

未名传记图书馆·社会学名家思想评传

帕森斯 学术思想 评传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德]乌塔·格哈特 (Uta Gerhardt)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8-24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 / (德) 格哈特著 ; 李康译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9.10

(未名传记图书馆 · 社会学名家思想评传)

ISBN 978-7-301-15864-7

I. 帕… II. ① 格… ② 李… III. 帕森斯, T. (1902 ~ 1979) - 社会学 - 思想评论
IV. C91-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243 号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first edition, EISBN 978-0-521-81022-7 by Uta Gerhardt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书 名: 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

著作责任者: [德] 乌塔·格哈特 著 李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864-7/C · 053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48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如果你认为，对于这些东西，乍读之下即可理解，那可要小心了。
你会领悟一二，但要真正理解，还得不断地追索、回味、再追索。

——帕森斯，“个人思想发展简述”
（“A Short Account of M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目 录

序 言	5
第一章 理解《社会行动的结构》	1
第一节 引 论	1
第二节 挥之不去的达尔文主义	16
第三节 事实问题	41
第四节 小 结	65
附论 何谓文化悲观主义?	67
第二章 帕森斯探讨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学: 1938—1945 年	73
第一节 引 论	73
第二节 战前时期	77
第三节 珍珠港事件之前	91
第四节 1942 年	111
第五节 迎接欧战胜利日	130
第六节 超越胜利	149
第七节 小 结	156
第三章 哈佛社会科学的应战努力与《社会系统》	159
第一节 引 论	159
第二节 哈佛社会科学应战努力的一些片段	161
第三节 帕森斯与哈佛应战努力有关的一些研究主题	168
第四节 帕森斯的三位哈佛同事所付出的应战努力	176
第五节 帕森斯对于投放原子弹的反应	182

第六节 帕森斯分析社会科学应战努力的备忘录的命运	188
第七节 第二稿备忘录, 一部不曾出版的著作	196
第八节 第三次努力	204
第九节 小结	216
附论 身陷政治围攻	217
第四章 有关公民权的新议程: 帕森斯的理论与 20 世纪 60 年代 的美国社会	225
第一节 引论	225
第二节 关于权力与政治体的新视角	230
第三节 理解价值承担	256
第四节 一般化符号媒介与关于社会的理论	264
第五节 有关整合与民主的新视角	277
第六节 引入社会共同体	284
第七节 有关整合的理论	303
第八节 小结	322
附论 变迁与危机的三个领域	323
跋 民主为旗 学术一生	343
参考文献	349
索引	356
中外人名索引	356
中外机构、团体、院校等专名索引	367
中外主题索引	371
译者说明	387

序 言

塔尔科特·帕森斯或许是 20 世纪社会学史上真正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尽管他毕生努力落实社会学理论，使其不仅仅是在单纯描述一些乍看如是的社会事实，但人们却指责他依然没有能力将反思性融入社会思想。尽管他孜孜以求，要阐述在一个愈益具有多元主义取向的现代社会里，意义取向 (meaning orientation) 有着怎样的动力机制，但人们却指责他塑造了一堆带有机械论意味的系统，适合一个令人窒息的“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尽管他本人致力于规划后纳粹时代德国的民主化政治方案，但人们却怀疑他庇护一个纳粹同情者进入了美国。尽管他从做博士论文开始就领略到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天才，此后更毕生自视韦伯主义者，但后辈同行们却认为他对韦伯 (还有涂尔干) 做了错误的解读，使人误入歧途，并屡屡尝试要将他们拯救出来，他不得不就此为自己辩护。

我之所以要撰写此书，旨在通过记述三件事情，让帕森斯的社会学著述更容易让人领会。首先，我希望揭示，帕森斯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 (乃至其后) 的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明确的知识旨趣，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民主，这既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追求，也是一套分析—经验性的方案。

其次，我想要记述，伴随着美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前后继替，这种对于民主的关注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政治议程的变更，从新政开始，历经二战和麦卡锡主义，到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最后是 70 年代的水门事件，帕森斯都在就自己对民主的关注作出相应的修正。

再次，我想指出，尽管他在自己纷繁多样的分析中，对当时社会的诸般问题和解决之道一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但终其一生，有两项基本宗旨却是始终不易。其一是警惕功利主义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交换理论，再到理性选择学说)，其二是效仿韦伯建立的社会学的概念框架，不仅认为社会可以如此观

测,而且认为社会实际就是如此。这种概念图式设想了一套双翼的社会行动系统,在两极之间摇摆,受人偏宠的一极是(代表民主潜力的)整合,令人恐惧的一极则是(代表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 危险的)失范。

帕森斯的著述包括十七部书,包括《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 1937)和《社会系统》(Parsons, 1951)这样的世界级经典,另有发表在学术期刊和各类文集中的两百多篇学术文章,并且屡屡被译成多种外语,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各类文选反复刊行。不仅如此,哈佛大学档案馆(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中还收藏有大量书评、讲演稿、备忘录、回忆录、研究计划、研究报告、讲话,以及数量庞大的信函及其他材料。^[1]

这套著作体系蔚为壮观,但却让人难以深入把握,即使对于美国学者也是如此。乍看起来,帕森斯的思想风格乃是取自德国,当他在海德堡求学时,读到了韦伯的原版著述,那是他第一次发现了社会学。据说,当50年代的哈佛学生被要求至少掌握两门外语,作为申请研读社会学的基本要求时,有学生询问“帕森斯语”(Parsonese)是否可以算两门中的一门。在他公开刊行的著述中,他以典型的韦伯式风格,从一种现象或问题的高度一般化的特性,推进到其诸般经验形式(而对于方法论预设的勾勒又常常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不过,根据哈佛档案馆中保存的资料可以看出,他在逐渐熟悉一项话题的进程中的行文风格

^[1] 本篇序言所使用的文献如下:Jeffrey Alexander,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Bernard Barber and Uta Gerhardt 合编, *Agenda for Sociology: Classic Sources and Current Uses of Talcott Parsons's Work* (Baden-Baden: Nomos, 1999); Max Black 主编,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Charles Carnic 主编, *Talcott Parsons: The Early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Uta Gerhardt 主编,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Uta Gerhardt, "From Brave to New: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War Effort at Harvard Univers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25, 1999, 第 257—289 页;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Robert S. Holton 与 Bryan S. Turner 合著,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86); William C. Mitchell,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Politics: Th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7);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以及 Bruce Wearne, *The Theories and Scholarship of Talcott Parsons to 195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并不同于定稿中的步调。他在关注某一现象的时候,既考察有代表性的历史记录,也考察有代表性的分析性阐述和经验性阐述,然后再在自己的讲演札记或论文初稿(或前后数稿)中给出尝试性的分析架构,并反复修改。

绝大多数二手阐述仅仅依据公开刊行的文本来研究,像这样的做法,往往不能充分重视他的分析的背景,甚或抓不住他的分析的出发点。即使是像尤尔根·哈贝马斯这样杰出的论家,在《沟通过行动理论》中既误读了帕森斯的治学之旨,也忽视了他的问政之心。而笔者此书则注重写作素材,讲演札记,或是帕森斯著述的各版草稿,以确保对它们的解读将(更加)充分。我将大量档案材料纳入了本书所使用的素材,注重分析帕森斯作品的四个核心阶段。我的目标是搞清楚,在他有关民主体制的社会学的分析中,主要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逐步积累起怎样的成就。我希望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中说清这位美国社会学家的伟大之处,以有助于重新理解他紧扣时代的社会学理论。 <xi>

当然,本书或许是站在一种欧洲立场上来写的。诸如此类的努力也许效仿了帕森斯在30年代的事业,那时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倡导当时称得上晚近的四位欧洲论家的学说,同时拒绝了斯宾塞式的自由主义,后者当时依然盛行于美国主流的社会学中。由此观之,笔者此书也许可以为当前对于帕森斯的诸多观点再添上另一种视角,力求通过一部思想传记来理解其著述体系,以补充许多现有的阐述。我打算基于一种大致上的欧洲立场,对一些已为人知乃至迄今人所未知的素材进行重新编排,以证明帕森斯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得益于他的政治立场,并与之紧密关联,满怀热情地倡导民主体制。

世易时移,评价亦会随之转迁。从60年代早期以来,帕森斯主要是被描述为一位以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为知识旨趣的理论家,与当时社会的政治保持距离。仅举数例,《帕森斯的社会理论》(Black ed., 1961)这一文集对他当时尚属创新的系统分析图式进行了重新概括,其中有些文章还给予了批评;《社会学分析与政治:帕森斯的学说》(Mitchell, 1967)严格基于政治学的角度,重新阐述了他有关行动和系统的一般理论[只讨论作为一名“不可救药的理论家”(incurable theorist)的社会学];《经典思想的现代重构:帕森斯》(Alexander, 1983)则认识到其著述分多个阶段,最终走向一个以“多维理论”

(multidimensional theory) 为特征的“晚期”，但却未能指出这种范式在其同时代的意涵，十章里有四章倒是在讨论据称是帕森斯的谬误之处。

80年代晚期，《帕森斯1951年前的理论与学术研究》(Wearne, 1989)一书开始认识到，帕森斯在宣扬社会理论的主张时绝非远离政治，但此书远远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描述了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和政治自觉是如何构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建构中的韦伯遗产。同时，《帕森斯论经济与社会》(Holton and Turner eds., 1986)不仅回顾了他的韦伯主义立场，也回溯了他在医学社会学之类专门领域中的各种成就。最后，《帕森斯早期文选》(Camic ed., 1991)和《帕森斯论国家社会主义》(Gerhardt ed., 1993)证明，他的一些迄今未曾公开出版或基本无人问津的文本，讨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诸多政治经济话题，视野宽广，论述深入。

本书将帕森斯的治学与其问政融为一炉。但基于美国思想史，这样的努力也应当符合韦伯的“价值无涉”(Wertfreiheit)[或“伦理中立”(ethical neutrality)]的原则。不过，在我理解问政与治学的关联时，也可以采用另一种视角。文化史家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其富于创见的《文化绝望的政治：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兴起》(*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一书中，阐明了思想评论中常常被忽视的一面。这个方面或许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诸般思路。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德国学人从宗教虔敬或大众哲学等角度出发著书立说，认为置身愈益加速现代化的时代，他们的文化正处在衰落之中。施特恩提出，这就助长了国族主义(nationalism)，因为这种论调预示了默认纳粹体制的克里斯玛式威权主义。在这种倾向下的文化悲观论就意味着，在时代精神(Zeitgeist)的疑似科学表现形式中，也隐含着政治。而在思想连续统的对立一端，否定诸如此类的文化绝望政治立场，无疑也是可以采取的一条道路。必然也存在着一种坚信社会进步的政治立场。这类政治将意味着倡扬民主体制，而这样的立场又寓于社会科学分析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式的世界观中，隐含着怀疑主义，传递着反民主的讯息，而拒斥这类讯息的立场必然乐于将民主体制理解成在现代社会的历史中不断演进。我认为，对于帕森斯来说，他的学术研究就体现出了这样

一种政治立场。不仅如此，我们将以丰富的材料记述，一旦需要，他就会作为一名活跃分子为民主事业而辩护，从未临阵踌躇。

早在阿默斯特学院读书时，年方 20 上下的帕森斯就十分明确地表现出这种远大抱负，要将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当问题在于将行为与道德相关联时，他对社会学中理论与事实之间关系的选择就放在了后者身上。他在一篇哲学课程论文中作出了如下论述，其措辞如实反映了他读过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William Graham Sumner)：

所有的理论都必须对事实作出说明，否则它们就毫无用处。理论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就那些广泛综合、意义显著的事实作出了说明。如果出现新的事实，不能适合理论，那么就不是调整事实，而必须调整理论。民德 (mores) 是普遍迟惰的，一般总会达成后一种结果。我们关于社会进化和道德进化的理论也是如此。自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时代以来，有大量事实开始为世人所认识，从而有必要对当时通行于生物学、社会学与人种学里的进化学说做彻底的修正。我们并不怪罪前人们的错误，我们认识到他们工作的价值，但我们并不视之为盖棺定论。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因此我们的概括能够比他们更加全面、更加精确。我们显然负有责任，用我们所拥有的事实，让这些概括尽可能确凿，并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事实。这意味着勤勉精益求精的研究，但只要有一点儿有价值的东西，结果就是值得的。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2]

帕森斯在其博士论文公开刊行的版本中，即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的头一篇 [这两篇文章其实是以连载形式出现的同一篇文章。——译者注]，探讨了符合严格地 (即便不是教条地) 以事实为基础的理论的社会观：“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不可能在我们现在所具备的基础上，持之以恒，打造某种更趋近于一个理想社会的社会……当然，在从

[2] Talcott Parsons, "Philosophy III. Professor Ayres. March 27, 1923. A Behaviorist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Morals", 第 23 页。参看哈佛大学档案馆, 帕森斯档案 (Parsons papers), 索档号 42.8.2, box 2。[本书下文有关档案材料将直接标示为“帕森斯档案”接索档号, 统一路径为“HUG-(FP)”。——译者注]

资本主义向另一种社会体系过渡的过程中，眼下的许多要素都会被铸入新的秩序。”^[3]

<xiii> 本书阐明了帕森斯是如何终其一生奉行这些观念的。整个故事将分四章来讲述，尽量为这位最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勾画一部思想传记。这四幕场景各自凸显他的社会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中尤其创新性的一个阶段，整个过程跨越了四十多年。

第一幕，也就是第一章，基于他所反对的两股发展趋势，描述了他的第一部世界级经典之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是（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拒斥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拿来与之相对抗的是从韦伯和涂尔干等那里得出的意愿论（voluntarism）；另一种对抗冲动针对的是欧洲当时的反民主政制（特别是德国的纳粹体制），他针对这种政制，伸张三位（或四位）“晚近欧洲作者”，以及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后者是对抗纳粹主义的一种政治现实。

第二章中的一幕重点刻画了帕森斯如何主要在 1938—1945 年期间，作为公民，也作为社会学家，公开对抗国家社会主义。他对德国和美国的政制做了比较分析，突出各自的结构要素。他还说明了（韦伯所谓的）法理型（rational-legal）社会如何转变成克里斯玛强制型（charismatic-coercive）社会，而克里斯玛传统型（charismatic-traditional）社会又如何转变成法治国（*Rechtsstaat*）民主体制。因此，我认为，他一生中从未像这个时段这样，集中分析极权主义专制。他分析这种专制的功能运作，并拿它与其对立面——整合社会（即美国民主体制）——相比较。

第三章中的第三幕场景乃是基于他的第二部世界级经典之作《社会系统》，阐明它是如何关联着美国历史上的两个具体背景。一是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应战努力，一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计划，通过“社会科学——一种国家基本资源”和“社会科学——一种国家资源”两份备忘录，与新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相关联。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探讨了众多与战争及其后果明确相关的话题，包括原子

[3] Parsons, “‘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Sombart and Web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6, 1928, 第 653 页。

弹的投放，他在讨论这个话题时，表面上是在谈科学之于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符号化(symbolization)]。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明确致力于理解民主系统的功能运作，哪怕只是作为他眼中的前专制体制转型的典范，比如40年代在德国和意大利所发生的过程，有朝一日也可能发生在苏联。

第四幕，也就是第四章，探讨了帕森斯所判断的另一场转型。那就是60年代，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发育成熟的民主体制，为所有的阶级、种族(族裔)等等提供完整的公民权。他的新理论有了全新的出发点，开始考虑他认为属于近在眼前的那些创新成就。他提出了两套理论模型来说明民主体制。一是通过一般化符号互动媒介(generalized symbolic interaction media)，其不断累积、扩张的性质使帕森斯必须提出新的权力概念，以及其他三个一般化符号化媒介的新概念。另一套模型集中关注社会共同体[注意这个词的原文是“societal community”，不是“social community”。前者是社会层面上的，相对于超社会、亚社会之类共同体；后者是社会维度上的，相对于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译者注]，这种形态典型地体现了充分发育的现代社会中的民主体制。他觉得，这种新思路要求理论更换新名：“进化控制论”(evolutionary-cybernetic)。至此，他对民主体制的关注达到了巅峰。

<xiv>

在这套著述体系的所有四个阶段，从《社会行动的结构》开始，延续到60年代乃至其后，帕森斯对于民主体制的捍卫始终意味着，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可能性：一种极端是失范(anomie)，另一种极端则是整合。当然，只有后一种意味着民主，尽管它也总是受到威胁，有可能坠入某种失范(例如麦卡锡主义)。这种双重聚焦使整合—失范这一区分成为某种变项。在他的思想生平四个阶段里浮现出来的主题，标志着民主化进程的得与失(与复得)，正是这激发着他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与时俱进。

本书使用了一些此前公开刊行的材料，但经过了彻底的重新研究。第一章重新阐述了我在《社会学议程：帕森斯著述的经典源泉及其当前运用》(Barber and Gerhardt eds., 1999)这一文集里的文章里提出的观点。第二章乃是基于《帕森斯论国家社会主义》(Gerhardt ed., 1993)的编选前言。第三章进一步发挥了“从美丽到新：帕森斯与哈佛大学的战时努力”(Gerhardt, 1999)一文中的观点

[原书参考文献无此项,原文为“From Brave to New: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War Effort at Harvard University”。——译者注]。第四章则是全新之作。所有四章都补充了档案材料,使之融为新的统一解释,尽管其中三章的观点是此前以某种方式公开发表过的。

本书大大受惠于多方协助。其中,哈佛大学档案馆与哈佛图像服务处(Harvard Imaging Services)的帮助令人难忘。哈佛的欧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资助我多次作为合作研究者造访,这对完成本项研究至关重要。我还特别希望感谢阿比·柯林斯(Abby Collins)与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的支持。我感谢以下人士的讨论、指点、批评与鼓励: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京特·恩德鲁魏特(Guenter Endruweit),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迪特尔·亨利希(Dieter Henrich),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rschel),芭芭拉·海尔(Barbara Heyl),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埃娃·卡哈纳(Eva Kahana),克劳斯—彼得·克平(Klaus-Peter Koepping),爱德华·莱曼(Edward Lehman),克里斯蒂娜·莱姆克(Christiane Lemke),唐纳德·莱文(Donald Levine),维克多·利兹(Victor Lidz),雷纳塔·迈因茨(Renate Mayntz),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斯文·帕普克(Sven Papcke),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安妮·罗尔丝(Anne Rawls),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尤斯廷·施塔格尔(Justin Stagl),爱德华·蒂利亚基安(Edward Tiryakian),哈维尔·特雷维尼奥(Xavier Trevino),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以及布鲁斯·沃恩(Bruce Wearne),等等。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玛丽·柴尔德(Mary Child)作为一名编辑,在许多方面堪为楷模。

我要对伯纳德·巴伯(Bernald Barber)致以最深切的谢意。五年来,我逐渐理解了帕森斯捍卫民主体制的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不仅是一位热诚的论家,也是一位忠实的良友。

本书敬献于他,以表谢意。

理解《社会行动的结构》

<1>

第一节 引 论

帕森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社会行动的结构》于1937年问世，但初版时并未成为社会学的经典之作。^[1] 尽管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和新创办的《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上皆有书评，甚至在读者面更广的《周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上亦有推介，但并没有形成交口称赞之势。

当时供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罗伯特·比尔施泰特，在《周六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智人？”，称帕森斯为“一位海德堡训练出来的哈佛社会学新秀”。^[2] 比尔施泰特觉得，此书与客观经验主义的思路截然相对，于是

[1]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New York: MacGraw Hill, 1937)。广告文案的第一段写道：“本书……对于社会系统之结构的理论的分析，是从‘行动理论’的角度来呈现的，以手段和目的的关联作为出发点。以这样的思路来切入主题别具新意，因为此前没有任何人曾经尝试过，在可堪比拟的一般性层面上，结合经验问题来分析这一特定的理论结构，也不曾结合这种结构，将晚近几位欧洲论家的著述融为一体。”参看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8.2, box 2。本书第二版于1949年由 The Free Press, Glencoe, IL 出版，平装本1968年由 The Free Press/Collier Macmillan, New York 出版。本书将使用后来的版本，并用 *Structure* 来指称本书。

[2] “Is Homo Sapie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By Talcott Parsons. Reviewed by Robert Bierstedt”, *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1938年3月12日，第18版；以下三则引语摘自同版。

指出，“像《中镇变迁》的作者这样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大概不太可能“愿意费心去读《社会行动的结构》”。在他看来，此书提出了一种主观主义思路，“从……理论会通 (convergence) 中得出‘意愿论行动理论’”，据称能够“赋予社会学属于自身的明确领域”。

但比尔施泰特并不推荐帕森斯此书。他看不出此书解答了社会学的有关问题，更不用说会像 80 年代末纪念其出版五十周年时那样，称誉其为一部“社会学宪章” (charter for sociology) 了。^[3] 在 30 年代后期，即使是曾经和帕森斯同学的比尔施泰特，也认为《社会行动的结构》的解答远远称不上令人满意。他在 1938 年评论道，在帕森斯的意愿论包装下的“一种主观的社会学在科学角度上的用益，大致相当于一首十四行诗之于一只云雀。而‘意愿论行动理论’将会使威廉·詹姆斯——或许还有帕累托——九泉之下不得安宁”^[4]。

路易斯·沃思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评论学术性要强得多。他承认，“此书将每一位作者都和其他所有作者相比照，因而并不仅限于简单的评注”^[5]，所以觉得它“对于诊断我们当今的理论之争——可以补充一句，不仅是语词之争——而言，颇具意义，也大有助益”。但沃思对帕森斯的支持仅限于此。他认识到，帕森斯试图综合四位大家的著述要素，超出经济学或政治学的领域，为社会学勾勒独特的领域。但他未被说服。他批评道，要设想一门社会学，能够分析某种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实在领域，根本毫无依据。根据他的评判，尽管帕森斯“有关纯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区分”言之有理，但他有关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分工的观念，充其量只是“粗浅地阐述了强调重点的不同”^[6]。总之，沃思认为，此书最为致力地方恰恰贡献最微。就“更好地理解理性的意义或理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7]而言，沃思认为此书无甚可观。

[3] 例如可以参看 Charles Camic, “Structure After 50 Years. The Anatomy of a Char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5, 1989, 第 38—107 页。

[4] “Is Homo Sapiens?”, 第 19 版。

[5]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Review by Louis Wir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 1939, 第 400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6] 同上引，第 404 页。

[7] 同上引，第 402 页。

第三位评论者是弗洛伊德·N·豪斯。回头看来，他对《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两个版本都做了评论，但都未能理解作品的重要意义。在1939年，他赞扬此书“为澄清价值观念在社会行为中的地位这一久悬不决的难题所作出的贡献”^[8]。而到了1950年，他的评价甚至更低。他提醒读者，自己曾经评论过此前一版，而“现在这一版……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新印而已，仅仅多了五又三分之一页的新版序。”^[9]他主张，虽然自己“基本完全赞同作者整个的推理”，但也不揣冒昧提出一个假设，试图说明为何此书初版对于美国社会学影响甚微：“我猜想，这本重要作品之所以似乎遭人忽视，原因正如我在1939年所预见的那样：‘不幸的是，它是如此冗长，行文如此玄奥，让许多原本可能从中受益的美国社会学人望而却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豪斯1939年的预测固然没有错，但1950年的预测就错了。书还是那本书，因此大概还是那么“冗长”，那么“行文玄奥”，但却成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典。从1950年代开始，学人们看来似乎不再“望而却步”，尽管豪斯的论断言犹在耳。显然，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初版与再版之间，大多数社会学家的头脑或心理经历了某种转变。1950年时，当豪斯指出，1937年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在美国学者中的受众面很小时，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但当他认定书的再版不会改变这种局面时就犯了错。1949年的再版刊行很成功，尽管其实1949年的此书“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新印而已，仅仅多了五又三分之一页的新版序。”事实上，此后十年，它成为社会学课程的必读文献。到了70年代，此书进一步成为经典。深入分析此书的二手研究接连不断。^[10]1968年刊行的平装本最终使该作品流传全世界。它成为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8]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Review by Floyd N. Hou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1939/40, 第129页。

[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Review by Floyd N. Hou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5, 1949/50, 第505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0] 诸如此类的评析之作有许多，仅举两例：Robert Bierstedt, *America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Donald Levine,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都花了一整章来讨论《社会行动的结构》。

一、政治的关节

《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初版与再版影响判若云泥，引出了一个迄今无人细究的问题：如何说明二战前后对于此书明显不同的接受状况？

当然，这个问题预设：对于一部社会理论著作的接受状况，关系到在社会学领域的科学共同体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中的接受状况。那么一门学科中的经典作品是否以某种可辨识的方式，关系到把握它们内涵时所处的那种历史情境或社会情境？学者们是否根据当时所处社会的视角来领会社会理论？我的观点是：社会学家之所以在二战之后而不是之前开始对《社会行动的结构》产生浓厚兴趣，是因为在此书两个版本之间的十年里，历史情境出现了转变。

历史情境中的显要一面在 1937 年或 1939 年时还只是初现端倪，但到了 40 年代后期，却已是暴露无遗，那就是通过五十个国家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的同盟作战，挫败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挫败了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不仅如此，到了 40 年代后期，已经有不少分析性的阐述，剖析德国如何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无可匹敌的罪行。到了二战结束时，纳粹政权所犯下的难以言表的反人类罪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公众为之震惊。^[11] 就像 1944—1945 年间的情形一样，纳粹的暴行成为得到证实的真相，战后的世界开始对此作出说明，学术阐述和文学描叙不胜枚举，至今不绝于耳。^[12]

我认为，对于 40 年代后半段来说，时人的大多数，包括社会学家，都面临

[11] 1945 年春天，欧洲远征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发起了一场广泛深入的宣传攻势，美国公众才开始知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残暴罪行。参看 Norbert Frei, “Wir waren blind, ungläubig und langsam”. Buchenwald, Dachau und die amerikanischen Medien im Frühjahr 1945.”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35, 1987, 第 385—401 页。

[12] 二战结束后不久刊行的德国人的阐述包括：Eugen Kogon, *Der SS-Staat. Das System der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 Fischer 1946), 英译本为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The Germa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e System Behind Th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Co., 1950); 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Fred Mielke, *Das Diktat der Menschenverachtung*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1947), 英译本为 *Doctors of Infamy* (New York, 1949)。至于美国人的阐述，比如可以参看 Morris Janowitz, “German Reactions to Nazi Atroc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1946, 第 141—146 页。

着一种不可否认的迫切需要，即分析作为一种恐怖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尽管从30年代开始，一直就有以德国专制政权为焦点的作品，但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在二战后而非二战前接受《社会行动的结构》，背后的推动力必然与此书的政治立场有关。我的看法是：不是在它最初问世之际，而是在它于1949年后获得成功之时，人们才认识到《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宗旨，哪怕只是间接的认识。我希望提出的主张是：帕森斯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从科学的视角去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何以作为民主的社会行动结构的对立面。

《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是在1933—1937年间写成的，历经各种有关德国和战争的话题的讲演，备忘录，以及最终成型的文章。这是一部和30年代的动荡岁月密不可分的著作。它的再版获得成功之时，也就为二战后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答案，以回应如何在有关社会行动的结构理论中概括恐怖政权的问题。

我的主张可能看上去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将帕森斯本人的关怀与韦伯将政治与社会学相分割的价值无涉原则相对立。其实，帕森斯本人也意识到这一表面上看来的悖论。他曾经写了长达八页的信回应沃思的书评，评论后者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的看法。帕森斯在信中说明，自己完全赞同韦伯。但是认可韦伯追求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就应当自我克制，不去认识威权政制的非民主性质。他宣称：“我将社会学与政治相区别，并不意味着认为具体的权力关系与价值观念毫无关联。”^[13] 尽管按照韦伯的传统，社会学确实不能采取某种政治立场，但他觉得，《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有某种特定的政治格调。在任何历史社会或当代社会中的社会关系都必然具有政治性质，承认这一点，并不能被视为逾越了社会学的领域。也就是说，即使他认为，社会行动的结构乃是具体定位在那个时代的世界之中，要么是强制性控制体制，像在威权政制中的情形；要么是国家权力的自愿削减和公民权利的确立，像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中促成民主体制的那种法治国里的情形，这时的他依然遵循着韦伯的道路。

无论如何，帕森斯在写给沃思的信中，说明了自己是如何看待此书的成就的，措辞警省，提醒要注意避免粗浅的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

[13] 帕森斯1939年10月6日致沃思函，帕森斯档案，HUG (FP)-42.8.2, box 2。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5>

区分只是分析性的，而不是对于具体社会结构的分类。对于我从经济学理论的地位的角度一直在探索的方法论问题而言，关键在于，像经济学理论或是社会学上的对应类型之类的分析系统，拿来分析各类具体现象，实际上不仅不是适当的图式，而且也不可能是适当的图式。正相反，社会学要素不仅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体现在政治世界，也体现在经济世界。反之亦然。

他在书中的立场涉及方法论对于具有实质宗旨的分析的两种指导方式。一方面，显然必须细致核查经济学理论或社会理论中有关的概念模型，它们讨论的是什么构成一桩事实并因此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此看来，实证主义的功利论也就未能通过方法论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检验。）另一方面，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分析了同时代世界的那些理论，即需要调整而非批判其概念成就的“晚近一些欧洲论家”的理论，浮现出了一种意愿论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重新构建了取自四套理论的深刻见解，最终有两章作为结论，一章是有关实质发现，另一章是有关“方法论意涵试探”。^[14]当他强调自己的论点是方法论性质的时候，其实也是事实性的。他倡导一元论，也就是在驳斥实证论。他反对功利主义的实证论，尤其是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外衣的那种实证论，宣称其“已死”，尽管在他那个时代，这种思潮还远远谈不上已死。当他说要彻底消灭它时，其实是在谈自己所处时代的思潮，说其披着某种“已死”的东西的外衣。他指责那种与“已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种族主义）相联系的政制，同时伸张其对立面，即现代社会中的民主体制。他自己的理论——被称为意愿论——宣称认识到了韦伯所说的科学概念的建构性质。

晚年的帕森斯承认自己早期著述中的这种认知旨趣。60年代末，他在两份不同的自述中承认，自己在写作《社会行动的结构》时关注着德国问题。他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文集收录了其在1942—1945年间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四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他在第二编的编序中，回忆起自己关注这一话题的动机：

我在1927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场求学德国的经历对我的一生至关

[14] 这是第十九章的标题。[现中译本该章标题为“方法论试探”。——译者注]

重要……在海德堡，我接触到了大多数人眼中的德国文化之精华……但到了二战前我最后一次造访德国，也就是1930年夏天，许多东西都已发生了变化。纳粹运动羽翼丰满……在所有关注当时西方世界社会政治进程的观察家看来，纳粹运动不仅暴露出思想上的问题，而且有深层的道德上的问题。或许我可以这样说，这些问题对于我的冲击，要比对于其他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更加尖锐，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德国经历，还因为事实上，我已经对我所知道的那一面德国敬慕有加。关键问题在于，在这个从其他方方面面都应被评为“好社会”的地方，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又是如何发生的？^[15]

1969年，帕森斯为美国文理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6>又译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刊《代达鲁斯》（*Daedalus*）组织的一场会议撰文，回顾自己的思想经历，并在这份有关自己如何构建社会系统理论的回忆录中，揭示了自己写作《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动机。帕森斯承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构筑了事实层面上的一个牢固根基，驱使自己去研究社会行动的结构（他还提到了俄国的共产体制，作为另一个专制政权，也是他的研究目标）：

《社会行动的结构》标志着我的职业生涯的一次转折。它的主要成就，即证明所探讨的四位作者之间的会通，还伴随着阐明并进一步发展我自己关于西方社会现状的一些问题的思想，而这些问题也是那几位作者所关注的。西方社会的现状可以归为资本主义体制或自由企业体制，而在政治方面则可以归为民主体制，当时显然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俄国革命和共产党所控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从我本科开始就一直是考虑的关键问题。法西斯运动影响了我在德国的交游。书出版不到两年，二战就爆发了。最后是大萧条，并波及全世界。^[16]

至于说到实存的社会类型，可以将现代福利国家与当时存在的国家社会主

[15] Parson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troduction, Part II)",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第59—60页。

[16] Parsons,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Daedalus*, vol. 99, 1970, 第826—882页, 本处引自第831页。

义政制相对照。在帕森斯的心目中,前者意味着一个整合的社会,后者则代表着失范。

二、“公民学”的意义

1937年书的初版广告文案,把这本书概括为“典型意义上的‘公民学’”(“‘civics’ in the highest sense”),但这本书前后三次出版时的各式书评均未注意到这一主题。耐人寻味的是,广告所做的这一概括引的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话,照搬了他的评语:“所有关注社会进程的哲学的人,都将发现本书……读之发人深省。它不仅推进了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也推进了典型意义的‘公民学’。”^[17]

熊彼特确实读过书稿,即使只是初稿,题为《社会学与人类行动诸要素》。
<7> 熊彼特在致哈佛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赞扬该书以“细致的学术眼光”^[18],让美国读者得窥韦伯思想等德国思想资源的堂奥。熊彼特指出,除了对帕累托和马歇尔这两位的前说,帕森斯还加上了涂尔干,从而拒斥了实证主义,哪怕是最初孔德式的实证主义传统。^[19]他还评论道:“他的绪论和结论各章论理确凿,博学睿智,不过我认为,它们还比不上致力于批判性阐释的那些章节。”^[20]相比对实证主义的拒斥,熊彼特似乎更欣赏帕森斯通过四大理论的会通来伸张意愿论的论证。帕森斯所称的“分析实在论”(analytical realism)^[21]在熊

[17] 广告文案的下半段全文如下:“哈佛教授约瑟夫·熊彼特对本书作出如下评价:‘对于那些创造出重要的观念体系、支撑起现代政治思想的人们,美国读者的了解还是相当欠缺的,或许帕累托是个例外。帕森斯教授通过一系列博学睿智的分析,展现了其中某些人的要旨,并最终将它们融入他自己的结构。所有关注社会进程的哲学的人,都将发现本书……读之发人深省。它不仅推进了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也推进了典型意义的‘公民学。’”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2, box 2。

[18] “In re: Mr. Talcott Parsons’ s manuscript: *Sociology and the Elements of Human Action*. To the Committee 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经济系 J. A. Schumpeter 的备忘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38年12月23日,第1页。此份备忘录系尼科·施特尔惠示于我。

[19] 同上引,第2页。两句相关的话是:“对于涂尔干的精细阐释为我开启了此前我不曾注意或理解的一个体系中的许多幽微之处。还应当补充一点,理解涂尔干就涉及理解孔德的传统,他的著述大部分溯源于此,而在我看来,帕森斯先生成功地经受了这一考验。”

[20] 同上引。

[21] 参看 Parsons, *Structure*, 第757页。

彼特看来，^[22]显然不如帕森斯“综合的”(synthetic)社会行动概念更具说服力。^[23]

早在1936年，熊彼特就注意到了此书的反实证主义立场，尽管他并不认为这是此书最突出的成就。帕森斯的反实证主义立场是打着拒斥斯宾塞社会学的旗号来表现的。而对待斯宾塞的这种立场又是取自他和熊彼特的共同同事，哈佛史学家克莱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当时刚出版的一部著作。

帕森斯的开篇第一段就引用了1933年问世的布林顿所著《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24]，表达了他对实证论功利主义的拒斥立场，摈弃了斯宾塞。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不仅斯宾塞的社会学已过气，就连他的政治思想也已死亡。^[25]在将近八百页的巨著《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开篇，帕森斯借布林顿的话明确指出，斯宾塞的著述包含了有关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一种政治观念，不仅如此，这种观念在30年代也可以判断已经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得不宣告，在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当中蕴含的宗教力量甚至仪式力量已经死亡。就这样，借布林顿之口，他明确提出，尽管斯宾塞此前，也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曾经“造成了……震动”，但现在，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经过气，不合时宜。帕森斯表示，随着斯宾塞政治哲学令人瞩目地“死去”，他对自己认为已经发生的这桩“罪案”很感兴趣。

<8>

^[22] 熊彼特或许对帕森斯的“分析实在论”有所怀疑，因为帕森斯主张，要实现“对于许多具体现象的充分理解”，或许需要“使用的分析范畴取自不止一个……(分析范畴)体系，或许取自好几个”。然而，熊彼特或许更赞同“对于理解任何给定的具体现象类别，只能使用一个分析范畴体系。”[这两句话参看《社会行动的结构》第757页，后半句正好是帕森斯的分析实在论所反对的经验主义的立场。——译者注]

^[23] 卡米克在《社会行动的结构》出版五十周年纪念时所写的志庆文章里提到，帕森斯自己对于其思路的概括就是“分析实在论”，并且引证了三处他认为是在讨论分析实在论的地方。据称这些地方在书后索引中都有所标示。然而，如果更细致地审查，会发现其中有两处索引查无原文。另一方面，卡米克未能注意到，帕森斯本人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的索引中指出有三处行文与分析实在论有关，其中有两处未被卡米克意识到。参看 Camic, “Structure After 50 Years”, 第53页; Parsons, “Structure”, 第lv页。

^[24] Crane Brinton,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初版于1933)。

^[25] 帕森斯引用布林顿的话如下：“谁现在还读斯宾塞？我们难以认识到，他曾经给这个世界造成了多么大的震动。……他把上帝称作进化原理，而他就是这位很不令人满意的奇怪上帝的密友。可他的上帝已经背叛了他。我们进化的程度已经超越了斯宾塞。”Parsons, *Structure*, 第3页。以下八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他借助布林顿的判词，假扮一位验尸官的腔调，认为斯宾塞的政治思想在 19 世纪下半叶或许算得上充分胜任，但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却是派不上用场。帕森斯利用布林顿所主张的摈弃整个这股政治思想传统的立场，搭建了一个平台，由此分析“实证论功利主义传统”的致命缺陷。

在开头的两段中，他做了两件事。其一，他判断斯宾塞政治哲学中准宗教性的教义的死亡不容否认，并认为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属于更大范围内的实证论功利主义。他这一观点的措辞煞是怪异，说斯宾塞有“一位很不令人满意的奇怪上帝”，“他把上帝叫做进化原理。……已经背叛了他”。然后他开始引入自己的方案，用的词是小写而非大写的“进化”（evolution but not Evolution）。他宣称，随着斯宾塞的“上帝”即进化论（Evolutionism）的死去，斯宾塞的政治哲学也已死去，而非机械论、非实证论的行动理论则将进化而来（evolved）。后者作为“科学理论进化（evolution）”的产物，也就是他自己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说明，将在书中予以展示。而在其论证过程的这个早期阶段，他用一句恐怖小说般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方案：“我们必须赞同这种判词：斯宾塞已死。但是，是谁杀死他的呢？又是怎么杀死的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斯宾塞是……实证论功利主义传统……的一位典型代表。这股传统出了什么事情？它为什么已经死了？本研究将提出，它是进化这个嫉恨心很强的上帝报复的牺牲品，而进化（Evolution）在这里就是科学理论的进化（evolution）。”

帕森斯 1937 年 9 月曾撰写了一篇序言，后来又应出版商麦格劳·希尔的要求，舍弃不用。他在原稿中明确指出，自己起初的“兴趣只在于多位作者所探讨的经济个体主义的经验问题”^[26]。但是他告诉人们，随着工作的推进，他发现这“四位欧洲作者”各自独立地提出了类似的解决之道，促使自己研究其会通。他说道，尽管自己研究的首要重点现在成了“理论体系的形成”，“不过，有必要指出，这并非起初的重点所在”。他继续指出，“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研究形成的早期阶段，作者并未意识到有什么诸如意愿论行动理论之类的逻辑整合的体系，更不用说意识到本研究所讨论的三位主要作者在该体系的轮廓上有所会通。”

[26] “Preface”，标注有“新罕布什尔州 Alstead, 1937 年 9 月 15 日”，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42.41, box 2, 第 5 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而在正式刊行的序言中，帕森斯删去了这句述及自己最初观点的话。他不再提到自己最初并未推测，在四位论家对于经济个体主义的不同观点背后，会存在一种统合的实在。与此同时，在标注日期为“1937年10月，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公开刊行的序言中，他比未刊版本更加充分地强调，自己关注的是经验问题。并且他现在知道，他所关注的这些问题，也是他要解释的那些著述的作者们所关注的问题。

真正的科学理论不是闲散无据的[原文为“idle”，兼取其“无所事事”、“无凭无据”、“琐碎无聊”、“徒劳无益”等义项。——译者注]“思辨”的结果，不是纠缠于一些预设的逻辑意涵，而是从事实出发又不断回到事实的观察、推理与证实的产物。因此，本书在每一关键之处，都会明确探讨有关论家所关注的那些经验问题。只有将理论与经验问题和事实如此紧密地关联起来加以探讨，才能以某种方式充分地理解，理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对科学又有什么意义。^[27]

帕森斯明白，这样忠实于事实，意味着必须更加细致地确认与事实相关联的科学的性质。

然而，无论在哪一个版本的序言里，他都没有具体说明，考虑什么样的事实才是检验理论性质的试纸。他倒是提到了一些对于自己以及他所探讨的那些作者来说比较具有相关性的经验问题^[28]，但他未能充分具体地阐明相关经验话题究竟是什么样的。至于他那个时候的经济个人主义之类事项在经验角度上的具体结构究竟是什么，他却惜墨如金，不多与读者分享。

不过，哈佛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迄今未被发掘的材料，或许更清楚地展现了他有关社会行动之结构的理论旨在应对的那些经验事实。他有一次演讲，大概是1938年3月，是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发表的。他在此次演讲中，显然在脑子里考虑了当代社会行动的结构（或多种结构）。他的手书讲演札记带有一些子标题，诸如“失范”、“价值”、“强力”等等，同时谈的是德国（纳

[27] 引自 *Structure*, 第 xxii 页。

[28] 即“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和“经济个体主义”。参见同上引, 第 xxii 页。

粹)社会。^[29]他草草记下一些关键词,风格类似刚刊行不久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这些关键词清晰表明,当他使用其意愿论学说的关键概念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德国]出于明确的社会学理解的目的,他将纳粹德国与美国做了对比。

例如,讲演札记的第1页和第3页的子标题均为“失范”,按照他的笔记稿<10>纸上的语句排列次序,抄录如下:

失范:

迅速工业化

阶级结构变迁

国族主义^[30]

犹太人

挫败与羞辱

目标与手段^[31]

失范——制度整合的瓦解

个体化

流动——工业化

作为对立面的国族主义

阶级结构——从未完全整合

犹太人计划——解放但不同化

迅速兴起夺取国家权力。挫败与羞辱。^[32]

他在札记中以类似的方式,开列了两次“价值”,但在两个相互分离的标题

[29] 讲演札记的标题为“纽黑文”,并附有日期“1938年3月”,藏于帕森斯档案,HUG(FP)-42.45.4, box 1。其他相关讲演稿分别标有“1938年3月3日, Gov 16”、“1938年3月3日, Soc A”、“1938年2月16日, Shop Club”,皆藏于帕森斯档案,HUG(FP)-42.45.4, box 1。

[30] 在稿纸上,这个词其实是写在边上,但标出了它在主题顺序中的具体位置。

[31] 题为“纽黑文”的讲演札记,第1页。有些单词的首字母在英语中通常不大写的却大写了,这是帕森斯自己的写法。[这里指“手段”。全书类似情况,中译只能一一注出,避免与其他强调格式混淆。——译者注]

[32] 同上引,第3页。

下，具体讨论的主题有所不同，详文如下：

价值——纳粹运动的情感—意识形态一面：

一种重新整合 (re-integration) 的现象

困惑 (Confusion)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所有革命运动

执迷 (Obsessiveness) ——犹太人、共产党人——外敌——将他们合为一谈的倾向。

妄想症 (Paranoid) 倾向

暧昧 (Ambivalence) ——尤其是对于科学+学问的态度

大众恐惧症 (Mass neurosis)? 正常人对于不正常的社会情境的不正常反应。^[33]

价值——

自由主义在德国始终遭遇到比别处更多的对抗

威权主义结构破坏力强，但却没有提供什么取代物。^[34]

一个子标题提到了“强力”，他在此处记述道：

强力——帕累托——

内部应用与外部应用。取得成功，但缺乏统合性。^[35]

在讲演札记的最后，他做了如下概括：

现代专制基本上是社会解组的产物。

后果：

从普遍主义基础转向特殊主义基础——

元首制 (Führerprinzip)

种族

科学——白色犹太人 [此处原文为 “Weisse Juden”，指白色人种中的犹

<11>

^[33] 同上引，第1页。

^[34] 同上引，第4页。

^[35] 同上引，第2页。

太混血儿或所谓“精神犹太人”，即同情犹太人的人。——译者注]

法律——攻击罗马天主教

普遍主义对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罗马的遗产+基督教

从专门性到弥散性

职司 (office) 概念的瓦解

(原稿此处两个词无法辨识) 缺乏流动的传统主义的危险。^[36]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笔记使用了失范、价值、强力等概念，并明确提到了帕累托，间接提到了涂尔干和韦伯，而所讨论的话题显然涉及纳粹德国。

在1938年3月3日发表的标注“Gov 16”的讲演中，帕森斯又一次援用了取自《社会行动的结构》的概念。在讲演札记中，他如此表述自己的话题：

分析“社会中的人”的全面综合的单一概念图式 社会行动理论……

秩序问题……

问题的两个主要来源

1) 缺乏完好的价值整合。霍布斯假设随意的目的——理性——因此问题主导了他的思想……

2) 达成目的的手段的可利用性；未充分考虑

a) 价值系统 b) 同系统中其他人的权利

a) 没有预设对于“牺牲品”的理性的限制：协商权力与强制

b) 涉及以下限制

欺诈+宣传

合起来便是“权力”……^[37]

这就意味着政治是《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某种背景。帕森斯不仅反对

^[36] 同上引，第4—5页。

^[37] 讲演札记，“Gov 16”，标注日期为1938年3月3日，第1—2页；见帕森斯档案，HUG(FP)-42.45.4, box 1。

德国法西斯主义，而且甚至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前，从1930年左右开始，就已经支持福利国家的各项制度，^[38] 将社会学列入政治议程。他通过使用某些社会学范畴，比如普遍主义、职司的概念、避免缺乏流动的传统主义等等，传递出自己对于新政自由主义的信奉。^[39] 他认为，平等主义的福利国家（促进普遍主义的公立教育）是一条彻底的人道主义道路，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实现机会平等。 作为对比，他反对斯宾塞、萨姆纳以及其他反对乍露端倪的福利国家的人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种族主义，还是它不那么张扬的版本，即被19世纪晚期达尔文主义世界观迷住心窍的社会理论中的进化论，都有待克服。他明白，意愿论是支持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学通过意愿论，既有益于整合的社会，也有助于理解社会行动的结构。

我的论证会比较细致地回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我希望阐明《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在30年代制定现代社会学研究议程时所针对的那种学说。当时大多数社会学是如何配合（依然属于）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欧洲的国家社会主义，只有基于这一背景才能表明，要想理解当时的社会，就需要社会学。

为了展现社会学在20世纪30年代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程度有多深，我必须回溯到19世纪50年代。

^[38] 关于他在1932年之前的政治立场，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能够找到一些证据。他告诉世人，自己在30年代中期成为一名医学社会学家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医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这等于说他在1930年及其后一些年引入大众健康保险制度的一名先行者。参看 Parsons,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Bearing on the Field of Medical Sociology", 收入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London: Free Press, 1964), 尤其是第326页。但令帕森斯引以为憾的是，由于与美国医学协会 (AMA,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的健康保险理念相违背，这项福利计划的实现前景渺茫。有关一些背景信息，参看 Gerhardt, "Models of Illness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5, 1990, 尤其是第340—342页。

^[39] 霍华德·布里克令人信服地指出，帕森斯在30年代乃至其后都坚定地支持罗斯福的政策。他从帕森斯身上看到的是一位持进步主义立场的自由派，并给出了证明。参看 Howard Brick, "The Reformist Dimension of Talcott Parsons' s Early Social Theory", 收于 Thomas L. Haskell 与 Richard F. Teichgraber III 合编的 *The Culture of the Marke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第357—396页。

第二节 挥之不去的达尔文主义

帕森斯引用布林顿《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视斯宾塞为彻底被人遗忘而不屑一顾。^[40]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开头，像侦探小说一样宣告斯宾塞已死，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是谁杀死他的呢？又是怎么杀死的呢？”^[41]并且继续推测，是“进化……的报复”导致了“科学理论的进化”，在他想来，无疑是这一点“杀死了”斯宾塞。显然，“科学理论”是通过《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副标题所言“晚近一群欧洲论家”的理论中的会通要素形成的。诸如此类的俏皮概括，有助于帕森斯回避重新阐述斯宾塞的理论。而他在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念时，仿佛假定自己已经充分了解了斯宾塞的观念。他更如法炮制，将实证论功利主义与斯宾塞视为一体，大加贬斥。

<13> 今天，对于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源头的斯宾塞，人们似乎知之甚少。人们几乎不记得，斯宾塞的社会学当时是如何刺激了美国思想中的精英主义，最后又是如何刺激了德国大学乃至政治中的种族主义。我认为，这就是《社会行动的结构》字里行间潜伏的故事，需要重新讲述。

一、斯宾塞与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学的历史

斯宾塞1893年在其《伦理学原理》新版序言中抱怨，世人将原本是他创造的“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概念归到达尔文的头上。但他也坦承，“当

[40] 帕森斯引用的布林顿讨论斯宾塞的一章开篇如下：“谁现在还读斯宾塞？我们难以认识到，他曾经给这个世界造成了多么大的震动。《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充斥了众多的书架，是书架上最为厚重的书籍。在每一位经历思想巨变的英国人的书架上，它和巴克尔与穆勒的著作并肩而立。人们阅读它，探讨它，争论它。而现在，它成了旧书市场上的滞销货，基本不能激起那些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德国人或美国人的兴致。”布林顿简要论述了斯宾塞是否还值得去讨论一二，然后下了结论：“斯宾塞本人从不心怀宽仁，至少在思想上不心怀宽仁。他似乎从不容忍任何怀疑。在那个肯定不偏向怀疑论的世纪里，要论自以为是、缺乏宽容，几乎没有思想家能胜过他。他把上帝称作进化原理，而他就是这位很不令人满意的奇怪上帝的密友。可他的上帝已经背叛了他。我们进化的程度已经超越了斯宾塞。”参看 Crane Brinton,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第226—227页。

[41] 参看 *Structure*, 第3页；以下四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然,当我发现那些在 1850 年时已经垂死的观念现在却又普遍扩散开来,心里一样非常满意。”^[42]他具体指出,自己创造的是“进化的伦理观”与“‘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学说”,早在 1859 年达尔文的首部重要著作开始推广它们之前,就已经由自己确立。斯宾塞认为,19 世纪 90 年代的公共意象错误地蕴含了“一种印象:这些都是达尔文先生观念的后续产物”。他要澄清,“有机进化的学说应用于人的性格与智力,由此也就应用于社会,要早于《物种起源》。”^[43]

斯宾塞所言非虚。他早在 1852 年即已说明^[44],动物和人群中的数量增长都是主导自然选择的法则的后果,选出的就是最能约束自身或最能适应外界者。斯宾塞说明道,自己所引入的这种法则适用于整体意义上的生命,从单细胞有机体到智人。他主张,在自然界中始终盛行着同一种矛盾,即个体化与繁殖的矛盾。个体化意味着独特性,但也意味着易受伤害乃至早死的风险。繁殖确保了种族维存,但有碍于个体的智力。按照斯宾塞的阐释,在这两种原则的持续对抗中,个体首先要努力培养内在的智力,这有助于他们在一个充满仇恨的自然界和人世间征服敌人,主宰对手。与此同时,动物与人的种群的首要目标都在于尽可能繁殖数量,以此维持各自种群的生存前景。

斯宾塞坚称,在个体化与繁殖之间的相互作用下,智力有助于最适者生存。他知道,智力有益于那些在生存斗争中更有能力战胜他人的人,进而确保进步。种族的改良则有赖于那些比别人更适于生存的人获得更多的机会,他们首先要征服环境障碍,并以更具智力的方式与自然竞争,与人竞争。斯宾塞使用了许多经验证据来具体验证他的命题,比如英国男人的“平均颅容量”为 96 立方英寸,而澳洲土著仅为 75 立方英寸。^[45]因此他提出,最发达的种族,被证明最适于生存的种族,也是最富技能、最具智力、最善自控的种族,总之,他们最有纪律。

[42]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Ethics*, Vol. 1 (初版于 1879 年), 1892 年再版, 1904 年印次 (序言署名撰于 1893 年), Osnabrück: Otto Zeller, 1966, 第 vii 页; 下三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43] 同上引, 第 viii 页。

[44] “Spencer, *A New Theory of Population Deduced from the General Law of Animal Fertility*, 重印自 1852 年 4 月号《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医学博士 R. T. Trall 作序 (New York: Fowler and Wells, 1852)。

[45] 同上引, 第 40 页。

他以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爱尔兰灾难性的所谓马铃薯饥荒为例，认为如果因饥荒而死，就意味着缺乏努力超越他人，意味着缺乏自控。他论证道：

全人类……都多少受制于纪律……；他们在纪律之下也可能发展，也可能不发展；但按照事情的自然规律，只有那些在纪律之下确实发展的人群才能最终生存下来……我们最近刚刚看到，这条真理在爱尔兰得到了例证……这是因为，就平均而言，那些早夭的人们必然也是自我维存的力量最弱的人。因此，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幸存下来延续种族的人们也是自我维存的力量最强的人——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的选择。^[46]

他就此宣称，早夭清除了“那些自我维存力量最弱的人”，从而确保了这类自我维存力量最强的人真正存活下来。这样就避免了两种危险，一是人口过剩，一是闲散怠惰。他警示世人，因“生育率冗余”而导致的人口过剩，往往会加剧已经很严重的必需品短缺和重要资源匮乏。而闲散怠惰，尤其是大规模的闲散怠惰，则表明了缺乏纪律，这又将危及斗争的能力，而斗争是确保适者生存的唯一途径。他知道，通往幸福（这意味着进步）的道路，必须清除那些不适于生活的艰辛的种群。由此，生存就培养出进取性 / 侵犯性 (aggressive) 的智力，生存对这种智力颇为依赖。他强调指出：

无论生存的危险是由生育率冗余造成的，还是由别的什么类型造成的，都很清楚，通过一刻不停地操练与人竞争所需要的官能，通过所有未能成功地与人竞争的人的死亡，确保了持续的进步，不断趋向更高的技能、智力和自我调控水平，趋向更好的行动协调，也就是一种更加完满 (complete) 的生活。

而在《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上发表两篇文章^[47]之前两年，斯宾塞就已出版了一部著作，伸张了类似观念，书名为《社会静力学：或，人类

[46] 同上引，第 42 页。以下三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47] 哈佛学院图书馆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所藏的小册子似乎是这两篇文章中的一篇的重印版本。

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48]他在书中以丰富的细节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认为严酷的个体主义意味着与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相比拟的伦理学，因为这种政治经济学也有助于种族改良。^[49]他想证明，智力要想保持优越于生育的地位，就只能通过他在记述人类进化和动物进化时提到的一些习俗来实现，类似斯巴达的选择性杀死体质弱的婴儿，或者贝都因游牧民将老人遗弃在荒漠中任其饿死。 <15>

他更进一步强调指出，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这样一条原则：“人人皆可诉求充分的自由权利”^[50]，只受另一个人的“类似自由权利”限制。由此观之，文明的、自由的个体不受那种天真幼稚的对于不适者的同情（compassion）所影响。在斯宾塞看来，这是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慈善事业或社会改良立法中的时代缺陷。^[51]他还攻击当时颁行不久的济贫法：

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下，社会在不断地排除它的不健康、不聪明、不灵活、不坚定、不虔信的成员，由于看不见这一事实，这些空有一番好心但缺乏头脑的人们，竟然倡导干预，而这种干预不仅会阻遏它的净化进程，甚至会加剧它的腐坏堕落——由于向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必需品，纯粹是鼓励了轻率、无能的人的繁殖，而由于加重了维持家庭的困难，又挫伤了有能力、有远见的人的繁殖动力。就这样，这些成天唉声叹气、愚蠢抱怨的人，当他们热切地想阻止我们周围发生的健康有益的苦难时，给后代

[48] Spencer, *Social Statics; or: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uman Happiness specified, and the first of them developed*, 节略修订版(初版于 London, 1850) (与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合订出版, New York: Appleton, 1904)。

[49] 李嘉图的经典之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初版于 London, 1817) 到 19 世纪 50 年代已经成为当时旅居伦敦的德国流亡者马克思的批判对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同时在反驳李嘉图、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人,但在 1859 年即以未成稿形式收场。

[50] Spencer, *Social Statics*, 第 36 页; 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51] 布林顿在描述斯宾塞的政治哲学时做了如下说明：“他拒绝赋予国家任何权利干预供需作用的自由，坚定信奉自由放任，以至于攻击卫生立法。”说完这句，布林顿还忍不住评论道：“可是他受失眠的折磨，所以我们看到他肯定了国家有权利立法禁止火车胡乱鸣笛。”参看 Brinton,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in Nineteenth Century*, 第 228 页, 转引了 Spencer 的《伦理学原理》, 第 296 节。

留下的却是不断增加的灾祸。^[52]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正好就是采用了斯宾塞的生存斗争原则来说明进化。达尔文使用斯宾塞的观念，将进步追溯到自然选择。书的副标题就说明了这一点：“生存斗争中优良种族的维存。”^[53]自那以后，世人都认为，是达尔文提出了生存斗争导致了自然选择，但实际上斯宾塞才是这个观念的原创。斯宾塞此后还继续探讨自然选择原则，到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他开始变得家喻户晓，真正成为名人，此时，他对于据称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范式的支持立场，反倒加强了人们对于斯宾塞的哲学的认可。而在当时，这两个人谁都没有对这种局面有所评论。

达尔文在其第二部主要著作《人类的由来》中承认，自己在思想上受惠于斯宾塞，尽管语气上颇有些不屑。^[54]他承认，在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中，他达尔文赞同一个观念，即“智力的曙光乍现……就是通过反射作用的繁生和协调取得发展的。”^[55]但达尔文同时反指斯宾塞有两项见解取自自己，也就是达尔文当时尚属新颖的突变(mutation)研究。在该研究中，达尔文提出，需要考虑通过动植物的驯化而完成的培养。^[56]此时他针对斯宾塞有关道德特性的遗传理论提出，“有些智力活动历经数代执行，开始转变成本能，遗传下来。”^[57]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比较简单的本能作用各类变化进行自然选择，比较复杂的本能的数量似乎越来越多。”达尔文觉得，这些说明补充了“我们的大哲学

^[52] Spencer, *Social Statics*, 第151页。

^[53]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J.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59); 重印于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988。

^[54]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the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London: J. Murray, 1871); 重印自第二版，即1877年修改增订版，London: Pickering, 1989, 第71页。下一则引语也摘自同一页。

^[55] 达尔文在一份札记中引到了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5)。他(在自己书再版时)概括性地引述了斯宾塞的书的1875年第二版，页数是第418—443页，但无进一步具体说明。

^[56] Darwin, *Variations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London: J. Murray, 1868); 重印于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57] Darwin, *Descent of Man*, 第72页；下一则引语也摘自同一页。

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58]尤其是他“关于道德感的观念”。然而，他也引到了斯宾塞公开刊行的信函之一，^[59]认为内有深刻见察，原样照录斯宾塞的话：“人类世世代代组织起来并加以巩固的有关效用的体验，正在产生相应的诱发变异，通过持续不断的传递和积累，已经变成我们身上某些特定的道德直觉官能，某些回应于正确行为和错误行为的情感，在个体的效用体验中并无任何明显的基础。”

因此，等到开始用遗传原则来说明社会，尤其是文明人口中的道德与文化，达尔文也追随了斯宾塞。有鉴于此，他也准备承认，进化扩展到“社会官能”(social faculties)。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主张：

在我看来，在多少牢固地遗传下来的德性倾向中，没有什么是内在固有的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且不论我们的许多家畜传递给其后代的诸多性情与习性，我还听说过许多真实的案例，偷盗成癖，撒谎成性，似乎在上层家庭也颇为常见；由于偷盗在富裕阶层中是一种罕见的犯罪，我们几乎不能用偶然巧合来解释同一个家庭里有两三位成员都出现这种倾向。……癫狂是一种臭名昭著的遗传病。……除非通过道德倾向的传递，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人类不同种族之间在这方面据信存在的差异。^[60]

斯宾塞的方案尽管事实上可能激发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却超越了达尔文的自然主义。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初版于1873年^[61]，对达尔文只字未提。此书旨在确立一门社会学的科学，超越并替代生物学。书的开头几章探讨了三类困难，正是这些困难造成了人们常常无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社会有机体的法则说明了“行为现象”。^[62]斯宾塞认为，这些困难要么是客观性的（比如因为

[58] 同上引，第127页；下三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59] 达尔文提到的是一封“(斯宾塞)致穆勒的信，见Bain 1868年所著 *Mental and Moral Science* 一书第722页”。

[60] Darwin, *Descent of Man*, 第127—128页。

[61]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初版于1873年)，重印于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1961年此书再次刊行时，帕森斯为之作序，基于60年代而非30年代的现代社会学角度来评判斯宾塞。不过，相比于30年代，有一件事情没有变化，帕森斯还是批评斯宾塞不承认大众教育的价值，而这正是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

[62] 同上引，第52页。

缺乏适合测度的行为现象),要么是主观性的(即由于智力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是随机变异的)。第三种困难将社会生活的观察者纠缠在“他的种族、国家、公民关系之中”。^[63]根据斯宾塞的说明,这后一种困难是各式各样的偏见所导致的,他认为这些偏见必然与教育、爱国主义、阶级或宗教有关。这一切因素都是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它们源于斯宾塞所称的有害的(noxious)哲学。他抱怨道,这些有害的哲学往往成为社会改良的表演舞台,这意味着它们会出于无意而妨害了社会进化与进步。

他在讨论教育偏见的一章中,全盘否定让人人可以接受教育就能够导向优胜能力的平等。相反,他赞扬更原始的社会中的战争富有效能,推进了生存斗争。他将战争和我们现代世界中的竞争相联系,认为其功能都在于淘汰那些无能者或不适者。他强调,侵犯正是种族中道德进化的关键。当然,在文明的共同体里,利己自私,有如暴力犯罪中的情形,还是必须遏制的。他发现,前工业社会或许偏爱根除劣等种族,视之为侵犯性的合适宣泄渠道。现代工业主义则诉求通过他所谓的“工业战争”进行选择,以符合种族的利益:“达到这一阶段之后,净化的过程依然很重要,还要通过工业战争来进行,即社会之间的某种竞争。在这场战争中,体力上、情感上、智力上的最佳者也传播最广,而剩下最缺乏能力者不能留下足够数量的后代,从而逐步消亡。”^[64]

众所周知,在19世纪80年代及稍后风行一时的萨姆纳的社会学无疑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65]萨姆纳的《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义务》初版于1883年,并于1925年重印,1934年再版。^[66]它的主旨是反对社会立法:“我们传承下来的公民自由权利的观念,乃是关于法律和制度为个体创造出来的某种地位,其效果在

^[63] 同上引,第67页。

^[64] 同上引,第180页。

^[65] 关于萨姆纳,参看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初版于1944), 修订版, New York: Braziller, 1959, 尤其是第三章; 亦参Hofstadter, “William Graham Sumner, Social Darwinist”,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14, 1941, 第457—477页。

^[66] William Graham Sumner,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3); 重印于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5; 再版于1934年, 1947年重印, Caldwell, Idaho: Caxton Printers, 1982年第九次印刷。

于，每一个人都得到保障，可以将自己的一切力量完全用于自己的福利。”^[67]

正如书的标题所示，这就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彼此不欠任何东西，除非他们自愿互助。上层（“富人”）不欠下层（“穷人”）任何东西。如此来看，现代福利国家没有任何权利以合法的形式，强迫境况优裕群体为弱势群体的维持生存乃至发展改善买单，否则将会威胁到文明的本质。只有允许自然选择造成其损失，现代社会才能担负起确保人类进步的责任。有鉴于此，此书第五章题为“求强人，先减人”（“That We Must Have Few Men, If We Want Strong Men”）。萨姆纳效仿斯宾塞，宣布工业主义为新信条，效仿马尔萨斯主义的口吻宣称：“准则……就是搞钱（Get capital）……而这就需要精力、勇气、毅力，同时不否定谋略。如果有人认为这世上有什么好东西无需那些美德就可以得到，那他可以去相信魔法石[此处原文恰恰是让哲学家为之气闷的“philosopher's stone”，也可译为“点金石”、“仙丹妙药”、“长生不老药”等。——译者注]。”^[68]

要以不受束缚的个体主义为手段去实现这类不可或缺的工业主义，社会就必须遵循“回归自然/本性”（Back to Nature）的准则。这也就意味着放弃对于自然选择的任何干预。当萨姆纳建议抛弃那些虽然好心但很幼稚的倡议，即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那些立法时，他其实是在建议从社会生活中清除社会立法：“大量的社会病患从未出于自然……而是……社会骗术（quackery）的复杂产物……现在受到习性、时尚、偏见、陈腐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新骗术的支撑……因此，社会并不需要任何关照或监督。”^[69]

只有清除诸如此类的干预，“被遗忘的人”[此处原文为“Forgotten Man”，意义见下文。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用此词来指大萧条时期的受害者，含义大转弯，包括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译者注]的美德最后才能盛行于世。^[70]后者注定要“自谋其事”^[71]，并会因此确保文明的持续进步。萨姆纳力称，历代前

[67] 同上引，第30页。

[68] 同上引，第68页。

[69] 同上引，第102—103页。

[70] 同上引，第107页；参看第107—131页，第九章至第十章，第九章题为“论从未被思及的某类人”，第十章题为“再论被遗忘的人”，参看第107—131页。

[71] 同上引，第106页。

辈历经斗争，备尝苦难，才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而我们现代的责任就是不要打破自然的循环。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以竞争性地适应环境为基础的遗传，才能确保种族维存。文明要想进一步改善，有赖于更具生产力、理智力的人口在数量上和寿命上都要超过不那么勤奋、能干的人。萨姆纳的结论是，“作为整体的种族的斗争产生了作为整体的种族的财富”，并加上一句对于平等主义的警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Something for nothing is not to be found on earth）。^[72]

<19> 萨姆纳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73] 他的《民俗》一书初版于1906年^[74]，认为无论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民俗民德（folkways and mores），即文化上的风俗习惯，都是生存斗争的结果。他讨论了生存斗争，财富对于净化生存适应性、促进培育生活方式的合法性，以及社会层面上的选择，在讨论这些主题的章节中，他阐明了环境操纵的各项原则和形式。^[75] 他提出，环境的操纵就是从婚姻到战争的各项制度的宗旨所在，包括像杀婴这样的习俗，在这样的宗旨下，也建立起“工业组织”^[76]，以有助于最强者的至高地位。

萨姆纳作为社会选择的倡导者，也反对现代福利国家，全书通篇都在谴责这种体制。比如，在他看来，养老金制度不是别的，就是人类进步之关键力量趋于败坏的一种征候：“美国的养老金制度是一种已经摆脱控制的弊病。不再有任何努力要去应对它。它是‘凡人’在公共掠夺的庞大体制中所占的份额。所谓‘贪污受贿’，只是例证了更大程度上的教唆偷窃这一课。它只是反映了立法与政治权力的腐坏运用是如何影响了民德。”^[77]

萨姆纳强烈反对公立教育，指责其被塑造为迷思（myth）和灵药，可以用来疗治现代美国的一切有害问题。他指出，这类“时代迷信”的主要缺陷就在于，“书本学识处理的是智力，而不是情感，而情感乃行动之源。”^[78]

[72] 同上引，第116页。

[73] Robert Bierstedt, *American Sociological Theory: A Critical History* (1981), 此书有专章讨论萨姆纳，说萨姆纳在其书桌上悬挂着一幅达尔文的画像，见第11页。

[74] William Graham Sumner,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06) .

[75] 同上引，第三章至第五章，第119—260页。

[76] 同上引，第157页。

[77] 同上引，第170页。

[78] 同上引，第629页。

霍夫施塔特曾撰书讨论美国社会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指出，萨姆纳有关上层成功人士的道德优越性的早期哲学，后来受到索尔斯坦·凡勃伦初版于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一书的成功挑战。^[79] 不过，凡勃伦作为萨姆纳或斯宾塞的挑战者，其实很不成功。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学界，凡勃伦显然是个争议人物，而萨姆纳则被视为一位严肃学者。

萨姆纳生前最后十年，声誉逐渐暗淡，但仍笔耕不辍，时有新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的一篇题为“被遗忘的人”的文章重新刊行，并作为整部个人文集的书名。文章高调宣扬了警惕社会改良的主题。^[80] “被遗忘的人”这个比喻，萨姆纳在19世纪80年代就用过（两次），指的是勤勉工作的公民，但如果他所创造的利润被国家征税取走，那勤奋所得到的就是惩罚而不是酬报。而国家又将税收浪费在支持穷人的方案上。萨姆纳认为，这些穷人就此不必承担责任，为自己的生活努力工作。^[81]

New
poor Men
<20>

霍夫施塔特还提到一位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理论家，活跃于19世纪90年代，就是莱斯特·华德。^[82] 诚然，华德的“努力”（effort）观念指出了社会生活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很可能激发了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想法，在一个关键之处将“努力”引入了社会行动结构的理论。^[83] 不过，华德晚年似乎越来越执迷于路德维希·龚普洛维茨的社会学，这位素负影响的奥地利人声称，种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原则。在19世纪90年代，华德的《社会学概要》宣称，

[79] Thorstein Veblen,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参看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第151—156页。

[80] Sumner, *The Forgotten Man and Other Essays*, Albert Galloway Keller 编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8); 内中收有文章“The Forgotten Man”, 初稿于19世纪80年代早期, 见文集第465—495页。

[81] 即使在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刊行之后, 仍有一卷《萨姆纳今论》在1940年出版, 向这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致敬。该书的副标题是“美国领袖评注文集”, 重刊了萨姆纳的一些文章, 第二编中辑入了一些公共要人对其人其书的溢美之词, 其中包括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会长哈罗德·莫尔顿, 美国劳联 (AF of L) 主席威廉·格林, 耶鲁大学校长查尔斯·西摩尔。参看 Maurice R. Davie 编, *Sumner Today.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Graham Sumner With Comments by American Leader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82]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第四章。

[83] 有关《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的“努力”观念, 详见下文。

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力量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84]，不过他也翻译了龚普洛维茨的《社会学纲要》一书^[85]，并于1899年看到它以和自己的书《社会学概要》同名的标题出版。^[86]

龚普洛维茨主张，权力与知识起源于社会集合体，与社会集合体之间存在着生物性的关联，而社会集合体当中最显要的就是种族。因此，思想自由或意志自由，甚至是个体性本身，都只是些幻觉。他声言，绝对的优先性在于整个进化过程中的“物种生命”，这无疑意味着，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顺从于或服务于历史力量的个体，就要消灭之。他如此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人对于历史事件的推动作用，并不比上帝对于自然事件的推动作用更大。”^[87]龚普洛维茨这里明显是在影射达尔文最终战胜了神学偏执，他希望找到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历史决定论。

显然，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思想远未被人遗忘（1933年春天，德国杂志《社会学》（*Sociologus*）的年度增刊集中刊发了龚普洛维茨致华德的一批通信，而其合编者正是索罗金。^[88]）。

<21> 二、种族主义在德国

话又说回来，这幕美国社会学的场景只是进入《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一个舞台，用韦伯的话来说，后者倡导的是一种“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而另一种场景则是欧洲的。当《社会行动的结构》开篇借用布林顿的套话，宣告斯宾塞“已死”，被征服已久，当时的纳粹伪科学却是正当其时。它的影响遍及德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被称作优生学的种族生物学缘起于19世纪50年代，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传遍欧美。在德国，优生学成为生物学和医学中一门受到尊重的分支，19

[84] Lester Ward, *Outlin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1898).

[85] Ludwig Gumplowicz, *Grundriss der Soziologie* (Vienna: Manz, 1885).

[86] Ludwig Gumplowicz, *Outlines of Sociology* (Philadelphia: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899); 重印于 New York: Paine Whitman, 1963, Irving L. Horowitz 编辑并作序。

[87] 同上引, 第31页。

[88] 参看 Bernhard J. Stern 编, “The Letters of Ludwig Gumplowicz to Lester Ward”, *Sociologus*, vol. 9, Beiheft 1, 1933, 第5—32页。

世纪晚期开始在大学教授。1928年，创建了威廉皇帝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Genetics, and Eugenics*)，1933年由纳粹接管后，奥特马尔·冯·费许尔成为首任所长。冯·费许尔是一名公共健康领域的生物学家，在研究所创办之际，曾经出版了一本小书，要让社会学表现社会政治，倡导种族卫生——这意味着纳粹的种族主义——因此臭名昭著。^[89]

不过，从19世纪晚期以降，种族这一话题就一直像幽灵般徘徊在德国的社会学中。在德语社会学界，最早讨论种族的著述可以回溯到19世纪80年代，龚普洛维茨有一部^[90]，古斯塔夫·腊岑霍夫或亚当·舍夫勒之类的作者也有其他的著述。比这些人更重要的一个人物是阿尔弗雷德·普勒茨，他自诩创立了一门学科，致力于将（种族主义）生物学应用于（更合意的未来）社会[即所谓社会生物学 (*Gesellschaftsbiologie*)]。1910年，值新创立的德国社会学学会 (*German Sociological Society*) 第一次年会之际，韦伯建议邀请普勒茨作为主题发言者之一，不过只是要猛烈抨击普勒茨的学说。韦伯在台发言，评论普勒茨有关种族各范畴对于社会学分析的重要性的讲演，驳斥了这种学说的科学魅力的一切假象。^[91] 普勒茨似乎首创了“种族卫生学”这个词，职业生涯令人瞩目，1895年发表了一部论著，一时风行，在德语社会学界赢得大批信众。

书的题目叫做《我们种族的适应性与弱者的保护》，副标题则是“论种族卫生学及其与社会主义等人道理念之关系”。^[92] 普勒茨的问题在于，最近的一系列 <22>

[89] 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 *Sozialpolitik und Rassenhygiene* (Langensalza: Beyer, 1928).

[90] 龚普洛维茨最早的作品比他的《社会学纲要》还早两年，即其《种族斗争》，初版于1883年，重印于1909年，1928年再次刊行。在1909年版的序言中，龚普洛维茨宣称，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关注种族的的社会学传统取得了蓬勃发展。他称赞这类成功为实证论、进化论社会学的成功，参看 Ludwig Gumplowicz, *Der Rassenkampf*. Zweite Auflage, 1909, Mit einem Vorwort von Gottfried Salomon. Ausgewählte Werke, Bd. III (Innsbruck: Universitätsverlag Wagner, 1928), 第 ix 页。

[91] 有关评论，参看 Detlef Peukert, “Weber contra Ploetz”, 收于 *Max Webers Begriff der Modern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90), 第 92—101 页。韦伯的原始表述重刊于其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第二版 (Tübingen: Mohr, 1988), 第 456—462 页。

[92]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Ein Versuch über Rassenhygiene und ihr Verhältnis zu den humanen Idealen, besonders zum Sozialismus* (Berlin: S. Fischer, 1895).

社会政策方案,包括卫生改善、社会保险在内,是否属于为穷人撑腰,而大众医疗保障是否其实常常拯救了那些尽管很羸弱或有缺陷的孩童,从而威胁到日耳曼(诸)民族的“体质”适应性。他宣称,通过“正常情况下”经济或非经济的“去芜”(Ausjäten, weeding-out)过程,自然选择将会清除那些不太能适应的人。但他认为,鉴于现代社会政策保护那些弱者免于早夭和无后,通过种族卫生学的有关政策,采取一些补偿性措施来遏制其后果,就显得十分必要。他的术语体系里有共变因子(convariates)和偏差因子(devariates),被界定为与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种族之间的近似或偏离。普勒茨用这样的术语来界说自己的问题:“我们通过卫生、治疗,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保护弱者,以及整体上的社会主义改良,从这场去芜存精的生存斗争当中清除掉的每一部分,都必须通过偏离因子的相应改善,确立某种等价形式,否则,物种就肯定会发生退化。”^[93]

在普勒茨看来,解决办法融合了两种策略,以确保所谓的“取精”(Auslese)^[94]。种族卫生必须履行两项显而易见的任务。一是教育自律,磨炼人格,以传承种族的最佳潜力。另一项任务是只允许那些代表最佳种族血统的人员或夫妇生孩子。普勒茨的作品中连篇累牍地讨论了如何不对种族适应者实施生育控制,又如何防止不适应者生儿育女。就后一项任务而言,要实现理想化的纯正种族,需要通过自我约束、强制流产,有可能的话,甚至需要进行大规模绝育。不过,后面这个话题只是一带而过。

根据普勒茨的概括,种族卫生这种社会政策需要服务两种截然相对的目标。一方面,普勒茨建议明确鼓励种族最适者繁殖,另一方面,则要抑制甚或防止

^[93] 同上引,第229页。德语原文如下:“Für jedes Stück des ausjätenden Kampfes um's Dasein, das wir durch Hygiene, durch Therapeutik, durch socialen und wirtschaftlichen Schutz der Schwachen, durch socialistische Reformen im Allgemeinen beiseite schaffen, müssen wir nothgedrungen ein Äquivalent bieten in Form von entsprechender Verbesserung der Devarianten, sonst ist eine Entartung sicher.”

^[94] “Auslese”这个德语词指的是积极主动的选择,成为纳粹种族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词。另一种策略被称为“去芜”(Ausmerze),即有意毁灭被视为不值得维持生存的人口。例如可以参看 Gisela Bock, *Die Politik und Praxis der Sterilisierung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86), 以及 Robert Procter,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种族可疑人口怀孕。他宣称，这些目标意在改善种族的整体素质，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其政策不会给予个人任何发言权，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是生育还是其反面，即绝育。

普勒茨认为，雅利安人，尤其是日耳曼（诸）民族，有“种族卫生学的要求，让其品种完善，数量增加”^[95]。他把雅利安人（日耳曼人）分成许多不同的国族，估计这类雅利安人（日耳曼人）在欧洲（西欧）、美国和澳洲的总数大约在1.6亿—2亿。（普勒茨明确指出，在他看来，犹太人是一个有教养的种族，需要和日耳曼—雅利安人互相混合乃至完全融合，在种族性质上达成互利。）

普勒茨这位医生（全科医生），当时被广泛认为对社会学颇有贡献。1904年，他创办了《种族生物学与社会生物学文献》（*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在现今称为种族卫生学或其别名社会生物学的领域，这份杂志或许是第一个论坛，但不久就有了一批同行杂志。（该刊于1944年停刊。）

诸如此类的学术讨论，无疑标志着纳粹式思想甚至在国家社会主义攫取权力之前就开始出现了。冯·费许尔在他题为《社会政治与种族卫生》的小册子中，将种族（racial）卫生与种族主义（racist）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冯·费许尔觉得，他的《社会政治与种族卫生》中的主题有两个方面，分别关联到两类科学。一类是为社会政治提供素材的“社会学说或社会学”（*Gesellschaftslehre oder Soziologie*），另一类是应用于种族卫生的“种族生物学或人类学”（*Rassenbiologie oder Anthropologie*）。他提出，这两块领域可以尽可能融为一体：“社会政治安排和措施会产生种族卫生方面的后果，而种族卫生方面的需要与愿望也常常涉及社会政治。只有社会政治与种族卫生的两方面任务都得到清晰展示，尤其是清楚牢记它们的共同宗旨，才能充分理解并评判这些纷繁多样的相互作用。”^[96]

^[95]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第114页。

^[96] von Verschuer, *Sozialpolitik und Rassenhygiene*, 第7页。德语原文如下：“Sozialpolitische Einrichtungen und Massnahmen haben rassenhygienische Folgen, und rassenhygienische Forderungen und Wünsche liegen vielfach auf sozialpolitischem Gebiet. Diese verschiedenartigen Wechselwirkungen kann man nur dann einheitlich betrachten und beurteilen, wenn man die Aufgaben von Sozialpolitik und Rassenhygiene, vor allem aber ihr gemeinsames Ziel klar vor Augen hat”（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他继续说道,这种共同宗旨关乎“民族(people),也就是说,不关乎……个体。”^[97]问题既有关国家,也有关种族。但无论国家还是种族,都代表着集合体,个体只是一个涵括一切的整体中的组成部分。冯·费许尔的这一观点乃是取自奥斯马尔·施潘。^[98]

要说清楚冯·费许尔这本小书从施潘的社会学那里获得了什么样的灵感,不妨简单提一提施潘的两部作品。他的《社会学说》假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性力量的实体,包容并融合了作为要素基元的个体。他看到了社会思想中有两种趋势,即普遍主义与个体主义。他要整合两者,赞成视社会为有机整体,具有超出其要素的生命。这样他就将个体化约为一个涵括一切的集合体中的成员。这些成员要素会通过内在强迫性的(compulsive)共同体形成过程/形态(Vergemeinschaftung, community formation),融塑成一个支配性的总体,即社会(Gesellschaft)。他主张,这样一种共同体形成过程/形态必须同时建立在其成员的种族和遗传天赋基础上。^[99]

他的学说中吸引冯·费许尔(但或许与帕森斯相对立)的基本宗旨,在《社会学》一书里表现在如下行文中:

每一个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社会都基于一个原则:它抑制道德上败坏的东西,驯服所有敌视它的价值体系。它要想存在下去,就只有通过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通过像谢林所说的宇宙间的神圣秩序,稳坐基于持续恐怖的宝座。当然,这不是和平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所梦想的那种充满和平与爱的场景。如果没有价值权威,从而没有切实的强力权威和支配力量,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权威必须基于某些支配性的评价,即文化

[97] 同上引,第8页。德语原文如下:“Volkstum - also nicht... Einzelmenschen.”字面照译“Volkstum”也许应该是“peoplehood”,但英语里不存在这样一个单词。

[98] 冯·费许尔所提到的施潘的社会学是这样两本书:《Gesellschaftslehre》的第二版(初版于1914)(Leipzig: Quelle & Meyer, 1923),以及《Kategorienlehre》(Jena: Gustav Fischer, 1924)。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的索引中提到了施潘,参看第lviii页(不过拼错了后者的名)。[作者此处有误,应为《社会行动的结构》的注解中提到。帕森斯将“Othmar”误拼为“Ottmar”。——译者注]

[99] Spann, *Gesellschaftslehre*, 第267页。

(geistige) 优越性的等级秩序。^[100]

冯·费许尔还提到了施潘的另一本书,《分类学》。施潘在书中深入探讨了为什么必须认为,个体在社会中(环环相扣地构成一个个成员)必然会“重新结合成”原型般的整体。他宣扬一个涵括一切的实体所具有的那种君临一切的一体性,以及它不可分割的实质。他在讨论思维范畴时,使用了一套多少有些神秘化的术语,不把思维范畴看做是认知概念,而是直觉概念。这就预见了一些哲学思考,这些思考十年后将会成为纳粹所欢迎的那种哲学。(要知道,施潘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了希特勒个人的恭维,而在纳粹统治初年也受到整个政权的公开尊崇,但到30年代后期他便不再受到执政党的宠爱,他的作品也被禁止进入公共图书馆,因为据说其立场过于保守。)

冯·费许尔在他那本纲领性的书中支持了施潘的社会学立场,最后得出一个颇为程式化的结论:社会政治有利于国家,种族卫生有利于种族,两者合一,有利于民族[“Volk”,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性(Volkstum)]。^[101]他警告读者,所有这三样东西,当然主要是国家和种族,始终面临堕落退化的危险:“如果种族退化,文化也就死了。……而如果国家无力,如果环境不利,种族的文化生产力也就归于沉寂。”^[102]这样一种推理使他发出警示,不要让现代福利国家(比如他曾明确指出的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或疾病保险等方案)冲淡了——其实是严重危害了——种族的实质。冯·费许尔对魏玛共和国的一批福利方案逐个予以评估,主张必须采取措施,以缓解福利方案所带来的损害。考虑到不能让任何福

<25>

[100] 同上引,第254页(笔者自译)。德语原文如下:“Jede geschichtliche und lebendige Gesellschaft beruht darauf, daß sie sittlich Schlechtes niederhält und darüber hinaus noch alle ihr feindlichen Wertsysteme bändigt, daß sie nur durch unaufhörlichen Sieg besteht, indem sie, wie Schelling einmal von der göttlichen Ordnung im Weltall sagte, über Schrecken thronet. Auch hier ist also nichts mit eitel Friede und Liebe, wie Pazifisten und Schwärmer träumen. Ohne Wert-Herrschaft und darum ohne wirkliche Macht-Herrschaft und Herrschergewalt ist keine Gesellschaft möglich, aber diese Herrschaft muß sich auf bestimmte vorherrschende Wertungsweisen, geistige Rangordnungen gründen.”

[101] 参看上文注97。

[102] Von Verschuer, *Sozialpolitik und Rassenhygiene*, 第12页。德语原文如下:“(E)ntartet die Rasse, so stirbt die Kultur... Verfällt der Staat, beziehungsweise wird die Umwelt ungünstig, dann verstummt die Rasse in ihrer geistigen Produktivität.”

利措施对种族完善造成丝毫削弱，他建议采取反制。为此，他把普勒茨的言下之意给挑明了：“劣等群体滥用社会保险，导致劣等群体得到经济支持，人口繁衍。种族的健康恢复的自然过程受到阻碍。社会保险所导致的这类损害在种族卫生角度上十分危险，建议采取反制措施：服务于国家控制的公共健康机构的医生们要采取更严格的遏制措施，对那些精神上不健康、心智上不坚定的人，有计划地实施绝育。”^[103]

他还建议了另一项措施，可以剥夺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享受保险的资格，从而增加那些证明适于生存的人（比如实际在工作的人）的群内结合感。因此，他毫不含糊地拒绝接受民主福利国家，因为它似乎破坏了不平等能够产生的种族净化效果。

冯·费许尔又一次引证施潘作为意识形态盟友，支持施潘的普遍主义。他这样写道：“因此，倡导种族卫生的人，对于所有那些参与精神斗争，用观念论对抗物质论，用普遍主义对抗个体主义的人，都会感到十分亲近。”^[104]顺带说一句，在《社会政治与种族卫生》刊行后不久，冯·费许尔在给一部《社会卫生与预防健康手册》写的文章中，明确了遗传与环境都具有决定论的性质。^[105]他指出，人的发展包括“一方面是遗传天赋，另一方面是环境（environment 或 peristasis）”^[106]。他具体说道，遗传意味着寓于种族或家族的生物特性，关键因素在于种族或家族，而不是个人天赋。环境有助于发展种族的先天潜能，与主导种族（家

^[103] 同上引，第 21 页。德语原文如下：“Dieser Missbrauch der sozialen Versicherungen durch die Minderwertigen führt zur wirtschaftlichen Unterstützung und zur Mehrung der Minderwertigen. Der natürliche Gesundungsprozess der Rasse wird gehemmt. Als Gegenmaßregeln gegen diese rassenhgienischen Schäden der sozialen Versicherungen kommen in Frage: verschärftes Durchgreifen beamteter Ärzte, künstliche Unfruchtbarmachung von Geisteskranken und Schwachsinnigen.”

^[104] 同上引，第 32 页。德语原文如下：“Der Rassenhygieniker fühlt sich deshalb als Bundesgenosse von all denjenigen, die im geistigen Kampf des Idealismus gegen den Materialismus, des Universalismus gegen den Individualismus... stehen.”

^[105] Von Verschuer, “Soziale Umwelt und Vererbung”, 收入 *Ergebnisse der Sozialen Hygiene und Gesundheitsfürsorge*, A. Grotjahn, L. Langstein 与 F. Rott 合编, 第二卷 (Leipzig: Georg Thieme, 1930), 第 1—33 页。

^[106] 同上引，第 1 页。

族)倾向遗传的整体性力量有着持续交换。这就意味着,“作用于遗传天赋的那些影响,即遗传型,其本质(是)‘自外而内的’,也就是说,是外在于基因的形态基质的。”^[107]由此观之,无论遗传还是环境,都属于机械力量。个体的努力不能影响它们,它们会直接作用于“Volk”(即种族或家族):遗传与环境动力机制的要素基元不再是个体,来自环境的影响作用于“Volk”或者类似健康实体的基因的种族实质,任何个体性的东西都是从这样的实体中生发出来的。

冯·费许尔使用统计推断,举智力迟缓和甲状腺肿之类的遗传疾病为例,来计算疾病对于整个人口的种族构成所产生的效应。他通过严格机械的统计计算证明,由于某种导致遗传疾病的基因的主导传承,整个人口会在比较有限的几代人之间受到病变的影响,毫无希望重新赢得种族健康。

在他看来,由于环境影响意味着作用于基因中的种族基质的因果力量,就会造成遗传基因在天赋上的缺陷。包括一些军姿裸照在内的孪生子照片表明,环境一致的单卵孪生子或双卵孪生子有助于理解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冯·费许尔通过这些个体(孪生子)的职业、身高、颅型等信息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文章最后,他做了如此概括:“社会环境和遗传一起密切互动,决定了人的发展,也决定了人群的命运。”^[108]他一方面想要预警种族退化的危险,同时也指出了避免此类即将到来的灾难的一些方式。他以一句对于政治的诉求作结:“这些发现旨在帮助找到一些方式,以期通过某类措施,影响人们和民族的生物性生命。”^[109]他认为,这些方式有两类。一类是“社会卫生”,能够影响环境,从而改善我们的遗传天赋。不仅如此,通过他所谓的优生学,就可以影响“生而为某

^[107] 同上引,第2页。他把环境作用,即他所谓的“peristasis”,称作(德语原文如下):“den Inbegriff der Einflüsse, die das Erbgefüge, den Genotypus, ‘von außen’, d.h. von außerhalb des morphologischen Substrats der Gene treffen.”

^[108] 同上引,第30页。

^[109] 同上引,同页,德语原文如下:“Unsere Ausführungen haben ergeben, daß soziale Umwelt und Vererbung in innigem Wechselspiel di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 und das Schicksal von Menschengruppen bestimmen. Diese ursachlichen Erkenntnisse dienen dem Zweck, Wege zu finden, um durch Maß-nahmen irgendwelcher Art das biologische Geschehen im Leben der Menschen und Völker zu beeinflussen.”

些特定群体的人的事实”^[110]。他明确提出,诸如此类的措施的宗旨在于:“(1)保护和养育健康的、有价值的基因的携带者,(2)与导致基因损害的环境影响作斗争。”^[111]

<27> 三、《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反达尔文主义

诚然,当帕森斯认为遗传与环境(诸)原则在社会学角度上是非理性的,从而不予接受的时候,他并没有引述冯·费许尔。不过,他确实提到了将其社会学与纳粹学说放在一条战线上的一些论家,比如施潘和汉斯·弗赖尔,哪怕只是在参考文献中。他还提到了有关北欧日耳曼血统的学说,在一处引述中提到了所谓“北欧日耳曼”人。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一章中,帕森斯在讨论各种概念类型时,提到了“北欧日耳曼”人的概念,视之为假设的科学概念。^[112]他承认概念具有假设上的经验用途,指出有一个类型学思维的例证,集中体现了什么是

^[110] 同上引,第31页。照他的概括,实际的可能性是(德文原文如下):“1. Die Entwicklung der geborenen Menschen beeinflussen wir durch die Gestaltung der Umwelt (Individuelle, Soziale Hygiene). 2. Die Entwicklung einer Menschengruppe in der Abfolge der Generationen, d.h. das Geborenwerden von Menschen in bestimmten Gruppen, beeinflussen wir durch die Gestaltung der Auslese (Eugenik). Die Richtung der Auslese wird bestimmt durch die Umwelt.”

^[111] 同上引,同页,德语原文如下:“Hier ergeben sich als praktische Folgerungen: 1. Behütung und Förderung der Träger von gesunden, wertvollen Erbanlagen, und 2. Bekämpfung der Erbschädigungen hervorrufenden Umwelteinflüsse.”要记住,根据普洛克特的记述,冯·费许尔有关生物天赋潜在可变性的研究项目,比如单卵孪生子的虹膜颜色,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实施,而执行者正是冯·费许尔早在威廉皇帝研究所里的助手,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门格勒。参看 Procter, *Racial Hygiene*, 第44、139页。[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 1911—1979): 奥斯威辛集中营医师,绰号“死亡天使”。负责决定新送来的犹太人是做劳工还是被灭绝,并用囚徒进行医学实验,寻求一种增加生殖能力的方法,满足日耳曼民族人口增长的需要。主要兴趣是孪生子。战后被英军抓获,但逃脱,隐居巴伐利亚数年后逃往南美,先后居住多国,1985年才证实其1979年在巴西死于游泳时心脏病发作。——译者注]

^[112] Parsons, *Structure*, 第31页。

“纯粹类型”^[113]。他断言道，“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遇到一个纯粹的‘北欧日耳曼’人（无论可以怎样界定这种类型），而无须预先假定，他按照定义具有地中海血统或其他任何非北欧日耳曼血统。”^[114]

帕森斯嘲笑了纳粹的疑似科学学说（quasi-scientific doctrine），同时嘲笑了非科学的思维，就此表达了对“纯粹类型”概念的怀疑。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时在德国大行其道，甚至支配着自称科学的思维，针对这一背景，帕森斯这样提及纳粹的概念，证明了他的强烈异议。他还证明了，事实上他已经注意到了30年代在德国实践的伪科学（pseudoscience）。帕森斯在两处注解中直接提到了纳粹主义，分别位于讨论帕累托和涂尔干的章节。一个是在谈纳粹的反犹主义，另一个是在讨论有关操弄和控制知识与舆论的做法。^[115]

后一处注解所挂靠的句子讲的是“其实，在相当程度上，社会存在取决于其成员的某种道德共识，如果这种共识土崩瓦解，就会遭到社会消亡的惩罚。”^[116]帕森斯评论道，对于这个事实，“以功利主义作为其本质上的理论背景的那类自由派，都太轻易地忽略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会产生不幸的后果。”在注解中，帕森斯为涂尔干作辩护，反驳那些理据不足的批评者；他们指责涂尔干制造了玄秘的社会整合意象。帕森斯澄清道：“但从这一点绝不能推出，这种共识必须、应该或只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维持。涂尔干本人不断重申，自发性对于真正的道德行动十分重要。基于这种立场，轻易地推演出对纳粹控制舆论的手段进行辩护，是没有道理的。”他无疑区分了强制

<28>

[113] 简评一下：帕森斯对“纯粹类型”（pure type）这一概念的摒弃，应当配合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第十六章中讨论韦伯时，对韦伯著作中的理念型（ideal type）的批评来看。帕森斯显然误解了韦伯的理念型观念（包括“纯粹类型”的构建）。他对韦伯方法论的理解，乃是遵循了30年代一种看似颇具权威的观点，即亚历山大·冯·舍尔廷的《韦伯的科学学说》（Alexander von Schelting, *Max Webers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34）。（帕森斯1936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长篇书评。）遗憾的是，冯·舍尔廷对于韦伯的错误阐释，却被帕森斯当成充分的理解，从而对韦伯方法论在这一点上的用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有关更详细的阐述，可以参看 Uta Gerhardt, *Idealtypus: Zur methodologischen Begründung der modernen Sozi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2001), 尤其是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114] *Structure*, 第31页。

[115] 同上引，第283、395页，亦参下文。

[116] 同上引，第395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推行与真正莫立意见遵从的道德基础，主张涂尔干说明的是后者，并举国家社会主义为例来概括前者。

而提到纳粹的另一则注解就更加公开。帕森斯上一次提及有关内容，是在一份未出版的文稿中，写于1935年（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题为“帕累托与社会理论之发展”。在那份文稿中，帕森斯通过讨论帕累托，攻击了非科学的（unscientific）思想，将其视同为纳粹的疑似科学。他区分了外在于真正科学倾向的环境的两类思想氛围，一类产生伪科学，另一类产生公然叫嚣的非科学学说。他的观点乃是依据帕累托对于“狐狸”与“狮子”的区分，这是帕累托所区分的社会中两种主要的精英类型。帕森斯揭示道，帕累托发现有两类“与科学无涉的（non-scientific）观念体系，但其间有一种差异非常耐人寻味”^[117]。一种思想氛围建立在怀疑论的基础上（让人想到帕累托的“狐狸”），按照帕森斯的说法，所包含的观念是“伪科学的”：它们尽可能密切地与科学拉关系，“扯上‘理性’、‘科学’、‘实证主义’之类的‘神灵’，所以要把这些与实际事物区分开来，还需要一些洞察力。”与此相反，其他一些观念体系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让人想到“狮子”）。它们是“公开宣称观念论的、反物质论的，涉及直觉、信念之类‘更为高远的’存在。”帕森斯认为，后一类观念体系显而易见是非科学的，前一类仍称是科学但其实不是。他肯定地指出，帕累托对这两类都持反对立场，提出“理性经验科学的观念，以及理性行动作为受科学知识指导的行動的观念”，以对抗“主要的实证主义功利论传统”^[118]。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除了显而易见的几处直接提及纳粹的学说，帕森斯还在拒斥达尔文主义等行文中，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不仅反对遗传与环境原则，还批判了在斯宾塞及其他一些人的传统中，作为更宽泛背景的实证主义功利论或生物性反智主义。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三章中，帕森斯分析了“个体主义实证论在行动理论中的历史发展的一些阶段”，其中明确探讨了达尔文主义。他首先指出，马尔萨斯是“实证主义的反智主义”的真正源泉，这种思潮“几乎历经整个19世纪

[117] Parsons, "Paret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 第54页。参看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41, box 2, 下两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118] 同上引, 第58页; 前后两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而稳步积聚力量”^[119]。至于它的巅峰,即“激进实证论学说……马尔萨斯本人并未达到这种地步。……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该趋势在19世纪思想的重要运动之一即达尔文主义中发展到登峰造极,当达尔文主义发展成为一套封闭体系并应用于社会中的人的行动时,也就成为曾经提出过的最重要的一套激进反智的实证论体系。”

帕森斯认为,达尔文主义作出了三项假设:首先,假设的人口剩余“必须通过……‘自然选择’予以清除”^[120];其次,这就意味着发生了某种进化过程,因为据说事实上“那些生存下来的人并非‘一般水平’”;再次,“只有环境是决定性、定向性的要素”,而不是人的能动作用。他又补充道:“这种‘生物学化’的倾向,实际上主要表现为达尔文主义的形式。凡是这种倾向占优势的理论,都抛弃了功利主义立场,而转向激进反智主义的实证论。”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是在谈达尔文,不如说是针对斯宾塞及其追随者所实践的达尔文主义。^[121]

耐人寻味的是,至此,帕森斯从达尔文主义推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还要把行为主义也包括进来,以警示预防决定论的“理论,以行动条件——通常是遗传和环境——所产生的与规范无涉的客观影响作为终极说明原则”^[122];进而补充道:“最重要的是,归根结底,它们都将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归结到某种生物选择理论。”^[123]

在帕森斯看来,这类误入歧途的学说意味着“激进反智的实证论”。是什么使得他会反智主义的实证论进行如此猛烈的抨击?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一章中,当他谈到“问题”时,他指的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是他自己的思想努力背后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他在概括自己所处的当时,说的是“在通行的对于人类社会的经验解释方面,一场如此宏大的革命……在短短一代人的工夫里面几乎很难发现,除非你回溯到大约16世纪。”^[124]

[119] Parsons, *Structure*, 第111页;下一则引语也摘自同一页。

[120] 同上引,第112页;下两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121] 同上引,第112—113页。

[122] 同上引,第114页。

[123] 同上引,第116页。

[124] 同上引,第5页;以下四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原文此句最后缺后引号,据《社会行动的结构》英文补。——译者注]

帕森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反智主义的主要动向,在于“带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有机论色彩的各色学说”,而“理性作为行动要素之一的角色,科学知识作为行动要素之一的地位,都一再遭到攻击。我们已经被一股有关人之本性与行为的反智主义学说的浪潮淹没。”

帕森斯谈到了自己时代的一场思想革命,认为自己旨在溯源的那场意识形态浪潮,有可能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必然结果。他称这些事件为“某些根本的社会变迁”,但又补充道,自己的书并不打算分析这些事件,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写《社会行动的结构》只是为了驳斥“斯宾塞的思想”。他提到的自己时代的一场革命,类似于16世纪早期的文艺复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态度是正面肯定的,而不是消极否定的。他指的是什么?在第一章里他那些颇为晦涩的语句背后,可能藏着些什么,是第三章里有些阐述仿佛要补充的?

大约1500年前后,宗教、科学和艺术等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迁激发了文艺复兴,孕育了宗教改革、人文主义,乃至整体上具备思想和艺术创造性的个体主义表述。那么,在帕森斯自己的有生之年,又有什么可堪比拟的呢?在讨论达尔文主义的一节中,帕森斯有一次引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帕森斯的论证思路。他提出:“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有关竞争秩序的观念大大有助于奠立生物学的选择理论的模型。”^[125]然而,他怀疑,现实中的世界是否处在持续的“战争状态”,并且,他又加上一句,被冠以“生存斗争”的名目。针对这样的观点,他持保留意见,并伪装成引述凯恩斯的一句话。凯恩斯曾经写道:“适者生存的原则可以看做是对李嘉图经济学的大大推广。”帕森斯原样照引凯恩斯的语句,不仅拒斥了生物学主义,而且拒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当然,不仅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者的马克思,而且还有韦伯和凯恩斯等其他许多人,都已经超越了这种论调。)^[126]

凯恩斯的专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刚刚于1936年出版,迅速成

[125] 同上引,第113页。

[126] 同上引,第113页(注释)。他引述了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London: L. & V. Woolf, 1926; New York: New Republic, 1926), 第17页。[“大大推广”原文为“a vast generalization”,《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译本此处作“深刻概括”,强调的不是广度而是深度。——译者注]

为经典——也启发了帕森斯对于福利国家政策的理解。凯恩斯建议通过财政措施进行国家干预，反制萧条期间的经济危机。这就意味着以反循环周期的刺激方案作为公共福利的保障。^[127]帕森斯作为罗斯福新政的追随者，无疑会支持凯恩斯的非斯宾塞主义的现代经济与国家学说，所以才会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反驳生存斗争的原则时引用凯恩斯。他强调指出，在凯恩斯看来，生存斗争是一项早已被克服的原则，指的无非是“霍布斯用‘大自然血淋淋的肉搏厮杀’这句话所表述的自然状态”^[128]。凯恩斯就此成了帕森斯论点的某种见证，警告世人，达尔文主义已经抛弃了古典功利主义，“转向激进反智主义的实证论”^[129]。

他对斯宾塞式的达尔文主义大加批判，认为它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竞争”概念的理解还要糟糕，显然他是要阐明，生存斗争是场骗局。他谈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表面如此的残酷竞争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较：“在这里，那些‘不适’者——成本昂贵的厂商以及低效率的厂商——都被清除了，或者应该被清除掉——尽管只是清除出市场，而不是清除出生活！”^[130]

帕森斯不仅拒弃萨姆纳式的自由主义、斯宾塞式的自由主义，还拒弃李嘉图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发现经验实证主义与霍布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如出一辙。那么，他是如何假定实证主义功利论与“激进反智主义”相关联，又是如何假定“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与冷酷的个体主义哲学有密切关联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广为征引的埃利·哈列维的《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131]哈列维详细阐述了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

[127] John Maynard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36).

[128] Parsons, *Structure*, 第113页。

[129] 同上引, 第112—113页。

[130] 同上引, 第113页。

[131] Elie Halévy,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4), 法文初版为 *Le développement du radicalisme philosophique* (三卷本, 1901—1904)。英译本由[牛津大学——译者注]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的传奇院长A.D.林赛(Lindsay)作序。林赛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罗得斯奖学金(Rhodes)得主们非常尊敬的导师, 其中有历史学家戈登·克莱格(Gordon Craig)、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政府官员与外交官菲利普·凯泽(Philips Kaiser), 以及政治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 他们都参与了二战后德国的重建工作。

40年代期间杰里米·边沁的思想历程，并将他的思想与其同时代人李嘉图和詹姆斯·密尔等人的思想相结合，揭示了边沁在一生中是如何不断推进无限制的个体主义哲学的。后面这些人将自由贸易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合法化，这些力量的极致体现便是高歌猛进、冷酷无情的所谓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哈列维概括道，“边沁学说”对于19世纪英国的革命意义，有如法国大革命早先对于欧洲其他地方的革命意义。^[132]“这无疑是一种快乐道德”，哈列维如此评价他在边沁那里找到的激进实证主义，

但这种快乐道德为了确立自身，以我们已经界定的那种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为预设。基于这些理据，它始终诉求着两种独特的原则，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原则是在一个体系之中相互竞争的：一种原则有赖于立法者的科学的介入，以确定本质上歧异的各种利益；另一种有赖于社会秩序通过自我主义的和谐共存而自发实现。

帕森斯认为，哈列维的论著包含了一种警示，针对的是经由边沁等人的英国实证主义功利论发展出来的哲学激进主义。哈列维的书最后告诉我们，斯宾塞最终取代了边沁。在哈列维看来，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是“曼彻斯特哲学”的最终胜利，尽管立场暧昧。^[133]

帕森斯采纳哈列维对于激进理性主义的个体主义的批判，在《社会行动的
<32> 结构》一书中批判了实证主义功利论等，指其为反智主义，可谓一举两得。他既

^[132] 同上引，第508页。下两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哈列维所谓的理性主义，其意涵他在自己书的前文已经有所说明。至于边沁所属的那伙功利主义者，他也有说法：“他们要求，社会科学要想存在，就必须舍演绎方法而取统计方法，而对于后者，斯密已有批判，李嘉图不屑一顾，就必须建立在观察的科学的模式上，而不是抽象科学的模式上。”（第496页）话又说回来，在哈列维眼中，像边沁这样的哲学激进主义者，其个体主义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个体主义学说已经兴起，并获成功，本身就足以证明，在西方社会，个体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哲学。个体主义是罗马法和基督教道德的共同特性。……个体可能会受到另一个体施加于他的暴力的约束，也可能会受到对另一个体的同情模仿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哲学激进主义者正确地个体身上看到了社会科学的说明原则。”（第504—505页）

^[133] 同上引，第514页。哈列维注意到，斯宾塞的“由动物生育率通则推出的人口新论”（“A New Theory of Population, Deduced From the General Law of Animal Fertility”）1852年初刊于《威斯敏斯特评论》，而这份杂志是1824年“由边沁及其朋友们”创办的（Halévy，第483页）。

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拒斥，又表达了自己对凯恩斯倡导民主福利国家式资本主义观念的同情。

第三节 事实问题

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德国的种族主义，这两种思路显然与帕森斯以意愿论为基础的行动理论不相符合。《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思路拒斥了英美世界中从斯宾塞到萨姆纳的脉络，后者在德国体现为从普勒茨到纳粹的种族主义。这些观念代表了所谓“已死”的思想，它们假定的上帝，即大写的“进化”，据说已经背叛了斯宾塞及其他信徒。帕森斯针对这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其实依然影响广泛的学说，撰写了《社会行动的结构》。达尔文主义影响深广，过去与当时皆是如此，影响到 30 年代社会学与社会可以预见的未来。

我认为，此书将民主体制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相对立，所以它第一版应者寥寥、第二版后即 50 年代以降大获成功，似乎颇有道理。

帕森斯想要做的是一套有关社会的连贯一体的理论，而不是单纯的社会学史。在序言中，他宣称《社会行动的结构》是“一项有关社会理论(theory)的研究，而不是有关诸理论(theories)的研究”^[134]，表明他感兴趣的是“单一一套系统性的理论论证，可以通过批判性地分析这一群体的著述，勾勒这套理论论证的发展”，这个群体就是“（晚近欧洲）一群论家”，其显著特性给“本研究的首要目标”定下了“基调”。如前所述，帕森斯告知其读者，落笔撰写此书的时候，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可以认为这四位论家协力促成了“一套连贯一体的理论系统”^[135]。不过他同时坦承，“把这四位论家放到一起进行研究的理据是相当经验性的。”

可以从下面问题的视角来重述此书的论点：那么，经验性的理据又是什么呢？通过批判性地把握以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为主的几位人物的著述，又能聚合起什么样的事实呢？经验社会的性质不通过经验主义构建出来，而是由帕

[134] *Structure*, 第 xxi 页；下四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黑体格式系原文所有）。

[135] 同上引，第 xxii 页；下两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森斯利用这些“欧洲论家”的理论阐明，又得出了什么结论？

耐人寻味的是，在正式出版的“绪论”中[此处原文是“introduction”，但并非《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一章“绪论”，格哈特实际引述的是“preface”，即帕森斯的序言。——译者注]，主要讲的是照他理解构成经验现实的经济话题。他认为，这四种理论分析了“现代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即‘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和‘经济个体主义’”。然而，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37年9月撰写但弃用的序言初稿中，他更直接地写到了经济秩序的社会要素，“本研究所探讨的四人……都非常关键地讨论了现代社会经济秩序。”^[136]他继续写道，这就意味着“许多（不令人满意的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如此，并不像制度主义者和桑巴特所主张的那样，是因为理论图式根本就错了，而是因为要得出这些经验结论所涉及的某些非经济预设。”

他随后解释了自己的努力。帕森斯先是指出，自己的书通过重新阐释经验性的经济话题，捕捉到非经济的现象，无疑就是社会层面的现象。然后，他宣称自己还不仅仅是要指出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的错误何在。他明言，透过以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为主的一些理论，他提供了对于社会的经验逻辑的一种理解。既然这四种理论的目标都在于显示，众多经济学理论的主题所及的“经验意涵”^[137]并不仅限于与经济学相关的意义，他也就用这四种理论，通过分析现代社会的重要人物之眼，拼装出现代社会的真实性。根据他的阐述，自己开始理解经济生活中有一些不纯粹属于经济的特性，比如“非理性和与理性无涉(ir- and nonrationality)的诸般可能意义”^[138]，“结合行动来解释宗教观念与仪式”^[139]，以及“宗教观念与伦理在现代经济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上三点分别对应于帕累托、涂尔干与韦伯。——译者注]

帕森斯在（被弃用的）序言中概括论点之前，显然已经写成了十九章。序言中扼要重述了自己在这一十九章中的思路，并说自己的经验兴趣只是最初的动

[136] “Preface”，1937年9月，第2页；帕森斯档案，HUG(FP)-42.41, box 2；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37] 同上引，第3页。

[138] 同上引，第4页。

[139] 同上引，第5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力。^[140]当他发现这四种理论当中存在一些共同要素，他诊断其为“会通”，“一旦理解到这一会通，经验的这一轮环节也就结束了。”^[141]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就此终结。相反，这是强调重点的变化，将开始时的一项经验研究，转换成有关现代社会的一套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另一系列的问题开始慢慢凸现出来”，他这样写道：

尽管作者自己的分析，以及所研究的那些论家的分析，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经济个体主义的有关问题，但情况开始表明，在他们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彼此独立地逐渐浮现出某种一般性理论体系的轮廓，其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这些特定的经验问题。与经验问题相关的会通变得如此令人瞩目，并且维系着分析层面本身的一种更深刻的会通。从此，兴趣逐步从经验问题本身转向理论体系。^[142]

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我要讨论的话题在于：意愿论的行动观以怎样的方式能够说明被作为经验问题探讨的“非理性和与理性无涉”、“结合行动来谈的仪式”或“宗教观念与伦理”之类的论题？

帕森斯在其被弃用的序言中揭示道，经验范畴原本是其首要的兴趣，随后，理论“综合”成为意外收获。他告诉读者，自己在撰写研究时，“兴趣逐步从经

^[140] 根据哈佛大学档案馆目前保存的原始大纲，原本应该有二十章。但他后来删除了最初的第十八章，其前半部分后来被称为讨论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失落的一章”。

^[141] 1937年9月版“序言”，第5页。被弃用的序言概括其论点的那一段全文如下：“本研究富有收益的出发点看来是手段一目的图式和理性的概念，帕累托对此阐述得尤其清晰。这将理论思考的范围扩充到有效经验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从这些方面来理解理性时，非理性和与理性无涉的诸般可能意义。令人称奇的是，这种分析模式看来很适合涂尔干的方法论思路，大大有助于理解其思想的复杂性。而这又有可能将他有关经济个体主义的经验问题的探讨，首先是《社会分工论》里提出的讨论，与其理论思路直接关联。在帕累托和涂尔干的著述里，很显然，对于经济问题的背景框架的考察，即一方是‘非逻辑’范畴的考察，另一方是‘契约的非契约性要素’的考察，使他们最终远远偏离，落到结合行动来解释宗教观念与仪式之类的问题。尤其是涂尔干，在其著述的最后阶段，就这些现象发展出了一套详细明确的分析体系。同样令人称奇的是，他在概括这种体系时，表明与马克斯·韦伯几乎完全达成会通，其常用的范畴都可以直接应用于韦伯有关宗教观念和伦理在现代经济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分析，并有助于理解这种分析。一旦理解到这一会通，经验的这一轮环节也就结束了。”第4—5页。

^[142] 同上引，第5页；以下六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和前一页。

验问题本身转向理论体系”，并（如上所述）补充道，“当然，必须指出，这并不是最初的强调重点”，仿佛是要给有些读者提个醒儿，否则他们可能只看到理论动力。

我希望步其后尘，不妨认为他最初的兴趣在于理解当时的经验社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样的经验社会就包括某种双重现实，一边是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元首国家，另一边是美国新政下的民主体制福利国家。^[143]

我的观点是，帕森斯针对当代社会的背景，寻找对于经验现实的说明，并找到了一套分析性理论。这种社会学理论阐述了社会结构的有关事实，不仅是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且涉及更为一般性的层面。《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详尽地重构了这些论家的学说，最后更强调韦伯与涂尔干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对应，尽管出乎意料，但却令人瞩目，证明他们都站在作为其前辈的巨人（包括伊曼纽尔·康德这样的哲人）肩膀之上。这样，帕森斯就点明了使这些人的学说形成会通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事实。他如此宣称韦伯与涂尔干之间的关系：“并无任何相互影响的迹象。两个人的著作都丝毫没有彼此引用的地方。不妨说，可以很方便地把这样一种共识说成是对于同一类事实作出了正确的解释。”^[144]

我的重新阐述则在于，根据帕森斯的说法，构成社会的经验事实预设了一种双翼的（two-pronged）社会行动结构。这类结构的两个极端，一端是失范社会的类型，另一端是整合社会的类型。我要提出，正是对于失范结构的探寻，引导了他去分析自己发现四位欧洲理论家所探讨的三种主要现象，即强力与欺诈、失范、仪式或克里斯玛。我认为，这些现象构成了他所理解的传统型社会，他从所谓“欧洲论家”那里总结出这样的社会，一种受失范驱动的强制型系统的社会。他提出了社会行动的结构相反类型，作为与此对应的现代解决之道。在我看来，整合系统就是帕森斯在强调合法性、安全和理性时背后的意象。社会系统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类型是一个连续统上的两个极端，将失范与价值整合相对立，而在实际的历史世界中，无疑存在着混合的形式。

^[143] 在“构建社会系统理论”（“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初刊于 1970 年）一文中，帕森斯在一个注解里提到，就个人角度而言，他支持《社会行动的结构》写作时代罗斯福总统的整体政策。参看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第 30 页。

^[144] *Structure*, 第 669—670 页。

一、失范社会

我认为,根据《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失范社会包括以下主题:强力(force)与欺诈(fraud),失范,仪式(ritual)与克里斯玛(chrisma)。

帕森斯在讨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时,首次引入强力与欺诈的论题:“如果缺乏任何约束性的控制,针对这一直接目的(即彼此毁灭或制服,这是从霍布斯那里引的一段话里提到的),人们就会采取可以利用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归根结底就是强力和欺诈。”^[145]就此而言,在霍布斯那里,强力和欺诈典型地体现出一种社会状态,办法就是在主权者近乎总体的权威下压制臣民。这种社会状态是需要避免的。

在这一幕场景中,强力和欺诈既有经济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就政治的一面而言,帕森斯阐述道:“运用强制将会导致某种冲突,如果缺乏约束性力量,就会沦为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强力和欺诈将大行其道。”^[146]至于经济的一面,他继续指出,古典经济学理论意味着排除了无所不在的强力与欺诈所导致的彻底解组,转而假定市场力量这一看不见的手的有益效应,指望这样就能将失序防于未然。帕森斯指出,这是马歇尔(不过还有洛克)无意之间犯下的错误:承认效用主导了个体的选择(调控了个体的需求或活动,马歇尔认为这些非常关键,这倒是正确的),但却低估了某些系统力量,它们有效地压制了缺权少势的群体,并剥夺其选举权(强力),对穷人实施欺骗、剥夺或剥削(欺诈)。因此,(所谓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所宣称的)古典的自由社会,对非市场的共同体纽带是缺乏考虑的。帕森斯觉得,马歇尔错误地假定强力和欺诈已经被克服,而帕累托则正确地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帕累托非常强调强力和欺诈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在这里他和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达成了共识。这又与马歇尔的观点截然对立。”^[147]帕森斯反对马歇尔,后者错误地“将其(这些现象)放逐到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 <36>

[145] 同上引,第90页。

[146] 同上引,第236页。

[147] 同上引,第179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按照帕森斯的说明，帕累托的精英循环（circulation of elites）观念更适合于社会现实，能够阐明强力、欺诈和信念所扮演的角色。他用现代世界的观照来重新阐述帕累托定律：帕累托曾经认为，“狐狸”在实施强力手段时有所迟疑，将转向“狮子”型政制。“狐狸”不能冷酷无情、不加分别地使用强力，这将导致它们最终被击败、被颠覆。^[148]与此类似，在经济领域中，“强力性强迫”（forceful coercion）加上保守主义，将支配经济，以帕累托所谓的“食利者”（rentier）类型，取代更有活力、更不墨守传统的“投机者”（speculator）类型。

帕森斯在一处注解中对此有所评论，明确提到了纳粹主义。他提醒自己的读者，在“狮子”与纳粹分子之间存在诸多类似，而与“投机者”和魏玛时代的德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他表明了自己的具体分析兴趣：“帕累托有一则注解很有意思（《普通社会学通论》[Traité]，第2336节），认为反犹主义作为一种‘基础’，实质上就是对于投机者的一种反抗，犹太人成了象征投机者的一种符号。因此反犹主义是食利者阶层所具有的天然倾向。纳粹德国的历史印证了帕累托在这方面（写于二十多年前）的观点，令人佩服。”^[149]

帕森斯注意到，帕累托所分析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信念。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意识形态。帕累托已经发现，意识形态可以意味着两样东西。它们要么意味着打着“理性”旗号的怀疑主义，帕森斯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尽可能地使自身同化于科学”^[150]。或者，意识形态强制推行信念，装扮成“一些原则……对事实‘发号施令’，而不是相反，像在科学中那样。”

这三点特性属于帕森斯所勾勒的两种模式：“‘狐狸’和投机者盛行的时代，也是怀疑主义的时代；而‘狮子’和食利者的时代则是信念的时代。”不过，强力和欺诈在这两种模式下都很普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帕森斯认为，这两种受权力驱动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式适于分析欧洲的历史和社会，却不适于分析美国的历史和社会。他认为，帕累托所持

^[148] 根据帕森斯的阐释，帕累托提出，除非“狮子”杀死抑或清除新冒出来的“狐狸”型领袖，否则倡导人道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狐狸”将逐渐掺杂进来，最终颠覆“狮子”赤裸裸强力的政制。

^[149] *Structure*，第283页（注解）。

^[150] 同上引，第284页；下两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淡化了的基督教”^[151]。对于后者，他指出：“是18世纪以来欧洲精英的显著特性，可视为当前情境非常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显然意味着，帕累托的两种选择方案，即“狮子”/食利者的强制性传统主义和“狐狸”/投机者的怀疑论反传统主义，其实非常类似，因为都“可以视为缺乏社会整合的某种征候”^[152]。他认为，在美国人看来，这两者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都反映了文化悲观主义，而照帕森斯的说法，这“是某种美国人很难理解的旧世界的悲观主义”^[153]。 <37>

帕森斯在讨论涂尔干时，又一次凸显了强力和欺诈的问题。不过，涂尔干区分了契约中的契约性要素和规范规则，后者体现了契约中的非契约性要素，并构成一般化道德。帕森斯采纳了这种区分思路，找到了对抗强力和欺诈的解药。他知道，只有不带立场偏见、基于程序的道德，才能有效制衡强力，预防欺诈。有鉴于此，他提出了一条否定性的一般化规则，也就是抑制强力和欺诈的规范取向。他发现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明确阐述了这一规则。^[154]

最后，他还讨论了韦伯，又回到了强力和欺诈作为非经济手段的话题。如果“一方面是效率规范、合法性规范，另一方面是道德义务”有所缺失或失效，这些手段就很容易支配经济交换。^[155]更确切地说，由于未能履行道德义务而造成的失效，既包含经济环境的失序，也包含政治环境的失序。由此观之，失序意味着“施展可称为非经济的手段”，尤其是“强力、欺诈和施用（韦伯意义上的）权威”^[156]。帕森斯认为，即使不是全部，也会有一部分（韦伯意义上的）权威属于某一类社会结构，如果不受规范性控制的擎制，这类社会结构最终将会有助于强力与欺诈。

他关于强力与欺诈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强力与欺诈属于传统经济学理论

[151] 同上引，第290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52] 同上引，第291页。

[153] 同上引，第293页。这种意见或许是在间接地批评索罗金的《社会与文化动力学》，此书前三卷与《社会行动的结构》同年出版。亦参下文。

[154] *Structure*，第311—312页。

[155] 同上引，第651页；原文中的分号已经转为引语中的逗号。

[156] 同上引，第657页。

所预见的那种社会类型的意外后果。在当时的世界中，即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强力与欺诈盛行于欧洲社会，成为 18 世纪威权主义政制的残余。在帕森斯看来，那时的社会秩序缺乏整合是显而易见的。当他提及对抗强力与欺诈的解毒药，同样也是整合了的社会结构的特征，他明确指的是法律权威^[157]，也认识到理性的（非强制性的）说服^[158]。

三大基本特性的下一点就是失范。失范与强力和欺诈并非完全分离——可以把强力和欺诈视为共同体纽带败坏过程的两个阶段，最终走向失范。当强力和欺诈盛行，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就会削弱。在失范逐渐加剧的场景下，强力盛行，是为“聚合的韧性瓦解”的第一个阶段。^[159]然后是第二个阶段的欺诈成风。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共同体的这种动态的败坏过程不会老是不受遏制。历史上，
<38>常常不待完全进入欺诈阶段，就会出现重组整合。因此，那种失范普遍弥漫的彻底失序是不会任由其爆发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索引中，强力和欺诈之间的时序关系被列在“失范”项下，作为讨论失范时的一项话题，不过在正文讨论失范时并未正面探讨。^[160]

失范现象是从四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取的。第一次明确提到失范，是在重新阐释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161]，指的是社会秩序的瓦解。第二次提及是在解释《自杀论》中的涂尔干，关注的失范面向完全不同。场景现在变为：“手段与目的、努力与获得之间的关系被打乱。其结果，是某种困惑，是迷失方向。人们不再感到自己正在‘走向何方’。”^[162]失范的这种类型或面向牵涉到自杀作为丧失方向的一个严重指标，类似于“此前的定向解组后社会和个人层面上的真空”，而程

[157] 同上引，第 132 页。

[158] 同上引，第 101 页。亦见下文。

[159] 同上引，第 291 页。

[160] 同上引，第 xlv 页。

[161] 同上引，第 326 页。

[162] 同上引，第 335 页。

度稍轻的形式，就是挫败感 (frustration) 和不安全感 (insecurity)。^[163]

失范的第三个面向，就是行动取向中可计算性成为压倒一切的取向。这无疑意味着，在社会交流中，缺失了真诚的道德义务。帕森斯注意到，在涂尔干最初的理解中，个体是严格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的，而个体的理性的基础就是可计算性：“他的态度就是计算的态度。在这里，‘个体’依然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被视为在一套给定条件下追求其私人目的。唯一的差别在于，这套条件现在包含了一套受社会约制的规则。”^[164]

但是，帕森斯继续写道，涂尔干很快便意识到，如果社会环境允许这种可计算性，那么整个世界就没有道德约束了。按照帕森斯的说明，“既然罪犯对于规则的真实态度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只是对诸般后果进行某种计算”，涂尔干认识到，社会不管怎么样总还在发挥着功能。一个普遍渗透着可计算性的社会，尽管缺乏整合性秩序，但也可能通过强制性力量，确保猛烈程度不等的惩罚性控制，从而得以维系一体，因为事实上，“约制只要得到充分的实施，就会成为切切实实的威慑因素”^[165]。因此，如果一个社会里的“秩序”乃是基于惩罚性的社会控制，那么强力与失范就会关联在一起。换言之，即使失范大行其道，世界也依然可能存在，只是在这个世界中，契约的权威主要由赤裸裸的强力来确保，由那些就所推行的契约关系发号施令的人实施：“纯粹的契约关系状态不会是秩序，而是失范，也就是混乱。”^[166]

<39>

但可以肯定，失范已经濒临社会解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只要特定行为的直接目的脱离了终极目的……，就需要有一套调控性的规则，或明确或

^[163] 同上引，第 336 页。这里的挫败感和不安全感两个概念，都指向 20 世纪 30 年代说明暴力的一些思路中的讨论。诺曼·梅尔在 20 年代晚期研究有意图的行动的能力丧失时，最早探讨了挫败感。参看 Norman Maier, *Frustration: The Study of Behavior Without a Goa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9)，在十年后回溯性地概括了梅尔研究的挫败感如何孕育了暴力的无尽动机。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威尔分析了不安全感，视之为现代大众的一种宁要专制不要民主的心智状况，比如当时的德国和俄国等地，参看 Harold Lasswell,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4)。亦参帕森斯在“法西斯运动的一些社会学特征” (Parsons, 1942) 中对于拉斯威尔的问题的再次探讨，此文现在重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第 203—218 页，亦参下文。

^[164] *Structure*，第 380 页。

^[165] 同上引，第 403 页。

^[166] 同上引，第 346 页。

隐含，法律上的或习惯上的，以上文细述的种种方式，保持行动遵从该套规则。这种控制一旦丧失，就是失范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167]

帕森斯论点的第四部分，将失范视为历史动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迁阶段。帕森斯在讨论韦伯时写道，要不是有他关于投机者的资本主义的理论，韦伯或许会被指为忽视了系统结构变迁的潜力。而涂尔干在分析失范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一现象之所以兴起，乃是因为从伦理的控制中逐步解放出来，将利益和冲动从传统角度和理性角度上合乎伦理的规范性限制中逐步解脱出来。”^[168]

帕森斯指出，在韦伯看来，当然也是其他一些学说的看法，投机者的资本主义意味着“离心式的‘各种利益和欲望的爆发’，意味着它们的摆脱控制的倾向”。也就是说，在这里，韦伯诊断出，往昔世界的共同体纽带已经一去不返，这是一幕个体主义肆意扩张的当代场景。帕森斯发现，所有主要论家，哪怕是韦伯，都看得很清楚，从整合到解体，从社会秩序到失范，这种逆转之势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过程本质上也体现在帕累托笔下由持韧 (persistence) 的剩余物主导向由组合 (combination) 的剩余物主导的过渡过程，并同样体现在涂尔干笔下从团结或整合向失范的过渡。在意愿论的行动观念本身之中，就内在蕴含着这个过程的可能性。要是在韦伯的思想中完全看不到这个过程，倒是有了重大的理由来怀疑上述分析是否准确。但他的思想中的确有这个过程。只不过，由于韦伯本人的经验兴趣的特点，它不在关注的前台之列，就像仪式的明确角色。^[169]

由此观之，失范成为现代社会变幻莫测但却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按照帕森斯通过韦伯的投机者资本主义观念所做的阐释，也是涂尔干正确指出的观点，可以有“从团结或整合向失范的过渡”^[170]。换言之，即使一个社会已经达到某个整合阶段，社会动力机制也有可能发生持续变迁，作为现

^[167] 同上引，第 407 页；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168] 同上引，第 685 页；下一则引语摘自同一页。

^[169] 同上引，第 685—686 页。

^[170] *Structure*，第 686 页。如前所述，他发现在帕累托笔下“由持韧的剩余物主导向由组合的剩余物主导的过渡”中，也存在同样的过程。参看 Pareto，同上引，第 685 页。[原文此处表述有误，应为 Parsons，同上引。——译者注]

代化的某种代价。这样的变迁可能会使某种社会秩序陷入重大危机，产生更为明显的失范。

下面来概括一下帕森斯有关失范的讨论：这四个方面的特性展现了系统层面的社会整合逐渐瓦解的过程，展现了社会结构的行动层面上的交换中，道德义务逐渐丧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定向力，从而也是规范的定向力，逐渐衰微。如果这种瓦解过程不受遏制，如果只是通过引入有效的惩罚性社会控制，就会导致危险的集体良知衰微之势，社会就可能从强力与欺诈盛行之处兴起。在帕森斯看来，强力与欺诈代表着这样一类社会“秩序”，与其他意味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之势的秩序之间，不仅存在量的差别，而且有着质的差别。甚至此前达到的文明程度有所倒退，也是常有之事。失范标志着社会中可计算性界定了社会生活中唯一的规律性。这种情况类似于犯罪活动的泛化，如果保护契约关系的非契约性保障缺失，就会盛行于世。那时，黑手党式的强迫性关系就会强行主导契约的内容与条件。此等社会失范状况，堪比于混沌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样的失范在吞噬了社会之后，包含了前后相继的几个阶段：强力标志着最初的阶段，随后便是欺诈大行其道。

在这一分析中，失范具有两种意义。其一，失范标志着驳斥功利主义学说的讨论中的一项主题。不仅如此，失范还代表着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否定性一端，是社会整合的最低点。

帕森斯第三方面的话题是仪式和克里斯玛。他对于这方面话题的探讨是在不同的标题下进行的，其各自的论题凸现在“晚近欧洲论家”的著述中。他结合讨论帕累托和涂尔干的著述来分析仪式，又通过讨论韦伯的作品来讨论克里斯玛。他发现，这三套理论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来分析仪式/克里斯玛，但聚焦的重点却有所会通。他明确指出，存在这样一种会通。在他看来，这就充分证明了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基本的要素。

当然，他的兴趣在于，事实上，他发现帕累托、涂尔干与韦伯在探讨仪式/克里斯玛时存在共识。他惊叹道：“可以很方便地把这样一种共识说成是对于同一类事实作出了正确的解释。”^[171]那么，在他看来，激发这三套经典学说之间达

[171] 同上引，第 669—670 页。亦参上文笔者讨论被弃用的序言时的引述。

成共识的相关事实又是什么呢？他们各自不同的概念阐述又是基于什么现实形成会通的呢？

按照帕森斯的说明，对于仪式的理解是基础。帕累托谈到了逻辑角度上的剩余行动，其中的手段一目的关系是符号性的。比如古希腊的渔夫在出海前要以食物祭献波塞冬（Poseidon，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译者注）。根据帕森斯的看法，帕累托强调，对于渔夫本人来说，自己行动中的手段一目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172] 他并提出，有鉴于此，即使不考虑影响（社会）行动的那些与规范无涉的（non-normative）因素，比如生理过程，也可以明确辨识另一类与理性无涉的（nonrational）因素，即仪式取向。它们同样具有规范性质：它们的手段一目的关系虽然是外在观察者所不能够观察得到的，但对于行动者本人却无疑是实实在在的。这样来解释帕累托的概念，就类似于涂尔干更有名的说法，将仪式视为社会中的宗教形式。基于这种解释，帕森斯在讨论帕累托时，最后达成了这样的理解：“按照涂尔干的界定（这里将接受他的界定），仪式除了符号体系的角色，还包含一个尺度，就是有关神圣范畴的行动。因此，可以把仪式界定为对于符号的操弄，这些符号在某些方面被视为神圣，其运作在主观上被视为通向某一特定目的的适当手段。”^[173]

他在讨论帕累托时最后指出，仪式之所以属于一种社会行动类型，是因为它包含了努力（effort）。^[174] 他更在别处提到，鉴于努力是社会行动的一个要素，其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他明确指出，努力这个要素标示出了人的选择自由的范围，进而界定了人际生活中积极主动的评估性创造活动的领域。他认为这一见解可以作为自己也就是帕森斯的意愿论行动理论的要旨：“这个要素在行动理论中的分析地位，或许近似于能量在物理学中的地位。”^[175]

按照帕森斯的记述，涂尔干在其理解社会的学术生涯的相对晚期发现了仪式。最终，涂尔干在其《社会分工论》出版将近二十年后的最后一部主要作品中，

[172] 同上引，第 208 页以下。

[173] 同上引，第 258 页。

[174] 同上引，第 298—299 页。换言之，仪式并不是机械的行为，而是包含着人的能动作用，这正是因为行动者致力于通过深思熟虑地运用仪式，展现努力的效力，以实现其目的。

[175] 同上引，第 719 页。

认为神圣范畴可以体现为事物与观念。根据帕森斯的说明：“任何东西只要人们信其为神圣，即可为神圣。使之成为神圣的正是他们的信念。”^[176]按照他的理解，神圣范畴所产生并通过仪式等渠道表达出来的情感，就是尊崇，就是一种自愿的情感取向：“单纯的物质力量或许会引起恐惧，却不能引起尊崇。社会是一种道德的实在，而且是……对于人具有道德权威的……惟一经验实体。涂尔干正是沿此途径得出他的著名命题——上帝或其他任何神圣对象都是‘社会’的某种符号表征。”^[177]

这样一来，宗教观念就通过“实施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类型的仪式”，赋予世界以意义，并意味着表达对于“神圣范畴”的尊崇。^[178]世界就此充盈着符号关系。它们的现实性对于行动者的强制力，与具有内在理性的手段一目的关系相当：“仪式乃是人们对于现实的各种非经验特性的积极态度见之于与思想截然不同的行动的表现。”^[179]

帕森斯特别强调，涂尔干视宗教为社会黏合的主要媒介，而无论其是否涉及神祇或其他“神圣范畴”。关键在于“宗教仪式确认、巩固了社会团结赖以存在的那些情感”^[180]。

当帕森斯转向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他指出，**克里斯玛**是一种赋予对象的特性，能够使这些对象与众不同（他用的是韦伯使用的德文原词“*ausseralltäglich*”）。按照帕森斯的说明，被赋予**克里斯玛**的对象与涂尔干笔下的神圣范畴极其相似，也要求得到尊崇。他这样坚称：“富有收益的出发点乃在于认为，与世俗行动有别的宗教行动包含了一些特定的属性、力量等，是有别于普通的不同凡响的东西（*ausseralltäglich*），人们对其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赋予一种特别的效力（*virtue*）。这种不同凡响的属性，韦伯称之为**克里斯玛**。它在玛纳（*mana*）之类的概念中有典型的体现。”^[181]

[176] 同上引，第 415 页。

[177] 同上引，第 417 页。

[178] 同上引，第 419 页。

[179] 同上引，第 432 页。

[180] 同上引，第 435 页。

[181] 同上引，第 564 页（黑体格式以及“*ausseralltäglich*”拼写错误均系原文所有）。

他指出, 克里斯玛神圣性的特质可以由人来获得(比如先知), 但也可以是观念, 由此变成宗教观念。后者常常可以为实践生活提供引导, 因为它们塑造了特定的方式, 行动者据此趋向某些特定的理念, 甚至是经济生活方面的理念: “韦伯基于这一基本观念, 提出了他的根本命题之一, 即‘宗教观念’对于包括经济行动在内的行动的首要效应, 即无处不显的效应, 就是赞许固守传统。”^[182] 在这一点上, 帕森斯发现韦伯作为第一原则提出, 克里斯玛力量使得“任何重大行为领域, 从经济活动到政治活动, 从爱到战争, 都……被传统化了。”^[183]

但克里斯玛甚至也具有革命的潜力。克里斯玛既是一种宗教属性, 又是政治权威的一种类型(甚至是一种理念型), 通过这样的双重性质, 克里斯玛成为对抗社会秩序力量的强有力的解毒剂。帕森斯认为, 韦伯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才会说克里斯玛“就其本身而言, ‘特别的疏离于经济’(spezifisch wirtschaftsfremd)”^[184], 这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政治特性, 即一位克里斯玛领袖的光环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强制性: “用到一个人身上, 克里斯玛的性质就是堪为楷模(*vorbildlich, exemplary*), 就是值得效仿的某种东西。与此同时, 承认其属于某种与众不同的性质, 赋予其声望和权威, 则是一种义务。”

这就点出了具有“克里斯玛性质”的人应该享有其追随者的那种尊崇, 要求得到的那种尊崇具有一种特别的强制性: “克里斯玛型领袖处置那些在其要求范围内抵抗他或忽视他的人, 永远都会认为他们是未尽到义务”, 而这又意味着可以对那些“未尽到义务”的人施以严惩, 因为需要得到尊崇的克里斯玛型领袖属于圣人。

不过, 进一步深入分析就能看到, 当克里斯玛型权威支配着一个具有神秘强制性的政治体制, 甚至是犯下侵害人权罪行的政权, 这种权威也是合法的。帕森斯在阐释韦伯时明确指出, 合法化说明了权威何以可能, 成为政治制度中的自愿乃至非自愿的行动特性的基础。然而, 帕森斯比较了合法化与克里斯玛两者的包容性, 注意到合法化不像克里斯玛那样涵括广泛, 事实上, 克里斯玛的概念

[182] 同上引, 第 565 页。

[183] 同上引, 第 566 页。

[184] 同上引, 第 662 页; 下四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更为宽泛：“合法性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这种性质仅适用于一种秩序的规范，而不适用于人、事物或‘想象中的’实体，它所指的是对于行动的调控，主要是其内在固有的特性。因此，合法性乃是克里斯玛的制度性应用或体现。”^[185]

因此，克里斯玛是一种超出了合法性但肯定蕴含着合法性的现象。鉴于合法性是政治权威的核心领域，个体不得不接受支配政权的合法性，哪怕是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度，甚至这个政权只是建立在克里斯玛的基础上。这无疑可能包含着彼此冲突的多种忠诚所导致的张力：“如果一项秩序在共同体中大部分人的眼里都被视为是合法的，单凭这一事实就使该秩序成为任何一个个体的利益所在 (Interessenlage)，无论其本人是否认为它合法。就算他认为这种秩序不合法，他的行动要想理性，也仍然必须以这种秩序为导向。”^[186]

概括一下帕森斯有关仪式与克里斯玛的说法：它们是社会行动中对于终极目的的符号取向的两种密切相关的特性。宗教观念无论是体现于仪式还是体现于克里斯玛，都能普遍渗透于行动的意义之中，既有助于与理性无涉的符号性宗旨，也有助于更具理性色彩的宗旨。帕森斯注意到，帕累托讨论了仪式，指出符号行动中包含了努力，既解决超验性的生活问题，也解决经验性的生活问题。涂尔干也讨论了仪式，并就此讨论到形式化的行动，其实施的基础就是在社会中普遍渗透的神圣的精神，而所谓社会，就是构成一个共同体的集合体。韦伯虽然没有讨论仪式，却集中探讨了克里斯玛。帕森斯发现，韦伯讨论了与帕累托或涂尔干相类似的现象。但他在分析这些现象时，考虑的是它们专门的经济特性或政治特性，指向克里斯玛的非经济性、反民主性的政治维度。

我认为，强力与欺诈，失范，仪式 / 克里斯玛，这三项话题是合为一体的。帕森斯突出了三者之间的关联，并与整合的社会秩序相比照。那么关联何在？这些模式是如何与社会整合相对立的？比如说，强力与欺诈是“帕累托所说‘决定社会均衡’的那些更深层力量的状态的征候，如果换一个略有不同的语境，这些力量也可以说是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整合状况。”^[187]

[185] 同上引，第 669 页。

[186] 同上引，第 652 页。

[187] 同上引，第 291 页。

一方面是强力与欺诈，主要是强力，另一方面是克里斯玛或信念，两方面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帕森斯在讨论帕累托的“观念论与强力的使用之间的关系”^[188]时就对此有所述及，他明确指出，“对于帕累托来说，信念的一个首要特性就是它的绝对性……要记住，这样一种信念会对行动产生确定的后果。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一般都会不惜利用任何手段，努力使别人遵从自己的信念所要求的那些标准。”鉴于信念涉及被迫遵从的其他人，信念就意味着克里斯玛，也涉及仪式。帕累托的“具有坚定信念的人”“很容易转向强力”，并由其克里斯玛而将强力合法化，有可能像韦伯所分析的那样行事。他可能会运用权力来惩罚那些“未尽到义务”^[189]的人，他们未能遵从自己不可妥协的威权主义要求。因此，将强力和欺诈与仪式/克里斯玛关联起来的因素，具有涂尔干所界定的那种宗教性，即象征着社会中的集体信念的神圣范畴。

帕森斯指出，可以把失范看做是一种失序，而其表面上的补救之道就是仪式/克里斯玛。在“经过经验验证的结论”一章(第十八章)中讨论涂尔干的时候，帕森斯提出，涂尔干引入仪式作为对抗失范的解毒剂：“仪式在涂尔干看来……对于社会的‘团结’具有巨大的功能意义，是重振并增强共同的价值要素的一种方式。……仪式是社会对抗失范趋势的根本性防御机制之一。”^[190]这里可以简要概括重述一下强力与克里斯玛之间的关系、强力与失范之间的关系，以及失范与仪式之间的关系：强力（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欺诈）引发了克里斯玛，随之又强行推进信念；由此导致失范，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通过遏制社会解组的仪式有所抵消。总之，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涂尔干称之为失范的极端类型”^[191]。

综合帕累托、涂尔干与韦伯的著述，帕森斯发现，应用韦伯的思想，可以找出社会行动结构的基本系统类型，但不是三种，而是两种。他指出，其中一种是在行动层面上，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一）情感的、（二）价值合理性的[wertrational]或（三）宗教的”^[192]等主观价值取向的聚合，作为一种替代选择，

[188] 同上引，第 289 页；下三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189] 同上引，第 662 页。

[190] 同上引，第 713 页。

[191] 同上引，第 291 页（注解）。

[192] 同上引，第 659 页；下两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有别于“‘利益’，对于外部后果的特定预期”，即基于自我中心的动机。而在社会系统的层面上，他发现韦伯实质上已经提出了四大要素的结合，即“(一)传统的、(二)情感的、(三)价值合理性的和(四)由实际规章(Satzung)认为合法的”，合为一类模式：“‘一种秩序由于人们把传统神圣化(sanctification)而获得合法性，在任何地方都是最为普遍、最为本原的情况。’这样将传统主义与神圣性(sanctity)相关联，是贯穿他(韦伯)对于前者(宗教动机)的探讨的显著特性。”^[193]

帕森斯提出，韦伯实际上发现了社会行动诸类型或此类行动的结构系统(或诸系统)的某种二重性，而社会秩序就是其中明显的一重。帕森斯正确地拒斥了社会行动/系统(诸系统)的三重权威结构观念，而那正是韦伯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在捍卫的立场。帕森斯指出，涂尔干也有类似的发现。他明确认为，两位作者都对比了“合法秩序……与不受控制的利益相争的情境”，并且怀着得胜还朝般的心情断言：<45>

就这样，当韦伯把约束解释成道德权威，也就得出了与涂尔干一样的论点。不仅如此，韦伯还从同样的角度切入问题，即认为个体的行动乃是参照构成其行动条件的一个规则体系。两人的著述中都以类似的方式区分了对于此类秩序之规则的态度要素，一是有利益关涉的，一是无利益关涉的。两人在做区分时，都将合法秩序与不受控制的利益相争的情境相对比。两人都尤其关注后一种要素。这样的类似不太可能纯属偶然。^[194]

连续统的一端标志着失范或缺乏社会整合，突出地表现了私人的甚至是我中心的功利主义利益；而另一端所展现的社会，则是由蕴示着无利益关涉的社会共同体的取向所主导。^[195]

[193] 同上引，第 660 页。引语出自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22), 第 19 页。

[194] 同上引，第 661 页。

[195] 同上引，第 659 页；下两则引语均摘自同一页。在帕森斯的早期著述中，无利益关涉意味着他后来的模式变项观念中所称的集合体取向。五大结构性替代选择中的这一选择蕴示了某些特定的制度领域，比如医疗实践。在帕森斯看来，医疗实践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民主制系统型构的道德类型。有关由此导致的信托(trust)的重要性，参看 Bernard Barber,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他明确指出,失范所缺乏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能够“被视为价值观的某种表达,因此之所以得到遵从,是因为其本身或者它所表达的价值得到珍视。”他更在一处注解中补充了这句话的另一部分,又一次体现出他的心中是如何倡导支持民主制、反对纳粹的政治。他补充道,一种合法秩序是由于其内在固有的价值而受到珍视,并在注解中指出,“或者出于无利益关涉的动机而争取”^[196]。

二、整合社会

强力与欺诈、失范、仪式/克里斯玛这三项话题,标志着社会行动(系统)的二元结构的一端,那么,与之截然相对的另外一端,也就是一个整合的社会,或真正民主的、道德的社会秩序,又以什么为标志呢?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并未明确刻画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价值整合的各项特性。他只是将自己有关整合社会的意象掺入自己对于三套(或曰四套)学说的解释,集中考察它们是如何分析解组的,并由此间接讨论整合。我的阐述也只是大致勾勒这个观点。我认为,《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阐明了整合的社会秩序的三种特性,即法律性(legality)、安全性(security)与合理性(rationality)。

帕森斯在解释马歇尔的时候引入了法律性。他指出,马歇尔想当然地认为,
<46> 在一个功能运转良好的经济体系里,超经济的(契约中的非契约性因素)力量事实上体现出社会的道德规范。帕森斯写道,马歇尔假定了竞争、需求的满足、流动性与资源的可分割性,但也假定了这种竞争秩序中的消费者受到保护,免遭强力与欺诈:“部分是借助竞争的压力,部分是借助一种法律权威,确立游戏规则,处罚违规者。”^[197]不过,帕森斯也知道,这种法律权威并非理所当然,需要有一种功能运转良好的道德秩序,以确保非契约性的规范来调控契约关系。

帕森斯在讨论韦伯的时候,也涉及到法律性。很显然,法律性这个维度使韦伯的理性权威类型成为对于社会关系的法理性调控。根据韦伯的看法,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遵从经宪法合法化的立法机构所创制的法律,对公众负责,是与失范相对立的秩序之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一个基于法律性的规范体系,才能

[196] 他因此引出了一种可能性:可以出于无利益关涉的动机而争取一种合法秩序。

[197] *Structure*, 第 132 页。

在现代民主体制下“运作”^[198]。他主张,在公共管理中必须普遍尊重法律性,并由此增强政府的立法功能。^[199]

帕森斯间接引入了第二个方面,就是安全性。他写了很长一段,阐释霍布斯与洛克的推测相对的社会秩序观念,最终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强调安全性。他赞同霍布斯的观念,只有主权者几近总体性的权威才能遏制强力和欺诈,否则强力和欺诈将横行于世。^[200]他支持霍布斯并认为,洛克及18、19世纪众多他的信徒都忽视了,假定“激情”不会主导行为是多么不切实际:

洛克与霍布斯相反,始终尽力压低安全性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对于洛克来说,政府并不是防止强力与欺诈肆虐如潮,淹没并破坏社会不牢靠的堤坝,而是成了一种审慎的措施,以确保对抗不测,它的威胁不是特别严重,可是明智的人都对此有所提防。事实上,抵御侵犯的安全性,往往会成为公民社会参与的一种次要动机。^[201]

这就意味着,霍布斯的理论更具现实主义色彩,而“洛克对于利益的自然特性的推测多少有些一厢情愿”^[202],大大低估了安全性的重要性^[203]。当然,在霍布斯看来,对于安全性的现实主义关切证明了下述有力观点,也遮蔽了对于个体自

[198] 当然,韦伯在其《政治论文集》(*Politische Schriften*)中已经讨论到这些话题。在1917年修订并出版的有关价值中立性的备忘录中,他也处理过这一话题。他在该文中驳斥了工联主义,理由是它削弱了民主制下的自由,当时他正强烈反对国家垄断政治权力并实际运用(在韦伯看来,国家就得刻意避免使用这样的垄断权力)。参看 Weber, “Der Sinn der ‘Wertfreiheit’ der soziolog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en”, 刊于其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第三版, Johannes Winckelmann 主编 (Tübingen: Mohr, 1968), 第 489—540 页 (尤其是第 540 页关于国家权力的讨论)。

[199] 这个主题帕森斯不会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明确阐释,而是在文献中有两处参引,即 Carl J. Friedrich 与 Taylor Cole 合著的 *Responsible Bureau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以及 Friedrich 所著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7), 参看 *Structure*, 第 xxxiii、xxxvii 页。前一本书探讨了瑞士的行政管理结构,后一本书则比较了美国的宪政与纳粹基于公投的“民主”。

[200] *Structure*, 第 87 页以下。

[201] 同上引,第 95 页。

[202] 同上引,第 97 页。

[203] 这里可以应用拉斯威尔对于安全性的政治蕴涵的分析。拉斯威尔首先使用不安全性的命题来说明,像纳粹德国或俄国这样的国家为什么会转向极权主义,参看其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刊于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 1933, 第 373—384 页。亦参本书下文,第二章。

由的所有考虑：“霍布斯以经验主义的意味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也从经验上导向了深切关注最低限度安全性的问题。他是如此专注于这个问题，而这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性又是如此难以达成，使他看不到除了安全性本身，从社会关系中还有任何可能得出什么积极的好处。”^[204]

有关整合的道德共同体的第三个特性，我认为就是合理性。帕森斯和帕累托一样，也警告世人，科学并不能构筑理性行为的可信基础。他提醒人们，任何基于科学的合理性都有可能认为，其他选择都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基于科学的合理性模式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个体的选择自由。然而，他又预设道，选择自由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要害。由此观之，单单从科学发现的角度推出的合理性，并不能回答合理性如何主宰现代社会行动的问题。

另一方面，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具有典型关联的不同立场观点，想必会形成各式各样的思想体系，相对主义对这些思想体系会提供地位相当的正当性理据。但即使是相对主义，也不能提供可以接受的答案。^[205] 答案在于指明，合理性并非单方向的事情。合理性不可能由具备理性取向的个体得出，更不用说强制推行，而只能通过相互之间不具有强制性的说服来激发，或者常常是诱发。帕森斯区分了“理性地追求目的的两类手段，一类是强力、欺诈等强制类型，另一类是理性地说服他人进入交换关系以有所获益。”^[206]

帕森斯在讨论帕累托时，深入讨论了这一区分。一方面，疑似合理性 (quasi-rationality) 是建立在强迫、蒙骗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合理性则是建立在说服的基础上的。根据他的解释，帕累托的“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从界定上就是与说服中包含的合理性相对立的：“鉴于理性说服对于确保遵从有着固有的局限性，

^[204] *Structure*, 第 97 页。

^[205] 帕森斯毕生始终怀疑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Wissenssoziologie*, sociology of knowledge)。曼海姆显然希望通过一种看似巧妙的策略来对抗相对主义，就是像其导师阿尔弗雷德·韦伯一样，倡导某种所谓“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原文为“free-floating intelligentsia”，本书下文的“free-floating”用法基本为贬义，强调的不是摆脱根植性后的自由批判性，而是去除共同体约束后的非道德、无依凭性质，译作“散漫漂移的”。——译者注]。对于这种特别的解决之道，帕森斯不予置信。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他明确表示不打算探讨这一话题。在他眼里，马克斯·舍勒和曼海姆对于知识社会学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将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置于“本研究范围”之外(第 672 页)。

^[206] 同上引，第 101 页。

具有坚定信念的人很容易转而求诸强力。”^[207]他又在别处指出，“要说服某人做某事，你不仅必须告诉他如何去做，而且要让他明白，究竟为何必须如此。在有些场合下，所涉及的价值观念并不属于人人都必须明言正确还是错误的事实，而是属于‘主观’范畴，在这些场合下没有任何理性的手段能够让另一个人接受目的。”^[208]

由此观之，说服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习用的手段。正是因为说服常常会无所收获，当人们选择抗拒说服时，合理性就体现为一种共同的努力，一种交互性的成就。

法律性、安全性和合理性，这三个因素概括出帕森斯眼中整合的社会秩序的意象。道德价值观，即共同关注的规范准则，在这三个因素背后均有体现：“秩序被视为价值观的某种表达，因此之所以得到遵从，是因为其本身或者它所表达的价值得到珍视。”^[209]在理想状态下，这意味着通过自愿承担实现制度化。他承认，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韦伯意义上的）合法的法理型权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达成秩序的目标：“纯粹的自愿协议是一种有限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合法性要素化减到了最低限度。”^[210]

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对于无利益关涉的倡导，展示了帕森斯对于民主社会的关注。在这一点上，他与基本和自己属于同时代人的芝加哥大学哲学家兼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取得了共识。^[211]米德和帕森斯都提出了规范性的准则，使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社会观念的先驱。

[207] 同上引，第 289 页。

[208] 同上引，第 277 页。

[209] 同上引，第 659 页。

[210] 同上引，第 660—661 页。

[211] 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的一个部分中解释了社会，阐明了帕森斯称为无利益关涉他称为普遍主义的立场：按照米德的理解，医生作为专精职业人士，在工作中寻求满足，从另一个人即其病人的幸福安康中求取自我实现。帕森斯在其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撰词条“社会”（*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34）中也强调了相同的观点，讨论了社会中的服务取向的重要性。参看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arles Morris 编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第 288 页; Parsons, “Society”, 1934, 重印于 *Talcott Parsons Early Essays*, 第 109—121 页。

三、遗传与环境如何考虑？

回头再来看《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有关社会行动结构的双翼理论，或许可以讲清楚其中对于遗传与环境的讨论。在书的结尾，帕森斯区分了三类社会理论，其中只有第一类关注到了这个话题。首先是关注遗传与环境，推定为行动源泉，提出一种决定论的观念，否定个体能动作用；其次，另一种理论关注的是严格讲求理性的手段一目的关系，行动的源泉要么在于功利主义的动机，要么在于外在体验到的约束，源自强制性权力；第三类理论关注个体，视之为负责任的目标导向的行动者，可以从根本上针对他人的取向和判断作出反应。^[212]他进一步阐明，后一种理论，即意愿论的行动理论，兼顾了行动中的规范要素与条件要素^[213]，而前两种理论多少有些局限于条件要素。

当然，在此书开头，帕森斯已经认为，“就行动理论而言”，遗传与环境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非主观范畴”。^[214]他明确指出，“遗传与环境这样的概念……在本研究的核心理论论证中没有扮演任何实质性的角色。”^[215]而当他谈到达尔文主义时，他则认为遗传与环境属于一种虚幻的“理性主义”图式，是由据说“非规范性的客观行动条件之影响”构成的。^[216]他在许多地方进一步阐释帕累托和涂尔干的思想时，也提到他们是如何多少有些完全不考虑遗传和环境的因素。^[217]帕森斯还发现，韦伯也曾关注“品味问题”^[218]，在这里来说，就是遗传和环境也属于“愚昧之源，‘明确的’谬误之源”，从经验的角度上说还有些相关性，但对于社会行动的理论来讲就毫无理论意义。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最后的总结中，帕森斯区分了可以赋予遗传和环境的三种意义，它们在理论上都不怎么重要。一是这些话题造成了“不能达成理

[212] *Structure*, 第 718—719 页。

[213] 同上引, 第 719 页。

[214] 同上引, 第 82 页。

[215] 同上引, 第 84 页。

[216] 同上引, 第 114 页。

[217] 有关这些地方的引述, 参看同上引, 第 464—465 页。

[218] 同上引, 第 718 页; 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性规范”^[219]，或许因此可以说明为何会有谬误，等等；二是据说源于遗传驱力的享乐主义，可以激发一个有机体的根本上非理性的行为；第三，在更一般的层面上，“遗传要素”多少可以形塑日常生活。而这一切在理论上都没有多少相关性。按照他的总结，归根结底，关键在于，“实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对于遗传和环境原则的运用，是否只是作为内在理性的规范的对立面，或成为界定某种功利主义立场的“激进实证论一端”的支柱。后一种立场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使得遗传和环境成为一种“超出实证主义的形而上支柱”（*extrapositivistic, metaphysical prop*），所构筑的理论有力地确立起“关于利益的自然特性的假设”，我觉得，后一种模式激发的正是纳粹倾向的学说中盛行的那种强制性乌托邦主义。

四、社会学的领域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全书的最后一节，帕森斯明言，自己的宗旨在于“社会学的位置”，并尝试性地阐述了今天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知识。他主张，社会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第三领域，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相互分离，但又保持彼此关联。这样一种真正属于社会学的社会领域，在他提起来是当做事实问题的，尽管他强调这还属于尝试性的，会激发出

<50>

一种共同的指涉，即通过指向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而整合个体这一事实，体现在制度规范的合法性中，也体现在行动的共同终极目的中，体现在仪式及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中。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反过来指向社会行动系统的那一项一般性突生特性，可以称之为“共同价值的整合”（*common-value integration*）……如果这种特性被称为社会学的，那么社会学就可以界定为“试图发展出有关社会行动系统的一套分析性理论的科学，而这些系统要能够从共同价值的整合这一特性的角度来加以理解。”^[220]

路易斯·沃思当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此书书评，不承认社会的

[219] 同上引，第 701 页；本段下面的引语均摘自同一页。

[220] 同上引，第 768 页。

实在。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不解。沃思赞扬《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学识深厚，但不认为此书的宗旨是正确的，即确立一块社会学的领域，来阐明真正的社会事实，外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析领域。相反，沃思主张，社会范畴不应当与经济世界和政治世界相分离，而应当作为经济世界与政治世界的一方面特性加以概括。帕森斯则在1939年秋天写了一封长信，反驳了沃思的批评，承认自己对于社会学的事实领域的界定是尝试性的，但还是坚持认为，这是自成一体的实在：

我在结尾冒昧提出的对于社会学领域的界定，具有相当的尝试意味。我并不想倡议对美国学术界的思考角度来一场彻底的改革，只是希望抛砖引玉。我从经济学理论的地位出发，看到像经济学理论或者社会学中与之相对应的类型这样的分析系统，不仅不是分析各类具体现象的充分图式，实际上也不可能是。相反，不仅在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世界中，而且在经济世界中，都存在社会学要素，反之亦然。我们不妨说，即使在教会里也有经济和政治的要素。鉴于我把这种讨论的重点放在理论系统的分类与具体现象的类别之间的区别上，窃以为您提出的异议并不成立。^[221]

我认为，他从三位（或四位）理论家的学说中（已经）得出的现实，表明社会的结构（包括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其基本形式即“基元行动”模型来概括）是双翼的。一方面是强力与欺诈、失范和仪式/克里斯玛，是社会解组的特征，他看到绝大多数经验社会中不同程度地盛行着这些特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制主导了大多数国家。另一方面，只要有一个作为“理念型”的公民社会，将法律性、安全性和合理性融为一个具备自愿的共同道德价值取向的共同体，就可以预见一个整合的社会系统。

在我看来，帕森斯确实相信，在纳粹德国，盛行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与此相反，他认为新政下的美国则代表一种方兴未艾的整合性道德秩序，尽管他也不否认其间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些还很严重，但却是对达尔文主义倾向的威权主义的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

[221] 帕森斯1939年10月6日致沃思函，第7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2, box 2。

第四节 小结

《社会行动的结构》常常被视为对于此前各种经典理论的概述，但我们迫切需要证明，这从来也不是此书的宗旨，也非其知识旨趣。

帕森斯分别写于1937年9月和10月的两篇序言尽管重点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了两样事情。一是目的乃在于分析经验社会（或诸社会），因此关注于通过科学研究所确定的事实。另一样是有关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心愿论理论，无疑是与康德所谓的“分析性”相对的“综合性”的，“综合性”这一概括指的是寻找两方面的模式或结构类型，一方面是失范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另一方面是整合或社会秩序，最终形成两种对立并置的系统类型。

笔者的论证沿着三条线索。一是在明确具有价值中立色彩的——也就是韦伯风格的——对于社会行动结构的理解中，依然蕴含着政治。帕森斯在回应沃思的书评时指出，做一种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时，不需要具备使他能够据之对社会现实作出评判的价值。要作出这样的评判，需要基于作为一名公民的社会学家所持的价值视角，把握具体的权力关系。作为一个人，他是（或应当是）自己所处社会中一个道德完整[原文为“integral”，而“integration”就是整合，“integrity”就是正直。——译者注]的成员，尊重人类平等、尊严等深深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价值观念。因此，正如帕森斯告诉沃思的那样，社会学家需要认识到，具体的权力关系需要与价值观念相协调。

如果说政治学明确有别于社会学，那就意味着两样事情。一是说帕森斯像韦伯一样，拒绝将学科政治化，希望社会学免遭政治目的或政治群体之宣传的侵蚀。二是说强制性的政制对于人类尊严等西方价值的否弃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因此是社会学的概念视角不得不面对的，哪怕是作为民主的现代社会可能性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视角下，帕森斯借熊彼特之口，宣传其书为“典型意义上的‘公民学’”。

就第一条思路而言，我试图通过文本来追溯这一线索。我通过重新阐述文本，揭示了在1938年的（各次）讲演中，明确用来分析与美国民主体制相对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那些角度/用语（terms），与《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说明的那

<52>

些如出一辙。“欧洲论家”的各种理论在一些事实上取得会通，基于这样的总体看法，构成失范的社会类型的主要概念有别于构成整合的社会类型的主要概念。

我的第二条线索在于，帕森斯的知识旨趣针对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各式变种。比如说，我认为，他与斯宾塞针锋相对。科学史的证据表明，斯宾塞是激发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生存斗争原则的先驱。不仅如此，他又进而反对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社会学中盛行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它们延续了机械进化论，这种趋势让人不能接受，而涂尔干和韦伯等欧洲理论家的学说早就克服了这样的论调。出于同样原因，他坚决拒斥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后者已然成为纳粹“科学”的官方学说。在这一点上，他谈论了遗传与环境，对生物学中的某些原则（就像当时经常声称的那些东西）表示不屑，它们属于自说自话，对于系统社会学完全没有意义。

他的第三条线索在于提出了一种社会现实的理念，设定出现了一种逐步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即使只是不动声色地作为对抗经济学和政治学之傲慢自负的解药。基于这种进化，帕森斯假定现代世界本身的一种民主化动力机制。他赞同新政是一项饱含希望的成就，因为它缓解了贫困，遏制了政治动荡的危险，而这些曾经吞噬了魏玛时代的德国。他了解社会是实实在在的，而不只是社会学使用的一种建构，基于这种背景，他可以看到民主（比如在美国）和专制（就像在纳粹治下）之间的双翼动力，看到被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代场景所证实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变动不居的结构与过程。

要理解《社会行动的结构》，意味着将此书置于上述三重背景之中。我认为，只有在阅读文本时遵循这三条线索，解读者才能充分领会帕森斯在此书中所探求的多维知识旨趣与复杂精致的论证。

然而，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这部著作是这样一种视角多维、复杂精致的努力。事实上，他原本雄心勃勃地计划通过经验研究的角度，综合方法论分析与理论分析，但就此而言，这部著作或许是某种失败。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讨论齐美尔的那半章被删掉了，而齐美尔对于社会化成（sociation）的先验推定，既包括社会的条件，也包括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条件，原本可以大大地启发帕森斯，只要他理解了齐美尔真正具有开拓性的建构 [他原本可以通过齐美尔的建构，将怀特

海对于具像误置的谬误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的警告, 对于视角主义的赞同, 与韦伯的理念型概念相调和]。甚至可以说, 帕森斯本人都低估了自己论点中令人激动之处。他讨论到了现象学, 这一点十分关键, 但奇怪的是, 这种讨论依然是含糊不清的, 尽管它对于其理论观点的方法论根基无疑非常重要。他将处在经验历史背景中的社会行动者取向的发展置于现象学结构之中, 但却未能细究这一假定的各项条件与推论。

有鉴于此, 《社会行动的结构》可谓天才之作, 但论证上亦有所欠缺, 尚待进一步阐明。帕森斯此后一生会在适当时候不断回到《社会行动的结构》, 充实论点, 或添补布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欧洲论家”, 或是乔治·赫伯特·米德、W.I. 托马斯等美国思想家, 以落实《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开创性的思路。他在自己思想历程的所有四个阶段都回到双翼的社会理论, 但再也不曾用该书中那样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假设, 那时他是借用其他理论家的著作来构筑自己的思想。此后, 他继续自己的双翼分析, 更清晰地聚焦于自己周遭的世界, 并始终意图在当时的时势下捍卫民主。 <53>

附论 何谓文化悲观主义?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开篇几段, 帕森斯就借布林顿之口明确提出, 在自己所处的时代, 边沁式的政治哲学已经过去, 甚至其后续, 即达尔文主义, 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他眼里也早已“死了”。但悲观主义, 哀叹西方文明面临的危险, 伴之以诉求政治冒险主义, 却并不过时, 即使在他哈佛的身边环境里也是如此。索罗金的四卷本《社会与文化动力学》, 前三卷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同期撰述(从1932—1933年间到1937年)^[222], 是一部宣扬文化悲观主义的巨著, 试图通过经验分析证明, 某种威权主义的克里斯玛政制最终将很有可能兴起, 甚至值得想望。

[222] Pitirim Sorokin,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s. I-III (New York: American Books, 1937); Vol. IV, 1941.

索罗金的前驱,无疑就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大获成功的《西方的没落》。^[223]它确立了一种文化批判的范例,斥责了现代科学与艺术,也配合了德国知识分子拒弃魏玛文化的目的。斯宾格勒描绘了一幅西方文化通史,并认为现代世界业已衰亡。他哀叹道,不具生产性的相对主义清除了“浮士德式的”潜能,继而在现代性的余波之中,导致“灵魂意象”和“生命情感”等据说不可或缺的力量趋于枯萎。^[224]斯宾格勒强调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核物理学,导致牛顿式世界观的瓦解,使得“建筑和各类艺术中的……伟大观念风格”业已显而易见的崩溃雪上加霜。^[225]他强调,源于古希腊的古老世界观支柱倾圮,清楚地表明,西方文明的“缓慢衰落”似乎已经无法挽回。^[226]至于前景,毫无疑问,就是普遍灾难。在规范秩序崩溃后的余波中,一片混沌,相对主义文化和科学兴起,导致了这样的普遍灾难。最终将会出现一个缺乏生命、没有灵魂的世界,受“去感觉化的”(de-sensualized)^[227]系统管理手段的主宰,以将要大行其道的无法驾驭的数学为基础。它那贫瘠而机械的根基所发挥的功能,就是将世界勾勒成一个格栅状的“形态学关系的巨大系统”。

早在1933年春,索罗金就在《社会学》(*Sociologus*)上以德文发表了一篇文章,预告了自己的巨著^[228],并使世人知道,自己非常重视斯宾格勒。他讨论了一个问题:在美术这个领域里,客观的衡量标准是否可以评价文化的内在创造性,仿佛受他所称的一个时代或一种风格的活力所激发。不过,他的《社会与文化动力学》一书的要旨却关系着另一个问题:西方的没落是否意味着文化的终结。索罗金的历史哲学自成一体,细致精微,甚至有量化分析,涵括了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以来的高等文化的整个历程。索罗金宣称,自己的宗旨在于通过这样的分析,“考察整合的文化的性质与变迁,考察其动力机制:它的类型,过程,趋势,波动,

[223] 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Berlin/Leipzig: Wilhelm Braunnüller, 1918); 英译为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Knopf, 1922)。

[224] 这些是《西方的没落》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标题。

[225]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第420页。

[226] 同上引,第425页。

[227] 同上引,第427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228] Pitirim Sorokin, “Studien zur Soziologie der Kunst I”, *Sociologus*, vol. 9, 1933, 第45—65页。

节律,速度”^[229]。不过,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这种文化之子……,顺从接受其衰落的可能性”^[230],但他希望阐明,尽管存在深切的“当代危机……在一段艰难的过渡期之后,隐然闪现的不是死亡的深渊,而是生命的巅峰”,是西方文化更生后的上升时代。换言之,他要讨论的是西方文明的前景,旨在证明,文化活力之衰微在当前固然势不可挡,但最终将迎来克里斯玛英雄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巅峰。

他的方法比较简单。他区分了三种基本的文化类型:观念型(Ideational)、理想型(Idealistic)与感觉型(Sensate)。它们的认识论基础据说使得这些类型成为真实,表明历史角度和思想角度上的充分性,他是通过单纯引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来确立这些基础的。^[231]他对于观念文化、理想文化和感觉文化的界定似乎颇有道理,因为他区分了一些特定的心态,而在整个历史上,这些心态据说又构筑了艺术、政治、社会生活等各式现象的结构。索罗金不仅将各个时代概括为三种类型之一(或混合形式)的流溢,而且明确提出,各个类型也常常发生波动。他尤其希望证明,即使一种文化的观念活力、感觉活力等都呈现衰败,而这类衰败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是显而易见的趋势,这种文化也不一定就会“死亡”。与此同时,他主张,一个此前已然衰落的文化也能够孕育出新的生命,并警示世人,必得有彻底的破坏,才能有接续的重生。这个命题维系着他自己的时代,以及他避难的国度。为了证明这一命题,他例举了将中世纪(观念型)转换为近代(Modern Age)的危机,在他看来,近代又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后是感觉型)。至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按照他的判断,处于一场划时代的危机,以革命、战争和公民自由权利的显著丧失为特征,与此相关联的则是极权主义政制的广泛兴起。

他点出了纳粹主义,作为文化危机的一个标本。他明确指出,与其他类似的政制一样,它是“一种内在强迫的、机械的奴役制:没有灵魂,没有欢乐,没有同情,真正的利他、真正的亲情、真正的团结基本上付之阙如……破坏起来大

[229] Sorokin,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 I, 第 x 页。

[230] 同上引,第 xiii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231] 同上引,第 58 页。

获成功，但对于亲情关系和真正的集体主义社会，建设上却乏善可陈。”^[232]话又说回来，虽然索罗金对纳粹的反人道主义抱持敌意，但他也提醒读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就相信社会改良，更意味着他就支持罗斯福总统下的新政。相反，他认为罗斯福治下的美国与苏联或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并无多大差异，明言“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团国家，纳粹帝国，罗斯福的政策，还有其他独裁国家的政策，都只是同一种趋势的具体表现：趋向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远离自由主义。”^[233]这里说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20世纪30年代可能会称之为的进步主义。^[234]相反，索罗金感叹自由主义已经显现衰落趋势，他的自由主义观念仿效了斯宾塞所相信的自我调控的个体主义，索罗金称之为“特殊主义”（singularism，与普遍主义相对立）。^[235]

索罗金固然看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危机意味着强者对于弱者多少可谓没有控制地使用权力，但他却并不抱憾其直接效应，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他看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每一个人、派别、群体和阶级都千方百计获取他们的感觉所欲求的一切”^[236]，是新时代到来的一个必然阶段。他在自己的鸿篇巨著的最后，传递了一种先知预言般的希望精神。他认为，危机的动力从巴比伦时代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结束，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四阶段模式，这四个阶段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危机（crisis）—净化（catharsis）—克里斯玛（charisma）—更生（resurrection）”的程式。^[237]索罗金就此得出结论：
<56> 在自己有生之年，不仅极权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制也不是不可逆转的衰落趋势的最后阶段：“在我们面前，萦绕着过渡期的末日军（dies irae），此去荆棘满路。然而，在路的那一方，隐约闪现着新的观念文化或理想文化的壮伟之

^[232] 同上引，第三卷，第338页。

^[233] 同上引，第二卷，第575页。

^[234] 30年代会被称为进步主义的立场，似乎最接近帕森斯自己此时的政治态度。参看上文。

^[235] 第二卷，第261—304页。还应当指出，施潘在其《社会学说》中提出的，就是一个包含了普遍主义思想、清除个体主义的社会（Spann, *Gesellschaftslehre*, 1923年第二版；1930年第三版）。参看上文。

^[236] 第三卷，第177页。

^[237] 第四卷（1941），第778页。

巅，巍峨耸立，犹如感觉文化在自己创意横溢的天才时期的巅峰体现。”^[238]

对于索罗金这本书，帕森斯的意见无从知晓。不过，帕森斯的同事，也是30年代早期哈佛帕累托小组(Pareto Circle)的伙伴布林顿，却对此书的学术流派和文化悲观主义颇有微词。哈佛学院图书馆保存了一份书评的选印本。

布林顿对于索罗金的反应措辞严厉。^[239]他认为索罗金的思路属于“社会占星术”(Socio-Astrology)，精巧地指出其中的票友漫谈而非严谨科学，对此嘲讽有加：“我们对于人类大众的心态其实并不了如指掌，但索罗金先生却能够驾轻就熟地把它们分门别类。”他就以这样的语句开头，列举索罗金的类型划分，并补充道，还有一些混合类型，“索罗金先生似乎还搞出混合型的混合型”^[240]。但布林顿主要是想揭露索罗金的文化悲观主义，甚至颇为不满地拿它与斯宾格勒的类似论调相比拟^[241]，把这两位论家连同其他类似的世界观都称为“即刻末日的预言者”^[242]。他指责道：“当然，索罗金先生并没有预言我们会彻底灭绝，而只是预言了另一个短暂的黑暗时代，因为我们的儿辈或是孙辈将会享受到曙光。”^[243]在布林顿看来，索罗金完全蔑视普通人，而社会中的现实生活的动力却始终维系在这些普通人身上。布林顿认为，社会学要想具备一点科学性，就必须小心保持分析概念和经验现实之间的微妙界限。要想领会现代社会或任何类型的社会，社会学都必须重视所有公民生活其间的社会世界的经验特性。

布林顿对于索罗金的批评或许反映了帕森斯自己对于这种伪科学的厌恶，这种伪科学打着观念论的名义，实则倡导经验实证论。尽管如此，当布林顿从索罗金等人推及社会学本身时，也让帕森斯大为不满。布林顿在1939年一篇题为“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的书评中断言：“社会学家们总体上态度谨慎，偶尔做

^[238] 同上引，第 779 页。

^[239] Crane Brinton, "Socio-Astrology", *Southern Review*, vol. 3, 1937, 第 243—266 页；重印于 Harvard University College, 1937。

^[240] 同上引，第 247 页。

^[241] 同上引，第 257 页。

^[242] 同上引，第 261 页。

^[243] 同上引，第 262 页。

预言家言,也是他们始终低人一等的情结的自然弥补。”^[244]随后,帕森斯回函,“尤其”反对“(文章中)这种高人一等的姿态,可以说是盛气凌人的腔调”^[245]。布林顿稍后承认,他对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表面所为意存贬损,但并不想把帕森斯也包括进来,他甚至都没有读过《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尽管帕森斯此前已经呈送于他)。他加了一句有些难解的话,似乎是想吹捧帕森斯此书的质量,将他与其他社会学家间接做了比较,也暗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您会看得上的社会学家人数确实非常少——当然我也同意,这个数字正在增长——或许即将到达哈维之后的生理学家或者拉瓦锡之后的化学家的发展程度。”^[246]

[244] Brinton, “What’s the Matter With Sociology?”,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May 6, 1939, 第3版; 评论的是罗伯特·林德的《知识何为?》(Robert Lynd, *Knowledge for What?*, 1939)。

[245] 帕森斯 1939 年 7 月 11 日致布林顿函,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8.2, box 2。

[246] 布林顿 1939 年 7 月 19 日致帕森斯函,第 2 页;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8.2, box 2。

帕森斯探讨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学：

<58>

1938—1945 年

第一节 引 论

对帕森斯的著述体系的二手重构认为，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与1951年问世的《社会系统》这两部经典的时期，分别代表了“早期”与“中期”。《社会行动的结构》之后的20年理论努力，据说最后导向了以多维系统的分析路向为特征的“晚期”。^[1]继《社会行动的结构》而来的“中期”，似乎首要的内容就是作为系统化的抽象理论之典型的《社会系统》。

这样来概括帕森斯的著述体系，实际上是把美国历史上两段明显不同的时期混为一段“中期”，而这两段时期都深深影响了他的作品。一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直至1945年；另一段是战后时期，包括初起的冷战，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高峰。

本章中我将提出，二战是帕森斯著述的一个特别阶段的背景。我认为，他提出了一套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学，与其有关以美国民主制度为代表的民主体制分析形成对照。

^[1] Jeffrey Alexander,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尤其参看第46—72页; Peter Hamilton, *Talcott Parsons* (London: Tavistock, 1983), 第85—114页。

帕森斯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学，乃是源于其有关社会行动（系统）的结构的双翼理论。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两类社会系统，间接对比了当时的两个社会，即美国和纳粹德国。本章将进一步证明，他始终惦记着当前的社会。我的假设是：从1938年11月德国开始对犹太人实施集体迫害，到国家社会主义失败，二战终结，他的社会学完全关注着所处世界的现实时事。他致力于理解诸多社会问题背后的机制，比如警察国家的恐怖和大众侵犯情绪，充分重视当时屡屡提及的话题，即如何处置纳粹政权之后的德国，可谓正当其时。

<59> 本章重点探讨帕森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这套学说非常借重《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提出的失范与整合之区分。他将明显属于经验事实的内容融入自己有关社会双翼结构的理论，水乳交融，令人惊叹。实际上，他通过大量的文章、演说和备忘录等等，细致探究了纳粹社会的性质，即便是历史学家也不可小觑。他从中看到了一种与美国（英美）民主体制截然相对的类型，并以丰富的事实论据加以证明。

对于他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分析理解，我将分五个片段来展开叙述。首先我将讨论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形成年月，当时他开始养成对于自己研究的两大焦点的兴趣，一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ism），一是经济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主要关注的还是1938—1945年间的发展。

我认为，帕森斯警觉到国家社会主义对于西方文明所造成的威胁，因而全力投入对这种政制的性质的深入研究。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介入政治活动，公开宣扬自己的反纳粹信念。1938年11月9日，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实施集体迫害，面临这一臭名昭著的事件，他第一次公开捍卫民主。我认为，从1938年到1945年，他的积极行动立场与其有关纳粹类型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始终是携手并行的。

在1969年出版的第四部文集《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帕森斯重刊了自己分析国家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德国的四篇文章。他在文集中如此回忆自己当时如何在行动立场和分析工作这两种宗旨之间分配时间和精力：

在所有关注当时西方世界社会政治进程的观察家看来，纳粹运动不仅暴露出思想上的问题，而且有深层的道德上的问题。……显然，对于令

人如此困扰的现象，至少有两种反应方式：一是就它们努力“做”些什么，一是努力理解它们。作为一个学术人，身处新的世界大战千钧一发并最终爆发的危险情势，我成为一个比较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但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特别是考虑到行动机会有限，我面临很强的“内在”压力，对我自己以及别人关于时势的理解都要努力有所贡献。^[2]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构建社会系统理论：个人治学史”一文中，他却很少提到自己积极关注二战的经历，而是重点回忆自己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后的理论兴趣，讨论“专精职业与理性问题的两个特性”[本书多处探讨以医生、律师、教授等为代表的“profession”，为了与“occupation”、“major”等相区别，中译采取了比较啰嗦的“专精职业”这一表达，以突显“learned”的特点，但对于“professionalism”、“professionals”等词语的中译，仍采取比较简略的“专业精神”、“专业主义”、“专业人员”等。——译者注]。当他将医疗实践的问题视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其实触及了更广泛的一些话题。他回忆道：

从经验的角度上几乎显而易见的是，所谓“需高深学识之专精职业”（learned professions）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而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一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阐述中，这些专精职业根本不曾凸显。实际上，现在习惯所称的“私有非营利”组织部门和根据职业来组织的活动，与亲族关系之类截然不同，但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也不曾凸显。回头看来，可以说两种意识形态立场都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对于自利的理性追求”：资本主义的版本乃是基于功利主义思想，指的是个体要满足自己需求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的版本指的是（沿循霍布斯和奥斯汀的思路）最大限度满足公共利益的集体利益。^[3]

<60>

这两篇回忆都出现在1969年，谈的都是《社会行动的结构》之后的那段

[2] Parsons, “Part II.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Author’s Introduction”,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第60—61页。

[3] Parsons,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初版于1969), 收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1977), 第33页。

时期。但帕森斯回想的是自己思想历程的不同方面。应当合而观之，看看他在1969年的这两次回忆场合是如何回想所发生的事情的。我既注重勾勒帕森斯的社会学思想的发展，也关注他作为美国公民，是如何积极投身反抗纳粹威胁的事业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文献，探讨帕森斯是如何分析国家社会主义的。遗憾的是，作为这类论述的始作俑者，雷纳·鲍姆和弗兰克·J. 莱赫纳在重构帕森斯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解时，未能区分哪些是帕森斯从其同时代人如拉斯威尔或玛格丽特·米德那里借鉴的，哪些是他在写自己的各类分析时扩充了或大大超越了他人的假设。^[4]另一项此类研究是威廉·巴克斯顿从据说占据主导地位的积极问政立场的角度来描述帕森斯毕生的著述，这种立场正合于一名美国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倡导者，巴克斯顿因此指称帕森斯毕生都“奉行开明加尔文派的救赎信念”^[5]。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未能恰当认定帕森斯在1938—1945年的真正关注。它们显然都未能充分认识到，在帕森斯一生的这一时期，作为公民，他积极投身捍卫民主的行动，而作为社会学家，他也十分关注分析性理论。后一方面基本上属于从历史—政治的角度研究当时社会的理论，也是我在本章关注的焦点。

照我的理解，在1938—1945年期间，帕森斯在理论关怀和政治介入之间来回穿梭。他观察着正面临纳粹帝国主义威胁的美国，这无可厚非，但他也考虑着自己曾在20年代生活过一年的德国，那时他开始了解德国人（他可以帮助其中一些人逃离纳粹魔爪），也开始了解他们的社会。

我认为，他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只是他更大的研究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对有关民主体制的社会学抱有理论兴趣，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社会和自己学生时代曾经逗留的德国，也抱有一份个人的关切。有鉴于此，他希望初露端倪的社会系统理论能够有助于理解当前事件，推进自己的首部重要作品《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提出的分析框架。他依然满心关注经验社会，认为它既孕育了社会

[4] Rainer Baum and Frank J. Lechner, "National Socialism: Toward an Action-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51, 1981, 第281—305页。

[5] William Buxton,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Capitalist Nation Stat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尤其参看第97—116页，扉页有引(无页码)。

行动结构的理论，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种种证据。在1938—1945年期间，他把自己在理论分析上的才华都用于国家社会主义所导致的历史危机，以求有助于从比自己在30年代更为具体的角度上去理解社会行动的结构。

从1938年到1945年，有关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帕森斯发表了九篇文章，写了三份生前未公开发表的文稿。另外他还留下了一大堆面向各种场合和团体的电台广播稿、讲课稿、演讲稿、备忘录，都保存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本章将使用这些材料，希望以时间顺序整理他那些年的研究工作。我们将区分出五个阶段，为他那些年的思想生平提供一份粗略的指南。而组织这些阶段的主要焦点就是二战，我将其思想历程划分为一段战前时期，然后是对应于美国战时史的三个阶段，即珍珠港事件前的支持干预立场，1942年也就是远东和欧洲战区深陷危机的一年对于宣传和权力问题的关注，欧战胜利日前夕至关重要的轴心国家特别是德国的战后民主化问题，最后一段题为“超越胜利”，我希望突出帕森斯1945年3月到10月作为外国经济管理署敌国处（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Enemy Branch）的顾问，致力于拟制德国的再教育政策计划。

第二节 战前时期

1938年11月23日，帕森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明确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题为“纳粹毁灭学问、挑战宗教”^[6]。文章刊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报纸《拉德克利夫新闻》（*Radcliffe News*），该校是与哈佛大学挂钩的一所女生本科学院。两周前的11月9日，纳粹借一位波兰犹太青年刺杀一名德国外交官之机大做文章，将对于德奥境内的犹太人的迫害迅速升级，其残酷性史无前例。^[7]

[6] Parsons, "Nazis Destroy Learning, Challenge Religion", 重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81—83页。

[7] 关于11月9日开始大规模迫害的深远影响，参看 Gerald Schwab, *The Day the Holocaust Began: The Odyssey of Hershel Grynspan* (New York: Praeger, 1990); *Night of Pogroms: "Kristallnacht" November 9-10, 1938* (Washington, D.C.: U.S. Holocaust Memorial Council, 1988); 亦参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Quadrangle, 1961), 尤其参看第22—30页。

帕森斯在短文中指出，在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常常被误读为威权主义政制的某种变种。他注意到，美国人指望纳粹主义会很快受到正常的政治过程的遏制。但他必须警示世人，纳粹主义代表了一种革命性的反民主运动，旨在破坏现代世界，而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假思索地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他抨击国家社会主义是“对于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被看护的整个西方文明的许多制度根基最可怕的威胁”^[8]。为了具体证明这一说法，他重点讨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两点特别有害的企图，一是以党派学术(partisan science)取代自由学问(liberal learning)，一是破坏16世纪早期宗教改革以来盛行的宗教普遍主义。

在学术领域，也就是在大学里教授和贯彻的自由学问，他看到“国家社会主义尤其敌视学术精神，敌视伟大的学术传统，更广泛地说，敌视这些东西作为必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上和制度上的整个大传统。”^[9]纳粹“正在毁灭德国极其出色的伟大学术机构……在哲学、历史、社会领域几乎是摧毁殆尽。”^[10]

至于纳粹对宗教的挑战，帕森斯谴责了排斥性政策：犹太人天生就被剥夺了担任新教教会牧师的资格。^[11]这就意味着，在纳粹的统治下，救赎的普遍性原则就此被放弃，而这一原则从圣保罗的使徒书信以来就一直激励着基督徒的信念：“就我所知，无论是宗教权威还是世俗权威，此前没有任何欧洲权威当局曾经在原则上仅凭出生就排除一个群体获得宗教上的好处的资格。无论他们曾经多么残酷地迫害过犹太人，至少也是因为犹太人奉行的是基督徒角度上的异端。”^[12]帕森斯的结论是，国家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必须倾全力与之对抗。”^[13]这在他看来，也是可以用来描述自己思想发展的“隐秘规划”。

他倡导自由学问和普遍主义宗教，正是以这一立场为支撑，他第一次公开抨击纳粹对于西方文明的威胁，这种立场是如何形成的？他又是如何养成了这

[8] “Nazis Destroy Learning etc.”，第81页。

[9] 同上引，第83页。

[10] 同上引，第82页。

[11] 参看 Alan Davies, “Racism and 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y: A Prelude to the Holocaus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50, 1980, 第20—34页。

[12] “Nazis Destroy Learning”，第82页。

[13] 同上引，第83页。

样一种世界观，让这两个焦点成为民主结构的集中体现，而如果否弃它们，就会对文明本身的实质精髓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阿默斯特学院的本科岁月，到30年代末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作为副教授的教职生涯，在帕森斯的眼中，这两项主题始终不仅是社会学的核心要义，也是他理解当代社会的历史过程的关键所在。对他来说，每一项主题都意味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论题。自由学问意味着学术与专精职业的理念，而普遍主义宗教则倡导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观念。

一、自由学问、学术与专精职业

<63>

帕森斯对于自由学问如此关注，源于其1920—1924年间本科教育时代形成的一种坚定信念。亚历山大·梅克勒约翰从1912年到1924年担任阿默斯特学院院长。在其掌校期间，学院对于本科学院教育的内涵与宗旨锐意改革，一时名传。梅克勒约翰确立的博文学院(liberal college)教育主旨，乃在于捍卫自由探索、追求卓越知识、服务国家民族(nation)。梅克勒约翰的教育哲学主张，博文学院旨在超越“修养”(Bildung)这一古典哲学的培养计划。^[14]梅克勒约翰清楚，“修养”固然将人从过分局限于日常生活之所必需中解放出来，但如果作为主导性的学术追求，也往往会使学生与其所处的当前社会两相疏离。阿默斯特的理念是要教育公民负责任地运用其知识，不仅增进整个共同体的福祉，也促进每个个体的利益。学校鼓励学生超越专门化学科的狭窄界限，把握所处世界的动力。梅克勒约翰明言，大一新生要“直面国民同胞所面临的问题，开始自己思考那些问题，习前人之所鉴，思前人之所思，总之，做好准备，堪当重任，以观念、原则和宗旨，指导我们的共同生活。”^[15]

[14]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威廉·冯·洪堡的古典观念激发了20世纪早期美国大学的改革。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出使德国，最终提交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评估了全美各高等院校及其他高等学问研究机构的质量。至少在此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以“修养”理念为样板。不过，帕森斯日后也开始明白，有一个关键因素使美国的大学不同于并优越于传统的德国大学。后者培养的是教授们的“独立自主”精神，而美国的体制则是要院系/教授会(faculty)在教授群体中间培育共同体般的关系。亦参下文第四章。

[15] Alexander Meiklejohn, *The Liberal College* (Boston: Marshall Jones, 1920), 第48页。

学生们也要积极投身改革。他们要运用所学知识与常识智慧，努力工作，造福社会，迎接“下一个百年”——梅克勒约翰在1921年6月阿默斯特建院百年纪念典礼上的演讲即以此为题。^[16]这样一种教育使哲学通向实践学识，而不仅仅是博学深思。梅克勒约翰写道：“谁要想切实有效地领会哲学，就不能只是死读书，而必须找到在他看来实实在在的问题，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来阅读与思考。”^[17]

改革规划得到了学生们明确而热情的支持。当时有一本题为《不自知的先知》的书，记叙了梅克勒约翰的改革所创造的一派生机气象。^[18]此书描绘了一介普通学生是如何被激发出天降大任的精神，刻画出像帕森斯在其本科岁月显然成为的那类学生：“经过阿默斯特的教育方法的四年熏陶，他的教育已走上正轨，并将持续终生。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都将如此。”^[19]

学院董事会后来与梅克勒约翰爆发冲突，最终导致后者辞职。帕森斯作为梅克勒约翰的教育理念的热忱信徒，在冲突中立场坚定明确。作为学生一方的代言人，他于1923年10月在《新学生》(*The New Student*)上发表了平生第一份公开刊行的作品。这篇与人合署的文章为梅克勒约翰的改革规划鼓与呼，强调指出，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自己心中那些同路人，“那些教育理念都已经变得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倾力探讨。”^[20]因此，尚在本科时代的帕森斯就已经深切体认，自由学问对于民主类型的社会非常重要。

离开阿默斯特之后，帕森斯负笈海外，然后又入职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他的第一项研究课题是1930年前后开始参与的，属于医学经济学。他所属的课题最后产生了35份研究报告，由医疗费用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Cost of Medical

[16] Meiklejohn, "The Next Hundred Years", 刊于 *Freedom and the College* (New York / London: Century, 1923), 第 101—144 页。

[17] Meiklejohn, *Philosophy*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6), 第 47—48 页。

[18] Lucien Price, *Prophets Unawares: The Romance of an Idea* (New York: Century, 1924)。

[19] 同上引, 第 47 页。

[20] Talcott Parsons 与 Addison T. Cutler, "A Word from Amherst Students", *The New Student* (October 20, 1923), 第 7 版 (转引自 *Talcott Parsons Early Essays*, 第 292 页)。有关梅克勒约翰执掌阿默斯特及其被迫辞职的前前后后, 参看卡米克在《帕森斯早期文选》中的编者长序, 第 xii—xiii 页。

Care) 主持, 主席和主要倡导者是拉伊·莱曼·威尔伯(故而又称威尔伯委员会), 胡佛政府第二届内阁的内政部长, 而此时新政已是呼之欲出。^[21] 他奉行专业主义, 呼吁实施健康保险(当时被称为“疾病”保险)等改革。

在1937年的一篇书评里, 帕森斯以专精职业为核心要旨, 重点考察了教育与专精职业, 并间接讨论了纳粹是如何对这两个领域都横加干预的。^[22] 帕森斯评论的是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的书[原书此处误将“Hutchins”写作“Hutchin”。——译者注], 强调大学作为不受束缚的学术探究的机构, 具有重要意义, 珍存了古典文明所孕育的文化遗产, 即欧洲文化。帕森斯写道: “它们都很关注这个意义上的学问, 既包括专门职业化的 (professionally specialized) 学问, 也包括共同的自由学问, 这样的共同关注构成了对于各门专精职业来说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项统合原则, 也奠定了专精职业与大学之间的关联。这是因为, 大学[原文此处特意使用了大写的“Universities”。——译者注]秉承了欧洲的伟大传统, 是卓越的学问托管者, 是负责其继续、传播和提升的机构。”^[23]

<65>

实际上, 帕森斯的年轻同事和合作者爱德华·Y. 哈特索恩, 就以纳粹对于

[21] 帕森斯在60年代早期的一次生平自述中回忆道, 威尔伯委员会1932年提交报告后, 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否定了委员会提出的国民健康保险方案, 指其是在计划建立“医疗苏维埃”。根据帕森斯的回忆, 这不仅是自己作为一名医学社会学家的职业生涯的开始, 也是自己对于专精职业的社会学研究[这里原文是“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不是“professional sociology”。——译者注]的起点。参看Parsons,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Bearing on the Field of Medical Sociology”, 刊于*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4), 尤其参看第325—326页; 亦参*Medical Car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Cost of Medical C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2)。威尔伯医生是1916—1943年间的斯坦福大学校长, 1928—1932年主掌医疗费用委员会。帕森斯参加了威尔伯委员会主持的其中一个研究项目, 很可能是得到了自己本科时代的教授沃尔顿·汉密尔顿的推荐。

[22] Parsons, “Remarks on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47, 1937, 第365—369页; 亦参“The Profess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Forces*, vol. 17, 1939, 第457—467页。

[23] “Remarks on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s”, 第366页。

自由学问的摧残为主题,撰写了一本书。《德国大学与国家社会主义》一书^[24]记录了如何引入所谓元首制(Führerprinzip),来取代院系的学术自治。哈特索恩报告说,大多数系科丧失了三分之一甚至超过一半的教授和年轻教员,损失最惨重的是社会科学,因为遭到骚扰或驱逐而导致的流亡移民最多。报告就此见证了对于德国大学中自由学术精神的威胁。

哈特索恩写道:“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在双重意义上可谓以极权主义为旨归。首先,所有的政治权力都由一个代理人团体所垄断;其次,该团体旨在将其影响扩展到所统治的社会群体方方面面的活动。”^[25]哈特索恩指出,在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大学,这意味着有组织的国社党学生对自由派和左翼的教授肆意诽谤,大加威胁。^[26]而在1933年1月之后,更是常常意味着丢掉生计(公务员这种铁饭碗也不能幸免),不仅是犹太人,包括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那些不愿向纳粹献媚的人,都遭到了排斥。^[27]

哈特索恩的书描述了“行元首礼”如何在课堂上成为强制义务,并很快使得那些希望远离纳粹规矩的人觉得生活无法忍受。他写道,犹太人提出的那些学说被清除出德国允许通行的学术著作范典。他还描述了德国大学里传统上半自治状态的行政,以及教研人员的独立性,是如何几乎完全陷入代表纳粹学说的残酷无情的国家控制,沦为元首制的等级组织。

^[24] Edward Y. Hartshorne, Jr.,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7)。他综合利用了设在伦敦的学术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又名科学知识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提供的材料,还有以柏林洪堡大学(Friedrich-Wilhelm-Universität)为主的多种渠道搜集的德国统计数据,再加上大量鲜活的传闻轶事和生活史素材。从1935年到1936年,他周游德国,搜集第一手证据来说明德国大学深陷危境。

^[25] 同上引,第13页。

^[26] 有关学生恐怖,参看 Michael Stephen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The Students'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3)。至于教授在毁灭自由学问方面扮演了何等角色,参看 Leon Poliakov 与 Joseph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Berlin: Arani, 1957)。而那些确立极权主义社会的“革命变迁”,参看 David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6)。

^[27] 帕森斯从自己在海德堡的老同学的来信中震惊地发现,许多被迫逃离德国的流亡者正遭受着个人的灾难。

在1937年的冬春之际，哈特索恩和比尔施泰特、金斯利·戴维斯、乔治·德弗罗和罗伯特·默顿等人参加了一个研讨小组，在帕森斯干劲十足的引导下，深入钻研影响的类型，以及权威和宣传的问题。主要的个案就是纳粹德国，用来分析专家的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等一系列话题。^[28] <66>

从1937年1月12日到5月18日，研讨小组在亚当斯楼(Adams House)定期集会，戴维斯负责撰写(编辑整理)会谈纪要。小组深入探索一种框架，结合权威与宣传来分析影响。就行动者甲对行动者乙能够产生作用的关系类型而言，小组作出了以下区分：其中一种影响类型下面又包括三种亚型，即理性启蒙、经济交换和强制；与之相对的另一影响类型是权威，包括四种亚型：专家、职员、克里斯玛和权力。耐人寻味的是，帕森斯主持下的研讨小组尽管勾勒出了理性启蒙的意涵，但其前提条件在于，相应的知识需要给予全面的核查，以确保实现影响关系。“甲说明，乙学习，行动是所学习的东西引起的一种后果。”^[29]至于“专家”，有一点特征在社会学角度上极具意义，就是无利益关涉。而这种无利益关涉的基础，就是以该行动者的对方为核心的服务的伦理要求，对方则是专家的资格能力的目标和受益方。“既然甲将在乙不具备资格能力的领域出于乙的利益而行事，那么就必然有团结(即对于目的的共同认定)，至少甲不会利用乙的欠缺。这一点说明了专精职业无利益关涉的伦理要求。”^[30]三次集会之后，德弗罗概括了迄今为止的成果，如此描述影响行为的类型划分(根据戴维斯的记录)：“这种分类……区分了通过启蒙和自由交换所发挥的影响和包含权威的影响。后一类影响中又包含了专家的影响、专职人员的影响和克里斯玛领袖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影响类型又都有别于强制。”^[31]

在最后两次集会上，小组讨论了宣传这个话题：“哈特索恩首先提出，宣传是一种旨在将他人引向某个特定目的的影响类型。帕森斯补充道，这是通过影响他们的态度或目的而不是情境来实现的。……宣传不单单是信息性的；它要

[28] “Parsons’ Sociological Group, Reports on Meetings.”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45.4, box 1.

[29] 同上引, 第3页。

[30] 同上引, 第5页。

[31] 同上引, 第9页。

借助操纵情感来实现说服。”^[32]当然，这种影响远不是什么科学，它很切合当时德国的现实图景：

哈特索恩指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实，说的是当前德国出于政治目的而念诵如仪的一些套话。他用这个来表明，一旦宣传被彻底灌输，那么同样观念的来回传递，或者同样措辞的反复述说，往往就成了乏味的负担，
<67> 沦为单调的仪式。仪式本身得到普遍赞同，往往伴随着安全感和稳定感。宣传往往发生社会变迁的阶段，灌输一种态度。^[33]

到了1938年11月，帕森斯在《拉德克利夫新闻》上发表短文，明确指出了源自德国的两大危险，作为一名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而广为人知。此时的他脑子里想的完全可以肯定就是这些话题。

在帕森斯看来，学术自由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的民主使命的支柱。他在1939年留下了一份未定稿，铅笔暂拟的标题为“学术自由”，详细讨论了学术职业的民主寄托（anchorage）。^[34]

贯穿其全文的问题在于：“学术人”为何在享有权威的同时“不能‘为所欲为’”？对此他给出了两点回答。其一，在于专精职业的传统是自由开明、精研多识，以整个西方文明史为始基，捍卫着理性和人类尊严的价值观。之所以要特别限制个人自我纵容，防止肆意操弄，并制度化为无利益关涉或功能专门化等规范取向，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历史。专业人员的权威尽管由于仅仅涵盖特定领域的资格能力而有所局限，但是，因为这种权威所依赖的知识遵循的不是别的，就是以科学的方式确立的标准，因此又是无所限制的。有鉴于此，学术知识意味着与真正的思想自由相维系的责任。他明确指出，所谓“自由职业”的自由，只能赋予那些能够抵制偏见或教条的人。而如果“以刻板态度或先人之见看问题，或者受情绪主导，情感支配，使这种理性过程注定不能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就不能赋予他这种自由。^[35]

[32] 同上引，第20页。

[33] 同上引，第22页。

[34] “Academic Freedom (1939)”，参看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第85—99页。

[35] 同上引，第89页。

其二，他拒绝接受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学术的替代选择，后者对科学家们得出怎样的结论发号施令。在德国，学术自由已经被受党派主导的反智主义取而代之，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自然科学，尤其是“在军事技术之类领域已经产生重要实践成果的某些科学分支”，有充分的运作空间^[36]，而社会科学则遭到排斥。不过，科学家们在技术上或实验室中的成就，只是被纳粹当局借用来赋予所谓“纳粹革命”或“新德国”以道德权威，那些大肆聒噪支持纳粹政权的科学家，通过公开声明大做文章。这无疑破坏了专业权威历史上曾经拥有的任何存在理由。支撑探索自由 (freedom) 的那种自由 (liberal) 学问，却被穷兵黩武的极权政府所绑架，孰不可忍。他以医疗为例，作为自己所批判的现象的典型体现。他将德国大学的处境比作一群医生被某个把持无上权力的外行机构命令，对癌症之类的病案作出诊断，否则就得丢饭碗。他指出：“因此，对于真正属于某个学术领域的技术范围内的问题，只要是企图基于非学术理据来确定学术工作的结论或学术人员的意见，都是不可容忍的。”^[37]

二、普遍主义宗教与现代经济

帕森斯在 1938 年发出的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警示，第二个关注焦点就是宗教。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前的美国学术传统中，以社会科学角度观之的宗教，与经济的伦理一面关系密切。

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间的改良时代^[38]，公正、平等、和谐社群等宗教价值观念刺激着美国经济学 [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首次公布的 181 名会员中，就有 23 位是牧师]。理查德·T·埃利^[39]

^[36] 同上引，第 95 页。

^[37] 同上引，第 96 页。

^[38]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Vintage, 1956); 亦参 James T. Kloppenbu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9] 哈佛大学的怀德纳主图书馆 (Widener Library) 收藏有埃利写的 22 本著作的 36 个版本，其中主要有 *Recent American Socialism* (Baltimore: N. Murray Publication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885); *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889); *Monopolies and Trusts* (New York: Macmillan, 1900); *Property and Contracts in Their Relation to Distribution of Wealth*, 两卷本 (New York: Macmillan, 1914); *World War and Leadership in a Democracy* (New York: Macmillan, 1918)。

分析了经济生产如何从早期的游牧时代进化到现代工业时代，并基于道德理据来批判现代垄断资本主义。他问道：“是否存在真正的机会平等？”回答是：“贫富悬殊，阻碍了这样的平等。”^[40]而解决之道就在于社会改良，捍卫民主体制，同时克服经济不平等。^[41]

社会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联盟刺激了时人所称的社会福音运动。^[42]在这股思潮中，承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分析严肃认真地设想着如何推动机会平等。运动的宗旨既在于克服经济个体主义，又要拒弃垄断和托拉斯资本主义。它倡导废除劳动剥削，基于公益服务和自愿担当的观念，打造新的社会秩序，将科学用于趋近真理、不断进步。根据卡米克的引述，要用进化和改良来促成爱德华·帕森斯所谓的“完美人性”。^[43]

帕森斯在阿默斯特学院时的教授们，尤其是艾尔斯和汉密尔顿，也代表了经

[40] Ely, *Studies i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03, 1918年第11次印刷), 第81页。关于埃利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重要意义, 参看 Edward S. Mason, "The Harvar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from the Beginning to World War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7, 1982, 尤其参看第391—393页。

[41] 埃利的《工业社会的进化》第二编讨论了工业社会中社会改良问题的多种解决方案, 讨论如何既增进机会平等, 又保障个体自由权利。埃利在书的结论部分提出, 德国的教授们表率世人, 将教学中的学术取向与课堂外参与公共生活、倡导改良相结合(第487页)。此言极有可能指的是两位德国经济学家, 柏林洪堡大学的阿道夫·瓦格纳和古斯塔夫·冯·施莫勒。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倡导俾斯麦政府发起的福利政治, 既对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 也抵御大众生活中的贫困和卑下。

[42] 帕森斯的父亲爱德华·帕森斯就属于社会福音运动, 并发表有 *The Social Message of Jesus* (New York: National Board of YWCA, 1912)。

[43] 卡米克概括了老帕森斯的观点, 如实照引了1912年那本书问世之前写的两篇文章中的话: “对于‘工业体制’的种种道德后果, 自私自利, 经济个体主义, 劳动剥削, 趋向社会‘失序’, 要保持警惕; 而‘科学考察, 高等考证[“higher criticism”, 指用高深方法分析与研究圣经文本的作者、成书日期、写作形式及来源, 有别于低等考证(lower criticism), 后者主要分析和研究抄本的证据, 以判断经文的原稿用语。——译者注], 理性主义, 哲学思辨’, 甚至是‘基督教化的社会主义’, 对于这些方面可能产生的改进, 则要积极承纳。希望热诚秉持各色伦理观点的人们, 将能在‘真理与原则的共同宝库’周围联合一体, 与‘众生万物的激励者’教会携手奋力, 不断进步, 通向‘完美人性’。”转引自《帕森斯早期文选》编者序, 第x页; 亦参 Howard Brick, "The Reformist Dimension of Talcott Parsons' Early Social Theory"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1991, 油印稿), 第6—7页。

济学中倡导社会改良的传统。艾尔斯给帕森斯上的是哲学^[44]，但在梅克勒约翰辞职事件之后，他离开了阿默斯特学院，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艾尔斯1918年出版《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性质》，分别探讨了伦理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但又提出要把这“两门科学”综合起来：“无论是伦理学的问题，还是经济学的问题，都必须以社会的结构及其正在经历的变迁为核心……伦理问题是一般性的问题，与之相对可以称其他问题为‘专门性’的问题……经济学的问题是要将其有关工业社会的研究用于解决生活的问题。”^[45]

汉密尔顿的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他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学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就是要通过民主的渠道，致力于提高生活标准。汉密尔顿的《薪酬控制》（1923年）一书鼓励工人自行组织合作社，努力争取体面的薪酬。^[46]他编写的教材《当前经济问题》（1925年第三版）紧紧把握“当务之急”，告诫学生不要只是熟悉“一大堆只能从形式上说明产业运行的‘原则’”，而要“学会基于复杂的产业情境有理智地思考”^[47]。教材中的选文就是要“既在思想上也从情感上展现当代社会针对其问题所提出的种种彼此冲突的观点和论

<70>

[44] 在艾尔斯的课上，帕森斯提交了两篇习作，分别题为“行为主义的道德性质观”（“A Behavioristic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Morals”，1923年3月27日）和“论人类行为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The Theory of Human Behavior in its Individual and Social Aspects”，未注明日期，见帕森斯档案，HUG（FP）-42.8.2，box 2）。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就的简短回忆“克拉伦斯·艾尔斯的经济学与社会学”中提到，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激发了自己，使年轻的帕森斯最终成为一名职业社会学家，但文章却未能回顾当时艾尔斯的经济学所传递的道德主义讯息。这篇回忆刊于William Breit与William Patton Culbertson, Jr.合编的*Science and Ceremony: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C. E. Ayres*（Austin/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第175—180页。

[45] Clarence Ayres,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Econom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8），第54—57页。

[46] Walton Hamilton与Stacy May合著，*The Control of Wages*（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3）。扉页介绍汉密尔顿是“阿默斯特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默斯特工人补习班讲师”。而梅则是阿默斯特工人补习班讲师。该书的献词如下：“按照诗篇作者的说法，一本讨论薪酬的书，宛如青草初发，朝来生机勃勃，暮至渐枯渐萎[典出圣经《诗篇》90:5—6。——译者注]。但作者仍需在夜色之中继续照看他栽下的草，因为他并没有确切地看到；关于劳动者值多少工钱，有关的行文写的是多么不堪。”（第v页）。

[47] Walton Hamilton编著，*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A Series of Readings in the Contro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第三版（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第17页（1915年初版，1919年修订版）。第二版有可能就在帕森斯本科生时修读的书单中。

证（因为在我们日常世界的实际事务中，感情和逻辑同样重要）。”^[48]

在帕森斯求学期间，还有一位教员也在调和宗教与经济。理查德·托尼在尚未去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终身教职前，曾于1920年夏在阿默斯特学院教书，在梅克勒约翰去职前还来过一两次。帕森斯去伦敦经济学院短暂求学的后一年，托尼出版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书中大胆提出，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是在基督教价值观念的外衣下发展而来的，但却变成一种玩世不恭的、有欠公正的体制。托尼批评韦伯未能真正看到，真正具有宗教性的秩序，是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不相容的。^[49]

1924—1925年间，帕森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托尼学习，然后去往海德堡大学，在那里他开始熟悉韦伯分析宗教与经济关系的作品。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文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其中第一卷的一部分）令帕森斯大开眼界，也使韦伯的路线成为其毕生的主题。韦伯将宗教与经济融合到一种分析性的视角下，看西方文明中孕育出理性的方式与原因。帕森斯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并化为己见。他的博士论文探讨的就是这项主题^[50]，并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了英文（1930年出版英译本，而作序的正是托尼）。

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为激励社会行动的一种“精神”，开始成为帕森斯的核心关注。他在反驳H.M. 罗伯逊对韦伯的批评时，以权威性的口吻申说韦伯有关新教学说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真正命题。他为韦伯辩护道：“据他所言，

^[48] 同上引，第15页。

^[49] Richard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6); 此书已被译成其他几门语言。[如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译者注]

^[50] Parsons, “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Sombart and Web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6, 1928, 第641—654页; vol. 37, 1929, 第31—51页（重刊于 *Early Essays*, 第3—37页），似乎是博士论文的某种改写版。由于帕森斯论文的德文原稿中的两章被（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埃德加·萨林的助手给“搞丢了”，他就写了一份英语版本，作为第三章，被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接受为要求提交的作品。关于他在海德堡的岁月，参看帕森斯“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Daedalus*, vol. 99, 1970, 第828—830页; Camic, “Introduction”, 刊于 *Early Essays*, 第xix—xxii页；以及 Alexander, *Modern Reconstruction*, 第23页。帕森斯最终还是被授予哲学博士，这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的文献证据保存在海德堡大学档案馆，索档号 UAH H IV, 751/21。

禁欲新教主义对某些类型的行为置以特别有力的‘心理约制’，而这些约制的源泉正在于新教教义，首先是预定论的教义，将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导向某种特定的方向，也就是系统性地、理性地主宰外在环境，并赋予这些态度一种非常特别的伦理激情 (intensity)。”^[51]

他在“终极价值在社会学理论中的角色”一文中^[52]，进一步讨论了韦伯的社会学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行动理论的用益。作为对理性的替换，新出现的仪式主义 (ritualism) 意涵重大，他基于这一点重新分析了韦伯最初对于终极价值问题的解答。韦伯提出的两难困境就是信念伦理 (Gesinnungsethik) 与责任伦理 (Verantwortungsethik)。

用伦理学的追问来研究经济学的问题，这成为主要撰写于1934—1935年间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最高问题。^[53]此书通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发展起来的四套学说，分析了社会系统中的行动的结构是如何要么被视为功利性的，引发蕴含在强制中的失范，要么被理解为规范性的，意味着整个社会层面的整合。麦格劳-希尔出版社的广告如此宣称：“本书……不仅推进了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也推进了典型意义的‘公民学’。”^[54]

此书的高潮部分集中探讨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是如何说明经济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差异，介绍了“先知预言、理性化和传统化之间的相互关系”^[55]。根据他的分析，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要么在于权力的过程适当，要么在于权力的例行化，这种合法性甚至可能源于克里斯玛，它提供了能够引发行动的“世界的‘意义’”^[56]。他紧随韦伯的思路进一步阐述道，克里斯玛“是一种因其与‘超自然’

[51] Parsons, "H. M. Robertson on Max Weber and His Schoo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1935, 第 688—696 页, 转引自 *Early Essays*, 第 59 页。Hector Menteith Robertson, *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A Criticism of Max Weber and His School*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3)。

[52] "The Role of Ultimate Value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45, 1935, 第 282—316 页。

[53]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7), 1968 年第三版。亦参本书前文第一章。

[54] 有关广告, 参看帕森斯档案, HUG (FP)-42.8.2, box 2。亦见前文。

[55] *Structure*, 第 685 页。

[56] 同上引, 第 667 页。

范畴的关联而赋予某些人与物的品性”^[57]，“克里斯玛型领袖处置那些在其要求范围内抵抗他或忽视他的人，永远都会认为他们是未尽到义务。”^[58] 顺此思路，他在表面上属于凡俗秩序的克里斯玛型统治中找到了宗教结构的特征，尤其是神圣范畴的律令，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创新变革的状况中发现了传统化的保守僵化之处：“在韦伯看来，传统型权威有两点主要特征，一是被视为神圣不可交易的一套传统规范体系……一是统治者享有个人任意裁断的权威的一块领域，凭其整体上的克里斯玛个人品性而合法化。通过这一过程，克里斯玛从一种具有特别的革命性的力量，反而转变成一种特别的约制，为保守僵化的传统主义撑腰。”^[59]

此书别的不谈，还挑战了“经济人”(Economic Man) 的程式。补充后者的是社会行动的双翼结构的理论，它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经验世界的诸般倾向。彼得·德鲁克于 1939 年春天出版了《经济人之终结》一书^[60]，分析了几个欧洲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和德国，在经济理性显著受挫之后，民主体制趋于瓦解，极权主义逐渐兴起。只是他分析的笔调比帕森斯更直接。德鲁克提出，大众在工业革命中牺牲了原本所处的传统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一心指望以此换取平等和自由，但这样的希望随后也被粉碎。一次大战和大萧条时代的战争与失业，宛如恶魔横行于世，并不能拯救他们的困境。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人眼中像是一条解决之道。但德鲁克强调，它体现着一种非经济的社会，用军队的方式组织社会，以“战争经济”为基础，企图同时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即使是经济人的衰微也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政治整合。迫害犹太人就此成为德国大众新的支撑，继续创造着对型(antitype)，毁灭了后者，就相当于替代性的成功，维持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权，德鲁克如此写道。

关于此书，哈佛经济学家伊莱·金兹伯格 1939 年 5 月 6 日发表了一篇书评，帕森斯收藏此文，并仍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金兹伯格指出，“战争经济”的目

^[57] 同上引，第 668 页。

^[58] 同上引，第 662 页。

^[59] 同上引，第 664 页。

^[60] Peter F. Drucker,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A Study of the New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John Day, 1939).

的就是永久战争。他承认，纳粹已经克服了失业，昔日的无特权者也有了机会获得声望和权力，但整个国家及其公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更有甚者，德国的欧洲盟友们被纳粹哄入不平等交易。金兹伯格写道，在此前的和平年代，战争经济开销（cost）即已颇为可观，但“更糟糕的高昂代价（cost）还在后头。在严酷的国族主义的世界里，对外征战的胜利最终将受到遏制”^[61]。

第三节 珍珠港事件之前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9月7日，英格兰霍夫市(Hove)的律师A.J.R. 弗雷泽·泰勒致信帕森斯，请求他说明，在“欧洲民主国家和德国之间刚刚爆发的这场战争”中，美国为何保持中立。^[62] 泰勒特别关注为何美国似乎喜欢孤立主义，对此他给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美国参战会引发日本或俄国攻击其“防备空虚的太平洋沿岸”；“纳粹党在一定程度上买通了国会”；“不谙世事的中西部孤立主义者的拖累”，哪一个造成了不作为？9月28日，帕森斯回信道，头两个原因似乎不重要。但他承认，第三个原因确属事实。

<73>

帕森斯觉得，尽管罗斯福总统立场明确，但国内事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美国参战。他引用拉斯威尔的“不安全感假设”来说明孤立主义：

在这样一个大国，快速增长，社会剧变，经济动荡久拖不决，个人不安全感如此大规模蔓延，实属必然。这类事情比较容易被高度情感化的运动和领袖所动员，就像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爱国主义”成为最容易形成动员的焦点之一。出于多种原因，爱国主义很容易被等同为孤立主义，甚至是在其他情境下很容易被动员起来推动一场侵略战争的某类情绪。^[63]

拉斯威尔1933年首次提出“不安全感假设”来阐释“希特勒主义的心理

[61] Eli Ginzberg, “The Dynamics of Nazism” (评德鲁克一书),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1939年5月6日, 第5版。书评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8.2, box 2。

[62] 泰勒1939年9月7日致帕森斯函,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8.2, box 3。

[63] 帕森斯1939年9月28日致泰勒函,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8.2, box 3。

学”^[64]，并在一年以后，把自己的想法扩展成一套全面的政治心理学，写成《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65]拉斯威尔所谓的不安全感，指的是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或由于剧烈的政治变迁，导致丧失了对于传统权威或价值的认同。个体一旦被剥夺了人身安全感，也就丧失了归属感，这就使得任何符号只要承诺恢复个体安全感，从而缓解无所不在的焦虑，都会被现代大众轻易接受。他并警告道，如果现有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不足以充分缓解大众焦虑，大众就会寻找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宣泄其不可遏制的憎恨。在美国，像休伊·朗这样持有强硬反民主立场的鼓动家[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铁腕治州，大兴公共工程，主张更多地剥夺富人，后被暗杀。——译者注]颇有市场。在苏联，共产专制明显是对大众不安全感的解药。而在纳粹德国，他发现，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憎恨，使没饭碗、被剥夺的底层与反民主的上层群体取得了联合：

战败的羞辱叫它痛楚不已，凡尔赛和谈的不公后果使它不堪其重，漫无尽日的经济困境令它饱受折磨，统治着它的政治模式又空有其名，并无神圣化的传统为依托，凡此种种，德国的心态已经准备好大众的爆发……希特勒主义与其说是捍卫财产不受共产党人的征用，远不如说是向文化原教旨主义投降……事实上，希特勒就能够说：“战争的失去也给你们的人格带来灾难，为此不应由你们来承担罪责。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外敌背叛了你们……德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欲除外敌，先清内奸。”……总之，希特勒主义的符号缓解了中下资产阶级的情感冲突，而希特勒主义的行动又降低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劳力成本。^[66]

帕森斯借用拉斯维尔的“不安全感假设”向泰勒说明，对于那些被晚近的社会变迁（包括迅速工业化和人口增长，也包括大萧条）弄得士气低落的人来说，孤立主义是对战争的替代，而据他所知，这批人目前在美国占据大多数。

帕森斯也立即亲身行动，以图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变。1939年9月28日，就

[64] Harold Lasswell,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 1933, 第 373—384 页。

[65] Lasswell,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4) .

[66] Lasswell,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第 373、378、380、384 页。

在他写信给泰勒的同一天，帕森斯致函大卫·I. 沃尔什和小约翰·卡博特·洛奇，马萨诸塞州的两位参议员。^[67] 他解释自己有正当理由要叨扰参议员，因为他认为，那些不赞成参议院多数表决同意禁止向英法两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他们的意见应当得到倾听，不能只是因为他们人微言轻，就把他们的东西丢在一旁。”他明确提出，有三个目标无疑符合美国的利益：(1) 西方列强最终获胜；(2) 尽可能减少美国的社会经济损失和代价；(3) 免受战争牵连。但他又补充说，后者不应意味着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和平，犹如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他警告道，《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 的禁运条款将会威胁到国会的声望：“一旦接受那些限制，我们的中立立场不管可能产生怎样的保护，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举国之代价。”他又添上一句，德国人并不打算感激美国这种自束手脚，因此这样做甚至可能两头落空：首先有可能牺牲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友，然后便是独自应对纳粹强权。^[68]

1940年4月26日，对英军援委员会(Militant Aid to Britain Committee)在哈佛庭院(Harvard Yard)举办集会，帕森斯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介入战争，支持英国。他认为当前的危机可以用摆在美国公民面前的两种抉择来解释：

其一，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的变迁，是历史法则和社会自身历史的运作的必然产物。战争和革命，暴力与对我们道德标准的挑战，这些都只是征候，只是表面现象。无论我们做什么，基本的过程都将继续其必然的进程。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多只是缓解某些让人极为不快的失序，但这最好是在我们自己的辖区里做，在家乡做。这种听天由命地接受必然性的态度来自方方面面，有左有右，从“顺应时势”者，到我们某些马派的朋友。由此观之，目前这场战争的结局基本是次要的，只会产生表面的影响。而

<75>

[67] 帕森斯1939年9月28日致沃尔什和洛奇两位参议员函(两函措辞相同)，见帕森斯档案，HUG(FP)-42.8.2, box 3。

[68] 但洛奇在复信中表明立场与帕森斯相反。他写道：“在我看来，我们要么择一立场，要么保持和平，两者不可得兼。”他又以私人的语气补充道：“我认为，作为一名美国官员，我唯一有权秉持的目标就是维护美国的和平。”参看洛奇1939年10月3日致帕森斯函，帕森斯档案，HUG(FP)-42.8.2, box 3。不妨回想一下，当时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P. 肯尼迪的立场，和洛奇致帕森斯的信件完全一致。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可能正处在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69]

一、美国民主与纳粹德国之比较

1940年8月，民主议事会（Council for Democracy）在纽约成立，首任主席是帕森斯的同事和密切合作者，哈佛政治学教授弗里德利希。议事会的宗旨是通过阐明使美国有别于德国的那些民主特性，帮助美国公众理解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性。大批社会科学家和公众名人加入议事会，尤其是特别活跃的下属的国民士气委员会（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其中有戈登·W. 阿尔波特，格里高利·贝特森，沃尔特·坎农，哈德利·坎特里尔，埃利奥特·D. 查皮，埃尔默·戴维斯，伦纳德·杜布，弗里德利希，乔治·盖洛普，杰弗里·格雷尔，恩斯特·克里斯，大卫·利维，库尔特·勒温，玛格丽特·米德，加德纳·墨菲，亨利·A. 默里，拉尔夫·巴顿·佩里，埃德蒙德·泰勒，戈德温·沃森，罗伯特·耶基斯等。

帕森斯第一次公开比较美国社会与纳粹德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分析，是向民主议事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拟的题目是“适用于对抗美国制度和外交政策的群体和组织的发展及其可能的预防措施”（“The Development of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Amenable to Use Against American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d Possible Measures of Prevention.”）。^[70]他在1941年4月21日写给默里的信里称，备忘录是“去年夏天应弗里德利希之邀而撰，写完后即交给弗里德利希”。但此份文件在帕森斯生前从未公开发表，他在信中向默里抱怨，“我不知道民主议事会拿它干吗了，或者根本就没想起来”^[71]。

[69] 演讲的书面文本参看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3。据《哈佛红》（*The Crimson*）的剪报，集会由哈佛学生会维持秩序，学生会并邀请了各方面反对援英的人士：哈佛各学舍，教师工会，法学院，建筑学院，韦尔斯利（Wellesley）学院，西蒙斯（Simmons）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塔夫茨（Tufts）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劳联—产联（the CIO and the AFL），坎布里奇所有高中，坎布里奇妇女社区联合会（Womens' Neighborhood League of Cambridge），基督教青年会（YWCA），反战同盟（the Pacifist League）。参看《哈佛红》剪报，帕森斯档案，HUG (FP)-42.8.2, box 3。

[70] 备忘录在帕森斯生前从未公开发表，保存在帕森斯档案，HUG (FP)-42.41, box 2；经哈佛大学档案馆允许，备忘录最终发表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第101—130页。

[71] 帕森斯1941年4月21日致默里函，参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3。

备忘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描绘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整体背景”，另一部分则是“操作问题”。导言部分明确指出，美国社会结构的欠缺之处是可以被德国反民主的宣传加以利用的，包括阶级冲突、种族差异、社会解组，这些危险的态势意味着有可能导致情感上的不安全感和心理上的病态。显然，群体或个体处于后面这些状况，会很容易受到纳粹策略的影响。帕森斯承认，现代社会的职业—经济结构未能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令人满意的所得，让他们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安全感。经济和宗教领域的现代化抽空了社会传统的价值，而理性行动又常常被过分强调。大众的反应则是所谓“原教旨主义”，这是亟待避免的：“纳粹运动的诉求虽然主要不是宗教性的，但却与原教旨主义的诉求颇多类似。”^[72]

美国社会中自由主义的这些薄弱之处表明，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运动“并非凭空乍现，与孕育出它的那个社会的内涵全无延续之处，而是表现出传统的不断发展”^[73]。有鉴于此，帕森斯概括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五个特征，“围绕这五大要素，逐渐组织起它的主要目标和符号。”^[74]他详细阐述了这些特征：(1) 与种族主义密切维系的国族主义(种族被界定为日耳曼或“雅利安”血统)；(2) 社会主义，规定德国人人人平等，因为他们都是所谓民族共同体中的同胞；(3) 反智主义，表现为“原教旨主义”的反理性主义；(4) 军国主义；(5) 特殊主义，落实为元首制，一种特殊类型的等级制组织。它废除了职司的观念，从而造成凡纳粹势力所及，权力分工即告不复存在，以有利于一元化金字塔式权威结构，“最终上抵最高领袖。后者享有无限权力，对此没有任何法律界定。各级下属领导除了臣服于上级，自己即享有无限权威。”^[75]

而美国自由主义体制下的民主则与此截然相反，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趋向：

获取职业成就和地位的机会至少目前是相对自由的；这个领域盛行的是普遍主义标准，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为个体自由和各项自由权利提供制度保障；政治系统中的权威受制于法律，尊重被统治者

[72] Parsons, "The Development of Groups", 第 111 页。

[73] 同上引, 第 113 页。

[74] 同上引, 第 114 页。

[75] 同上引, 第 119 页。

的权利，权力限于宪法规定的职司。^[76]

基于美国民主体制的这四股趋势，帕森斯概括出六点“我们的社会传统的要素，有鉴于其内在的可取性，以及切实有效的诉求，在理应并且能够整合国民团结的所有情感诉求中，都应当给予大力强调。”^[77]也就是说，以下六点要素非常重要，足以成为民主议事会的教育工作的主旨所在，让美国人清楚意识到自身所具备的民主体制的力量与成就。这六点要素是：(1) 宪治，或者说有别于人治的法治；(2) 公民自由权利；(3) 机会平等；(4) 认同公民共同体，投身无利益关涉的活动，实现有利于社会每一个成员个体的价值观念；(5) 理性批判精神，尤其关注科学与技术作为社会生活动力的重要性；(6) 行动主义。

这份备忘录将两类社会秩序并置而论。不过，帕森斯警告说，它们并非泾渭分明。譬如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头三个特征，即国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反智主义，在美国社会也能找到，只是程度有所缓和。（只有军国主义和元首制威权主义这种彻底的特殊主义才是纳粹德国所独有的。）

不仅如此，阶级不平等或种族不平等之类的结构张力还导致了四块危险地带。原教旨主义，特殊主义，政治群体和政治议题的人格化，以及对于少数族群的歧视，这些危险地带有可能招引德国宣传的渗透，破坏美国对于民主的信念。帕森斯提请人们关注，“不仅在宗教当中，而且在任何领域，‘原教旨主义’”^[78]都会使美国人疏离理性思维。他又强调，特殊主义认为自身所属群体远远优于其他群体，这会使美国人淡忘民主的某些价值（特别是平等）。他还指责道，对于某些“利益”和“群体”的人格化饱含危险，此时对于一个人的判断乃是基于其群体成员资格，尤其是“不加区辨地粗率使用‘法西斯分子’或‘共产主义者’之类的修饰词”，^[79]从而不能恰如其分地判定个体自身的价值。最后他指出，对于少数族群的歧视乃是基于偏见，不仅针对“爱尔兰人、法裔加拿大人、意大利

[76] 同上引，第 106 页。

[77] 同上引，第 120 页。

[78] 同上引，第 124 页。

[79] 同上引，第 125 页。

人”，而且针对犹太人和黑人。^[80]进而，这些歧视又会在所针对的族群心中制造怨恨，而这样的情感可以被那些煽动仇恨的德国人利用，在美国挑起反民主运动。因此他呼吁，要警惕“出现任何劣等感，因为这很容易被利用来煽动对于实际或所谓的歧视的怨恨。”

这份备忘录乃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在两个领域与极权主义截然相对的民主体制。一是弗里德利希在其全面综合的《立宪政府与政治》中所分析的政治权力的性质。^[81]弗里德利希指出，现代政府体系意味着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以欧洲历史背景中利益表达和意见表达的多元主义为基础。他警告道，现代的政治可能意味着利益群体对政府施加压力，导致政治体中的失衡。纳粹的统治就是一种败坏的“直接民众行动”，彻底破坏了宪治。

弗里德利希认为，国社党人利用全民公投“来展现联合阵线，以支持政府侵略性的外交政策”^[82]。他更提出，“任何政治权力，无论有什么样的合法形式行使该权力，都会有被滥用的危险。但集中的权力被滥用的危险远远大于分治的权力。”^[83]纳粹声称其统治是民主的，因为他们在所谓“选举”中赢得了近乎百分之百的压倒多数，完全就是支持希特勒的全民公投。弗里德利希对此大加嘲讽。他指责道，诸如此类的操弄根本不能“提供‘切实的民主’，而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却企图让我们信以为真。”^[84]他把戈培尔的声称说成是“要么是子虚乌有的幻梦，要么是令人遗憾的赝品。”

<78>

帕森斯的备忘录中的第二股讨论脉络在于士气 (morale)。这个主题是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前期的热点。比如说，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院的某些成员编了一部文集《今日之战争》，流亡社会学家汉斯·施派尔在其中探

[80] 同上引，第 126 页。下一则引文亦摘自同一页。

[81] Carl J. Friedric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a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7; 修订版题为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41)。

[82] Friedric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1937), 第 494 页。

[83] 同上引，第 499 页。

[84] 同上引，第 500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讨了“士气与宣传”这一话题。^[85]他提出,在现代大众社会,符号战(symbol warfare)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将会使用宣传说服这一操弄性的手段。他写道,在战争中,宣传有三种用途。它会左右士气,操弄事实的符号意义,指引忠诚。就士气而言,他联系到“恐惧与焦虑的心理学”^[86],并进一步说明,“濒临危险,士气或可强振,如果想到已经准备好应对危险,就更是如此。而捉摸不定的危险则会导致焦虑,士气为之萎谢。”^[87]

比如说,精神病学家哈里·沙利文就透过士气低落(demoralization)来探讨士气。他分析了许多晚近发生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6月数百万法国人逃离德国人,阻塞道路,妨碍法军调动。^[88]而苏格兰心理学家P.E.弗农所撰“士气概念一探”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他考察了民主社会中的战争态度,检验了人格中“被认为与士气相关的品性”。根据他在摘要中的概括,他发现,在具有民主倾向的人格品性中,“心绪稳定、积极乐观、乐信少疑、达观开朗、处逆不惊、热情好奇”等因素比较普遍。在这些因素中,他发现了“一种群体因素,在看待问题

[85] Hans Speier, “Morale and Propaganda”, 收于 *War In Our Time*, Hans Speier 与 Erich Kähler 合编 (New York: Norton, 1939), 第 299—326 页。社会研究新学院创建于 1919 年, 1933 年后成为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流亡社会科学家的主要目的地和庇护所, 例如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荷兰、意大利和波兰。1933 年, 流亡大学 (University in Exile) 成立, 同年 10 月 1 日开始教学, 并改名为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在最初的代表人物当中, 包括了德国的流亡社会学家汉斯·施派尔与埃米尔·莱德雷尔, 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 政治学家卡尔·布朗特与爱德华·海曼, 经济学家格拉德·科尔姆与阿瑟·法伊勒, 以及教育学家弗里达·文德利希。最近有一份名单开列了社会研究新学院自 1933 年至 1945 年曾经协助过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计有 180 余人。参看 Claus-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Campus, 1987), 特别是第 227—232 页。

[86] 参看 John Dollard, “Hostility and Fear in Social Life”, *Social Forces*, vol. 17, 1938, 第 15—26 页; Theodor Reik, “Aggression from Anx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20, 1939, 第 7—16 页。

[87] Speier, “Morale and Propaganda”, 第 312 页。

[88] Harry Stack Sullivan, “Psychiatric Aspects of Mora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7, 1941, 第 271—301 页。

时表现出讲求理性、自由开明、体察他人 (altrocentric outlook)。”^[89]

金博尔·扬有一篇文章很精彩，最后收录了国民士气委员会有关德国心理战的文献解题，提到了“总体”公民。扬解释道，美国人尽管不那么争胜好战，一心侵犯，但如果面临攻击，需要自卫，则无疑会变得充满斗志。纳粹追随者如果被牢固组织在一整套等级结构之中，此时的力量会最为强大，但一旦有此需要，美国人会独力自卫，每一个人都成为坚韧的堡垒。^[90]

帕森斯在提交给民主义事会的备忘录中比较了美国社会与纳粹社会，宪政和士气作为民主体制的特征，成为两个核心主题。

1941年秋，帕森斯开始彻底重写此份备忘录，并更名为“美国与欧战关系之社会学思考”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lation to the European War”)。^[91] 备忘录旨在探讨“美国的防御”，分以下四个部分：“我们在捍卫什么？我们在抗御什么？我们的弱点是什么？政策的前景与问题。”^[92]

但是，在构思的四个部分中，真正写成的只有第一部分。在写作的那个时节，有待捍卫的显然还是“欧战”，是英美世界的民主体制。这里包含了民主性社会组织的四项一般性原则：积极行动（行动主义），理性（法理或手段一目的行动取向），伦理普遍主义 (ethical universalism)，功能专门性 (functional specificity)。这些原则标志着自由的社会组织的三套系统：一是职业领域或“经济”（这里的引

[89] P. E. Vern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ion of Morale",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vol. 9, 1940, 引语见第 294 页。其他值得关注的还有 L. M. Hurvich, T. W. Huntington 与 G. W. Allport 合撰的 *Beginnings of a Bibliography o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Morale*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1940, 油印本); Stanley Washburn, "What Makes Moral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5, 1941, 第 519—531 页; Clyde R. Miller, "Some Comments on Propaganda Analysis and the Science of Democr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5, 1941, 第 657—665 页; 以及上述阿尔波特书目的续编, Irving L. Child, "Morale: A Bibliograph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38, 1941, 第 393—420 页。

[90] Kimball Young, "What Is To Be Learned From This Survey", 第 84—88 页, 收于 Ladislav Farago, L. F. Gittler, Gordon W Allport, John G. Beebe-Center, Edwin G. Boring, Floyd L. Ruch, Stanley S. Stevens 及 Kimball Young 等合撰的 *German Psychological Warfare.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New York: 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 1941)。

[91] 首次公开刊行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189—202 页。

[92] 同上引, 第 189 页。

号是帕森斯原文所用)；一是基于宪治的政府，其中民主体制是一种主导形式；一是通过以程序法确立的契约规则调控人际关系。最后一块领域包括公民自由权利的制度化。这三大系统(或韦伯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的系统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了四项原则，是西方自由主义所特有的。这样所看到的民主体制也就超出了政治的领域：“[四项模式要素]界定了一种(比通常人们所称的民主)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类型……可以证明，这四要素在今日之世界局势下都受到严重威胁。”^[93]

至于从新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特性，在完成的第一部分文稿中只是略一提及。帕森斯就此简述了有关的四项要素，包括“宿命主义”、仪式主义、伦理特殊主义(ethical particularism)、功能弥散性(functional diffuseness)。他觉得，“宿命主义”是行动主义的反面，一向被“广泛认为是东方诸文明的特点”。^[94]根据《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已经提过的涂尔干的分析思路^[95]，仪式主义指的是“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和实体占了上风”^[96]。仪式主义还导致了某种与经验无涉的行动正当化，对此他表示反对(以说明其反面，即倾向交互性的理性)，主张“猜想必须有能力证明正误，规划的行动必须根据其有多大效力作为达成某项目的手段之类的标准来衡量”^[97]。毫无疑问，伦理特殊主义主导了区分雅利安血统与非雅利安血统的种族学说，这甚至成为是否有权利生活在纳粹德国的一个决定因素。最后一点，功能弥散性意味着“西方的科学与学问的传统，连带着以这种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最终将会被毁灭。^[98]他指出，在纳粹德国的大学中，技术上是否具有资格能力已经被意识形态上是否可以信赖所替代。在极权社会中，权威已经成为总体性的，因为它不再受到资格能力的界定，不再涉及与具体任务相关的技能。在倒退到家

^[93] 同上引，第 194 页。

^[94] 同上引，第 191 页。帕森斯显然指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类似于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参看 Karl August Wittfogel, “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 7, 1938, 第 90—122 页。

^[95] 参看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尤其是第 673—677 页。

^[96]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United States……”, 第 192 页。

^[97] 同上引。有关仪式主义作为社会行动中手段与终极目的之间的某种关系类型，较早的探讨参看帕森斯“The Place of Ultimate Values in Sociological Theory”，发表于 1935 年。

^[98]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第 199 页。

长制传统主义的过程中，“享有权力的职司与占有者的私人能力这两块领域之间”的“明确分别”逐渐模糊，“在这样的领域中，无论其个人声望或影响如何，他并不在行使特定法律规定的职司权力，因此也不是在行使这里讨论意义上的法理权威”。^[99]

二、民主受到的威胁

1940年夏，捍卫美国哈佛小组成立，帕森斯同时加入。小组的宗旨乃是以民主体制的技能训练对抗极权主义的威胁。在署明1940年7月的有关组织宗旨与活动的声明中，开列了八项具体宗旨^[100]，包括代表与极权力量交战各国支持美国的军事动员和产业动员措施；救济外国难民和英国儿童；帮助“发展切实可行的国民联合体，无论种族、教义、党派”；倡导一视同仁的国民服务，“无分阶级肤色，以彰显举国一体，坚定维护美国自由权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维持英勇无畏、团结一心的国民士气，矢志抵抗任何对于美国的极权主义侵犯，无论这种侵犯表现为武装力量、经济行动，还是国内绥靖思潮而非抵御极权力量。”

<81>

1940年秋，帕森斯成为小组下属的士气与国民联合委员会（Committee on Morale and National Unity）[初名国民服务委员会（National Service）]的副主席，到1941年2月，担任改名后的国民士气委员会（Committee on National Morale）主席。^[101]在这个位置上，他起草了一份据说要经过成员投票通过的决议，把国家社会主义说成是民主体制的对立面。该决议开宗明义：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仅在原则上与现代自由社会不相融，现在它已经直接而强烈地威胁到后者的存在本身。不幸的是，它并不是一帮垂暮之

^[99] 同上引，第200页。

^[100] “Letter to the Faculties and Staffs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Defense Harvard Group”,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July 1940; 收于帕森斯档案, HUG (FP) -15.2, box3.

^[101]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阿尔波特·保罗·H. 巴克、伯纳德·德·博托、威廉·Y. 埃利奥特、哈特索恩、詹姆斯·A. 麦克劳林、小阿瑟·M. 施莱尔辛格等。参加委员会工作的还有乔治·德维沃、谢尔顿·格吕克、埃尔顿·梅约、默里·罗伯特·乌利希、卡斯帕尔·W. 温伯格与威廉·F. 怀特。

辈在自说自话，而是本质上的一场穷兵黩武的扩张运动，骨子里孜孜以求权力、征服和支配。不仅如此，它的扩张所使用的手段正是一个自由社会极不情愿去抵御的，它所攻击的地方正是我们极不可能理解其危险的。它不仅成功地组织起一个大国，以斯巴达以来前所未有的彻底全面去实施武力，不仅为了自卫，更为了征服。此外，它还把这股武力纳入一项更大的战略，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致运用宣传作为破坏抵抗的技术，并在一定程度上摸索阴谋和欺诈作为史无前例的政策技术。^[102]

从1941年2月到4月，帕森斯和哈特索恩作为主席与副主席，组织了一个有关德国社会结构的讨论小组，致力于统合纳粹德国已经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以便就美国的政策和战后计划提出切实有效的结论。^[103]

<82> 分组讨论的纪要打字稿显示，帕森斯对于哈佛学者内部的这些讨论寄望甚高：“如果我们能够处理这些议题，德国情势的变化或许就在合理的可能性范围

[102] 打字稿分三部分（没有注明标题与作者），起头是“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收于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3。

[103] 帕森斯负责的分组是1914年前德国社会的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性。哈特索恩负责的则是一战如何影响了德国人的态度和世界观。流亡历史学家赫伯特·罗辛斯基探讨了德军作为与第二帝国时期王室紧密相关的军国主义的中坚，同时又成为二战时为纳粹服务的那些出身容克贵族的官员当中反纳粹情绪的积存地。默里的合作者怀亚特博士讨论了德国权威主义的家庭结构问题，其素材来源于霍克海默、弗洛姆等流亡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员合编的《权威与家庭研究》（*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1936年在巴黎出版）。随后还有另外两个讨论小组分别关注日本和美国，旨在基于比较的视角，谋划提升美国士气的有关策略。参看“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National Morale, submitted by the Chairman”（1941），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3；以及1941年10月1日帕森斯致博托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3。罗辛斯基和怀亚特的背景材料如下：罗辛斯基在先逃往英国、后流亡美国之前，曾在德国基尔大学教授历史。他的奠基性著作《德军》（*The German Army*）1939年由伦敦Hogarth Press刊行，1940年又在纽约由Harcourt, Brace & Co. 发行。英国版于1940即告重印，美国版在1944年由华盛顿的Infantry Journal Press再刊。此书的德文初版系伪托笔名：Miles, *Deutschlands Kriegsbereitschaft und Kriegsabsichten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Fachliteratur*（Zurich: Europa Verlag, 1939）。怀亚特的素材主要是弗洛姆有关权威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开创性论著，作为《权威与家庭研究》的三份导言之一[此书开篇为霍克海默、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分别撰写的三份理论导言。——译者注]（Paris: Félix Alcan, 1936）。弗洛姆的理论命题是：德国的威权主义家庭结构滋养了某种特定的人格倾向，出于孤独无助和自视尊大的混合情结，容易屈服于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思潮。

之内，即使不考虑它与我们所想的那些理想模式之间的相符之处，其不相符之处至少也是静待无为的，而不是积极扩张的。”^[104]

他在讨论一战前的德国社会时，适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纳粹主义，长远来看，这些因素是否能够改变。他概括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社会，包括容克主义，精英主义，体现在普鲁士地区竭力占取主导地位的新教教会的那种宗教（并简述及犹太人的影响以及反犹主义），工业化，以及都市化。他强调，后面这一切带来了1870年后迅猛的社会变迁。科层制是法理型的，但囿于法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尽管普鲁士霸权在政治系统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不利于公民参与，但区域分化也很重要。不仅如此，帕森斯还提到，事实上，帝国政府并不对帝国国会负责。他概括了德国容易导致后来的极权主义的那些张力，指出了两方面的失范。一方面，迅猛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使大部分人口背井离乡，导致广泛丧失对于未来的安全感（柏林在短短五十年里从20万人增长到超过400万人，即为明证）。另一方面，在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对于失范的组织……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是无神论者，反宗教者，这就非常便于纳粹对于情势的界定，将激进派界定为反宗教者。”^[105]

<83>

除了用社会学作为背景来理解当下和过去的德国社会结构，帕森斯还致力于向哈佛校外的公众说明目前的世界政治。从1940年8月29日到1941年6月5日，他常常在当地电台WRUL评论时事，每月一两次，讨论罗斯福总统或参议院所考虑的政策或采取的措施，从世界战争情势的角度予以解析。他毫不掩饰地强调对于民主的威胁是何等深重。当1940年9月27日轴心势力与日本缔结三方盟约，他警示听众“新的协定将有可能证明是一场历史事件”，因为它意味着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存在本身的“一种明确而直接的挑战”。^[106]

[104] “Discussion Group on German Social Structure, February 14, 1941 (Dr. Parsons)”, 第1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10.

[105] 同上引，第8页。

[106] “News report, September 30” (1940)；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3.

三、考察宗教

大约在此前后，帕森斯完成了论反犹太主义的论文的草稿。但文章最终发表了将近两年时间，并且让帕森斯倍感失望的是，最终的文本并未经其授权。文章收于一部讨论反犹太主义问题的文集，题为《非犹太人世界中的犹太人》。^[107]文集的主编伊萨克·格雷伯在1939年晚期联系了帕森斯^[108]，帕森斯在1940年春完成了长达五十多页的初稿，但不得不反对格雷伯的观点而为自己辩护。1940年9月，帕森斯把文章寄给流亡的政治学家埃里克·沃格林，请其评阅。^[109]

12月，格雷伯要求至少给他一份“理论概述”，一页纸即可，帕森斯照办。^[110]根据这份摘要，有关观点如下：反犹太主义这种现象是由于两套相互分离但彼此关联的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所产生的。犹太的文化个体性有其历史悠远的宗教根源：“这种宗教类型与基督教的任何分支都大为不同。”^[111]当犹太人融入欧美各社会时，在普遍主义标准盛行的领域，这种融入就会更成功些，主要是奉行机会平等、最少受到共同体式（*gemeinschaft*）社会传统约束的某些职业领域。但犹太人常常痛苦地发现，在自己周遭的社会，这种普遍主义的制度化并不彻底。当这些张力，特别是“使个体陷于冲突和不安全”的张力，逐步蔓延，反犹太主义就会盛行。现代社会中的犹太人痛切地承受着“迅速解放所带来的不安定效应”，“其结果是情绪的不稳定四下蔓延，包括极易动员的侵犯情绪”。显然，如此容

[107] Isaacque Graeber 与 Stuart Henderson Britt 合编的文集 *Jews in a Gentile World: The Problem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2)。在文集作者中，除了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讨论“二元文化性：社会性精神分裂一探”，社会学家埃弗里特·斯通奎斯特探讨“犹太人的边际性格”，来自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德国流亡社会学家卡尔·迈尔讨论“反犹太主义的宗教与政治特性”，还有哈佛政治学家弗里德利希的文章“反犹太主义：对基督教文化的挑战”，哈佛人类学家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的“犹太人具备种族特性吗？”，堪萨斯大学与门宁格诊所 [“Menninger Clinic”，美国门宁格医生世家在堪萨斯开设的精神病诊所。——译者注] 的心理学家尤尼乌斯·哈格·布朗讨论了“反犹立场的起源”。

[108] 1939年12月8日帕森斯致格雷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2, box 3。

[109] 参看帕森斯1940年9月11日致沃格林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2, box 3。沃格林当时在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校区任教，他来美国的书面担保就是帕森斯提供的。

[110] 和摘要一起，帕森斯于1940年12月14日致函格雷伯，警告他“对于我的论文主要观点的任何概括都不能超出此限，否则会被视为不合适。”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7。

[111] 据随1940年12月14日致格雷伯函一同发出的一页摘要，本段下文的各处引语均据此页。

易屈服于侵犯情绪，使犹太人变得毫无必要地扎眼，招来侵犯性的反应：“在非犹太的平民大众之中，犹太人成为特别容易受到侵害的符号象征，供民众宣泄其侵犯情绪。”

但格雷伯未经授权删改了帕森斯的文本。他这样为自己的编辑修改辩护：“我请求您不要责怪我删减了您这一章。事实上，我不只是根据意见改写了您的文章，对其他几位作者的文章也是如此。请相信我这样处理，尤其是对您的文章这样处理，内心也颇为不安。”^[112]对此，帕森斯的回复是添加了十一处文字。然而，格雷伯在最终出版的文集中只采用了两处。^[113]

冲突在哪里呢？关键的意见分歧在于，文章的结尾是否应当严斥反犹主义是不道德的。格雷伯觉得应当，于是在手稿中添加了这样的措辞，取代了帕森斯原本主张的科学研究的至上性。但帕森斯坚持向格雷伯提出，“我明确认为这是在做科学分析，而不是促请推行某项政策。”^[114]原稿的结语是：“只有充分把握反犹主义涉及的所有问题，才能有效地探讨这一话题。换言之，要通过严肃的研究，客观的分析，而不是情绪化的思维，才有可能成功地处理问题。”^[115]但在文集中最后一句却变成“对于反犹主义的理性政策不能只是压制和惩处其表达，而只能是类似于努力控制其更为深层的起因。仅仅义愤填膺地压制某种邪恶，实属治标不治本。”^[116]

[112] 格雷伯 1941 年 8 月 16 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41, box 2.

[113] 根据哈佛大学档案馆所保存的材料尽可能修复的此文原稿，迟至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才公开刊行。

[114] 帕森斯 1940 年 3 月 1 日致格雷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2, box 3.

[115] 这里修复的帕森斯文本根据的是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第 150—151 页。在这一点上，亦参 Gerhardt, “Die soziologische Erklä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ntisemitismus in den USA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vol. 1, 1991, 第 253—273 页。

[116] Parsons, “The Sociology of Anti-Semitism”, Graeber 与 Britt 合编之 *Jews in a Gentile World*, 第 122 页。可以理解，帕森斯在此后的五本个人文集中均未重印此文。事实上，在他 1942—1947 年间所撰写的全部探讨法西斯主义及相关问题的文章中，只有这一篇遭此待遇。不过，他似乎一直记挂着这些话题。到了 1979 年，他又为这篇文章写了个后记，提到了德国在 1945 年以后的变化，并指出只是在自己文章发表后的岁月里，世人才了解到纳粹的罪行是何其残暴。在哈佛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这篇后记的文稿上，还有利兹题写的“S.Z. 克劳斯纳在塔·帕去世后编辑准备发表”，后来刊载于 *Contemporary Jewry*, vol. 5, 1980, 第 31—38 页。

<85> 帕森斯在致信沃格林邀请他评阅自己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分析时，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纳粹主义在宗教立场上属于倒退。沃格林于9月11日回函帕森斯，将德国对于犹太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点：一是类似于失范的无助感，二是两群“选民”之间的竞争将德国人拖入一种奇怪的“单子论”（*monadologism*），三是反基督教。帕森斯在9月27日复函，告诉沃格林，为了理解他提出的问题，自己又重读了三四遍韦伯的“古代犹太教”。

沃格林提出的第一点，即德国人不能像英国的绅士（*gentleman*）或法国的绅士（*gentilhomme*）那样，有某种文化理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就使他们在犹太人面前感到无助。对此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尝试性的结论。^[117]他告诉沃格林，“从路德宗的角度来看，”

会接受世界确实是、必然是邪恶的。人被视为带有原罪，也就避免了懊悔的心理张力。在我看来，这很容易大大削减基督徒的仁爱义务的力量，更广泛地说就是普遍主义伦理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加尔文宗要在世间打造上帝的王国，这一积极行动的义务对严格执行基督教义施加的约制则要强硬得多。我认为在这方面，具有路德宗背景的人对于他们有悖于基督教伦理的侵犯冲动所施加的约束，比加尔文背景的社会中的约束要宽松得多。只要美国社会强烈地感到要遵循加尔文模式，我觉得我们可以比德国人更好地对抗这种彻底非基督教的侵犯情绪的大众爆发。^[118]

沃格林的第二点谈的是“选民”之间的竞争，对此，帕森斯将德国的选民感与犹太的弥赛亚主义做了对比，但这两者都对立于加尔文教义：

本质性的差异之一在于，在英美世界，这一点并没有维系着犹太人独有的谦卑感，接受并预料会遭受迫害，居于依赖地位，视之为对自身此前过失的惩罚。它也没有维系着对于最终主宰世界的弥赛亚式希望。因此，我觉得，之所以相对于我们而言，德国人的选民感更近于犹太人，与其说

^[117] 帕森斯1940年9月27日致沃格林函，第2—3页；见帕森斯档案，HUG（FP）-42.8.2，box 3。

^[118] 同上引，第3页；关于这一观念的讨论，亦参Gordon A. Craig, *The Germans* (New York: Meridian, 1991), 第15—34页。

是出于这类原因，不如说是有其历史渊源。我认为，这也维系着我此前指出的德国的屈辱感，我想，对于早期中世纪帝国的辉煌过去的自觉意识，欧洲受西方诸国尤其是法国主宰时期长达百年的政治上无助的处境，两相融合，大大促成了这样的感受。^[119]

<86>

他最后的结论是：“或许反犹主义与此有关的缘由之一是一种恶意的怨恨，将这些伦理性的宗教态度与对于能够靠那种希望生存下去的人的纯粹嫉羨结合起来。”^[120]

就沃格林提出的第三点而言，帕森斯引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强调在理性主义下，基督教比犹太教的发展要大得多。但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寻求虚无主义时也消灭了这一优势，用一个来破坏另一个：“我以为由此观之，国家社会主义可视为你所说的新的宗教力量的爆发，其核心恰恰就是这些原教旨主义情感的重新定向。当然，这又与劳施宁（应为‘Rauschnig’，帕森斯原稿误作‘Rauschnig’）谈了很多的纳粹精英中的虚无主义有着密切关联。”^[121]

四、韦伯主义的观点

1938年，帕森斯答应给《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写一篇以韦伯的观点来看当代政治的文章，以接续在他《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于韦伯的讨论。具体来说，他答应结合现代极权主义来探讨韦伯的权威类型说。^[122]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

1940年9月28日，帕森斯在《波士顿晚钞》（*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上，假借新闻记者的口吻，本来是要以典型的报章风格叙说事实，但却以韦伯风格的分析，试图阐明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他假托是在报道一场演说，分析

[119] 帕森斯 1940 年 9 月 27 日致沃格林函，第 3—4 页。

[120] 同上引，第 4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21] 同上引，第 5 页；这里提到的是 Hermann Rauschnig, *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 Warning to the West* (New York: Alliance, 1940; 原文为德文, Zürich: Europa-Verlag, 1938, 第二版)。

[122] 瓦尔德马·古里安 1939 年 12 月 11 日致帕森斯函，以及帕森斯 1939 年 12 月 21 日的复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 box 17。

所知事实,概括德国如果赢得战争,将如何把整个世界拖入新的“黑暗时代”。^[123]他坦承,纳粹德国正在走向的这种社会类型,和现代法理统治无甚关联。封建制这个术语倒是可以概括这类社会,仿佛它在德国(重新)兴起,只是其封建式的采邑—封臣关系的基础不再是土地,而是种族主义的世界观:

因此,从这种长远视角来看,或许我们正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当前与革命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斗的结局,或许将会决定整个西方社会是继续这条已经让其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发展道路,还是退回到从我们历史的所有根本价值来看都必然更加原始的状态。^[124]

接下来帕森斯决定细述,德国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倒退型社会变迁,其基础是韦伯所概括的那种克里斯玛的例行化。^[125]1941年夏秋之交,帕森斯写成此文,分两部分发在《政治学评论》1942年的一月号 and 四月号上。^[126]

文章的第一部分细致重述了韦伯有关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概念区分。第二部分运用这种类型学,从四个方面来阐明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如何不同于作为法理类型的民主社会的美国。文章通过韦伯式的思路,探讨纳粹德国的克里斯玛类型的权威结构在什么方面意味着对于西方文化本身维续的深重威胁。

帕森斯首先指出,纳粹党根本算不上政党,而是一种破坏多元政党体制的革命性运动。“民主与政党体制”一节强调,纳粹领袖要求服从,拒绝照办的德国人将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遭迫害。他比较了民主体制的做法和纳粹的做法,明确指出,“不存在任何客观上正当的事业,要求选民全体有义务支持。但在克里斯玛的模式下,情况正是如此。对于那些落在领袖的诉求范围内的人来说,不听

^[123] “New Dark Ages Seen If Nazis Should Win”, 收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153—157 页。

^[124] 同上引,第 157 页。

^[125] 在一封注明日期为 1941 年 10 月 21 日的信中,古里安表示,《政治学评论》已经接受发表帕森斯的文章,但提出了少许修改的意见。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45.4, box 1。

^[126] 题为 “Max Weber and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risi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 1942, 第 61—76 页,及第 155—172 页;重印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159—187 页。

从他的号召，就是违逆了义务。”^[127]

其次，他概述了克里斯玛型统治如何经历了例行化过程，导致地方大员的个人统治。他明确提出，如果纳粹获胜，或是希特勒死后，这种发展趋势尤为可能。

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以韦伯所谓的克里斯玛政制观之，帕森斯强调的是以先赋行动取向替代获致行动取向。德国人基于种族这一先赋属性，标示了日耳曼民族（Volk），彻底重构他们的社会：

如此一来，比如说，在德国人民这一“神秘肌体”中的“种族”成员资格，无论在什么方面都超越了对于个体品质或能力的任何考虑。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普遍主义标准的伦理意涵，这样的标准原本应用于各式各样的领域，像理性知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本身所具有的各项人身权利和自由权利、技术能力，如此等等。取而代之的是种族和党派上的特殊主义，强调对元首的无限忠诚，所提出的模式更适于传统型权威组织，而不是法理型权威组织。^[128]

有鉴于此，他在重新阐述韦伯的三类权威时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克里斯玛型权威属于韦伯所谓的“疏离于经济”（wirtschaftsfremd）。典型的克里斯玛政制对倡导正常的经济生活不感兴趣：^{<88>}

在克里斯玛阶段，无论是所提供的行政管理的手段，还是管理职员的薪酬，都有可能出自运动或领袖个人所能处置的资源，领袖随后又会根据具体所需分发给其追随者，或者由追随者们在其活动中独立获得。但无论就管理职员内部的关系而言，还是从它与整体人口的关系来看，这种体制都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另一方面，特别是当供应来自贡赋和劳役时，是很容易被最接近其来源的管理职员们所“占用”的，他们享有对于相关来源的权威，因此这些来源被视为其‘私有’财产，是他们在群体内的地位所附的特权。^[129]

[127] 同上引，第 173 页。

[128] 同上引，第 174 页。

[129] 同上引，第 166 页。

以上两个因素合在一起，产生了第三个因素，即法治的瓦解，法治国的废除。分权体制被颠覆，破坏了独立司法，导致党派立法和司法，大批纳粹官员凌驾于法律之上，纵然作恶多端，也是逍遥法外。被指为“反纳粹”的就会遭到杀害，即使是整个“种族”，比如犹太人或斯拉夫人，也是难逃厄运。而这样的杀戮却是横行无阻，比如盖世太保、党卫队和党的官员即使犯下反人类罪，也是不受惩处。

因此，对于一个“法治”的体制来说，常规的法院系统不受侵犯乃是根本要件。但在纳粹治下，秘密警察凌驾于法院之上，无需为其行动提出任何理由。不仅如此，在党的等级序列上拥有权威的任何一个人，在某种重要意义上都高于法律。执法机构这一常规国家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若想在此人头上动土，都会面临危险，除非该人被其党内上级发落给司法处置。^[130]

在“国家社会主义权力持续巩固的可能后果”一节，帕森斯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他指明在德国，从法理型权威，经过克里斯玛型统治及其不可避免的例行化，倒退回极权主义的家长制：

<89> 如果把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与克里斯玛运动的例行化动力机制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证据似乎非常明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在政治上始终占据主宰地位，其结果，所关注的领域就极有可能转型成为这样一种体制，其制度模式具有强烈的传统主义特性。在西方世界可以保持与政治组织之间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中的其他要素，比如私有财产和经济企业的主导形式，市场关系，教育和文化活动，都难免被卷进同一个基本变迁进程。我们文明最独特的文化性质恐怕不能挨过这样的变迁而幸存下去，这一点似乎无须赘言。^[131]

帕森斯的第三点，谈的是“战争的结局与制度的发展”。韦伯用公元前五世
纪古希腊赢得对波斯的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来比拟西方文明的维存，不

^[130] 同上引，第 176—177 页。

^[131] 同上引，第 179 页。

妨借用来理解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帕森斯警示世人，“我们完全有可能正站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另一个同等关键的决策关头。有些人觉得，西方世界的理性化自由文化已经玩完，再无进一步的创造潜能。”^[132]然而，他接下去质疑道，难道真的可能有一位严肃的学者，会倡导“由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运动来支配主要的西方文化地域吗？”^[133]（要记住，他的同事索罗金 1941 年刚刚出版其讨论社会文化动力机制的巨著的最后一卷，宣告一位克里斯玛型领袖将拯救我们进入一个新千年。）

他的第四点关注的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伦理立场：一是“原教旨主义”，一是自由现代主义；一是信念伦理，一是责任伦理。奉行后者比前者艰难得多，但只有后者能够胜任 1941—1942 年间“当前政治危机”中盛行的争取民主之战：

毋庸置疑，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之所以是“非理性的”，不仅是因为将所有的取向都推至终极价值，超出理性分析之力所能及，而且，这种力量抑制了对于行为问题存在理性取向的可能性……今天，动员起威胁现代西方基本制度体系的那些力量的运动，所诉诸的正是信念伦理类型的取向……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与此相反，基本可以肯定，任何担当韦伯特定意义上的责任行动之重担的能力，都构成一种极为重要的条件，以成功维持法理型权威体系，以及……我们的西方“伟大社会”所秉持的人类发展的潜能。^[134]

第四节 1942 年

1942 年是美国全面参战的第一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加入了二战，从而终结了孤立主义。1941 年 12 月 7 日凌晨，日本抢先轰炸了美军联合舰队， <90>

[132] 同上引，第 180—181 页。

[133] 同上引，第 181 页。

[134] 同上引，第 183—184 页。

而在此之前,美国海军原本是要部署来阻遏日本对于朝鲜、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帝国主义征服。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既是事出偶然,又是实属必然。^[135]它终结了极权主义三轴心制造的“欧洲暗夜”和“权力谋划”时期。^[136]原本倡导干预政策的人,比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厄尔,其立场再也不是“反潮流”了。^[137]现在,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诉求在于“美国值得一战”。^[138]希特勒于1941年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在此之后,美国对付纳粹及其轴心联盟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优势军力。

帕森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研究以三种值得关注的方式,回应了美国现在已经积极参战的事实。其一,他转向探究德国的战争和对被占国的占领政策;其二,展望德国的战败,讨论美国胜利后的对德政策;其三,更多地根据美国(未来)对德国(和日本)实施再教育的使命,重新审视目前美国的民主类型。

一、“被占国研究”

1941年12月上半月,帕森斯与流亡的荷兰社会学家巴塞洛缪·兰德海尔在哈佛教员俱乐部(Harvard Faculty Club)共进午餐时,提出了对在战争中遭到攻击或军事占领的社会的研究计划,称之为“被占国研究”(Occupied Countries Study)。

兰德海尔是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金得主被救出欧洲的,当时供职于设在纽约的荷兰情报局(Netherlands Information Bureau)。与兰德海尔的合作研究最初名为“入侵的社会特性”^[139],打算“就欧洲各德占国的征服和占领的社会学后果开展系列研究”^[140]。这些国家包括荷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荷兰

^[135] Oscar Handlin, *Chance or Destiny: Turning 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54), 第八章, “Pearl Harbor”, 第167—190页。

^[136] Frederick L. Schumann, *Night Over Europe: The Diplomacy of Nemesis* (New York: Knopf, 1941); *Design for Power: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1942)。

^[137] Edward Mead Earle, *Against This Torre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138] Ralph Ingersoll, *America Is Worth Fighting For* (Indianapolis/New York: Bobbs-Merrill, 1941)。

^[139] 兰德海尔1941年12月13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15.2, box 15。

^[140] 帕森斯1942年1月5日致哈特索恩函,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15.2, box 16。

的个案将由兰德海尔负责。法国由乔治·古尔维奇负责，当时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刚开设了法国分部，即“高等研究独立学校”（École Libre des Hautes Etudes），古尔维奇担任该学校下属的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 Études Sociologiques）主任。捷克斯洛伐克由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的康拉德·阿伦斯伯格负责，与他密切合作的是捷克流亡政府情报部门的沙弗拉内克博士。波兰的研究由哥伦比亚大学的西奥多·阿贝尔负责。阿贝尔原籍波兰，他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已来到美国。 <91>

不过，阿贝尔并不热心参与此事。2月中旬，帕森斯从默顿那里听说，阿贝尔觉得社会学完全没有能力处理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默顿致函帕森斯说，“他的意思，或许有些自抬身价，”

是说波兰、荷兰和希腊这类国家在被占领后一片混乱，谈什么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纯粹是徒劳无益、“不切实际”的问题。“那儿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结构了；完全乱套了。而且，说什么绝大多数人更希望过被占之前的日子，这种轻描淡写完全可以说是荒唐。”因此我不指望从他那方面得到任何密切合作。他只希望出去“干点实事儿”，比如想办法救些还在敌人手下的人出来之类。^[141]

在筹措研究资金方面帕森斯也不成功。1942年1月初，帕森斯联系哈特索恩，吸引他所在的机构对研究产生兴趣。哈特索恩当时供职于设在首都华盛顿的综情局心理处（Psychology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COI）。帕森斯劝说道：“毫无疑问，我认为一个负责对欧各国宣传政策的机构对这类研究几乎不可能没有兴趣”。^[142]然而，哈特索恩却未能说服综情局以官方名义资助研究，只不过被允许参与项目合作。^[143]

帕森斯也未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那里拉到赞助^[144]，甚至没能从自己所在的

[141] 默顿1942年2月17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2, box 15。

[142] 帕森斯1942年1月5日致哈特索恩函。

[143] 哈特索恩1942年1月23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2, box 15。

[144] 帕森斯1942年3月28日致约瑟夫·威利茨函；6月11日致罗杰·埃文斯函；11月18日致威利茨函，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2, box 15。

哈佛大学要到钱。他请求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暗示说综情局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可能支持或赞助研究，学校只需要给予形式上的核准。^[145] 信中他代表自己和现在希望联合发动研究的哈特索恩，作为捍卫美国哈佛小组国民士气委员会两主席，向校长指出：“我们觉得缺乏直接付诸实际行动的能力，因此我们的宗旨乃在于某种学术工作，利用自己关于那些国家的社会情势的社会学知识和思路，把任何有理智的实际政策都必然仰赖的某些主要因素搞清楚。”他从这个角度描述了研究的宗旨，认为德占各国“最适合广泛地理解相关方面的‘社会系统状况’。”至于具体的用途，“可以是以下实践领域，比如宣传政策、外交政策的整体方针，或许最重要的是有关战后安置的各种问题。”

<92> 二、展望如何处置德国

1941年，路易斯·阿达米克出版《双行道》一书^[146]，书中建议，德国的流亡者，以及过去数百年来逃离欧洲反自由政权的那些移民，应该在重建欧洲时以美国为楷模，以此来回报自己的新祖国。帕森斯对此不能苟同，于1942年3月致信阿达米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假定同盟国获胜，俄国也未能在中欧成为主导势力，

我们势必要在安置那部分世界时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但在我看来，如果正式的权威和责任是在所安置国家的本国人自己手上，成功的机会则要大得多。当然，有了纳粹这样一场暴烈的革命，这个事情会非常困难。或许问题正在于确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147]

他建议阿达米克，欧裔美国人主要应该担负救济之类的工作，而重建国家、（重新）民主化的责任应该由德国人自己来承担。原因有二：其一，德国人容易觉得受到羞辱，指责别人对其不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也势必会带来巨

^[145] 帕森斯致科南特的草拟函，未注明日期（大概是1942年3月上旬），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2，box 15。

^[146] Louis Adamic, *Two-Way Passag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1) .

^[147] 帕森斯1942年3月24日致阿达米克函，第3页，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2，box 16。

大的羞辱、幻灭和苦难。”而这

便意味着那些担负正式责任的人成为各种对抗和厌憎情绪的对象，有的情有可原，有的全无道理。比如魏玛共和，就是因为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觉得这个政权是被胜利者强加的，以胜利者为效仿成了它重大的缺陷。如果担负责任的人正是战胜国的公民，那我认为困难加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祖先的纽带并不足以克服这一点。^[148]

其二，是德国人对于美国人的偏见。

据我的经验，在德国，骨子里的立场是非常暧昧的。一方面，大多数德国人在我们面前有巨大的优越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很久，就表现在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谈论美国的物质主义、贪得无厌什么的。至少在我有所接触的那些圈子里，基本上都认为美国这块土地物欲横流，而德国则拥有高尚的精神价值。老有人说什么美国的爵士、广告等等粗俗的东西正在败坏欧洲。再加上德国国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羞辱感，对我们以庇护者自居的态度，对我们沾沾自喜于自己相对于他们来说坐拥巨大财富的做派，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怨恨。有关十四点和平纲领[“Fourteen Points”，指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结束时提出的战后和平解决方案。——译者注]之类的宣传，人们自然也很熟悉了。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的技术成就，人们还是真真切切地看重和仰慕的。但我很怀疑，这是否能够构成非常坚固的基础，足以克服产生怀疑、猜测和优越感的那些原因。^[149]

<93>

因此，德国社会的本性被纳粹体制搞坏了，纳粹倒台后自然应当恢复可以接受的制度结构。不仅如此，还需要对德国社会进行彻底重整，因为它还容纳了属于前现代的严重欠缺。

[148] 同上引，第4页。

[149] 同上引，第3页。

“前纳粹时代德国的民主体制与社会结构”这篇文章^[150]，最初是打算作为一章，收入一本与哈特索恩合著的关于德国的书^[151]，重点探讨德国传统主义的哪些要素使得魏玛共和的民主体制无法保持稳定：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在英国和美国之类国家最充分地得到大范围实现的那种“民主的”社会类型，更准确地说是“自由民主的”社会类型，是从一系列结构要素的复杂组合中发展而来的。其中有些要素是整个现代西方世界所共有的，而另外一些则在这两个国家尤显重要。与此相反，德国同时呈现出众多的相似与差异，令人困惑。^[152]

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二帝国与魏玛共和时期，德国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和科层体系的国家。然而，与美国之类的国家不同，德国仍然保留着强烈倾向于欧洲传统社会封建背景的土地贵族。这一点在普鲁士尤为突出，其容克家族为整个社会定下了军国主义的基调。“根据旧的德国宪法，军队并不属于国民政府控制，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军官团与整个容克阶层保

[150] “Democrac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Pre-Nazi Germany”, *Journal of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 1942, 第 96—114 页；重印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225—242 页。这篇文章是帕森斯应古尔维奇之邀，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新建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创办的杂志《法律与政治社会学》(*Journal of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上发表。借帕森斯邀请古尔维奇参加“被占国研究”计划之机，古尔维奇也获得了帕森斯的承诺，写些讨论德国的东西。耐人寻味的是，帕森斯在接受稿约时也提醒古尔维奇，不可能或不愿意接受什么编辑对他的文章动手脚：

对于篇幅和文体方面的任何编辑改动，或核查具体的事实问题，或考虑应当考虑而我却未能予以重视的问题的建议，我自然不会有任何异议。不过，我曾经有些不愉快的经历，编辑改动了我的文稿，却没有交给我本人审阅，在我看来里面有些行文大大改变了我自己的立场和分析。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必须确信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稿从所有根本方面来说都出自我本人的手笔，在我付出大量心血之后，我不能受制于任何压力，要对其社会学专业分析或政治立场做大的改动。

帕森斯 1942 年 2 月 20 日致古尔维奇函，参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5。

[151] 帕森斯和哈特索恩于 1941 年夏一起筹划此书，拟名为《德国社会结构与国民心理》(*German Social Structure and National Psychology*)。帕森斯在写给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维尔德的一封信中，概述了此书纲要，其第二章就是探讨前纳粹时代的德国。参看 1941 年 12 月 17 日帕森斯致维尔德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0。(但哈特索恩随后相继供职于综情局和参谋局，只要他留在政府机构，就不能出版学术著作。书的计划就此夭折。亦参下文第三章。)

[152] “Democracy and Social Structure”，引自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225 页。

持延续，其‘生活方式’高度独立，与一切被视同‘市民阶层’的东西水火不容，强烈蔑视工商贸易，……甚至强烈蔑视开明人文的文化。”^[153]

一方面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另一方面是封建式的传统主义的强硬势力，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对立，但德国文化倾向于注重基于正式等级和头衔的人际关系，从而调和了这样的对立。有鉴于此，他指出，“顾问(Rat)这一荣誉头衔分化成一大堆子阶层，就看具体所任席位是商务顾问(Kommerzienrat)、司法顾问(Justizrat)、医疗顾问(Sanitaetsrat)、财务顾问(Rechnungsrat)还是别的什么。”^[154]在这种文化中，女性绝不是什么影响式微，而是培育着一种以居家打理、相夫教子为核心的生活，甚至被抑制参与社区生活，除非在形式上符合其丈夫的等级和权威。

帕森斯接下来讨论的是，面对20世纪早期特别是一战之后的社会变迁压力，这种类型的社会是如何应对的。他指出，都市化、工业化之类进程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大量散漫漂移的侵犯情绪，趋向不稳定的情感主义，易被围绕各种符号象征的情绪化宣传诉求和情感调动所感染。”^[155]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进程在德国导致了宗教价值观念的世俗化，从传统的道德模式中解放出来，“出现了理性批判的总体趋势，撼动了传统保守的符号体系。”^[156]当然，诸如此类“解放了的”价值模式并非毫无问题。它们尽管说缔造了现代性精神，但也导致了解释性世界观的明显分裂，“这些两极化的态度模式往往都带有心理不安全感的标志，‘陷于武断’。两方面皆是如此：在被解放的一方，表现为倾向于强迫性地‘揭批’和否定，拒绝赋予一切传统模式以任何合法性成分；而在传统一方，则是对于一切进步的‘原教旨主义’阻挠，是怀着强烈情感态度的、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157]

在政治光谱的左翼，结果就是激进化。在魏玛时代，劳工运动过分依赖颇有些强迫性的理性主义，倡导面向未来的乌托邦诉求。而在政治光谱的对立一端，

[153] 同上引，第227页。

[154] 同上引，第231页。

[155] 同上引，第236页。

[156] 同上引，第236—237页。

[157] 同上引，第237页。

<95> 也弥漫着乌托邦主义，只是带有追忆往昔的倒退意涵。政治右翼宣扬的是逃避主义，远离深陷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灾的社会现实。激进的传统主义者将德国的使命浪漫化，期待不切实际的回到失落的帝国时代。在这幅局面中，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彷徨于两大对立阵营之间，茫然无助，最终在兴起的民众煽动浪潮面前败退失据。

帕森斯最后总结道：“德国基本制度体系的模式安排中的形式主义要素……似乎显示出比英美国家强烈得多的浪漫主义总体趋向。”^[158] 他再一次具体点明，是社会结构中的哪些方面使德国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甚至在纳粹上台前就是如此：“这类浪漫主义要素的存在乃是现代社会的内在性质。不过，只有通过前纳粹时代德国的社会结构中那些使其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特性，才能体会到，这些要素的实际表现注定会有这样的结构模式，会服务于这样一种运动。”^[159]

同样写于1942年的另一篇文章从更具一般理论色彩的角度，表达了帕森斯如何看待德国陷入法西斯主义，未来又如何疗治。1942年4月25日，他在美东社会学学会（Easter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发表主席就职演说，题目是“法西斯运动的一些社会学特性”^[160]，谈及三点：首先，社会理论最终必须理解如何探索对于文明的威胁这一论题：

无论孔德、斯宾塞或马克思之类笔下旧有的尝试如何有理有据，它们往往过于密切地纠缠着从科学的角度上看含糊可疑的宏大思辨建构、方法论假设和教条的成分，使得整个分析往往由于反对思辨理论的总体趋势而名声不再……在过去几年可能前所未有地强烈表现出，要确保社会科学中有希望具备一种能力，秉持彻底经验主义的尝试精神，将一般化的理论分析应用于此类问题，以促成理解的累积性发展……对一个伟大文明的状况作出诊断，该问题涵盖如此宽广，本身就强烈要求这样一种方法。^[161]

[158] 同上引，第239页。帕森斯赶在规定的8月1日截稿期限前完成了此文。古尔维奇复函祝贺他完成了一篇“令人震撼而意味深长的文章”，称之为“该领域社会学分析的佳例”。参古尔维奇1942年8月1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7。

[159] “Democracy and Social Structure”，第241页。

[160] 初刊于 *Social Forces*, Vol. 21, 1942, 第138—147页；重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203—218页。

[161] 同上引，第203页。

他明白，失范导致“容易受到某些运动的诉求的影响，这类运动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与法西斯主义属于同类”^[162]。这里讲的失范，就蕴含在工业革命期间经济上和生活世界中的诸多不稳定趋势（比如都市化、迁移等等）。面对这些力量，个体不堪“决定之累”，要在命运未卜的世界中控制自己的生活处境，往往会“被能够给他们一种‘特定成员资格’的运动所吸引，‘这个群体秉持富有活力的团体精神，服从某种强大的权威，具备严格的信念体系，个体就此找到一种方法，逃避了痛苦的困惑或者说失范的处境。’”^[163] <96>

接下来，帕森斯把重点放在了更为宏阔的“理性化进程”，比如工业革命时的情形。韦伯对于理性化过程作出了权威的分析；而斯宾塞和滕尼斯则指出，在新确立的工业世界中，契约主义是社会关系的标准，维持了个体的自由权利，同时“汇聚而不是分散了各式各样的权利，我们把它们合称为所有权”^[164]。由此推断，整个进程推动了科学与技术，并激发了基于功能角色专门性原则的私人专业实践和大规模组织。这些发展趋势尽管无疑都是积极正面的，但却产生了某种意外后果：“现在关注的并非这些不同领域里的理性模式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优越于它们想要取代的那些模式，而是它们比较迅速的发展进程与社会系统的功能运作之间的关系。”^[165]

关键在于，“理性模式”也可能导致普遍的失范。“要知道，它们的发展本身可能就是导致失范的最重要源泉”。现代化过程中所孕育的社会变迁使大众对于自己在生活中的安全前景失去了明确的引导，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盛行的局势使这些人投向了运动的怀抱，提供给他们一种令人重获确信的权威性世界观。其中一种运动就叫做马克思主义，以劳动为核心，视之为自我实现和福祉的支柱。但马克思主义依然包含了功利主义，因此不能给出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166] 另

[162] 同上引，第 207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63] 同上引；其中的引言取自 Theodore W. Sprague, *Jehovah's Witnesses: A Study in Group Integration*.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42.

[164]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第 208 页。

[165] 同上引，第 209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66] “随着……从‘经济个体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强调不同的因素，但‘功利主义’的认知模式在根本上保持不变，依然留存”，同上引，第 210 页。

一种这类运动就是纳粹主义，同样是要对抗所谓资本主义无力确保正义或平等。他解释道：“‘赢利动机’成为痛批的对象”^[167]，“不平等，失业，以及新式的不公平特权，现在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样反抗社会理性化的‘意识形态’，至少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方面。”^[168]

其三，文章分析了法西斯运动上台执政的事件。在权力易手的局势中，运动表现得像是拥有大众基础，因为事实上，不安定感使得大部分民众都倾向于通过反民主的组织来寻求稳定。不过，一旦法西斯主义者拥有了大批追随者，他们又会与大企业结盟。这样一来，他们又变得致力于实现高产出、高利润、防罢工等产业利益。帕森斯引用了德鲁克的命题：“法西斯主义的明确趋向就是动员经济以备战。”^[169]

那么，社会学该当何为？社会学有何可能帮助根除法西斯主义？他认为，“社会学的……分析……或许……将以谦卑的方式描绘一种方向，似乎有可能利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至少在思想上指引我们看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悲剧性的社会世界中某些广泛的特性。”^[170]

1942年5月21日，他在一次电台演讲中探讨了德国战败后的未来可能性。他的问题是：在德国未来的重新民主化的前景下，德国人民是否原则上应当被视同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在纳粹主义和德国人之间划清界限？他知道，纳粹运动已经暴露了“有着多么野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是多么残暴无情地不择手段增加自己的权力，不仅通过武力，也借助经济压力、宣传、外交上的阴谋诡计以及组织间谍队伍。”^[171]但德国人民应当免除罪责吗？可以免除罪责吗？

帕森斯具体论述到：“具有这类品性的德国民众，究竟是一旦有机会，他们就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蛮横专断的侵犯性，还是说他们也只是一小撮政治

[167] 同上引，第211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68] 同上引，第212页。

[169] 同上引，第217页。

[170] 同上引，第218页。

[171]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German People”，手稿上标注为“Radio Broadcast, WRUL, May 21 1942”，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0；重印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本句摘自第219页。有关类似话题，亦参 Albert P. Martin, “The Plain People of Germany”, *Yale Review*, vol. 29, 1940, 第461—483页。

冒险分子的无辜牺牲品？”^[172]帕森斯认为，这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既不能愚蠢地认为，“必须永久剥夺德国民众获得政治权力、承担政治责任的渠道，作为保持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也不能凭空谎称，“只要清除那些恶棍，就万事大吉”。纳粹的统治只是进一步激化了德国社会自19世纪乃至之前即已有之的一些特有趋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英主义，过度的科层做派，形式主义）。不仅如此，一战之后的社会解组与失范，通货膨胀，以及最终导致的1929年后的大萧条，都促使纳粹在魏玛共和国倾覆之后上台掌权。德国的感伤主义也为纳粹所谓“疗治一切社会疾苦”的预言添上了一份不适当的浪漫主义成分。就这样，“德国的国民性格和社会的深层特性”^[173]促成了整个国家沦为纳粹的牺牲品。

有鉴于此，帕森斯列举了五项“对德政策的大致建议”：（1）同盟国在消灭纳粹后，应当注重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定，最重要的是避免孕育德国人的不公正感，从而激起新一轮的激进主义；（2）要避免对于军管政府的任何“非德国人”的印象；（3）要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念，采取坚定的道德立场。军管政府在谴责罪行<98>的时候，既要看到纳粹的实际所为，也要看到普通大众的纵容，这样才能加深羞耻感和罪疚感，有助于最终的重构；（4）容克阶层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必须彻底根除；（5）最终，德国人将彻底不可能再以浪漫化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国族。^[174]

在WRUL电台演讲的最后，他大胆建议：“最激进的解决方案是让德国人民不再作为……一个（争夺权力的）单元，而是纳入一个更大的单元，比如某种中枢性的欧洲联邦。”^[175]

当然，有关德国未来的争论并非以此为始。早在1941年11月，哈佛史学家西德尼·费伊就已经在其协助创刊的《当代史学》首期上呼吁，“不应解散德国”^[176]。他警告道：“对战败的德国强加一种解散国家的处置，会让绝大多数反对希特勒及其疯狂军国主义的最可贵的德国爱国者深陷痛苦。”^[177]他转而建议，

[172]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German People”，第219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73] 同上引，第222页。

[174] 同上引，第223—224页。

[175] 同上引，第224页。

[176] Sidney Fay, “Germany Should Not Be Dismembered”, *Current History*, vol. 1, November 1941, 第12—15页。

[177] 同上引，第12页。

“如果建立一个联邦德国，由一批大致平等的州组成，大权在于联邦政府，有些类似于魏玛宪法的宗旨，也不算时光倒流很远。它将能满足大多数信奉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德国人，只要他们不受到某种不公正感的刺激。”^[178]

三、“宣传与社会控制”——早期的模式变项图式

1940年开始，罗斯福政府即有政策认为，应当有一家全国性的宣传机构来协调美国士气，大力倡导民防。^[179]1941年夏，资情局(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成立，9月又成立了综情局，以对抗德国在当时还限于欧战的进攻中所使用的心理战。但是公众对于这两个机构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满怀疑虑。有论者认为，问题在于，回头看来，美国在一战中的宣传效果基本是负面的。^[180]1941年夏，国会觉得迫切需要说服公众了解国家的使命，协力备战，于是同意设立一个情报部门，兼负责宣传。

1942年6月，战情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成立，部分取代综情局^[181]，其职责是广泛收集战争以及各交战敌国的情报。它的宗旨并不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说服，而是以所谓“实情战略”(a strategy of truth)为指导原则。^[182]这种策略值得关注，在与公众交流时，设定每一个成年人都会有自主思

[178] 同上引，第15页。这里指的是Edwar Ansell Mowrer, *Germany Puts the Clock Back* (New York: Macmillan, 1933)。1933年下半年问世的这本书读者甚众，真实描绘了纳粹如何侵害公民权利，破坏民主制度。费伊读了帕森斯的“前纳粹时代德国的民主体制与社会结构”一文后表示，“对此我相当赞同”。参看费伊1942年11月26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7。

[179] 参看Richard W. Steele, “Preparing the Public for War: Efforts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Propaganda Agency, 1940—194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5, 1970, 第1640—1653页；以及Allan M. Winkler, *The Politics of Propaganda: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2—1945* (New Haven, Con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尤其是第1—7页。

[180] 参看这一点上引用的一项研究，Harold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New York: P. Smith, 1938)。

[181] Executive Order 9182, “Consolidating Certain War Information Functions into an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June 13, 1942; 据 *Federal Register* (June 16, 1942): 第4468—4469页。

[182] 时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资情局局长的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1942年3月19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致力于民主、自由与人权发展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译者注]的成立晚宴上最初使用了这个说法(Winkler, *Politics*, 第13页)，并在公共演说和报章评论中被广泛引用。麦格利什后任战情局处长。

考的能力，以此来启迪公众，诚可谓史无前例。政治学家弗里德利希 1943 年初在《舆论季刊》的一期专辑上发表“信息战略问题”一文，分析战情局的原则与政策，强调政府的声明需要以实情作为理想标准。“实情战略”表明了涉及公众的有关措施的正当理据，在战争情势下，只要可行，对于一切事实几乎是完全披露。弗里德利希认为，如果政府不对自己的民众撒谎，这样的民众最愿意也最可能自愿付出牺牲，为击败敌人这一共同目标而奉献。弗里德利希写道，如果说有一种信息战略，在协助后方战线的同时还能伤害敌人，那就是“广受欢迎的‘实情战略’，或‘实情宣传’。最高层领导宣称，这是民主体制在宣传战中的武器，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来对抗极权主义话语、口号、词语象征的狂轰滥炸。在保全人类清明心智的伟大斗争中，实情可以说将为我们而战。”^[183]

战情局的约翰·佩里在分析“民主体制的战争宣传”时，将宣传与民主都联系到所预见的战后和平来谈。他提到了爱莉诺·罗斯福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侄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联合国外交家，人道主义活动家。——译者注]，在这位公众人物身上，维系着求真和实干的精神：

罗斯福夫人在最近一篇专栏文章中如此说道：“我希望，在今日之每一家工厂，每一座军营，年轻人们都在谈论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想要建设怎样的一种世界。”这样的自觉意识将表现为战时产量，表现为战斗力，表现为后方国防。——这一切能够通过宣传来实现吗？如果是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宣传只是从政府流向民众，以强力为后盾，不承认任何回应或异议的权利，那就不可能实现。而在民主体制下，宣传的宗旨并不在于“塑造”舆论，或为一小撮官僚政客的某种既定规划赢取大众支持。只要人们可以自由获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与想法，有权利自己讨论，形成自己的结论，这样的宣传就会获得成功，不过仅仅是局部的、暂时的。而政府的宣传曾经被、现在也可以被用来激发群体讨论。信息、资料和观念可以通过语词、表格或图像来表达，通过某些渠道来传递，最终将它们带入农民、工人、家庭主妇和年轻人的言谈中。……这样一种武器是轴心国永远无法拿来对抗我们的，它的力量与胜利已经载入了各国的史册。它是一

<100>

^[183] Friedrich, “Issues of Informational Strateg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7, 1943, 第 78—79 页。

种令人惊叹的力量，是自由的人民奉献牺牲的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勇毅。自由的人民万众一心，靠的是共同利益的纽带，而不是专制暴君的统治。^[184]

帕森斯在 1942 年夏天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宣传与社会控制”一文分析了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其一，宣传类型的变化，以捍卫民主，预见战后世界对于法西斯主义社会的重新民主化。其二，需要一种概念图式来区分民主体制下的规范行动与威权主义社会下的强制遵从。

问题首先在于，德国与日本为何会变成富于侵犯性的强权，而美国却没有。有一种解答认为，轴心国已经沦为侵犯性的大众运动的牺牲品，其领袖们攫取了所在国的政府，成功地粉碎了一切抵抗。与此同时，美国依然是一种民主体制。但这种解答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轴心国的民众在界定其所处局面时，是如何认为，只要选举带有犯罪性质的冒险分子上台，并使政权迅速变成享有无上权力的政府，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回答是：宣传使得他们不再相信自己原有的正误观。某种特定的宣传促使他们采取了反民主、反人道的意识形态，他们觉得有义务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否则就会遭到指责，对自己处于困境中的国家缺乏坚定支持。这又引出一个问题：这种策略为何在美国不会起效呢？有一种回答是：由于没有德国在一战后经历的那种程度的国民羞辱感及其后的经济混乱，美国的“散漫漂移的侵犯性”也不那么严重。话又说回来，即使在美国，出于眼下一定程度上的不安全感和解组趋势，也盛行着某种“散漫漂移的侵犯性”，所以问题乃在于，为何其效应不是那么剧烈。答案就在于，美国人往往会为别人打气，而不是泄别人的气。美国人的心智状态和生活方式有时候看似天真乐观，甚至简单幼稚，但也证明会对民主体制发挥保护效应。帕森斯建议，不妨精心应用这种倾向，通过“巩固型宣传”（propaganda of reinforcement）来支持应战。这种真实披露信息的战略往往能够使人们更好地意识到朝野上下的各种积极有益的趋势。这类宣传能够重视人的权利和尊严，认清理性和理智，但不斥责别人的情感和个人感受，对宪政分权作出说明和强调，从而让公民人人有义务共担责任。

^[184] 引自 John Perry, “War Propaganda for Democr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 1942, 第 443 页；类似说法，参看 William Garber, “Propaganda Analysis - To What En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8, 1942, 第 240—245 页。

作为一篇社会理论的文章，此文分别就宣传的类别和社会控制的类别作出了两种区分。宣传包括两种失范的类型[革命型、揭批型(debunking)]，一种适合整合社会的类型(巩固型)。与此类似，社会控制也包括标志着失范的强制型和属于整合社会的自愿型。

整体而言，宣传就是一种“努力，无论其所针对的对象是否清楚要对自己做什么，这样的宣传是要试图改变其‘立场’或影响其情境界定。”^[185]宣传是“一种通过诉诸行动中‘主观的’、非情境性的方面来控制行动的重要机制，当然，不一定是为了遏制偏离趋向，倒很有可能是推波助澜。”

三种宣传类型中有两种属于失范或威权主义。帕森斯写道：“其中之一所以称为‘革命型’，是想要让人们‘皈依’到某种新的价值模式和情境界定，与现有基本制度结构及其相应价值和界定的根本特性存在显著冲突。”^[186]而“宣传的第二种基本类型是‘破坏型的’[原文此处为“disruptive”，和上文的“debunking”不一样。——译者注]，其宗旨并不在于说服人们接受另一套价值和情境界定，而是破坏他们对于现有制度体系本身的依恋。”

第三种就是“‘巩固型’，就是增强对于社会的基本制度模式和文化传统的依恋，有条不紊地制衡不容小觑的现有偏离趋向。”^[187]

所有这三种类型都关系到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旨在对整个社会的情势给出特定的界定。在此背景下，宣传逐渐演变成社会控制。在社会控制的两种类型当中，一种是强制型的，一种是自愿型的。

大体上，社会控制包括“可以实施‘压力’来控制行为的两种渠道，至于控制机构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为之，与眼下的考虑无关。”^[188]

法西斯式的强制型控制乃是基于不切实际的情境界定，常常带有极权主义的意味。比如说，作为一个有着真正非理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的社会系统，德国实施的是强制型控制，以偏执狂般的歧视作为无中生有的正当性理

[185] Parsons, “Propaganda and Social Control”, 见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249 页; 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86] 同上引, 第 267 页; 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87] 同上引, 第 268 页。

[188] 同上引, 第 249 页。

由去进行迫害。“犹太人”被视为方方面面的德国命运之源，杀戮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在纳粹的体制中仿佛成了合乎逻辑的结论。精神的疾病和犯罪的行为，这些形式的偏离在党的精英和党卫军那里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同样，成千上万的党员，甚至普通平民，面对放逐或杀戮，要么亲自参与，要么默然认可。犯罪行为 and 病态立场融合在一起，导致了迥异于自愿型控制这一逻辑的“态度和情境界定”^[189]。

耐人寻味的是，通过强制确立社会控制的那些偏离的社会系统，哪怕表面上看来有明显的“紧张和解组因素”^[190]，却不容易解体。相反，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机制会将它们紧紧维系一体，让相对于西方现代工业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法西斯替代道路”^[191]趋于稳定。而在民主框架中典型的自愿型社会控制乃是基于弗洛伊德人格学说中的自我，意味着交互性：“一方面，或许诉求的是精神分析学者所称的‘现实原则’，而机制的运作却是通过实际或潜在地变更人们行事的情境。”^[192]

这类社会建立在普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交互性原则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制度上确立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所具有的功能中，无疑包括这一潜在功能。这些模式为其他人提供了恰当的刺激，防止他们采取偏离太多的行为趋向。”^[193]在这类社会中，正常性/规范性 (normality) 盛行，或是通过医疗等制度/机构重新确立。

帕森斯透过医疗实践来看与他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促进有利于集体或共同体的互助服务行动的制度模式。^[194]他的说法是，事实上，自由社会中的

[189] 同上引，第 260 页。

[190] 同上引，第 261 页。

[191] 同上引，第 274 页。

[192] 同上引，第 249 页。

[193] 同上引，第 251 页。

[194] 如前所述，芝加哥哲学家兼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在其经典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中，以医生扮演他人角色为例，刻画了真正的民主社会的意涵。米德点明，当一位医生以无利益关涉的方式照料其病人，作为一名专业人员做自己的工作时，就是在实践一种民主的态度。米德认为，“从功能意义上来谈平等是可能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这样的平等就不能带有像宗教态度那样深切的感受，在自己的自我中认识到他人。一名医生要是能够通过自己精湛的技能拯救某人的生命，也就可以从他所造福的那个人的角度来认识自身/实现自身 (realize himself)。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这种功能性的态度不应该表现为在他人身上认识/实现自己的自我。” George Herbert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ocial Behaviorist*, 第 288 页。

医疗实践正是自愿型社会控制的典型体现，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克服偏离的重要渠道。医疗实践一方面将患者与周遭环境暂时隔离，使他们变得无害；另一方面又以特定的方式处置他们的偏离，以使患者重新能够履行其社会角色。通过这两个方面，医疗实践有助于患者的康复。

而透过有关医疗专业如何有助于将人重新整合到其社会世界的这种说明，也可比对一个偏离的国族如何能够转型进入一种民主的社会秩序。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说明这种前景的时候，帕森斯提出了模式变量的雏形。医生作为自愿型社会控制的代理者/行动者(agent) [有意思的是，这里的“agent”与“patient”（患者），在语言学和形容词用法上，恰好也是施动与受动、主动与被动的对立关系。——译者注]，典型地体现出帕森斯所区分的行为规范取向的三个向度：普遍主义、功能专门化和情感中立。正是这三个特征，界定了现代民主社会中具有较高声望的某些角色，被普遍视为是值得追求的。他提议用这三个特征来说明民主框架中典型的行动取向与威权框架下有何不同。 <103>

他甚至以医疗实践为范例来阐述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服务使命。医学等领域的学问，特别是人文学，以大学为基地。而“大学，简言之，正是西方理性、自由的伟大文化传统首要的正式承载者。”^[195] 大学中的学术自由让社会科学家（也是承担其专业角色的有固定教职的教授）对危机中的社会担负责任。社会学家通过持之以恒地求取客观知识，有助于民主社会的不懈自卫。因此，社会学家可以在大学固定教职的保护下，通过负责任地运用其知识，服务其社会，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宣传的轰炸和强制型控制结构的诱惑。

帕森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了医疗实践，解释德国和日本为何成为富于侵犯性的国家，而美国却没有。他就此提出了一种可供效仿的观念：西方社会如何能够为德国或日本的康复充当某种“社会化代理人”：

本文的主要命题在于，西方社会的结构就其与社会控制的功能之间的关系而言，可以非常好地接受有条不紊的巩固型宣传，成为控制的代理机构。正如医疗关系中有条不紊的心理治疗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扩展了医

[195] “Propaganda and Social Control”，第 262 页。

生角色结构中固有的功能要素，那么在社会层面上，巩固型宣传也不过就是扩展了既有制度模式中许多自发然而潜在的功能。^[196]

“宣传与社会控制”一文于1942年11月发表。此后两年，帕森斯未曾撰写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学术分析。直到1944年，他才重拾此题，具体预测德国的(重新)民主化问题。

他暂时放弃了反抗纳粹的社会学工作，当然，政治上的努力还在继续。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1942年下半年出版了一本书。弗朗兹·纽曼的《比希莫特》一经问世^[197]，当时的许多研究顿显老旧。帕森斯虽说不接受其分析框架，但还是愿意采纳其结论。纽曼此书题名借自霍布斯的第二部书，后者大约写于17世纪60年代，1889年才被重新发现。霍布斯为世人周知的《利维坦》一书初版于1651年，当时奥利弗·克伦威尔主导的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政府刚刚取代了英国王室。《利维坦》集中探讨表面的威权主义政制下主权者被赋予的合法性的假象。而霍布斯的《比希莫特》则集中探讨那十年的最后两年，即克伦威尔死后彻底的无法治状态[克伦威尔于1658年去世。——译者注]，把不存在的“政府”比作史前巨兽。

纽曼以17世纪50年代后期的混乱年代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状作类比，重点考察纳粹德国国家权威的衰亡。他认为，继之而起的，是权倾一时的四大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权力集团彼此倾轧，但最后形成联盟，以史无前例的总体性压制民众。它们是与容克贵族关系密切的(普鲁士和帝国)的高级官员；纳粹党各级官员；军队；以及垄断性大产业。纽曼认为，大众之所以接受这样混乱纠缠而普遍渗透的统治，所谓“大德意志帝国”的意识形态[“Grossdeutsches Reich”，即生存空间说，德国式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眼

[196] 同上引，第269页。

[197]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两年后，纽曼积攒了许多新证据，为自己的思路确立了修改后的概念框架，增加了一百页的附录，出了第二版，改题为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纽曼本人于1942年夏加入参谋局中欧处，也就为书的增订创造了条件。参看 Barry Katz, *Foreign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942—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里，这种统治建立在种族帝国主义学说的基础上，他把这种学说视同为以某种极权主义种族概念为基础的“日耳曼帝国主义”。纽曼揭露道，希特勒成为这个“领袖国家”中的克里斯玛型领袖，其克里斯玛魅力来自“血统纯化和反犹太法”的理念。^[198]因此，德国的社会乃是建立在杀戮和渴求救赎的辩证关系之中。德国的四大权力集团深陷于对总体主宰地位的致命争夺之中。

帕森斯立即接受了纽曼的诊断，并将其应用在1944—1945年间自己讨论德国的下一篇论文中。1942年末、1943年初，他确信，指望法西斯主义土崩瓦解的时机尚未到来。然而，纽曼的分析却有助于说明，彻底无法治的社会实体（无法治这个提法是弗里德利希在1943年首创来分析纳粹治下的德国的）尽管已经陷入无法否认的失序，亟须补救，为何还能继续下去。

1943年春，阿尔波特的一名研究助理，来自波士顿大学心理学系的A. 戈德斯坦女士，要做一项非正式的舆论调查，问了帕森斯以下两个问题：（1）晚近的军事失败（北非的阿拉曼战役、俄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否会毁灭德国民众对于纳粹的忠诚？（2）希特勒或纳粹党的受欢迎程度是否会就此衰落，从而很快加速德国的溃败？帕森斯的回答是不，并提请其注意战争情境下的强制型结构。

对于纳粹的忠诚是否会因军事挫败而衰减？帕森斯承认，产业工人和宗教界人士最容易产生反法西斯主义的情绪，乃至付诸行动，从而削弱“德国的士气”^[199]。但他认为，“基于结构性的原因”，中产阶级、青年和妇女，这些人在过去“最容易受到狂热的纳粹诉求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不安全感特别显著”，如今也不会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判断情势，无论其生活已经变得多么艰难。这些人已经获得了“纳粹政权下的既得利益”。军队也是如此，只是原因不同。他强调说，军队会效忠政权，哪怕只是因为德国军队的传统不允许屈服，叛乱意味着“日耳曼事业本身的荣誉，尤其是军官的荣誉，乃是利害所在”。

<105>

就戈德斯坦的第二个问题而言，帕森斯同意，纳粹党对于民众的控制正在减弱。

[198] 这三则引语分别取自章或节的标题。

[199] 帕森斯1943年3月29日致戈德斯坦女士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9；以下六则引语均摘自同一处。

不过他又说：“现在支撑士气的主要情感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国族主义，是与民族团结相维系的东西。这是因为，要拯救目前的情势，除了继续打下去，很难看出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这么说，指的是德国人之所以迟迟不愿推翻纳粹，这些罪行恰恰提供了一种悖谬的理由。他写道：

对于战败的后果的恐惧角度来诉求民族团结，这样做之所以富有成效，有一个人人们不自觉的潜在因素：由于过去整整十年间发生的种种事件而逐步积累的罪疚感。这一点似乎有大量例证，纳粹在国内的倒行逆施是如此，开战以来对付被占国的做法就更是如此。不过，就眼下的情势来说，要想直接揭露这一点，还面临着重重阻碍，表现为心怀忧虑，或许对战败的后果夸大其词，担心胜利者可能有的打击报复。

第五节 迎接欧战胜利日

一、关注再教育

1942年12月29日，副总统亨利·A. 华莱士发表全国电台讲话，题为“战后内政外交”。此前，11月15日，在庆祝菲律宾共和政府成立七周年的电台演说中，总统罗斯福提到了战后重建问题。而这一次，华莱士的整个演讲谈的都是这个问题。他如此评论德国人：“德国人民必须学会忘掉 (learn to un-learn) 教给他们的一切，不但是希特勒教的，还有过去一百年他的前辈教的，那么多哲学家和教师，那么多铁血政策的信徒……我们必须以民主体制为目标，对民众进行去教育和再教育……欧洲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改变德国人的心态。必须教会他放弃数百年来古老观念：他所属的种族是主人种族。”^[200]

当时的核心词是再教育。有些教育学家致力于讨论相关的实际问题。有人建议，把教育战后德国的努力放在国际框架中，以避免单纯照搬美国自己的民主

^[200] 电台演说，华莱士谈“战后内政外交”（“Postwar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刊于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9, 1942)。

立场。沃尔特·M. 科奇尼希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提议在酝酿中的联合国组织中附设常设性的国际教育署（International Office of Education）。不过，他警告要摆脱福音传教的姿态，“如果我们彻底清除了救世主情结，我们的教育重建工作就会富有成效。如果我们学会与其他国家协力合作，而不是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就会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201] <106>

哈佛大学的O. 霍巴特·莫勒提出了二十个“有待提出和解答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都关系到如何有效地进行德国转型的教育。莫勒与捍卫美国小组讨论了这些问题，然后扩充成一篇文章发表在《变态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下面就是他在草稿中提出的其中一些问题：

- (2) “自由”这一理念应当在何等程度上关联着责任与约束？……
 (4) 正规教育能否有效地抗衡糟糕的政治经济状况？…… (6) 各国公民应当在何等程度上清楚地了解，移置作用（“displacement”，即寻找替罪羊机制）被作为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来使用，遮掩了受挫和失败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7) “个人安全感/人身安全”是否既有赖于个体被社会化的方式，也有赖于被归为四大自由[“Four Freedom”，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1月国情咨文中对于世界性的社会和政治目标的概括。包括言论与表达自由；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之忧的自由；避免恐惧的自由。——译者注]之类的环境因素？…… (9) 识文断字及其他教育成就指标与政治智慧和自治能力是否有关联？(10) 能否说民主属于价值问题，而科学属于事实问题，或者说价值问题必须确立在威权主义的理据或形而上的理据上？…… (12) 作为“服务”而非“控制”的行政管理观念如何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而是扩展到学校？…… (15) 在民主体制下的和平时期经济中，如何能够实现法西斯和战争曾经带来的令人兴奋的心理效应和社会效应（充分就业、降低群内竞争等等）？(16) “适者”生存是否只能通过竞争达成？合作是否可能是一种更为有力的手段，确保安全感、生产力和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 (18) 教育工作者如何能够最为有效

^[201]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42); 亦参 I. L. Kandel and W. M. Kotschnig, “The Messianic Complex”, *School and Society* (February 6, 1943)。

地与精神分析学者、社会工作者、新闻记者、律师及其他专业群体协力合作,实现重建的宗旨?(19)是否应当向受教育者灌输民主理念,或者说,民主的灌输是否从其措辞而言就是自相矛盾的?(20)教育技术和目标可以从哪些新的方面,针对战争所带来的特别机遇作出调整?[202]

<107> 莫勒开列的问题所关注的主题,在1941年之后,涉及三门学科对于战后前景的讨论:心理学、精神病学和政治学。

1943年,心理学家勒温——他也是一位流亡者——撰文讨论德国的“文化重建”[203],以及“德国的特殊个案”[204]。1939年以来[205],他一直主张德国人从未学会如何选举领袖,也未学会如何通过群体合作实现某项任务。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德国人所知道的群体结构,要么是威权主义的,要么是自由放任的,实际上需要去学习什么是民主的结构。[206]勒温写道,美国对于德国再民主化的贡

[202] O. H. Mowrer,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in Making and Keeping the Peace”, 为捍卫美国小组国民士气委员会会议准备的讨论草稿。草稿可能写于1943年1月,收于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45.4, box 1。莫勒在当时的分析中开列了用来回答这二十个问题的知识,提到的参考文献包括(1)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Rinehart, Winston and Holt, 1941); Harold Lasswell,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原文如此,两份文献同列一款。——译者注](2) William Temple,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42); (3) Alfred D. Simpson et al., *Schools of the People: Report of the Barrington Surv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1943); (4) Gustav Bychowsky, “Psyc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Post-war Europe”, *New Europe* (August 1942); 以及(5) Clarence Leuba,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August 1942)。莫勒的文章修改后刊载于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1943, 第174—182页。

[203] Kurt Lewi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1943, 第166—173页。

[204] Kurt Lewin, “The Special Case of German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7, 1943, 第555—566页。

[205] 例如可以参看 Kurt Lewin、Ronald Lippitt 与 Ralph K. White 合撰的 “Patterns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Experimentally Created ‘Social Climat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1939, 第271—299页。

[206] 他引用了 Alex Bavelas, “Morale and the Training of Leaders”, 收于 Goodwin Watson 所编 *Civilian Moral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2), 第143—165页, 但同样提到了 Alex Bavelas 与 Kurt Lewin 合撰的 “Training for Democratic Leadership”,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7, 1942, 第115—119页。勒温作为曾经担任柏林大学教授的流亡者,具有双重文化属性,因此捕捉到了德国群体态度和意象中关键的匮乏之处。

献之一，除了政治变迁，就是在战后德国他所谓的自我再教育中，通过德国人与非德国人（比如美国人）之间的协作，推动文化变迁。勒温希望，对于民主式的群体生活的体验，能够推动“自我再教育过程”。^[207]

精神病学这方面的主题，在1943年也是举国关注的一项话题，就是德国的偏执狂这一文化倾向。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家理查德·A. 布里克纳基于精神病学的观点，认为典型的德国文化反应模式与偏执性精神病有明显的类似之处。^[208] 布里克纳^[209] 与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合作（后者帮助他了解文化价值、家庭结构和整体人格倾向之间的关系），集中探讨了德国政治与文化中的四点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诊断。他大胆提出，在群体层面上，德国人的世界观类似于偏执狂患者的感知，针对某种假想敌而捍卫自己的幻念，哪怕需要通过杀戮。这四点特征是：（1）自大狂，即夸张地觉得负有拯救世界摆脱疾苦的使命；（2）对于德国领袖地位的不容辩驳的需求；（3）受迫害的情结；（4）追怀往昔，罔顾事实（神秘化），比如普遍相信，德国在一次大战中并非战败，而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建立“非德国化”的民主体制，德国挨了“背后一刀”。

那么能做什么呢？布里克纳的说法是，精神病学能够证明文化人类学的发现，<108>即国民性格与先天基因没什么关系，而有赖于文化背景。他知道，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再教育已经成为治疗偏执型精神病的最成功的办法。对于《德国还有救吗？》这本书的题名，答案就在于：再教育是让战后德国皈依民主的一条希望之路。再教育可以克服德国的偏执狂文化倾向。在盟国的保护下，“德国群体”的民主要素或“清白的”要素可以成为战后德国最终迈向民主化的出发点。^[210]

[207] Lewin, "Special Case", 第566页。

[208] Richard A. Brickner, "The German Cultural Paranoid Trend",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12, 1942, 第611—632页。

[209] Brickner, *Is Germany Incurabl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43)。

[210] 关于布里克纳的书取得的巨大成功，详参 Gerhardt, "Re-Education als Demokrat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Deutschlands durch das amerikanische Besatzungsregime", *Leviathan*, vol. 27, 1999, 第355—385页，尤其是第364—368页。

政治学方面则有不同的观点。“德国民众与战后世界”一文^[211]分析了民主统治结束前的选举统计数据,发现大多数德国人从未投纳粹的票,或者说,事实上从未投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的票。这就意味着,一旦摆脱了纳粹的统治,德国人通过大众投票,还会转向民主的、非民族主义的政党。弗里德利希在《凡人新信念》一书中提出^[212],民主体制自身就有强烈的魅力,是迄今人们创造的最具人性的政府管理形式。未来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军管政府引入民主。“从战时法律的角度来理解它,它将有可能在已经被剥夺了自治的初始条件的土地上重新确立法治。美国军管政府这样重新确立起的将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将会大大有助于重建世界上被奴役各民族的自我治理。”^[213]

弗里德利希 1943 年到 1945 年担任哈佛的海外管理学院院长,与帕森斯合作,协助准备德国的民主重建。在培训未来军管官员的项目的筹备阶段,帕森斯为 1943 年 2 月 11 日项目管委会首次会议(会议纪要存于哈佛大学档案馆)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即“社会学对于拟议中的军管培训项目可能有的贡献”(“Memorandum on a Possible Soci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Proposed Training Program for Military Administration”)。^[214]在概括社会学对培训未来军管政府官员的作用时,他又提到了自己的“被占国研究”,还想寻求资助。他还引到了自己在哈佛教社会学十多年来积累的有关美国和欧洲多国社会结构研究的素材。
<109> 备忘录主张,在适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筹备军管政府:“研究项目要富有成效,就应该从共同的概念图式出发,研究一系列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以促进系统性的比较研究。”

在海外管理学院的筹备期,帕森斯担任其管理职员,并从一开始就成为教员。两个月后,他就任外国地区和语言项目中欧子项目筹委会(Planning Committee

[211] Sydney L. W. Mellen, “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Postwar World. A Study Based on Election Statistics, 1871–193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7, 1943, 第 601—625 页。此文属于设在哈佛的海外管理学院分区专训项目(Area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 of the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的指定阅读材料,帕森斯 1943—1944 年在这个班上授课。

[212] Friedrich, *The New Belief in the Common Ma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42)。

[213] Friedrich, “Military Government as a Step Towards Self-Rul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7, 1943, 第 541 页。

[214] 帕森斯的备忘录现存哈佛大学档案馆, 索档号 UA V 663.8, box 2。

of the 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Program, Central European Program) 主席, 人事教学两头挑。

他的讲课题目如下：欧洲的制度结构（七讲）；德国的大学；自由职业在德国的地位；新教教会与天主教教会；纳粹德国的新闻业；德国的公共集会；反犹太主义（三讲）；人际关系礼仪；商贸礼仪与公务礼仪；家庭习惯；权威的社会特性和心理特性；（人际关系中）权威的特定角色；纳粹胜选原因（两讲）；德意志民族及其性格；意大利的家庭、传统与习俗（与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合讲），等等。^[215]

他还和克拉克洪合作，准备一项关于德国和意大利家庭体制的研究，并结合被占国军管问题的考虑。^[216] 拟议中的研究项目打算解答如下问题：“（1）丈夫和妻子各自的角色是什么（包括家庭内部以及对待外人，结合考虑权威、主动性和预期的相互态度）？尤其是，赋予妇女的独立和责任范围如何？有何限制？……（7）家庭忠诚的哪些情感可能最容易被不理解当地情况的外国人所扰乱？”^[217]

方案的一个部分题为“实际效用”，草案中有这么一段（并附带明确指出，“此类知识无疑对军民两方官员皆极为实用”）：

比如说，如果要实行食物供给制或配给制，关键就要了解，哪些群体一般会共用其资源，哪些个人习惯于负责此类事务。公共关系方面也需要考虑与家庭有关的特殊情感。惩处罪犯对于不同的犯罪者所产生的影响大为不同，就看他处于亲属关系网络的什么环节上。任何项目只要涉及青少年，就需要考虑到有关家长监管权限的传统观念。尽管在这个国家里，或许完全可以在不直接联系父母的情况下管理好学校，但在另一个国家里，确保父母的直接合作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大体掌握习惯上具有权威和影响的位置，是提高管理效率的必要前提。能够建立起作为整体的国族的

<110>

[215] 详参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材料，索档号 HUE 67.143.75.5。

[216] 方案未获批准。1943年9月28日，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约翰·D. 布莱克致信帕森斯，确认后者已经撤回申请，但也表示委员会无人同意该项目。

[217] “Research Project for the Study of the German and Italian Family Systems”，帕森斯与克拉克洪呈交的研究方案，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9, 第2—3页。

某种凝聚力，自然会简化管理者的任务，也会对更为广泛的有关整个民族的政策问题产生不容小视的影响。比如说，可以就此预测对于各种类型的宣传诉求的不同反应。^[218]

1943年7月，纳粹占领了打算与同盟国停战议和的意大利。新的战线就此开辟，盟军经由西西里岛攻入意大利。哈特索恩当时任职心理战处，加入审讯德国战俘的小组，先在阿尔及利亚，后至意大利战场。他在给帕森斯的信函中提到，德国战俘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冷漠和驯顺。^[219]

曾经给帕森斯做过助教的某人，当时正在一座战俘营里工作，参与了一个教授德国人民民主的态度立场与组织方式的项目。帕森斯在写给他的一封信里明确指出，“我们需要大量冷静客观、切合实际的思考。”他具体解释了自己的想法：

在我看来，欧洲社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从几乎各个方面都显得令人满意，这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个人觉得，秩序与安全将不得不成为基调，我们不能只是推行什么宏大的人道主义理想。如果再加剧令人恐惧的解组失序，就注定会造成在欧洲的每一项重要举措都不得不仰俄国人之鼻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养成这样一种念头，觉得我们是要往那里引入一个乌托邦。^[220]

二、“战后德国”

1944年3月29日，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Orthopsychiatric Association)、国际防治癫痫病联盟美国分部(American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美国精神缺陷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ental Deficiencies)、美国神经病学学

[218] “Research Project”，草案，打字稿，第3页(在正式呈交哈佛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方案中，这一段被删去了)。与本段所探讨的内容相关的一些话题，参看 Katherine Thomas, *Women in Nazi Germany*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43)。

[219] 参看其通信，收入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11。

[220] 帕森斯 1944年2月15日致查尔斯·O. 波特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15。

会 (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精神分析学会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美国心身问题研究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Psychosomatic Problems) 组成的战后计划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Post-war Planning), 邀请帕森斯参加“战后德国问题研讨会”。会议旨在“从文化的角度而不单单是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德国情势, 采纳具有心理学取向的学科所能提供的深刻见解, 包括人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某些分支”^[221]。

此次会议由精神病学家布里克纳组织。^[222] 布里克纳在会议筹备申明^[223] 中提议讨论以下三项议题, 并邀请各正式与会者、顾问和其他人士在会前提交书面意见:

- 一、德国文化对德国民众有何影响?
- 二、德国民众对战败预计会有何反应?
- 三、可以利用哪些方法和步骤来确保对德国民众进行再教育和再文明化 (re-culturalization)? 美国人能否……对德国执行某种矫治方案, 尤其在其愤怒渐息之后?

[221] 劳伦斯·K·弗兰克 1944年3月29日致帕森斯函,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10。

[222] 在受邀正式参加会议的名单中, 有精神病学家劳蕾塔·本德尔、卡尔·宾格、阿道夫·迈耶及道格拉斯·A·索恩, 神经病学家弗雷西·J·普特南, 临床医生阿尔文·L·巴拉克、精神分析学家弗朗兹·亚历山大、托马斯·弗兰奇和劳伦斯·S·库比, 心理学家理查德·克拉奇菲尔德和加德纳·墨菲, 哲学家哈利·S·奥弗斯特里特,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社会学家西奥多·阿贝尔和帕森斯。受邀与会的顾问和贵宾有古斯塔夫·比霍夫斯基, 汉斯·恩斯特·弗里德, 海因茨·哈特曼, I.L. 坎德尔, 沃尔特·科特尼希, 恩斯特·克里斯, 罗达·梅特罗, 克佩尔·平森, 西格丽德·舒尔茨, 西格丽德·温塞特, 罗伯特·维尔德。会议公报中还特别感谢了埃里克森、弗洛姆、勒温和劳拉·汤普森等的协助。露丝·本尼迪克特参加了会议的第一部分, 并就其总结备忘录发表了评论。最初计划在1944年的4月29日至30日和6月3日至4日召开两次会议, 各为期两天。不过, 会议由于讨论热烈, 在该年5月6日和13日至14日又增加了两次会议安排, 后者最后改在了20日至21日。帕森斯只参加了其中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议, 但收到了5月两次会议的材料。

[223] “Conference on Germany After the War. April 29th and 30th, and June 3rd and 4th, 1944. New York City”, 申明的署名者包括劳伦斯·K·弗兰克 (代表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爱德华·汉弗莱斯 (代表美国精神缺陷学会)、乔治·史蒂文森 (代表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道格拉斯·A·索恩 (代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和埃德温·韦斯 (代表美国心身问题研究学会);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10。

所谓暂且命名的矫治方案，既包括德国解除军备和惩处战争罪行，也涉及德国参与国际交流和交通，科学发展，削减工业产能 (deindustrialization) 等经济措施，还有德国利用本国出产原材料的问题 [下文的“disarmament”不单单指对德国军队的处置，还包括了对德国经济特别是某些与军备相关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控制和生产用途转型。因此不译作“裁军”或“解除武装”。——译者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军管政府中的美方人员如何处置德国罪行，如何协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United Nations Rehabilitation and Relief Agency, 简称“联总” [UNRRA]) 之类的救济和重建工作。

在第一次会议上，精神分析学者库比和弗兰奇之间就爆发了一场争论。他们的立场分歧在于，库比认为德国人的态度中的破坏性因素已经彻底取代了建设性因素，而米德 (弗兰奇认同她的立场) 则认为有可能实现对德国人的再社会化。亚历山大在一份书面发言中支持后者，认为德国的威权主义急需改变。^[224]

<112> 帕森斯在四月会议后写了一份备忘录，题为“对于德国社会的干预问题”，比较了库比和弗兰奇的观点，接受了亚历山大的主要观点。他指出，“在我看来，

库比博士考虑问题太限于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出发。或许他忘了，对于一名孩童就像对待其他患者一样，精神病学治疗要获得成功，不能仅限于精神病学专家这一方的特定程序。患者的大量时间是在精神病学专家充其量只能部分控制的一系列社会情境中度过的。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者所针对的社会都在界限之内，都比较正常。患者最初的社会关系对于患者所施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精神分析学者相配合的，而不是有碍于后者。实际上，他的治疗的首要目标，乃在于促进患者充分适应其所处社会情境中其他人的期待。^[225]

米德主张，德国的国民性格具有二元结构。1944年夏，她撰写了一份备忘录，

[224] Franz Alexander, M.D., “Conference on Germany After the War.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Joint Statement Prepared at Conference April 29th–30th” (交流文稿, 油印稿);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10。亚历山大 1930 年从德国移居美国。

[225] “Memorandum – The Problem of Intervention in German Society”, 第 1 页;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10。

题为“德国国民性格中的规律性”^[226]，刻画了德国人强烈的地位取向和支配—顺从关系 (superordination-subordination)，侵犯性行动倾向，以及对于作为考察变迁时主要对象的其他个体的非人化态度。她提出，德国的国民性格包含了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所谓 A 型典型模式，源于母子关系，使德国人表现出“情绪性，理想性，主动性，浪漫性”，这方面的性格“有可能是建构性的，也有可能是破坏性、反社会的”。^[227] 另一方面是所谓 B 型典型模式，源于威权主义家庭中作为惩处性形象的父亲，使德国人表现出“守秩序，勤工作，尊等级，循条理，能顺从，喜合群，重实利”。米德觉得，这两类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但她大胆提出，纳粹主义把这两种类型融为一种二元结构：“纳粹主义比以往任何政权都更可能促成青春期后养成 A 型行为。A 型行为倾向于无政府和破坏；B 型……倾向于偏执、累积、施虐受虐狂。在某一特定时刻，A 型和 B 型是互斥的。而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每种类型都会以不同程度呈现在不同情境中。”^[228]

米德 1944 年 5 月 12 日致函帕森斯，承认自己和帕森斯在会上的立场非常类似。她通过以下三个问题，重述了会上库比与弗兰奇之间的争论：其一，一个社会能否通过外来力量的强加而得以治愈？其二，个体与社会之间是否有足够的交换，让一种施加于社会制度的影响，也能够同样有效并有计划地改变个体社会化的方式？其三，德国人的性格是否具备某种固定结构——源于数百年来不曾改变的文化实践——使得国民性格的双元性反复再现，无论受控型社会变迁的实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其暂时的消失？她在致函回应帕森斯的观点时提出疑

[226] 帕森斯认为，这份备忘录出自米德一人之手，参看其 1944 年 7 月 21 日致佩里函，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5, 但在国会图书馆所藏米德档案中，米德留有一份草稿，上面署了五位作者，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杰弗里·格雷尔、米德本人、罗达·梅特罗和阿尔弗雷德·梅特罗。参看国会档案馆，玛格丽特·米德档案，box 31, “Institute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Folder: “Conference on Germany... Reports”。本尼迪克特撰写了“评‘德国国民性格中的规律性’”，里面提到“探讨德国人性格结构的人类学合撰备忘录”，参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0。

[227] “Regularities in German National Character”，收于“Germany After the War. Round Table - 1945”，*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11, 1945, 第 392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布里克纳的“战后德国问题会议报告”最初定为“秘密”，后于 1945 年以这个不起眼的题目公开发表。

[228] Mead, “Regularities in German National Character”，第 393 页。

问,是否足以“促进工业化、解放妇女等等,基于这种本质上健康的‘基本性格’来表达自身。”^[229]帕森斯5月19日复函米德,就其双元心智理论表示:

实际行动是否危险,取决于情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某一种可能性的显现。比如我觉得,就算德国国族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单元参与权力竞争战,无论这种竞争会实现何等成就,那么也能够做成许多事情。又比如我认为,有理由相信,具有类似的路德宗背景的瑞典,将会表现出类似的侵犯倾向,在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 1611—1632年任瑞典国王,对丹麦、波兰、俄国、德意志等相继交战。历史上首次将“职业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引入军队和战争,其军事创新成为欧洲军队的标准和楷模。——译者注]和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 1697—1718年任瑞典国王。当时瑞典乃欧洲北方霸主,查理十二世多方征战,意气风发,但在与俄皇彼得一世的交战中大大败。——译者注]在位期间,倒也确实如此。但是,一旦退出霸权角逐,守秩序、勤工作、奉良知就会成为主导趋势,创造出支配—顺从(dominance-submission)模式逐步消减的情势。我想,之所以德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环境里明显是些“好公民”,大抵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问题的大体性质已经很清楚了。^[230]

帕森斯1944年9月21日致函布里克纳,寄出其全面修改后的备忘录,为其超出篇幅要求致歉,并解释说它包括了一节理论概介,以及对于德国个案的具体应用。^[231]9月28日,他将这份备忘录寄给米德,米德于10月28日复信,在几个细节上提了些修改建议。11月,布里克纳复函帕森斯,通知他文稿已经被分拆,理论部分成为布里克纳向陆军部的总司令办公室(应为“Provost Marshall General's Office”,原文此处误作“Marshall Provost General's Office”。——译者注)提交的最终报告的十个附录中的附录五。这些附录皆未署名,帕森斯的文稿有些部分成为附录五(只包括其“分析引介”),其他部分分别插入讨论德国的政治经济重建的其他文本。布里克纳向帕森斯解释为何要删改其备忘录,“其中有些部

[229] 米德1944年5月12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10。

[230] 帕森斯1944年5月19日致米德函,第1页,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10。

[231] 帕森斯1944年9月21日致布里克纳函,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10。

分在别的地方已经有所论及，另外有几点，我们似乎不能说体现了会议的整体精神，比如关于鼓励德国恢复工业产能。”^[232]

<114>

帕森斯在复函中强调自己为何持有此种立场：“就我对情势的分析角度出发，人们现在考虑的那些选择方案，大多数会造成某种‘倒退’效应，进一步巩固和确认而不是远离曾经孕育麻烦的那些模式。”^[233]

“受控制制度变迁问题”^[234]包括两个部分。“分析引介”把社会学角度的焦点定在对于一个社会的“情境界定”上。从克里斯玛型社会系统转向法理型社会系统，这一和平过渡就发生在一个社会的意义结构的集体维度上，它有赖于理解社会系统中的文化力量。

“分析引介”中概括的有关社会的理论，确认了通过军管政府对战后德国实行制度变迁的着力点。他首先指出，制度是社会系统的“脊柱”，通过动力力和情境这两种输入渠道落实于社会行动，而这两种渠道又汇聚于情境界定。如果变迁的宗旨是要重塑某种特定的情境界定，首先就必须搞清楚，一种制度结构中什么成分是僵化不变的，什么又是灵活可变的。否则，寓于既存制度中的那些“既得利益”就会成为阻碍变迁的温床。因此，从策略上说，应该加强灵活可变的潜力，通过适当的步骤，产生新的或者不同的情境界定。^[235]从什么渠道推动变迁需要审慎考虑，以免战败国民众对这些政策产生抵制情绪。诸如此类的阻碍自然会使得改革措施无功而返，就德国而言，会就此延长对于世界的威胁。

帕森斯区分了民主社会和法西斯社会两种类型。民主社会尽管充分整合，但容纳冲突与张力，乃至偏见、精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当然，普遍主义取向和获致取向也始终受到特殊主义和先赋取向的挑战。另一方面，法西斯社会也容纳了普遍主义和成就取向。有鉴于此，帕森斯主张，德国许多“最重要的文化模

[232] 布里克纳 1944 年 11 月 13 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 box 10.

[233] 帕森斯 1944 年 11 月 17 日致布里克纳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 box 10。有关其想法的进一步阐发，详参下文。

[234] 帕森斯的备忘录被布里克纳在其会议报告中删改，最后全文发表在 *Psychiatry*, vol. 8, 1945, 第 79—101 页；重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291—324 页。

[235] 为了说明什么是对行动者有效的神秘、僵化的情境界定（远非西方的理性所能理解），他举了日本的神风突击队的自杀式袭击。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大约三百艘同盟国战舰被神风突击队员击沉，大约一万五千名军人阵亡。

式和结构要素，其实与民主社会那一边的并非泾渭分明。”^[236]毫无疑问，纳粹对于民主社会的取向并非彻底根除。要知道，这是在压力下发生的，意味着纳粹所强加的某些变迁很快就会被军管政府的政策逆转。

那么这些政策从何着手呢？在讨论“德国的个案”时，他提到了米德有关德国性格结构中的A型要素和B型要素的区分：

在前纳粹时代的传统德国社会，主要是B型要素被制度化了。A型要素则主要来自两个相互依赖的源泉：德国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的某些特征，以及生活在那种制度秩序中所引发的一些张力。它表现在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情感主义和渴求上。……纳粹运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这种浪漫主义的动力引向一种侵犯性的、扩张主义、国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也是一场内部的革命，同时还利用并支配了B型要素背后的一切动机。……制度变迁的计划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综合，创造一种新的情境，让浪漫的要素重新找到一种非政治性的表现形式。^[237]

这种双元性的性格结构，伴之以（帕森斯在讨论前纳粹时代德国社会结构的文章中分析的）德国“形式主义”，以及（他在“法西斯运动的一些社会学特性”中分析的）封建半封建心智残余，就是有待克服的对象，从而指明了三项目标：

消除纳粹对于德国人性格中两类主要成分的特定综合，或者可能的话，使其脱离晚近独特的表现渠道。消除或至少是大大削减等级主义、威权主义、形式主义的成分在“保守的”德国制度结构中所扮演的结构性角色，尤其是应当打破这种制度结构对于军队和军士阶层的倚重。通过系统地培育现代德国模式中最接近民主国家中相对应部分的那些成分，尤其是工业主义，来替代保守模式，化减张力。^[238]

为完成这些目标，需要有三类社会控制：倒退型（regressive）、宽容型

^[236] “The Problem of Controlled Institutional Change”，第298页。

^[237] 同上引，第300页。

^[238] 同上引，第302页。

(permissive) 和直接型 (direct)。^[239]

倒退型控制涉及纽曼所概括的四大权力集团。纳粹党是要彻底铲除的。容克阶层是要被拆散或压制的——最有可能是通过苏联占领区政策。要借着溃败之机，打散军事阶层，解散军队。而公务员官僚集团要去除其军国主义、精英主义和形式主义。当然，大工业只是在晚近才接受了纳粹的影响。^[240]而帕森斯认为，这部分恰恰具备普遍主义和获致取向的“内在特征”，需要充分重建，甚至大大改善，作为战略性社会变迁的重点场所。同时，这种变迁要去除德国工业“与军国主义国家和保守主义阶级结构之间的整合”^[241]，为未来谱写希望。

宽容型控制指的是促进可以接受的变迁。帕森斯细致地探讨了四种可能成为潜在变迁渠道的制度。他觉得，直接介入家庭可能有悖于隐私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教育渗透可能会激起厌恶被教导该思考什么的民众的逆反对抗；而政府很容易被扭曲成同盟国的输入，与非民主的德国本土传统形成令人不快的对抗；他发现，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制度控制领域就在于经济—职业系统。从变迁的有效性的所有三个标准——显著性 (salience)、可行性 (feasibility)、隐蔽性 (inconspicuousness) 来看，这也是问题最小的 (原文为 “the least unproblematic”，疑系作者笔误。——译者注)。

他明确提出，经济—职业系统从先赋转向获致，会对其他制度系统产生有益的震荡。也就是说，家庭将受惠于父亲在工作场所的自决；学校将受惠于教师能够影响自己的工作、评价自己的教学；政府同样将受惠于许多显而易见的方面。无论如何，在经济—职业这个制度领域中，普遍主义—获致类型的价值的盛行看起来很自然，因此，这类价值将得到巩固，并且潜移默化，不需要打破坚冰。由此，经济方面的自由权利和安全感将在政治领域之外确立一块民主取向的核

^[239] 帕森斯在日后重印于前后几版《社会学论文集》和《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此文不同版本中，将第一类从倒退型改为再现型 (representational)。在我看来，用“倒退型”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倒退回纳粹的家长制的权威类型。帕森斯在“马克斯·韦伯与当代政治危机”一文中解释了这一点。《帕森斯论国家社会主义》中的重印版采用的是1944/1945年初版的措辞。

^[240] 详参 L. Hamburger, *How Nazi Germany Has Controlled Busines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43)。

^[241] “The Problem of Controlled Institutional Change”，第306页。

心领域，成为文化重新定向的有效场所。魏玛共和那种纯粹以政治为民主核心的模式将不复存在，那种模式已经证明非常容易受到非民主的大众运动的侵害。

他强调指出，拟议中的变迁具有两大好处：它将减少城市中产阶级和乡村人口的保守主义倾向，并将减少形式主义。当地位成为获致成就的结果，而非像前纳粹时代和纳粹模式那样，是依赖于顺从上级的职业晋升的产物，德国的心智也将发生显著变迁，趋向民主的态度。^[242]

考虑到 1944 年秋美国计划大大削减德国工业产能的政策，帕森斯的结论似乎不单单与布里克纳截然不同：

<117> 关键在于，必须有这样一种政策，为德国培育一套产能丰沛、就业充分的扩张型经济。现代工业经济的内在趋势乃在于，一旦实现这一点，就会以正确的方向自动影响制度变迁。相反，趋向特殊主义，破坏功能专门化，过分强调群体团结，这些都是对于机会领域收缩相伴而生的不安全感所产生的过度防卫的反应。助长这些现象的并不是现代工业主义本身，而是其病理现象，是其发展的不完善性。^[243]

直接型控制作为社会控制的第三种类型，是要宣布反犹太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教义为非法。诚然，“‘观念’在塑造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方面”^[244]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只是什么不牢靠的东西。问题在于，需要什么类型的巩固型宣传？度如何把握？无论如何，不加掩饰地颂扬美国的工商成功，只能招来德国人对于美国的物质主义的偏见。考虑到米德所谓德国国民性格中的 A 型成分和 B 型成分已经分裂，前者受到抑制，后者被重新引导，而又没有确立起任何新的信条，能够吸引原教旨主义者的希望，甚至不指望经济繁荣。帕森斯就此建议道：

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虽说从未在什么地方实现过基本完美的整合。……尽管在德国有着种种不同的转化、扭曲乃至矛盾的价值观念，但这些价值决不能说已经衰亡了。……可以考

^[242] 同上引，第 313 页。

^[243] 同上引，第 314 页。

^[244] 同上引，第 315 页。

虑诉诸这些情感进行谨慎的宣传,通过言,也通过行。这么做的时候,……具体的诉求应尽可能摆脱关系到作为一个单元的德国国族地位的说法。应该诉诸人、公民和群体作为其本身而不是作为德国人的权利与义务,诉诸真理或自由之类的非人化的模式。主要是应当明确,基于此类价值的普世性,要把德国人包容进来。^[245]

帕森斯提醒道,尽管如此,制度变迁也可能十分缓慢。只有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它们才会见效。如果运用恰当的宣传,有时也不妨作出“谨慎”的诉求。诉诸“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以及某些……相关的世俗价值观念,比如科学与自由探究,人的尊严与自由,乃至机会平等”,都有可能作出正面的巩固。这些诉求都是将德国人刻画成全人类的成员,人人皆在其中。他希望,有些人在纳粹治下曾经拒绝让其牺牲者属于这些价值观念,现在将会释放出他们想必潜在负有的、普遍渗透的罪疚感。他不怀疑后者的确存在,而一旦释放出这些情感,也将使德国人更加趋近西方社会的精神。

因此,帕森斯预测,通过细致地应用社会学知识,是有可能顺利实现从克里斯玛型专制独裁向法理型民主体制过渡的。他并不鼓励由施政当局通过“强加”民主而操纵变迁,而是基于从失范到整合的社会行动结构两分,建议激励德国人自己改变在其社会中的情境界定,从失范和强制转向整合和自愿投入。 <118>

此文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后毁誉参半。弗里德利希在1944年11月曾经和帕森斯策划过一个研究方案,叫“德国社会结构的模式与动力”,但未获成功。^[246]此刻他觉得有关观点未能切中要害。他很不同意用“国民性格”的概念,因此对帕森斯这样用颇感不爽。^[247]帕森斯回复道,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关联概念,可以引入自己有关恢复工业产能的政策建议,比起当时普遍视为一条颇具希望的道路的德国再教育方案,是一项更好的战略。^[248]

1945年春,帕森斯撰写其自1938年以来第一篇真正理论性的论文,准备收

[245] 同上引,第321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246] 参看 Barry Katz, *Foreign Intelligence* (1989), 第204页。

[247] 弗里德利希1945年4月16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9。

[248] 帕森斯1945年5月7日致弗里德利希函,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2, box 9。

人威尔伯特·穆尔参与编撰的一部文集。穆尔赞扬帕森斯的分析全面透彻：“点点滴滴，都比自己晚近读到的所有东西有料，相形之下，绝大多数有关‘如何处置德国’的讨论都显得浅薄无味，甚至文不对题。”^[249]

三、偏见

1944年5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组织了一场关于反犹太主义的会议。^[250]与会者中包括了流亡学者阿多诺、爱德华·毕卜林、霍克海默、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弗雷德里克·波洛克，还有美国社会科学家戈登·阿尔波特、约翰·多拉德、克拉克洪、阿尔波特·麦克朗·李、伦西斯·李克特和劳埃德·沃纳等。会议宗旨是一起探索一种切实的思路来看待美国的反犹太主义。

另一次探讨反犹太主义的场合，是1944年的“科学、哲学、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之关系会议”(“Conference of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会议选择的统一主题是“现代世界的统与分”。帕森斯选择了“作为社会问题的群体张力”分组提交了论文，打算谈的问题是“群体张力中的种族差异和宗教差异因素”(同一分组的其他发言者还有弗兰克和奥弗斯特里特)。^[251]

<119> 他的文章起首迂回，徐徐迫近：

就在不久前，西方世界弥漫着一股情绪，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天真幼稚的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迅速增长的大众生活水平，都被视为与不断提高的宽容及内外和谐相携而行，凡此种种，仿佛千禧年就在眼前。而整个世界的战争景象，挑战我们社会道德秩序核心基础的种种

[249] 穆尔1945年5月1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3。此处暗指当时的畅销书 Louis Nizer, *What To Do With Germany* (Chicago: Ziff-Davis, 1944, 2d edition, 1945)。

[250] “Conference on Research on Anti-Semitism, May 20 and 21, 1944, New York City”，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4。

[251] 文章发表在会议论文集，论文集题为 *Approaches to National Unity*, Lyman Bryson, Louis Finckelstein 与 Robert McIver 合编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5), 第183—199页；重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275—290页。

思潮的兴起，则已经无情地将我们这一代从这场乌托邦幻梦之中唤醒。^[252]

不仅是“当代令人赞叹的技术天才都在致力于破坏性的目的”，而且“甚至在万众一心投入战争的压力之下……新闻特写里也依然充斥着反犹太主义的骚动、种族骚乱和劳工纠纷。”

事实上，种族群体或族裔群体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团结源泉，而其反面就是大众不安全情绪中的“散漫漂移的”侵略性所导致的偏见。然而，存在一些“微妙而可畏的壁垒，阻碍着相互的沟通，也因此阻碍着作出调整，以适应”标志着民主体制的普遍主义。^[253]

群体团结常常关联着文化上共享的宗教传统，在族裔的角度上常常是同质性的群体。这甚至适用于“所谓‘发达’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普遍主义的理念从未在超出某个人类宗派的范围内实现，而这些运动本身也老是分裂成多个教派亚群体，在自身内部树立起新的壁垒。”^[254]

由此出发，他探讨了导致强烈偏见和暴力杀戮的群体张力的形成源泉与动力机制。一方是“真正宗教的持有者”^[255]，另一方是“皈依的‘异教徒’与‘异端教徒’”，表达这种冲突的主要机制不仅在于某些群体被剥夺了经济特权或司法正义，而且“情境界定被扭曲，伴随着情绪反应激烈，大大加剧了上述内在冲突。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发生的冲突或许存在某种现实主义基础，但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所描绘的犹太人形象却是千篇一律的歹毒，完全不合比例。这个例子体现了一种流传广泛的机制，即所谓‘寻找替罪羊’。”

寻找替罪羊机制的基础是“夸大”呈现在某一情境中的要素，在这类情境界定中运作的思维方式完全脱离了理性。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它顶多算是对于否定性情感的粗陋的理性化。诸如此类的推理为暴力行为确立了虚假的正当性理据，表现为“极端的简化和刻板印象化，‘通俗小报式思维’（tabloid thinking）。”^[256] 帕森斯总结道，

[252] “Raci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第 275 页；下两则引语也摘自同一页。

[253] 同上引，第 279 页。

[254] 同上引，第 280 页。

[255] 同上引，第 282 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256] 同上引，第 283 页。

<120>

因此，我们所处的情境是好几种因素相互依赖，即(1)群体之间实际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其他差异，塑造了沟通 and 理解的壁垒；(2)价值和利益的现实主义冲突因素；(3)群体生活和结构当中的内在张力和不安定感，塑造了寻找替罪羊式的反应的需要；(4)充分程度不一的其他控制机制或中立化机制，针对由不安全感产生的侵犯性冲动；(5)将某个外群体塑造为替罪羊的符号挪用，与内群体中的特定张力有关；最后是(6)一种理性化模式，为寻找替罪羊现象提供正当化理据，并使之在主观上为民众所接受。^[257]

贡纳尔·缪尔达尔在当时刚出版的《美国的困境》中分析了种族张力。^[258]帕森斯后来称之为“实际的控制问题”。他承认，缪尔达尔建议发起系统的教育运动，以对抗美国南方严重的群体对抗，或许很重要，也很有益。但首先，危险在于，对于种族平等的负面态度可能就此被激化而不是削减了，致使政策措施更难获得成功。其次，倡导种族平等的运动可能会在无意间变成一种渠道，专供一些人借此斥责被指立场保守或冷漠的人，以明显的偏见指责别人有偏见，借此宣泄其侵犯情绪。

在文章最后，他警告读者，群体张力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不采取任何政策措施去削弱一个系统中的解体趋势，偏见就会愈益加剧，哪怕原本的政策是要扩大宽容。至于能够增强平等、削弱偏见的那些力量是什么，他暗示道，即使在一个让人觉得被群体张力和越轨所主宰的社会里，也有可能常常呈现出整合的趋势。这类趋势都需要以适当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在社会构造中表现明显的失范趋势的反面，他也明确认为存在一种整合趋势，内在于“社会系统……(犹如)其他有机系统。‘整合’或‘社会健康’是绝大多数社会的内在趋势，哪怕它算不上是易于被直接控制的可感‘因素’。”^[259]

[257] 同上引，第283—284页。

[258] 参看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两卷本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259] “Raci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第288页。

第六节 超越胜利

1944年8月上旬，布雷顿森林会议创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协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战后重建，也是为了避免战后英国经济陷入崩溃。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建议^[260]，把德国的出口市场转给英国。他觉得，要实现德国 <121> 的去军事化，以此防止这个极具侵略性的国家未来再穷兵黩武，唯一安全的方式就是彻底削弱德国的工业产能。如果德国就此变成一个由农业生产维持经济的国家，对其邻国就没有危害了。特别是莱茵—鲁尔地区，作为中欧重要的重工业区，要么由同盟国管辖以实现国际共管，要么彻底铲除工业产能，转为牧区。^[261] 1944年9月15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达成初步协议，将德国变成牧区。^[262]

帕森斯本该在9月交稿，赶上布里克纳的最终报告，但面对摩根索政策的前景，他全面修订了自己的备忘录。他重新表述了自己最初的观点，旨在证明，摩根索的目标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政策来实现。

为了贯彻自己的诉求，他接受了自己一辈子在华盛顿担任过的唯一职位。1945年3月到10月，帕森斯出任外国经济管理署敌国处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Agency, Enemy Branch, 简称“外经署”(FEA)] 兼职顾问^[263]，负责拟定对德解除军备和削减工业产能的措施。^[264]

^[260] 以下参看 E. H. Penrose, *Economic Planning for the Pea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261] 摩根索在 *Germany Is Our Proble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5) 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戈培尔的宣传机构从1944年秋之后就抓住机会对摩根索大肆污蔑，因为他是个犹太人。

^[262] 协议的全文可参 Henry A. Stimson 与 McGeorge Bundy 合著; *On Active Service i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7), 第576—577页。但对于1944年9月的这个协议，美国新闻界一片反对之声，迫使罗斯福政府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说，协议的精神仍然体现在1945年2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令，规定了对德军管政策。顺便提一句，摩根索的政策建议比实际的政治后果声名更为狼藉，军管政府实际从未在德国付诸实施。

^[263] 1944年9月魁北克会议大约两周后，罗斯福总统授权外经署筹划对德经济政策。

^[264] 以上背景详参 Uta Gerhardt,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4, 1996, 第291—325页。

就任前夕，帕森斯于1945年3月6日致信外经署敌国处副处长阿瑟·R.伯恩斯，概述自己认为应尽的责任。^[265]帕森斯把当时已决定发表在《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给布里克纳的备忘录一并附寄给伯恩斯，在信中概述了自己对于外经署的战后筹划使命可以有的贡献：

<122> 我觉得自己可以作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产业变迁的程度，这是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这方面涉及社会结构中各主要群体之间的内部平衡，还有关系模式的变迁程度，更加微妙，但我觉得同样重要。我认为，从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我的意思。第二类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应。我在文件最后一部分已经指出，我认为在这个方面很难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确实明确了解某些具体的危险何在，应当可能避免推行直接激起不良反应的措施。这应当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我认为可以就此谈一些举足轻重的东西。

基于这一总体视角，他向伯恩斯提议，后者不妨“认为，我有可能就贵署已经制定的经济政策给出具体的提议，并针对它们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发表某些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想我能够就比较长期的问题而非近期阶段做些有价值得多的工作。”

整个夏天乃至初秋，他通过备忘录将自己的想法落实成文，分别呈送伯恩斯、外经署参谋处处长菲利普·M.凯泽、外经署敌国处处长亨利·福勒。在该学年剩下的时间里，他每月至少去一次华盛顿，七、八月暑假期间更是每月去几次，借着每个周六与敌国处人员整日开会。凯泽后来对这些会议印象深刻。帕森斯借着这些讨论场合，与专家们交流自己的观点，并将讨论的东西落实成备忘录，交由该处专家商议。^[266]

还有一份未署日期、未有题名的四页文稿，或许撰于这些备忘录之前。该文

^[265] 帕森斯1945年3月6日致伯恩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9。下两则引语亦摘自此函。伯恩斯(1895—1981)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从20世纪20年代帕森斯负发伦敦经济学院两人初识，结为长期密友。

^[266] 源自与凯泽的私人交流，笔者有机会在1995年11月与凯泽在华盛顿会面，他供职政府和外交部门，现已退休。

稿反对认为所谓“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根源，从而应该控制其在德国的发展。^[267]帕森斯承认，军国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侵犯性”必须永久铲除，但他又分析道：“纵然这种军国主义模式已经根深蒂固，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深植于德国人的生物特性，或者长远不能驾驭。”他提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解除军备的政策如果构想妥帖，贯彻得当，不仅应当立刻让德国不能再发动战争，而且要有助于让德国人民重新定向，符合同盟国的利益与价值。”

根据他的预想，这就意味着“要把德国的能量重新导向和平的渠道”。因为在转型过程中，“关键在于坚持尽可能发挥德国人的责任”，“而绝不应当弄成是我们去照看他们，替他们做事情”。因此他认为，受控型经济重建的政策会比其他任何战略都更能满足为德国重新定向的宗旨。他解释道：“我强烈地感到，<123>不应当禁止德国的工商业发展，而应当鼓励它沿着符合经济上解除军备的政策路线发展。”他进一步说明，这同样会大大“削弱旧有的保守势力，特别是土地贵族和旧式官僚”。而且他觉得，这会提升“个人成就”在德国价值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当然是在与军事无关的序列上，并且对世袭位置的重视程度比以前大大降低。要让德国融入整个欧洲经济，让注意力不再集中在工业转军工的可能用途，不再集中在国家自足，这似乎是最好的发展导向。”

波茨坦会议开幕前大约两周，帕森斯交给福勒一份备忘录，详述两点细节，表示是“在和另一个机构中的一位专家商谈后……想到的”^[268]。其一，如果建立一种机构，“帮助……失散家庭……迅速团聚”，可能会增进德国人在军管政府治下的安全感，“这个问题的心理意义肯定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其二，“由

^[267] 备忘录，起首句为“军国主义的持久倾向，举国备战的长期趋向，正是德国长期以来的特征。”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9。以下四段行文中的所有引语都摘自该备忘录[原文如此，似有误。——译者注]。帕森斯此稿的呈交对象很可能和世称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及纽曼的观点类似，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因此，要战胜法西斯主义，就必须根除垄断资本主义。有关这一观点，参看 Neumann, *Behemoth*, 第 221—361 页，尤其是第 225—292 页。

^[268] 1945 年 7 月 2 日，“Memorandum to Henry A. Fowler, from Talcott Parsons”，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9。这里的专家很可能是米德。1945 年 7 月，米德邀请帕森斯加入她作为主席的全国饮食习惯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ommittee on Food Habits)，作为固定成员。本段所有引语皆取自该备忘录。

于德国的就业形势急转直下,大量已经习惯出门就业和顶起半边天的妇女不能求得保全。这非常危险。”为了防止德国家庭就此重新沦为臭名昭著的威权主义,他建议采取某些措施促进妇女就业:“有助于妇女的独立与自尊的任何措施,都是让德国人民重新定向的重要一步。”

帕森斯 1945 年 8 月 7 日致凯泽的另一份备忘录,乃是有关“西方诸国占领区与德国的分离”问题。^[269] 鉴于该主题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帕森斯希望探讨其“社会政治面向,直接联系欧洲在政治上的根本解决来探讨”。他警告说,如果像数天前在波茨坦会议上商谈的那样,由法国来兼并莱茵—鲁尔区,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加剧了“由各国族单元竞争权力位置而形成的欧洲体系”,“战胜国所缔造的国际政治秩序”就会从一开始就受到损害。不仅如此,“不可变易的解决方案……将会以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式,极大地增加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责任”;哪怕就只是因为点燃了德国国族主义,要去收复世居失地:“这几乎不可能推动任何进展,趋向一种新的社会情境,能够指望影响德国民众,逐步融入西方民主模式。”换言之,德国的侵犯性远非遭到削弱,而是会重新获得一种颇为正当的理由,而种族中心主义的妄想症模式也将由于同盟国政策的无心之失而得以延续或重建。

备忘录的第二部分开头就明确指出,“我认为,将此地区交由同盟国组织管理的方案就大为不同,值得细致考虑。”他建议,对莱茵—鲁尔区实施国际共管,“很可能有机会促成整个欧洲政治经济体系的颇为根本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这将显著象征着超越作为彼此竞争的权力单元之体系的欧洲这一旧有政治构架”。他大胆指出,这将会给德国人好好上一课,因为这“切实展示了国族自利的模式可以就在自己身边被超越,这样的效果显然好过我们这边作出的大量宣传。”

经济方面,帕森斯看到了两点好处。首先,“不一定非要在占领区内实施如此剧烈的削减工业产能,好像它还在德国管辖权限之内。”这将相当于“测试德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可以采用更加专门的经济标准来引导产业的重新发展与定向。”其次,德国的邻国将不再那么担心其与德国的

^[269] “Memorandum to Philip Kaiser, from Talcott Parsons. Subject: Separation of Western Territories from Germany.”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 15.2, box 9。本段及以下四段所有引语皆摘自该备忘录。

经济关系，因为“国际共管当局将可以提供互信基础，大大促进贸易自由，也因此大大促进我们希望看到的经济发展类型。”

而在社会结构方面，他也看到了两种有利的后果。要知道，莱茵—鲁尔区尽管从19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属于普鲁士，却从未成为容克体制的盛行之地。它的发展是独立的，这意味着“他们（容克阶层和普鲁士官僚群体）逐渐丧失了此前的垄断位置，不仅在工商业中如此，在社会角度上也是这样。这就为新鲜血液的进入打开了缺口。……国际共管当局尤其应当关注高等教育，视之为新精英群体形成的渠道。该地区将包括几所大学，尤其是波恩大学、科隆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或许还有海德堡大学[为这所辉煌名校加上“或许还有”，其来有自。1936年，希特勒政府下令将该校校门上方的铭文“向现世精神致敬”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雕塑分别改为“致德国精神”和“德意志之鹰”。该校被彻底改造成“纳粹干部学校”（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原来就是在海德堡拿的学位）。直到1946年，海德堡大学才正式重新办学。但在二战期间，海德堡是仅有的几个没有遭受轰炸的德国城市之一。据说美军负责战事的空军将领曾在此接受教育，该校幸运躲过“一劫”。战前海德堡大学与美国就保持相当紧密的联系。在马克·吐温游记及电影《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王子》的影响下，许多美国人前往海德堡观光或求学。1931年，毕业于该校的美国驻德大使舒尔曼牵头，高盛、摩根、克莱斯勒和福特等美国商界巨头为该校捐资兴建了“新大学”校区。——译者注]。它们是新鲜血液进入领导位置的天然渠道。”

最后，不妨在可取的大范围内重新确立工联运动。总之，对莱茵—鲁尔区实施国际共管，能够孕育欧洲一体化的种子：“希望它最终能发展成对欧洲政治体系进行整体重构，这样一来，作为组成单元的各民族国家的意义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它是一场以此为方向重构欧洲社会的实验，最吸引我的正是这一点。”

10天之后，1945年8月17日，帕森斯又写了一份备忘录。它还是呈送给凯泽，是要“概评外经署解除军备计划，8月6日草案”^[270]。他所评论的解除军备计划显然指的是包含“TIDC建议”或“TIDC德国经济重新定向政策”的一份

<125>

[270] “Memorandum to Philip M. Kaiser, from Talcott Parsons. Subject: General Comments on the fea disarmament plan, draft of Aug. 6.” 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9。本段及下两段的引语皆摘自此备忘录。

文件，属于波茨坦会议上达成协议的经济计划方案的一部分。^[271]他指出，作为起步，该报告表达了“我们坚定的决心，再也不能允许源于德国的那种对于和平的破坏重演”。他明言，如果假定单凭破坏备战所赖的经济资源就可以促成德国的转型，未免不切实际。而市场资本主义这种类型的和平经济，就能够对抗德国未来的黩武可能。他如此诠释建议方案：

正确的抑制行动可以具备积极的功能价值，推动重新定向的进程。反过来讲，正确的“宽容”行为也会产生积极的抑制效应。这种说法听起来或许自相矛盾，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宽容”行为所言为何？比如说，“制度性解除军备”意味着整个经济从卡特化工业的军工型生产转向小型资本主义企业的消费型生产。他解释道，在重新确立消费导向型经济的过程中，“‘宽容’的一面有助于切实解除德国军备，因为它能有效地引导民众及其情感和兴趣远离尚武价值，远离通过武力实现德国霸权的幻梦。”就此而言，“如果施加‘更为强硬的’控制，我们其实面临着削弱整个控制体系的效力的危险，因为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巩固对于控制的抵抗，而不是巩固控制。”他这样概括自己观点的主旨：

为了分析一系列假设的具体意涵，我建议把拟议中可能出台的抑制措施按照两个标准来排序。一是它们有效废除德国开战能力的战略意义大小，二是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那种德国和平经济的功能运作情况。其他考虑，比如相互依赖，当然也必须纳入商议。但要作出这样的分类，先要有可能区分出一些比较独特的解除军备彻底性层级，并尝试分析每一层级所导致的整体状况。

因此，不再只是向德国人强加控制，“考虑我们正在努力促成的积极正面的事情有哪些，有关的障碍又有哪些，这对我们来说要健康有益得多。”在这一点上，他相信，伴随着一种明智的解除军备政策，一个和平、繁荣的德国经济最终甚至

^[271] 这里的首字母缩写大概代表的是“解除德国工业军备委员会”（Industrial Disarmament for Germany Committee）。

将有助于克服欧洲的经济体系各自为营、国家之间彼此分隔：“我相信，对于有效而持续地解除军备，绝大多数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措施也自然符合这一观念，一旦实施外科手术般的措施，清除德国工业结构中那些大致自给的成分，就会促进一种健康的欧洲经济的发展。”^{<126>}

备忘录并附有一份草稿，概述了外经署解除军备计划的“心理与社会方面”。草稿明确表示，容克阶层（及高级官僚）、军队、大企业将消失或丧失其权势位置（而纳粹党当然已经解散了）。文稿敦促将德国的经济转为小型资本主义，重振专业主义，这样才能最好地将德国社会的各个制度领域转向“自由民主类型的社会”。他建议，虽然要通过去卡特化、战争赔偿等措施摧毁德国的开战潜能，但也不要太严厉地限制德国经济。他觉得，这样的政策最终同样会造福于“欧洲其他部分的重建”^[272]。

1945年9月和10月，帕森斯又撰写了两份备忘录，进一步阐发了以上观点。1945年10月15日，外国经济管理署解散，部分职员转往国防部德奥处。该处主任是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他将帕森斯最后一份备忘录（注明日期为1945年10月11日）推荐给其下属，作为筹划对德战后政策的材料。^[273]

大约二十五年后，帕森斯在自己截至60年代末的思想生平“构建社会系统理论：个人治学史”中半带挖苦地回忆道：“战争后期我担任了外国经济管理署敌国处的顾问，处理德国的战后处置问题。我写了些备忘录，反对所谓的摩根索计划。”^[274]

[272] 整段文稿原话如下：“解除军备计划的最终考验乃在于，它能够如何影响德国人的态度，影响德国的社会结构。如果支撑过去两次大战的那些态度，以及德国的侵略欲望和能力所依赖的那种德国社会结构，依然故我，甚至更坚固，那就只能通过旷日持久的压制型控制才能获得安全。但可以通过设计并执行一种特别的方案，有助于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让德国重新整合于一个稳定的欧洲社会。”见“VI.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F.E.A. Disarmament Program”，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9。

[273] 参看“Office Memorandum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tate Department, Germany and Austria Division”，金德尔伯格致德奥处全体主要职员，1945年12月15日，国家档案馆，Record Group 59, General Records State Department, Decimal Files, 1945-9 Control (Germany), box 3672。

[274] Parsons,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见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第39页。

第七节 小结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帕森斯的战时著述才在学界二手研究中引起应有的关注。从 1938 年到 1945 年，他通过表面上以纳粹德国为对象的著述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学分析，将之与自己有关美国社会的分析相对比。作为公民，作为学者，他都在积极投入反纳粹的行动。他加入了民主议事会和捍卫美国哈佛小组等志愿团体，而在 1945 年，也志愿为负责战后对德政策的一家政府机构担任顾问。总之，他谴责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强制性的克里斯玛体制，但也关注二战后的德国重新民主化问题。

我的论述把他的关注分为五个阶段。最初的阶段，在梅克勒约翰治校时代，培养阿默斯特学院的学生们的公民精神，有两个核心。一是高深学问，包括专业精神，它超越了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来界定社会组织的内涵。另一个核心是宗教，包括了经济（在韦伯的理论中，这是一项重大成就）。1938 年 11 月下旬，在他第一篇公开指责国家社会主义破坏西方文明的文章中，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话题。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段时期，他积极倡导干预。他将纳粹德国和美国这两种典型体制放在一起对比，并做了系统分析。纳粹德国作为克里斯玛—传统权威型社会，而美国则作为法理型权威社会。这种分析最终发展为他的“韦伯与当代政治危机”。

1942 年，他开始讨论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既然对德（以及对日）战争最终还是启动，他现在可以开始关注未来会怎样。1942 年，他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前后分两个部分发表），兴趣逐步转向再教育的前景。

接下来的两年，帕森斯除了其他许多活动，还参与了哈佛海外管理学院培训未来军管政府官员的项目。在这一职务上，他运用其系统分析思路来研究德国，并根据必须契合的历史情势做了适当调整。他在最初为“战后德国问题研讨会”而写的备忘录中建议，通过受控型制度变迁来克服特殊主义和先赋取向，并重新充分确立普遍主义和获致取向。他建议基于社会学的专业技能，对那里的经济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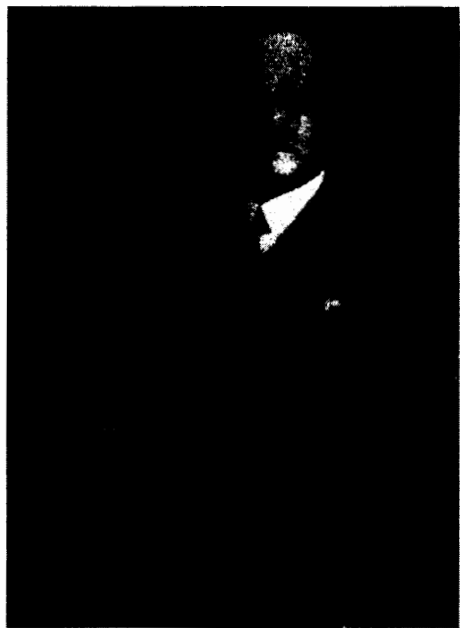
在1945年10月之前的那段时光，他作为外经署的顾问，建议政策参谋者们遵循一种有社会学依据的想法。他主张，要让德国产生社会变迁，就意味着对德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

从1938年到1945年，他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关注一个活生生的社会，那是千百万人亲身经历的生活世界。他是捍卫民主体制的活动分子，但他也运用社会学理论来遏制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对于文明的根本威胁。

在这些年里，他的工作重心不仅仅是美国的民主体制（这依然是一个核心主题），而且是其对立面，德国纳粹主义。负笈海德堡的岁月让他了解了德国，这很有可能激励了他的关怀。他对于社会行动（诸系统）的双翼结构的分析，融入了他说明处在世界大战时代的当前社会的努力。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已经详细阐发了概念图式，而现在，当他成功地将这种图式应用到二战的“当代政治危机”的时势中时，也就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 <128>

帕森斯常常十分直白地主动出击，说服别人相信，自己审慎的社会学思考在许多领域都是言之成理的。相比于他一生中其他任何时候，他或许都更多地针对民主化进程的敌人，将对于民主的捍卫与理论的分析密切融合。





(1)

爱德华·史密斯·帕森斯 (Edward Smith Parsons, 1863—1943) 的祖上有一名成员地位显赫, 那就是爱德华·帕米列·史密斯 (Edward Pamelee Smith), 在南北内战时期尤利西斯·格兰特政府里担任美国印第安事务专员。他拥有神学学位, 在 20 世纪早期是社会福音运动成员, 该思想运动旨在调和当时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状况与基督山上宝训中蕴含的伦理。他专研英文, 出版过弥尔顿研究专著。1919 年, 他被选为玛丽埃塔学院 (Marietta College, 位于俄亥俄州) 院长。有未经证实的传闻, 说在次年春天, 他和自己的小儿子塔尔科特曾去往德国旅行, 并在慕尼黑拜访过马克斯·韦伯。



(2)

玛丽·奥古斯塔·英格索尔·帕森斯 (Mary Augusta Ingersoll Parsons, 1863—1944)。她父亲是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3) 的曾孙, 母亲婚前名叫凯瑟琳·塔尔科特 (Katherine Talcott)。她和整个英格索尔家族都来自马萨诸塞州西部。玛丽·帕森斯成长于克利夫兰, 然后于 1889 年与爱德华·帕森斯结婚。据说她支持当时的进步事业, 甚至本人就是一位争取妇女投票权分子。她生有五个孩子, 塔尔科特是最小的一个。前四位分别是埃斯特 (Esther, 1890—1965), 查尔斯·爱德华兹 (Charles Edwards, 1892—1940), 伊丽莎白·英格索尔 (Elizabeth Ingersoll, 1894—1957), 小爱德华·史密斯 (Edward Smith, Jr., 1898—1960)。



(3)

塔尔科特·帕森斯与海伦·帕森斯 (Helen Parsons) 的三个孩子分别出生于 1930、1933 与 1936 年。其中两位后来靠自己拼搏成为学者。他们最大的孩子，女儿安妮 (Anne)，后来成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她从索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在波士顿和意大利做研究，1964 年 6 月去世 [这位精神分析学者系自杀。——译者注]。儿子查尔斯 (Charles) 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哲学。2001 年，查尔斯受聘哈佛大学埃德加·皮尔斯哲学讲座教授。在埃默森堂 (Emerson Hall)，他的办公室恰好与其父 1965 年前的办公室同在一层楼。



(4)

帕森斯成长于一个大家庭。这张照片摄于1928年圣诞节，聚齐了帕森斯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母亲，侄子和侄女，还有新婚燕尔的帕森斯夫妇。前排(左起)分别是：埃斯特·帕森斯(大姐)，爱德华·S. 帕森斯(父亲)抱着琼·帕森斯(小爱德华·S. 帕森斯之女)，玛丽·A.I. 帕森斯(母亲)抱着萨缪尔·帕森斯(小爱德华·S. 帕森斯之子)，玛格丽特·艾伦·帕森斯(小爱德华·S. 帕森斯之妻)。后排(左起)分别是：海伦·沃克·帕森斯(1927年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结婚)，塔尔科特·帕森斯，查尔斯·爱德华兹·帕森斯(众人敬重的大哥)，伊丽莎白·I. 帕森斯(二姐)，小爱德华·S. 帕森斯。海伦·W. 帕森斯曾经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美国研究生，在那里与塔尔科特相遇。塔尔科特后来转往海德堡大学(1926年7月结束)，回到美国后，两人成婚。



(5)

1949年，帕森斯毕业二十五周年之际，接受了母校阿默斯特学院授予的荣誉学位。照片中，帕森斯站在后排最右边。1949年与帕森斯一起接受荣誉学位的其他教授是：(后排从左到右)巴茨(Frederic Marsena Butts, 1909届)，艾伦(Henry Butler Allen, 1909届)，赫宁(Frederick Waldbridge Hoeing, 1929届)，金曼(Joseph Ramsdell Kingman, Jr., 1924届)；(前排从左到右)索普(Willard Long Thorp, 1920届)，弗兰克斯(Sir Oliver Shewell Franks)，米特(Ralph Albert Van Meter)，肯德尔(Henry Plimpton Kendall)(均为1899届)。前排中央一位是科尔(Charles W. Cole)，马萨诸塞大学校长。在1950年前后的战后岁月，帕森斯正逐渐走向其前人难以企及的声名巅峰：美国社会理论的思想者。



(6)

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不知疲倦地穿梭旅行于国内外的各种研讨、会议和个人演讲，数量之大令人惊叹，也让听众熟悉了他新修正的系统理论（符号性互动媒介理论）。1956—1961年他担任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第一分委员会委员，后转任第三分委会；1961—1963年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秘书，1967—1971年被选为美国文理学院学术院主席。



(7)

从1927年开始，直至1973年退休乃至之后，在帕森斯学术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哈佛都是帕森斯的大本营。1946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创建了社会关系系，这是1943—1944年哈佛教员齐心协力，通过海外管理学院培训军管政府职员的后继，统合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在60年代早期，他协助谈下了威廉·詹姆斯楼（William James Hall）的建造工程，最后该楼成为系内各学科的共同居所和家园。在照片中，前方的大楼就是威廉·詹姆斯楼，而埃默森堂（位于哈佛庭院内）是怀德纳主图书馆[照片中间偏上方白色正方形带廊柱最大建筑物。——译者注]左侧有着廊柱的四边形建筑物。



(8)

1964年，帕森斯参加第十五届德国社会学大会，会议在海德堡召开，纪念马克斯·韦伯诞辰一百周年。在会上，帕森斯发表了主报告，重点谈了韦伯论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的观念。他和德国社会学学会前会长奥托·施塔默(Otto Stammer)一起安排了会议日程，以确保“法兰克福学派”中那些批评韦伯的人不会遇上对手。在照片中，帕森斯站在左边。其他人自左到右分别是：(帕森斯身后)利奥波德·冯·维泽(Leopold von Wiese)，德国社会学的“贤明长老”(nestor)，二战后作为学院教师重出江湖；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法国社会学的“江湖大佬”(doyen)；恩斯特·托皮奇(Ernst Topitsch)，60年代在海德堡大学教授科学哲学；以及施塔默。早在1962年9月于华盛顿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帕森斯与施塔默就曾会面，讨论海德堡会议的安排。



(9)

晚年的帕森斯也坚持不懈地渴求新知，关注时政。他的家人还记得，他在与家人一起时，绝大部分时间依然在埋头读书或看报（《纽约时报》是其最爱）。这个场景看起来是在准备野餐，他似乎想起来还在野炊炉上煮着什么东西，显然他一直在读报，野餐反而只能间或打断他。





(10)

帕森斯家在新罕布什尔的消暑别墅既是休憩地，也是庇护所，在帕森斯从哈佛退休后（海伦也是从哈佛退的休，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是俄国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还长久为夫妇俩服务。从30年代开始，他就邀请客人造访阿克沃斯（Acworth），从社会学角度讨论各种问题。比如说，1941年8月，沃格林（Eric Voegelin）就曾做客消暑别墅，讨论了帕森斯有关反犹太主义的文稿。1938年晚秋，正是帕森斯的搭救让沃格林逃离了欧洲的迫害，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帮沃格林找到了一份临时职位（需要提供一份书面担保）。

哈佛社会科学的应战努力与《社会系统》

<129>

第一节 引论

《哈佛世纪：一所大学对于一个国家的贡献》系庆祝哈佛大学建校三百五十周年的纪念之作。该书详细讨论了哈佛的自然科学家在二战期间对于原子弹的开发和最终投放所作出的贡献，但对于哈佛社会科学家为赢得二战所作出的贡献却只字未提。^[1]

其他还有一些论著虽非专述哈佛之作，但却充分重视了社会科学学人在战时的活动。《宣传的政治：1942—1945年的战情局》偶尔提到了哈佛心理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贡献，虽说依然未能讨论哈佛人士在这一战时机构中的广泛参与。^[2]与此类似，《斗篷与长袍：秘密战中的学人，1939—1961年》分析了哈佛和耶鲁的一些教授对于综情局、参谋局、战情局等政府机构的贡献，尽管有失全面。^[3]再有一例，《外国情报：参谋局的研究与分析，1942—1945年》回顾了哈佛历史学家威廉·兰格主持下一批学者的工作，遗憾的是，哈佛学者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E. 斯威齐的工作得到比较细致的讨论。^[4]

[1] Richard N. Smith, *The Harvard Century: The Making of a University to a N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2] Allan Winkler, *The Politics of Propaganda: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2-1945*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3] Robin W. Winks, *Cloak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书名中的斗篷(或披风)和长袍,分别喻指间谍和职业学人。——译者注]

[4] Barry M. Katz, *Foreign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942-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在此书明确重点讨论的社会科学家中,有菲利克斯·吉尔伯特、豪约·霍尔本、金德尔伯格和马尔库塞等,但来自哈佛的只有两位马派经济学家。

整体而言，有关哈佛社会科学家的应战努力的证据非常稀缺。我们找不到一部专著全面记载他们丰富多样的研究项目。从二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爆发，有过一些整体记录的尝试，结合当时方便所称的应战努力，凸显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这些报告中，有一些提到了哈佛的社会科学家，但这些分析的涵盖范围通常不仅限于哈佛，不仅限于社会学，往往以政治学为焦点，认为这块领域尤其重要。^[5]在其他一些分析阐述中，社会学家充当了主角，比如丹尼尔·勒纳讨论对纳粹德国的心理战的专著。这本书记录了许多学者进行的战时研究，包括社会学家哈特索恩、爱德华·希尔斯（来自芝加哥大学）、贾诺维茨[毕业于纽约大学华盛顿广场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Washington Square College）]。^[6]勒纳从自己的专长即政治学（而不是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人的研究，视之为应战努力的一种类型，整个探讨思路与哈佛毫无关系。

哈佛的社会科学对于二战的应战努力的贡献迄今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而我认为，这正是帕森斯《社会系统》的一个被普遍忽视的背景。本章我的宗旨就是具体论证帕森斯第二部要著的这种背景。我不仅要提到哈佛应战努力的丰富场面和结果，也要阐述帕森斯在二战胜利前夕、特别是战后初期的种种努力。我将具体记叙，帕森斯关注的是确保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他眼里，就其作为一种“国家基本资源”的价值而言，与核物理同等重要。^[7]

[5] 例见 Leonard W. Doob,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1, 1947, 第 649—667 页; Carl J. Friedrich,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art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1, 1947, 第 978—990 页; Paul M. A. Linebarg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Washington: Infantry Journal Press, 1948)。

[6] Daniel Lern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Nazi Germany, D-Day to VE-Day* (New York: Georg W. Stewart, 1949), 该研究以信息全面见长, 分析了心理战处所采取的对敌说服攻势的学术思路。该处的职员中也包括理查德·格罗斯曼, 他后来在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政府中担任内政大臣; 还有克劳斯·曼, 诺贝尔奖得主、作家托马斯·曼之子。有关贾诺维茨, 详参 Dennis Smith, *The Chicago School: A Liber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尤其是第 184—188 页。

[7] 见帕森斯 1946—1948 年撰写并呈交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备忘录的标题,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参看下文。

第二节 哈佛社会科学应战努力的一些片段

鉴于确凿的二手文献尚不存在，必要的证据既根据讨论诸多相关话题的论著和文章，也取自各种公文报告和未刊材料。包括帕森斯在内的哈佛社会科学家在以下四个领域的应战努力表现尤为突出。这些任务中有的是在首都华盛顿进行的，另有一些则远及远东和欧洲战区，还有一些战时工作就在哈佛本部开展。 <131>

一、政府机构

1941年9月，综情局成立，该机构负责从国会图书馆搜集有关敌国的各种资料加以分析，供军队等部门使用。其首批雇员中就有哈特索恩。他和帕森斯有过许多合作，比如在捍卫美国哈佛小组的国民士气委员会。两人当时正准备合撰一本书，题为《德国社会结构与国民心理》。^[8]

1941年参加综情局的另一位哈佛学者是历史学家兰格。1942年6月，兰格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参谋局调查与研究处（简称调研处）处长。参谋局是综情局的两个后续机构之一。^[9]当时人们常说的“调研”很快孕育出众多学术成果，就敌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法律、军事组织机制、宣传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各方面特性，提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备忘录。^[10]为该处工作的其他哈佛社会科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历史学家^[11]施莱尔辛格、布林顿，^[12]经济学家罗斯托和乔

[8] 拟议的出版商是 Reynal & Hitchcock, New York / Philadelphia. 亦参前文。

[9] 部分细节参看 William Langer, *In and Out of the Ivory Tower: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Neale Watson, 1977)。

[10] 对于调研处的细致研究所积累的丰富材料的评价，参看 Petra Marquardt-Bigman, *Amerikanische Geheimdienstanalysen über Deutschland 1942–1949* (Munich: Oldenbourg, 1995)。

[11] 与参谋局有关的全部历史学家的名单，参看 Winks, *Cloak and Gown*, 第 495—497 页。

[12] 布林顿作为精研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也曾著书讨论 19 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包括社会进化论。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 版）开篇首段即引用了他的话，认为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社会理论而言，斯宾塞的功利主义可谓已死。在 30 年代早期，布林顿与帕森斯同属传奇般的“哈佛帕累托小组”成员，正是在该小组展开反达尔文主义的讨论，参看 Barbara Heyl, “The ‘Harvard Pareto Circ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4, 1968, 第 316—334 页。亦参第一章。

治·梅森,后者 1944 年离开参谋局,就任助理国务卿。^[13]

参谋局处理敌国信息,战情局则主要关注美国国内。但战情局也有一项任务,就是撰写敌国情况手册,以供美国公众、政府和军队所用;任务之二是贯彻“实情策略”下的宣传,赢取公众对于政府战时措施的支持;^[14]任务之三是在战场附近审讯纳粹战俘,或是在位于纽约长岛的培训中心训练去海外从事此类工作的职员。帕森斯的合作者哈特索恩 1943 年冬在培训中心工作,然后他自己也被派往阿尔及尔和罗马执行相关使命。

从 1945 年 3 月到 10 月,帕森斯在外国经济管理署敌国处这一政府机构兼职顾问。他撰写了多份备忘录,建议对德国进行非军事化和非卡特化,但不是非工业化,警告美国的占领政策有可能在无意之中重新激起德国的国族主义。^[15]

帕森斯参与的有关战后德国问题的会议,系由陆军部的总司令办公室提供资助。^[16]

[13] Smith, *Harvard Century*, 第 170 页。在后两人中,罗斯托于 60 年代相继成为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重要顾问,而梅森则曾担任副国务卿,当时的代理国务卿是约瑟夫·C. 格鲁,哈佛毕业生,职业外交官,坚定地支持社会科学充当政府决策的资源。

[14] 1943 年,《舆论季刊》以一期专号讨论了战情局针对美国民众的各项政策和方案。相关介绍包括 Jerome Bruner, “OWI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A. H. Feller, “OWI on the Home Front”; Carl J. Friedrich, “Principles of Informational Strategies”; 以及 Robert J. Landry, “The Impact of OWI on Broadcasting” 等等。参看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7(1943 年春季号), 第 3—185 页。亦参第二章。

[15] 此前有关帕森斯这一工作的阐述,参看笔者所撰 “Talcott Parsons als Deutschlandexperte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vol. 43, 1991, 第 211—234 页; “Die Geburt Europas aus dem Geist der Soziologie”, *Ruperto Carola, Wissenschaftsmagazin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2/1996, 第 24—30 页;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 Societ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2, 1996, 第 303—323 页; 以及 “Talcott Parsons und die amerikanische Besatzungspolitik”,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vol. 24, 1998, 第 121—151 页。参看上文第二章及下文。

[16] 会议最终落实为 Richard Brickner, *Report on a Conference on Germany After the War* (未注明时间地点,推定为 1944 年 11 月纽约)。1944 年 12 月,经过选择的一些政府机构得到了这份报告。1945 年,该报告公开发表,标题平凡无奇:“战后德国—1945 年圆桌会议”,刊于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11, 1945, 第 381—441 页。亦参前文第二章。下文讨论的主要就是布里克纳的会议, Gerhardt, “A Hidden Agenda for Recovery: The Psychiatric Conceptualization of Re-education for Germ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World War II”, *German History*, vol. 14, 1996, 第 297—324 页。

二、志愿团体

1940年夏，民主议事会成为学者和公众人物的一个志愿团体，旨在增强美国民主体制，抗击法西斯主义。哈佛政治学家弗里德利希作为民主议事会的创会成员，邀请帕森斯加入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并明确指出，作为法西斯主义之对立面的民主体制，其诸多议题都有待“基于一切可以利用的事实，通过讨论，加以探究”。他还说道：“作为顾问，我正在寻访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男女人士，能够随时准备就我们工作中所涉及某项政策的与其专业领域有关的具体方面提供信息。”^[17] 1941年12月，《万象》杂志（*Variety*）授予民主议事会爱国领袖奖章（Plaque for Patriotic Leadership），表彰其向全国公民成功弘扬美国的民主。^[18]

<133>

民主议事会的一个扩展机构是国民士气委员会。其最初的主要任务是准备一份德国心理战书目解题，1941年编纂，1942年成书出版。^[19]

哈佛人员参与的另外一个志愿团体是“捍卫美国”^[20]。该团体的哈佛小组成立于1940年6月，主席是哲学家拉尔夫·巴顿·佩里，在欧战胜利日之前，该小组一直很活跃。根据“捍卫美国组织行动计划”，捍卫美国协会的核心宗旨是“捍卫美国不受国外实际或潜在敌人的侵害，抵御国内破坏性分裂。……必须同时始终保持警惕、始终忠诚于国家、始终坚信国家所支持的社会人文价值。”^[21] 帕森斯为主席，哈特索恩为副主席，组织了分委会的讨论组，讨论士气问题、德

[17] 弗里德利希 1940 年 10 月 8 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2, box 3。

[18] Cedric Larson, "The Council for Democr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 1942, 第 284—290 页，尤其是第 288 页。

[19] Ladislav Farago 等合编，*German Psychological Warfare.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New York: Putnam and Sons, 1942; 初版为 New York: 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 1941)。亦参上文第二章。

[20] 还有一家志愿团体，其目标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已经完成，就是哈佛对英军援运动。它一直持续到 1940 年底参议院通过《租借法》（Lend-Lease Bill）。[原文表述如此。其实是罗斯福于 1940 年 12 月提出“租借”概念，以应对美国需向二战盟国提供大批军火、交通工具和食品等物资，而丘吉尔在 1940 年夏提出英国已无法维持现金支付战争物资的局面。美国国会于 1941 年 3 月通过《租借法》，授权总统援助任何一个他认为防务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并接受以实物或财产等直接或间接方式偿还。援助范围迅速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扩大到中国和苏联。——译者注]

[21] "Blue Print for Organization of an American Defense Group", 针对哈佛的文稿收于帕森斯档案，HUG (FP)-42.8.4, box 3; 本句引自第 3 页。

国从一战以前到纳粹上台的社会结构，然后是有关日本社会和美国意识形态的两个讨论组。^[22]

1940年建立的另一个志愿团体一直持续到60年代，就是“科学、哲学、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之关系会议”。会议的组织者莱曼·布赖森、芬克尔斯坦和麦基佛（战时及战后初期各辑会议论文集集合编者）都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为基地。会议在创会初期乃至整个40年代都吸引了大量社会科学家及众多公共人物，比如艾森豪威尔和核物理学家罗伯特·J·奥本海默。提交研讨会的论文围绕着以下会议主题，比如“自由”、“世界和平”、“统与分”、“权力与冲突”或“一体化的进展，1939—1949年”，这里仅举40年代讨论的几个例子。1949年，列名参与讨论的会议成员包括亚历山大·卡尔·W·多伊奇、古里安、克拉克洪、拉斯威尔、玛格丽特·米德、梅克勒约翰·默里、帕森斯、拉尔夫·巴顿·佩里、阿瑟·厄珀姆·波普、乔治·N·舒斯特、萨缪尔·A·斯托弗、沃思、昆西·赖特等将近两百人。^[23]在40年代，帕森斯为会议准备的论文有“宗教与种族张力”（1944年）、“侵犯性的起源和模式”（1946年），还有一份为1947年的会议“学术如何有助于缓解国际张力？”准备的29页草稿，题为“社会科学的制度化与大会诸问题”。^[24]

三、研究

社会学家们常常研究与纳粹有关的话题，包括抗击纳粹的战争。比如说，193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阿贝尔基于纳粹党成员的传记，出版了一项研究，题为《希特勒何以夺权？》。^[25]流亡社会学家汉斯·格特曾于1938—1939学年在哈佛执教，1940年，他撰文分析纳粹党的组成和领导，以说明他们如何上

[22] 帕森斯1943年5月24日致佩里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 box 3。

[23] “Program. Tenth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convoked by Mortimer J. Adler (first of a list of nearly two hundred names) at The Men's Faculty Club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on... September 6, 7, 8 and 9, 1949”；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8.4, box 8。

[24] 文稿似乎是一篇文章的初稿，该文并未在1947年的大会上正式发表，只有手写的说明“科学、宗教与哲学会议”，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8.4, box 8。

[25] Theodore Abel,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38)。

台掌权。^[26]

在哈佛的一项持续到1940年4月1日的研究项目中，阿尔波特与历史学家费伊和哈特索恩合作，邀请世界各地的德国流亡人士撰写自传，话题是“1933年1月30日前后我的生活”。[该日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译者注] 此项研究收集到234份报告，许多报告长达几百页（比如当时流亡日本的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描述了他和海德格尔的关系，描述了他在纳粹上台前就遭同事冷遇、最终逃离德国的经历^[27]）。阿尔波特与杰尔姆·布鲁纳及另一位合作者，基于社会灾祸下的人格这一分析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初步解释。^[28]

帕森斯的身边有不少研究项目在进行。帕森斯从前的学生默顿，曾任图兰（Tulane）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40年代早期转往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接受综情局伙伴机构资情局委托，研究战时公债的宣传。^[29]在整个战事激烈期间，综情局调研处一直在研究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成了大约两千份报告，最终为1945年11月开始的纽伦堡国际审判法庭起诉纳粹头脑准备了材料。该处所搜集并分析的材料中，详细记录了纳粹头脑们的犯罪责任，纳粹是如何计划主宰欧洲，包括第三帝国如何计划在波兰进而则是西方世界建立集中营，进行种族灭绝。^[30]

<135>

[26] Hans Gerth, "The Nazi Party: Its Leadership and Compos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1940, 第517—541页。

[27] 洛维特的长文在其身后作为单行本自传出版，Karl Löwith,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Stuttgart; Metzler, 1986)。

[28] Gordon W. Allport, Jerome Bruner 与 Erich Jandorf, "Personality Under Social Catastrophe",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vol. 10, 1941, 第1—22页。哈特索恩根据有关1938年11月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的访谈材料编了一本书，对比了纳粹受害者令人震撼、促人警醒的自述，纳粹报章的报道，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新闻报道。此书拟名为《纳粹的疯狂》，遗憾的是，它始终未能找到出版商。

[29] 此项研究的成果在战后出版，即 Robert K. Merton, *Mass Persuasi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6) (Marjorie Fiske 和 Alberta Curtis 协助)。

[30] 例如可以参看 R & A Report No. 3110, "Leadership Principle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22页), 1945年7月18日; No. 3114, "Nazi Plans for Dominating Germany and Europe" (95页), 1945年8月7日; No. 3113.1, "Principal Nazi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the Commission of War Crimes, Criminal Responsibil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ge of 1934" (18页), 1945年6月15日; No. 3113.3, "Legislative Agencies Involved in War Crimes" (30页), 1945年8月28日; No. 3114.2, "Nazi Plans for Dominating Germany and Europe. Domestic Crimes" (68页), 1945年8月13日; 以及 No. 3114.3, "Nazi Plans for Dominating Germany and Europe. The Criminal Conspiracy Against the Jews" (15页), 1945年8月15日。

当时还有一项研究是米德和贝特森合作进行的。贝特森令人影响深刻地分析了一部德国电影，讲述一个男孩如何放弃共产主义，转而皈依希特勒青年团，刻画了将牺牲作为放弃个人独立乃至身份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研究——借用米德后来提出的一个说法——将德国作为“远方文化”考察了法西斯主义。^[31]

另一项研究努力被称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这项大型调查的系列报告最终长达数千页，由心理学家利克特主持，他是战时研究中最富经验的组织协调者之一（他在完成了资情局委托的任务后，又主持了项目调查处 (Division of Program Surveys) 通过民意调查了解士气的考察，然后才来指导战略轰炸调查)。1944年12月，哈特索恩担任利克特的顾问，负责设计调查问卷，用于战败后的德国。这种问卷不仅必须研究轰炸对于德国士气的影响，还得研究停战初期德国人的心态。素材是通过1945年3月到7月之间对德国人的访谈搜集的。^[32] 针对日本也做了类似的研究。^[33]

<136> 诚然，这些方面的事情帕森斯都没有参与。但他本人几番尝试，为一项比较研究寻求资助。1942年初，他在丹麦流亡者兰德希尔的共同主持下，与阿贝尔、阿伦斯伯格、古尔维奇、哈特索恩和默顿等同行合作，筹划研究纳粹德国占领下各国的社会结构，每人负责调查一个国家的情况。^[34] 1943年夏，作为军方特训项目的教学附属任务，^[35] 他草拟了一套研究方案，与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合作，通

[31] 参看 Margaret Mead 与 Rhoda Metraux 合著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32] 根据这项研究完成的两部主要出版物是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German Morale. Vol. 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ly 1947); *Vol. 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ecember 1946)。[原文确系第二卷先于第一卷出版。——译者注]。有些态度数据在下文中另有分析，Helen Peak, "Observation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German Nazis",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vol. 59 (1945), no. 6 (专号)。

[33] 在此或许只需要指出，帕森斯认为后一研究在面向远东战场的应战努力中属于非常成功的一项 (参看下文)。

[34] 参看前文第二章。详参帕森斯 1942年6月11日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埃文斯函，1942年11月18日致同一机构的威利茨函。在这两封信之后，帕森斯还登门拜访，说明研究设想。但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什么成效。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15。

[35] 参看下一节。

过考察波士顿地区的流亡家庭，研究德国与意大利的家庭体系。^[36] 不过，1944年下半年另有一项小型研究，受剑桥社区议事会（Cambridge Community Council）资助，帕森斯和韦尔斯利社区事务学院（Wellesley School of Community Affairs）教员伊丽莎白·施莱尔辛格为指导，对拉德克利夫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的学生进行访谈，考察种族关系（族裔群体）。^[37]

四、民事培训学校

1942年5月，第一所军管学院在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创办，由陆军部新设立的民事署（Civil Affairs Division, CAD）发起，院长是约翰·希尔德林将军。^[38] 民事培训项目（Civil Affairs Training Program, CATP）的课程为期三个月，面向至少拥有高中学历的比较年轻的军人；军方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 ASTP）为期九个月，所针对的申请者需要拥有专精职业的教育背景或大学教育背景，能够流利使用至少一门外语，年龄在30至55岁之间。^[39]

哈佛大学从1943年6月开始同时启动了民事培训项目和军方特训项目，后者包含大约900小时高年级研究生水平的课程。其中半数以上主要是培训各种语言，要么是远东语言，要么是欧洲语言。剩下的就是教授相关区域各国的地理、

<137>

[36] 已完成全稿的“Application for Grant Form from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有关研究方案的五页草拟说明“Research Project for the Study of German and Italian Family Systems”；以及有关研究目标的五页草拟说明，皆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 box 9。

[37] 参看 Elizabeth Schlesinger 1944年9月21日所撰“Memorandum to the American Defense Steering Committee”，收于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 box 3。

[38] 1943年，此类培训未来军管职员的项目又相继在其他九所大学开设，即波士顿、芝加哥、哈佛、密歇根、西北、斯坦福（以上夏季开学），西部保留地（Western Reserve）、威斯康星、耶鲁（以上秋季开学）。

[39] 详参 Earl F. Ziemke,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 1944-1946* (Washington, D.C.: Museum of Military History, 1975)。两类课程的申请者都必须经过大学组织的严格筛选的面试。这就意味着，在1943年最后三个月完成民事培训项目的大约2000名军人，是从25000名申请人中挑选出来的；而同期接受军方特训项目的960名平民则是从大约50000名申请人中筛选出来的。

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管理结构、文化传统及心智状况。^[40]

在1944年前尚为副教授的帕森斯，最初负责同时为民事培训项目和军方特训项目教授中欧地区的课程，特别是德国。然后他又负责组织整个军方特训项目课程。根据他向社会科学教务长呈交的自己详细的日程安排，他在1943年下半年耗费了整个工作时间的六分之五在这项任务上。^[41]他负责筹委会的议程安排和讨论纪要，并主管筹划课程、招募职员，并就各式相关话题外聘讲课专家，自己还要备课、讲演和测试学员。^[42]

第三节 帕森斯与哈佛应战努力有关的一些研究主题

从1939年到1945年，帕森斯的十五篇文章里，有七篇讨论的主题与战争有关。比如说，“韦伯与当代政治危机”（1942年1月和4月分两部分发表）；“群体张力中的种族差异和宗教差异因素”（最初系呈交1944年“科学、哲学、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之关系会议”的论文），显然都与战争局势有关。另外还有三份未出版的文稿，至少十四篇电台演说，为各式各样的团体或机构所做的一堆特别备忘录、报告、会议纪要或决议。

本节回顾了他融入与战争相关的工作的社会学研究，简单概括向民主义事会呈交的备忘录，为捍卫美国小组的决议所拟的草稿，为民事培训项目和军方特训项目准备的讲课笔记，论德国再教育问题的文章，为外国经济管理署撰写的备

[40] 弗里德利希作为哈佛海外管理学院的院长，在总结1944年2月之前进展的年度报告中，将一年前由哈佛校务委员会(Corporation of Harvard)投票通过的学院总体宗旨概括如下：“其宗旨在于发展地区研究和教学的强化训练项目，尤其关注有可能前往海外执行美国在全球面临的战争和战后任务的美国人的培训需求。”见“Annual Report, 1943.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院长撰，未出版，1944（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存档号HUE 67.143.75B），第1页。

[41] 帕森斯最初被指派划出一半时间参与军管政府和国际共管机构委员会(Committees on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的事务，但他在一封写给巴克教务长的信中解释道，自己更多的时间其实花在了民事培训项目上。见帕森斯1943年12月8日致巴克函，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 box 9。

[42] 在哈佛，针对日本的民事培训项目和军方特训项目持续到1945年，针对欧洲的项目则在1944年4月结束。

备忘录,以及一篇论西方社会中的侵犯性的文章,这最初是为“科学、哲学、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之关系会议”1946年的系列会议准备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原子弹带来了二战的胜利,也带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正是针对这一背景,他提出了一些思考,也奠定了哈佛社会科学应战努力的基本方针。 <138>

一、向民主议事会呈交的备忘录

本备忘录的主旨在于:各个种族、族群、社会阶级或其他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张力产生了社会解组,并进而可能导致失范,这种失范又根植于行动取向层面上的个体不安全感。根据拉斯威尔的命题,个体不安全感会促进转向效忠非民主的力量,针对那些已经丧失了与国族、经济体系等之间认同的现代公民大众,提供类似于安全感的假象。透过这样的诊断,就可以说明民主国家为何可能沦为极权主义。

可以发现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秩序。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表现出五点主导要素,即“包括种族在内的国族主义,社会主义,反智主义,军国主义,以及著名的领袖制原则所体现出的所谓特殊主义”^[43],这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威胁。

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社会,可概括为以下六点特征:(1)相对于“人治”的“法治”,按照帕森斯的同事弗里德利希的分析,可归为“宪治”;(2)公民自由权利,不过他提醒道,这不能不加分辨地延伸到那些旨在破坏民主结构的人身上;(3)机会平等,他强调说,这一点值得进一步巩固,不仅仅在于单纯的金钱成就,而且要牢固确立在其他的成功标准上;(4)获致成就的公正规范,要强调对于共同体的志愿服务;(5)理性批判精神,倡导科学、技术和专业责任,但拒绝一味消极否定的态度;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6)积极行动的立场,这意味着直

Parsons, "Memorandu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Amenable to Use Against American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d Possible Measures of Prevention" (未出版, 1946), 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101—130 页, 本句引自第 114 页。

二、为捍卫美国小组国民士气委员会提出的专门理论

帕森斯坚信，理解了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就意味着能够更好地与之抗争。他看得很清楚，国家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以暴力和欺诈为基础的社会。他在一份敦促美国援助英国、美国人应当参战的文稿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当“德国……已经控制了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44]时，帕森斯为捍卫美国小组起草了一份决议，大声疾呼奋起抗御纳粹主义：

我们美国人面临一项根本抉择。我们可以积极抗击这场灾难，我们也可以消极自得地坐视不管，只想着保住我们已有的东西。……而我们（此处原件空缺）小组成员对这种抉择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我们理解这将意味着举国之资源，无论道德资源还是物质资源，都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调动起来，投入一场抗击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同盟的决定性战斗。……这将意味着准备好甚或期待着亲身投入战争。……这意味着……人人各尽其长，各倾其备，抓住机会，积极参与，奋力实现目标。^[45]

三、为未来军管政府官员讲授的关于德国的社会学

1943年6月14日，在民事培训项目和军方特训项目两个项目的开弗里德利希·爱德华·福克斯院长和帕森斯向第一批“学员”致词。^[46]项目致词中明确指出，“这确实是一个重大机遇，可以做一些前人未谓前所未有，言之为何？”

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要给诸位提供某种社会科学领域的希望针对这一特殊的任务讲授科目，并尽我们所能动员这门

[44] 该文稿没有标题，分为三部分，起首句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第(FP)-42.8.2, box 3。

[45] 同上引，第2页。

[46] 事实上，这些学员大多在民间各行各业享有相当地位。如前所述，尤其是军方特训项目的学员，都是专业人士（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市政管理界高层雇员。简言之，他们往往是受过很好专业训练
参看 Ziemke,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

体
校
面

[43] Pa
Ag
194

资源。按照我们的理解,这项特殊的任务就在于理解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并且其理解方式将切实帮助那些与该社会的民众实际打交道的人。随着我们培训项目的逐步推进,诸位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的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47]

在接下来的九个月教学中,帕森斯将他在开班演讲中的诉求付诸实施。他讨论了德国的人口、家庭与亲属结构,以及方方面面的制度结构,比如民法、权威结构、地方政府、教育体制、自由职业、宗教的组织(路德宗和天主教各教会及其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军事组织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讨论了德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后果。^[48]此外,在1943年11月12日至12月23日期间,他还为军方特训项目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课程讲授现代欧洲思想的有关问题,有纳粹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即反资本主义)成分(“纳粹主义II”);纳粹主义中的激进革命主义、青年文化和反犹主义(“纳粹主义III”);基督教在欧洲文化模式中的社会意涵;“既得利益”与保守主义;德国文化中的结构环境;德国文化的宗教背景;纳粹主义和德国国族传统;德国与英美民主体制之间的差异。^[49]

1943年7月25日,帕森斯在民事培训项目班上讲演反犹主义,这份讲课笔记或许能够体现他的思路。^[50]他首先考察了犹太人被选为非犹太社会中的替罪羊的两大原因。其一,犹太人既是内群体又是外群体,他们这些社会成员既不像外国人那样相隔遥远,又因为其(正统程度不等的)社群在社会宗教方面的特征而有别于非犹太人。其二,对于那些对抗现代社会中现代化过程的“原教旨主义”群体来说,他们是某种“自然”的符号,在“原教旨主义者”眼中,成了所有现代的东西的鲜明浓缩。无论现代生活是作为经济资本主义、宗教解放还是唯智主义而被拒弃或遭憎恨,犹太人始终是充当了充满怨恨的反现代主义的符号。

[47]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Program Advanced Phase, Opening Meeting - June 14, 1943”,第9页;哈佛大学档案馆,UA V 663.8, box 2。

[48] 有关课程大纲的详细材料,包括帕森斯的那些讲课安排,皆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UA V 663.8, box 1。

[49] 参看“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 Central European Program. Outline”,1943年9月29日,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UA V 663.8, box 1。

[50] “CA Anti-Semitism, July 25”,手书讲课笔记,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UA V 663.8, box 2。

帕森斯的讲课笔记只是一些关键词或短句，草草记下几处要点。即便如此，他也点明了犹太人是“有关解放的无与伦比的象征”，意味着与解放相对抗的“原教旨主义”群体可以通过憎恨犹太人而抗击现代性。因此，他指出，这些人可以用来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唯智主义和 / 或都市主义。反犹主义既可以是反基督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因为它实质上源于失范和虚无主义，代表了不止一种的非道德性。他在讲课中指出，宣扬这种无所不包的偏见的人，对犹太人据称的国际性看不顺眼，假定经济生活到处都被所谓实力强大的世界犹太人群体所控制。他还提到，即便是在美国，犹太人也被告控说操控了经济生活。^[51]

接下来，帕森斯还谈到了有关反犹主义的另外两个要点，分别用了“牺牲品”和“对于牺牲品的反应”这两个关键词。在前一个名目下，他点到了“可以区别的（可见性）；基本没有可能报复；可接触性；此前的责难；人格化”；而在后一个名目下，他主要提到了“压制；顺从 + 缓和；抵抗 + 同化，反向寻找替罪羊（contra-scapegoating），内群感增强，暂时的安全感”^[52]。

<141> 从他的讲课笔记来看，对付这类偏见的办法似乎是“回报的重要性，甚至是对遏止偏见加以褒扬”。这类宣传将会巩固歧视或种族中心主义的缺失或对于这些态度的否定，作为军管政府方面的一种反偏见政策^[53]（他在 1944/1945 年详细阐述针对德国的三类制度控制时，又修正了这一看法）。

[51] 帕森斯的讲课笔记在这一点上标了颇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句：“以中国皇帝为例”。虽然他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推测，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皇帝的几乎全体臣民都从未亲眼得见皇帝本人，因此总是胡乱幻想他的样子。这就有如反犹主义者幻想犹太人是什么样子、在“干些什么”或者“是什么”。

[52] 讲课笔记，“CA Anti-Semitism, July 25”，第 3 页。

[53] 在“宣传与社会控制”一文中，他明确区分了共产主义的“革命型”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破坏型”或“揭批型”宣传，以及民主体制的“巩固型”宣传。这些宣传类型又关联到两类社会控制，即偏离型（专制的）政权下的压制型控制，整合型（民主的）政权下的宽容型控制。参看其“Propaganda and Social Control”，*Psychiatry*, vol. 5, 1942, 重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243—274 页。亦参前文。[在前文第 101 页（原书页码），这两类社会控制分别是强制型和志愿型。——译者注]

四、作为“受控型制度变迁”的德国再教育

从1944年的9月到11月初，帕森斯一直在为“战后德国问题会议”的最终报告修改一份备忘录，该会议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专家布里克纳负责召集，并得到陆军部的资助，在该年稍早前召开。

修改后的备忘录于1945年初公开发表，提出三大命题。首先，对付纳粹主义的社会变迁可能会遭到所谓“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除非再教育政策潜移默化，政策所针对的那些人未能注意到。其次，米德的假设很有道理，德国的国民性格具有某种二元结构，在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之间摇摆。再次，如果军管政府的各项政策坚定有力，同时不颐指气使(nondirective)^[54]，德国人也不难与军管政府合作，让德国人自己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再教育，成为一个民主的国族。

这样的制度变迁要应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控制政策。其一，**倒退型控制**，用韦伯的权威类型的用语来说，就是抗衡进一步向更为明显的传统主义倒退，甚至比克里斯玛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已经发展出来的还有过之。

其二，也是在社会学角度上更具意味的，是**宽容型控制**。(未来的)同盟国军管政府政策将确立某些特别的制度创新，能够通过向经济—职业体系的市场资本主义转换，潜移默化地消解纳粹心态。普遍主义和获致取向的心态将在德国人的头脑中进一步增强，通过最初发生在经济—职业领域的变迁，他们的价值取向将倾向于民主。至于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即如何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补充道，德国的重建绝非错误，因为世界和平的关键就在于国际控制，而不是清除德国的工业产能：“要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于更好的国际控制体系，而不是清除德国的工业产能。”^[55]

第三类社会控制他称为**直接型**，就是通过坚决无情的压制，处理种族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的其他特性，打掉“社会主义”对于德国人的一切吸引力，将他们的形式主义转换成对于个体性的认识，哪怕需要付出代价，重归德国人声誉不佳的那种僵化的法条主义。

<142>

[54] 这也是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观点，这位作家也是德国流亡者，曾于1943年在众议院战后政策委员会就这方面作证过。参看 Emil Ludwig, *The Moral Conquest of German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45)。

[55] Parsons, “The Problem of Controlled Institutional Change”, 第314页。

五、向外国经济管理署呈交的备忘录

帕森斯在为外国经济管理署（敌国处）准备的备忘录中，具体阐述了他所说的“应用型社会科学”是什么意思。^[56]他的备忘录讨论的是“西方诸国占领区与德国的分离”这项政策，其中他指出，要让德国人吸取教训，明白民主体制如何比任何威权主义结构更为有效，就得坚信市场经济下的经济自决原则：

从内部来看，最重要的就在于创造一个核心，在德国民众当中培养自由民主社会。只要道德—心理状况不错，经济比较繁荣，经济机会不断扩张，局面有利，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在国际共管下会比在德国人自治下更有可能实现这一点，因为前者更不需要对经济实施压制型控制。^[57]

至于外经署的德国裁减军备计划，他认为，制度性的裁减军备是让德国重新民主化的核心，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军力的制度领域而言，要彻底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目标不仅是武装力量组织，还必须包括尚武价值和传统所具备的声望。其次，要让经济脱离国家政府。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废除卡特尔和垄断，还得铲除所谓产业群体的准政府力量；^[58]这样，经济就成为社会中一块富于竞争性、去除政治性的领域，市场力量可以畅行无阻。再次，彻底废除利用国际关系作为庇护，进行间谍活动或欺诈；这样的话，国际关系就摆脱了约束，可以成为合作与交流的场域。他大胆提出，如此一来，纳粹帝国主义在欧洲带来深重灾难的做法，即强势者剥削弱小者，就可以得到控制，或者得到预防。

当然，以裁减军备的名义推动的这类制度变迁，需要有积极正面的目标作为理据。单靠摧毁不值得想望的纳粹体制是不够的，还需要领会取而代之的适于德国社会的民主体制。“讨论的重点不能只是如何清除或压制某些制

[56] “The Problem of Controlled Institutional Change”一文还有一个副标题，“An Essay i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57] 帕森斯1945年8月7日致凯泽备忘录，主题是“Separation of Western Territories from Germany”，第4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9。

[58] 指的是在纳粹扶植下，各经济部门内部整个联合起来，形成依赖国家的集中化综合企业，在基本上属于政治性的政策（比如党的方针）下，以超越于竞争或市场控制的方式运作。

度。”^[59]“单单压制它们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说到底,如果德国社会还要维持生存,就必须以某种形式加以组织,无论我们乐意与否,同盟国的政策都将影响到这种形式的发展。”他由此得出结论:“期望有什么样的选择方案出现,可能取代被摧毁的体制;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引导,向我们看来最能接受的那些选择方案发展,对这些方面作出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六、有关西方类型社会的侵犯性之起源与展望

1946年9月,“科学、哲学、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之关系会议”召开第七届研讨会,主题为“西方文化中的权力与侵犯及这种文化本身的转型与整合之方法”^[60]。帕森斯的选择是基于原子弹爆炸的影响,重新分析侵犯性。他认为,拉斯威尔的不安全感假设丝毫未有失色。

他首先提出,“有关侵犯性的心理学的几个基本事实”^[61]意味着,侵犯性作为某种文化趋向,而不单单是个体趋向,需要得到社会学角度的关注。现代社会的三种子体系产生了侵犯性,可以转换为愿意支持反民主的运动,或维持某个侵犯成性的国族的政治。首先,现代西方都市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体系已经不再能够庇护个人声望和安全,这就产生了焦虑,会被诉求侵犯性的政治运动利用。其次,职业体系在收入和影响等级上的上升机会缺乏确定性和公正性,可能孕育不满,更糟的是,“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不公正,其中许多深植于社会的本质,因为许多人(个体)趋于偏执,看到的不公正就比实际存在的还要多。”^[62]他总结道,“因此,目前看来,亲属关系和职业体系构成了两套相互增强的力量体系,

^[59] 帕森斯 1945 年 9 月 14 日致凯泽备忘录,主题为“Revision of Chapter 10 of the FEA Disarmament Plan Called Institutional Disarmament”,第 2 页。以下两则引语皆摘自同一页。据帕森斯档案, HUG (FP) - 15.2, box 9。

^[60] “Announcing the publication of *Conflicts of Power in Modern Culture*, autumn 1947, Seventh symposium of the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distributed by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 42.8.4, box 8。

^[61] Parsons, “Certain Primary Sources and Patterns of Aggression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初刊于 *Psychiatry*, vol. 10, 1947, 第 167—181 页; 重印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325—347 页, 本句摘自第 326 页。

^[62] 同上引, 第 338 页; 下一则引语也摘自同一页。

<144> 作用于个体，产生大量的侵犯冲动，压制了其中的大部分，导向找寻一些代理人，能够在符号象征的角度上为个体及其认同的那些人所蒙受的失败、欺骗和不承担责任。”

第三个子体系所具有的危险最为糟糕。“群体仇视”一旦被某个不受民主政体控制的政府所利用，就很容易变成侵犯性帝国主义的驱动力。“原教旨主义的反应模式往往将价值观念汇聚于……非正式的群体团结的构成和象征化之中。”^[63] 这类被移置的侵犯性以“外国人”为目标，之所以非常危险，原则上是因为，事实上，在战后，由于原子弹的存在，“许多民族国家现在拥有了如此具有破坏性的武器，它们之间如果爆发战争，几乎意味着自杀。”^[64]

第四节 帕森斯的三位哈佛同事所付出的应战努力

如前所述，并非只有帕森斯在做应战努力。在1940—1945年间，哈佛有许多教授间断或持续地投身于各种项目和计划，其中有些帕森斯也参与了。同样，无论是对于帕森斯还是对于他的同事们，主导其应战努力的主题并不会随着战争胜利戛然而止，而会融入其战后的某些工作。为了具体说明这样的关注，并由此进一步证明帕森斯的说法，即社会科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资源举足轻重，我会简单介绍其中三位的背景：阿尔波特、弗里德利希和克拉克洪。

一、阿尔波特

阿尔波特是一位心理学教授，20世纪20年代在柏林大学跟从勒温做研究生。他的主要研究领域类似同事默里，是关于人的人格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起源和功能运作。^[65] 1940年，阿尔波特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开创了有关士气的研究兴

[63] 同上引，第341页。

[64] 同上引，第342页。

[65] 参看其主要著作之一，Allport,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37)。

趣^[66]，并和另两位同行编撰了一份搜罗广泛的文献著录。^[67]1940年，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学会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 S.P.S.S.I.*) 创立，勒温担任首任会长，阿尔波特成为会中活跃的成员。学会第二期年刊题为《民气》 (*Civilian Morale*)，收录了讨论士气几乎各个方面的学术文章，包括劳资关系、种族关系或国民性格，阿尔波特也撰写了稿件。^[68]1943年，阿尔波特加入海外管理学院教员行列，并成为捍卫美国哈佛小组的顾问。在这两个机构里，帕森斯都成为其同事。

第二个话题：1942—1943年，阿尔波特作为《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编辑，邀请了一些杰出的美国学者和流亡德国学者撰写纳粹主义、战争和心理学的文章。在他的支持下，布鲁诺·贝特海姆和库特·邦迪发表了有关集中营生活的第一篇分析详细的亲历报告。^[69]

1945年，《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学会年刊》集中刊载了曾在学会1944年年会上讨论的世界和平问题。^[70]阿尔波特的文章属于题为“我们把握中的世界秩序”一节，建议“同盟国”在战后立即变为一个积极行动的和平组织 [二战中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同盟，斯大林提出“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的说法，二十六个签署国即成为同盟国。这是日后“联合国”的基础。——译者注]，并敦促就国际政治事务迅速作出决策，以便促成心理上的变迁，有助于未来的和平：“战

[66] 这项研究发起了一系列的《士气丛刊》 (*Worksheets on Morale*)，兼具教育和指导意义，旨在全国通用。所涉及的话题包括“宣传战的分析与执行”、“夯实士气之社区指导课程纲要”、“反纳粹宣传的策略与技巧”等。截至1942/1943年的话题名录，详参 Allport and Helene R. Veltfort,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Civilian War Effor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S. P. S. S. I. Bulletin, vol. 18, 1943, 第165—233页，尤其是第225—226页。

[67] L. M. Hurvich, T. W. Huntington, and G. W. Allport, “Beginnings of a Bibliography o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Mora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未出版, 油印稿, 1940)。他还在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讨论士气问题的论文。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他和 Helene Veltfort 细致总结的三百多篇讨论“平民应战努力”的论文。亦参前文第二章。

[68] 该年刊公开出版时作 Goodwin Watson 编, *Civilian Moral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2)。

[69] Bruno Bettelheim, “Individual and Mass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1943, 第417—452页; Curt Bondy, “Problems of Internment Camp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1943, 第453—475页。

[70] 该年刊公开出版时作 Gardner Murphy 编, *Human Nature and Enduring Pea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5)。

后初期欧洲将会处于一种极具可塑性的状态，但过一段时间，又会重陷窠臼。势力范围会被重新塑造，新的国族主义和既得利益也会形成。在心理上和政治上，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在终战之日，迎接一个和平组织。最好是战局甫定，趁热打铁。”^[71]

另一个话题最初是在《士气丛刊》中的一本小册子里讨论的，然后发展成为一项学术主题^[72]，即谣言问题[“战时谣言基本谈”(“ABC’s of Wartime Rumors”)，有些许修改]。谣言是一种借力于作为社会心理力量的焦虑和侵犯性的宣传手段。有鉴于此，阿尔波特组织了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促进会(Massachusetts Committee on Public Safety)。从1942年开始，该组织大力推动全国至少四十家报章的积极参与，通过题为“谣言诊所”(Rumor Clinics)的常设专栏，^{<146>}致力于分析并抗御谣言。^[73]这项工作旨在抵消“外宣电台”(Auslandspropaganda)的短波广播在美国的宣传效果，该电台的主导思想正出自远在柏林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阿尔波特基于《士气丛刊》中的一本，在大量修改之后，题名“替罪羊机制基本谈”，于1944年由捍卫美国哈佛小组以小册子的形式，向全国的教育工作者散发了十万册(初刊于大约1940年)。^[74]基于这一战时工作，阿尔波特的经典作品《偏见的本质》(1954)在序言中表示，不仅要感谢自己的战时关注导致了“群体冲突和偏见系列研讨会”，而且也要感谢对其同事帕森斯等人的思想借鉴和学术浸淫。^[75]

二、弗里德利希

弗里德利希原籍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初识帕森斯，当时他们都在阿

[71] Allport and Sheldon J. Korchin, “World Order Within Our Grasp (Discussion)”, 收于 Gardner Murphy, ed., *Human Nature and Enduring Peace*, 第227—230页, 本句摘自第228页。

[72] 战后完成的系统阐述是 Allport and L. Postman,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New York: Henry Holt, 1947)。

[73] 详参 Allport and Veltfort,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Civilian War Effort”, 第181页。

[74] 参看 Allport, “ABC’s of Scapegoating”, 修订版, Freedom pamphlet series (Chicago: Roosevelt College, and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1948)。

[75]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54), 第xx页。

默斯特学院就读。从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他就在写关于德国的东西。^[76] 他的《宪制政府与政治》（1937年）区别了两种现代形式的民主：宪政民主与公投民主（plebiscitarian），强烈反对单纯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77]

1939年11月，弗里德利希在一封“致编辑信”中明确反对《中立法案》，此信现存于他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的档案中：

在我看来，给予英国和法国强有力的支持，希望它们不会被希特勒击败，相反，有能力将这场不幸的战争尽速搞定，这正是我们避免陷入战局的机会，唯一的机会。战争拖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是有可能陷进去。因此，我们一旦做什么事情拖长了战事，我们就越是肯定要陷进去。而维持眼下的《中立法案》无疑就有这种效果。^[78]

1940年，弗里德利希成为民主议事会的创会成员和积极推动者，参与议事会下设国民士气委员会的多个分委会，并加入捍卫美国哈佛小组，1941—1944年又主持电台委员会。在与纳粹德国作战时，意志坚定、恪守真理这样的美国价值观，也是他在1942年写下《凡人新信念》时的关注，他在书中解释了直面艰难世事的能力如何能够培养符合常识的德性，而这正是大获成功的美国民主体制的核心所在。^[79]

<147>

1943—1945年，弗里德利希担任哈佛海外管理学院院长。他所奉行的原则是：社会科学对于应战努力的最大贡献，就是以卓越的指导培训未来军管政府职员。他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战后的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实现民主的唯一机会就是在享有无上权力的军管政府的权威下，用“法治”取代“人

[76] 例如可以参看他于30年代早期撰写的未注明日期的文稿，题为“National Socialism”[哈佛大学档案馆，HUG (FP) - Carl J. Friedrich-17.60, box 18]，以及“Hitler, Prophet of Germany”[哈佛大学档案馆，HUG (FP) - Carl J. Friedrich-17.60, box 24]。

[77] Friedric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a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7), 修订版改为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41)。

[78] 弗里德利希1939年10月17日致《共和》(Commonweal) 编辑小斯基林函，见弗里德利希档案，HUG (FP) - Carl J. Friedrich - 17. 10., box 2。

[79] Friedrich, *The New Belief in the Common Ma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2)。

治”。^[80]

停战之后，弗里德利希在1946年和1948年两度出任德国美占区（代理）军事最高长官卢修斯·D. 克莱将军的政治顾问。他帮助拟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制，作出了宝贵贡献。日后他回忆道，自己在1948年建议德国制宪会议 [“Parlamentarischer Rat”，又译议会参议院、议会委员会等，由当时美英法三国占领区的11个州的州长组成。——译者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Grundgesetz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中规定了一条原则：政府的更迭需由立法院即联邦议院（Bundestag）以符合条件的不信任投票而定，然后提出议案，举出事先提名的一名总理候选人。如此一来，现任政府首脑就不能被轻易驱逐，而这曾是魏玛体制的缺陷之一。弗里德利希给克莱担任顾问的这段经历孕育出他极具启发性的讨论军管政府的论著，他认为军管政府是二战的最后一个阶段。^[81]

三、克拉克洪

克拉克洪是一名人类学家，其田野工作主要针对的是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特别是纳瓦霍人（Navaho）。他与人类学家米德、贝特森一起参加了“科学、哲学、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之关系会议”1941年第二届会议，会议主题是民主的性质与未来。米德提交的一篇论文倡导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克拉克洪负责点评此文。米德提出，应该将从威权主义转向民主体制的变迁过程，奠基于文化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科学知识，认为不能先行规定任何蓝图，但可以基于科学知识，指明目标。米德明白，这类目标将会导向创造性的努力，同时既无需过分限制个体行动自由，也不会无意中在无意中将公民变成值得怀疑的社会进步的傀儡。米德强调了文化人类学如何能有助于确保一个更好的世界，改善现代社会。^[82]

^[80] Friedrich, “Military Government as a Step Toward Self-Rul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7, 1943, 第527—541页；本句摘自第541页。

^[81] Friedrich and Associates,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Military Governmen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Rinehart & Co., 1948)。他所分析的时段是从1943年夏到1946年夏。

^[82] Mea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 and the Purposive Cultivation of Democratic Values”, 收于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Second Symposiu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第55—69页。

克拉克洪支持米德的想法，不过同时他也指出，一个国家 (nation) 的文化远不是同质一体的，不能如此探讨。他警告各位，文化变迁在民主化方面的任务或许比米德所预期的更为艰巨。他提醒道：“我们不能贸然‘贯彻计划以改变我们现有的文化’，除非我们对于该文化的了解，其细致周全，连贯协调，堪比于我们对得到最佳描绘的非文字文化所确知的程度。”^[83]

1943年，该会议的主题是未来的世界和平。克拉克洪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人类学研究与世界和平”^[84]。1944年7月的会议主题是“统与分”，他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纳瓦霍文化如何有助于预见军管政府在战败国的未来工作中必然蕴含的文化冲突的张力或潜力。^[85]

1944年，他还出版了《纳瓦霍巫术》。此书初看上去似乎与应战努力风马牛不相及，但（正如帕森斯所发现的）实际上却大可借鉴。克拉克洪细述了在纳瓦霍的社会中，怎样的情境界定在动机促动角度上具有相关意义，其社会背景和类型是什么，有着怎样的结构性动力机制，导致了对于巫术的怀疑，并常常进一步导致迫害乃至杀戮。帕森斯在1946年评论这本书时，称赞其说明了焦虑和侵犯性如何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找到宣泄渠道。他转述克拉克洪的发现，可以把巫术视为一种间接促进群体张力之精神发泄 (abreaction) 的制度机制。^[86]

[83] Kluckhohn, "Comment on chapte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 by Margaret Mead", 收于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Second Symposium*, 第72—76页；本句摘自第72页。

[84] Kluckhoh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World Peace", 收于 Lyman Bryson, Louis Finckelstein 与 Robert MacIver 合编, *Approaches to World Peac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第143—159页。

[85] Kluckhohn, "Group Tensions: Analysis of a Case History", 收于 Lyman Bryson, Louis Finckelstein 与 Robert MacIver 合编, *Approaches to National Un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5), 第222—231页；重刊于 Kluckhohn, *Culture and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第301—322页。

[86] 在书评的最后，帕森斯对克拉克洪做了进一步发挥：“研究我们自己社会的读者肯定会惊奇地发现，在纳瓦霍巫术和我们自己的‘寻找替罪羊’现象之间有着密切类似。但也存在重要的不同。在纳瓦霍社会里，巫术针对的始终是个体。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针对的绝大多数是社会群体，比如黑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那么这种差异的基础是什么？”见 Parsons, "Navaho Witchcraft. By Clyde Kluckhohn.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44", Book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1, 1946, 第566—569页，本句摘自第569页。

从1943年到1945年，帕森斯和克拉克洪都在海外管理学院的远东分部(Far East Section)和中欧项目组(Central European Program)讲课。(他们还在1943年合作设计了一项研究。)1942年，克拉克洪担任战情局外国士气分析处(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的双处长之一，主要针对领域是太平洋战区。他与精神病学专家亚历山大·莱顿合作，指导了一系列研究项目，考察日本的士气和国民性格、心态，向美国军队说明日本的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背景，以及日本人的威权主义和战争态度的具体表现。^[87]

按照帕森斯在几篇文章里所言，1945年春，克拉克洪基于以民族志方式收集的材料得出结论：日本士气已经严重受挫。这个结论他显然呈交了好几个政府部门，包括陆军部，但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回应。^[88]帕森斯对克拉克洪的研究评价甚高。

在这类战时工作之后，克拉克洪成为1948年创办的哈佛俄国研究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首任主任。在该中心，克拉克洪与作为执委会成员的帕森斯再次共事。在新成立的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里他们也是同事，直至1960年克拉克洪英年早逝。[克拉克洪1905年出生。——译者注]

第五节 帕森斯对于投放原子弹的反应

大约在二战胜利日之前一周，不算苏军加入对日战争，原子弹投放在了日本的两座城市：广岛和长崎。在史密斯的《哈佛世纪》一书中，哈佛的自然科学家后来得到了广泛赞扬，因为他们鼎力促成了这种武器，帮助终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哈佛的社会科学家虽说也出了大力，帮助打赢了这场战争，却未被提及。

你或许会问，对于投放原子弹，整个国家或者学术界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

^[87] 该项工作的成果之一就是 Alexander Leighton, *The Governing of Men*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45)。

^[88] 帕森斯在战后著述中好几处提到了这一事实。例如可以参看 Parsons,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55页；亦参下文两节。

么？更精确地说，考虑到世人相信原子弹意味着自然科学的最终胜利，考虑到一种武器有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帕森斯又会如何看待应战努力？从档案材料来看，不妨说，哈佛的社会科学家们，包括帕森斯在内，当他们确实认识到原子弹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效，也并不对此十分激动。^[89]

1945年7月19日，距此后的原子弹投放不到一个月，国家科学顾问、科研署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 主管万尼瓦尔·布什关于战时工作的报告在华盛顿公开发表，题为《科学永无止境》。^[90] 布什的报告基本只谈了核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学术努力，建议成立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以其为基础，在战后继续价值巨大的战时研究工作。7月23日，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基尔戈和另两位民主党人联名向国会提出议案，在联邦政府中建立这一科研核心机构。

<150>

7月25日，《纽约时报》登出帕森斯7月22日致编辑的一封署名信，题为“社会科学很重要。呼吁为它们在国家研究项目中争取资助”。他简单回顾了布什报告的背景，然后指出：

不难同意，社会科学尚未达到医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那样的成熟程度。然而，它们正在迅速发展，已经对应战努力和其他实践应用领域作出卓越贡献。有朝一日，有关这场战争中科学的角色和历史撰成，公众将会惊讶地发现，社会科学的贡献是如此重要，尽管在科研署的涉战研究中，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员动员从来不能与其他群体相提并论。^[91]

帕森斯还致函布什，抗议“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排除出基金会的考虑范围”，并具体指出，“事实上，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给予社会科学研究充分资助，对于我们文明的未来，可以说至少和自然科学与医学方面的资助一样重要。……因此，我觉得，您拟议中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忽略社会科学，会对国家利

[89] 尽管帕森斯的几位哈佛同事作出了与他类似的举动 (这方面的有些材料还保存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我在这里还是集中讨论帕森斯，对于那些反应类似的同事，我只是点到即止。

[90] 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

[91] 剪报，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4, box 19.

益造成非常严重的潜在伤害。”^[92] 布什于8月7日复函帕森斯，引用了罗斯福总统在最初接到布什报告筹划国家研究机构时给他的一封信。^[93] 而就在这一周前，哈佛校长科南特也在帕森斯提请他关注此事后，以同样理由回复他：“罗斯福总统的信清楚表明，他并不重视社会科学。”^[94]

接到布什信后第二天，帕森斯便草拟了致《纽约时报》编辑的另一封信。他利用原子弹已经在广岛投放这一事件（8月6日核爆，次日见报），进一步强化其代表社会科学的主张：

有关原子弹的新闻令人惊骇，其影响之深远，非任何寻常标准可以衡量。它首要的意义在于，使得当前为了和平与进步而将整个世界组织起来的紧迫问题更趋激化。……《纽约时报》提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人类成长的速度是否足够迅速，能够赢得文明与灾难之间的竞赛？”而如果结合晚近其他某些事件和声明的背景来看关于原子弹的整个故事，这个提问的迫切性就非常明显了。原子弹是对于一项大型群体研究规划实施组织和管理后发展出来的，这项规划涉及许多最杰出的科学头脑。……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中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整项事业中最令人赞叹的……科学头脑的成就，就在于将来自不同科学领域的许多人所拥有的极其繁复的知识，合成一项可以操作的计划。……”而这项科学工作的直接成果就是一种破坏力量，其程度胜过往日所有的武器，也因此事实上成为各大工业国统治者手上的一种武器，永远改变了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也永远改变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原子弹已经消耗了二十亿美元。……我们已经发现精确科学及其应用技术对于赢取一场战争来说不可或缺，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将它们投入战争。……罗斯福总统要求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就

<151>

[92] 帕森斯 1945 年 7 月 26 日致布什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4, box 19。

[93] 布什 1945 年 8 月 7 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4, box 19。

[94] 科南特 1945 年 7 月 31 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4, box 19。科南特并放低身段说道：“您认为社会科学家对于战争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说法我也非常感兴趣。我认为把这些事例告诉给有理智的业外公众会很有价值，希望尽早落实此事。对于这样一本书，我当然会很感兴趣。”

政府未来对于科学的促进政策提出建议。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科研署的报告忽略了社会科学，在确保世界对抗原子弹的危险的必要措施中甚至没有提及。^[95]

意思很清楚：社会科学已经在战争中发挥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名英雄，现在只有社会科学才能处理新的事实所带来的国际政治问题，即自此之后，原子弹将成为判断国家的命运与声名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帕森斯就此呼吁：

人的头脑必须解决关于世界和平的属人的问题，这个观念并不让人陌生。罗斯福总统在为杰斐逊日晚宴 [“Jefferson Day dinner”，每年4月13日为杰斐逊诞辰，系美国某些州的法定假日，民主党有时以餐会形式庆祝。——译者注] 准备的演说中也声明，“今日我们面临一个显著事实：文明要想继续下去，我们就必须培植关于人类关系的科学。……”时任战争动员与复员局 (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 and Reconversion, OWMR) 主任的文森先生在阿灵顿发表纪念日 [“Memorial Day”，每年5月最后一个周一为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尤以全国最大的国家公墓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的纪念仪式最重要。——译者注] 演说时明确指出，“我们身上出了一些问题，人类的某些体制导致了战争。……”如果说这些声明并不意味着处理他们所说的那些问题的一种特定方法，那就只是泛泛而谈。而如果确实意味着一种方法，那就必定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适当的首要措施，总统应当要求考察社会科学的定位，与科研署的布什博士就自然科学所拟定的考察地位相当。……它应当充满活力地探究，在一个装备好自杀工具的世界里，社会科学必须满足哪些需求，而驾驭社会科学的头脑又有哪些手段。

帕森斯主张，在美国人掌握原子弹所带来的新起的世界危机中，社会科学具有关键意义。为了具体落实这一主张，他奉行了两条各自分离的行动路线。其一，他提请社会学同行们注意，有必要积极活动，将社会科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

^[95] 帕森斯 1945 年 8 月 8 日草拟信函，“To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Times*”，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42.8.4, box 19；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函件。

为此他自己也撰文详细讨论，在美国战后陷入危险的政治情势中，社会科学扮演怎样的角色，由此在科学领域又该实行怎样的立法。^[96]

<152> 此外，帕森斯还加入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核科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并在1946年12月科学促进会召开的科学立法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于1947年1月发表在《核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上。然后，他让此文重刊于《政治学季刊》，以期在社会科学家中扩大影响，后者的角色显然举足轻重。^[97]他关注的是要让社会科学进入国家科学基金会，与自然科学地位相当，理由是在现代民主世界中，科学本身对于进步十分重要。在有关社会系统的社会学理论框架里，帕森斯提出以下四点，具体论证以上关注：(1)“绝大多数科学家，以及其他有理智的公民都会同意，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控制自然，而在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妥当性”^[98]；(2)“整体观之，我们的文明坚定地致力于推进理性理解的伟大征程，而这种理解的对象不仅仅是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也包括人和社会。科学作为一套技术知识和程序，正是我们文明中这套态度与价值的根本体系最发达的表现”^[99]；(3)“事实上，所有科学本质上都统合一体。根本不可能截然区分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的贡献，而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也是跨越了界限”^[100]；以及(4)“我们的社会秩序的实际运作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一种社会技术，其实也就是应用型社会科学，并且这种程度还在迅猛增长……比如说，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在劳资关系调适中，在沟通领域里，在经济通过中央银行系统实现的控制功能中，在外贸的运作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受过技术培训的职员都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01]

有鉴于此，他强调，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一样重要。为了突出社会科学的

[96] Parsons, "The Science Legisl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1; 1946, 第 653—666 页。

[97] "Science Legisl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2, 1947, 第 241—249 页。

[98] 同上引, 第 241 页。

[99] 同上引, 第 242 页。

[100] 同上引, 第 242—243 页。

[101] 同上引, 第 243—244 页。

重要性有时甚至连社会科学家自己也低估了，他引述了几个例子，其中就有战情局的外国士气分析处有关日本士气低落的报告被忽视，而这是在 1945 年头几个月，先于日本最终无条件投降，这实际上是否认了官方的说法，即原子弹的投放乃是二战终结之因：

由莱顿博士、克拉克洪博士及其同事们实施的日军士气研究……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奠定了心理战政策的基础，在终战之前就产生了重要的实效，这当然是不能基于常识之见实现的。对于导致日军投降而避免了许多人担忧的严酷的垂死抵抗的那些政策，这些人无疑也大有帮助。^[102]

<153>

具体到社会学，为了详细说明它在战时的实际成就，帕森斯与巴伯合撰了“社会学 1941—1946 年”，发表在 1948 年初的《美国社会学杂志》上。^[103]此文引述了大量战时研究，集成豪泽的“人口普查统计领域的战时发展”（1945），托伊伯的“农业部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晚近发展”（1945），以及威廉斯的“二战期间政府管理领域的社会学研究数议”（1946），记述了开战以来的分析进展。^[104]文章提到了 1941—1946 年间，作为科学研究的社会学在一些与战争有关的政府机构中的发展，即参谋局、战情局外国士气分析处，以及“军方组织的民事培训学校和军方特训处的外国地区与语言培训项目”^[105]，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机构。文章通过细致考察，详尽记述了社会学的战时成就，事实上也能看到整个社会科学的战时成就。

话又说回来，文章的最后一段也抱怨了所遭到的明显歧视。帕森斯和巴伯注意到，尽管在 1941 年到 1946 年这段时间里，社会学无疑为赢得战争贡献良多，但就专业的发展而言却比较糟糕。不过，他们还是心存乐观：

[102] 同上引，第 247 页。

[103] Parsons and Barber, "Sociology, 1941-194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3, 1948, 第 245—257 页。

[104] 参看 Philip M. Hauser, "Wartime Development of Census Statistic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0, 1945, 第 160—169 页; Conrad Taeuber,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ociological Work in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0, 1945, 第 169—175 页; 以及 Robin M. Williams, "Some Observations o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Govern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1, 1946, 第 573—577 页。

[105] Parsons and Barber, 第 249 页。

这些纯粹科学角度上的问题，一旦附加上所有训练有素的理智思考——但首先是社会科学——在这样的时代都必然感受到的社会责任，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在二战后做一名社会学家，面临着重重困难。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我们致力于一项在许多方面都史无前例的冒险事业，事实上，悲观主义者完全可以预测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但它是一项配得上美国事业进取精神的最佳传统的挑战。^[106]

第六节 帕森斯分析社会科学应战努力的备忘录的命运

1946年11月底，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正式邀请帕森斯，就社会科学如何能够有助于理解和说明现代世界这一话题，撰写一份全面的“陈述或报告”。而这个话题的背景，就是国家科学基金会应否纳入社会科学的争论。当时国会正在讨论此项授权议案。不过，社科研究委员会并非直接希望委托搞出一份政治声明，而是以更为根本的专业技能为宗旨。有鉴于此，委员会的议事录里包含了耶基斯的一份备忘录，为帕森斯要呈交的备忘录确立了方针。议事录点明了帕森斯将要撰写的备忘录的首要目标：“启迪科学家和普通人对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的地位及其发展潜能，主旨乃在于教育并说服他们，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素材的人类生活和制度的现象，就像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可以用也应当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也对人类大有裨益。”^[107]

帕森斯或许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份备忘录就是要评述哈佛及其他各处应战努力的框架所确立的那种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108]哈佛大学档案馆保存的材料

^[106] 同上引，第257页。

^[107] 耶基斯1946年11月26日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交的“Memorandum Concern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第1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 box 20。

^[108] 遗憾的是，克罗斯纳错误地解读了帕森斯的关注。见Samuel Z. Klausner, “The Bid to Nationalize Social Science”，对于帕森斯1948年备忘录的这篇解读收于与Victor M. Lidz合编的*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第3—40页。克罗斯纳推测帕森斯关注的是设法让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社会科学列入控制管辖范围，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全国性机构，服务于华盛顿的政府利益，从而据说是代表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

确凿无疑地显示，他从大量专家那里广泛收集信息和有关数据，而这些专家当时有的供职于政府机构，比如国家资源计划署 (National Resource Planning Board)、劳工统计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总统研究局 (President's Research Board)、公共卫生署 (Public Health Service) 等^[109]，有的是他自己学校或其他学校的同行。此外再加上他自己参与过的一些计划或项目所给予的经验，比如民事区域管理教学，或他参与合作的外国经济管理署等。他和哈佛的同事联系，比如克拉克洪，此时帕森斯正与其一起参与创办俄国研究中心，还有斯托弗，他在指导完陆军部赞助的一项重大研究项目后，于1946年加入了新创立的社会关系系。斯托弗的项目成果于1949年出版，后以《二战中的美国士兵》之题名闻于世。^[110]他还广泛征求了多个机构和专家的意见。^[111]

<155>

^[109] 为预备研究编纂的名单题为“研究成就或研究项目”，有四类名目，分列如下：“一：政府”，有十一家机构，从“农经署 (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 农业人口与农村福利处 (Division of Farm Population and Rural Welfare)”，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有手写附上的“食品+农业”，“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ttee)，“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TVA, 即“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1933年新政时创立的国营机构，负责控制河水泛滥，改进河运，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并沿田纳西河流域生产电力。——译者注)]；“二：战争经历”，有四家机构具体负责九个项目和部门，从“1. 参谋局 a. 调研处”到“4. 价格管理署”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三：私营组织”，开列十五个名目 (另有三个手写的附加)，从“1. 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到“14. 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清算中心 (Public Administration Clearing House)”和“15. 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实验室 (Laboratory of Social Relations)”；“四：基金会”，有八个名目，即“1. 洛克菲勒，2. 卡内基，3. 梅西 (Macy)，4. 米尔班克 [“Millbank”，原文如此 (作者原注)]”，并补充了手写的“20世纪，拉塞尔·塞奇 (Russell Sage)，共和 (Commonwealth)，凯洛格 (Kellogg)”，最后一个具体注明了一个人，哈罗德·泰勒。参看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 box 23。

^[110] 参看 Samuel Stouffer, Edward A. Suchman, L. C. De Vinney, S. A. Star, Robin M. Williams, Jr., *The American Soldier*, 2卷本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第三卷名为 *Experiments on Mass Communication* (Carl I. Hovland, Arthur A. Lumsdaine, and Fred D. Sheffield), Princeton, N.J., 1949。

^[111] 例如他1947年7月致函米德：“我想您知道，我正在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撰写一份报告，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为此我正在收集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展现大大超出常识的研究方法如何能够产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结果。”见帕森斯1947年7月10日致米德函，帕森斯档案，HUG (FP) -42.8.4, box 14。

1948年7月,帕森斯的备忘录《社会科学:一种国家基本资源》公开。^[112]这是一份重要的文献,不仅详细阐述了科学对于现代社会之动力机制的功能,而且阐述了社会科学为赢得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所作出的贡献。他宣称,社会科学对于胜利贡献巨大,因为它使原本会十分艰难的变迁大为便利。不仅如此,它还大大降低了这些变迁的破坏性,也使之更为有效。社会科学也有助于一个社会在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同时,减轻国内危险,保持相对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帕森斯眼中社会科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资源所作出的最值称道的贡献,惠及人人。他就此提出,社会科学在战后的使命是不言自明的。社会科学可以减轻政治威胁,不使其发展到需要以强力解决。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改良以反制社会解组,不至于使原教旨主义运动利用社会中的结构冲突。

他想传递的信息是:社会科学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因此毫无疑问应当列入新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研究经费资助范围。社会科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资源,应当根据其已经得到证明的价值,成为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下的一块研究领域,这样做确定无疑,物有所值,而不是有什么有待考虑之事。^[113]

<156> 这一点他又是如何展开论证的呢?在备忘录的第二章,他具体说明现代世界观是如何奠基于科学知识。而在第三章,他揭示了进步往往不被当时的科学界所承认(比如19世纪法国看待巴斯德,又如20世纪初的维也纳看待弗洛伊德)。到了第四章,他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研究,旨在最终到第五章提出,鉴于科学进步常常不能被立即承认,不管怎么说,应当在尽可能高的层面上实施研究型教育,不要计较公众性问题。

[112]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Preliminary Draft: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年7月,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15.2, box 20, 以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名义发布的该“草案”,在以下引作帕森斯“社会科学——一种国家基本资源,1948”。帕森斯去世后,该备忘录重新出版,题为“社会科学——一种国家基本资源。1948年7月提交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草案。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见 Samuel Klausner 与 Victor Lidz 合编的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第41—112页。有关评论亦参 Bernard Barber, "Theory and Fact in the Work of Talcott Parsons", 收于 Klausner 与 Lidz 合编的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第123—130页。

[113] 克劳斯纳和利兹两位编者显然未能充分了解备忘录当时的写作背景,改变了文稿主要部分的措辞,重写了一些句子乃至整个片段,包括为各章节加了一些帕森斯未曾使用的小标题。由于克劳斯纳和利兹的重新措辞所传递的意思有时略见差异,有时更大相径庭,我在这里用的是备忘录的原稿。

备忘录的主要章节无疑是第五章。^[114]帕森斯劈头指出，应战努力是一块丰富多产的研究领域，帮助解决了众多实践问题，研究在科学上的质量往往是出类拔萃的。关于这一点，他写道：“在这场动员中”出现了“一种比较新的资源”，就是“社会科学家的知识与技能”^[115]。他紧接着指出，既然这类研究基本上建立在战前完成的的研究的基础上，那么对于质量也就没有任何可以遗憾的了。他详细介绍了战时研究的六块领域，认为它们鲜活地体现了细致的调查过程、严格的研究设计以及重要的成果，而其宗旨又是与战争问题相关的。

他列出的第一块领域就是**战时公债销售研究**。根据他的描述，该研究仿效曾经得到资情局支持的默顿的大众说服研究，在1940—1942年间，在农经署调研处 (Division of Program Survey) 底下进行。他认为，针对战时公债销售研究这个话题，他也可以强调，尽管研究的宗旨显然是实用性的，有助于战时工作，但也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示范性的贡献。他着重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说，战时公债销售研究已经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进行入户访谈的调查人员所获得的素材，有时候会比邮寄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更为可信；而从实质角度上讲，研究所产生的结论已经证明，科学研究是如何有时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积极改变政策。^[116]

第二块领域是**心理能力测试**。他基于心理能力测试，首先提出，就算测试紧扣应用，例如广泛使用的军队通用测试 (Army General Application Test)，也是有可能达到科学角度上的最佳质量的（比如与默里的人格理论相符合的结果）；其次，心理能力测试可以说明，效度检验程序如何能够有助于揭示，一项特定的测试可以投入哪些有效的用途，哪些又是无效的应用（比如根据他的记叙，在战时，发现某些测试可以令人满意地测试受训能力，但用来评估作战能力却没什么

<157>

[114] 克劳斯纳和利兹在1986年编辑的版本中插入了小标题，即“一些实践成就：战时的记录”。不过原稿就只有罗马数字“V”。

[115] Parsons,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40页。在克劳斯纳与利兹的版本中，本段的措辞有所修改，例证了他们对于帕森斯原稿的编辑：“二战促成了美国历史上对于国家资源最广泛深入的动员。像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和技能这样的比较新的资源，自然应当包含在动员之列。”参看 Klausner and Lidz,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第79页。

[116] Parsons,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41—43页。默顿的研究出版时题为 *Mass Persuas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与 Marjorie Fiske 和 Alberta Curtis 合撰)。

用)；再次，心理能力测试常常被用作甄别偏见，而这种甄别已经揭示，偏见不仅在于研究者对于测试的应用方式，也在于应试者接受测试时的背景框架，测试结果或许类似，但效度的问题却可能非常复杂；又次，根据多次记录，测试工具是可能得到改善的，这一点他有详细探讨；最后，能力测试项目有一个积极的后果，就是似乎可以避免战争中不必要的死伤，也就是说，通过基于科学依据的标准化态度量表甄选出来的人，比起那些未能通过甄选担负战争责任的人，往往更能胜任自己的使命。这就意味着，那些在测试中表现令人满意的人，在战场上令战友陷入危险或将战友弃之不顾的可能性会更小一些。^[117]

他举的第三个例子是**精神健康评估**。^[118]他承认，精神健康评估的研究项目主要是为军队的精神病治疗服务的。但它们也有助于测试一个人在何等程度上适宜于某项任务。他明确指出，如果在战争情境下需要信守对于他人的责任或保守秘密，精神健康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此时命悬一线，士兵们必须承受战斗的压力。他还提到了自己认为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认为“要认识到群体关系在精神健康问题上的重要性，这种视角……将精神病学的科学基础牢固融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在这类研究领域中，社会学层面最直接地关联到‘有关行为动机和机制的微妙的动态分析’。”^[119]因此他觉得，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并且将会丰富“对于我们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知识的贡献”^[120]。

第四个话题在帕森斯看来，证明了社会科学在战争背景中具有巨大价值，但迄今为止遭到严重低估，那就是战情局外国士气分析处对于日军作战意志及日本民众是否准备好无底线忍耐的研究。^[121]他通过外国士气分析处的研究来揭示，即使在另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中，也可以用源于社会科学知识的概念图式来解释书面或口传的材料。他重提关于日本的研究，认为它早在1945年5月就从种种证据中明确判断，日本的士气已濒临崩溃。他以直白得令人惊异的不满语调总结道，美国通过投放两颗原子弹终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原本可以通过社会

[117] Parsons,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43—47页。

[118] 同上引, 第47—52页。

[119] 同上引, 第52页; 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20] 利维在其《精神病学新领域》[David Levy, *New Fields of Psychiat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47)] 中也以同一视角来看精神病学, 将政治精神病学等领域的发展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

[121] Parsons,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53—55页。

科学的专业技能，基于可信赖的知识来展开行动。他在提到外国士气分析处的结论时写道：“这一群体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社会科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实践功能。‘专家’们，即在日本事务上富有经验的实际工作者，对于究竟是日本士气不可动摇还是值得建议向天皇发动攻击之类问题看法不一。在这种实际层面上，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系列标准来决定采取哪一种可能选择。”^[122] 他暗示道，指挥军队的美国政界人士原本应该听取社会科学家的意见。他的结论是：“一个社会如果拒绝利用这样一类资源，所作所为似乎也不会太通情达理。”^[123]

第五，社会科学家创造了一些方法来测量战斗的组织 and 士气的决定因素。^[124] 他通过战斗组织和士气的话题来揭示，首先，如果抽样程序严格规范，问卷设计系统全面，是可以有效地运用民意调查的；其次，他强调，定量方法可以和参与观察之类的定性方法结合使用；再次，他着重指出，根植于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可以成为看似偶然意外的经验发现的温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基于社会科学研究而得到推荐的那些图式和程序 [比如停战之后从军队遣散时的“绩点” (merit points) 方案]，已经获得了士兵们的广泛欢迎。这些都与陆军部信息与教育处研究科 (Research Branch of War Department'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 在斯托弗指导下的研究工作有关。^[125]

最后，军需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通过研究与统计署 (Bureau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得到平衡，具体是通过特供与发放局 (Supply Priorities and Application Board) 主持的项目完成的。^[126] 他认为，在美国，生产与劳力市场方面的决策都是依据社会科学方面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常常是基于专门的研究，细致确定个人自我实现与国家紧迫需求之间的平衡。与此相反，在纳粹德国，有关货

^[122] 同上引，第 55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23] 就像备忘录其他地方的行文一样，他提到美国的政界人士时用的是一个比喻：“实际工作者”。

^[124] Parsons,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 55—61 页。

^[125] 哈佛大学于 1946 年创建了社会关系系，斯托弗加盟该系。该系本身就是战时工作的一个后果，有很多学者指出过这一点，例见 Barry V. Johnston, "Contemporary Crisi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Department at Harvard: A Case Study in Hegemony and Disinte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29, 1998, 第 26—42 页。

^[126] Parsons,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 61—63 页。

品、服务和劳力的购买与分配的决定都是命令式的，体现在强制性的国防经济（Wehrwirtschaft），充斥着强力、欺诈乃至杀戮。

在备忘录的结尾，帕森斯回到了当下的一刻。他在所开列的表明“战时工作”的研究领域上又加了一个，在他写作的时候，这一个正直接造福于整个国家。
<159> 1948年1月1日，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ERP）启动。^[127]他提到欧洲复兴计划，希望强调，对于设计并制定一项特定的政策，经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他又立刻添上一句，这样的影响力永远不能带有任何专制独断的意味。

“面临战争的压力，同时在较小的程度上，面临新政时期大萧条的压力，实际工作者们十分乐意倾听经济学家的建议，尽管也不乏争执。”他如此宣称，而在他眼里，所谓的“实际工作者”，就是与社会科学家相对而言的政界人士。他又补充道：“很自然，一旦压力得到释放，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弹。整体而言，实际工作者罔顾经济学家的建议，一下子废弃了整个经济控制体系。然而，似乎难以长期忽略他们。”^[128]

说起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价值，帕森斯提到了欧洲复兴计划。这个计划关系到是否能重新把欧洲建设成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一股新兴重要力量。最初提出这个计划时，似乎像是国务院搞出来的一项新政策，其实正是经济学家倡议的。当时只是刚刚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的总体政策和实施方案，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疗治欧洲战后经济疲软这一背景下，典型地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施惠影响。^[129]

^[127] 1947年6月5日，国务卿乔治·C.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首次宣布了欧洲复兴计划，如今世人也遵照国务卿的名字，称之为马歇尔计划。

^[128] Parsons, “Social Science—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63页。在这里，“实际工作者”，或政界人士，指的就是在二战结束后放弃了价格和工资控制的杜鲁门政府（尽管当国会要求回归市场经济时，杜鲁门试图加以阻拦）。

^[129] 有关更多的细节，可以参看 Charles P. Kindleberger, *Marshall Plan Day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和 Kindleberger, *Life of an Economis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金德尔伯格是一位经济学家，1948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经济史；他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一起，首倡欧洲复兴计划，后来又精心制定其细节。参看 Michael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此前，如上所述，金德尔伯格与其副手罗斯托一起，主宰国务院下属的德奥事务处（Division of German and Austrian Affairs），该处对于1945年6月开始的德国经济重建的政策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争取说服的最后尝试，帕森斯还努力寻求科南特的支持，以此推动社会科学的事业。科南特是围绕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争论中的一位领军人物，时任哈佛校长（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帕森斯试图通过个人引述来争取科南特的支持。为了让科南特信服，他科南特一向就对社会科学怀有敬意，帕森斯引用了他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则是如此完美地配合着帕森斯。根据帕森斯的援引，科南特1948年4月在总部设在纽约的社区服务学会（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曾经说道：“我们需要将科学家就有关人的研究已经获得的知识付诸应用。”^[130]难道有关人的研究不是显然包括社会科学吗？

在这份呈交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备忘录的结尾，帕森斯措辞谨慎，警示世人不要对社会科学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但又呼吁给予社会科学强大的支持：“社会科学对于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的贡献……将不能满足那些希望得到一种有关彻底重建的至高定则的人……它冷静清醒，不慕想象，不图花哨。但如果让它充分发挥，可以大有作为。它有助于讲求理智的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渐进发展，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不容忽视。”^[131]

然而，这份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托、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而撰写的备忘录，在1948年7月呈交之后，却没有得到该委员会的充分重视。事实上，（多达）69位评审人中大部分都对备忘录提出了严厉批评。帕森斯得到的建议是彻底修订。在其年轻同行小约翰·W. 赖利的协助下，他着手此项任务。

[130] “Social Science -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1948”, 第75页。

[131] 同上引，第76页。公开刊行的版本，即Klausner与Lidz合编的*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的第3页，本句改写如下：“社会科学对于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的贡献……将不能满足那些希望得到一种有关彻底重建的至高定则的人。……它冷静清醒，不慕想象，不图花哨。但如果让它充分发挥，可以大有作为。它有助于讲求理智和人道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渐进发展，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不容忽视。”

第七节 第二稿备忘录，一部不曾出版的著作

一、修订始末

在赖利协助下完成的修改稿题为“社会科学——一种国家资源”，于1950年初提交给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事实上，委员会主席彭德尔顿·赫林在最后成为草案的文稿的导言中，如此概述第二稿备忘录的缘起：

1946年，塔尔科特·帕森斯……受命起草……一份有关作为国家资源的社会科学的分析。他的报告于1948年呈交委员会。当时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作者随后在重写文稿时尽数采纳。与此同时，1949年春，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赖利应唐纳德·马奎斯之邀，正准备一份备忘录，调查社会科学的状况，供顾问委员会考察福特基金会计划。赖利博士搜集的统计数据和事实素材，以及帕森斯博士撰写的草案，奠定了两位作者的合作基础。有鉴于此，1949年夏，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下，作为合作成果，眼下这部书纲要成型。帕森斯博士在夏天撰写文稿，而赖利博士从1949年9月开始到来年初，将文稿最终完成。^[132]

第一章讨论“社会科学的性质”，第一节题为“社会科学与社会”。该节首先开列了社会科学的主题领域，提醒读者注意，尽管社会科学的论题是凡俗的，但在处理经济繁荣或世界和平之类看似与科学无关的主题时，其方法却必须是科学的：

观念一旦得到证明，就可转变成知识。因此，社会科学家完全有正当理由努力检验众多假设，甚至包括^[133]是否可以通过引入某些类型的社会控制来维持经济繁荣，或能否通过某些类型的世界政府来确保世界和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社会科学家的动机可能是自身的大胆想象，他希望发

[132] Talcott Parsons and John Riley, "Social Science. A National Resource" (草案), 本段引语摘自 "Foreword", Pendleton Herring, 第 i 页;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 15.70, box 2.

[133] 还有一种措辞, 在“努力”后径直写为“检验假设”, 但被帕森斯用笔勾掉了。

现这是真实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必然有损于他对这些观念本身所做的科学分析。他作为科学家，之所以关注这些观念，只是为了确定观念中哪些特定属性及其相互关联可以转换成知识。因此，相比于思想上非关科学的人士，持科学角色的他在处理观念的问题上界限要严格得多。^[134]

就社会学家而言，帕森斯和赖利提出了两点。首先，他们赞同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允许社会学家作为公民参与其共同体的生活，表明作为公民的立场，但同时又作为科学家分析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们澄清道，社会学家所分析的社会类型模式，就会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类型模式，因为观念是很重要的。他们主张，社会科学家不可能维持中立，而是作为一个观察者，面对自己分析的那种社会类型，必须采取某种立场。在“**社会科学与受控型社会**”的子标题下，两位作者指出：

在孕育出社会科学的许多思潮这一背景下，众多观念体系旨在诊断出社会疾患的某个单一源泉，并由此奠立对于社会的总体重构规划。当然，人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这些思潮中有许多特定的概念要素和深刻见解已经融入了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但这类思潮作为一种总体系的精神，是与社会科学家的精神格格不入的。^[135]

有鉴于此，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科学又适合担当什么角色呢？为了说清这一点，他们举医生为例。医生的任务就是作出诊断，基于已经得到证明的知识，帮助矫正功能失调，只要有矫正的可能。那么，社会科学家又该秉持什么样的精神来行事呢？

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他更类似于医生 (physician)。从某种意义上讲，支撑医学实践的整套科学知识无疑通向一种单一的“人类有机体学说”。不过，它并不锁定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某一病因，也不为如何求取

[134] Riley and Parsons, "Social Science. A National Resource", 第一章第 3 页 (五章各自编排页码); 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135] 同上引, 第一章第 14—15 页; 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162>

一种“理想的身体”确立一套程式，而是处理有机体功能运作的特定问题，诊断功能失调的具体类型，为处理此类情境的特定措施的有关科学知识奠定基础。无独有偶，物理 (physical) 科学在应用于工程学时，也没有就整体上的改造自然给出某种程式，他们处理的是人持有实践兴趣的具体问题。这就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整体精神。^[136]

备忘录共分五章。先是探讨了社会科学的性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的应用 (utilization and application)，有五种渠道，即日常生活、工商贸易、联邦政府 (特别是它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以及“战时记录”的两方，就是“军事前线”和“国内后方”。然后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各种技术与理论。然后的一章是“专业需求与问题”，讨论“专业化的问题”、“个人储备”及“研究的资助”之类话题。最后，结论题为“前景”，谈的是“展望未来”。

这份备忘录达到了书的规模，讨论了在美国社会的背景下，尤其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背景下，社会科学所发挥的功能与取得的成就。但在 1950 年春提交后，却未能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认可。赫林在为草案所撰导言中赞扬了这份文稿，但他对于两位作者的赞扬听起来却有些语焉不详，令人好奇。当他分别提到两位作者时，关于帕森斯他写道：“社会科学家们认为需要感谢帕森斯的积极性，因为本份报告中所讨论的问题，委员会最初在几年前就已有考虑，感谢他持之以恒的关注。”至于赖利，“我们都感谢赖利博士，这项研究在好几年来一向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共同关注，而他为最终完成这项研究担负了重大责任。”^[137]最后，备忘录未能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出版许可。帕森斯和赖利受命再次修订，以期满足受托机构也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为项目确立的标准。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对第一稿备忘录的说法模棱两可，而对第二稿的反应又颇有微词，这种态度或许有外部事件影响的因素。比如说，国会在 1949 年通过了基于基尔戈议案的立法，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但却没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任何条款。同时，冷战的迅速发展 (导致 1950 年春朝鲜战争爆发) 据说也影响了委员会对于备忘录将要实现目标的期待，除了 1945 年 9 月和 1946 年 11 月委员会两次

^[136] 同上引，第一章第 15 页。

^[137] 同上引，第 I—II 页。

会议上最初达成的共识，还把其他想法置于备忘录必须完成的目标的前台。

哈佛大学档案馆藏有 1950 年 8 月到 1951 年 3 月间的三份信件，记录了个项目最终是如何半途而废的。当第二稿备忘录的修订稿又一次未获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出版许可，两位已经投入大量精力和耐心来满足委托机构期望的作者不得不宣布放弃。

1950 年 8 月 2 日，帕森斯致函赫林，附寄了一些“对于赖利—帕森斯文稿的修改”，答应如果需要的话，乐意去纽约作进一步商议。同时帕森斯表示：“如需亲往，请即知唤。不过我另有要事在身，如并非一定要去，当然更好。”^[138]11 月 8 日，赫林复函帕森斯，告诉他自己和赖利有一番长谈，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托的评审人提出的一些意见。赫林写道：“通过信件来详谈细节，来往过程会很漫长。只需要告诉您，杰克[赖利的名字约翰的昵称。——译者注]现在觉得，有许多地方看来需要修订。他已经同意着手撰写自己准备改动的地方。几位评审人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让赖利全面关注到了这些评论意见。”^[139]

最后，到了 1951 年的 3 月 16 日，帕森斯给赫林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摆明了自己所感受到的问题。首先，自己的 1948 年备忘录和赖利的福特基金会报告这两份原始文稿颇有些各说各话，从未完全融合成一个框架。其次，就“理论取向的研究”而言，所采取的立场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愿意承认的皆有不同。^[140]尽管他认为研究发现的可应用性很重要（赖利显然也作此想），但他们相信，“所谓‘纯粹’科学研究之所以具有巨大意义，根本乃在于理论在科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个人对于这种纯粹科学—理论取向的强调毫不犹豫，我想杰克也会同意我的立场。”^[141]这就引出了一种说法，而这一说法显然就是导

[138] 帕森斯 1950 年 8 月 2 日致赫林函，见帕森斯档案，HUG(FP)-42.8.4, box 19。1950 学年上半年，帕森斯接获资助，聚集了一批主要来自社会关系系的学者一起讨论，其成果便是与希尔斯合编的《一般行动理论初探》。此书 1951 年出版，作为《社会系统》的姊妹篇。后者准备于 1949 年至 1950 年，成书于 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之间，正是帕森斯和赖利至少两度修改社会科学备忘录之际。

[139] 赫林 1950 年 11 月 8 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42.8.4, box 19。

[140] 帕森斯 1951 年 3 月 15 日致赫林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42.8.4, box 19, 第 2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41] 同上引，第 3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致报告难以被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接受的症结所在：

整体而言，我认为不妨大致认定，美国科学的最大欠缺就是不太愿意充分认真地关注理论。这显然与美国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氛围有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们的某些强调重点不能代表相关专业群体的舆论。不过我想，我们会觉得，像我们写的这样一份文件，不应该只是反映业界的舆论，还应当努力体现对于业界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诊断，指明如何提高成就、增进自知。

他通过一些细节指出，过去二十年间，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类领域中，理论
<164> 进展显著匮乏。大部分的思路都还抱着早就过时的观念，就经济学而言，被“凯恩斯式的观念”所超越。当然他也承认，“在考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创立宏观计量经济学。——译者注]和列昂捷夫的研究[这位俄裔经济学家1931年由其留学的德国移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研究助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197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从30年代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法，用数学方法研究各部门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这种方法迅速传播，被联合国规定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注]之类的领域里，还是有些晚近的发展”，也运用了最新的概念思路。但整体来说，当前的理论与研究大多落后于时代，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托的那些评审人，对于帕森斯的（以及赖利和帕森斯合作的）文稿中以满怀理论关怀的经验阐述来描画社会科学对于国家民族所担负的角色，颇不以为然，他们或许正是因循往昔思想的典型代表。有鉴于此，他和赖利都不打算再回到委员会委托的评审人看来或许可取的思路。他总结道，“就算我们继续此项研究”，赖利也会是预期正式出版文本的第一作者，至于他自己，则“退居其次”。此信请求赫林原谅他帕森斯不再进一步作出重大修改：“当然，我并不想让人觉得我固执己见，但您建议我的是明确表述我所认为的文件‘精神’，而我也努力这样做了。”^[142]

赖利和帕森斯题为“社会科学——一种国家资源”的文稿始终未能公开刊

[142] 同上引，第5页。

行。在帕森斯撰写《社会系统》期间，该文稿至少修订了两稿，它的观点论证和所使用的经验证据皆堪比于其后续之作，而后者却成了世界经典。

二、书中的观点

整体而言，重写的“社会科学——一种国家资源”的修订稿，在第一章重述了第一稿备忘录，那里已经揭示社会科学是一种国家基本资源。备忘录明确指出，之所以要说清社会科学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功能，整个努力的缘起就在于核物理学的成就。“显然，相比于迄今所有其他已知文明，我们对于自然力量的控制都要发达得多。……在这段延续千百年的漫长历史中，对于原子能的应用就是最新的一章。”^[143]

无论关注的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其系统的方法而有别于一厢情愿的思维或实践知识。“标准在于对这些主题的考察方式。它就在于对客观知识与真理的系统探究。”^[144]社会科学依然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远远不及自然科学所达到的系统化程度。但在文艺复兴使思想自由成为科学探究的发动机之后，自17世纪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毫无疑问，从任何技术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起步都要晚于自然科学，发展要慢得多，也尚未达到与之相当的水平。”^[145]

由此观之，成就是显而易见的，而需求也是一目了然的：

<165>

由联邦政府发布，国会、法院、农场主、生意人、劳工领袖、教育人士乃至普通公民等等日常使用的那些统计信息，都是社会科学的产物。……不过，社会科学最显赫的记录，或许还是在战争危机期间写下的。附属军方的社会科学家发展了一些技术，用于预测非战斗减员，确定各种军备物资的“消费者接受度”，解决士气低落这样的严重问题，摸索用于复员的绩点制。而在国内后方，有关信息发布政策、稀缺材料配置、民用物品配给等方面，类似的研究团体成功地解决了错综复杂的难题。然而，无论实践

[143] John W. Riley, Jr. 与 Talcott Parsons, “Social Science. A National Resource”, 第一章第1页；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41, box 3; 同样, 各章分别编排完全是阿拉伯数字的页码。

[144] 同上引, 第一章第4页。

[145] 同上引, 第一章第11页。

成就的总体记录如何令人印象深刻，若不是可以利用的技术资源和理论资源储备丰富，显然是永远不可能谱写出来的。筑造这一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也并非易事，而是严肃的科学研究过程，唯有持恒用力，毫无浪漫可言。^[146]

他们由此推出了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在研究人员的配备上要坚决保质保量，“对于未来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从组织上和资金上鼎力支持社会研究，尤其是可以合理归为基础性研究的项目”^[147]。

帕森斯的核心关注在第三部分。在“技术与理论的发展”这个平淡无奇的标题下，有一章“科学与常识”，他详细阐发了现存的两类研究，一类研究是在想当然接受的理论框架内确认事实（“以事实为中心的研究”），另一类研究是对经验世界采取某种理论视角，从而揭示其内在结构中新的特征或迄今未知的特征（“以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对于后者，他进一步说明道：

在这一端，研究主要是“理论取向的”。无论是通过理论推演，通过经验证明，还是更多情况下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它所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某一套理论的主要逻辑结构中涉及的问题。这类研究首先意味着验证理论推演得出的推论，或是找到经验证据，以便在理论上皆有可能的几种替代方案中间作出选择。而在另一端，研究主要是“找寻事实”……在理论本身的结构之外。^[148]

为了具体说明什么是“理论取向”的研究，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他着重指出，所谓“情境界定”的建构，就是这本书通过经验比较加以检验的原创性概念成就。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的研究证明，不能通过“利己”动机与“利他”动机这一简单两分来分析“情境界定”。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认为，只有进一步区分生意人的自我利益/关注（interest）与医生的专业关注/利益（后者的自我关注/利益就是“遵从良好的专业行为……服务于‘患者的福祉’”^[149]），才能理解“‘医生’的角色与‘生意人’的角色之间

[146] 同上引，第二章第3页。

[147] 同上引，第二章第4页。

[148] 同上引，第八章第9—10页。

[149] 同上引，第九章第26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的差异，这是由对于情境的界定所确定的。”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解释清楚所搜集到的丰富的经验素材。无独有偶，涂尔干的《自杀论》让人清楚地看到，他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如何推动着他在自杀这个主题上可以利用的统计数据中寻求证据。（帕森斯简单提及韦伯，是和涂尔干一起提到的，强调两人都“使用某种社会系统的观念作为首要参照点，然后可以细致描绘专门的结构，并结合这些结构来分析社会行为的动态过程”。^[150]）他着重谈了涂尔干是如何展开研究的：

他根据其他来源，尤其是对于斯宾塞的契约关系概念的批评，发展出了理论上的基础，以质疑从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行为直接动机的角度，来说明这些行为的许多规律性。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个体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之间整合的类型为何，程度如何，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他特意选择了自杀问题这块领域，来检验其推理的经验效度。因此，他是在寻求有可能不符合“动机”这一说明类型的事实。^[151]

所以，在帕森斯看来，理论在研究中至关重要，超越了事实与观念这种糟糕的区分。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读者，在社会学中过去根本不存在什么毫无争议的权威性理论，能够就此转换成研究假设；不仅如此，现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理论，因为事实上，就其理论发展的状况而言，社会学远远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比如经济学或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基本的推理路线，也必须重新评估，以切近期待未来才能阐释清楚的概念网络，就眼下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勾勒一套参照框架作为出发点。他把对于社会学理论现状的这种诊断，融入对于各门社会科学的比较：

具有浓厚理论取向的研究已经推进到社会结构、经济分析、人类动机、文化变异等领域。诚然，从这类努力中产生的概念图式愈益明确，但发展尚不平衡。在有些地方，它似乎基本只是种参照框架，而在另一些地方，比如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的一些分支，它已经发展到产生颇具效力的分析工具和概念工具。^[152]

[150] 同上引，第九章第 27 页。

[151] 同上引，第九章第 28 页。

[152] 同上引，第九章第 1 页。

<167>

最后，到了与（第二稿）备忘录的第二版同期撰写的《社会系统》，帕森斯宣称自己将社会视为社会系统的理论乃是基于一种参照框架，并明确指出它就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

第八节 第三次努力

有鉴于两份不成功的备忘录，说实在话，帕森斯基于社会学的战后成就来分析举国的应战努力，唯一的长期效果就只有他的《社会系统》。

《社会系统》受惠于帕森斯在战争期间探讨过的许多主题，这一点虽说不是直白表露，但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两份命运不佳的备忘录中，试图对战时的工作作出概括和评估，而这部书就成为颇具价值的后续之作。《社会系统》作为一部世界经典，虽说其实缺少一份参考文献，但的确得益于长达十年的有关经验主题的分析，特别是英美民主与纳粹德国的对比。如此看来，帕森斯试图评估战时研究的成果，并且不懈努力地要确定，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能够为推动实现一个民主化的现代社会的各项目标作出怎样的贡献，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在战争期间优先考虑的那些主题，在战后依然受到相当的重视，绝大多数都被他引入了《社会系统》，虽说并没有大肆声张。比如说，科学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因的角色、苏联是否属于可与二战中纳粹德国相比的冷战之敌。

一、医疗实践：社会系统之典型缩影

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是战时研究的积极成果所讨论的话题之一，在《社会系统》中又再次进行了探讨。其中既包括对于健康和疾患的相关问题的某些深刻见解，也有医疗实践的问题。^[153]《社会系统》的第十章全章讨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医疗实践系统，旨在说明，精神病学方面（也是身心方面）的特

^[153]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帕森斯就已经致力于一项研究，考察医疗实践中的行动取向，当时他所关注的一些身心话题只是有关医生的专业精神，而不是精神病学。在 1951 年《社会系统》之前，他只是在 1948 年的备忘录里才将精神病学视为一门社会科学来探讨。

征不仅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健康与疾患，而且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医疗，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战时研究的洞见：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有鉴于此，他假定所有医疗实践都包含某种精神病学因素或心理治疗因素，因为事实上，疾患意味着退回到孩童般的依赖状态，而治疗就是引导患者摆脱这种状态，将会作用于整个疾患之下潜在的无意识偏离动机。帕森斯所谓的“无意识心理治疗”，指所有包括四阶段社会控制的康复过程的医疗。^[154]他反驳当时医生一方对于这

<168>

个不同寻常的命题的质疑态度，提醒道：“持有机论立场的医生咄咄好斗，反精神病学，他们看待心理治疗就有如那些咄咄好斗的反理论的经验论科学家看待理论。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管他是否了解或是否希望如此，都只是循规去做。事实上，他或许会做得很有成效，就好像你甚至无需了解语言具有某种语法结构就可以很好地使用它。”^[155]

透过这一分析，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医生和患者这两种角色彼此紧密关联，都被整合到一种基于共享价值取向的模式中。他揭示道，两种角色都体现出普遍主义、情感中立、功能专门性、获致取向和集体取向等规范。事实上，按照他在该章开头所言，医疗是他眼中社会系统的典范：

我们不单单是针对许多具体方面引入描述性材料，还努力把此前讨论的许多线索，甚至是绝大多数线索，都综合到一种更为宽广的分析当中，揭示现代西方社会一种重要的子系统的某些关键特性，这样的话，或许将有助于读者理解我们已经发展出来的抽象分析的经验相关性。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现代医疗实践。^[156]

^[154] 他在与勒妮·福克斯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见 Parsons and Renée Fox, "Illness, Therapy, and the Modern Urban Famil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8, 1952, 第 31—44 页。四阶段是社会控制的整体过程模式，包括容忍 (permissiveness)、支持 (support)、拒绝交互性 (denial of reciprocity)、操纵报酬 (manipulation of rewards)。后来他又在别处更加充分地阐发了这一点，见与年轻一代的合作者合撰的《行动理论试论集》，细致探讨了社会化、治疗乃至整个社会控制的四阶段性质。参看 Parsons、Robert F. Bales 与 Edward A. Shiels 合撰的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155]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1; 平装本,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第 462 页。

^[156] 同上引, 第 428 页。

二、从社会类型视角看偏离

疾患当然是一种偏离。第七章谈到了有关偏离的其他问题，包括它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对应范畴——社会控制（他在“宣传与社会控制”一文中已经说明，包括治疗与强制两种类型）。这一章题为“偏离行为与社会控制机制”，关系到应战努力所发展出来的观念，特别是讨论“偏离取向的走向”和“偏离行为趋向的社会结构”的两节。要点是什么？

帕森斯为了确定偏离的不同走向，尤其是因为偏离与遵从之间既有差异又有重叠，所以借鉴了默顿的名篇“社会结构与失范”中提出的一些偏离类型。^[157] 默顿称偏离为失范，分析了它的社会结构的情境条件，提出了仪式主义（ritualism，颇有些类似于弗洛姆所说的“自动遵从”^[158]）和创新（innovation，等同于犯罪）等类型。帕森斯把这些类型都融入一种代表遵从的偏离，称之为“强制性遵从”（compulsory conformity），挑明“默顿所言的‘创新’和‘仪式主义’是我们的两种强制性遵从类型，而‘反叛’（rebellion）和‘退却主义’（retreatism）显然是另两种类型。”^[159]

这样，帕森斯就可以将犯罪型社会（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要素视为偏离，而这恰恰因为它们是遵从主义的。附加在这种遵从上的强制性表明了它的异化性。在分析偏离的社会结构时，这一点又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而帕森斯感兴趣的是，一个处在有组织的异化中又“真正具有某种团结的群体”，其功能是如何运作的。^[160] 这类群体也仿佛是“异化了的需要倾向”^[161]的领域，使强制性遵从成为可能：“遵从的需要具有强制性……或许对这类偏离的亚文化群体方方面面的特

[157] Robert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1938, 第 672—682 页。

[158]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1)] 一书中明确使用了这个术语，更早前，在流亡中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对于系列经验研究的报告《权威与家庭研究》中，他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念，用的是“威权性格”的名目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Félix Alcan, 1936)]。默顿对此非常熟悉。

[159] *The Social System*, 第 258 页。

[160] 同上引，第 287 页。

[161] 同上引，第 286 页。

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极其关注忠于群体，暴力诅咒‘该死的’。”^[162]

帕森斯认识到，当犯罪的破坏性是政治性的，换言之，“首要的异化取向……反对的就是规范模式本身”^[163]，当犯罪的亚文化蓬勃兴起或是攫取了整个社会，强制性遵从就成为越轨文化中的主导特性。他指出，“群体偏见的动力的某些特性似乎符合这一点”^[164]，然后他把反犹主义解释为偏离了普遍主义，借助寻找替罪羊的机制，设定为伪普遍主义。纳粹德国就是典型。他认为，犯罪和种族反犹主义都是基于同样的机制。唯一的差别在于，越轨的团伙成员的动机是“对抗”主流社会，而反犹主义者则是把自己异化了的需要移置到某个作为替罪羊的外群体上，而他自己却“属于”主流社会（即法西斯社会）：

将侵犯性移置到犹太人身上，视之为某种替罪羊式的对象，这种机制促成了反犹主义。上述假设在社会科学中几乎已是尽人皆知。但是，从非犹太人群体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种偏离行为，因为根据主要的价值模式，犹太人与任何非犹太人同胞一样，都有权受到同样是普遍主义的宽容行为对待。因此，存在一种强大的压力，通过某些指控，比如他“不公平竞争”，比如不能指望他会诚实或忠诚，将他所受到的特殊对待“理性化”。这样一来，对他的歧视就被归入普遍主义的价值体系。只要在非犹太人群体内部，或者其内部的一个子集体里，接受了这种合法化类型，并且彼此增强，我们就会看到一种增强了的偏离行为模式，而无须任何个体被迫接受偏离通常会付出的代价，像是公开摆脱其制度化了的角色，面临遭受负面制约的风险。实际上，如果任其发展，遵从主要价值模式的人反而会遭受到负面制约。^[165]

<170>

有鉴于此，他讨论了在怎样的条件下，社会可能会被其偏离群体所攫取。考虑到意识形态群体或宗教群体（包括政治群体）诉求获得道德上或政治上的合法化和主宰地位，他警告道，“偏离的子群体现在的诉求绝大部分就是要求获得

[162] 同上引，第 286—287 页。

[163] 同上引，第 288 页。

[164] 同上引，第 289 页。

[165] 同上引，第 290 页。

合法性”^[166]，往往会夸大“(其成员)与主要价值体系之间差异的根本性”。他认识到，这甚至可能伴随着“宣布(社会的)……价值取向本身就不合法”。

在这一点上，他明确告诉其读者，一个革命性运动很少能够成功地谴责或威胁要摧毁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不过，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一种偏离的大众运动也有可能获胜。鉴于战后的情势，鉴于纳粹政权已经被粉碎，显然他的例证另有所指。帕森斯点明了偏离的群体是如何持有含混不清的动机结构，几种发展方向都有可能。他们利用了周遭的自由社会，针对那些他们寻求获得承认的人，肆意表达暴力侵犯性。在魏玛时代的德国人身上就能看到这一点，而在美国共产党人那里也有类似的表现，他们一方面谴责其所处的民主社会的自由权利，同时又在利用这些自由权利：“比如说，共产党人常常相当自觉地利用自由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之类的模式，但在普通党员心中，却有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觉得他们有正当权利指望得到法律的各种‘照顾’。但在坚持这种权利的同时，对于该权利作为制度化组成部分的那个‘体制’，他们又肆无忌惮地予以全面谴责。”

三、思考模式变项

帕森斯在《社会系统》第五章中明确提到了纳粹主义，题为“社会系统的结构 III：诸社会的结构在经验上的分化与变异”。他摸索出四种类型的社会层面的结构(societal structure)，即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获致取向或先赋取向这两对价值取向倾向的矩阵组合。他提醒道，这些典范类型当然只是一些经验抽象，但能够通过历史上四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来具体地看。对于“普遍主义—获致取向模式”，其代表就是美国；对于“普遍主义—先赋取向模式”，其代表就是前纳粹时代的德国，不过纳粹体制也是一个很惹眼的实例。^[167]他强调这些类型的关键就在于，在某一文化或社会中的各种主导价值取向的特定组合中，存在多大程度的张力；从而需要建立怎样的缓和机制或阻遏机制，以确保社会系统达到某

^[166] 同上引，第 294 页；下三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67] 另外两种类型，即“特殊主义—获致取向模式”，比如在中国，以及“特殊主义—先赋取向模式”，比如在某些西班牙语系的拉美文化中，他觉得社会学上的相关意义较小。

一特定的稳定水平。

结构上重大的差异使得普遍主义—获致取向模式有别于普遍主义—先赋取向模式，他强调，在后一种模式中，“普遍主义因素在此的后果类似于上例（即普遍主义取向的获致型社会，英美类型的社会），但在与先赋取向结合之后就有了不同的走向。”^[168]

他进一步澄清道，这一点又有两个方面。首先，在普遍主义—先赋取向类型的模式中，以普遍主义方式界定的理念状态和从近似于理念的角度范畴化的既存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他认为，这就引发了“一种强烈的趋向，……泾渭分明地区别遵从理念与偏离理念，就行动而言，也就是区别‘支持理念’与‘对抗理念’。”这种二元对立或许表现为以理念化的未来对抗腐坏了的现在，而这正是纳粹在魏玛共和时期所做的事情。

其次，有三个因素可以缓和张力。一是与先赋取向相配合的职场上的普遍主义，孕育出“地位”的范畴，强调的是特定的行动者是什么，而不是他做了什么；^[169]二是事实上，“很容易从有待实现的理念状态，转到将理念特性事先赋予集合体”，从而促进了“集体主义”；三是“因为很清楚什么是适用于全体的理念，使得那些担负着约束集体责任的角色的人自然要‘保证’人人符合理念，要么直接命令，要么为集体成就作出适当贡献”，由此发展出“威权主义”。

在普遍主义—先赋取向的景象中，如此强制推行的理念又是什么呢？帕森斯解释道：“纳粹主义将某种理念状态投射到有关政治未来的理念中，视之为德意志民族（Volk）神秘的理念性质的流溢。”^[170]这就造成了社会的普遍政治化，乃至于彻底压制内部的对立。而这种压制本身就刺激了针对被指定的“外部”敌人的侵犯性。他注意到，“这种泛政治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组合与此类社会中的侵犯倾向颇有关联。”^[171]帕森斯并揭示道，这类侵犯性是一种“散漫漂移的侵犯

[168] *The Social System*, 第 191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69] 同上引，第 192 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70] 同上引，第 193 页。

[171] 同上引，第 194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性”^[172]。

<172> 在这方面的论证上，纳粹体制并不是他谈到的唯一一类普遍主义—先赋取向体制，虽说它表现得如此显著。在他看来，另一个实例就是苏联，它同样用强制力培植了一种带有乌托邦政治性质的未来理念，与经验现实相对立。他直白地指出，“苏维埃时代的俄国也在某些方面近似于这种类型。共产主义是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的一种乌托邦性质的理念状态。而主要的地位核心，就是作为实现理念的精英先锋的党。”^[173]

四、何谓科学？

帕森斯在《社会系统》的第八章探讨了关于科学的一些论题。他提出，科学不仅受惠于以探究自由为典型体现的进步，而且推动了这种进步。但在威权主义社会里，通过意识形态的腐坏，科学也可能被政治权力所挟持。讨论“文化传统的主要成分”的两章中，头一章的话题就是“信念体系或观念体系”（另一个话题是“表达性符号体系”，在第九章讨论）。^[174]

他首先指出，如果价值取向的文化意涵被视为理所当然，就需要关注“信念体系与社会行动过程”之间的关系。^[175]诚然，信念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具有某种“整合功能”，表现为“存在的信念，……包括经验的和非经验的”^[176]，依赖于各种观念（意识形态）所提供的证据，从哲学、宗教到科学。至于“存在性经验信念”^[177]的真理，毫无疑问，在于科学。科学研究的制度化对于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福祉有赖于应用性科学的开发利用，而且知识的增进也有赖于不懈奉行培育基本“科学知识规范”的理念：“科学知识的基本

^[172] 他就这样融合了拉斯威尔在1934年（或1933年在另一处）提出的命题，并加以适当修正，就像他在二战期间有关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解释，或者发表于1947年的有关西方类型社会中侵犯性的分析。他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象意味着，在极权主义的专制独裁下，相比于西方类型的民主体制，“散漫漂移的侵犯性”要广泛得多，也强烈得多。

^[173] *The Social System*, 第193—194页。

^[174] 这些概括取自同上引，第23页。

^[175] 同上引，第327页。

^[176] 同上引，第328页。

^[177] 同上引，第332页以下。

规范或许有这么四条：经验有效性 (validity)，特定命题的逻辑明晰性 (clarity) 或精确性 (precision)，各个命题之相互关联意涵的逻辑一致性 (consistency)，以及所涉“原则”的一般性 (generality)，以上或可解释为一些相互验证的意涵。”^[178]

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大学作为西方文明的先驱，何以成为将合格的专业精神传递到广阔社会中的媒介？

鉴于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的“领导者”大体上应当是现代意义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精英地位也就包含了奉行一种特定的价值体系，而科学家的价值、科学家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价值评估，就是这种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机制不仅将科学整合到社会的广泛文化传统之中，而且整合到社会的制度结构中，构成了作为社会结构一部分的科学研究的制度化的首要基础。……科学家以大学为重心所占据的职业角色，是整个职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它和整个职业系统一样，也具有普遍主义、情感中立、专门性和获致取向等模式要素，在此无须赘言。不过有必要注意一个事实：作为一种专业角色，它的制度化主要是从集体取向而非自我取向的角度来看的。^[179]

<173>

这样一来就凸显出两种危险：“一种是所谓‘知识就是权力’的意涵”^[180]，趋向于自负傲慢，而不是强烈的“他人取向”^[181]；另一种是“所谓‘科学家的理论就是他的城堡’”，不太情愿接受专业同行的成就，发展出充分的集体取向以面对公众。（他主张，这一点平等适用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第二点说的是科学要在适当程度上根植于一个社会系统的价值取向，相关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化。那么，作为有别于确保得到接受的知识系统的意识形态又意味着什么？

要构成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存在……某种特性，对于信念有一定程度的评估立场，作为集体中成员资格的一个方面，对于信念系统的认可被制度化为集体成员资格的角色的一部分。这种制度化的具体类型及其

[178] 同上引，第 335 页。

[179] 同上引，第 342—343 页。

[180] 同上引，第 343—344 页。

[181] 同上引，第 344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程度千差万别，可以是彻底非正式的，也可以是正式实施的，需要认可某一具体文本，由某一具体机构执行对于偏离的制约。……但是，作为有别于基本属于认知旨趣的观念的信念，比如意识形态，必须包含一种义务，要接受其信条作为行动的基础。作为有别于纯粹工具性信念的意识形态，必须包含一种观念，即信念体系的贯彻实施维系的不单单是某个特定的目标是否达成，更是整个集合体的福祉。^[182]

在后一种形式下，偏离，其极端便是极权主义，进入了“‘观念角色’的问题”这一论域。^[183]

五、系统变迁的动力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社会系统》的第十一章，帕森斯讨论了社会变迁，从战时研究及其战后续篇得出的深刻见解再一次进入视野。他觉得，分析“社会系统中变迁的一般性质”^[184]只能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需要考虑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一种是每个社会都盛行的所谓“既得利益”，可能推动变迁，也可能对抗变迁。因此，“变迁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模式更替’，而是通过克服抵抗实现更替。”^[185]另一种是张力和对于张力的反应是否产生了消除变迁的抗衡趋向，重归此前的均衡是否是可能的甚或不可避免的。

如此观之，他认为，社会变迁可能会有两种相反的方向。它要么意味着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186]，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法理型社会中，比如英美民主体制下的普遍主义—获致取向类型的体系，增进或改善其现代化程度。或者反之，变迁可以往相反方向推进，变得越来越不理性化。他提醒道：“我们已经不断看到，在社会系统中，可能会有相当多的障碍发挥作用，阻挠理性化过程。”^[187]

[182] 同上引，第 349—350 页。

[183] 后一表述是第八章的副标题。

[184] 同上引，第 490 页以下。

[185] 同上引，第 491 页。

[186] 同上引，第 499 页。

[187] 同上引，第 501 页。

他明白，在韦伯的框架中，这只能意味着通过克里斯玛运动，“社会系统的理性化程度”降低。^[188]他觉得，根据韦伯的解释，历史上的进化式进步似乎就是通过“将新的能量从外部引入系统”，而这在韦伯看来往往涉及克里斯玛：

就这样，系统的理性化的整体水平降低，理性化过程由此仿佛有了新的起步。事实上，在韦伯看来，尽管他十分重视理性化过程，但之所以不能坚信社会系统的进化是单纯的线性，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对于表达性符号体系领域内的独立发展趋势也可以有类似的考虑，这一点已经可以证明了。^[189]

而在这里，克里斯玛型统治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变迁，即一个社会中政权类型的变迁，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从一个法理型社会到克里斯玛型统治的倒退或变迁是如何发生的。二是韦伯所预见的那种克里斯玛例行化过程，作为社会变迁，是如何将一种克里斯玛型政权转换成传统主义政权。

就两种变迁方向的第一种而言，他选择了德国从魏玛共和到纳粹体制的转变，作为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论题。他通过对魏玛德国这一段历史的精彩勾勒，概括说明了这种转变的四个阶段：

<175>

一、民众中普遍出现异化性动机，不仅如此，“异化性动机将会聚合在特定的张力点上”^[190]，比如一战后德国国族一体性的丧失；

二、涌现出一个偏离群体，对这些异化性动机加以利用；

三、该群体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一套宗教信念，……能够从有关主要制度化意识形态的至少某些符号的角度，成功地推进对于合法性的诉求。”^[191]不过，如果“权力系统的组织，特别是国家的组织”^[192]属于等级性、

[188] 同上引，第 502 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89] 在这句引语之前的一句话有一则附注，帕森斯直指韦伯对于克里斯玛的理解：“在韦伯的图式里，我们可以推断，这是克里斯玛概念在理论上的功能之一，即概括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理性化过程赖以运作的新取向的来源。”

[190] 同上引，第 521 页。

[191] 同上引，第 522 页。

[192] 同上引，第 523 页。

集权性、精英主导性，系统就会导向革命性变迁。他指出，在德国，这意味着出于爱国主义的反共和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的最初岁月，政治暗杀接连不断，导致了不稳定的气氛，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传统下，纳粹运动可以对这样的气氛大加利用。因此，希特勒对于“社会主义”以及国族主义的诉求，就成为大获成功的大众运动的积聚之地，而自由主义则始终“在德国比在西方世界其他地方羸弱得多”^[193]。

四、他还补充道：“最后一点，众所周知，获胜的盟国对于如何处置德国犹豫不决，左右摇摆。这样很可能比严苛无情或宽宏大量后果都更严重。它制造了一种局面，使得躁动不安的修正论在德国有了绝好的机会，而对于这样的躁动，当权人士是很缺乏抗御力的。”^[194]

对于克里斯玛的例行化，帕森斯觉得苏联是比纳粹德国更好的例子。但在进一步讨论这一点之前，帕森斯论证至此，提出了几乎可视为直抒个人胸臆的陈述。他谈到了德国在二战战败之后成功实现转换，回到法理型的民主社会。“不管曾经融入纳粹运动的那些要素在未来可能出现什么新的组合，德国再要出现完全一样的运动是不太可能了。以上只是极其粗略的勾勒，但却足以显示本研究（即《社会系统》）在抽象层面上探讨的因素，主要是以哪些方式发挥作用，促成了纳粹运动兴起的。”

他发现，纳粹所赋予的能量表现为从法理型权威转向克里斯玛型权威的社会变迁。但克里斯玛的例行化则意味着从克里斯玛型统治转向传统型统治，这是极权主义政体下一种持续的内部发展，或许通过纳粹体制来看还不算最佳范例。他指出，克里斯玛的例行化过程在德国尚未完成，由于二战战败，德国倒退回传统主义的过程走到半道便中止了。^[195]

在该章的最后一节，他用另一个克里斯玛型政权来典型示范克里斯玛的例行化，那就是苏联。“一个革命性运动的适应性转型”意味着，在典型情况下，

[193] 同上引，第 524 页。

[194] 同上引，第 525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95] 他明确指出，自己之所以认为德国的纳粹体制并非克里斯玛例行化的最佳范例，是因为“纳粹德国的相关发展戛然而止”（同上引，第 525—526 页）。

一些保守倾向，比如提供可以接受的生活标准，或是在可能性的范围内提供有限的机会，都会对主导意识形态产生某种“制衡”效应。尽管事实上，胜利后的革命群体不仅需要“规训”其追随者，而且要“规训”全体民众，但“制衡”影响能够迫使政权作出让步。根据帕森斯的诊断，就苏联而言，在革命之后的新政权初期，显著的变迁发生在政策面上，而并非意识形态层面：

直接废除强制的做法其实很早就放弃了，在一定程度上，党的准军事化组织及其纪律未受触动就被带入了新政权。但在革命的早期阶段，的确有着广泛的期待，觉得人们现在终于“自由了”，基本上能够为所欲为了。最关键的一步或许发生在列宁遇刺之后，以此为契机，红色恐怖作为一项特意为之的政策建立起来，此后从未松动。不妨认为，在理念状态上严厉驳斥强制，而政权又为了自身的目的厉行强制，两者之间的张力通过某些方式成为俄国共产主义长期张力的深切源泉。^[196]

不过，他认为，长远来看，对于全体民众的控制是无法维持的。当他着手研究苏联克里斯玛型政权特殊的例行化方式，就开始认为，这种极权主义的系统不会长久。“即使政权本身并未瓦解（渡过了斯大林继承的问题），不出一两代人，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系统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上也肯定会发生调适的过程。”他如此明言，并加上个人的思考，“这种出自社会学家的特定预测就是：‘共产主义’将不会实现，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其实现毫无前景可言，这也将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远转变。事实上，很难看出，一旦这个无论对内对外都动力十足的扩张主义阶段……宣告终结，……这个系统还如何能维持下去。”^[197]换言之，在帕森斯看来，一方面是理念至上的信念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对知识分子彻底强制性的控制实践，考虑到这两者之间的歧异，苏联似乎不太可能维持长久。其实他想说的无非就是：“这个困境可能有什么样的结局，将不得不留待未来的分析研究或事态走向来决定。”^[198]

<177>

[196] 同上引，第 530 页。

[197] 同上引，第 532—533 页。

[198] 同上引，第 533 页。

概括一下我对于《社会系统》的简要重述：帕森斯在这部巨著中提出了丰富多样的分析观点，有些只在某一小节中出现，毫不起眼，有些则属于论证主线，占据了整章整章的篇幅，但这些观点都记录了他是如何关注面临困境的民主体制的有关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余波的背景下，帕森斯既关注社会学理论，也关注其实际应用。对于哈佛及其他地方社会科学的应战努力，不仅是帕森斯，也包括他的许多同行，都给予了充分认识，帕森斯也将此融入了《社会系统》中的许多主题。这部著作虽然被标定为抽象理论，其实关联着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境。

因此，尽管众多二手研究在评估《社会系统》的理据时，往往把帕森斯说成人云亦云的“不可救药的理论家”，但他的自我定位却远非如此。他在《社会系统》中题献妻子海伦时自称的“不可救药的理论家”，不应被当做是真切的自我形象描绘，更不能以之概括其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根本宗旨。

第九节 小 结

《社会系统》常常被误读成抽象理论，远离当时具体社会的急迫问题和典型特征。但我的观点与此相反，《社会系统》自有其社会历史关怀的深厚背景。一方面，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的应战努力，包括帕森斯的一些同事们的研究，激发了《社会系统》。不妨把它看做是帕森斯代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反复盘点社会科学在二战期间对于国家事业的贡献，就此得出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此书也很重视科学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集中探讨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在战后所能扮演的角色。原子弹的投放余波未尽，通过这样的努力，期望能够维护和平，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最终导致《社会系统》的努力中，帕森斯著述中对于民主体制的捍卫方式与《社会行动的结构》不太一样，也和1938—1945年之间采取的行动主义与分析立场相异。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作为社会系统这个层面上的民主体制。在捍卫民主体制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到从民主体制倒退回专制独裁是可能发生的，

反之也有可能，即社会变迁可能通过现代化战胜极权主义（就像在美国一样，一个现代社会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化”而趋向现代化）。

他把民主体制看做发达社会系统，从这一视角出发，他认为，毫无疑问，国家社会主义或苏维埃共产主义之类的克里斯玛型政制迟早是要覆灭的。他关注的新焦点在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系统作为整合的行动结构是如何发挥功能的。这一主题将十多年来众多研究议程的工作集一大成，莫立了《社会系统》。 <178>

附论 身陷政治围攻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社会系统》的写作和即获成功的同时，帕森斯也遇到了两桩事件，日后这些事件使他遭到了敌视他的人的指控，说他在政治上有偏离之举。1948年6月，他取道德国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为哈佛大学学生会所组织的社会研究研讨班授课。而这趟旅程在他去世后可以说成了一场噩梦：到80年代后期，他被指控在这次旅程中对至少一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共犯表示了同情。另一桩风波是麦卡锡主义。他被指控对国家不忠。1954年他个人深陷指控，此后他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麦卡锡主义。

一、一个纳粹同情分子？

《社会系统》的问世使帕森斯的人生行至巅峰。但大约40年后，他却被指控对纳粹德国抱持同情，甚至在1948—1949年间犯下了支持纳粹的罪行。

风波起于帕森斯的一份思想传记，该文大言不惭，对他的生平和著述进行了明显错误的构建，而为了平衡论证，又提出了无中生有的指控。这个故事有两种面目，一种是被讲述的说法，另一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可以从多种多样的来源了解到细节）。

先看前者。1989年，《国民》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控帕森斯将一名前纳粹雇员偷偷带入美国，此人同时也是俄国流亡者。此文作者，一位历史学家兼记者，指控帕森斯在1948年6月到1949年上半年期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

研究中心的协助下,帮助该纳粹共犯进入美国。而帕森斯当时正是该中心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稍早前《哈佛红》上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指控,现在的指控使得波澜再起。^[199]更广泛的背景可参看199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通过的一部博士论文,直指俄国研究中心的情报工作针对的是战后欧洲的共产党人(从而有利于前纳粹分子),而帕森斯正是这项工作的领军人物。^[200]

怀疑的主要依据是帕森斯在此次为期三周的旅程中写给克拉克洪的十封信, <179> 这些信保存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的政治学家默尔·芬索德的档案中。这些信件被怀疑包含了秘密情报信息,特别是向克拉克洪报告了帕森斯与军管政府官员和俄国流亡者(他们在战后德国往往过着隐居生活,怕被引渡回国,送入古拉格劳改营)的有关接触和谈话。时值冷战欲来,风雨满楼,帕森斯被认为充当了某种密使,为某个政府机构服务(据称是国务院和/或当时刚成立的中情局)。具体的指控在于:帕森斯身负一项准官方性质的反共情报使命,安排一位前纳粹分子有机会使用假身份证入境美国(事实上,被怀疑的此人的确是这样做了)。

结局如下:早在80年代前期,这些信件就已由芬索德的继承人从哈佛大学档案馆中取走。有鉴于此,当80年代晚期爆发指控,说帕森斯偷送一位纳粹同情者入境美国,似乎不可能提出反驳。在芬索德档案所藏的那些信件中,据说那个人已经被引见给克拉克洪。

然而,事实上,在帕森斯这一方无可指责。他那十封信最初是手写的,后来应他本人要求,以打字稿形式存于俄国研究中心(为此他像克拉克洪和芬索德一样,各得一份复件)。信件当时是写给作为俄国研究中心主任克拉克洪的,因为帕森斯答应要利用自己顺访德国的机会,就图书馆分布、特色书店或书籍、俄国问题专家及相关问题搜集大量信息。芬索德收到了这些信件的一批复件,因为他主持了俄国研究中心拟议的一个研究项目,帕森斯就是为这个项目提供来自

[199] 参看 Ron Wiener, "Talcott Parsons' role: Bringing Nazi sympathizers to the U.S.", 刊于 *The Nation* (1989年3月号), 第306—309页; 以及 Joseph R. Palmore, "Parsons Allegations Challenged by Professors. Colleagues Say Scholar Did Not Knowingly Recruit Collaborators", *The Harvard Crimson*, 1989年2月23日, 第1—2页。

[200] Charles Thomas O'Connell, "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ce: Soviet Studies at Harvard". 博士论文,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 历史系, 1990(未公开刊行)。

德国的素材（项目旨在分析逃难者的人格结构，针对的就是那些当时居住在西方诸国对德占领区的所谓难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共产党国家）。根据1948年6月7日俄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帕森斯在旅程中要代表其同事们接触一些人士，其中就有一位前俄国的语言学家，当时以英国情报部门给他的一个假名生活，叫波佩。在执委会预备会上，帕森斯提到，自己在逗留德国的三周期间，将代表各方面同事执行不同任务。以上就是现在可以重新构建起来的，他代表俄国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在德国执行多项任务。^[201] 在他写给克拉克洪的信中，只在其中一封提到过波佩（那位被怀疑的纳粹同情者）。但帕森斯好像根本就没见到那人。帕森斯先是与军管政府中一位官员谈了波佩，然后，波佩就被认为不适于担任俄国研究中心（在1948年4月）提供的差使：在一项难民研究中担任顾问，为期一年。^[202] 这样一来，在当年10月，俄国研究中心撤回了对波佩的邀请信。不过，波佩还是移民入境美国，大概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卡尔·门格斯最终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给他找了个职位。50年后，帕森斯还被指控与此事件脱不开干系，可他其实什么也没做。最后重新整理并评价对帕森斯这场指控的是丹尼斯·朗，他把这场无事生非的典型的政治诽谤称之为“左翼麦卡锡主义”^[203]。

<180>

[201] 比如说，雷蒙德·鲍尔要求的是关于“德裔美国人对于苏联人的体验。苏军中的德国人。德国人对于占领过的苏联领土的体验。”英格尔斯希望的是关于“询问难民对于在苏联处境的想法”。芬索德要求“访谈 Dudins 党的事情及其他，慕尼黑黑黑的 Fischer 女士、Karpovich 或 Nikolaevsky，有关共产党的文献”；见帕森斯档案，手写札记，未注明日期（大约是1948年6月），开头是“鲍尔有关难民的问题”，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45.4, box 1。

[202] 3号信件1948年6月30日寄自柏林，相关原文如下：“其次，通过CJ，我结识了一位情报部门的人。……他告诉我，英国人已经把德国纳粹党员中的苏联问题专家集合在了一家旅馆里……最后，他……提到了我们的朋友波佩的名字。他告诉我，波佩现在处于英国情报部门的监护之下，但他们希望让他到美国去。他对他们来说是块烫手山芋，因为苏联人明确希望要他——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再次要求得到他。为此我拜访了一位英国情报人员，名叫罗德斯，他证实了这一说法。顺便说一句，他案头上放着的有关波佩的案宗标着‘绝密’。他告诉我，沃尔什将军（美军欧洲中央司令部情报长官）今年春天在华盛顿时曾试图说服国务院接纳波佩，但未能成功。但沃尔什将军觉得还算幸运，因为国务院同意继续考虑此事。（如果他能入境美国，英国人将负责让他离开德国。）事情的说法就是这样，如果您打算有所努力，我不知道这些事实是否会有帮助。”这里的代号CJ指的是卡尔·J·弗里德利希，笔者感谢利兹让我看到了这封信。

[203] Dennis Wrong, “Truth, Misinterpretation, or Left-Wing McCarthyism?”,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1, 1996, 第613—621页。

二、一个前共党分子？

1953—1954 学年，帕森斯应邀前往英国剑桥。在国外逗留期间，麦卡锡主义波及其同事和合作者斯托弗，帕森斯本人也被指控对国不忠。一时间，麦卡锡主义与他有了莫大的干系。

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事实：1954 年上半年，他从英国申请签证前往法国，参加 4 月召开的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但令他错愕的是，他的护照被扣留，还收到一份表格，要求填写并留下指纹。帕森斯听说，斯托弗已被美东产业人员安全委员会 (Eastern Industrial Personnel Security Board) 指控与自己合作，而自己据说参加了共产党，公开支持共产党组织，比如 30 年代的“全美争取西班牙自由委员会” (American Committee for Spanish Freedom)，40 年代的约翰·里德学会哈佛分部 (Harvard branch of the John Reed Society)。此事已经从开始的迷雾一团变成了丑闻一桩。

帕森斯大为震惊。2 月 23 日，他为斯托弗担保作证，除了驳斥其他说法，还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181> 我的政见始终是支持自由的民主体制，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无论是左是右。作为一名忠诚的美国公民，我接受这样的立场自然而然，显而易见。除此之外，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一向觉得自己对此有强烈的专业关注。我这一行的所有人都不可能不明确地认识到，对于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的自由，在任何极权主义体制下都被大大削弱了。我曾在前纳粹时期的德国求学，那段经历让我对纳粹政制的这种特性尤其敏感。我也深切意识到，在苏维埃俄国盛行的基本上也是同类状况，甚至更糟。^[204]

3 月初，尽管得到了多方支持，斯托弗还是输掉了与设在纽约的美东产业人员安全委员会之间的这场官司。从此以后，他将不能查看政府机构的密级文档，对于像他这样敬业的一位研究人员，这种限制影响很大。不过此事还没完，帕森

^[204] “Before the Eastern Industrial Personnel Security Board, Matter of Samuel Andrew Stouffer”, 宣誓陈词，塔尔科特·帕森斯签署，于美利坚合众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伦敦大使馆，1954 年 2 月 23 日，第 2 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4, box 13.

斯本人又被盯上了。5月6日,帕森斯接到一份挂号并需要回执的质询信,要求“对有损名誉的信息作出说明或回答”^[205]。除了指控他曾是共产党员,还说他和共产党员哈洛·沙普利有关系,与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所指定的共产党组织[比如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 Reed Clubs)]有牵扯,并曾挑头反对给阿尔杰·希斯判刑[希斯系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曾任罗斯福总统顾问出席雅尔塔会议,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会主席。1948年,曾是共产党地下间谍网情报员的钱伯斯向众议院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指控,希斯二战前曾是共产党华盛顿间谍网成员。时任加州众议员的尼克松也因调查此案名闻全国。调查后希斯被定伪证罪,获刑五年。苏联解体后经俄方调查,官方档案未发现希斯涉案证据。——译者注]。更令人发指的是,帕森斯被指控,其子曾在1949年前后的家中一次聚会上,引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帕森斯在5月23日致美国驻英大使馆的书证中否认了以上所有指控。针对最后关于其子查尔斯的中伤,他特别驳斥道:“所谓我儿子对马克思感兴趣可以解读为证明我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所谓他受了我的影响,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始终在根本上质疑马克思的学说。这一点在我的案子里或许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马派研究的大部分主题正好属于我自己的专业领域。”^[206]

谈到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激动地声明拒绝任何压迫体制,支持美国的民主体制:

我强烈地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及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影响。原因主要有四。第一,共产党倡导并致力于暴力革命,拒绝接受美国及英国等其他国家所实践的宪政民主的法律程序。第二,它以阴谋手段行事,不符合民主制度的要求——一定程度内的政见分歧是被我们视为合法的,应当在舆论论坛上公开辩驳,通过宪政过程予以解决。第三,美国的共产党

^[205] 国际组织雇员忠诚委员会(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mployees Loyalty Board)主席皮尔斯·J.格雷蒂,执笔为J.保尔·费尔班克,委员会执行秘书,代表美国公务人员委员会(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1954年5月6日,发自Washington 25, D.C.,见帕森斯档案,HUG(FP)-42.8.4, box 13。

^[206] “Interrogatory. Mr Talcott Pars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mployees Loyalty Board, Washington, D.C.”, Part VII-5; 见帕森斯档案,HUG(FP)-42.8.4, box 13。

<182>

据知乃由俄共控制，并非自由美国人的独立运动。第四个原因乃是我喜欢共产主义的理念，不喜欢他们赖以兴起的缘由，他们的实践做法，以及他们关于一个社会应当如何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我对他们无情镇压个体自由深感厌恶。我认同这些观点，我想所有忠诚的美国公民都会毫无保留地视之为理所当然。^[207]

而在大西洋的彼岸，斯托弗尽管由于与帕森斯的关系而招来了损失，但两人依然交好。1954年5月21日，他终于能够坐下来给帕森斯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塔尔科特：这是什么世道！（O temporaes！）如果家里来个客人，你从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就可以向秘密警察告发，主人年仅十五岁的儿子熟悉《共产党宣言》，而这一信息则被说成是反对主人所服务的那个国家——这太令人恐怖了。”^[208]

帕森斯在写给麦乔治·邦迪院长的一封信中，分析了麦卡锡主义所揭示的美国民主构架面临的危险：

我为哈佛大学在国会调查面前分寸得当的捍卫立场感到骄傲，我认为这种做法对于扼制针对大学本身的直接攻击浪潮至为关键。但我觉得，大学或学界不能仅限于捍卫这种“自家地盘”的立场。它们必须捍卫其权利，在资格能力的范围内，以合乎情理的方式，服务于它们的政府和国际组织，不遭恶意臆测不忠，现在这种臆测已经到处流行。我认为，国家的大部分，而不仅仅是业界，正处在危急关头。^[209]

帕森斯后来进一步思考了这一问题并落笔成文，最初题为“一个社会学家看‘麦卡锡主义’与美国外交关系”，在《耶鲁评论》冬季号发表时题目略有修改[原文此处为“slightly different”，但其实差别很大。——译者注]。^[210]帕森斯指出，

[207] 同上引，Part VII-6/7。

[208] 斯托弗1954年5月21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4, box 13。

[209] 帕森斯致邦迪函，未注明日期（大约是1954年5月），第2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8.4, box 13。

[210] Parsons, “McCarthyism and American Social Tension: A Sociologist’s View”, *Yale Review*, vol. 44, 1954-1955, 第226至255页；原始文稿收于帕森斯档案，HUG (FP)-15.70, box 2。

由于美国尚未习惯二战后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陷入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浪潮。兰格在读了这篇文章后，于一月初致函帕森斯表示感谢，明确指出：“我觉得，这样的文章非常有助于让大家重归正常的视角。”^[211]

1955年1月，帕森斯洗清了所有针对自己的指控。来自美国公务人员委员会的公函如此声明：“基于所有证据，业已确认，没有任何确凿理由怀疑该人士对于美国政府的忠诚。”^[212]

然而，帕森斯的名声固然回复清白，但对他来说，事情却不能就这么算了。1955年秋，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成立了一个学术自由和固定教职专门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隶属其第一分委会，以调查所有美国大学中任何教员在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调查下曾遭受的解雇或制裁。帕森斯愿意为该委员会服务。^{<183>}此后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除了有一年作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研究员，他都投入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调查麦卡锡主义曾作出的决定和实际措施的工作。^[213]

埃伦·施雷克在80年代出版的书中，根据后面这些身心烦劳的工作，分析麦卡锡主义对于美国大学的危害，大力赞扬了帕森斯在缓和麦卡锡主义后果的背景下所作出的负责任的工作。^[214]

[211] 兰格 1955 年 1 月 6 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8.4, box 13.

[212] 格雷蒂 1955 年 1 月 19 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8.4, box 13.

[213] 有关帕森斯 50 年代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第一分委会学术自由与固定教职专案 (Special Freedom and Tenure Cases) 的繁重工作的材料，藏于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8.4, box 2；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早期。

[214] Ellen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McCarthyism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有关公民权的新议程：

帕森斯的理论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 <184>

第一节 引 论

哈佛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尔辛格最早近距离分析了约翰·F. 肯尼迪的总统任期^[1]，后来又完成了《罗伯特·肯尼迪与其时代》的历史记述。^[2]但当他记述肯尼迪时代并直至 1968 年改变美国社会的革新政治时，虽然注重了哈佛学者作出的许多贡献，却未能提及哈佛的社会科学。

《代达鲁斯》是美国文理学术院的院刊。斯蒂芬·格劳巴德 1999 年发表的对于《代达鲁斯》四十年的回顾，注意到了社会科学包括帕森斯的贡献，主要集中在 60 年代，是晚近不可多得的概述。^[3]文章的确看到了帕森斯的成就。但在格劳巴德看来，对于学术院及其院刊的成功，对于捍卫科学作为我们文明中文化知识卫护者的角色，有众多社会学家都出了力，帕森斯只是其中一员。因此，作为社会理论家的帕森斯个人在 60 年代的具体成就，尚有待更专门的阐述。

[1] Arthur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2] Schlesinge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New York: Ballantine, 1978).

[3] Stephen Graubard, "Forty Years On", *Daedalus*, Supplement to vol. 128, 1999 (整期专刊此文)。

一些论战口吻的著作,比如阿尔文·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4],指责哈佛社会学特别是帕森斯的机械论思维,乃至缺乏分析上的反思性,这一对帕森斯“后期”著述的认识是不公正的,过于负面。

笔者认为,帕森斯在60年代受到肯尼迪政府自由进步主义的激励,彻底重述了自己的系统理论。我想,他的主要洞见就在于,将国家乃至国际规模内社会层面上组织的范围与结构正在发生的变迁,视为现代民主历史上重大发展趋势的指标。在他看来,美国的多元民主正在经历创新重组,使美国成为进行中的现代化过程的世界领袖。就在他所处的时代,帕森斯注意到,50年代最高法院在公民权方面的立法,刺激了美国社会不断趋向平等,包括南部诸州起先蔑视法律,最终还是将教育市场和就业市场向少数民族群开放。在他的分析中,帕森斯创造了新的概念视角,以充分考虑公民权方面的这些新机会。而在分析这些变化的时候,他也意识到,原教旨主义者的“革命”孕育了反民主的趋向,可能出现现代化过程逆转的危险。即使是不那么暴力的运动形式,比如麦卡锡主义,他也始终认为有现代化过程逆转的危险。

帕森斯这样的努力方向和他大多数同时代人的社会学思路是矛盾的,他认为别人不足以科学地理解60年代的发展趋势。他特别不能接受的是,首先,马克思主义这种思路在他看来,反映的是19世纪(也只是在19世纪)的历史问题和科学问题;此外,出现了功利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回潮,表现为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的一些思路,比如60年代所谓的交换理论和冲突理论。他觉得,这些路数的欠缺都无非是他自己早在30年代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就已经力求铲除的。

笔者认为,帕森斯之所以超越自己的《社会系统》,在思考方式上开拓出一个新阶段,源于其在50年代中期重新研究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论述。他发展出有关系统动力的四功能图式,这有助于他理解一般化符号媒介。他的创意来自重新研究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论述,这在50年代很适合作为方案。他开始认识到,在经济活动中界定理性的文化取向属于经济学知识中非功利的一面,而那种经济学知识从30年代开始就将凯恩斯关于现代经济的观念变成主导理论(显然,

[4] Alvin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1970).

它早就取代了韦伯时代作为主导理论的边际效用经济学)。

他在概念上的第一项成就，开启了结合现代民主体制的发展来研究权力和政治体 (polity) 的新视角，拒斥了他所谓的“零和”权力观。他转而提出，权力的集中与扩散是可变的，在政治体中盛行着两个彼此分离的互动媒介，即政治权力与影响。此外，还有第四种媒介，即价值承担 [原文如此，还有一种就是货币。——译者注]，也是以作为一种符号手段的货币为样板的。他还借用韦伯的术语，尝试讨论了一个社会中随权威类型不同而变的媒介总量。

帕森斯在概念上的第二项成就在于通过各种整合过程来说明民主体制，也就是将各自分化的、多元的(子)系统中的多样要素整合成一个系统。这些(子)系统虽然各自分离，但原则上相互平等，意味着新引入的建构——社会共同体 (societal community)。

1976年，他为马克斯·布莱克所编的《帕森斯社会理论》评论文集再版撰写了“跋”，里面概括说，从60年代初他撰写自己最初的“作者的观点”以来，自己的理论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而那时的新思考才刚起步。他还记得，当时“有一条重要发展脉络初露端倪”。他明确告诉读者，自那时以来，“理论的重大发展”已经发生。^[5]

<186>

过去十五年来，出现了许多学术论著阐述或重新阐发帕森斯的思想成就，但令人惊奇的是，很少有人关注到他有关社会共同体的学说，而这个概念正是他修正后的思路在经验层面上的内核。耐人寻味的是，罗伯特·霍尔顿和布赖恩·S. 特纳合著的《帕森斯论经济与社会》(1996)，作为重新评估而非批判重建的最初尝试，反倒是比日后的许多阐述更能欣赏到其中的妙处，虽说霍尔顿和特纳并没有完全领会其内外意涵。他们认识到帕森斯对于美国社会如何整合黑人有了新的说法，但却忽视了他的公民权理论的才华。两位作者正确地认识到，帕森斯既超越了以19世纪共同体 (Gemeinschaft) 理念为核心的乌托邦乐观主义，也超越了文化悲观主义，后者倡导的是20世纪的怀疑主义，针对据称是个体主义式的

^[5] Parsons, "Afterword", 收于 Max Black, ed.,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London/Amsterdam: Feffer & Simons, 1976), 第367页。

社会体 (Gesellschaft)。^[6]但他们却未能认识到,事实上,帕森斯将共同体和社会体这一对孪生概念整合成为一个奠基性的概念:社会共同体。而在霍尔顿与特纳之前,弗朗索瓦·布里科所著的《帕森斯的社会学》是一部更早的重构,最初刊行于帕森斯在世之时,1977年以法文初版。布里科认识到帕森斯在晚年的著述中开始运用控制论,也理解其有关互动媒介和政治体的分析的重要性,但却同样未能认识到社会共同体这一观念的发现所具有的重大意义。^[7]近些年来,有两位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逆转了趋势:一是亚历山大秉承其所谓新功能主义,重塑市民社会观念;一是理查德·明希有关当今全球化社会中的秩序问题的分析,后者此文收入我们最近纪念《社会行动的结构》成就的文集中。^[8]

我希望通过本章的叙述实现两点。其一,我希望讲清楚,帕森斯在60年代有关民主体制的理论中,包含了社会学分析的哪些重要概念工具,我特别要凸显两个现象,即互动媒介和社会共同体。我希望揭示出,他把这些看成是在两极对立的现象——一极是失范和去分化,另一极是整合与多元分化——之间变化。(就互动媒介而言,他肯定是看做两极结构之间的变异的;不过,正如下文所要讨论的,社会共同体究竟是在失范与整合这两极之间变化,抑或本身就属于整合这一极,在民主结构中能够实现,帕森斯却有些语焉不详。)在这一点上,我会尽可能结合考虑他和其他论家之间的关系。同时代人中颇有一些人,以帕森斯为批评的靶子,但自己的说法又不能令人满意,比如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或者不那么咄咄逼人的乔治·霍曼斯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形式》。还有一些是帕森斯觉得有说服力的,比如罗伯特·贝拉的公民宗教观、T. H. 马歇尔的公民权

[6] Robert J. Holton and Bryan S. Turner,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第232页。

[7] Francois Bourricaud, *The Sociology of Talcott Parsons*.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8] Jeffrey C. Alexander, "Citizen and Enemy as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On the Polarizing Discourse of Civil Society", 收于 Alexander, ed., *Real Civil Societies: Dilemma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8), 第96至114页; Richard Münch, "The Problem of Social Order, Sixty Years after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收于 Bernard Barber 与 Uta Gerhardt 合编的 *Agenda for Sociology: Classic Sources and Current Uses of Talcott Parsons's Work* (Baden-Baden: Nomos, 1999), 第211—232页。

三重属性论。

我的第二项主题是：我深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帕森斯的许多著述在写作的时候，社会中的诸多事件都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某个特定的问题或情境。我猜想，当帕森斯深入探索他那些主题，特别是他的历史分析性著述中的主题，脑子里或许常常萦绕着一些实践性问题，需要运用社会学的专业技能，结合其背景加以理解。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三个实例。当1954年春麦卡锡参议员在国会弹劾，麦卡锡主义开始退潮，帕森斯立即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美国战后历史的这一段不宽容和政治迫害（witch hunting）为何会发生。当此文于1962年重刊时，帕森斯坚持应当加上一点：比较麦卡锡主义与近来声势大涨的约翰·伯奇社[“John Birch Society”，1958年成立的美国国内极端保守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社团。——译者注]的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9]当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学校实施种族隔离为非法，在包括交通工具在内的公共场所禁止种族隔离，正如历史学家施莱尔辛格后来评论的那样，就冒出了此前从未列入讨论但亟待关注的第三个话题，那就是黑人投票权问题，在南方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10]恰在此时，帕森斯决定分析投票，写了“‘投票’与美国政治系统的均衡”。^[11]再举一例。当1964年实施第一个《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Bill）后，许多城市（绝大部分位于北方）都爆发暴力事件，他说服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美国文理学院需要投入大型的分析考察。随后启动了一系列会议，最终导致《代达鲁斯》出了两期开创性的特辑，在1966年单独成书，由约翰逊总统作序，题为《美国黑人》。^[12]

本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的是互动媒介，以及它们如何融入帕森斯最初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勾勒的分析方案。第二部分探讨的是他的社会共

[9] 帕森斯1962年1月11日致函丹尼尔·贝尔称：“我想我应当就麦卡锡主义和新近出现的一些运动之间的关系添写一点东西，我想其中还是有些重要的差异。”保存在帕森斯档案中的一份剪报[1963年3月31日的《星期日共和党人》（*Sunday Republican*），Springfield, Mass.]有如下判断：“从头脑疯狂的偏激分子，到思虑多多的保守分子，这些激进派的努力已经成了进步浪潮的绊脚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理解社会变迁。”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4, box 4。

[10] Arthur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第287页。

[11] 重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204—240页。亦参下文。

[12] 参看下文。

<188> 同体学说,以及这种有关社会的学说是如何促成了公民权概念,使之成为真正的现代民主体制的核心。这两个部分说明了他的宗旨:将控制论引入社会理论。第三部分是附论,讨论了他如何将60年代的两项政治议题,即公民权运动、大学学潮和越战,与自己的专业活动和个人活动相结合。

第二节 关于权力与政治体的新视角

一、理解美国的权力分配

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主张,美国社会是由顶级工商主管、军事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及他所谓的政治主管(directorate)组成的封闭圈子所支配。根据米尔斯的看法,这个权力精英集团与普罗大众相隔离,垄断了影响千百万人生活的有关决策,与大众社会形成对抗,而组成大众社会的公民们,却被剥夺了积极塑造自己命运的权力或影响。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米尔斯未谈及政府中的司法部门)的中层管理者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实质上依赖于真正有权势的人的运筹:“如果顶层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并且越来越沉湎一气,为所欲为;如果中间地带越来越成为半组织化的僵化构架,那么底层会是何种形貌?普通大众会处于怎样的境况?权力精英的兴起……有赖于美国的公众转型成为一个大众社会,并在某些方面属于这样的转型过程。”^[13]

米尔斯是要指出,美国的政治现实与有关公众的理念是相悖的,后者认为公众有认知能力,对所投票的议题有判断力。相反,掌握了总体权力的那些精英,据说对生活在核战争威胁时代的那些人予取予夺,毫无责任感。前景颇为黯淡:“地位不再主要根植于地方共同体,而是紧随全国规模上的大型等级序列。金钱财富会带来地位,哪怕其中有黑社会的沾染。权力会带来地位,哪怕这种权力毫无背景。……组成美国精英的并不是堪为代表的(男)人(men),其行为和性格构成了美国式的模仿和追求的样板。”[原书此处无后引号。——译者注]^[14]

[13]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第 297 页。

[14] 同上引,第 357、360 页。

此书甫一问世即获成功，没有被所得到的评论棒杀。在北卡罗来纳任教的罗伯特·阿格尔在《社会力》上发表了关于米尔斯此书的书评，认为“它……很重要，因为其关注的焦点是今日的政治改革家所急需的。”^[15]而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图兰大学的列奥纳德·雷斯曼承认，“米尔斯所作出的判断，从来也不是说些正确无误然而无关紧要的东西，但社会科学中的众多报告就是如此。”^[16]还有一位评论者，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彼得·罗西，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撰文抨击米尔斯对权力这一议题做了简单化处理：“米尔斯用来塑造其命题的基本事实倒是正确的，这一点没什么可以怀疑。不过，他围绕着这些基本事实编织了一张繁复的意涵网络，却没有给出什么证据。”^[17]

然而，帕森斯却不能让这本书就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他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书评，彻底批判米尔斯。^[18]他指责米尔斯忽视了两点。首先，米尔斯严重误读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结构和过程，因为他忽视了“一个渐趋成熟的工业社会的动力机制”^[19]，就美国而言，“多种多样的外生变迁，包括西欧列国的相对衰落，苏联兴起，非白人世界大部分‘殖民’组织瓦解”，已经重新界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另一点指责则是说米尔斯误读了权力本身的性质。

<189>

就美国社会而言，帕森斯针对当时的经验现象作出了三点分析判断。其一，权力不再是唯一的分层维度，更不要说作为米尔斯批判靶子的那种权力/地位不平衡分配。市场经济中的分化在19世纪是以工业生产系统代替基于亲属关系的家庭农场，假以时日，到了20世纪，在作为影响焦点的财产权与管理权之间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这个事实是不能被干净利落地解释掉的。在20世纪中叶，权力与声望成为社会分层中两个相互分离的维度。“最令人瞩目的是，正如著名的诺斯—哈特调查数据(North-Hatt data)所揭示的那样，专业人士相比于工

[15] Book review of *The Power Elite*, *Social Forces*, vol. 35, 1956/7, 第 288 页。

[16] Book review of *The Power Eli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1, 1956, 第 514 页。

[17] Book review of *The Power Eli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2, 1956/57, 第 232 页。

[18] Parsons,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 初刊于 *World Politics*, vol. 10, 1957, 第 123—143 页, 后数次重刊, 作为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第六章, 以及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第 185—203 页。

[19] 同上引, 第 190 页, 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这个说法凸显了二战之后美国角色的变化, 它现在成了全球超级大国。1954 年时帕森斯也曾用这一点来解释麦卡锡主义。

商业中的主管角色，位置相对较高。医生作为一个群体，并不享有很高的权力，但他们具有很高的声望却是不容置疑的，各项研究先后证明了这一点。”^[20]

其二，控制，包括军方对于政经决策的控制，也受制于美国体制内的相互制衡，而米尔斯似乎忽视了这个传统。帕森斯承认米尔斯的说法：在二战结束后的头十年，由于欧洲相比于苏联影响力下降，这一变化赋予美国世界领袖的角色，但美国自觉难以承担，“高级军官们往往填补了国家决策领域里的真空”^[21]。不过，基于这一点肯定不能确保作出诊断，说公众已经退化为大众社会，权力精英居于支配地位。

帕森斯指出的第三点是反问：米尔斯都忽略了什么？比如说，米尔斯误读了他所指的大众社会。亲属关系和家庭、宗教、团体活动和关系等结构要素其实都很重要，但米尔斯往往不当回事。不仅如此，米尔斯还完全忽视了科学、学术对于现代民主体制的积极作用，因而也就未能注意到，大学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员证明是能够抵抗权力的诱惑或压力的。最后，米尔斯忽视了律师的功能，特别是忽视了政府的司法部门，“对于法院系统角色的评价似乎非常偏颇。且不论更长期的回顾，就拿乌烟瘴气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后法院系统对于种族隔离问题和重新确认公民自由权利的积极行动来说，我认为就不符合米尔斯的观点。”^[22]

当然，理论上的症结在于米尔斯误解了权力的性质。对米尔斯而言，“权力这种工具 (facility) 并不是处在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之中，并代表这个社会执行功能，而是完全被解释成这样一种工具，作为当权者的一个群体，通过防止作为‘在野者’的另一个群体获取其所需，而获取自己所需。”^[23]

[20] 同上引，第 194 页；他所指的研究发现参见如下出版物：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Jobs and Occupations: A Popular Evaluation”, *Opinion News*, IX (September 1, 1947), 第 3—13 页；Paul K. Hart, “Stratification in the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5, 1950, 第 210—216 页；Otis Dudley Duncan, Paul K. Hatt, Cecil C. Nonth, Albert J. Reiss, Jr 及合作者, *Occupation and Social Statu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重印本,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21]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196 页。

[22] 同上引，第 199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23] 帕森斯批判的一个背景观念，不仅在于米尔斯的观点，除了马克思主义，也是针对拉斯威尔，见 Lasswell,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1)。那本书的出发点是：“政治学研究就是关于影响和有影响者。……所谓有影响者，即那些获得大多数想获得的东西的人。……得到最多的就是精英，剩下的就是大众。”（第 13 页）

如此一来，一种“零和”的权力观就大行其道了。^[24]帕森斯认为，这种权力观当时普遍见于政治学的各种思路。这种思维方式错误地假定，如果权力被授予某一个人或群体，就必然得从另一个人或群体那里撤回、夺走或予以否定。然而，帕森斯却提出：

权力是社会中一种一般化的工具或资源。它必然被分割或分配，但也必然被生产。它具有分配性功能，也有集合性功能。它是一种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以达成某种一般性“公众”认同已经作出或可能作出的目标。它首先是对于各人和群体的行动的动员，通过这些人和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来维系 (binding) 他 / 它们。^[25]

帕森斯基于这样的立场，驳斥米尔斯的“个体主义式的乌托邦主义”^[26]。米尔斯本人拒绝接受杰斐逊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认为这种立场已经不能充分应对现代社会；他也驳斥“资本主义”式的核准企业家享有自由权利，可以任其所欲经营，主要是生产导向的。米尔斯主张以“社会主义”政治对抗资本主义，主张国家控制经济；尽管如此，他又预设存在一种“大众意志” (popular will)，会预防权力误用。而在帕森斯看来，这三种都属于乌托邦主义，都是不可取的。^{<191>}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原因就在于“权力固然会有可能被误用，需要很多控制，但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却是不可或缺、值得想望的要素。”^[27]

米尔斯既不接受批评，也不赞同说权力是现代世界中的积极要素。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驳斥帕森斯的取向为“宏大理论”，既不接受帕森斯对于权力

[24] 1960年4月29日，帕森斯撰写了一份为达特茅斯学院准备的演讲稿，题为“社会系统中的权力”。他在其中指责零和权力观，认为它将权力视为寓于基元（或行动者），而不是社会集合体（“系统状态”）：“零和概念——本质上就是作为基元的权力对与系统状态有别的其他基元。”这种说法似乎是认为，政治学中的权力观（他认为预设了某种零和性质）复制了自己在30年代著述中提到的“功利主义两难” (utilitarian dilemma)。参看“Dartmouth. *Power in Social Systems*. April 29, '60”，第1页，帕森斯档案，HUG (FP) -15.4, box 19。

[25]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第200页。

[26] 同上引，第201页注。

[27] 同上引，第202页。

的替代看法,也不认为帕森斯的作品在《社会系统》后的确有所进展。^[28]米尔斯就像 50 年代后期的其他一些论家,比如达伦多夫,都没怎么注意到,事实上,帕森斯的理论已经超越了他早期的著述。

帕森斯不为所动,继续拓展并明晰自己关于政治结构的理解。《美国投票行为》这本书酝酿于 1957 年,最终于 1959 年出版,帕森斯撰写了其中一章,令人关注。^[29]此文重新解释了一项重大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该研究的主要调查者是伯纳德·R. 贝雷尔森,与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处(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拉扎斯菲尔德是处长)合作实施。^[30]该研究是经典的《人民的选择》的续篇,后者分析了 1940 年罗斯福与温德尔·威尔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民主党方面的罗斯福胜选后,曾委任其作为特使出访重庆。——译者注]的总统选举对决在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的表现。^[31]现在研究的是纽约上州小城埃尔迈拉(Elmira)在杜鲁门—杜威之选中的表现。帕森斯用贝雷尔森及其合作者收集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新的权力概念,以及由此推出的政治系统概念,在经验上是成立的。

那么证据是什么?理论又是什么?贝雷尔森等人先是确定了埃尔迈拉在人口分布和党派偏好方面的背景,然后探究了工会等组织的角色,社会经济地位和族群地位的影响,以及群体在确定投票规范时所扮演的角色,再有就是人际讨论的动力机制,选战对于投票倾向改变方式的影响。他们进而分析了当地政党分部的

[28] 参看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在“宏大理论”一章中,米尔斯嘲笑帕森斯“将《社会系统》的内容译成了英文。”(第 207 页)他还指责道:“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选择的思考层面太一般化,以至于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第 33 页)两人就此结隙,终生未解。1962 年在华盛顿召开第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帕森斯甚至劝说拉扎斯菲尔德,把米尔斯从美国组委会拟订的发言者名单中删去。参看拉扎斯菲尔德与帕森斯在 1961 年 5 月 22 日和 6 月 5 日的通信,帕森斯档案, HUG(FP) - 15.4, box 11。

[29] Parsons, “‘Voting’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收于 Eugene Burdick 与 Arthur Brodbeck 合编的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1959), 重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204—240 页。

[30] Bernard B. Berelson, Paul F. Lazarsfeld 与 William N. McPhee,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31]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与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结构和影响，竞选人的议题立场给选民留下的印象，以及大众传媒的角色。贝雷尔森等人从数据中得出 149 个假设，费了整整十个章节来说明，但最后的结论还是觉得难以说明整个研究：“社会学的假设要包含群体的特征；社会学的解释要从包括群体成员之间互动的角度来说明数据。”^[32]到头来，他们只好诉诸法国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然后才能确定有关效忠立场的陈述：“我们的研究所包含的数据，处理的无疑是个体组成的系统，就此而言，符合社会学的一种传统。”^[33]

贝雷尔森等人未能成功地确立其研究的理据，而帕森斯在进行再分析时则提供了这样的理据，从而让他们出色的数据和精细的报告更具意义。在这项工作中，他面对贝雷尔森等人积累起来的经验证据，应用了他在几年前提出的四功能分析图式，主要是与贝尔斯和斯梅尔塞这两位合作的结果。这样来调和数据与分析图式，选择贝雷尔森等人的研究发现所具体体现的投票行为作为有待解释的主题，避免单纯应用某一模型的演绎推理。其目的有二：一是概括投票在美国政治系统中的重要性，哪怕只是在不久前最高法院的裁决影响下；另一方面，他也要看看，自己的系统分析中提出的这些概念，可以支撑《社会系统》后发展出来的四功能图式，但是否能够作为说明经验事实的分析思路。

他先是简单考察了在居于主导地位的两党制中所谓选择的本质，然后重新解释了贝雷尔森等人的数据。他区分了四对两分问题，并联系到一个系统要维系自身就必须解决的四个功能。基于这种思路，他提出了四点发现。首先，如果考虑到群体的卷入（贝雷尔森等人揭示了这一点），那么一方面是一任单个投票者常常非理性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是最终效忠选出的总统的理性，两者之间表面上的矛盾就会消失。这就揭示了政治体与公众之间的予取关系，“属于维模子系统”^[34]。

其次，选战过程中政治效忠常常发生转换，这一点贝雷尔森等人已经谈得很多了。但帕森斯解释道，这恰恰标志着一个稳定系统中的弹性要素，既为该系统提供担保，又使它有能力的达到其目标，其结果便是合法政府。

[32] Berelson et al., 第 298 页。

[33] 同上引, 第 301 页。

[34] “Voting”, 第 238 页。

其三是“‘两极化’问题,或贝雷尔森等人所说的共识与分裂之间的平衡”。^[35] (当帕森斯笔锋一转,提到“某种导致极端主义和情感主义的‘克里斯玛’诉求”的“病理现象”,比如晚近的麦卡锡主义^[36])他提出:

<193> 在更为分化的结构层面上激活团结的纽带,跨越分裂的界限,这往往会让政治分裂的压力自动产生反作用力。个体的观点很可能是“我的团体同伴(舍友、教友、同事等等)虽然想投共和党(或民主党),但大体说来是个正派家伙。我就看不出,有他那种观点的人怎么能都像说的那么糟糕。”意识到这种情感会被激活,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选战中的极端主义。^[37]

显然,功能运作的这块领域确保了整合,一场选举之后,公民们还得超越党派对立,一起过日子,就更得这样了。

最后一个问题关注的是,“对于迅速演化的社会中结构变迁的适应过程”^[38],这个过程的中介机制解决了进步与保守之间的张力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保守派的共和党与偏向改革的民主党这两种形象才对选民产生影响。他又补充道,耐人寻味的是,像新政这样的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经历苦痛调整,却是由一位共和党总统加以采纳,甚至扩大改革范围。毫无疑问,这在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发挥了适应功能。

他概括道,这样就充分满足了结构与过程的四项要求。投票的结构同时促成了稳定与动态,促成了一个系统“相对稳定……能够整合形态各异的多元利益,并适应变迁环境”^[39]。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涉人与超然、稳定与弹性之间的均衡,但同样要实现共识与分裂、进步与保守之间的均衡。(他承认,第五对均衡,即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均衡,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以上我比较细致地评论了《美国投票行为》一书中有关我四大命题之间关系的数据,下面来综合一下”,他作出了如此总结并强调:

[35] 同上引,第 221 页。

[36] 同上引,第 225 页。

[37] 同上引,第 224 页。

[38] 同上引,第 235 页。

[39] 同上引,第 234 页。

就眼下这一点来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发现和结论如何与更一般化的概念图式相契合。作者们自己的说法是，他们的发现与解释的主要结构存在着重要的内在一致性，而这种契合更加深了对于这种说法的印象。基于上述讨论，再要说事实无非是零散事项的随意集合，彼此不存在任何本质关联，我认为是无法理解的。^[40]

至此他证明了两点。其一，一般行动理论已经超越了50年代早期社会关系系多人合著的《一般行动理论初探》的目标，融入了《行动理论试论集》的成就。^[41]他在与斯梅尔塞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系统分析的四功能图式适用于经济过程，而采纳当代数据的进一步应用现在已经推到了政治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因此变得更重要的一块领域）。^[42]有鉴于此，他在1960年4月的一封信中，<194>将自己对于贝雷尔森等人数据的解释提升为一种视角，“我认为这是迄今最完善的理论成果。”^[43]

另一点证明是事实方面的。他现在明白，四功能模型有助于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体中一个重要领域的功能运作。

二、权威与强力之比较

1960年6月，肯尼迪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洛杉矶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欢庆自己的胜利，并在洛杉矶大体育场向8万人发表了演讲：

世界正在改变。旧时代已经终结。旧方式将会失效。在国外，权力均势正在转换……世界已经比以前更濒临战争——但是现在，已经挺过了此前种种威胁而生存下来的人们，致命之手/凡人之手上（mortal hands）

[40] 同上引，第235页。

[41] 《行动理论试论集》的主要成就就是四功能图式，它将社会过程概括为简称作A、G、I、L的四个阶段的继替演进，而社会控制（包括社会化）就是L、I、G、A四阶段的逆序继替。这种图式现在可以应用于社会历史世界，揭示其经验上的动态机制。

[42] 当然，帕森斯在概括新思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一些杰出政治学家思想中的权力观与“零和”权力观截然不同，比如拉斯威尔，又如Robert A.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43] 帕森斯1960年4月6日致R. J. 阿普索恩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4, box 1。

已经掌握了大约可以把整个人类灭绝七次的力量……我所说的新边疆就是……一系列的挑战。……而在边疆那端，就是有待解决的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就是有待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陷阱，就是有待回答的贫困与剩余的困惑。……时代需要创造力、革新力、想象力、决策力。^[44]

大约六个半月后，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肯尼迪在总统宣誓就任典礼上发表就职演说，大声呼吁：“让我们从头开始——让双方的人们都记住，文明并不代表羸弱，而真诚也始终需要证明。我们永远不会因为害怕而作出妥协，但我们也永远不会害怕彼此协商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45]

肯尼迪的演说精彩表述的这种权力观同时强调了两个方面，其所传承下来的精神，被美国公众视为对于未来的呼吁。对此帕森斯在两篇文章中有所分析。一篇提交给了1955年弗里德利希召集的一次研讨会，最后在1958年公开发表。另一篇是为1961年8月一次主题为“内战”的会议准备，会议论文集1964年出版。前者探讨了权威，后者探讨了强力。

帕森斯在“权威、合法化与政治行动”的分析中指出，权威是超出了政治领域的一类关系。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它涉及达鹄 (goal attainment)，实现了一般寓于政治体的系统功能。^[46] 权威体现着社会价值，并进而构成合法行动的取向框架，这个特性很重要。对于行动者而言，价值必须“‘根植于’三个主要导向：首先是其对于世界的存在性信念，其次是其作为人格的动机需求，再次是与社会中其他人的关系。”^[47] 正是行动者将权威合法化，此时他的取向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种权威关系，让他觉得有义务如此行事。“合法化……是一套标准，个体据此将‘遵循’一种价值模式转化成实际贯彻行动，也就是说，被合法化的并不

[44] 转引自 Arthur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第 59—61 页。

[45] 转引自同上书，第 4 页。

[46] Parsons, "Authority, Legitima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收于 Joachim C. Friedrich, ed.,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重印于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0), 第 170—198 页。

[47] 同上引，第 174 页。

是价值本身，而是行动。”^[48]

而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化也对合法化作出了限制，只是关乎作为整体的社会这一系统。帕森斯声明：“从我的特定目的出发，我把权威界定为一种制度化范畴，而不是合法化范畴。”^[49]这样他就可以关注产权之类的制度，相比于权威，前者在结构上寓于经济体，后者寓于政治体。

为什么与经济体的类比很重要？经济体作为一种制度领域，意味着生产和消费，服务于作为集合体或共同体的社会系统的增长和福祉，而不只是造福于个体行动者。可以肯定，产权确保了经济系统，确立了安全的交换关系和权利关系。权威就此确保了群体或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效性，在理想状态下，有利于公民总体，而不只是精英或寡头集团。

这种权威观也包含着选择了一种民主的社会结构。他把权威定位在成员对于某种政治结构或某个职司的任职者的支持，明确提出：集体目标与公民的自愿承担相协调，并确立一种不仅限于描述性的权威观，本质上是为了相互关系的最大互惠。这样说来，权威概念就包含了一种特定的政治体观念，超越了化约主义的实在论，就像实证主义中那样。公民集合体基于自愿而赋予一位领袖的支持，完全适用于作为概念现象的权威：“由此观之，权威乃是特定类型与层次的集合体整合的制度化，因为这些类型与层次的整合是有效和合法化的集体行动的基本条件。它是‘领袖’期待得到集合体成员支持的权利的制度化。”^[50]

有鉴于此，权威的四大维度适用于每一个经验系统，即“（1）从社会的一般价值角度进行合法化；（2）其所适用的角色或集合体系统中的地位；（3）期待权威承载者面对的情境类型；（4）一方面由自己处置、另一方面则是由与其行动相关的其他人承担的约制。”^[51]

“有必要注意到，马克斯·韦伯著名的分类只处理了其中之一，也就是通过我称之为合法化的那些过程，承载社会的一般价值。”^[52]他认为这就有了充分理

[48] 同上引，第 176 页。

[49] 同上引，第 178 页。

[50] 同上引，第 186 页。

[51] 同上引，第 187 页。

[52] 同上引，第 188 页。

由，现在把权威概念融入其他三个变项。

此外，韦伯对于“法理型”权威的典型概括，让他找到了关键词去强调另一点。帕森斯强调指出，法律本身作为一项制度，又捍卫着权力通过权威得到规范性的使用，体现出各项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充分的功能发挥。当然，这预设了在盛行法治的地方就存在着分权。这样一来，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比较清楚了，即多元主义作为较高水平的功能分化，不断演进：“在功能分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从法律上界定权威的内容和界限成为绝对必要之事。”^[53]

“略议社会过程中强力的位置”一文讨论了权力的对应形式。^[54]他将强力界定为暴力，其基本模式为设想一个他我(alter)被一个自我(ego)迫使做某事，无可退避，只能遵从。有关的物质性强力表现为三种形式。首先，强力可以成为阻遏因素，以自我预先规定的强制(imperative)方式约束他我。其次，强力可以成为某种惩罚。再次，强力可以是自我的某种宣示，证明说话有分量，证明“有能力行事”。^[55]这三种形式都旨在制造恐惧或焦虑，作为某种动机，使他我无条件遵从自我的要求。情感的一面也很关键，也就是说，自我的强力(或威胁使用强力)会在他我身上产生恐惧或愤怒。帕森斯区分了内在强制(compulsion)与外在强制(coercion)，以进一步阐发有关的变项：

自我可以在行事的时候，让自己所执行的意向实际上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是并非所愿的，试图以此阻遏他我。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称为内在强制。但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担心某些人未来的行动，就逮捕他们，囚禁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不给他们任何选择机会。就此而言，内在强制的替代选择就是外在强制。我们用这个词，意思是“威胁”，如果他我贯彻了据说非(自我)所愿的意向，就要使用强力。如果他我还是不顾威胁实施其行为，那么针对他所使用的强力就变成某种惩罚，尽管自我最初的意向可能只是威

[53] 同上引，第 191 页。

[54]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Force in Social Process”，收于 Harry Eckstein, ed., *Internal War: Basic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第 33—70 页。

[55] 同上引，第 35 页。

慑，他可能会非常遗憾不得不实施威胁，真的诉诸强力。^[56]

从一般化的理论角度来讲，区别在于社会控制的组合方式。这个组合矩阵是一张包括四种类型的交互表，涉及两种维度，一看他我对于自我命令的规避余地的大小，一看约制是正向还是负向。相应的四种社会控制类型分别是引诱（inducement）、外在强制（coercion）、建议（suggestion）、诉诸道德正直（appeal to moral integrity）。“还可能改变供他我决策的时间，自我对于其处境的‘容忍度’，以及因此愿意倾听情况的程度，考虑到诸如此类的具体情形，这些类型都可能被‘简约化’，本质上就像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由于内在的强制，导致了外在强制的简约化。”^[57]这就揭示了强力是说服（persuasion）的反面。而对于各类社会控制的“强硬”形式，都可以存在某种最佳规避形式作为对比，前者互动中的交互性最小，后者互动中的交互性最大。

<197>

所有这四类社会控制都包含某种内在强制形式。第一，引诱可以强化为“馈赠……没留下任何拒绝的可能”；第二，外在强制可以强化为内在强制；第三，建议可以成为基于“好理由”而实际遵从，并被包装成某些特定的威胁，诸如“‘我们作为怎样怎样的人，就得这样这样做。’明确等于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真正的’怎样怎样的人”^[58]；第四，从被视为正确行动的共享标准的角度来诉诸道德正直，被扭曲成极权主义政权下的讹诈，威胁要把一个被允许出国的人的家人关起来，“除非他听上面的话”。

那么，当四类社会控制都既有温和的形式又有内在强制的形式时，约制和

^[56] 同上引，第36页。就内在强制而言，可能有一个相关的事例，1960年秋，马丁·路德·金牧师在密西西比被指控轻微暴力而遭逮捕，以防止他将争取黑人投票权的运动引入这个南方州。（最初金牧师被拒绝保释，只是在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亲自给被押者打了个电话，明确给予无条件支持后，情况才发生了逆转。）至于体现外在强制的典型事例，比如1962年10月，当密西西比大学牛津城校区接受它的第一位黑人学生梅雷迪斯时，还需要由国民警卫队护卫入校。队伍遭遇到一群暴力抗议者，而当地警力消极无为，不能或不愿营救梅雷迪斯。簇拥在这位学生周围的是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从部里派来的护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攻击。这一小队队伍与一大群暴民对峙，面临着生命的威胁，经过漫长而危险的一整夜，直至次日凌晨，国民警卫队最终入校。

^[57]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Force”，第39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58] 同上引，第40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强力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物质性强力对于推行任何剥夺都可能是一种重要手段。不过，这是剥夺本身的固有因素，尤其是对于自由权利的剥夺。尽管罚款和课税之类都是以强力做后盾，但靠接管资产来贯彻这类约制的过程通常都不是可以靠强力来执行的。不过，如果执行行为遭到挑战，就会出现如何应对拒绝遵从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始终会导致强力，因为他我可以通过一些物质性的手段，比如将该领域留给自我掌管，或将资产转移走，以此作出有效的抵抗。要预防诸如此类的规避，终极手段还是强力。因此，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概括说，强力就是当较为温和的措施无效时，一种有效的负向约制的“底线”概念，不过要记住，是为了威慑。^[59]

<198> 有鉴于此，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出，权力现象是流变不居的，强力只是其中一种极端的表现。可以肯定，这种变异性集中体现在政治权力的两面性上。根据帕森斯的说明，他所理解的作为强力的权力并不是一条单行道，一端是政府，另一端是据说类似于大众的公众（当然，体现为权威形式的权力肯定是一条双向道了）。

帕森斯指出，当人口中的一部分拒绝信任某个政府或领袖，将权威合法化的权力也是有可能被撤回的，但对其后果则不能一概而论：“通过不公开明言的消极放弃，作出不具偶变性的（non-contingent）总体撤回，当然也属于内在强制。而罢工显然属于通过偶变性的撤回来实施外在强制。另一方面，即使是通过撤回来进行威慑，也完全有可能激活至少是视情境而定的外在强制性反制措施，因为合作是出于义务，并且不仅仅是在‘道德’意义上，而如果未能遵从，也会招来负向约制。”^[60]

在文章的结尾，帕森斯又回到了“内战”的主题上，提到了“革命性情境的形成因素”^[61]。他勾勒了这样一种情境，一个政府遭到挑战，要充分并立即满足

[59] 同上引，第42页。

[60] 同上引，第47页。

[61] 同上引，第66页。

它所有“被视为合法的义务”^[62]，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处在任何这种对政府高度索求的氛围下，要求全部或大部分满足民众方方面面的需求，而政府又不能或不愿履行其诺言，民众又不能降低要求，就会产生重大张力（濒临内战）。两方面都会充斥着不满。一方面是身处困境的政府，一方面是理直气壮又缺乏耐心的各式群体，为各自正义的事业而奋斗，就可能发展出行动与反制 / 作用与反作用（action and counter-action）的“恶性循环”。

三、权力银行与联合国

经济体是一块典型的领域，集中体现了权力是如何与一个环境中给定的情境因素紧密关联的。货币作为媒介，促成了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它的功能多少属于广延性的，而从货币资源的角度来讲，也多少属于“流动性”的。这些资源可以通过银行交易，“贷给”市场经济中从事生产的企业之类。或者，货币手段也可以化简成限制性的“金本位”，这就严格限制了可用的货币量、可行的生产、可能的就业等等。帕森斯在探讨强力在社会过程中的位置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话题，并为自己声辩：“这种谈法并不仅仅是空口讨巧地扯到经济学里的老生常谈。之所以要这样讲，是为了揭示货币与权力之间的酷似之处。”^[63]

货币是象征商品的某种符号（无论就其消费而言，还是就其生产而言），或者平等地分配，或者不平等地分配，会带来富裕，也会造成贫困。与此类似，权力可能被授予许多人，然后他们再授信于[“entrust”，在有关权力银行的行文中，我们将把“trust”由“信任”转译为“信托”。——译者注]选出来的人，在有限期间内出任领导职位；权力也可能被某一个独裁者或排外性的寡头集团所攫取。

在为“内战”讨论会而撰写的文章中，有一个主题是“对于强力的垄断与‘权力银行’”。这个主题的焦点在于，在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体与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体之间分化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使得后者服务民众需求的能力要大大优于前者：“因此，它的货币价值的‘根本’基础就在于经济体的生产力。”^[64]那么，

<199>

[62] 同上引，第 69 页。

[63] 同上引，第 46 页。

[64] 同上引，第 59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资本主义有能力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制造富裕，而共产主义只能在一个不发达得多的经济体中负担低得多的生活水平？文章直指两类系统中的政府性质。在美国与苏联，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因为两类系统允许通过政治过程刺激经济增长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民主体制的政府能够确保，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体自由提供多得多的规避余地，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美国那种系统就是这样。相反，在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中，等级森严的政治控制对自由企业施加了严密约束，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和繁荣。

西方类型的政府把权力“贷给”其公民，让他们成为经济主体，政府则从公民那里接收“存款”，表现为被选上官职。帕森斯把这种状况描绘成“权力银行”的模式。“在发达的政治系统中，显著存在着政治上的银行类比，我们可以用引号，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权力银行’，意思是说，公民可以向领导地位投资，反之亦然。”在一个广泛普及公民权利的系统里，信托以银行发行信贷的方式，让每一个体的规避余地都大大扩张，也促成了一个高度分化的多元世界。

与此相反，在低度分化的、更具“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社会类型中，信托与规避就不那么明显了。他概括道：

权力具有分配性的一面，这几乎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将之与货币相比照，也清楚体现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希望将这种类比进一步扩展，使我们能够假设，在作为整体的系统的层面上，存在一套总量扩张和收缩的机制，作为强力的一项功能在运作，类似于货币的例子里信贷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些想法与强力所处位置的问题紧密相关，而我们已经勾勒的权力与强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之所以如此重要，部分原因也在于此。^[65]

帕森斯在一篇从未刊行的文章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权力银行：世界秩序问题札记”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963年下半年，是为《裁军与军控》杂志(*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撰写的，但在清样送抵帕森斯后，这份杂志显然是停刊了。此后，《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65] 同上引，第61页。

Comparative Sociology) 编辑兰德希尔曾想刊发此稿,但没有任何下文。^[66]

权力银行的类比现在转向了国际政治：“有关多元主义的国际共同体的观念，<200>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稳定的民主社会的内部结构，对于这里的分析至关重要。”^[67]针对这一观念，可以把现实世界的情境看做是不同程度地切近于这一观念：“国际权力系统是比较虚弱的，因为有那么多的权力‘锁定在’国家单元中，‘锁定在’它们彼此之间实际的或潜在的对抗关系中。这就意味着，物质性强力相对于权力的其他方面特征，比例始终过高。”^[68]

帕森斯使用银行交易的类比，来描述哪些权力问题可以通过类似于现代经济中货币市场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经济的例子里，增长首先是通过投资机制发挥作用的。所投入的资产可能来自投资单位的直接储蓄，也可能来自各类初始储户，然后投入生产用途。当然，在权力领域里这些过程都有重要的类似对应。……不过还有一种机制……，即通过银行运作，创造作为信贷的新货币。……而创造新货币的结果可能就是扩大生产规模。

后面这种机制其实很重要。银行将信贷延伸到越来越多的个体单位，它们各自都用信贷来生产物品，并就此进入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这样就导致了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张。至于权力，主张的是不仅权力关系越来越广泛延伸（“多元论”），而且在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中，经济体也被激活了。1962年11月，帕森斯在墨西哥埃莫西约大学（University of Hermosillo）[原文如此，应为设在墨西哥索诺拉州首府埃莫西约的索诺拉大学。——译者注]演讲，在讲稿中如此表述这一点：“在广泛的政治整合层面上找到‘解决之道’，就是大规模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69]

[66] 参看韦兰·扬1964年4月9日致帕森斯函，以及罗伯特·马克斯韦尔1964年4月23日致帕森斯函，均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41, box 4。兰德希尔与帕森斯是从二战期间一起筹划研究被纳粹德国占领各国而开始结识的。参看前文第二章。

[67] Parsons, Abstract: “The Power Bank: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World Government”; 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41, box 4 (打字稿)。

[68] “The Power Bank: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World Order”，清样稿第35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41, box 4；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69] 演讲稿，手写稿，题为“埃莫西约”，注明日期为“1962年11月13日”，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4, box 12。

帕森斯在讨论“权力银行交易”的文章中，讨论完“银行家的声誉”（以说明信托对于有关信用交易的重要性），就转向“应用问题”，他举出的两个突出实例就是各国政府与联合国：

在这个意义上，各国政府都是权力银行家，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论对内，政府“促进”了各权力单位的发展，而这些权力单位最终是被期待变得独立的。……论对外，典型的情况就是订立并信守各类条约，在国际组织中承担成员资格和义务。……国际组织的例子更近于理想类型。以联合国为例……可以采取的活动的范围颇为宽松，并不要求每一个成员国政府都有详细具体的承诺，但另一方面，大多数成员国政府……都可能让组织卷入风险。……联合国的权力借贷中，最令人瞩目的例子当然就是亚喀巴湾（Gulf of Aquiba）或刚果之类的事端，秘书长的创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70]

在稍早前的一篇文章中，他界定了新兴的世界秩序与联合国之间的关联何在，尽管当时东西方的两极对立显而易见。^[71]他动情地提出，“所谓自由世界和共产阵营之间”^[72]的两极化已成事实，双方被锁定在似乎无法释解的冲突之中，

[70] “The Power Bank”，清样稿第38—39页。刚果的例证指的是1960年秋，该国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似乎就快要被一个共产党政府接管大权，联合国军队于是介入，打的旗号是要在那里（重新）确立议会民主制度。较晚近的一个例子是在推翻实行恐怖统治的“红色高棉”后，联合国负责保护新成立的柬埔寨民主政府的安全。还有，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介入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地区事务。耐人寻味的是，帕森斯未能提及朝鲜战争，那也曾由联合国秘书长代表安理会提请大会讨论。

[71] Parsons, “Polar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刊于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 1961, 第115—134页；重刊时题为“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International Order”，收于 Quincy Wright, William E. Evan 与 Morton Deutsch 合编的 *Preventing World War III: Some Proposal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2), 第310—331页；亦参 Parsons, “Order and Commun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ystem”, 收于 James A.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第120—129页，重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292—310页。1959年9月，詹姆斯·罗西瑞第一次建议帕森斯写些东西，讨论战争威胁与和平前景的问题。1960年6月中旬，帕森斯告诉《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编者之一多伊奇，自己已经完成了准备投给罗西瑞主编文集的文章的第一稿。参看罗西瑞1959年9月17日致帕森斯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4, box 15；帕森斯1960年6月15日致多伊奇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4, box 6。

[72] “Polarization”，第115页；下三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有爆发“总体战争的危險”，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世界政治共同体已经形成：“我会认为，两极化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这种因素或秩序。”他提出，尽管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显然是巨大的，但“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就预设了存在一种共同的参照框架，由此意识形态差异才有意义。”

阵营的两边共同具备四点秩序要素，只是程度不同，各具特色：其一，铁幕两边都相当重视经济生产力；其二，东西方都赞赏个体的人身自主和政治自主价值；其三，两类系统都将平等视为一种正义原则；其四，为实现这些珍视的目标而重视教育。鉴于这四点要素同时存在于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73]，那么可以理解，东西方之间除了“不可避免的‘战争’——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经济‘战争’，似乎还有别的东西”。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辨识这种整合过程得以发生的机制”。

四大领域体现了两极化宏大系统之间的基本共性。首先是“一系列共有价值”^[74]，包括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当然，在对立的系统中，具体实践时所强调的具体信念和原则不尽相同，这些价值会与不同的强调重点相结合）。其次是共享行动取向中包含的规范，比如国际法，而联合国便是落实此类规范的组织：“其核心特征……便是程序层次上的共识的确立。”^[75]并且特别关注对于破坏共同约定者的约制的可执行范围：“联合国是一个不设法院的论坛，其中有一种义务……聆听对立方针针对所陈述的事例的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只要参与其间，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根据‘世界舆论’作出裁断的合法性。”^[76]

其三，无论是在一元单调的等级系统中，还是在多元复合的（子）系统中，利益都在维持着不同党派、团体等群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忠诚关系。第四个领域是意识形态，既可以像作为“情境界定”的外在强加，也可以不那么具有压迫性，更具多样性，确保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他觉得，关键在于东西两半球都同样受惠于“所有西方文化的伟大传统”^[77]，后者不仅包括“程序规范和多元分化的

[73] 同上引，第118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74] 同上引，第121页。

[75] 同上引，第125页；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76] 同上引，第126页。

[77] 同上引，第132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利益”，而且还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也就是社会科学的发展”。

我想，帕森斯之所以关注将联合国视为国际政治的“权力银行”，理据有二。一是理论性的。他那篇讨论两极化的文章在最终收入《政治与社会结构》文集时做了修改，他在其中指出，尽管存在极权主义对民主体制的二元对立，仍然可以以国际秩序的概念为核心关注。有鉴于此，他希望“辨识当代国际关系中表现出的规范秩序的要素，并且指明，如果要让它们在各个文化层面上得到增强，满足最低限度制度化的基本条件，都具有哪些潜力和局限。”^[78]他在探讨“权力银行”的文章中，将这种理论上的热诚表现为明确指出，在世界秩序不断趋向进步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避免纳粹式的回潮：

哪怕是比较充分的承担价值，视之为道德上可取，与这些价值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趋于制度化，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别。价值必须在规范的层面上得到明确表述……集体必须针对规范框架作出调适……因此，个体的相关承担必须在角色结构的层面上得到充分整合，这首先是为了尽量减少与新的规范秩序之间产生异化，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纳粹激发的德国国族主义在秩序方面表现出的那种异化。最后，尤其是要克服更为褊狭的旧有秩序中的既得利益。^[79]

<203>

在我看来，另一个理据超出了单纯的理论性，而在于帕森斯讨论时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1960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苏共总书记和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求西方同盟国放弃柏林，完全交由苏联控制，举座皆惊。^[80]1960年6月，帕森斯告诉多伊奇，自己完成了有关话题的论文初稿，算是完成罗西瑙以及多伊奇（是他在该年1月第一个写信给帕森斯邀稿）的稿约。^[81]1961年6月，

[78] Parsons, "Order and Commun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James A. Rosenau 编, 第 121 页; 参看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295 页。

[79] "The Power Bank", 清样稿第 34 页。

[80] 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世界危机的分析, 参看 John L. Snell, *Dilemma Over Germany* (New Orleans: Hauser, 1959); 以及 Hans Speier, *Divided Berlin: The Anatomy of Soviet Political Blackmail*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0)。

[81] 该年晚些时候, 他请求罗西瑙允许他这篇文章先刊登在 1961 年初发行的《伯克利社会学杂志》上, 这要早于它所入选的分别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出版的两部文集。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展开峰会，但危机未能终结，最终于该年8月导致建造柏林墙。大约一年多后，便是古巴导弹危机。（就在这段时间里，帕森斯两次修改并两次发表了他有关国际政治两极化的论文。）最后，两个超级大国（和联合国一起）在1963年夏天签署了第一次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在当年4月，帕森斯在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学会的年会期间，参加了一次为期一天的小型会议，主题是“行为科学家与人类生存”，根据会议组织者的声明，宗旨是关注核军备对于人类灭绝的威胁（帕森斯演讲的题目是“行为科学家在国际情境中的角色”）。^[82]

四、政治权力与影响之比较

1962年10月，帕森斯给弗里德利希写了一封信，评论其一份文稿，强调自己和弗里德利希的共同点在于都反对“近日这块领域中盛行的伪实在理论论述”，具体而言，“我特别乐见您将权威建基于某种理性秩序，因此这个概念必然具有坚实的文化基础。”但他又肯定地指出，自己看到在“您对于权力概念的探讨上”有重大差异：“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像您那样，在分析上将此概念扩展到包括整个影响领域。”^[83]

在讨论社会过程中强力的位置的文章中，帕森斯在“货币、权力与影响”的小标题下，讨论了这种差异，强调货币的类比超出了权力领域。

韦伯曾经倡导，国家不应当使用权力，更不用说自己所垄断的强力。帕森斯信守韦伯的立场，支持作出这种约束，指出国家“权威……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规范上限于货币资源（征税）和物质资源（明确属地）。”^[84]但这样的话，政府将会令人惊奇地缺乏效力，除非其领导的基础建立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什么

<204>

[82] 参看“The Role of the Behavioral Scientist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未发表文稿，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8.6, box 1。

[83] 帕森斯1962年10月23日致弗里德利希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4, box 7。

[84]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Force in Social Process”，第53页。后一种概括显然指的是韦伯在讨论经济学与社会学里价值中立问题（这是韦伯对于其文章题目的诠释）的备忘录最后的主张，谴责辛迪加主义，称赞社会学拒绝支持以科学为基础建立政治乌托邦。韦伯在文章最后一段赞同了国家对于物质性强力的垄断，但又说自己不言自明地期待，普鲁士德国会拒绝使用其赤裸裸的强力实施手段。亦参上文。

东西上。要知道，民主体制的关键特性就是支持系统，所以他提出通过说服来界定影响，该支持系统的交换媒介并不在于政治权力：

在这里，控制的类型属于说服。我们已经把“说服”界定为提供好的理由来说明，他我基于自身的利益，为什么应当遵照自我的期望来行事。附着于说服的、偶变性的正向约制就是接受 (acceptance)，是态度方面的约制，有别于情境方面的约制。因此，我们不妨说，影响就是一种一般化的能力，通过提供偶变性的接受来实现说服。……所以，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说服就是赋予他我共享成员资格的地位，把他当成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接受性的偶变性基础可以概括为遵从主导集合体运作的规范。……说服将涉及某种规范性的指涉，以确定所提供的理由在什么意义上是“好的”理由；这种指涉可以称为将他我对于这些理由的接受予以正当化。^[85]

他提出，“因此，可以把影响视为一种媒介，把社会控制的权力一面与社会中的规范结构相联结。”“群体不仅必须有渠道接触到权力，而且其位置必须得到‘正当化’……嵌入一个制度化的规范系统——比如说在法律层面上（但不限于此）。”^[86]

1962年，帕森斯参加全美舆论研究学会年会，进一步阐明了这些想法。实际上，“论影响概念”^[87]在会议上宣讲后大获成功，一些与会者要求选印，哪怕帕森斯早已经（将根据笔记发挥的发言）撰成一篇文章，发表在1963年春季号的《舆论季刊》上。^[88]

为了阐发这一主题，帕森斯开始借鉴语言学。1960年，他和哈佛语言学家

[85] “Some Reflections”，第54—55页。

[86] 同上引，第55—56页。

[87] 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7, 1963, 第37—62页；重印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405—429页。

[88] 在帕森斯的档案材料中，藏有一批明信片，见证了与会者寄赠稿件的要求。参看帕森斯档案，HUG (FP) -42.8.6, box 2。

罗曼·雅各布森考虑过合写一部书。^[89]雅各布森专长的领域是语音学，他已经证明：口头英语特征层面上的语言具有独特的、可辨识的系统要素。雅各布森发现，通过世界上的客体对象的沟通，激发具备交互意义的活动，将这些对象符号化，言者与听者都会由此介入解释活动，可以识别为对立与对比、讯息与符码、省略与明言等。从帕森斯希望理解的视角来看，比如从影响的视角来看，结果就是存在一种符码，可以用主体间可辨识的、系统化的形式，将讯息完好地模式化。

雅各布森解释道：“如果听者在自己所了解的一种语言中接收到一条讯息，就会将它联系到可用的符码，这一符码包括了有待处理的所有特征，它们与被称为音位 (phonemes) 的各组共位特征的所有可行组合，将音位联结成序列 (sequences) 的所有规则，简言之，所有主要用来区分形位 (morphemes) 和整词的独特载体。”^[90]有鉴于此，帕森斯认为语言（比如英语口语）结构典型地体现了一种图式，这种图式刻画了在一般层面上的互动关系中交换的性质。他采纳了雅各布森的发现，将影响类比于货币，同时两者都与语言有关：

根据雅各布森（帕森斯原文误将“Jakobson”拼作“Jacobson”）和阿莱的著名观点，对于一种语言的理解必须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的使用是释放和传递讯息的过程，是对特定情境有具体指涉的语言要素的组合；另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符码，特定的符号由此构成了某种特定的讯息，“具备了意义”。由此观之，只有针对那些“懂得语言”的人，也就是懂得其符码并接受其“惯例”，一条讯息才能获得意义从而得到理解。^[91]

[89] 参哈佛大学出版社托马斯·J. 威尔逊 1961 年 2 月 3 日致雅各布森与帕森斯函，帕森斯 1961 年 2 月 13 日致威尔逊函。威尔逊提到了与雅各布森之间的一次谈话，热情接受了两位要组织的研讨文集，“您二位要组织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相关学科从业者的一次研讨，这个计划会产生一部在语言社会学整个主题中第一部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帕森斯回复道：“您的建议听起来非常吸引人。不过，雅各布森已经去了西海岸，我们的计划还远远谈不上全面展开，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暂且先搁一搁，等他和我可以一起细致地考虑问题再说。”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4, box 20.

[90] Roman Jakobson and Morris Halle,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S-Gravenhage: Mouton & Co., 1956), 第 5 页。

[91] 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 见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406 页。

布里科在解释帕森斯的这一原则时概括道：“语言就在于通过符码来控制讯息的常规发送的各式控制机制。”^[92]

在采纳了雅各布森将语言视为沟通媒介的观念后，帕森斯将货币和影响都类比为语言，认为两者都是“一般化沟通媒介”：“就我而言，我不仅要谈货币类似于语言，而且要说它就是一种非常专门化的语言，也就是通过使用在一套符码中被赋予意义的符号而进行的一般化沟通媒介。因此，我也要把影响作为一种一般化媒介来处理，从而将其解释成意味着一种专门化语言。”^[93]

由此观之，影响作为一种沟通媒介，在接收方那里导致了行动进程。影响作为一种权威来源，就此不同于韦伯经典的概念：行动者在合法化的支配一服从框架内得到他人遵从的机会。现在影响变成一种“说服的符号媒介”^[94]。“影响在他我一方产生了某种决定，即以特定的方式行事，因为他我觉得这对于他是件‘好事’，一方面是因为独立于他所处情境中偶变性的抑或强加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出于正面的理由，而不是因为他会以不遵从违背义务。”^[95]

影响会引发声望。这是因为，影响来源使某人具有声望，这种声望本身就使他成了一个表现为权威来源的人，他的一举一动、所言所思，在他人眼里都成了一种资源。既然作为符号媒介的影响意指说服，那么关键就在于，他作为“影响”的“发出方”，在“接收方”眼里，这种地位自动使他具备了说服能力：“（在信息领域中）必然具备某种基础，他我据此认为自我是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相信’他，哪怕他并没有能力独立地证实信息，或根本不打算如此费事。”^[96]声望作为源于影响的属性，标志着平等/不平等中的非经济、非政治维度，是社会内

[92] François Bourricaud, *The Sociology of Talcott Pars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第 174 页。布里科在解释帕森斯对于雅各布森另一本书的引证时说道，符码确保了“一种固定的转换，通常是逐词转换，一系列的信息基元被转换成音位序列，反之亦然。”（第 175 页）引自 Roman Jakobso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第 91 页。

[93] “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 第 407 页。

[94] 同上引，第 415 页。

[95] 同上引，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96] 同上引，第 416 页。

在固有的一种民主力量。^[97]

帕森斯在“权力银行”一文中探讨“整合媒介”^[98]时指出，可以建构出一套媒介的等级秩序：从标志控制论层级上最低一级控制的货币，到权力，直至“说服能力”^[99]：

在社会层面的等级序列上，比政治权力高一级的媒介就是我所称的影响。……这个意义上的影响……在内在固有的说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比如说，说服的对象不具备技术上的能力理解理由，就会作为媒介发挥作用。因此，必然要涉及“名声”，即存在某种信心，认为如果基于某人作为一位有能力的医生之类的名声而接受其“建议”，其接续行动将带来值得想望的后果，即增进健康。

<207>

在作为整体系统的社会的层面上，影响在舆论的领域确立了自身的制度秩序，这种制度对于民主社会相当重要。^[100]

原则上，舆论的平等主义化性质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对任何人施加影响。由此观之，帕森斯问道：“影响在社会系统中的总量是不是固定的？”对这个问题

[97] 本迪克斯与李普塞特合编的《阶级、地位与权力：比较视角下的社会分层》，第一次全面地综述了20世纪40年代以降，哪些研究和理论揭示了经济维度上的差异（“阶级”）和政治维度上的差异（“权力”）只是社会不平等的现实的一部分，必须补充以第三个维度。参看 Reinhard Bendix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第二版, 1966)。他们编的这部文集的题目就意味着，他们想要通过所选文章，具体证明阶级代表着作为媒介的货币，指向社会的经济维度；权力代表着政治结构，两者需要补充以第三种媒介，后者逐渐成为更多被使用的维度，在经验研究中频频测量社会地位，也就是社会结构中看似非经济、非政治的维度，即声望。沃纳在对一个名叫扬基城 [“Yankeetown”，实为新港 (Newport)] 的“典型”美国城镇的社会结构进行系列考察时，最先使用声望作为社会地位指标，此即世人所称扬基城系列研究，第一卷初版于1941年。

[98] “The Power Bank”，清样稿第35页。

[99] 同上引，第36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00] 早前一篇讨论舆论的文章阐述了二战期间的美国民主体制，见 Carl J. Friedrich, *The New Belief in the Common Ma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2)。《舆论季刊》创办于1937年，是美国舆论研究学会的会刊。刊物的创立，其实也包括学会本身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因为1936年盖洛普民调的影响。此次民调力排众议，正确预测出罗斯福将再次胜选，就此使人们广泛意识到，舆论是一种现实。

的解答引出了对于“零和”模型的又一种驳斥。他提出，影响的非“零和”性质类似于货币如何成为一种通过银行交易刺激信贷的媒介。任一时点上的货币流通总量（包括来自“非流动性”信贷的资产与负债等）的增加，都标志着金融市场的功能运转良好。与此类似，随着一个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权利总量增加，政治体中的权力总量也会增加。“在影响的领域里，忠诚的配置与银行交易和信贷的类比似乎极为明显。……我认为，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点，首要的方式就是借助大量的自愿团体，……所以，不妨把这类团体视为某种‘影响银行’。”^[101]

由此观之，影响被赋予了声望，声望又寓于社会地位，也就是声望的制度化形式。如果影响中包含源于声望的权威，就会被赋予信任，比如对于一位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员。就整个社会而言，当作为符号媒介的影响十分丰富，舆论就会主导政治过程。可以区分出四类影响：“（1）‘政治’影响；（2）‘信用’（fiduciary）影响；（3）通过诉诸区分性的忠诚而获得的影响；（4）以对于规范的解释为取向的影响。”^[102]

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影响既然与货币和政治权力相类似，是否也是一种变项？一端是范围最小化的形式，即说服能力紧缩的收缩型，而在连续统的另一端，则是对于资格能力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相互接受，影响是否会在这两端之间来回摇摆？是否会出现一种情境，其中的影响可能趋于衰落乃至消失，破坏了专业人员、高级官员乃至军方之类所享有的高地位？

帕森斯直到最终完成文稿的发表定稿，才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在初稿后又加了一个附论，探讨的正是这一点。附论插入了清样稿^[103]，在谈到强令获得忠诚的影响这一主题时，提起了麦卡锡主义。^[104]他提出，回顾美国社会的

[101] “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第 428 页。

[102] 同上引，第 419 页。

[103] 论文草稿所附插入文稿，黄色法律文书尺寸纸，打字稿，藏于帕森斯档案，HUG (FP) -42.8.6, box 1。

[104] 顺便提一句，帕森斯在为贝尔所编《激进右派》文集撰写的论麦卡锡主义一文的附记中提请读者注意，事实上，麦卡锡主义只是外在强制性不宽容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当然他也认为，约翰·伯奇社由于持右翼极端主义立场，并不像麦卡锡主义那样危险。[原文如此，其实两者均系右翼极端主义，疑系作者笔误。——译者注]

历史，麦卡锡主义就像是作为一段“紧缩时期而进入了影响领域，其登峰造极之时几近恐慌。要求‘绝对忠诚’，类似于在金融领域要求回到金本位。”^[105]

五、论权力概念

1962年，帕森斯参加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秋季大会^[106]，提交论文“论政治权力的概念”^[107]。帕森斯自认这是他说明新的政治体观念的巅峰之作。^[108]他收官论定，从三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权力。其一，是对政治理论的重新阐述，从17世纪的霍布斯到20世纪60年代的达尔，人们所阐述的权力概念都不是作为人际交换中的关系属性，而是担任官职的人颁行多少带有外在强制性的秩序的某种成就。其二，权力乃寓于平等者之间的共识，而传统观念则诉诸冲突或等级序列，只是对某种更为广泛的现象的局部理解。其三，权力是包罗万象的集体努力的网络，旨在提高效率，借用货币的类比，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信贷领域，刺激了生产，也取代了零和模型。

在政治权力的整合性一端，密切相关的议题是自愿参与，只有在连续统的另一端，才是外在强制。两端合而观之，考虑到社会理论用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它所分析的现象（而不仅仅是“伪实在论的理论阐述”，这是他在写给弗里德利希的一封信中的措辞^[109]），就得出了如下界定。权力就是“当约束性义务被依照其对于集体目标的意义而合法化，确保一个集体组织的系统中各单元执行这些义务的一般化能力；当出现不服从时，假定会实施负面的情境约制，不管实际实施的动因(agency)为何。”^[110]

[105] “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第429页。这种引申到紧缩趋势的视角，显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多有借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帕森斯开始坚信，凯恩斯的经济学比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更好地反映了现代情境。亦参前文第一章及第三章。

[106] 原本只是二十分钟的发言，但帕森斯在正式发表时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必要的篇幅自由扩写。

[107] 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7, 1963, 第232—262页；重印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352—404页。

[108] 在《政治与社会结构》文集中，帕森斯讨论权力一文注明“1963年6月”撰成，而讨论影响一文注明“1963年春”撰成，但他将前者置于后者之前。

[109] 见本章前文注83。

[110]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见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361页。

这样，令人惊异的是，权力就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它意味着，即使每个人都有权力，也不会从这种平等分配中必然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事实上权力是一种“符号”媒介，只是在交互关系的网络中构成了一种从他人那里“确保获得遵从的能力”^[111]，这些交互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某个共同体（如群体、党派或国族）。

至于合法化，他也使用了货币类比：“所谓合法化，就是……在权力系统中对应于货币系统中的信任的那个因素，后者信任的是货币单位的相互可接受性和稳定性。”

关于“权力与机会平等”，帕森斯感谢了耶鲁政治学家多伊奇的相关建议^[112]，又一次运用货币类比，认为强力就是“金本位”的“原教旨主义”形式，一旦危机来临，权力就有演变为强力的危险：

上面我谈的是将货币的价值“建基于”铸币金属的商品价值上，并且提出，一方面是权力的“价值”，也就是权力的效力，另一方面是作为外在强制手段、有些情况下作为内在强制手段的物质性强力的固有效力，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强力……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作为“终极”阻遏手段。……由此观之，乐于强加负面制约，无非就是逐渐展现出认为承担具有约束力，而作出这些制约的行动者是“当真的”，是准备好坚持的。^[113]

当他结合强力来谈政治危机的情境时，帕森斯提到了“紧缩恶性循环”（deflationary spiral）。如果一个政府没有能力应对整体政治情境所施加的压力，就会出现这种状况。有意思的是，他谈这种危机的举例又是麦卡锡主义，把它看做是对于严峻的世界情势的反应：

^[111] 同上引，第362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12] 多伊奇在1963年出版《政府的控制力》，（在序言里）感谢了帕森斯的帮助，认为他代表了多伊奇所称的创新观念。在他看来，这种观念拉斯威尔、戴维·伊斯顿等人也曾提出（当然，帕森斯对此不能苟同）。多伊奇专辟一节讨论了帕森斯如何处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交换，赞扬这样来阐述当代政治领域富于动感。

^[113]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第365—366页。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了相反的替代选择：“另一方面，在互动系统的有些领域里，存在一定范围里的替代方案，可从中任意选择。”

面临不同寻常的压力，即使是高度负责的领袖也会被迫置身艰难的情境，“紧缩”的恶性循环启动，其模式类似于金融恐慌。比如说，我把麦卡锡主义解释成政治领域中的这种紧缩的恶性循环。而范围延伸最广的承担焦点就在国际领域，美国非常迅速地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分担了最大的一份责任，维持世界政治秩序，对抗不断扩张中的共产主义运动。……麦卡锡主义对于情境的界定是……几乎任何承担相当责任的人……都应当明确放弃可能与对国家的忠诚有一定竞争的其他所有忠诚。……它往往会使权力系统“紧缩”，因为它破坏了信托的根本基础，而许多具有正式和非正式领导责任、并进而维持着“权力信贷”的人士，他们的影响必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许最耸人听闻的例子就是指控共产党向军方渗透，从而导致广泛的“不忠”。^[114]

<210>

帕森斯把焦点放在影响与权力的关系上，前者作为“更具整合性”的媒介，在麦卡锡主义的风波中受到挑战，后者则是他所讨论的话题。帕森斯诉诸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层级：“麦卡锡风波的焦点可以说是在影响系统，在于社会的整合功能与维模功能之间的关系。……不过，鉴于在控制的层级中，影响系统高于权力系统，前者的紧缩也必然会波及后者。”^[115]

“论权力概念”[原文如此，应为“论政治权力概念”。——译者注]被帕森斯视为收官定论，收入自己此后出版的好几部文集，并允许选入本迪克斯和李普塞特的《阶级、地位与权力》读本第二版及其他一些教材。他在自己后来的著述中提到此文，也称之为突破之作。^[116]

[114] 同上引，第 392—393 页。

[115] 同上引，第 393 页。

[116] 有关权力的新概念，此后还有不少相关文章，比如“The Political Aspect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cess”，最初刊于 David Easton, ed., *Varieties in Political Theori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6)；“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on Modern Societies”，收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二章)。在此书第 486 页，“政治体与社会”一文中，一则说明其非“零和”权力观的脚注里，帕森斯认为自己在 60 年代的权力观与《社会系统》中阐释的观念相对立：“作者本人认为，这体现出明确的意见转变。”

第三节 理解价值承担

1968年的春天，在欧洲，法国的学生开始上演他们反对大学当局和戴高乐政府的反叛，要求法国总统下台，这场大戏虽然昙花一现，但却蔚为壮观。而在捷克的改革中，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也启动了同样短命但却广受民众支持的议会社会主义，史称“布拉格之春”。就在这种情势下，帕森斯开始研究价值承担。^[117]

一、第四种沟通媒介

帕森斯早前就曾主张，权力和影响分别关联着达鹄（通过追求集体效力）和整合（通过体现其实是整个共同体福祉的服务）两个系统功能。而他现在觉得，第四种“符号媒介”也同样类似于货币，亟待关注。他首先指出，“在本文中，我仍将采取长期以来的承担(!) [该惊叹号为原文所有，以凸显“commitment”一词的多重含义，包括“委托”、“立场”、“义务”、“承担”乃至“担当”等义。现代化的世俗化进程就是从宗教意味的“担当”到契约关系的“义务”的“下行”过程（但并非单纯的价值剥离过程）。——译者注]，以‘完善’有关图式，用以分析四个一般化符号性交换媒介，在社会层面的(societal)系统中运作，有别于一般行动系统，有别于其他三个基本的行动子系统。在价值承担之外，另外三个社会层面媒介是货币、政治权力和影响。”^[118]

帕森斯事先澄清了两点，以免误读。其一，他摆脱了社会学中所谓的“‘芝加哥’思路”，拒绝认为价值承担是源于外在于行动者的规范控制的力量，而所

[117] 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38, 1968, 第 135—160 页, 重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439—472 页。

[118] 同上引, 第 439 页。而在行动系统中, 其他三个基本的子系统分别是文化、人格与有机体。

谓的标签论思路在分析价值承担时，看的是社会如何作用于个人。^[119] 他所不屑的另一种思路是政治学中所谓的“‘芝加哥’传统”，即拉斯威尔和伊斯顿。他批评以上两位的思路：“这个概念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它认同行动者和对象（或情境）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对这种区分做了具体化的理解。”^[120] 换言之，在他看来，这些思路就像他在给弗里德利希写的信里所称的那样，属于“伪实在论的理论阐述”^[121]。他反对这些思路，提出“我的想法，一方面主要借鉴韦伯，另一方面主要借鉴美国人类学，尤其是克拉克洪。”^[122]

当然，韦伯已经区分了价值理性与手段一目的理性。但帕森斯在讨论价值承担时，对于韦伯的引述层面宽泛，核心在于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两类伦理的区分。不过，对于克拉克洪的引用还是具体的，帕森斯提及克拉克洪时一直回到了1950—1951年间，从《一般行动理论初探》中引了一段话，克拉克洪在那里提出了一种特别的文化观（后来克拉克洪自己放弃了）。帕森斯借用克拉克洪的话指出，价值乃是“关于什么是值得想望的东西的观念”^[123]（当然他也提醒道，

[119] 同上引，第440页。他引述并反驳了布鲁默对于符号互动论的阐释，捍卫自己的立场。布鲁默在一篇最初写于1937年的文章中指出，符号互动论乃源于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在1918—1920年的研究，参看Herbert Blumer, “An Appraisal of Thomas and Znaniecki’s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onograph, 1939)。格哈特以疾病为关注话题，将帕森斯的说明与符号互动论（标签论）的说明放在一起考虑，以揭示后者通过社会层面的期待（标签、污名）从外部控制行为的说法。参看Gerhardt, “Stress and Stigma Explanations of Illness”, 收于Gerhardt and Michael E. J. Wadsworth, eds., *Stress and Stigma. Explanation and Evid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Crime and Illness* (London: Macmillan, 1985), 第161—204页；以及 *Ideas About Illnes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尤其是第1—177页。

[120]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s”, 第440页。

[121] 参看本章前文注83。

[122]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 第440页。他指的是克拉克洪对于《一般行动理论初探》(1951)的贡献。克拉克洪1960年去世，他在1950年冬参与了联合小组的深入讨论，组员们来自四个学科，基于这些讨论，将各自的体会汇合形成摘要，摸索出统合而成熟的“一般行动理论”。

[123]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 第441页；本段接下来所有引语皆摘自同一页。

这不一定完全符合大多数人在实际经验中所想望的^[124]。意思就像克拉克洪具体阐述的那样，这些价值是“文化层面上的‘模式’”，对于行动者，是“有关值得想望的**社会类型**的观念，为所指涉的社会的成员持有，并应用于他们所属的特定社会。”

他明确指出：“价值模式……界定了选择的导向，以及随后对于行动的承担。”^[125]

在价值承担中，制度化与内化之间的关联至关重要。一个社会关于具备正向价值的东西的观念，关于以合乎道德的行动观念、行动意象、行动条件或行动模式出现的规范范畴的观念，熔铸到制度之中，必须牢固地整合为个体想当然接受的行动取向。实际上，个体的人格和有关道德正直的观念也必须依此发挥功能。只有建立这样的关联，才能从动机到行动都维系着承担。这样一来，帕森斯的研究对象就很清楚了：“在这里，我们基于价值模式观念的主导观念，就是关于**承担**的观念。无论一个行动基元可能具有其他什么价值承担，我们关注的就是该基元如何基于其作为一个或多个社会系统的成员的能力，承担要贯彻价值模式。”^[126]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标志着社会中值得想望的东西。研究的宗旨是要概括，价值承担作为社会层面上的交换的“符号媒介”，与已经分析的另外三种媒介相类似，都具有双重面目。

[124] 1964年，帕森斯在具体澄清自己与霍曼斯的立场差异时，拒斥了霍曼斯的功利主义，因为帕森斯认为价值取向并不像霍曼斯所说的那样，以个体之**所想望**为核心。相反，唯一能够接受的观点是：以自我在社会中道德上值得想望的形象为核心。价值承担的标准并不是功利主义的。他批评道，“霍曼斯的价值概念显然仅限于值得想望的东西”，丝毫没有考虑到符号性的东西，强调的只是主导人的境况的物质过程。（他顺便提到了詹姆斯·奥尔兹的研究来说明，即便是实验室里的老鼠，也已经通过实验证明，行事时也依照符号性的报酬，而不单单是物质性的报酬。）他写道：“我也相信霍曼斯所言，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既主导着一般意义上的有机体的行为，也主导着‘作为人的人’的行为，但是你根据那样的程式所理解的生物，不仅是作为有机体意义上的人，而且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根据文化的符号编码和规范组织起来。我认为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因为生命系统的组织也体现在文化的层面”。参看 Parsons, “Levels of Organization and the Mediat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34, 1964, 引自第 215—217 页。

[125]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s”, 第 441 页。

[126] 同上引，第 442 页。

二、整合、克里斯玛、通胀通缩

就符号媒介而言，需要澄清两极之间的动力机制。一极是所有公民都高度承担集中体现民主整合社会的价值：“一般而言，在理念型中，对于一种高度一般化的价值模式的承担，是由该价值模式在其中得以制度化的那个社会系统中所有单元共享的。”^[127] <213>

价值承担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自我和他我，也就是交换关系中任两个行动者，在道德共同体中互相尊重，相互界定。“当我们说自我激活了他我的承担，意思就是说，自我通过符号沟通，帮助他我‘界定情境’，以便他我行使其道德自由。”^[128]同时，每一位行动者都被赋予“自由，作出自己关于合法性的决定”^[129]。

这当然就引入了帮助实现现代性的多元主义：“在一个以多元主义为标志的社会系统里，从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到各级集体组织，各种忠诚都必然会在多元的诉求中相互制衡。这就是说，一个成员单元要承担对于某个团体之类的义务，并不会‘耗费’其全部的承担储备，而会保留一些储备，供有可能发生承担的其他渠道之需，包括其他的团体连带（associational solidarities）。”^[130]

与此同时：

即使整体的价值模式是稳定的，在社会各个部分的许多层面上，结构变迁也始终在发生；而在局部价值（subvalues）方面，急切要求（exigencies）也始终在变，所以有必要重新评估不同的应对类型的合法性。……但正是因为这种有所分化、具体限定的复杂性，再加上始终面临变迁，大部分不可能事先预测，使得作为一般化符号媒介的承担成为社会的功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131]

“有关承担的银行交易”（commitment banking）的比喻有助于说明，担负“道德责任以服务于集体利益”^[132]的个体，会把他的义务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127] 同上引，第 451 页。

[128] 同上引，第 456 页。

[129] 同上引，第 455 页。

[130] 同上引，第 458 页。

[131] 同上引，第 455 页。

[132] 同上引，第 459 页。

社会关系的精神性一面，蕴含着对于值得想望的社会的取向意象，就经济而言，即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意味着一种道德维度，能够维持不断增强的忠诚网络。在这种不断扩张的社会交换网络中，对于团体的忠诚往往会相互交叠，但并不一定就彼此冲突，帕森斯用一个身边的实例来说明：“哈佛大学分别属于不同层次的地方社区的‘成员’，从坎布里奇、波士顿大都会区、马萨诸塞州、美国，一直到某种意义上的‘世界社会’。同时它还‘卷入’或者说‘涉及’难以计数的其他团体，比如各级政府，有关学术兴趣的组织的复杂世界，学校教员出版作品的读者群等等。”^[133]

与此同时，“如前所述，事实上，是急切要求主导了承担在贯彻价值方面具备怎样的效力，但又不能假定这些急切要求保持稳定，所以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公司的需要始终会根据市场状况的变化作出调整，无独有偶，贯彻价值的单元也必须随时准备调整它的各种承担之间的配置，以应对贯彻过程中的急切要求的变化。”

“社会共同体，即整合系统”^[134]，为共同体中保障安全提供了机会：“在这里，承担具体指向‘被赋予价值的团体’这一背景。就组合的逻辑而言，这里涉及是否接受价值要得到有效贯彻所需的特定条件，即在规范角度上首要的社会条件（有别于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个体单元不再‘各行其是’，而是接受团体地位，这使他期待与相关共同体或集合体的成员同伴之间产生连带。”

而在连续统的另一极，有两个问题比较重要。一是承担的“强度”（‘intensity’ of commitment），一是“道德领袖性质”（moral leadership）。

前者意味着“处在紧要地位的人作为人格系统，多少会比较强烈地投入承担，贯彻已经在各自地位中制度化的那些价值模式”^[135]。而另一个问题则在于，个体会从道德优势或劣势的角度相互界定，倾向于诉诸“道德领袖性质”，这常常属于某种克里斯玛型领袖。追随克里斯玛型领袖的人会视之为价值的典型化身，用完全是韦伯风格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如果“未尽到义务”，即缺乏忠诚，拒

[133] 同上引，第 462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34] 同上引，第 461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35] 同上引，第 454 页。

绝追随，将可能导致外在强制式的惩罚。帕森斯在提及韦伯时重点谈到，事实上，价值承担中的克里斯玛式强力可能会方便一个克里斯玛型领袖攫取权力：“早期加尔文宗里的那些命定的‘圣者’，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共产党，都属于具有道德领袖性质的精英，都认为政治权力在整体上属于一种用来贯彻其道德承担的工具。……但韦伯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强调了道德领袖性质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张力。”^[136]

“有关承担的‘银行交易’”，在“信贷”与“金本位”两极之间各有变异，要么在价值承担中包含着一套大型“信贷”关系网络，要么将交易化约为不容变易的效忠关系或结盟关系。后面这种情况比如“金本位”法则[原文此处为“low”，疑为“law”之误。——译者注]，就像一位克里斯玛型领袖的“道德领袖性质”。帕森斯提醒读者注意，尽管后者绝大多数会许诺一种全“新”的道德秩序，但“如果不能成功”，^[137]就可能破坏系统中任何类型的信任/信托(trust)；公民将大规模“撤回/提款”(withdrawal)，不再乐意将他们的承担/承付款项(commitment)存入国家权威可能设立的任何“银行”：

在社会学思想中，有关“承担银行家”(commitment banker)角色的最一般化的阐述，或许就是韦伯的克里斯玛型领袖概念。克里斯玛型领袖将遵从其“要求”强加为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自我利益的增进。……在解释韦伯的克里斯玛“突破”观念时，有一个问题更麻烦，在于突破的“总体性”程度。……即使这些突破像意识形态分子常常说的那样彻底激进，也很难看出它们的运动如何避免沦为几乎是直接地“仰赖”“有关承担的银行交易”系统，那样的话，通过克里斯玛式过程进行所谓承担创造(commitment-creation)就是不可能的。……我想答案就在于价值创新的制度化观念。克里斯玛式的承担扩张只是代表了制度化过程的第一步，因此不会是通胀型的。^[138]

<215>

[136] 同上引，第452页。

[137] 同上引，第469页。

[138] 同上引，第467—469页。

帕森斯讨论了价值承担的两种病态过程，它们都会导致脱离多元主义类型的社会秩序，分别是“承担的通胀与紧缩”。通胀与紧缩的意象借鉴了凯恩斯的货币体制理论。“所谓通胀，就是至少在贯彻价值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所谓**过度承担**（*over-commitment*）。当某一个单元作出的承担太多、太杂、太‘重大’，乃至有效贯彻的能力必然会遭到合理的质疑，就会发生通胀趋势。……而紧缩趋势指的则是不愿意‘尊重’各单元自愿付出的承担。”^[139]在“紧缩趋势”的情况下，“一些外在的动因（*agency*），比如‘法律’”，不是允许个体自由选择各自的承担，而是往往会代替个体自己的正误判断，强加给他们有约束力的承担。他补充道，这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增加外在强制，减少自愿的规范遵从：“这种趋势的重大运动……后果为人熟知：购买‘安全’，而牺牲掉自主责任的更大自由可能带来的获益。”

第四节 一般化符号媒介与关于社会的理论

帕森斯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社会系统”词条中，综合参照与符号媒介的关系来谈社会行动的四个维度，并从“具有特别的规范性”的沟通的角度，把这些维度关联到语言：

“货币”系统就是一种符码。……政治权力当然是另一种符码。……第三种一般化符号媒介就是影响……，就是通过说服，与某一交往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达成“共识”（帕森斯原文此处误将“*consensus*”拼作“*consensusus*”）的能力。……第四种媒介是在社会系统本身的层面上对于贯彻文化价值的一般化承担。这是最难以概括的一种，也是了解最少的一种。^[140]

[139] 同上引，第463页；下三则引语皆摘自同一页。

[140] “*Social Systems*”，收于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二十卷（New York: Free Press, 1968），重刊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本段引自第198—199页。

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媒介矩阵，各自有变化，总体上又有变化。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帕森斯档案里保存了一份手书札记，清晰勾勒了四种一般化符号媒介的可变结构。综合来看，札记在头一行归纳了民主（整合）社会里的四项制度化要素，对比来看，在最后一行列出了濒临社会类型变迁和 / 或彻底缺乏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媒介的实现状况。而在两者中间，即中下一行，列出了四种具有病态特征的议题。^[141]

<216>

财产	权威	地位	模式
货币	权力	影响	承担
恐慌 (panic)	骚动 (riot)	偏离	宗派主义 (Sectarianism)?
疯狂 (craze)	革命	规范重组	克里斯玛运动

在上表中，财产、权威、地位乃至模式（虽说背景有所不同）都代表着制度化。而在另一端，则列出了极端不安定的形式，是对制度化秩序的否定（它们都会造成社会结构类型的明显变化）。四种病态形式体现的是趋向于失范的社会过程。这张图表（显然从未用于或打算用于公开发表的著述）将一般化媒介综合成一个四重矩阵，（尝试性地）描绘整合形式与失范形式之间的变异。

实际上，这种变异既能说明图表中各行的安排，也能说明各列的安排。在纵轴上，四个一般化符号媒介在整合一端与失范一端之间变异。而在横轴上，图表的四列，尤其是最左列与最右列，用理念型的方式，从一般化媒介的实现的角度，来表示社会结构的几种类型。这就超越了《社会系统》第五章里用来描述英美主体制和纳粹或苏联极权主义之对立案例的四功能图式和模式变项组合。

该图表还能匹配两类社会动力机制，可以浓缩为“银行交易”和“恶性循环”这两个类比。（两者都意味着从一类结构通向另一类结构的方式，要么是分化之类，可以从底行类型的形式或结构上移到顶行类型的形式或结构，要么是解组，或者说顺序相反。）

接下来，每一种媒介都涉及“银行交易”的类比，说明了社会形式如何在“信贷”的一极和“金本位”的一极之间摇摆。而“恶性循环”的类比也可以用来阐明，

[141] 单独成页的图表，无标题，无注明日期，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45.4, box 5。

整个社会如何能够从一种多少实现了的社会整合的结构,转变为所谓“极权主义”(冲突层次的上升实质上意味着失范)。

综上所述,一般化媒介成为帕森斯整个社会观的核心。显然,媒介提供了富于成果的概念框架,以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这种分析的核心之一便是社会分层。

一、关于分层的媒介定理

把互动媒介用在关于社会的理论里,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用途之一就在于分层。如此一来,媒介理论也就成为一种创新性的视角,重新来解释现代“后工业”社会中不平等与平等之间的困境。^[142]

帕森斯在他长达 60 页的文章“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与不平等”里,阐述了媒介概念如何有助于理解,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中的四个互动媒介领域里,不平等是怎样与平等密切关联的。他首先指出,传统上,有四个与先赋相关联的不平等焦点领域(即族群、宗教、地域和社会阶级)。但在 60 年代末,在当时的美国,只有社会阶级仍然是明显的不平等来源。^[143]不过,利昂·梅休在 1968 年指出^[144],新的先赋来源已经兴起,以不平等的方式利用了机会平等,比如家庭背景

^[142] 帕森斯在 1949 年和 1960 年先后探讨了分层问题。从 60 年代末开始,帕森斯在提出一般化符号媒介理论之后,扭转了讨论方向,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基于“早期”帕森斯传统来研究分层的是 Bernard Barb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7)。而秉持“后期”帕森斯观念来分析世相的是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重刊于 1999)。不过,帕森斯虽然在 60 年代即已认识到新颖的社会变迁,但并没有使用“后工业”社会的提法。1965 年,他在为阿默斯特学院准备的题为“美国的学术职业”的讲演稿中,更加强调了这种社会变迁的重要性:“学术职业作为某种……(此词字迹难辨)职业复合丛的‘核心’,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新的显要地位。……作为关键职业,作为或许可谓一个崭新社会的先锋”。参看讲演稿,“Amherst. Academic Profession in the U.S. March 1, 1965”,帕森斯档案, HUG (FP) -15.4, box 3。

^[143] Parsons,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Modern Society, or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visited”,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40, 1970, 第 13—72 页,重刊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本处引自第 330 页。

^[144] Leon Mayhew, “Ascription in Modern Societies”,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38, 1968, 第 105—120 页。梅休在 60 年代早期曾经担任帕森斯的助研。

有助于培养获致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现代美国在普遍主义这一项上取得的成就。帕森斯就此得出结论：“平等与不平等，先赋与获致，应当视为两组独立变量。”^[145]

如此产生的新视角就落实到四种一般化媒介。比如说，由于职业机会上的平等并没有彻底根除贫困，虽说它确实产生了获得收入的渠道，但还有些迄今未受到充分重视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即相对剥夺代替了绝对匮乏：“就像雷恩沃特（Rainwater, 1969）特别阐明的那样，之所以面临整体生产力的不断增长，这个问题始终不能消除，根本答案就在于**相对剥夺**。”^[146]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结合权力来考虑不平等，这就意味着，尽管获得权威位置的机会是平等的，但一方面是产业部门或政府部门中的为官者被赋予相当多的权力，相形之下，作为个体的工人或选民权力少得可怜，其间的“差距”十分显著。耐人寻味的是，帕森斯立即又补充指出，这种失衡关系到的是职司，而不是人本身；它之所以存在，前提条件是机会平等在整个社会获得了制度化。

<218>

另一个可能找到类似结构的领域就是文化。在文化领域，对于文化商品的大众消费已经成为蔚为壮观的大众娱乐商业化的基础，普遍弥漫着平等主义。不过，这种不受质疑的平等主义也会产生怨恨情绪，诱发反智主义（这显然也威胁到了现代大学）：“事实上，现代‘反智主义’的来源之一，似乎就是感到低人一等，也就是感到被那些享有更好渠道获得文化资源的上等人‘欺负’，甚至是‘剥削’，当然，不是在严格经济意义上说的。”^[147]因此，在这个领域，尽管不平等被叠加于（机会）平等之上，但这种二元性尚未被充分制度化。

总之，关键在于，先要预设在所有四个一般化符号领域中都存在机会平等的制度化：货币（就业方面的平等机会）、政治权力（通过投票等）、影响（通过公民权等）、价值承担（通过文化追求）。只有这样，不平等才会发展。

（叠加在平等之上的）不平等使结构得以发挥功能，但这个机制在影响领域

[145] “Equality and Inequality”，第 333 页。

[146] 同上引，第 337 页。这里指的是 Rainwater, “The Problem of Lower-Class Culture and Poverty War Strategy”，选入 Patrick Daniel Moynihan, ed.,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147] “Equality and Inequality”，第 345 页。

的应用方式并不同于其他三个领域。公民权构成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基本平等，无论对于司法，还是对于立法，都是如此。这方面不能分出三六九等，陷入被叠加于上的不平等，以免民主体制遭到威胁。不过，话又说回来，司法或医疗中特有的那种信用权威，如果仅此即可保障专业资格能力，就此满足了公民对于公正或健康的需要，那么这种权威也就意味着不平等。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文化汇聚在大学这样的机构中，在科学研究探索方面，相对于公民大众而言是不平等的，却是对于维护西方文明传统遗产的保障。

“从规范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共同体的维模‘基础’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148]这就要求确立某种正当化理据，以便将不平等制度化：“证明的要求转向了为不平等提供正当化辩护。”由此观之，为不平等提供的正当化理据，并不会被所有已经将平等价值内化了的公民同等接受；大体上，有些理据会更加让人信服一些。不过，关于影响的那些理据是最不保险的。

帕森斯预设了符号媒介的等级序列，然后提出，在民主体制中，最低层级的一般化控制媒介是货币。相形之下，政治权力这一媒介层级较高，进而是影响（比较模糊的是，价值承担属于这一层级序列，但并没有被明确界定为控制论意义上最高层级的媒介）。在控制论秩序上，“就分层而言，影响所具有的一个首要功能就在于，为功能上必需的不平等形式提供正当化。”换言之，基于获致成就的结构中的资格能力与卓越表现说明了影响的剩余，并为这种剩余提供了正当性辩护。实际上，这种正当化能够将现代社会中诸如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资格能力差距”予以合法化，作为医疗实践具有效力的前提条件：“显然，尽管资格能力的因素和信用责任一起构成了关键的不平等因素，但也特别强调摆脱了先赋性特殊主义考虑的能力，从而增进了整体上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强调。”^[149]

二、一般理论

有关社会的一般理论中的一般化媒介观念并没有产生《社会行动的结构》或《社会系统》那样的论著。帕森斯的一般理论主要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148] 同上引，第 346 页；下三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49] 同上引，第 343 页。

到1970年间发展出来的，但却并不曾以类似于其社会学理论早先几个阶段那样的方式，呈现在他公开出版的作品中。在1969年撰成的“构建社会系统理论”一文中，他并没有把逝去的60年代视为自己思想进一步推进的一段时光，而是在“交换媒介与社会过程”的小标题下提到，自己已经否定了“零和”式概念框架的逻辑，但并没有明确强调互动媒介是自己理论中新发展出来的主题：

这里提到的货币动力机制，显然不符合所谓货币是一种“零和”现象的观念。信贷的扩张与收缩当然是货币通胀与紧缩的核心特征，但政治理论家们却大多认为，应当从零和的角度来探讨权力。因此，要在这个关键方面让货币与权力可堪比较，就必须考察这种论点的依据，揭示它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150]

帕森斯在这份思想自传中，并没有谈及互动媒介，而是提到了功能性制度（经济体、政治体等）的四媒介结构，以及社会的四系统观念，因为社会与其环境处在持续的交换之中（社会系统与文化、人格和有机体相邻，并与它们保持输入—输出的交换）。

不过，有一些手书札记，以及一份没多少人知道的文稿，却能证明，互动媒介是20世纪60年代（乃至70年代）的一般理论的焦点，不仅仅接续了《社会系统》，而且上承《社会行动的结构》。

手书札记共三页，题目是“一般理论的地位与问题”^[151]。这些札记建立了两方面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是有关一般化互动媒介的观念，另一方面是所谓功利主义在方法论上不能令人满意的认知旨趣，后面这一观念早在30年代就已渗透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

札记开篇就把矛头指向霍曼斯，“一定程度上也针对布劳”^[152]，指责两人让功利主义卷土重来，“问题并没有解决”。 <220>

[150]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收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第47页。

[151] “Status + Problems of General Theory”，手文稿，第1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4, box 19。

[152] 所指的大概是 Peter Blau, *Power and Exchange* (New York: Wiley, 1964)。

问题并没有解决——自己研究的见证地位——现在还有霍曼斯，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布劳。

扩散到相邻学科 + 科学哲学。

一般理论都（……词句不可辨）在哪些层次上？塔·帕对乔·C. 霍。
（……词句不可辨）包含某些东西，缺乏逻辑（……以下两个词不可辨）
但应用上更为广泛，更为“具体”

.....

比较维度（含进化维度）的范畴化

以及对于诸过程的技术分析——

包括一般化媒介。

要注意属于“基本”的认识。^[153]

帕森斯回到他针对个体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批评，“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霍曼斯，也针对布劳，在他俩近来的著述中，都引出了仿效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社会行为“基本形式”。有鉴于此，他不得不表明自己要做的就是对抗这类理论，“包括一般化媒介方面”。有意思的是，就像他在 30 年代所做的那样，当讨论到采取哪一种进化时，他又回到了生物学。他概括重述了三种生物学理论模型，认为“必须把社会学放在更宽广的理论背景中——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社会层面上的‘文化’理论——做起来更加困难。”然后他指明了什么是“某些一般社会过程”^[154]，它们产生了社会学的认知旨趣：“1) 团结；2) 规范遵从。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偏离 + 社会控制’。均衡过程。”针对“将社会系统与其他行动系统关联起来的”团结和规范遵从，他勾勒了三块问题领域，即宗教，人格，以及“有机体、物质世界、技术”。他由此回到了方法论上至关紧要的一个问题：社会学不可能是实证主义的，而需要一种参照框架，以求概念上的充足性。为此他勾画了一套进化理论并明确提出，它标志着社会本身的现代化的实质。他以社会系统与其三个“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作为出发点，指出：^[155]

[153] “Status + Problems”，第 1 页；下四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54] 同上引，第 2 页；下三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55] 同上引，第 2—3 页。

针对每一个：参照的框架——系统的结构——主要的过程(理论)——
然后是问题的解决+事实。

我们有一些真正新鲜的资源——

焦点放在社会的整合子系统上。

任何具备充分的一般性的社会变迁理论的进化维度。

与生物学理论之间保持延续

<221>

自然选择考虑到了失败、整合不良等等

还有维持生存的“生态龛”(niches)。

但终归有一条“主线”。

过程的技术问题+变异的来源+选择。

制度化的范式——

这些札记中提到的三点非常关键。其一，他假定在现代社会的进步中，出现了“一些真正新鲜的资源”，使社会比过去确实更为民主，促成了整合，并就此在整体发展趋势上摆脱了失范。其二，他把焦点放在理论的进化维度上，它必须符合社会世界中的进化维度，仿效生物学理论中的进化维度，克服一切阻碍，尽可能推动社会上和知识上的进步(“但终归有一条‘主线’”)。其三，他明确提出，基于理论进化(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已经证明)和社会进化的背景，能够解决关于社会的技术问题。

高潮还在结论。他提出，一般理论与一般方法论是一回事。这意味着绝不重回实证主义，为了确保这一点，他要求承认“贡献”(大概指历史事件或结构特征)的变异，尊重历史：^[156]

一般理论+一般方法论。

[156] 同上引，第3页。在最后一行，他没有将“形式化”一词写两遍，而是用了个只在德语中习惯使用的记号。他用记号“.,”来取代原本要重复写的那个词。在德语的用法里，这个记号可以在被复制的那个词下面，帕森斯正是这样做的!(我不得不说，这是真正韦伯式的风格。)

贡献的变异是各自独立的(帕森斯原文此处为“independent of of contribution”,“of”为衍文),但注定会趋于相符。

“历史”作为矩阵

量化

比较维度的形式化

时间维度[的形式化]

在另一页上,他提到了相关文献的一些作者,即科塞、拉扎斯菲尔德和泽尔蒂奇,又加了个“亚当斯等”,并具体说明为什么后者显然很重要:“真实的+基本的——H.与E.[此处作者也未说明帕森斯大概指代的是什么,不知是否指代‘历史的’(Historical)与‘进化的’(Evolutionary)。——译者注]”,以及“整合之后社会不一样了”。

同样是在60年代中期,帕森斯还撰有一份文稿,证明了这些札记重拾其自《社会行动的结构》以来的知识旨趣。但这份文稿一直未以英文公开刊行。^[157]它的题目根据的是一封邀稿信给帕森斯的建议:“关于社会的理论”^[158]。

<222>

邀稿要求是让帕森斯将自己有关社会的学说与他人作比较,但帕森斯表示抱歉,只处理了自己的作品。他讨论的是“我个人多年来一直致力的概念图式”。这种图式乃是基于

西方思想在这些问题上的会通传统,具体体现为19、20世纪之交那一代的某些思潮。至少英国功利主义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有助于这一会通,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堪为例证。还有帕累托,在经济学学说与社会学之间打造了相当重要的桥梁。当然,最重要的人物还是涂尔干和韦伯。^[159]

[157] 该文稿系应法国大学驻美联合代表兼文化顾问爱德华·莫罗特—西尔之邀,请他为《哲学研究》(*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特辑撰写文章,截稿期为1964年3月15日。文稿从未以英文发表,却被译为法文出版,见“La théorie de la société”,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perspectives sur la philosophie nord-américaine*, vol. 3, 1964, 第537—549页。特辑的名目引自莫罗特—西尔1963年10月21日和12月31日致帕森斯的两封信函,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15.4, box 19。法文期刊具体名称据 *Ac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一书的参考文献。

[158] “The Theory of Society”, 帕森斯档案, HUG (FP) -15.4, box 19。

[159] 同上引,第1页。

然后，帕森斯回顾了功利主义的一些谬误，即无法解决伦理上设定的个体自由与公共福利之间的矛盾。接下来，他探讨了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是如何往往被视为截然对立，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在达尔文之后的生物学思想。^[160] 他抨击道，马克思主义无法超越“对于社会现象的决定机制中，‘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之间关系的两难困境”^[161]，分离了所谓物质“基础”和据说依赖性的文化“上层建筑”。这就从新的角度提出了问题，而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用它们的“虚设两难”来讨论的。面对过去二十年世界发展和知识进步不断“提速”的局面，必须给出说明，而新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在于有关人类行动系统的符号媒介的“信息论和控制论”。

对于人类社会特定现象的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沿循我已经指出的路线。无论如何，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科学中广泛得多的发展已经大大增强并加速了这种路线，而社会学思潮也与此配合得十分密切。这就是一种一般性的概念，认为自然——既包括那些自发演进的特性，也包括那些人为构想的特性——的特点就是一种控制等级序列的系统。在某种场合下，最一般化的阐述在于信息论和控制论。……而这些非常一般化的发展与关于社会的理论之间的关联，则在于文化要素介入人类行动系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化系统是围绕符号层面上的意义模式组织起来的。并且可以说，语言是此类系统的原型例证。当然，也有一种趋向，将这些文化系统与社会和个体“基础”相脱离。而新的视角恰恰在于，更好地理解它们远非相互脱离，而是复杂的相互交织，相互依赖。^[162]

由此他继续指出：“无论进化程度不及于人的（subhuman）社会组织会是什么情况，人类社会显然是深深渗透着文化成分。它不单单是相互参照而展开行 <223>

^[160] 在20世纪60年代的讨论中，据说是玛格丽特·米德在引领。二战之后，她的南太平洋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科学的角度强调与遗传相对的环境（文化）。至于差不多被遗忘的纳粹说法，在30年代德国所谓的优生学（称作“种族卫生学”）里，谈起环境来，无非是遗传的另一面，因此别无其他选择。参看前文第一章。

^[161] 同上引，第3页。

^[162] 同上引，第4页。

为的 (interbehaving) ‘动物’ 有机体的聚合, 直接类似于社会性昆虫, 更是首先表现为文化信念和承担的系统 (例如 ‘宗教’), 表现为价值与规范, 表现为通过语言形成的复杂沟通机制。”^[163]

他在说明这一点的时候, 诉诸控制论, 将互动媒介植入了另一套控制等级序列。实际上, 这里涉及三套等级序列, 他分别给出了简要说明。其一, 认为 “人类行动系统中的文化要素”^[164] 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控制力, 高于 “经济、政治或杂糅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利益”^[165]; 另一套针对的是不受利益主导的领域, 比如宗教, 法律 (法律系统), 被置于行为的经济结构之上, 或至少不能完全归入行为的经济结构 (如他所言, 这又回到了韦伯); 三是社会的四重结构要素, 从最高层级到最低层级, 依次为价值、规范、集体体和角色: “这套结构要素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既要强调控制论等级序列, 又要突出社会系统在分析上是如何有别于文化、人格或心理系统。”^[166] 价值就是四项要素中最具涵括力的。为了刻画这些要素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发挥功能, 从而体现 “美国价值”, 帕森斯把它们说成是 “关于值得想望的系统类型的观念……为其成员所持有”^[167]。 “从经验角度上讲, 这个意义上的价值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在最高层级的有关社会的 ‘典范性’ [此处原文为 ‘canonical’, 指称文本时即为 ‘范典性’。——译者注] 陈述中能够最直接地观察到。比如对于当代美国而言, 《独立宣言》、宪法序言、《人权法案》等等, 还有一些杰出的公共人物作出的永志铭记的陈述, 像林肯, 伍德罗·威尔逊, 当然, 还有肯尼迪 [帕森斯此文撰成之时, 肯尼迪刚刚于 1963 年遇刺身亡。——译者注]。”

“关于社会的理论” 概述了帕森斯的学说, 这时的学说已经开始融合了一般化媒介和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观念, 两者都被用来理解现代民主体制, 因此这篇文稿十分关键。它证明了帕森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依然关注 30 年代同样问题, 当时的顺序先是马歇尔的理论发现, 接下来是帕累托, 再到涂尔干和韦伯详细阐发的解决之道。到了现在, 在帕森斯看来, 媒介与控制论成了问题的解

[163] 同上引, 第 5 页。

[164] 同上引, 第 4 页。

[165] 同上引, 第 6 页。

[166] 同上引, 第 8 页。

[167] 同上引, 第 9 页; 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决之道，而在30年代的时候，他是用韦伯的行动结构理论来探讨这个问题，再加上涂尔干的仪式观念予以充分修正。

与此类似，在他题为“一般理论的地位与问题”的手书札记中，批评的正是像个体主义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那样不能令人满意的理论状况，而他新近重新阐述的思路则是对症下药。

三、论去分化

<224>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社会行动的结构》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的双翼意象，在整合与失范这两类社会结构之间来回摇摆。尽管社会进化的“主线”是趋向整合，但失范却预示着，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在分析一般化媒介、探讨价值承担的系列文章中，只是最后一篇才详细阐释了媒介，进一步说明了双翼概念是怎样激发了帕森斯在60年代的研究。

帕森斯基于文章的前面部分，再启克里斯玛话题，重新将其界定为公民对于一个企业家式的克里斯玛型人物的“贷款”，从“道德领袖性质”中看到了“承担能力”。他解释道，克里斯玛型权威促成了“重点放在与历史背景相关的去分化过程”^[168]。克里斯玛型领袖不仅将政治权力，而且将影响乃至承担都汇聚到一个行动者身上，使得社会交换中的制度化丧失了合法性，从而确立了原教旨主义性质的外在强制型控制：

而以其他“规范角度上的”义务领域为核心的责任则是可以忽略的，如果出现张力足够大，还可能遭到明确的否定，乃至被具体宣布不合法。因此，西方共有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念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遭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驳斥，在斯大林阶段尤其如此。言论自由的价值观，达成集体决策的程序秩序，以及“公民自由权利”的其他许多方面，都得不到重视……，产生了原教旨主义的意涵：谁要是共享价值观念，却坚持保留更为宽泛的权利配置模式，他就是创新运动的“敌人”。

帕森斯发现，从一个更具民主性的政权到一个更具强制性的政权，这种去

[168]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s”，第470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分化的逆转之势意味着韦伯所谓的从更为先进的责任伦理退回到基本属于信念伦理。^[169]

可以说,在1968年,面对当时在革命动荡与守成僵化的两难危境之间左右为难的社会,他给出了一套选择。他勾勒了这些选择方案,其中头两种相对而言不成问题,即(1)出现多少有些“奇异”的宗派运动,对整体社会没有什么影响;(2)“温和的革命”运动,比如在现代物理学的早期历史上,当全新的知识暂时挑战强制性的不宽容,尤其是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教会,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到后来,当科学在社会中成为自主的制度,这些“温和的革命”事件都有助于进一步的成功分化。

<225> 第三种可能性是:(3)重大的分裂让某个世界甚至全世界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宗教或意识形态为轴线,分成若干个看似不可调和的政权集团。有关这一点,帕森斯指出,在冷战时代,“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制造了东西方轴线上的分裂,大致上,一方是更充分地‘工业化’的社会,另一方是欧洲中部以东地带,‘需要’更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他又补充道:“现在,更具‘革命性’的替代选择或许使‘复归’重新整合变得极其困难。”^[170]

在帕森斯看来,只有社会变迁的第四种形式,即所谓现代化,似乎称得上是充分的。那就是(4)克服以下两难困境的改革,一方面是确保进步的创新,另一方面是克里斯玛运动造成的倒退。要解决传统与进步之间的调和问题,只能诉诸多元主义。

他最后以个人的告白作结,提出社会学家要以介入的立场致力于解释这个世界,而这正是1968年,困扰重重的多事之秋^[171]:“我们必须追问究竟哪一点最

^[169] 当然,韦伯在说明现代社会中这两类个体伦理取向的时候,一方面是通过辛迪加主义,即一种激进的世界观,仰慕乃至乐于诉诸国家暴力(就像1922年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而在韦伯的有生之年,其昔日的学生兼朋友罗伯特·米歇尔斯也对此大加倡导),另一方面的观点则温和得多,不认为国家是暴力的依据,尽管在现代,国家被赋予对于强力手段的垄断(就像帝制德国的情形,而到了魏玛共和时期,甚至变本加厉,不过也是在韦伯发表其文章之后才开始这种趋势的。)

^[170]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s”,第471页。

^[171] 有论者努力将混乱不堪与乐天自信两股潮流融合在1968这一年之中,参看 Charles Kaiser, *1968 in America: Music, Politics, Chaos, Counter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a Genera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重要：(1) 原教旨主义式地回归更为原初的层次；(2) 分裂主义的革命后果，这往往会使冲突最大化；还是(3) 价值系统中新的一般化层次的制度化？社会学负有重大责任，协助摸清现状，搞清楚要使这些可能性取得平衡，关键在哪里。”^[172]

第五节 有关整合与民主的新视角

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塞就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中批评帕森斯，指其无力分析冲突。他还发表书评讨论帕森斯的《社会学论文集》[原书正文误作《社会学论文集》，注解无误。——译者注]，指其无力分析社会变迁。但这两次科塞都错了。^[173]帕森斯在60年代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证明，科塞及和他持同样批评意见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打错了靶子。

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

科塞显然没有注意到，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有别于社会过程 (social process)，这一区别正是帕森斯在60年代早期的一篇正式论文和一篇交流文稿的关注核心。按照他的界定，社会过程指的是某种社会层面的结构伴随着社会的历时演进而进行的功能运转，既无分化也无去分化。(比如他在1960年出版的书，就是探讨50年代的美国社会，不曾发生任何重大的结构重组，书名却叫做《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174]。)与此相反，社会变迁则涉及逐步的或骤然的秩序重组、革命或改革。就美国社会而言，关键在于分化成为更加专门化的社会组织系统，以涂尔干的有机团结为样板。

后一种话题就是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帕森斯在60年代早期认为，现代化包

[172]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s", 第472页。

[173] Lewis Coser,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56), 以及书评,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Pure and Applied. By Talcott Pars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5, 1950, 第502—504页。在这篇书评中，科塞指责帕森斯“捍卫总体系统，甚至宽恕乃至倡导操纵” (第504页)。

[174]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0)。

括两个焦点，一是分化，一是整合。在他的分析中，前者就是像 19 世纪工业革命后所导致的那些历史发展，而后者在持续变迁尚未完结时也可能蕴含社会冲突。

帕森斯还在《乡村社会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家庭农场的乡村世界如何被工业生产的都市化区域所吞噬。其结果意味着剥离出一种“剩余的”家庭，与一般寓于家户之外的职业世界相分别。家庭虽然依旧作为制度留存，但已经丧失了绝大多数经济功能，转由现在居于主导性的工业部门来组织就业。^[175] 这里就涉及社会变迁，即“此前被赋予分化程度较低的那些单元的属性质，逐渐摆脱了这种先赋地位，通过适当的适应机制，可以被新涌现出来的更高层级的单元组利用。”^[176]

互动媒介角度上的分化意味着，每一个主要的制度秩序（经济体、政治体等）都会进一步分出更为专门化的交换系统，与其他制度秩序之间进行交换，从而确立更加专门化的子系统，比如在货币领域里出现专门针对权力的区域或监管机构，其功能就是确保金融交易中有关道德正直的规范；与之类似，在政治体中会出现特别针对货币、影响和 / 或价值承担的区域。帕森斯在讨论政治权力和分层的两篇文章的文末，都附上了一系列图表来描绘就此产生的复杂图景。^[177]

二、通过分化与涵括实现民主化

帕森斯为准备讨论美国黑人的重要文章（“赋予美国黑人完全公民权？”）先写了一些预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备忘录“论涵括过程”。他在备忘录中阐述了针对他所知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如何通过分化来实现民主化。

<227> 经济体越分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就越需要由市场考虑来主导。与此类似，政治体越分化，服务也越需要可以自由处置，在交换双方皆是如此。也就是说，提供服务者越能自由决定履行服务的具体情境，可以归结为雇

[175] Parsons,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Rural Sociology*, vol. 26, 1961, 第 219—239 页。

[176] 同上引, 第 235 页。

[177] 参看讨论政治权力概念的文章最后的图表, 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397—404 页; 以及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Modern Society" [原文此处缺后引号。——译者注], 刊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第 366—367 页。

佣组织中的受雇与自主的选择，而雇用服务的人也越能从可能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中作出自由选择。当双方都具备尽可能多的权力，与各自所处情境中的其他因素和谐关联，这种相互的自由就实现了最优化，甚至最大化。提供服务者的权力就是他在雇佣组织中选择受雇还是自主的自由，但始终需要假定他致力于贯彻共同价值。^[178]

他在本段结尾时，又在打字草稿里插入了一句手写的话，并加上了括号：“（双方的一般化因素）。”在他看来，这指的是被自己视为不言自明的假设：不仅是“雇佣组织”领域内的分化加剧，对于“提供服务者”的“受雇选择自由”也增加，两者都意味着从一个参与程度较低的社会，向一个更为民主从而也更为现代的社会发展。然后他重点以美国内战前后的南北双方为例，来说明发展的视角：

由此观之，北方社会与南方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事实上，这些要素（即 T.H. 马歇尔意义上的法律要素和政治要素）在北方要发达得多。尤其是成年人已经获得了普选权。妇女投票权的修正案又一次成为一个里程碑。至于女性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类似之处，也是人们常常提及的。……当然，总体看来，南方自身实际发生的社会变迁，即通常被联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概念的那些变化，也在不断削弱南方的位置。^[179]

在“论涵括过程”之前一年，帕森斯写过一篇文章，用“权力银行”的类比来理解现代政治。那时他假定，如果一种社会秩序现代性程度较低，就像纳粹的体制，那么它就是不完善的（partial）。因此，就战后世界而言，他直指联合国推动的那种进步，“特别是克服了旧有的、更不完善的秩序中那些既得利益。”^[180]他就此认为，那种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秩序，即“纳粹鼓动下的德国国族主义所展示的那种异化”，属于“不完善的”，就是说民主程度较低，显然分化程度也较低，所以一般性水平较低。

[178] Parsons, "Notes on the Process of Inclusion", 第 10 页,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42.45.4, box 4.

[179] 同上引, 第 8—9 页。

[180] "The Power Bank: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World Order", 清样稿第 34 页,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42.41, box 4; 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帕森斯写的“备忘录：肤色轴线上的两极化问题”探讨的是：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范畴被涵括进了行动系统，将人口中形形色色的成分都融入主流社会。由此观之，根据他的说法，在宗教改革时期，在俗之人成为“上帝子民”这个神圣共同体中具有完全资格的成员，与其神父或牧师地位相当；在内战结束后的英国，天主教徒通过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英王查理二世 1679 年签署。——译者注]，成为王权之下受保护的臣民，与新教徒地位相当；又或者在美国，新教经过“清教”变革，最终导致“‘不可见的’教会不再作为某种‘两阶层’体制，而成为被设定平等者的团体，原则上向所有想要加入的人开放”^[181]。他明确指出，政治过程所遵循的理据与宗教过程类似，也要在政治体中确立面对各个方面、各个团体的平等机会。美国革命以及法国革命都确立了公民权原则，让“所有想要加入的人”都汇聚在国旗之下，参与整个共同体的政治生活。

帕森斯还写了“赋予美国黑人完全公民权？”一文，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在公民权运动中，同时蕴含着分化过程和涵括过程，不断趋向为美国黑人提供与其他任何公民同等的权利。他也承认，很明显，国族主义作为“新国族”——美国堪称这些“新国族”中的先行者^[182]——中的现代团结形式，在 18 世纪就已经塑造了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当时的“核心显然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WASP)，而黑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并未被包括在内”^[183]。此后，在白人人口中，教派上的多样性得到了宪法上的保障，最初是体现在基督教内部形形色色的教会之间，然后又方便了俄国、意大利或爱尔兰等地涌来的犹太教或天主教移民。当人们回顾从南北内战到眼下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历史，在那些最终导致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的涵括过程中，绝大多数是将黑人人口排除在外的。尽管如此，

美国的发展趋势依然是不断趋向多元主义……而总体社会地位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松散。对于我们的考察宗旨而

[181] Parsons, “Memorandum: The Problem of Polarization on the Axis of Color”, 第 9 页 (未公开刊行);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42.45.4, box 4.

[182] 这里指的是 Seymour M.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183] “Full Citizenship for the Negro [原文此处误作“Nego”。——译者注] American?”, *Daedalus*, vol. 94, 1965, 第 1011 页 (*The Negro American*, 第 711 页)。

言，这种趋势的意蕴尤其深远。也就是说，明确区分涵括 (inclusion) 与同化 (assimilation) 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由于美国最初主要是一个新教白人社会，所以人们往往认为，所谓涵括，就是说成为新教徒，或者尽可能接近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但我认为，对于黑人来讲，并不需要这样，可能未来也不会这样。完全的涵括与多重的角色参与，和维持独特的族群认同及 / 或宗教认同可以并行不悖。^[184]

三、重构美国社会

本节涉及统合与冲突这两个论题之间的社会学关联，这是1965年1月帕森斯在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演讲的主题。^[185] 他在演讲稿中提醒听众注意，自己还不能够勾勒出一套一般化的比较理论，只是有一些从“宗教、族群、种族”的角度切入的见解，可以对每个角度的特性做些具体说明。他首先谈的是宗教：

宗教。层级较高 + 比族裔性更深层。如果“分栏排列”，较具区分度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分栏。)

<229>

同样会趋向更高层级的整合——(赫贝格)……

现在则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 (interfaith) 社会……

更高层级的系统是“大一统世界”[原文为“Oecumenical world”，有基督教各教会大联合、普世教会之意。——译者注]。政教分离，使美国有可能融入该世界。

回到种族——美国诸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

一战后开始“松动”，但在过去十年仍在发展。

迁移，选举，经济压力

还有文化上的持续压力，转换成

[184] 同上引，第1015—1016页(相应为第715—716页)。

[185] Parsons, “McGill[.] *Unity + Conflict*[.] Jan. 28, '65”;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15.4, box 12.

- a) 宪法上
 - b) 较具体的法律上。
- 最高法院的角色。

整体状况

在“私人”层面上向分化+升级过程开放。

冲破壁垒——黑人的迁移

南方的工业化。

生活水平，沟通，教育。^[186]

帕森斯分析了统合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美国社会在肤色轴线上的两极化如何可能随着公民权的变化而被克服，然后重新开始关注，公民内部诸范畴之间的优等 (superiority) 与劣等 (inferiority) 关系是如何可能被转换成货真价实的平等。在他有关价值承担的分析中，这一认知旨趣针对的是“道德领袖性质”的去分化过程，而在他有关肤色轴线的两极化的备忘录中，针对的则是“不完善的”社会类型，有如纳粹式的国族主义。他在备忘录的引言中解释道，

大体而言，两极化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包括某种优等—劣等维度，在特定的情势下，这一维度会主导其他维度。我尤其关注的情况是，根据某些相关制度标准判断的优等的成分，最终开始包容劣等的成分，基于某种根本意义上的彻底平等，共同生活在整合一体的社会共同体（或其他形式的社会共同体）中。[前者是“社会层面上的共同体” (societal community)，后者是“社会维度上的共同体” (social community)。参看前文第 xiii 页 (原书页码) 译者注。——译者注]^[187]

在他“论涵括过程”[此处原文误将“process”写作“problem”。——译者注]一文草稿中，帕森斯就保证要处理这一认知旨趣。对于黑人之类的公民范畴而言，如何具备平等的获致能力还是个问题，在教育、选举之类的参与方面，他们绝大

[186] 同上引，第 4—5 页。

[187] “Memorandum: The Problem of Polarization on the Axis of Color”，第 2 页；该备忘录初稿大约撰于 1961 年。

多数人遭到了无条件的 / 明确的 / 整类的 (categorically) 排斥。尽管如此，依然要期望获致机会的一般化，它意味着公正：“我们已经提出，黑人成了劣等的符号象征。……这样妄加断言劣等，又质疑作为资源的黑人不具备履行有关获致的价值观的潜力，这两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而与这种劣等地位相对的，恰恰是黑人构成了我们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未开发资源。与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如变废为宝，加以动员，以巩固公正这一主题。”^[188]

<230>

他的结论是：“总体上的主题就是完整的公民权（社会共同体）综合体，基于这一基本考虑，所谓劣等是不存在任何合法地位的。像现在这样的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试验案件 [“test case”，指用以测试具体法律是否违宪的案例。——译者注]。”

因此，整合至关重要。他（在麦吉尔大学演讲稿中）强调了法律系统在确保（公民）权利平等方面的特别地位，并特别指出，涵括意味着“涵括并不等同于‘同化’”^[189]。他的“社会变迁理论略议”一文，探讨了19世纪的工业化（取代乡村组织）作为社会结构分化的范式。他在文中提出，“结构中的规范性要素……被重组为分化过程的一部分。……有关大规模的、高度分化的社会系统，这里的典型就是法律规范的系统……所涉及的标准在于实际的表现或获致的成就，在于技术上是否妥当等等。”^[190]

另外还有一个知识旨趣：他希望避免在无意之中为文化悲观主义推波助澜。他在“论涵括过程”所附的“总体陈述”中指出，“十分惹眼的悲观主义”^[191]广为扩散，当年的《代达鲁斯》春季号已经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谴责。但他也说道，自己要提出“针对这种趋向的解药”：

不仅（美国黑人的）充分涵括确实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第一次真切看到了它有可能成功实现。况且，相较于我们从前的认识，社会科学知识大大促进了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理解为了完成进程所必需的

[188] “Notes on the Process of Inclusion”，第12页；强调格式为原文所有；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189] “McGill”，第3页。

[190]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第236页。

[191] “General Statement”，附于“Notes on the Problem of Inclusion”，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42.45.4, box 4；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份单页“陈述”。

条件。我的宗旨就是调动一定的此类理解，以使这类条件广为人知，为推动进程尽一己之力。

他的另一条思路涉及，在积极重构当代美国社会、为美国黑人谋求完全公民权的过程中，社会学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教育革命，这三大‘革命’支撑了现代社会的兴起”，学术系统就属于最后一个革命，“实际上，它还是教育革命现阶段的核心”。时值1968年，在一篇讨论美国学术系统的文章中，帕森斯如此写道。^[192]

<231> 在一份题为“哥大事件”的手稿上，他把社会学与教育革命相关联，并提出，伴随着民主革命，社会学就此集中体现了民主体制如何超出政治范畴，扩展到今日社会的结构和过程：

三大革命。

工业革命——经济学为“王”

民主革命——政治学

教育革命——社会学^[193]

第六节 引入社会共同体

一、以史为鉴

关于社会共同体，帕森斯最初的阐述出现在论（前现代）社会的历史演进的作品中，将萨缪尔·艾森施塔德探讨帝国的研究进一步推向高峰。1963年，艾森斯塔德以帕森斯式的风格，构建了一套关于帝国兴衰的理论，突出了分化与去分化。他揭示了在几乎所有已知文化中，多样化的政治系统的发展是如何表现出，普遍主义即使局部屡遭阻遏也逐步取代了特殊主义，而获致取向就算常受分

[192] Parsons, "The Academic System: A Sociologist's View", 重印于 Daniel Bell 与 Irving Kristol 合编的 *Confrontation: 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第 181 页。

[193] "Columbia affair" (手书札记),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 42.45.4, box 5 (大约写于 1968)。

层擎制仍逐步胜过了先赋取向。

在主要的制度区域中的分化……表现出比较高的发展程度，体现在社会中的主要制度领域，体现在各式专门组织，体现在“生产者”的角色，并且体现在“消费者”角色上，只是程度要小得多。在所有这些区域中，这种分化都创造出了不同类型的自由流动（free-floating）资源。这种分化程度固然有限，但却普遍弥散，构成了“外部”条件。而根据我们的假设，这里所考察的各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其主要特征的制度化必须满足这些条件，也就是集权化科层管理的政治体，可供进行政治斗争的渠道，以及具有一定分化程度的政治活动。^[194]

此后，帕森斯还继续深入阐发，普遍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价值取向是如何取代了特殊主义，而获致取向又是怎样胜过了先赋取向。相关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社会中的进化普遍项”^[195]，然后是《进化与比较视角下的社会》一书。^[196]在这部短小精悍的书中，他对比了许多文化，比如说古代社会中的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他假设，古埃及之所以长期稳定，也可以说缺乏发展能力，是因为事实上，社会中政教不分，基本融为同一套制度结构，法老成为实质上的神。这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能够确保个体权利的法律系统，因为宗教与政治体之间尚未发生分化。与此相反，在美索不达米亚，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已经有了一定

<232>

[194] S.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Collier Macmillan, 1963), 第 94—95 页。

[195] Parsons,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964): 第 339—357 页。

[196] 应“现代社会学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y*)丛书系列的主编、也是帕森斯的老同事和合作者英克尔斯之邀，帕森斯 1961 年签下合约，开始撰写一本书，但很快演变成两本书的写作计划。第一本写于 1963—1964 年。帕森斯在《进化与比较视角下的社会》一书中探讨了原始社会和古典时代的社会，希望通过历史的视角，更好地说明分化与整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1966)。第二本书是《现代社会系统》(*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1971)。而第三本则是一部文选，与利兹合编了《前现代社会研究文选》(*Readings on Pre-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2)。1977 年，杰克逊·托比将帕森斯写的两本书缩编为一卷本，题为《社会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程度上的分化，法律系统也有一定的相应发展，只是由于“有关义务的意义理据何在的统一观念”尚未形成，阻碍了各制度领域的进一步分化与巩固。不过，在古希腊，已经创造出城邦[原文为“polis”，就是“政治体”(polity)一词的词源。——译者注]的概念，实现了后一种发展成就。^[197]

此书首次提出了社会共同体的概念。那么，在这初次尝试之中，社会共同体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帕森斯用“AGIL”（适应—达鹄—整合—维模）这一四功能图式，概括了一个功能运作正常的社会中的四种行动系统。其中，代表整合功能的就是社会共同体。《进化与比较视角下的社会》一书中的第二章，“社会的概念”，勾勒了社会共同体的形貌，否认动机促动的行为的因果序列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形式。相反，包含作为核心社会系统的社会共同体的行动系统，与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密切关联，构成“所谓的‘终极现实’(ultimate reality)，归根结底(ultimately)，我们关注这样的现实，用来应对韦伯所说的‘意义问题’，比如恶与受难、人生有涯之类。这个领域中的‘观念’作为文化客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终极现实的符号‘表征’(例如有关诸神、图腾、超灵的观念)，但其本身并非此类现实。”^[198]

社会共同体在发挥功能时，所处的环境中还包括其他三个行动系统，即文化、人格和有机体，彼此之间存在交换关系，使得社会共同体具备自成一体的实在性(*sur-generis reality*)。如此一来，它就成了这样一种集合体，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良知(*conscience collective*)。帕森斯想要强调的是其自足性(*self-sufficiency*)：

一个社会必须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具备足够程度的整合或团结，以及某种独特的成员地位。……这一共同体必须“承载”一个具有相当的一般化水平和整合程度的文化系统，足以将规范秩序合法化。这种合法化需要有一个构成性符号象征系统(*system of constitutive symbolism*)，在此基

[197] *Societies*, 第四章, 第 51—68 页, 本句引自第 67 页。其实, 早在 1942 年, 帕森斯面对当时的“当前危机”, 也就是使西方文明深陷危险的战争, 引用韦伯来伸张民主体制, 对抗纳粹主义, 就诉诸了城邦概念。参看前文第二章。

[198] *Societies*, 第 8 页。

基础上筑造共同体的认同和团结，以及具体呈现此类符号象征的信仰、仪式等文化要素。……就此而言，一个社会的自足性……在于其将足够多样的文化要素予以制度化，以便比较好地满足其社会层面的 (societal) 急切需要。……但自足性绝不是要求所有成员的所有角色参与都在社会之内执行。……最后一点，自足性意味着对于经济—技术综合体的充分控制，能够以有目的、守均衡的方式，利用物理环境，作为资源基础。与这种控制密切相关的，是对于地域的政治控制，以及对于与居住—亲族综合体相关的成员资格的控制。^[199]

<233>

看起来，自足性似乎等同于社会共同体内部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能力。从一个希望说明民主社会如何进行功能运作的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将社会共同体结合其他三个行动系统，并与之相比较，意味着自足性，称得上一个相当发达的、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行动取向系统。进而，这种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能力使个体有能力具备其文化认同，受到立法和司法的巩固，保障了个体进行道德上具有显著意义的自愿互动。

二、“共同体的基本结构”

在没有创造出“社会共同体”这一概念之前，帕森斯最早探讨共同体问题的文章发表于1959年。弗里德利希在他1955年创建的美国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学会的名下，每年在坎布里奇召开年会。第二届年会的主题即为共同体。帕森斯参与其事，后来还协助编纂“诺莫斯”(“Nomos”，意为律法、习俗或中国古代的“礼乐”。——译者注)丛书。^[200]

“一位社会学家看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一文^[201]，既不遵循桑巴特的反现代主

[199] “The Concept of Society”，重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本段引自第19—20页。

[200] 仅在1958年到1964年，“诺莫斯”丛书系列就涉及了权威(1958)、共同体(1959)、责任(1962)和正义(1964)等新鲜话题。

[201] 选入 Carl J. Friedrich, ed., *Community*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1959)。同属该文集的其他作品还有 William Y. Elliott, “The Co-Organic Concept of Community Applied to Legal Analysis: Constitutional and Totalitarian Systems Compared”，第50—64页；Benjamin Nelson, “Community - Dream and Reality”，第135—151页；以及 Lon L. Fuller, “Governmental Secrecy and the Forms of Social Order”，第256—268页等文。

义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观念,也不接受滕尼斯与之相对照的“社会体”(Gesellschaft)观念,而是另辟蹊径来讨论共同体。他希望将共同体理解为就在此时此地,在当代的美国,构筑起团结的基础。当他找到了新的根基,就放弃了寻常之路。但其实有意思的是,这个新的根基却是老早以前的。他回头诉诸麦基弗的《共同体:一项社会学研究》一书,而它出版于1917年:[202]

<234>

我所说的共同体……指的是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集合体或结构都具有的某一维度。……鉴于麦基弗的书……把重点放在共同体与地域位置之间的关系上;我也就此给出一个尝试性的操作定义,把共同体看做是社会系统的结构中,可以用来指涉人……及其活动的地域位置的那个维度。当我说“可以指涉”……意思是说……可以将位置作为关注焦点(当然只是部分决定因素)来进行观察和分析。由此观之,对于共同体结构的研究,近似于用一群重要社会学家(以芝加哥大学为核心,后来又包括了密歇根大学)所称的“生态学思路”来研究社会现象。……整个的程式……包括了……考虑到各方地域位置而彼此参照行事的那些人。因此,人口和地域位置一样,是共同体研究中同样重要的焦点。[203]

[202] Robert MacIver,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Macmillan, 1917)。麦基弗的主要目标在于,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观点,无论是说明社会法则,说明社会事实,还是说明社会学在众多学科当中的位置,都能拒弃实证主义(包括涂尔干式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式的实证主义),克服麦基弗所称的“有关共同体的虚设视角”(第67页以下)。有鉴于此,麦基弗在讨论共同体的要素与结构的时候,认为一个共同体中的统合源泉之一就在于“地域边界”(第107页),另外还有两个源泉作为补充,一是共同利益综合体,一是与特殊利益相关联的结合。这样就与斯宾塞的观点针锋相对,他发现,制度就是“借助某种共同意志,在社会生活中确立的秩序形式”(第150页)。然后,他进一步概括了共同体发展的三大法则,与斯宾塞的自然选择说或决定论进步观毫无瓜葛,而是处处强调交往结合,其实是在强调,以一个共同体中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大量共同利益为追求,丰富多样的交往结合是如何有利于现代社会。

[203] “The Principal Structures of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View”, 收于 Friedrich, ed., *Community*, 本段引自第152—153页;这里所指的芝加哥思路或密歇根思路,可以邓肯为例,1958年,他在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中勾勒了生态学思路的基本形貌,此文后来重刊于一部会议文集,见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Neil Smelser, *Sociology: The Progress of a Decade. A Colle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第311—325页(Duncan and Leo F. Schnore, “Cultural, Behavioral,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至于“地域位置对于角色中的人所具有的意义的主要范畴，以及……这些范畴彼此关联的方式”，考虑到“地域位置作为某种具有显著社会意义的事情发生或预想可能发生的‘地方’，始终非常重要”，^[204]他找出了四个具有这种空间性、边界性倾向的认同焦点，即居住位置(location)，职业与工作场所(premlises)，管辖权域(jurisdiction)，以及“沟通综合体”(communicative complex)。

下面详细谈谈这些焦点。居住位置意味着，隔离往往关联着居住上的区别。作为社会阶级成员资格的直接归属和来源的单元，核心家庭“倾向于居住邻里上的相对一致性”，导致“‘较高档的’邻里住区与‘不那么令人想望的邻里住区’相隔离”：“而这又会成为社会中的阶级结构的一套重要参照点。”^[205]

职业与工作场所在空间上也是被隔离出来的。简言之，“通常针对的是……某个角色，会拥有某种家庭基地……角色扮演者由此外出，并返回其中”^[206]，言下之意，有别于暂住者，比如旅店的客人。

管辖权域是基于地域组织起来的，尽管宪法规定的权利与职责是通过美国联邦政府来保障的。这种双层结构关系到“一些义务，通过某种决策过程，强加给某些人群范畴，而在一套规范秩序的系统下，具有根本相关性的机构据说享有合法权威。”^[207]

重要的是获取或使用外在强制或物质性强力。1957年以后，南方某些州就连州长也公然违抗最高法院的司法管辖，阻挠废除种族隔离的进程，在争取宪法权利的斗争中不时爆发暴力冲突。帕森斯看到，“物质性强力的战略作用就在于……‘逐步减少’惩罚”，并提醒道，“尽管对于激发积极行动的动机，对于预防担忧或反对的行动，强力或强力威胁的效力面临重大限制，但强力仍然是最终的约制。”^[208]

[204] “The Principal Structures”，第153页。

[205] 同上引，第156页。

[206] 同上引，第159页。他后来将这种区分转换成一国之公民与外国人之分，前者显然是一种地域单元，后者虽然受到财产权的保护，但并非享有完整资格的成员。参看其“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on Modern Societies”，亦参下文。

[207] “The Principal Structures”，第160页。

[208] 同上引，第161页。

虽然联邦政府是更高层级的控制机构，但帕森斯提醒道，“整合一体的社会系统的边界会牢固地趋向于与其政治系统的地域管辖权域相一致。”^[209]不过，他还提醒读者注意，尽管不是所有的“政治义务都是‘至高’人类义务”^[210]，但“不管什么社会，只要允许其他的管辖诉求优先于其受政府核准的法律系统，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整合。”他宣称：“政治管辖权域是至高无上的，不管什么社会，只要其他管辖权域的诉求超越了成功推行法律的诉求，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效地组织起来。”^[211]

第四个是“沟通综合体”，涉及“具体场所中的人”^[212]，调控了信息内容（将互动结构化）。有效的沟通需要满足四项前提条件：认知内容，针对他人的意向性，对于有关影响的接受或拒绝，以及对于共同文化的分享。“那么，处在物质性位置中的物质性的人，在沟通过程中又属于怎样的参与类型？”^[213]沟通需要有物质性的媒介，比如言说，常常通过沟通技术加以传送，但语言维度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前提条件。沟通媒介，尤其是其符号基础，意味着地域性，因为财产一般属于处在某个（经济、文化、住区等维度上的）背景中的本地人，并据此被模式化。“这样来讨论沟通，其结果就是揭示了：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的活动必然有着空间上的定位，从而决定了他们的分布模式；不仅如此，社会单元之间的互动过程的物质特性也必须得到明确的模式安排。”^[214]

这样说所针对的目标，无疑就是美国社会。所谓社会共同体乃是基于地域性，这样的见解也让《共同体》文集集中的另一位作者深信不疑，而他的文章就在帕森斯一文的后面。托马斯·A·科万是一位律师，对帕森斯充满敬意：“我曾经认为，共同体就是一种基本上停留在人的思想领域的追求”，他在自己文章一开头如此回忆道，“然而，帕森斯却说，‘研究始于足下’，不妨就从家庭开始。”^[215]科万觉得，

[209] 同上引，第 163 页。

[210] 同上引，第 165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211] 同上引，第 167 页。

[212] 同上引。

[213] 同上引，第 170 页。

[214] 同上引，第 175 页。

[215] Thomas A. Cowan, "The Principal Structures of Community Reviewed", 见 Friedrich, ed., *Community*, 第 180—181 页。

帕森斯挑选了地域性这个不太寻常的主题，已经发现——更准确地说是重新发现——法律学说中一个无疑很关键的主题。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与帕森斯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的观点。（实际上，在此之后，到了60年代初期，当帕森斯开始分析影响和政治权力，他很可能是采纳了科万的想法。）“我很想看到，有关‘共同体空间’的性质，眼下这种单维观点扩展成了极化系统。”科万如此写道。

帕森斯教授提出，共同体的主要结构就是家庭、工作、管辖与沟通。我宁愿把这些结构看做是包含着一系列的极化对立。比如说，在管辖权域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所面临的结构融合了各类力量，有的倾向于趋近管辖空间，有的则倾向于远离管辖空间。如果我们始终重点关注空间（我觉得还有时间，因为帕森斯笔下的系统都具有目的论性质），不妨把这些力量看成对于所探讨的空间而言的向心力或离心力。^[216]

科万解释道，法律系统就是向心力量，因为它对人强加了约制，调控其行为。当然，并非所有的约制都是负面的，科万认为，从帕森斯本人那里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在他看来，帕森斯更推崇肯定性(affirmative)约制，而不是消极惩罚。^[217]科万提到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点出了一些向心性 or 整合性的趋向，“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就体现在用‘外援’来交换军事基地和意识形态忠诚。并不只有我们自己的公民在要求政府的积极服务，这世界上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渴望让自己归于美国的‘管辖权域’。”^[218]

三、基于法律系统的公民权

“赋予美国黑人完全公民权？”一文开篇伊始即认定黑人在美国属于“二等公民”，从而引出了T.H.马歇尔对于公民权三维度的理解。^[219]按照帕森斯的说明，

^[216] 同上引，第185页。

^[217] 这大概指的是《社会系统》，该书尤其是第六、七两章详细阐发了民主社会中为确保遵从所采取的正面机制（比如社会化或治疗作为社会控制形式），而负面约制只是作为附属性的社会秩序。

^[218] Cowan, “The Principal Structures”, 第186页。

^[219] 参看 T. H. Marshall,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4)。此书1950年初版于伦敦，60年代再版，是一部文集，其中有些写于二战期间。

马歇尔笔下公民权诸维度，即民事权利或法律权利，补充以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政治面和社会面（经济面），对于理解“有色”美国人如何能够成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公民，确实非常关键。不过，马歇尔的想法还需要夯实，深究这三重公民权的演化机制。他在自己的引言中澄清道：“这里所使用的公民权概念，指的是在我所说的社会共同体中的完全成员资格。而社会共同体这个术语指的是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社会的某一方面，它形成一个共同体（Gemeinschaft）；是维系其成员的团结或相互忠诚的焦点，构成了共识基础，支撑其政治整合。”^[220]

从个体公民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社会共同体这个范畴，指的是集合体成员对于所结合的集合体的承担，以及成员彼此之间的承担。”^[221]因此，他倡导这样一种权利平等，用此前不久约翰·罗尔斯所阐释的话来说，能够使在其他方面肯定不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分配正义成为必然义务。

在“论社会概念”一文中，他将社会共同体安放在法律系统中，因为它实现了三项任务：其一，区分成员与非成员；其二，维持某种团结感，赋予公民一种共同的、蕴含意义的认同；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代表了一个社会在地域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性，奠立了一个帝国、城市国家或民族国家的经济体与政治体生生活力的基础。

不那么现代的社会能够在其宗教世界中找到法律系统的前身。但充分分化的社会共同体蕴含着法律的制度化，只能存在于现代民主体制。“在其早期阶段，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分化是在宗教领域里体现得最为明显，随着诸神与人类境况之间的‘距离’愈益扩大，这种分化变得显而易见。”^[222]同时，“社会整合系统以社会共同体为焦点，政治体关注的则是集体目标的选择、调控与获致，而不是维持团结（包括秩序）本身，这两者之间的分化的最重要指标，或许就是自主的法律系统的发展。”

^[220] “Full Citizenship for the Negro American?”，收于 *The Negro American*，与 Kenneth Clark 合编（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第 709—710 页。

^[221] 同上引，第 710 页，引用了 John Rawls, “Constitutional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of Justice”，收于 C. J. Friedrich and John W. Chapman, eds., *Justice (Nomos VI)* (New York: Atherton, 1963), 第 98—125 页。

^[222] “The Concept of Society”，见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第 28 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法律是关键环节：“我们将会看到，在前现代各系统中，帝国时代的罗马法显然是最接近于符合这些要求的较为‘形式化’的特征的，当然，它对后来充分现代的系统的兴起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223]

《现代社会的系统》是《进化与比较视角下的社会》一书的续篇，明确聚焦于现代世界的演进，其中的第二章大大推进了上述分析。^[224]现在他从长时段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西方民主体制如何达到其最发达的状态，也就是当今之美国。

他重申，分化构成了多元主义的社会。政府中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的分立，<238>以及经济体、政治体、组成“社会”的各色领域（其中就有法律和医疗）与第四领域即文化的分离，这些都是产生重大影响的成就。“社会”是对于整合而言的核心领域，其中，有三个区域履行着信托功能，维系社会秩序，因为它们促成了服务公民的资格能力。这三个区域分别是：高等教育，负责保障文化与科学；法律系统，负责保障公民权利、调控契约关系等等；专业实践，负责保障健康（比如表现为医疗）。正是这些主要的向心力量制造了忠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律系统，促成了对于公民之间的多样性的宽容。^[225]

我们的核心范畴是……以如何界定对于社会集合体的忠诚这类义务为焦点的要素，无论是成员资格能力本身，还是社会中分化了的各类地位和角色范畴，都是如此……所谓忠诚，就是随时准备回应有关集体或“公共”利益或需要的恰当“正当化”了的诉求。规范性问题关注的是界定在什么场合下，这类回应构成某种义务。尤其重要的是，亚群体对于社会集合体的忠诚，个体对于社会集合体的忠诚，以及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其他集合体的忠诚，这之间都是什么关系。^[226]

法律系统作为包容整合性倾向的领域，追求的是非特殊主义、非先赋取向

[223] 同上引，第31—32页；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当时被译作英文不久，见 Max Rheinstein, ed.,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24] 此前曾经公开发表，即“*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on Modern Societies*”,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34—57页。

[225] 亦参下一节。

[226]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第41页。

的规则与角色，是一套有关正义的普遍框架。在法律正义、其实就是司法正义的取向协调方面，最高权威就是宪法。

法律性的某些方面完全是从宪法界定的角度来赋予的。由于这是一种可变要素……，最重要的变化动因似乎就是司法决定或其等效因素。……宪法本身……绝不~~仅仅~~是对于价值承担的确认。它还针对政府本身的行为，以及政府的各类代理机构与私人部门中各单元之间的关系，陈说了许多非常具体的规范。^[227]

帕森斯的一位同事，哈佛法学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曾经演讲“直接行动、公民不服从以及宪法”，进一步考察了一些相关问题。^[228]他反问道：“如果直接行动，不服从本地当局，以及民权运动的类似技术，最后都导致了种族关系方面一定程度上的改革，难道不会引导我们更加趋近那个领域的目标，并推动社会其他部分延宕已久的改革？”^[229]一方面，要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示威游行，对抗着地方警察当局对于此类游行的禁令，但却完全是合法的：“这类行动没有丝毫的公民不服从成分，归根结底，也丝毫不违法，因为被侵犯的法令都是违宪的，因而是无效的（也就是说，根本算不上法律）。”^[230]另一方面，如果在某个军事基地阻塞火车，要求黑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平等，那就是非法的：“民权运动中并没有一桩重大事件涉及这种有关黑人不服从法律的情况。”^[231]

第三类不服从在于“有些情况下，在示威游行的时候，唯一可以诟病的就是触及了某一宪法权利的外缘，甚或有所逾越。”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司法来释宪。“如果有所存疑，示威者将会寄望于聆讯其案的最高法院的终裁，并具备执行裁

^[227] “Polity and Society”，见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第 481 页。

^[228] 参看 Archibald Cox, Mard DeWolfe Howe, J. R. Wiggins 合著之 *Civil Rights,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our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该书收录了三篇论文，最初属于 1965—1966 年冬季学期，马萨诸塞历史学会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组织的晚间演讲系列。

^[229] Archibald Cox, “Direct Action,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见 *Civil Righ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Courts*，第 3 页。

^[230] 同上引，第 9 页。

^[231] 同上引，第 10 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决的手段和毅力。如果法院维持宪法诉求，他将无罪开释，否则他将受到惩罚。”考克斯明确指出，这就使得司法成为某种社会程序，尽管还谈不上是功利追求的手段，

如果示威游行和直接行动广泛取代理性与文明，成为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手法，那么社会就将解体。如果反复诉诸此类战术，也很可能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削弱其效能。不过，如果事业有着正当理由，如果情势紧迫，如果其他渠道不可行，我们就应当捍卫一个人享有这样的社会道德权利，只要他真诚地相信某项法律违宪，就可以不遵从它，哪怕最后证明他错了。我们之所以遵纪守法，是出于良知的要求。无论对于一致赞同原则会产生怎样的损害，都会因为这一需要而有所平衡。^[232]

帕森斯在分析社会秩序问题时写道：“我认为，在晚近的最高法院裁决中十分突出的宪法原则，即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其实是从根本上陈述了我们生活其间的这种值得想望的社会类型的价值。”^[233]

而美国的《人权法案》就是道德上的标尺。道德原则就是免于被剥夺选举权，免遭剥削，让每一位公民都相信，自己有助于提高这个国家的效力。^[234]

四、公民宗教

在通过美国宪法确立起多元主义的领域中，有一个就是宗教实践。帕森斯有一份手书文稿，题为“宗教多元主义与社会多元主义”，探讨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里，（业已与国家政府分离的）宗教如何成为一种道德资源，有助于将美国人整合进一个宽容和多样化的世界：<240>

宗教多元主义的基本轮廓并不陌生——保持延续的重要性。

合宪的种族隔离——并不充满争议（米利斯）。

^[232] 同上引，第26—27页。

^[233] Parsons, “Order as a Sociological Problem”, 见 Paul G. Kuntz, ed., *The Concept of Order* (Seattle and London: Grinnell Colleg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第376页。

^[234]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第44页。

宗教自由与宽容。

教派多元化（不是特洛尔奇所说的教会或宗派）。

宗教奋兴与教会民主化。

对于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的消极宽容。

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堪称关键一步，既有私立，也有公立。

原教旨主义的相对隔绝

对于新移民的保守反应

一战以后才开始的涵括进程

20世纪20年代的三K党

1928年的选举

30年代的反犹主义

种种紧张迹象

现状——

赫贝格

进入整体生活的渠道大大增多。

天主教

肯尼迪的故事

库欣的立场。[这里指的应该是 Richard James Cushing, 1895—1970, 美国天主教枢机主教, 不允许其教区内存在其他教派, 关心穷人, 关注慈善。——译者注]

教皇保罗与公会议 [“Council”, 这里指 1962 年至 1965 年,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与保罗六世在梵蒂冈召开的第二次基督教公会议, 简称“梵二会议”。会议的一系列文件和方针对当代世界的普遍人权状况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译者注]

“公民”宗教

争取民权宗教联合阵线 (United religious front for Civil Rights)

世俗社会的多元化
 大体上并不陌生的症候
 都市化——大都会
 工业化
 核心家庭的相互隔绝
 教育水平提高

“中产阶级”社会。
 同一个人的多元参与

新意义上的“世俗之城”。
 宗教已经大大私有化
 而且相关性也延伸了

许多问题——社会意义上的和神学意义上的
 但整体而言，组织化宗教的状况远好于欧洲。

基本情况在一种深层趋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35]

这些札记中提到的资料来源可以找到四个：一是《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236]，系一位犹太神学家写于50年代中期。赫贝格提出，美国的发展演进是通过接受大量移民，他们来自具有不同族群、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国家，主要是来自欧洲、俄国和近东；而当这些将要成为美国人的移民被整合进一个具有族群、文化和宗教上多重认同的世界，也会被根据其流出国加以识别。“做一个新教徒，一个天主教徒，还是一个犹太教徒，在今天成为做一个美国人的可替代选择，”赫贝格如此写道，<241>

^[235] 手书札记，“Religious and Social Pluralism”，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4, box 16，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236] Will Herberg, *Protestant-Catholic-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这种宗教上的常态化性质意味着，存在一个共同的“美国宗教”，三大宗教群体各自都被视为其具有同等合法性的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说，存在某种宗教上的统合性。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各自都可以认为自己的“信仰”最好，甚至最真实，但除非他是位神学家，或受到某种特别的神学兴趣的影响，否则他会十分“自然地”认为，另外两个宗教群体与自己所属的群体分享某种共同的“精神”基础，由一些基本的“理念与价值”组成，而统领这些理念和价值的就是宗教本身。因此，美国有其支撑性的文化——宗教，最好理解为美国生活方式的宗教一面[原文此处误作“aspect”，应为“aspect”。——译者注]，而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三大传统宗教均可视为其适当的呈现与表达。^[237]

另一点指涉说的是天主教，在四大议题中，指的是“肯尼迪的故事”。帕森斯脑子里想的可能是自己写的一份三页纸的札记，大概是在肯尼迪的葬礼时写的，指出这一事件在理论上的特点：

肯尼迪是第一位被选为美国总统的罗马天主教徒，在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人群获得社会共同体中的完整成员资格的涵括进程中，他的胜选堪称一场重大事件。在晚近历任总统中，他的注定被刺，还有他的英年早逝，为这场事件添上了一层特别的悲剧和壮烈色彩。毫无疑问，就它与其成员的宗教归属之间的关系而言，美国共同体获得了新的普世教会的地位，而葬礼就是对于这种地位的一次至关重要的符号化。……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葬礼应当按照天主教的方式进行……这是第一次，……美国的教派多元主义体制的相关意蕴，宗教在我们社会中的公共地位与私人地位之间的独特平衡，成为众目睽睽的符号焦点。千百万人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葬礼，红衣主教成了这种情境的符号象征。……考虑到美国社会的新教背景，一位天主教神父也会担当这种角色，堪称新奇，也十分重要。有朝一日，很可能会有一位拉比出场。^[238]

^[237] Herberg, 第 274 页。

^[238] 无题文稿，起首句为“我们首先强调的是……”，第 3 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45.1, box 1。

再一项指涉说的是“公民”(civic)宗教,但耐人寻味的是,它被归在“天主教”的名目下。这无疑会让人想起贝拉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概念,他在1965年下半年美国文理学术院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贝拉引述了肯尼迪的总统就职演说,后者诉诸万能的主,赐福于国民,确信“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出自上帝之手”^[239]。他问道,这样明显地尊崇上帝,而所指的教义既非新教,又不是天主教,与犹太教也没啥关系,那么意义何在?答案就在于一种特具现代风格的跨教派性宗教,被称作公民宗教。贝拉解释道,

美国的公民宗教从来也不是反教权主义的,也不具有咄咄逼人的世俗性。相反,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有所取舍地借鉴宗教传统,以至于普通美国人不会认为两者之间有任何冲突。这样,公民宗教就能够打造出强有力的象征国族团结的符号,调动起人的深层动机,以实现国族目标,而无需与教会做任何艰难斗争。^[240]

贝拉发现,美国的公民宗教将庆祝建国和纪念阵亡将士搞得很神圣,他确信,“美国公民宗教依然充满活力。就在三年前,我们还参加了一场栩栩如生的重演,将牺牲主题与我们被刺的总统的葬礼结合在一起。”他还发现,“无论是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还是约翰逊所说的‘伟大社会’,背后显然都还有美国人的上帝选民的主题(Israel theme)。”

作为帕森斯札记背景的第四项素材是基督教神学家哈维·考克斯的《世俗之城》。^[241]他认为城市是今日之民众所偏好的场所,在那里,宗教的根基并不在于拘泥教条的福音释义,而在于思想的探求,他并鉴于这一事实来为现代都市文化辩护。这就意味着,真正现代的尊崇基督信仰的方式并不在于恪守正统,从而超越了原教旨主义与无神论这一虚设选择。

^[239] Robert Bellah,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收于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ist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本句引自第171页; 该文最初发表于《代达鲁斯》1967年冬季号。

^[240] 同上引, 第180—181页; 下两则引语均摘自后一页。

^[241] Harvey Cox, *The Secular City: Secular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帕森斯在札记里将这四项目材融合在一起,再加上其他各式各样的材料,试图调和宗教上的多元主义与统合一体性。他对公民宗教有全面的把握,认为它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一种整合性力量。公民宗教由各种信仰的个体所共享,无论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或许)还有无神论者,都可以共同加入“争取民权宗教联合阵线”(按照他在札记中的表述)。这里所传递的讯息就是:多元主义既倡导分化(宗教宽容),又倡导整合(宗教权利自由是一项民权)。“多元化……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在于……宽容的原则。……另一方面则在于,共同体本身必须建立在道德共识的基础上。一个共同体中的各个群体即使具有明显的宗教差异,不仅被‘允许’各自不同,而且必须拥有这样做的道德权利——保持差异是至关重要的。……”^[242]

<243> 五、学术专业、高等教育、社会学

1963年春,帕森斯撰写了“国际情境中的行为科学家的角色”^[243],文中指出:

必须谈一谈大学在我们现代情境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大学是西方世界伟大思想传统首要的受托组织,必须充当基本的温床,培育最重要的新发展。我并不希望低估这类组织框架之外的各类自由职业者或研究所、政府机构中的人可以作出的贡献,但大学似乎是汇聚这些新科学的最重要发展脉络的关节点。事实上,大学教授的首要责任就是增进本领域的知识,培养其作为该专业行家的继承者。这一点在我看来就是最重要的保障,以保持平衡,不为了当下的急需而过分牺牲未来的潜能。^[244]

^[242] Parsons, “The Nature of American Pluralism”, 见 Theodore R.Sizer, ed.,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第253页(黑体格式为原文所有)。

^[243] 该文系为1963年3月7日召开的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而作,会议主题为“行为科学家与人类生存”。帕森斯根据札记做了发言,但后来又写了一份论文草稿,并致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的编辑,表示如果杂志有要求,自己会据此写成一篇文章完整的论文。但显然此后并无下文。参看帕森斯档案中的有关信函、会议日程、手书札记及论文草稿,见 HUG (FP) - 42.8.6, box 1。

^[244] 同上引,第18—19页。

60年代早期，帕森斯曾经担任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第三分委会主席，致力于大学结构的有关问题。他设计了自己有关学术专业的三项研究中的第一项。^[245]在提交给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份简明方案中，他说自己希望探究科学对于整体而言的社会的作用：

美国社会最重要的结构变迁……在当前这个世纪，就是高等知识学科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核心就在于各门科学。……本世纪也见证了行为科学与社会文化科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整个知识综合体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不希望使科学与其他学科相隔离，后者指的是法律、神学等传统应用性专业，以及典型的大学组织中所体现的那些核心人文学科。^[246]

帕森斯（于1968年）撰写了“一位社会学家眼中的学术系统”一文^[247]，揭示了究竟是哪些特定的结构特性，使大学成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组团式”的弥散性权力分布，以及对于其经济资源的自主控制，对适用于现代性的科学至关重要。他明确指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早期，针对美国学术系统在组织上的这些特性，始终是聚讼不已，并曾爆发过一场重大危机，也只能由当时刚创立的大学教授联合会来解决。在30年代，反智主义把矛头指向新政支持者；到了50年代，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学人遭到滋扰。而在60年代，新的威胁来自左翼，但也同样是威胁。院系组团式结构成为焦点，而这正是美国大学的历史文化功能的保障。

“认知理性”作为学术系统的存在理据正在陷入危机，而大学成员的责任也已遭到侵蚀，受威胁的核心就是研究在其探求范围内免于政治控制。帕森斯主张，

[245] 见提交给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计划，“A Study of the Place of the Professions in the Current and Prospectiv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a period from July 1, 1961, to July 1, 1964 (three years)”，1961年1月25日，HUG (FP) - 15.4, box 2。研究期间直至1964年的相关材料均保存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的同一索档号下。接下来是第二项研究，从1965年持续到1967年，然后是第三项，最后汇总起来，产生了与杰拉德·普拉特合著的《美国大学》(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46] “A Study of the Place”，第2页。

[247] “The Academic System: A Sociologist's View”，*The Public Interest*, vol. 13, 1968, 第173—197页。

学院教学，包括本科阶段的教学，仰赖于认知理性所孕育的资格能力与统合/正直 (integrity) 等价值观念。他认为，“‘院系组团’模式”这种组织形式，能够秉承学术自由精神，实现认知理性。为了追求思想卓越，就需要维护大学的这种有所分化的结构。

综上所述，学术系统由于能够统合多样性，整合责任，因此成了“一台‘变迁发动机’”。他也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力量强大、作用显赫的学术系统，决不是维护现状的堡垒，而是一种资源，广拓渠道，推动社会变迁。……实际上，它是教育革命现阶段的核心。”^[248]

学院的教学与研究，知识价值的培养，都为现代美国的福祉本身作出了不可或缺贡献。而根据帕森斯的说法，民主体制本身的命运正在于这种功能。他觉得，这种功能无法实现的实例，就是德国大学院系面对纳粹国家的侵犯，无法保护自己成员的学术自由：“大学可以合法地集体行动，以捍卫自身，对抗有可能威胁其自主或其成员学术自由的政治运动或政权。回头看来，人们普遍感到，作为集体的德国大学，而不只是作为其个体成员的教员，原本应当更为有力地对抗 30 年代早期纳粹运动的威胁。”^[249]

社会共同体中所属各项制度，其标志就是多样性与统合性的协调共存，调和了多元与涵括，分化与整合。也正是这种协调共存，将大学维系一体。它们秉承“尝试精神”，持有“非同寻常的宽容”，所谓约束性的力量也主要是些程序性规则，引领着一种民主的文化。“在教室里，研讨班上，或是院系会议上，学术讨论整体上是由类似于议会讨论程序的同一种程序性规则所主导，虽说通常无须如此形式化。……因此，与‘承担’相对而言的彻底的尝试精神，必须得到非同寻常的宽容。……以学术的方式应对……冲突，就是在程序性规则下进行讨论，而不是‘对抗’。”^[250]

那么，如果说这就是学术系统为免民主受损而要维护的特定结构与过程，社会学家在这种情形下又该扮演何等角色呢？

[248] 同上引，第 195 页。

[249] 同上引，第 190 页。

[250] 同上引，第 188、196 页。

帕森斯认为，社会学等需要高深学识之专精职业，已经“开始取代工商业，成为现代社会最具战略意义的部门”^[251]。他明确指出，这个过程“在美国的进展要超过其他任何地方”。作为这样一种学术专业，社会学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并且不仅仅是在规模上：“在知识学科的世界里，在有关各专业群体中，它已经愈益占据了一种新的战略性位置。”

第七节 有关整合的理论

一、作为变项的整合

罗伯特·库利·安吉尔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整合”辞条中，认为帕森斯的成就之一就是阐述了某种“规范整合”：“根据他的理论，当文化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也就是一个社会的共有价值，在社会系统的结构要素中得以制度化，就实现了这种整合。它会发生在三种层面上(人、集体与角色等范畴)。”^[252]依照这种理解，安吉尔把帕森斯描绘成一位整合理论家，并且有关这种整合的阐述据说还不那么精致成熟。他继续谈道：“有证据表明……大型系统的规范整合并不完全由其子系统的规范整合所支持。”为此他还引证了希尔斯与贾诺维茨对于德国军队的研究。^[253]

这样一种机械印象显然并非帕森斯的原貌，当帕森斯在实践自己的期望时，安吉尔甚至都没能看到他在诉求什么。

帕森斯已经不再谈论这个样子的规范整合了。在他看来，社会共同体是“一

[251] 帕森斯 1965 年 12 月 6 日致西部保留地大学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的埃莱娜·维特查的信函，简要概括了自己该周计划在该校发表的两次讲演的内容；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4, box 21。

[252] Robert Cooley Angell, "Soci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David Sills 主编, 第七卷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第 382 页。

[253] 同上引，引用的是 Edward Shils and Morris Janowitz,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11, 1948, 第 280—315 页。

个作为社会系统的社会中的整合子系统”^[254]。他认为,在整合的庇护下,社会共同体成为“以下两方面之间的首要关联点,一是价值和规范的系统,源于一般行动的文化系统,一是对于社会集合体和规范系统的动机依附,尤其与人格系统相关。”

<246> 根据帕森斯的分析,与文化相关的价值和与规范相关的动机分属理论的两个层次,虽然常常被分离,但却有共同的归属。已有的相当多研究在探讨倾向于共同体的行动时,只关注其“动机性一面”。“诚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讨论了偏离行为,讨论了众多现象根子上的异化,从含糊、弥散的不满,到一心求变的暴力抵抗乃至武装运动。但似乎依然缺乏充分的基础来进行一般化推论。”^[255]

帕森斯希望提供一种理论,能够调和文化—社会之间的交换(分析价值)与人格—社会之间的交换(分析“对于社会集合体和[原文此处漏了‘and’,句意大变,从上文改。——译者注]规范系统的动机依附”)。

这样一来,他就不再是一名结构功能主义者。结构功能主义这个标签被贴在他的系统理论上,直到今天还被广泛使用,但却已经不再切合其理论的实质。他反驳道:“我越来越相信,这种命名并不适当。功能概念并非与结构概念如影随形(correlative with),而是用来分析任何生命系统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框架的主导概念。结构与过程组合起来才可以执行功能,或者说满足功能需求。”^[256]

帕森斯在1967年全美社会学学会第62届年会上宣布,自己的思路的新修饰词是“控制论—进化论”(cybernetic-evolutionary)。他向该次年会的“宏观社会学”分组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分析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社会,勾勒自己新的整合理论。文章统合了他的(新)整合理论的三大要素,最后坦诚告白,用他手书札记里的话说就是:“为何我不再是一名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

三大要素中的第一项就是进化视角。它将分化的动力机制与普遍主义公民权这一目标相协调,并提出有可能发生去分化和倒退。他在自己的札记中留下

[254] Parsons, “Some Problems of General Theory in Sociology” (最初撰于1970年), 重刊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本句引自第250页。他在文中继续写道:“涂尔干无疑是讨论规范要素制度化最为用力的一位经典理论家。”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255] 同上引,第251页。

[256] 同上引,第236页。

了以下文字：^[257]

结构——

原始未分化状态……

两种基本的内部分化类型

等级型 (Hierarchical) — 分层 — 古代神圣合法化

联姻型 (Affinal) — 组团式 (。) 本质上是涂尔干的思路

政治 — 宗教方面的压力或融合……

现代社会，相似的人都是从同一个来源演进而来的 (韦伯)

[文化系统超越了社会]

基本项，新的文化分化水平，社会…… (字迹难辨) 基督教……

教会 (。) 修道会。

<247>

过渡阶段 [17 世纪]……

基本的普遍主义制度 [现代社会的系统]

组团型社会共同体

致力于公民权。

普遍主义的独立法律

科层制

货币与市场

世俗文化制度。……

对比更为“保守”的旧制度社会。

相对区隔

进步型变迁的范式

[257] 讲演札记, "Macrosociology (.) San Francisco (,) Aug. 27. '65," 第(首页, 未标明页码)至 M2 页;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15.20, box 4。方括号中的文字写在文稿页边。

对比各种失败与倒退

——也有创造性的去分化

第二个要素是涵括的特有性质，它并不等于同化。在“分化”的名目下，他强调了通过公民权实现平等；在“涵括—延伸”的名目下，是多元主义；而在“升级”的名目下，则是进步。^[258]

分化

家户 + 就业组织

政府 + 通过公民权实现的社会共同体

涵括—延伸

涵括此前的“低等”阶级——公民权的平等一面。

涵括“新要素”——美国的宗教特性 + 族群特性

升级

经济发展

知识 + 教育

价值一般化——道德共识相对于宗教特殊主义

第三，他把这一新视角与媒介理论相结合，作为具有双重焦点的变项：^[259]

在以下过程中的角色

a) 一般化媒介

货币，权力，影响

b) “信贷”的创造——

从银行业务到克里斯玛

至此，他的讲演札记以最后一句话告终

^[258] 同上引，第 M4 页（着重格式为原文所有）。

^[259] 同上引，第 M5 页。

为何我不再是一名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

帕森斯曾经致函阿米塔伊·埃齐奥尼，答应参加“宏观社会学”分组会（这个组是由埃齐奥尼组织的，另一位发言者是拉扎斯菲尔德）。他承认：“这个主题我很感兴趣，因为这其实正是我眼下关注的核心，我会写一篇论文，大致讨论的是作为社会系统的大型社会。”^[260] <248>

此时，分析被称作“控制论—进化论”式的，他尝试就这样称呼新视角。^[261]

他在说明所谓“大型社会”时，用其分析上的三重概念，即分化、涵括（延伸）与升级，来勾勒“宏观社会学”的基本形貌。这三个概念都属于社会变迁的某一维度。而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整合。整合不仅是抽象的原则，也是具体的成就，当寓于社会共同体时就更是如此。

分析的主旨在于，他的讲演札记重点探讨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巅峰便是美国社会，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他勾勒了一条从“17世纪”开始到“现代社会的系统”的线索。前者的特征是“过渡时代（：）君主制—贵族制（，）族群国民性（，）聚焦型（focalistic）经济”。至于后者，他的说明是“基本的普遍主义制度，组团型社会共同体，致力于公民权”，这无疑说的是他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在60年代已经达到的现实。^[262]

在“构建社会系统理论”一文中，帕森斯开始将自己60年代对于整合的兴趣归之于1958年涂尔干百岁诞辰时重读涂尔干。^[263]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他称赞涂尔干既考虑到了功利主义的不足，也捕捉到了此前卢梭与洛克的利益共同性观念的欠缺，将社会秩序理解为一种变项。“不管怎么说，涂尔干超越

[260] 帕森斯1967年1月20日致埃齐奥尼函，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20, box 4。

[261] 他的讲演札记最后一句话是“为何我不再是一名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第M5页），对此他很可能在旧金山那次全美社会学学会年会上，亲自向听众做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讲演札记开头就提到“有机世界+生物学理论”（首页，未注明页码），并标注了“结构—功能思路对比控制—进化思路”。他还表示要将“既然现在……（字迹难辨）基因+文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认为就连意味着确定性进步的生物学也已经放弃了机械论思维方式。

[262] 讲演札记，“Macrosociology”，第M3页。

[263] 参看Parsons, “Durkheim’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Social Systems”, 收于Kurt H. Wolff, ed., *Essay on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by Emile Durkheim et al. with appraisals of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9), 第118—153页。

其前辈的最重要一步，就是不单纯将团结及其据说与之相关的集体良知处理为给定因素，而是可变因素。因此，他明确区分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264]

行文至此，他解释道：“涂尔干似乎认为，社会和文化越是原始，彼此之间就越是缺乏分化。这种观点理据相当充分。基于这种理论，他深入分析了澳洲土著的案例……不仅如此，涂尔干还莫立了一种极具价值的概念框架，讨论社会发展的形态学——如何理解结构分化的过程，理解随之而来的一般化程度更高的新的整合过程。”^[265]帕森斯还指出，涂尔干已经在三个领域实现了这种分析，即宗教，价值判断，最后是作为社会失范的指标的自杀率。

二、从社会共同体角度概括分层与族群性

大型社会中的整合功能汇聚于社会共同体，因此可以预见持续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新发展趋势。在社会共同体的兴起过程中存在三重动力，其两大主要领域是分层和族群性。

先来看分层。“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与不平等”一文首先认为，(公民)权利方面的平等超越了社会阶级的差异，但在为通过职司界定的角色承担责任时却出现了不平等。因此，帕森斯在讨论“两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专门化背景时”^[266]转向了社会共同体，它们是“其一，……信托综合体”，其二，一般化交换媒介(首先，他讨论了在现代社会也就是民主社会里，影响为何相对居于主导位置)。

关于信托综合体，他强调道，“现代各专精职业”至关重要。它们所呈现的不平等并非基于权力高低，而是出于资格能力。它们的典型社会组织方式并不是等级式的，而是组团式的。事实上，它们就是“教育革命”的典型代表，使现代世界有可能大大降低支配的程度，调和权威与资格能力。

“教育革命”……首先创造出新的团结基础，跨越了“政界”与“商界”

^[264] Parsons, “Durkheim, Emile”, 收于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第四卷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第 314 页。

^[265] 同上引, 第 317—318 页。

^[266]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见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第 342 页; 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之类领域的传统分隔。因此，我所说的专业综合体潜力巨大，不仅可以为社会功能运转发挥强有力的工具性影响，而且也是整合机制的一个焦点。这些作用要想顺利发挥，首先就要将那些基于资格能力和权威的必要分化与平等模式取得平衡。^[267]

帕森斯在1965年为麦吉尔大学准备的讲演稿中，使用了“整合不同于‘同化’”这一口号，谈及另一种动力，并同样表现为调和分化与涵括的多元主义。^[268]“族群性的性质与变迁趋势的一些理论思考”一文初撰于1972年，深入探讨了这一主题。

民权运动兴起十年来，立法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启动，帕森斯在70年代前半期认识到，种族（现在被贴上了族群性的标签）的意涵已经改变。于是他着手刻画族群性的两个特性，只有通过60年代以来的创造性变迁，这两个特性才看得比较清楚。 <250>

其一，族群性是多元的：种族、文化或起源（各自都可以称作族群性）都远不是什么生物学上的给定范畴，早就成了后天获致的身份认同。他认识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具有多元文化性的起源，甚至可以说，具有多元族群性的起源。行文至此，帕森斯引述了大卫·施耐德，后者主张亲族关系在美国也很重要，族群起源绝非“唯一”。无独有偶，再到晚近，大卫·霍宁格尔提醒其听众别忘了，《根》的作者阿历克斯·哈利，他的父亲却是爱尔兰人。^[269]关键在于，“美国的社会共同体不再是其旧有历史观和经典的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族群共同体。……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最为突出，它是一个在族群角度上多元化的共同体，就连此前模糊不清的各族裔亚群体之间的非正式分层，也不再像从前那么重要了。”^[270]

有关族群性的另一项话题就是他称作“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的发展趋势。在“美国社会的族群多元主义”影响下，这种趋势逐渐蔓延：“族裔群体……

[267] 同上引，第344页。

[268] 参看上文。

[269] 参看 David Schneider, *American Kindship: A Cultural Accou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8), 亦参 David A. Hollinger, *Postethnic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270] Parsons,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Trends of Change of Ethnicity” (初刊于1975年), 重印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本段引自第389页。

已经‘去社会化’，转变成基本属于文化—符号性的群体。……比如说，这类群体的成员可以将自己的连带关系落实为政治利益，但……存在某种自愿选择的成分。”^[271]

换言之，族群性成为一个人的“私人化”特性，通常是从可以获得的一系列不同的族群/文化/起源范畴中选择的。这样一来，族群性就丧失了其此前的角色：在教育、职业或其他市场机会等方面是否会受到歧视或排斥的一种标准。

帕森斯知道，这两种极具现代性质的成就尽管预示着民主体制的极致，但依然是前途未卜。美国的社会共同体中的新型现代性已经趋近了这一水平，但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不过，这些美国的探索对于欧洲、非洲乃至整个世界还是鼓舞人心的，展现了未来的前景。“这些……有力地推动着对于族群多元主义的国民社会共同体的承担 (commitment to ethnically pluralistic national societal communities)，这里所说的推动，至少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晚近兴起的美国这样一种共同体的进化问题。”^[272]

他解释道，民主意味着通过分化—涵括—升级这一三重动力机制来实现整合。不过，进化绝非单行道。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会使整合成为一种变项，而不是静态给定因素。有鉴于此，他提醒世人警惕 60 年代世界上许多自我宣称的
<251> 革命运动，当时有各式各样看似进步的学说，大张声势地诉求权利，破坏传统。他觉得，这些都无异于“族群团结与认同的去社会化的对立面”^[273]。比如说，新教原教旨主义群体可以激起信仰奋兴，具有十分危险的反现代意味；或者，“对于拉比卡赫纳 (Rabbi Kahane) 领导的激进的右翼犹太群体，也不应视而不见。”他警告道，在这个社会迅速变迁的时代，它们的教条立场诉诸“‘群体主义’的强化”，昭示着“失范性社会解组和异化”的危险。[卡赫纳这位美籍犹太人及其创建的犹太组织主张以恐怖对抗恐怖，扩张犹太人在圣地全境的势力。其本人于 1990 年在纽约被一位埃及极端分子暗杀，但获得了极其隆重的葬礼。该组织后来在其子主持下继续壮大 (称作“卡赫纳永生”，据信应对拉宾被刺负责)，目前已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译者注]

^[271] 同上引，第 391 页。

^[272] 同上引，第 403—404 页。

^[273] 同上引，第 393 页。下三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显而易见，帕森斯表面上是在讨论新近发展起来并且大有希望的分层和族群性形式，即多元主义的平等主义，但他其实是重拾自己毕生的话题：民主体制对峙反民主的危机。他现在集中考察的是民主体制，非常细致地探讨“作为社会系统的大型社会”，在他看来，这主要就是60年代的今日美国。

但他从未忘记，始终存在一些危险，整合有可能逆转，也就是倒退。他在讨论族群性变迁的文章中写道：“我已经发现，不妨把这种趋势称作……‘去分化’”，“要理解它的性质和意义，应当参照其背景：社会结构的晚近发展中一些非常有力的例证，普遍主义的流动标准，相对提高的自由的发展。话又说回来，这些都有可能轻易转向失范的方向。”^[274]

三、战后美国史中的两段失范情节

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里，保存着一本未竟之书，暂拟的题目叫《美国社会共同体》(*The American Societal Community*) (包括十章断篇)。[此书由 Giuseppe Sciortino 编辑，2007年在Paradigm出版，题为*American Society: Toward a Theory of Societal Community*。——译者注]该书的开篇一章希望让读者熟悉社会共同体的概念，采用了晚近美国史的两个个案。一是水门事件(“行政领导危机”)，一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968—1969年间的“学生反叛”(“高等教育危机”)。

这两则“‘定调’个案”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呈现着动荡，其实正相反，它们典型地体现出“美国社会具有相当可观的整合能力，因为这两例原本很容易迅速升级成严重得多的社会冲突”^[275]。当然，此书写于70年代中期，对这两个“个案”[本节以下的“case”均采用括号，或许要凸显其“案例”、“病案”之意。——译者注]的评判已是动荡减退、尘埃落定之时，而非事件进展、乱局迷离之中。因而也就更能看到，社会共同体中存在某些机制，维护了整合，有助于扭转去整合的趋势。

他回顾道，尼克松的“个案”并非一日之寒，早在尼克松的第一个总统任期，

^[274] 同上引，第393—394页。

^[275] “The American Societal Community. Introduction”，第5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42.45.1, box 1。

就只有一小撮人被授予权力，广大公众和基层政党遭到冷落。1972年的选战暴露出，如果总统要确保再次当选，依赖的却是一群自己都不太干净的人（一个叫做“CREEP”的组织）[意即“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Re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而“Creep”作名词讲有“奴颜婢膝者”、“小偷小摸者”的意思。——译者注]，而不是共和党委员会，那就不再拥有合法的制度了。水门事件直到选举才被送上法庭。不过，一旦公之于众，就招致雪崩式的连串反应，直指总统与其团队行为不端，导致举国关注。帕森斯挑明，面对与道德性相关的法律性这方面的抨击，尼克松团队难以应对，无法逍遥法外。

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山雨欲来风满楼，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世人开始知晓，尤其是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厄文主持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查明，在白宫内部或者是相当接近白宫的人的纵容和/或指挥之下，出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但显然属于非法的行为。因此，法律性与道德性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反对之声很快蔓延。^[276]

另一项指责事关忠诚。“这种偏离之举长远看来易遭攻击的第二个领域涉及忠诚问题，它与政治支持有着密切关系。……当然，尤其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工作的压力下，越到后来越清楚，即便是共和党的铁杆拥趸，也开始舍尼克松团队而去。”^[277]

据帕森斯分析，尽管在危机愈演愈烈之时，多元体制往往会为政府内部的偏离群体提供相当的腾挪余地，但在社会共同体内，还有两块领域是公众施展回击的主要竞争领域。一个是新闻出版界，表现为两大报纸形成某种竞争，“挖掘水门事件的有关事实”，“然后是电讯传媒，尤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快加入竞相追逐的行列”^[278]。另一个领域是法律系统。诚然，法律系统也属于政府，但它最先对企图掩盖实情的反应作出了制裁：当尼克松解散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任命的特别委员会，司法部长和副部长宣布辞职，最后由最高法院宣布，总统的举动属于非法（迫使他交出了出言不逊的录音带）。帕森斯解释道：

^[276] 同上引，第17页。

^[277] 同上引，第17—18页。

^[278] 同上引，第19页。

我们认为，要调动起对于尼克松的偏离宗派的反击，把焦点集中在为
官之人的政治行动的合法化问题上，意义非常重大。这样的反击如果得不
到新闻报章和广播电视激发的真正的舆论运动支持，可能性就会锐减，即
使有所反击，效力也会大打折扣。……国会设立的两个委员会比其他任
何机构作用都大，将压力提升到对总统而言无法承受的地步。^[279]

而就大学的“个案”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大发展趋势汇聚。一
方面，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激增，强化了各院校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学术人员 <253>
或专业人员在社会上的声望降低。帕森斯明白，在这种“教育革命”的影响下，
有许多民众虽然被纳入了高等教育的系统，却仍不习惯“为其本身”而探求知识
会遭受的挫折。与此同时，科学研究乃至整体上的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又大大提
升。这些张力逐渐积累，不过大多数学人并不担心会有麻烦——帕森斯显然属
于夫子自道：

这是一场典型的“期望激增的革命”。对于受影响的学生来说，或
许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们所处的情境充满竞争，对此他们同声抱
怨。……反叛针对的是“体制/系统”(system)本身，并非体制当局被指
的所谓不公正。……更常见的是，抱怨之所指除了竞争，还特别针对非人
性、“非人化”。换句话说，“体制/系统”往往过于注重理性。这就可以理解，
学生们会打着“敢于表达”(expressiveness)之类的旗号来对抗体制。^[280]

帕森斯注意到，最后，到了1971年中，尽管这些抱怨没有一个得到明确的
疗治，动荡却消退了。但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大学基本上只是作出了某
些让步，保持审慎，有时甚至会撤销一些措施，因为它们“对主要制度模式损害
过大”：^[281]

在这个框架内，问题的社会面似乎已经由类似于心理治疗的过程加
以“处置”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协调计划。除了极少数例外，比如极其招

[279] 同上引，第21—22页。

[280] 同上引，第26—27页。

[281] 同上引，第30页。

人痛恨的警察行动……，大学当局、董事会、院系教员等方面的倾向整体上属于宽容与支持。……总体上，通过研究业绩表现出来的专业资格能力的水准始终还占据着主导性。^[282]

用来刻画“美国社会共同体”构架的这两个“个案”表明，要维持社会共同体的整合，存在着多种机制。帕森斯提出，这些机制足以处理哪怕是不同类型的危机。在尼克松的“个案”中，危机已经触及美国政治体的道德基础，而法律系统（包括政府中的相应领域）以及和公众保持联系的新闻界，则证明是长远看来对抗解体趋势的堡垒。在学术系统的“个案”中，危机在于认知理性的涵括与延伸的“增长”，而再整合过程涉及大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就算认知理性的价值观念彻底丧失了显要地位，最终也都重新确立起来了。

有鉴于此，帕森斯概括道，没有任何理由能够看到，在美国社会中有证据表明出现某种“法西斯化趋势”^[283]，“整个‘尼克松现象’”即为见证。也并非像当时所讨论的那样，“在这方面联系到麦卡锡主义，联系到‘军事—工业综合体’之类的地位”。与此类似，既然那些对学生反叛大为哀叹的人属于政治右翼，他们公开反对知识分子，那么解决大学危机的方法就在于重树自信。总之，帕森斯认为，有理由相信，美国社会共同体十分强大，足以维护整合，或者在危机的“个案”中发展出再整合的趋向。

四、“整合过程”

帕森斯在“赋予美国黑人完全公民权？”一文中，在“整合过程”的子标题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行为并非受到强制，而是在社会共同体中构成真正自愿动机的一面（前提条件是享有机会平等与公民权利），它又如何能够具备社会性？当然，这就引出了他对于表面看似功利主义的社会行为基本形式的批评。相反，他强调的是交互性。

詹姆斯·科尔曼评论过他的“论影响概念”一文，帕森斯在答复中将两种行动观并列比较：“我一向使用的基本概念图式始终尝试从交互性的互动角度来思

^[282] 同上引，第30—31页。

^[283] 同上引，第31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考，而不是单向性的图式，即某一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产生效力’。”^[284]他发现，后一种观念不仅在科尔曼笔下有，也体现在霍曼斯那里。他批评两人都基于一种享乐主义的原则来设定社会行为。

他揭示道，这类单向性的概念思路预设，社会组织可以归结为作为基本单元的行动者或行动者的行动，并假定这些基本单元构成了更大的实体，而帕森斯早在30年代就已经斥责了这类预设。自那以后，他对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驳斥丝毫未减其敏锐之处。

现在他把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拿来指责科尔曼，其推论之一就是悄悄回到了功利主义，这势必意味着否定整合及/或接受社会关系中的强制。他抨击道，科尔曼只能把影响概括成一种单方面的现象，“利益群体的主要武器”，但在帕森斯看来，影响是一种可变的互动媒介。^[285]顺着这样的思路，科尔曼就无法领会行动分析的控制论性质，而这正是帕森斯在“论影响概念”一文中发展的。他明确指出，“科尔曼强加给我这样的观点或意思，‘所有的报酬都是金钱，所有的惩罚都是权力。’我当然从来不曾说过类似的话，我的意思恰恰是对这种说法的严重挑战。”^[286]

换言之，60年代的诸多思路宣称要分析经验社会的基本结构甚至是基本要素，但都是误入歧途。帕森斯批评道，使用某种概念图式，仅仅通过使用实例来使论证成立，自称是经验实在论，却并不能证明自己深层的理论预设。这些预设想当然地认为，有可能对社会世界作出据说是无预设的描述（并常常被误当做说明），但帕森斯坚持不懈地揭示，这些思路远远谈不上摆脱了预设，而是有各自关于人和社会的意象，只不过往往被忽略罢了。这些意象呈现出某种“各行其是”的现代人，让人想起秉持萨姆纳和斯宾塞学说的充满思虑的社会学家。对于帕森斯的系统理论，这些思路并不能充当有竞争力的替代选择。

帕森斯毕生不懈地抨击实证主义。那些对自己的视角主义缺乏自省的经验研究者或理论家，尽管看似客观，却从未赢得他的赞同。韦伯自觉意识到，在

^[284] Parsons, "Rejoinder to Bauer and Colema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7, 1963, 第 87 页。

^[285] 同上引, 第 88 页。

^[286] 同上引, 第 89 页。

任何社会学分析中,都必然会采取某种方法论立场。帕森斯知道,对于这个问题,韦伯已经有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他提出了方法论上具有特定性的理念型。韦伯就此引入了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并说明任何给定现象。

帕森斯从《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开始,就避免只在这一点上追随韦伯。他根据自己的方法论视角,主张要警惕“具象误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这种见解首先是由怀特海提出的,然后得到了劳伦斯·亨德森的科学哲学的适当修正,(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约翰·杜威的哲学的适当修正。

帕森斯在三四十年代的立场是:关于社会范畴的模型还在于概念,而不仅仅在于其使用。对此,韦伯曾有表态:“行动之所以是社会性的,是因为借助行动个体(或诸个体)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考虑他人的行为,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进程的定向。”^[287]韦伯已经借助客观意义区分了三类针对他人的行动取向,即理性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帕森斯在有关社会行动结构的双翼观念中,采纳了韦伯对于理性行动的诉求,并融合了涂尔干的失范概念。

帕森斯全心赞同韦伯的主旨:两个行动者在彼此为了实现意义的共同取向中存在的交互关系,本身就是基本单元。不妨说,没有任何社会学可以高于或低于这一层次。

帕森斯不折不扣地追随了韦伯在方法论上的警示,在《社会系统》一书的开篇就明确支持韦伯的概念思路。他把这作为自己从事的分析的参照框架(比如说,“行动参照框架”就是分析社会系统时所使用的视角)。他在60年代的立场就是坚定地基于这一背景。从霍布斯和大卫·李嘉图等代表人物的早期功利主义,经过马尔萨斯主义最终到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经济功利主义”的代表,这是思想史
<256> 的一条脉络;而从康德与黑格尔的观念论,经过19世纪晚期德国哲学,以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为巅峰,这是另一条思想脉络。根据帕森斯1964年的概括,欧洲学术中这两条脉络的发展,就是韦伯的创造性成就的前导。帕森斯曾经参加德国社会学学会纪念韦伯百年诞辰海德堡大会,在相关研讨会上提交了

^[287]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alcott Parsons 编辑并撰序(New York:Free Press,1964;最初由 A. M. Henderson 与 Talcott Parsons 翻译,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第88页。

一篇论文，后来还将其扩写成“现代思想学科的统与分：社会科学的角色”一文，刻画了这两条思想脉络，而韦伯的社会学就是针对这两条脉络的某种权威总结。

根据他的叙述，功利主义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中有所发展，“看起来，最好是在接近哈列维所说的适用于19世纪早期的‘哲学激进主义’意义上，把这种运动称为‘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这门科学(science)的主要轮廓就是从中孕育出来的，起初或许有着极为牢固的根基。”^[288]他还指出，另一股传统，即观念论，引入了“精神”(Geist)的观念，因此促成了科学(他用的是德文原词“Wissenschaft”)的发展。^[289][德文此词比英文的“science”词义更宽，包含了非自然科学化的各门学术。——译者注]

他强调道，只有韦伯(以及同期但独立的涂尔干)超越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之间、“原子论潮流与整体论潮流”之间的二元对立。^[290]韦伯(和涂尔干)调和了功利主义与观念主义—历史主义这两股传统，使人们理解了真正独立的第三种科学方向，也就是社会科学。按照帕森斯的解释，韦伯自己的学术训练是做一名律师，但他立意理解经济过程，发现经济现象不单单是“物质性”的。相反，在“情境界定”中，“物质论的”力量还伴随着精神性的力量：“关键在于，韦伯的分析以新教伦理命题为核心，弥合了经济学—心理学意义上的‘需要’和观念论意义上的‘文化模式’之间的理论鸿沟。”^[291]

有鉴于此，帕森斯强调韦伯的创造性成就，开始调和意义的文化模式与个体的人格。基于个体在社会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自由，他可以把“整合过程”解释成既涉及价值，也涉及动机。（“基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们在拥有选择自由之后，事实上还会选择某一种而不是另一种个人目标和实现该目标的手段。”）：^[292]

[288] Parsons,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Disciplines: The Role of the Social Science", *Daedalus*, vol. 94, 1965, 第39—65页, 本句引自第44页。在这篇文章中, 他不仅引证了不久前再版的霍布斯《利维坦》, 而且还提到了1960年再版的哈列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

[289] 同上引, 第48页。

[290] 同上引, 第49页。

[291] 同上引, 第57页。

[292] 同上引, 第53页。

<257> 简而言之，极而言之，韦伯的解决之道就是，一旦意义的文化模式被内化到某一个体的人格之中，它们也会界定动机结构化的情境。因此，要想回答行动（包括接受其所导向的目标）如何有意义的问题，就必须诉诸界定行动情境的意义系统。因此，韦伯所设定的并不是给定的需求，而是给定的对于情境（人的境况）的文化界定，这使对于满足某些类别的需求的承担变得合乎情理。^[293]

帕森斯认为，韦伯的方法论视角主义的基础在于，作为人文—文化研究的主题，意义系统无处不在。在对这种立场大加赞扬的同时，帕森斯还诉诸涂尔干来予以完善。他补充道，涂尔干已经认识到了韦伯几乎忽略的东西。韦伯假定，在历史进化中，理性化的趋势是普遍渗透的；但涂尔干始终很清楚，这种趋势可能受到失范的阻碍或否定：“如前所述，对于界定情境的规范模式的内化，其基本主题已经由韦伯作出了部分的阐述。而涂尔干在关于自杀和教育的研究中，也就是通过他著名的失范概念，大大推进了有关的分析。”^[294]

当然，这个概念还关联着人格、文化与社会秩序：“失范这个名目，指的是这种关联未能稳定地落实为规范系统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关联。在这个基本点上，涂尔干与弗洛伊德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们有着令人惊讶的会通之处……，尤其是乔治·赫伯特·米德。”

根据帕森斯在“构建社会系统理论”一文中的描述，当他在“晚期”著作中重读涂尔干，他开始认识到涂尔干是多么强调社会整合的必然要求。对涂尔干来说，现代世界之所以危机重重，就是因为现代社会难以抗衡极度扩张的分工。帕森斯在这篇“个人治学史”中告诉读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是，事实上涂尔干早就把包括集体良知在内的社会存在都理解为变项，而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才取得这种概念上的成就。

此前，帕森斯始终都假设，在整合与失范之间存在某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现在他认识到，这两极在何等程度上其实都是变项。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就已经将涂尔干与韦伯的著述都融入（标志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293] 同上引，第57页。

^[294] 同上引，第61页；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的) 失范与整合一体的社会秩序之间的二元对立。在《社会系统》中, 他以起到阻碍作用的那些社会为背景来分析整合, 比如国家社会主义, 这是一种偏离的系统类型。到了50年代, 他从变项(“模式变项”)的角度来领会价值取向, 以求对社会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作出类型化概括。他还引入了行动过程图式, 包括四个阶段, 作为系统功能(A—G—I—L), 而其逆序各阶段则反映出社会化与社会控制的过程(L—I—G—A), 这是变项观念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式。

到了60年代, 他创造出互动媒介的图表, 而这些媒介显然都是变项。最后是社会共同体的观念, 他的分析图式就此完成。由于它代表着一种向心力量, 抗衡着离心性的分化趋势, 能不能把它本身看做某种可变现象?

真的可以吗? 他得到的证据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258>

他首先使用社会共同体概念的那些社会, 是比较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等古代社会。他用社会共同体这个术语来指称希腊的城邦, 尽管在事实上, 奴隶或妇女之类的成员范畴被排斥出构成其成员之间平等的那种统合体。无独有偶, 他还谈到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来建立社会共同体, 尽管在事实上, 迟至20世纪60年代, 黑人仍被排斥出广泛的宪政权利。与此类似, 他还把国族(nation)说成是与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一样, 尽管在事实上, 几乎在全世界, 国族内部都往往区分成好些部分的人口, 有些享有特权, 有些则遭受歧视。

而根据帕森斯的分析, 肯尼迪政府所推动的社会变迁, 至少确立了全体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司法基础, 他为此大声欢呼, 美国已经迎来了社会共同体。他具体指明, 全体公民终于获得了公民权。这或许意味着, 他倾向于认为, 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 尚不存在任何社会共同体。问题就在于: 在至少从18世纪开始就成为人口一部分的黑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之前, 是否存在一个社会共同体?

我发现, 这两个观念在他的著述中是并肩出现的。看起来, 前一种概念理解将社会共同体作为一个范畴, 而不是变项, 而后一种概念理解则把社会共同体当成一个变项。

概括一下帕森斯本人用来解决问题的证据: 在帕森斯的社会观中, 社会共同体标志着整合。而纵观其著述, 整合又标志着民主, 与(从极权主义到传统主义的)独裁专制相对立。(与分化平行发展的)整合意味着现代化, 与倒退或欠发

展相对立。鉴于社会共同体是民主体制的典型缩影，它也是一种变项，因为它标志着整合性力量的呈现，而这种呈现程度从民主政权到专制政权，中间有许多变化。帕森斯在“赋予美国黑人完全公民权？”中的“整合过程”一节里，是通过行动者的交互取向来谈社会共同体的。他认为，黑人和白人（或其他人，视情况而定）作为个体的地位越重要，这个社会就越是民主。其后果便是人道主义，哪怕社会现实令人困惑。他在自己讨论族群性的性质与变迁趋势的文章中宣称：“一个社会变得越是复杂，越具有多元主义倾向，……它的功能运转就越是依赖于基本单元的决策自由，依赖于促进并引导这些决策的一般化机制。”^[295]

有鉴于此，关键就在于，行动取向与功利主义截然不同，是交互性的。他抨击霍曼斯，接续了自己在1935年申明的信条，即行动者是一种“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有评估能力的生物”^[296]；继续倡导意味着个体性的多元主义。早在60年代初期，当帕森斯与温斯顿·怀特联手撰文，批评大卫·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时，就已经提出了类似观点。他主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选择是一种恩惠而非负担。^[297]他反对里斯曼的文化悲观主义，后者哀叹，那种自足的“内在导向的”个体，在现代世界中已经难觅踪影。帕森斯反驳道，选择的自由在现代美国盛行无阻，标志着相对于19世纪容纳度较低的文化而言的进步。

因此，“整合过程”标志着现代美国的社会共同体，以多元主义为背景，产生出某种多样性的氛围。不过，无论是什么构成了“整合过程”，其中都包括情感纽带，能够产生认同。当然，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身份是需要认同的。至于社会共同体如何能够促进黑人的整合，帕森斯“强调的是情感的范畴，因为它具有人际整合的意涵……同时，它还能够‘通向’更为原初的动机要素，尤其是有机体层面上的性欲。”^[298]

帕森斯认识到，在把握或促进整合过程（构成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纽带背后，

[295] “Equality and Inequality”，第355页。

[296] 参看“The Place of Ultimate Values in Sociological Theory”一文的开头一段，*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45, 1935, 第282页。

[297] 要想把握选择的关键角色，参看Parsons and Winston White, “The Link Between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见Seymour M. Lipset and Leo Lowenthal, eds., *Culture and Social Character: The Work of David Riesman Review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第89—135页。

[298] “Equality and Inequality”，第355页。

还隐藏着一些心理力量。他开始理解，社会纽带在人格上的两个相关范畴，即认同与内化，激发了归属和关联的体验：

这就意味着两样基本的东西。其一是我们所称的认同，意思是说在动机方面“接受”——或者在“深层”动机层面“承担”——集体系统中的成员资格，而最值得注意的集体系统便是社会本身。如果从对于集体系统的功能的角度来看，这在本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团结/连带。其二，某种优先系统的内化，该系统确定了个体的多重成员期待的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集体单元。^[299]

当然，认同与内化这两种心理过程首先是由弗洛伊德发现的[“identification”在弗洛伊德那里多译为“自居”。——译者注]。（他从作为一种社会层面现象的群众形成的角度分析了认同。）^[300]帕森斯在50年代重新分析了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的观念用于理解社会化这一迫切任务，以及个体与整体社会之间的关系。^[301]他的认同观念不同于弗洛伊德，成为1961年出版的文集《帕森斯的社会理论》<260>中一篇评论的焦点。^[302]现在，他将认同与内化融入了人格在社会世界中的对应范畴，也因此发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前者在一个分化了的社会里自愿行事以服务他人，后者促成了其成员行动取向中的无利益关涉性质。后者是通过社会共同体发挥功能的，其中的行动者以制度为场所和渠道实现了自己，因为他们可以并愿意接受这些制度作为属于自己的制度。

^[299] 同上引，第356页。

^[300] 例如可以参看 Sigmund Freud,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Vienna: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21), 英译本为 *Crowd Psychology and Group Analysi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5)。在这部论著中，弗洛伊德分析了自我超越性的认同过程，它们在军队或教会之类大众组织中非常常见。他提出，超我会作为简约化、理想化的心理动因而存在，以确保遵从，但它也会成为认同的场所，同时有利于人与社会。由此观之，内化可以作为一种个体化过程而发生。尽管帕森斯采纳了认同与内化的观念，认为它们在个体行动者层面上预示了社会共同体，但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了弗洛伊德。

^[301] 他的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是部分这类文章的选集，大部分写于50年代。

^[302] 参见 Urie Bronfenbrenner, “Parsons’s Theory of Identification”, 收于 Max Black ed.,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第191—213页。

第八节 小结

在学界的许多圈子里,帕森斯在60年代的“晚期”理论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章重新构建了他在这十年(并延续到70年代)所提出的两个理论模型。他试图理解充分发育形式下的现代民主体制,正视经历近乎革命的结构性的社会变迁这一历史突破的美国。

第一个模型以四大互动[一般符号化(*generalized symbolization*)]媒介为核心。该模型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变化。其一,民主促成了媒介参与大大扩张,以至于每一位公民都能够拥有收入、投票权等等。但专制(或其潜在的前导性运动,比如麦卡锡主义)往往将媒介拥有的渠道限制在少数人身上,类似于某种“金本位”紧缩经济。不仅如此,四大媒介还形成了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等级序列。这种等级序列将政治权力置于货币之上,影响又在政治权力之上,这意味着当社会倒退时(比如出现麦卡锡主义),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层次将下降。最后,他通过一般化媒介理论来重新探讨分层问题,揭示了一个平等主义获致取向的社会里,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个模型以分化和去分化的动力机制为核心。它认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在于社会共同体。后一个概念首先是在进化论说明背景下提出来的,后来成了新的公民权学说的核心要旨,以马歇尔的三重焦点说为依据。帕森斯解释道,分化、涵括与升级构成了“宏观社会学”中弹性的分析图式。他通过呈现“国族、族群、种族”乃至宗教的多项议题,体现自己的理论如何切合60年代的诸般事件。推到极致,便是认同孕育了自愿的承担,后者又产生了忠诚,这是一个非等级性共同体中的非强制性效忠力量。他重新阐述了分层,认为它引发了对于信托服务的专业责任,并在“去社会化”的影响下,引发了孕育“新”获致(选择)范畴的族群性。

为了捍卫民主体制,帕森斯开启了全新的视角来探讨社会学中最为棘手的一些问题。他不仅将分层及族群性与民主体制下的平等权利相调和,而且证明,在自己所处时代的动荡背后,隐然是朝向进步的趋势:多元主义通过分化实现演进,在这种演进过程中,蕴含着控制论等级序列。这样一来,在美利坚的建国信条“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中,就显现出一种社会学的理据。

附论 变迁与危机的三个领域

作为附论，我打算将帕森斯的社会学分析与他个人参与的当代事件三块领域相联系。对他来说，这些最初都属于针对社会变迁的研究议程：公民权利，“新左派”（大学学潮），以及美国卷入越战，这在冷战时代，表面看似反共攻势。

他为《美国黑人》一书写的绪论题为“为何‘现在就要自由’，而不是昨天就已得到？”，评论了种族问题，点明所谓机会平等其实付之阙如，令人难以接受。而对于60年代中期的另外两块危机领域，这也是根本原因所在。他首先指出，民权运动

对于推动某些特定的变迁，比如学校、小餐馆、公车站等地的去除种族隔离，显然是直接致因。不过，它更为重要的功能还是符号性的；它将道德问题给戏剧化了，使旧有做法的具体延续在道德上变得难以容忍。……运动……有助于眼下美国社会在道德上“重振生机”。……关于社会变迁的运动的一般化，这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实例，……比如公民权利。……所谓的“新左派”……以青年人和公民权的凸显为核心……比如……最初体现于CORE，然后是更激进的SNCC。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大体而言，在另外两个重要的背景中，也就是高等教育（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伯克利）和美国卷入越战，现在实施反抗的其实是同样的群体。^[303]

在帕森斯的理论观点看来，这三个领域属于同一场运动。关键在于公民权在美国社会里的扩张。但民权斗争的狂热扩展到了有关大学学潮的论坛（比如“新左派”）和反越战的行动上。“种族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始终在孕育着压力”，他如此分析60年代的动荡，正好肯尼迪时代释放出勇敢尝试更多民主的可观意愿。“1954年最高法院的裁定带来了第一次重大爆发；然后发生了小石城事件，它所凸显的不仅仅是南方诸州的抵抗，而且是联邦政府的消极被动。随着开

^[303] Parsons, "Introduction: Why 'Freedom Now', Not Yesterday?" 收于 *The Negro American*, ed. Parsons and Kenneth B. Cla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 第 xxv—xxvii 页。首字母缩略词“CORE”代表种族平等大会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SNCC”代表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明的民主党政府在 1960 年当选，期望也开始迅速攀升。”^[304]

他确信，三种运动有着同样的起源。事实上，只有在肯尼迪被刺之后才有可能分开。根据他的判断，这三股运动同样源于争取公民权的议程，那么，他个人又是如何与这三股运动相关联的？

<262> 一、公民权利

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社会学就在处理有关种族和种族歧视的问题。新政期间，在公共事业振兴署 [原文为“Works Program Administration”，但“program”似应为“progress”或“projects”，简称 WPA，罗斯福建立该政府机构，以解决大萧条时大规模失业问题，是新政时期及美国历史上兴办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政府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1935 年至 1943 年，该署先后为大约八百万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在美国各个社区广泛资助建设公园、桥梁和学校。——译者注] 指导下，美国青年委员会 (American Youth Commission) 针对黑人青年的生活处境和机会，实施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其中有许多在 60 年代重刊于世。沃纳及其同事针对芝加哥南区 (South Side) 的贫民窟人口，调查了肤色对于人格发展的效应。^[305] 多拉德发表了两部出色的研究报告，一部是《一个南方城镇的种姓与阶级》^[306]，另一部是与艾利森·戴维斯合著的《受束缚的孩子们》。^[307] 其他还有好多，就举这两例吧。他们的分析要点在于，黑人实际上被锁定在某种种姓体制中，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融入主流社会。^[308] 缪尔达尔受托进行过一项研究，并以《美国的困境》为题发表，生动地刻画了陷入贫困与被剥夺选举权的状况。^[309] 1962 年，豪泽根据 1960

^[304] 同上引，第 xxiii 页。

^[305] W. Lloyd Warner, Buford H. Junker, and Walter A. Adams, *Color and Human Nature: Negr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1), 由同一家出版社代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教育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f Education) 于 1969 年重印。

^[306] John Dollard, *Caste and Class in a Southern Tow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7, 重刊于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7)。

^[307] Allison Davis and John Dollard, *Children of Bondage: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Negro Youth in the Urban Sout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0)。

^[308] 例如可以参看 W. Lloyd Warner, “American Caste and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2, 1936, 第 234—237 页。

^[309]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the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重刊于 Harper and Row, 1962); 亦参 Obie Clayton, ed., *An American Dilemma Revisite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6)。

年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结论，全国非白人人口的收入中位数只是白人人口的 54%，其中，在南方仅为 43.4%，北方也不过只有 70%。^[310]

1963 年，李普塞特概括了亚非各“新国族”的民主化的前景与陷阱，然后用来说谈美国：

当然，美国的平等主义只是针对白人而言的。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黑人所受的待遇都是对这种价值观的嘲讽，在 19 世纪早期，当欧洲左翼和自由派直指美国是一个展现平等与民主之生机活力的国家时，美国也是一片盛行奴隶制的土地。奴隶制的创伤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心底。美国的价值体系与黑人所受待遇之间矛盾鲜明，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迫使许多美国人以更加严厉的方式看待黑人，而如果他们生活在一种更加明确其先赋性的文化里，或许还不那么过分。在一个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里，压制黑人之类的群体是毫无正当理据的，除非把他们界定为与生俱来的劣等种族。^[311]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经帕森斯提议、美国文理学院策划，召集了一次有关贫困和种族问题的会议，由帕森斯和克拉克联合主持。克拉克本身即为黑人，是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社会心理学教授，社会动力研究所（Social Dynamics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312]帕森斯自己提交了“赋予美国黑人完全公民权？——一个社会学问题”的论文。^[313]

^[310] Philip M. Hauser, "More From the Census of 1960",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07, 1962 (Oct.), 第 37 页。1960 年开会讨论原始数据，帕森斯也曾与会。

^[311]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第 330 页。

^[312] 会议论文最后出版时，首先以《代达鲁斯》两期专号的形式问世，其中包括豪译讨论“黑人整合中的人口学因素”（“Demographic Factor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gro”）；莫伊尼汉不久前刚从约翰逊政府劳工部长助理职位上退下来，撰文探讨了“黑人家庭的就业、收入与考验”（“Employment, Income, and the Ordeal of the Negro Family”）（帕森斯觉得这篇阐述非常有指导意义），还有托马斯·佩蒂格鲁讨论了“美国种族模式中的复杂性与变迁：社会心理学的观点”（“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American Racial Pattern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View.”）。

^[313] Parsons, "Full Citizenship for the Negro American? A Sociological Problem", 收于 Parsons and Clark, eds., *The Negro American*, 第 709—754 页。

帕森斯探讨的主题是：黑人成了二等公民，如何能够有效改变这种状况。“在这个序列中，黑人站到了‘底线’。他的状况成为最严重的（因此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有根据的）排斥依据，也就是其与生俱来的低劣性。涵括黑人这一问题如果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肯定将是美国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在我们的时代，它将不会得到充分的解决。”^[314]根据他的解释，马歇尔的公民权观念并非对于美国社会的单纯描述，而是一种诉求。“从这些权利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规定，到能够切实有效地贯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社会的许多领域，这个过程依然在推进之中。”^[315]“歧视可能在广泛的机会领域得到废除，或尽可能减小，尤其是在就业领域。但如果可以矫正的障碍继续通行，就算不存在歧视，也是‘一纸空言’。”^[316]

他具体谈到，关键并不在于标语口号，而在于清晰明确的规范性程序规则：“在小石城，福布斯州长蔑视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公允之见’，而且是依法构成的联邦法院所颁布的一项专门法令。”^[317] [面对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黑白分校的判决，堪萨斯州长Faubus命令州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就读，总统艾森豪威尔不惜动用101空降师护送入校。——译者注]

然而，尽管事实上留有大块污点，像美国的黑人公民，尽管有各式各样的倒退时段，但“美国在涵括进程方面的记录”却还算不错：

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吸纳问题导致美国共同体遇到了一场真正的危机；它或许是本世纪的社会张力和动荡的主要焦点之一。1924年的《移民法》基于1890年人口普查的国籍构成建立了配额体制，就是这种张力的显著症候。……从20年代的“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一战结束后，米切尔·帕尔默就任美国司法部长。国内三K党人横行，禁酒法令无效，罢工事件频发，社会思潮激荡，就连帕尔默的寓所也给人半夜扔下炸弹。国会拨出专款，令司法部着手对全国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激进团体进

[314] 同上引，第748页。

[315] 同上引，第717页。

[316] 同上引，第718页。

[317] 同上引，第720页。

行大规模清查。而日后执掌联邦调查局半个世纪的胡佛也正是从这场行动开始发家。——译者注]和萨科—万泽提案[“Sacco-Vanzetti case”，这正是胡佛上台后的第一桩大案。1920年4月，马萨诸塞州一家鞋厂的出纳及警卫被两名男子抢劫谋杀，三个星期后，两位意大利移民萨科和万泽提被指控杀人，七周审判后，罪证不足，但两人仍被判谋杀罪及死刑。——译者注]到50年代早期的麦卡锡时期，这类大规模的“外来”群体在我们中间的存现，引发了实实在在的不安与焦虑，而它们与对“非美”势力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也脱不开干系，之所以如此，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够理解。^[318]

话又说回来，“黑人之例”并不只是意味着将另一个族群涵括到“多元化”的持续进程之中：“在这一点上，肤色象征着劣等，因为这意味着有正当理由将作为一个范畴的黑人非常彻底地置于量表的底部，以至于只是勉强可谓在系统/体制内。”^[319] <264>

种族和贫困结成了邪恶同盟(unholy alliance)，这几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两者相互增强，难以抵挡，几乎成为都市贫困住区最典型的特征，再加上犯罪率和辍学率居高不下，并且很少有能够充分利用所拥有的本来就很不好的资源：“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贫民窟’。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有价值的成就表现方面各种实际的低能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包括贫困、健康不良、教育水平低下、家庭解组、越轨，以及其他种种反社会现象，相互增强。在这里，都市共同体本身的结构成为突出的问题焦点。”^[320]

目标固然明确，但实现目标的征程却是充满艰辛。“美国现在似乎已经完全进入了第三阶段。它最重要的特性或许是从关注狭义上的福利，转向广泛的健康、教育及都市共同体的实质，而最尖锐的聚焦点就是居住模式。”^[321]

以此为出发点，他继续分析涵括进程，最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塞尔玛的游行示威者中出现了天主教的修女，这是一个新的标志，其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

[318] 同上引，第 725 页。

[319] 同上引，第 734 页。

[320] 同上引，第 738 页。

[321] 同上引，第 737 页。

不为过。”^[322]

“我们正处在一场社会变迁的进程之中，(价值和规范的)这些要素都在发生变化，而不仅仅是利益。”^[323]这就是他对民权运动的历史意义的理解。^[324]为了具体落实他对于这些变迁的历史意义的解释，帕森斯还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文章。^[325]

1968年12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决定设立一个非裔美国人研究项目(Afro-American Studies Program)。哈佛和拉德克利夫两校非籍与非裔美籍学生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frican and Afro-American Students)的黑人学生，作为项目常设委员会(非裔美国人研究委员会)经选举产生的成员，有权决定甄选委员会(Afro-American Search Committee)的运作规则，通过该委员会寻找预想教职的合适候选者。帕森斯成为甄选委员会的主席，亨利·罗索夫斯基成为常设委员会主席。帕森斯草拟了一些规则，认为要想避免让人觉得非裔美国人研究项目在学术上不如该校其他系科，这些规则就是不可或缺的。他在“甄选委员会的有关问题”这一标题下，列出了自己觉得(并在会上讨论过)有助于使非裔美国人研究与哈佛其他科目并驾齐驱的一些事项：

1. 总务管理委员会(General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的成员构成？
2. 没有学生否决票
3. 资格能力优先于种族身份。绝不要求教职员皆为黑人。……
4. 如果主席是黑人，是否其他所有人员都得是黑人？
5. 各层级上各设置几个职位？
6. 委员会成员人数[。]4名教员，1名白人学生？罗索夫斯基的建议。^[326]

[322] 同上引，第740页。他指的是1965年春，3000民众在马丁·路德·金的率领下，向密西西比州[原文如此，应为亚拉巴马州。——译者注]的塞尔玛(Selma)行进，以支持那里的黑人获得投票权。游行持续了五天，这是整个民权运动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

[323] 同上引，第742页。

[324] 同上引，第750页。

[325] “The Negro American as Citizen”(为《华盛顿邮报》所撰文章的草稿，写于1965年，但似乎从未刊行)，见帕森斯档案，HUG(FP)-42.41, box 4。

[326] “Questions on Search Committee”，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10, box 1(这份单子上的第四个问题是“秋季学期休假”，事关帕森斯本人的时间安排)。

1969年4月10日，激进派学生占领了哈佛大学行政楼（University Hall），强令教职员撤出该栋建筑。他们的抱怨之一是哈佛大学未能充分满足非裔美国人研究的需求。因此有人建议重组该委员会，以舒缓对于校方不予重视的不满。理由就是此前的4月7日，“为有可能专修此领域的学生召开了一次会议。……有‘传言’常设委员会章程有变。但关于此事，没有与任何黑人学生有任何官方沟通。这种对于黑人学生意见的公然忽视仍在延续。我们要求结束这种轻忽态度。”^[327]

哈佛发生这些事件之后，罗索夫斯基辞职。但帕森斯仍在不懈努力，要办成非裔美国人研究项目。甄选委员会在细致磋商了15位可能候选者之后，于4月16日召开会议。根据会议纪要，就有关“常设委员会及本委员会的地位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纪要继续指出：“帕森斯教授指出，如果在明日的教授会议上，解散常设委员会的动议获得通过，就将解散甄选委员会。此言即出，三名学生出外密商。回座后，克雷格·沃森说黑人学生打算在教授会议上提议，即使常设委员会解散，甄选委员会也将保留。”^[328]显然，帕森斯为甄选委员会的工作殚精竭虑，令人景仰，赢得了学生（甚至是激进派学生）的尊重。

尽管动荡重重，帕森斯还是继续努力主持甄选委员会的工作，要为哈佛的研究项目找到在学术上已经牢固确立地位的同事。其后三个月，他联系了20多位学者，邀请其来哈佛任教，包括肯尼斯·克拉克、圣克莱尔·德雷克、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詹姆斯·吉布、查尔斯·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爱德华兹等人，<266>以及理查德·克洛尔德和威廉·拉波夫等已经在相关领域有所成就的候选人。然而，他的紧急接洽中没有一桩获得遵奉。他所联系的绝大多数人都告诉他，觉得自己不想离开现在供职的大学。

从7月1日开始，帕森斯接受哈佛大学为年过六十的老教授提供的半薪项目。8月5日帕森斯卸职，从秋季学期开始休学术假。甄选委员会中的一名学生委员专此致信文理学院院长，对帕森斯在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欣赏和感谢。

^[327] 四页打字稿，起首句为“我们希望在方案中首先指出”，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10，box 1。

^[328] “Minutes of the Afro-American Search Committee, 4/16/69”，第3页；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10，box 5。

总之，帕森斯为了确证自己的分析，即黑人争取民权是 60 年代社会变迁最迫切的议程，不仅呼吁赋予黑人完全公民权，而且在哈佛校内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创建非裔美国人研究项目，出现于 1968—1969 年的该项目后来发展成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事实上，委员会最初考虑的候选人中不乏日后功成名就之辈，其中一位就是奥兰多·帕特森，他日后成为哈佛社会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

二、大学学潮

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学术自由的主题始终占据了社会学。在哥伦比亚大学，麦基弗领导的全美学术自由调查计划（American Academic Freedom Project）开展了一些重要研究，考察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329] 麦基弗在综合报告中警示了麦卡锡主义的危害，开篇一章即明确指出：“我们要考察的是，目前有关共产主义渗透的指控，以怎样的方式把矛头对准我们的顶尖院校。……发出这些指控的人假借爱国主义的名义，激起了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原始情感，脑子里充溢着非理性，憎恨分歧，强求遵从，尊奉迷信，躲避真理，恐惧致盲，不辨敌友。”^[330]

另一项研究将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拉扎斯菲尔德在共和党基金的资助下，于 1955 年春主持研究，因被指控缺乏忠诚而面临被开除或拒绝晋升的威胁，在多大程度上恫吓了学院教授，影响其人格、风格或教学主题。^[331] 他使用了精心设计的长篇问卷，测量了答卷人的担忧和警惕倾向，构建了一套焦虑指标，半数教授得分不高，三分之一教授得分中等，六分之一得分很高。他发现，比较焦虑

^[329] 以 1952 年出版的一本经典文选为前导，1955 年同时出版了三本研究专著，即 Richard Hofstadter 的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Colle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研究学院教育的早期历史；Hofstadter and Wolfgang Metzger 的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强调美国大学基于学术自由原则的缘起 [20 世纪早期取自德国大学著名的教学自由 (Lehrfreiheit) 与学习自由 (Lernfreiheit)]；以及绝非最不重要的 Robert MacIver 所著 *Academic Freedom in Our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330] MacIver, *Academic Freedom*, 第 30—31、32 页。

^[331] Paul F. Lazarsfeld and Wagner Thielens, Jr., 并附有 David Riesman 所撰调查报告, *The Academic Mind: Social Scientists in a Time of Crisi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8)。

的院校教授不是比较消沉，倒反而更加积极。这使他开始讨论“警惕行动主义”（cautious activism）。最后他得出判断，原则上，专业人员的心智是非常开放的，倾向于自由主义，倡导公民权利，反对控制政见。然而，一旦发生所谓的指控或弹劾事件或风波，就很容易孕育出焦虑，并可能从中发展出警惕。拉扎斯菲尔德把麦卡锡主义那一段称作“艰难岁月”，并警告道（早在1958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受到了相当广泛的威胁。”^[332]

这项研究集中考察了教授，另有几项研究考察了学生的类型和心态的剧变。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医学院的入学初期与行将毕业时，理想主义高涨；而在漫长的就读期间，则明显表现出厌倦无聊和实用主义。^[333]另一项研究最初是在瓦萨尔学院（Vassar College）做的，并补充以一部文选《美国的学院》^[334]，分析了学院如何作为一种亚文化，求学的经历如何改变了学生本人的人格，而不仅仅是其专业知识水平。^[335]

1964年伯克利学潮骤起，此后的一些社会学阐述立场鲜明，支持他们眼中激进派学生的正义事业，而另一些阐述立论则更为持重。有一部文集汇聚了纪实报道和理论分析，并辅之以积极参与者的自述及其他一手材料，题为《伯克利学潮》^[336]，诉诸韦伯来理解事件：

如果说学生被界定为不负社会责任，他们也被鼓励成为理想主义者。家庭、教会、学校等价值传承机构往往以绝对正误是非的措辞来表现道德。德国社会学名家马克斯·韦伯尝言，青年人往往会遵循“绝对目的的纯粹伦理”，而成年人则常常会倡导某种“责任伦理”。……大学生尽管受过良

^[332] 同上引，第264页。

^[333] Howard Becker, Blanche Geer, Everett Hughes and Anselm Strauss,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334] Nevitt Sanford, ed., *The American Colleg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gher Learning* (New York: Wiley, 1962).

^[335] David Riesman and Christopher Jencks, “The Viability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以及 Christopher Jencks and David Riesman, “Patterns of Residenti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Harvard”, 分别刊于 Sanford, ed., *The American College*, 第74—192页、731—773页。

^[336]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heldon S. Wolin, eds., *The Berkeley Student Revolt: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Garden City, N.Y.: Anchor [Doubleday], 1965).

好教育，却一般不曾确立起对于成人制度的深切体认；他们尚未通过经验的磨砺，认识到自己未臻完善。^[337]

在同一文集中，社会学家纳坦·格莱泽和菲利普·塞尔兹尼克两篇文章立场针锋相对，体现出冲突中正反两方的立场。格莱泽表态，学生行动最糟糕的后果在于，大学当局的缺陷难以弥补，揭示了制度本身的脆弱之处。而塞尔兹尼克则觉得，“学生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去倾听。我认为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并且大大超额了。”^[338]他对“依法维稳”（law and order）的政策提出谴责。“守法是一条双行道。坚持遵守规则的人，也应当准备好为这些规则本身提供正当化理据。……我所遇到的支持学生的人，绝大多数热诚、坚定，具备基本的道德觉悟，对此我印象深刻。”^[339]格莱泽则回应塞尔兹尼克，“毫无疑问，了解到FSM中的学生也都参与了为黑人争取正义与平等的更大范围内的斗争，就使得许多教员难以明晰其行动是非……但是，这世上没有任何运动能够不受扭曲，免遭败坏，就算是争取良善与公正的运动。”^[340]

总之，学生对于学院教学的风格或内容的抗议始终还算温和，相形之下，针对反越战或要求改变入学申请标准或程序的政治性问题的抗议就火爆得多，后者旨在促进以非裔美国人（这是他们才获得的称呼）为主的此前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群进入大学。1968年夏天在哥伦比亚大学，1969年4月在哈佛，校方与学生之间的对峙最终都导致校长要求警察进驻校园。

丹尼尔·贝尔担任编辑的《公共利益》杂志曾经出版一期大学专辑，不久即以书的形式单独刊行，即《对峙：学潮与大学》。^[341]帕森斯在其中也有文章，最终向世人揭示，学生一味激进（教员的合谋或纵容无异于火上浇油）导致了失范，

^[337] Seymour Martin Lipset, "Students and Politics", 见 Lipset, ed., *The Berkeley Student Revolt*, 第3页。

^[338] Philip Selznick, "Reply to Glazer", 见 Lipset and Wolin, eds., *The Berkeley Student Revolt*, 第303页。

^[339] 同上引, 第310—311页。

^[340] Glazer, "Reply to Selznick", 见 Lipset and Wolin, eds., 第315页；首字母缩略词“FSM”指代的是“Free Speech Movement”（言论自由运动），这是激进派学生为自己的运动取的名目，以敦促大学允许在校园内进行政治示威。

^[341] Daniel Bell and Irving Kristol, eds., *Confrontation: 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给作为现代多元主义社会中学术机构的大学带来深重的危险。

按照帕森斯的理解，学生不算这个机构的成员，因为它是教授组成的院系联合体，而教授们所代表的研究与教学传统，是根植于卓越探索水准之中的。因此，激进派学生想要使学生与教员的影响趋于平等，也就威胁到了学术事业的核心：“学生权力不能凌越教员权力。没有教员群体，没有这个群体的自主核心位置，大学就什么也不是。”^[342]

阶级方面的阻碍，对教员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明确选择的政治观点，或教授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论题，甚至像某些激进派学生所要求的那样，在评断学生的学术成就时对黑人学生另施优待，这些都会在无意之中威胁到学术系统本身。

帕森斯之所以反对学生的一味激进立场，是因为他觉得，与这些学生的本意正好相反，他们的宗旨是反现代的，是与多元主义背道而驰的，暴露了他们没有能力使自己新的议程适合于一个整合的社会。多元主义需要增强，哪怕是面对以意见自由为名的攻击。他呼吁，需要在制度化的宽容之中融入美国大学中过去八十年一直牢固守护的那种卓越，以免目前选择性的世界观或承担“绝对化”的趋势破坏了民主体制的架构。 <269>

帕森斯在论证的时候使用了互动媒介的概念框架：他假设，道德共同体中的价值观念的一般性程度趋于降低，也就是说，正在得到倡导的其实是更具特殊主义的价值观念，要求的是政治上的党派之见，而不是思想的自由：

承担的两极化表现为将某项选择性价值观念“绝对化”……其结果，降低了要求得到承担的价值模式的定义的一般性程度，被“道德共同体”所排斥。组成“道德共同体”的那些人共享隐含源泉，比如重视基本平等，但并不愿把这种排斥性的承担只赋予一种价值——无论其多么重要——而不赋予其他价值。……学术系统本身在其自我界定的层面上不能采取此类排斥性的立场，否则将背叛其更大的受托：作为我们社会主要文化传统的卫士。^[343]

[342] Parsons, "The Academic System: A Sociologist's View", *The Public Interest*, vol. 13, 1968, 第187页。

[343] 同上引, 第197页。

以“哥大事件”为题的手书札记以同样明确的措辞记录道，帕森斯认为学生运动就社会层面而言是倒退。他指责道，它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叛，是对现代化市民社会基石的对抗。学生们抨击教育革命根本没有实现民主革命的种种承诺，帕森斯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批评道，学生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类似之处，其实并不像激进派学生所主张的那样，因为无产阶级是由工业革命缔造的，而不是工业革命的牺牲品；与此类似，学生运动是教育革命的后果之一，而不应该摆出一副教育革命批评者的姿态。最后，他指责激进派学生领袖们无非是感到脱离了学术领袖地位，被逐离学界而倍感怨恨。他提出，

哥大事件把焦点放在民主革命的主题上，成了对抗教育革命的一场反叛，就此而言，可谓倒退。明确的前提条件尚未实现。——类似于工人阶级与工业革命的例子。由后者的成功所导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领导阶层，而教育革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与社会相隔绝的尖锐问题，两者之间是否有类似之处？^[344]

另一份手书札记则将“教育革命”推向更为广阔的视角，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等比较传统的政权与他试称作“后工业社会”的政制做了对比，在更具一般性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话题。他概括了“政治化”方面的偏离类型。根据他的评判，随着普遍主义标准扩展到更多的公民范畴，随着学术价值分化为更多的学科门类，对于此类变迁的抵抗势必高涨。这类对抗现代化的抵抗在 50 年代表现为麦卡锡主义（以朝鲜战争作为托词，加强对于反共忠诚的要求），而在 60 年代，同样的反现代主义则转而对抗战争本身，表现为反对美国卷入越战：

高等教育的理论意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后工业”社会。——价值关联（Wertbeziehung）的整体问题。……——通过“政治化”表现出的积极行动路线的偏离。通过撤回表现出的消极被动—倒退。——普遍主义标准的压力与学术价值的分化：竞争+成功。——韩战触发了右翼的骚动：聚焦于麦卡锡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符号。——越南触发了左翼的

[344] 手书札记，起首句是“哥大事件”；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45.4, box 5.

骚动，“新左派”，只是含糊不清地支持什么东西，但反对的姿态却很暴烈。或许战争本身成了首要的负面符号。无政府主义的腔调。^[345]

1976年，帕森斯参加《美国学人》杂志举办的一个研讨会，缘由是罗伯特·尼斯比特的一篇文章“走下神坛的知识”（“Knowledge Dethroned”）。帕森斯举出自己的媒介理论，特别是其讨论去分化的方面，提到他与普拉特合著的《美国大学》，以阐述过去十年的大学学潮。

我们的命题……是，在学界极其迅速的增长背后，有着漫长的通胀背景……二战结束后尤其如此。我们把学潮解释成……在这一剧增之后转向紧缩趋势的症候，……我们揭示了我们……所说的……思想上或认知上的增长与扩张的通胀趋势。……扩张—通胀时期……通常预期会带来某种标志着紧缩和倒退的反应。……我们认为，尼斯比特所谈的祛魅有一个方面非常重要，可以概括为对于此前的通胀时期的紧缩反应，同时伴随着以信心降低为特征的衰退。^[346]

有鉴于此，他呼吁不要对所有的学科都一视同仁。任务不仅仅在于看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明显的差异，而且要明白，不能指望社会科学产生“它们不那么谨慎的倡导者和许多业外人都指望的那种巨大的实践利益”。

后一种说法使他有机会简要讨论公众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知识据说颇为不屑的看法，并且指出，今日学术专业中的许多人，工作其实非常努力（提到他尚未出版的经验素材）。“不管什么样的祛魅已然成为这些群体外部的普通公众的特征，专业本身依然保持着实质上的承担，有证据表明，与之相应程度的承担正在令人满意地传递给学生，在研究生层次尤其如此。” <271>

1969年11月，帕森斯连同其他三名都担任某一学术组织主席的同事，联

[345] 手书札记，起首句是“高等教育的理论意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42.45.4, box 5。“‘后工业’社会”这个修饰词无疑代表了帕森斯自己有关值得想望的现代社会的意象，同时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他从30年代早期开始就对这种观点倍加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使用了不同的名目，希望尽可能好地捕捉自己所预测的意象。

[346] Parsons, “Social Science: The Public Disenchantment”, *The American Scholar*, Autumn 1976, 第580—581页；下两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名致电尼克松总统，伸张全世界的学术界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警示不要重启忠诚稽查，以免干预国际学术交流：

作为个体，签信人谨以个人名义，敬请您维持长期惯例，继续允许外国学者访问美国，并接受罗杰斯国务卿所喜爱的国务院事实上的全面掌控。司法部规定的放弃监控者仍应继续定期颁授。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包括其在海外的形象，务使国际学术交流不——重复一遍不——受制于警方否决或恐吓气氛。（签名）卡尔·W. 多伊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C. 范恩·伍德沃德，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瓦西里·列昂捷夫，美国经济学会候任主席；塔尔科特·帕森斯，美国文理学院主席。^[347]

三、越南

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块角逐领域就是越战。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探讨了美国出于什么原因、又是怎样一步步地陷入战事，最初是为了援助据称陷入危境的南越政府，而在约翰逊总统任内，又发动了重大攻势。但要说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美国在东南亚的介入，至今寥寥无几。无论是帕森斯还是其他人，都不曾就那场战争的话题公开发表过著述。至于帕森斯对美国卷入的态度，倒是可以通过哈佛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证据来评判，哪怕是间接的评判。有四桩事情可以展现他对于国家困境的关注。作为一名学者，也是作为一名公民个体，他非常关注越南的和平。

1967年夏，16位哈佛教授采取了主动行动（类似于耶鲁等其他常春藤盟校中的同事的举动）。该年8月3日，他们致信约翰逊总统，要求政策制定者们认真考虑他们的担忧。他们向总统写道：

我们首先希望表达的是，理解您面临巨大压力需要让战事大大升级，并欣赏您事实上顶住了这些压力。……这足以让我们说，在我们看来，战争（从各方面来讲）的代价现在超出了任何可以预见的收益，而再也不进

[347] “Telegram Sent to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Sunday, November 30, 1969”；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10, box 3。

一步地投入倒有可能改善情势。……尽管作为个人，我们对于或许可取的步骤确有所见，但主要宗旨还在于询问，无论当下还是未来，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协助您推进越南的和平事业？^[348]

信函的署名人 为富兰克林·福特院长、罗杰·勒韦尔、爱德华·珀塞尔、帕森斯和 E. 布莱特·威尔逊。 <272>

为准备与总统的会面，帕森斯收集了许多材料，了解有关越共指控美国进行总体战争的宣传，对于当地平民的犯罪。他的手书札记反映了如下想法：

越南的关键危险或许类似于导致南北内战的那种。我们是否在尝试某种“重建”。国防部的不祥预见。……推广我们的共同体模式，但却没有充分的制度基础。……越共能够组织中间调停的结构——中央政治控制之下的特殊主义团结。产生国族集合体——政治效力。……甚至伴随战事升级，产生长远整合的问题。……

越南政策的代价。1) 由于内部问题导致焦点扭曲，产生内部整合的紧张——内部问题固然包括财政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共同体整合的代价——尤其是黑人问题和政治问题（1964年共识瓦解）。

2) 国际关系的紧张

A) 将美国置于“反抗”“革命性”发展运动的发言人地位（比照苏联在帕格沃什论坛上的立场[参看本小节下文。——译者注]）。

悲剧性地重复了英国立场对抗法国大革命。

B) 对于世界思想（文化）系统的震荡。始终是防御性的——当然也是政治性的。

政治解决的重要性。南越是否真的巩固得像一个社会实体？

两种可以容忍的替代选择。

A) 让胡[“Ho”，指北越领袖胡志明(Ho Chi Minh)，胡于1969年病逝。——译者注]接管政权。当然美国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48] 1967年8月3日致总统函，第1—2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15.10, box 3.

但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的意义。至于将会发生什么，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B) 基于联邦实现某种解决。相当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式的架构，依然不能保护一个立宪政制免遭极权体制接管。

除了早日实现和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接受？比如：

A) 北纬 20 度以北停止轰炸，

B) 战线南撤。^[349]

9 月 26 日，14 位哈佛教授受到约翰逊总统以及哈佛校友、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接见。但结果令人失望，代表团许多成员明确表达了这种感觉：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不受重视，似乎与国家的政治当局无甚干系。在由福特院长签署的另一封致总统的信中，他们对总统和华盛顿其他官员拨冗相见表示感谢，但又重申其对于越南和平的严重关切：

<273>

首先，我们比以往更加坚信，不能完全诉诸军事解决，甚至不能主要诉诸军事解决。应当千方百计为在东南亚谋取政治解决寻求建设性条件。为此必须竭尽所能，致力于比政府目前明显狭隘的选择更为出色、更为现实的方案。^[350]

1968 年 2 月 14 日，帕森斯作为美国文理学院主席，邀请英国政治学家丹尼斯·布罗根爵士在内部研讨会上演讲越战问题。布罗根的讲题为“反思美国全能的幻觉”，认为美国正在与一个完全不能信赖的独裁政权并肩作战，既不能抽身而出，也不能遏制西贡的南越政府明显的极权统治。^[351]帕森斯在致谢函中表示完全赞成布洛根的意见：“实际上，演讲主题很合时宜，您之所谈实属急需。

^[349] 手书札记；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10, box 3。这里提到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之例，说的是 1939 年二战爆发后，两国被纳粹德国接管，陷入极权统治。

^[350] 1967 年 10 月 13 日致总统函，由福特签署；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10, box 3。

^[351] 全美文理学院第 148 次例会，1968 年 2 月 14 日，“The Illusion of American Omnipotence - Reconsidered”，Sir Denis Brogan；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15.25, box 7。早在 40 年代，布罗根就已经是分析美国政策和心态的专家，出版了 *The American Character* (New York: Knopf, 1944)。

对美国问题的同情理解当然是很受欢迎的，但我个人很高兴看到，这种理解还融合了毫不含糊的批评。”^[352]

1968年4月7日，《华盛顿邮报》刊登广告声明，五百多名学人联署，主要是以帕森斯为主席的美国文理学术院以及美国哲学协会的成员（仅举数例，包括阿伦特、肯尼斯·伯克、列昂捷夫、莱昂奈尔·特里林及沃格林等人），要求和平解决越南问题，防止核战的巨大危险。声明指出：

联署人……认为，作为公民，作为研究国内外事务的学者，他们有义务表明自己的信念：美国的至高国家利益要求，与那些目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抗西贡现政权的越南人展开富有意义的相互协商，并在此基础上迅速解决越南问题。要实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就必须得到越南人民当中所有发挥重要影响的成分的积极参与，包括南越政府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分子（N.L.F.）。

延续我们目前的进程，注定将导致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处境进一步急剧恶化，而我们正力求帮助的那个民族也同样将遭受愈益深重的灾难。不仅如此，危险的可能还在与日俱增：这场重大但仍有限的冲突将一发不可收拾，升级成为一场世界范围的核战。^[353]

1968年4月，美国文理学术院决定启动一项研究计划，“越南冲突研究”，为此专设一个研究小组，并给予两万美元资助（拨给基斯佳科夫斯基先生），并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对于暑期研究小组而言，建议吸收入该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丹·埃尔斯伯格、卡尔·凯尔森、保罗·凯克斯凯梅蒂、亨利·基辛格、托马斯·谢林、亚当·亚尔莫林斯基等人（时任哈佛政治学教授的基辛格，在4月23日的一封信中表示愿意效劳）。研究宗旨严格限于学术研究，探讨的是“问题：越南谈判：可能的结果有哪些？”<274>

交流文稿以典型的帕森斯风格，仿效了二战期间已经采取过的立场，代表越南问题指导委员会声明，宗旨在于理解情势然后作出判断，这样才能避免一味

^[352] 帕森斯 1968年2月23日致布罗根爵士函；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25，box 7。

^[353] “A Statement on U.S. Policy in Vietnam”，*The Washington Post*，1968年4月7日周日版（剪报）；见帕森斯档案，HUG（FP）-15.25，box 9。

受意识形态影响，而不是充分了解信息：

宗旨：对于华盛顿与河内的对立两方之间多种可以想象的妥协结局作出描述与分析，以丰富有关将启之谈判的公众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双方观点的这种两极对立十分危险，易于僵化，除非阐明可以找到替代选择，并且富有意义。本研究小组所发布的文稿将不会指明具体某一项选择是否可取，而只是做全面的考察。^[354]

1968年4月召开的第18届帕格沃什论坛(Pugwash Symposium)，讨论主题为(作为美国文理学院院主席的)帕森斯所拟：“原子能和平利用控制，特别是核不扩散。”^[355]1968年9月，帕森斯致信福特基金会主席弗朗西斯·X. 萨顿，请求拨予一笔可观的赠款，以资助未来的帕格沃什会议，“帕格沃什是与苏联科学家交流的弥足珍贵的渠道：只有这个国际科学会议系列，他们可以例行参加，无须每次都要申请特别许可；苏联科学院认为这是他们与全世界科学家进行广泛接触的首要场合，因此由苏联科学院常务副院长M.D. 米利翁希科夫亲率代表团。”^[356]他继续指出，自己在1967年刚刚接任美国文理学院院主席一职，就尽可能让美国一方大力推动帕格沃什会议，使之成为东西方科学交流的主轴，始终遏制了越战的重大危害。[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为各国科学家讨论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政治问题提供交流平台，最初主要关注核武器、核裁军等问题，后扩至全球资源与环境、饥饿与贫困、人口膨胀、生命技术、科技伦理等一系列更为广泛的自然与社会议题。初期参与者皆为各国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后来逐渐有社会科学家参与。虽是民间会议，但所讨论的主题及形成的初步共识却在国际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该会议为沟通对立双方起到关键作用，其成果为冷战双方政府间正式会谈提供了基础，甚至为政府间签署的协定所采纳。因在推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积极

^[354]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Vietnam Steering Committee. Brief Outline for Summer Study Group”, 1968年3月3日；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5, box 9。

^[355] 第18届帕格沃什会议：该会议(自1950年以来)每年一次，名字来自纽芬兰一小镇，是铁幕两端(迄今为止主要是)核物理学家最初的聚会渠道。

^[356] 帕森斯1969年9月9日致福特基金会萨顿函，第2页；见帕森斯档案，HUG (FP) - 15.25, box 7，下一则引语亦摘自同一页。

作用,该会议本身及会议组织者之一 Joseph Rotblat 教授共享 1995 年诺贝尔和平奖。——
译者注]

事实上,要是没有这一沟通渠道,像军备控制联合研究小组 (Joint Study Group on Arms Control) 这般重要的项目,由于越南的冲突,就可能被苏联人放弃。任何人只要和苏联人乃至东欧人打过交道都知道,对于促进非正式、不公开的交流,对于通过研究小组和论坛组织严肃的、实质的讨论,保持这种持续的接触有多么重要。

两年后,尼克松将东南亚战事升级,美苏之间的学术交流严重受损,几近停 <275>
顿。帕森斯借在保加利亚瓦尔纳 (Varna) 召开第七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之机,重
续交流,会后致函新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阿列克赛·M. 鲁缅采夫:

我致信于您,主要是作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下设与苏联社会学家关系委员会主席。……我想我们可以提议在敝国召开一次大会。当然,作为替代选择,……我们也乐于考虑在苏联开会。……我认为,奥西波夫教授必须讨论和平的相关问题的提议会大有成效。……根据我们在瓦尔纳讨论时我的提议,或许可以通过我们各自的社会学家对于本国社会的一些杰出研究成果,讨论一些能够反映两个社会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彼此异同的问题。^[357]

[357] 帕森斯 1970 年 10 月 9 日致苏联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缅采夫函, Leninskii prospekt, 14, Moscow, 第 2 页; 见帕森斯档案, HUG (FP) - 15.25, box 7.



民主为旗 学术一生

<276>

在许多二手文献中，帕森斯都被描述成一位典型的哈佛教授，与日常生活相隔绝，据说一心关注抽象理论，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要么是不介入政治，要么是梦想一种美丽新世界。本书揭示出许多此类指控纯属闭门造车。恰如其分地领会帕森斯，就是这部思想肖像的写作理据。

这部思想传记利用了大量出版和未出版的资料，旨在颠覆那些将这位美国社会学家佼佼者污名化的许多判断。总而言之，这部帕森斯思想传记就是要展现，他一生治学与个人问政都是如何致力于捍卫民主。

在本书结尾，我不妨再一次引用丰富的相关证据，看看他的治学与参政之道中，是如何捍卫民主迄今最发达的阶段，也就是美国社会。

帕森斯在他以《社会行动的结构》为巅峰的早期著述中，致力于理解社会学如何通过四位欧洲论家的作品，有助于分析民主的经验特性——这个世界正受到与纳粹极权主义之间的政治冲突的困扰，进而，当代世界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威胁。他分析了作为整合的对立面的失范，后者既标志着强制也标志着不安全，而前者则孕育着交互性，并蕴含着根本上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性。作品反对斯宾塞式的实证论，传递出经过方法论精饰过的意愿论。它倡导韦伯的“价值无涉”原则，其方针就在于超越对于威权主义的潜在支持，确立社会学的牢固地位。

在其著述的所谓“中期”，他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分析了40年代前半期作为其对立面的美国社会，但脑子里始终想的是民主体制。如第二章所示，从1938年到1945年，他坚持不懈地将作为人道社会之典型缩影的民主体制归之于

美国。尽管他向民主议事会提交的备忘录提醒其读者提防疏忽社会改良，但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对于欧洲及其他地方那些较不发达的社会，甚至包括那些民主
<277> 的社会，美国社会就是可供效仿的楷模。二战后的德国处于再教育之下，就大大受惠于帕森斯对于美国民主体制的理解：他有关受控型制度变迁的观念有助于以经济—职业系统为基础来重塑德国国族。

二战之后，帕森斯的主要焦点成了社会系统如何运作。这种社会系统不仅能够证明对于不那么稳定的德国纳粹式政权的胜利，而且可以容纳值得细致考察的整合机制。他的世界级经典《社会系统》致力于分析，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民主（整合）类型的组织相比于极权（失范）类型的组织，更加富于弹性，也更具人道色彩。他先后写了三份专著长度的文稿，头两稿是呈交给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备忘录，一直未公开发表，第三份则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他在文稿中探究了以美国作为其典型缩影的民主体制的性质。不过，在《社会系统》即获成功后的麦卡锡主义岁月里，他却被指责是前共产党人。

到了 60 年代，他的学术研究有了一次飞跃，因为美国社会发生了如其所料的一些变迁。他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脱胎换骨了。他提出了两套分析模型，以捕捉现代民主体制的现代化过程的动力机制，这正是 60 年代美国发生的现象。其中一套模型通过四重互动媒介图式来分析社会功能，推演出不断分化的子系统，能够组织制度框架内各种媒介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个阶段他把失范概括成类似于“金本位”式原教旨主义的媒介表征。而其对立面就是民主化。真正民主的社会与政治体的功能运作，超出了“零和”式的媒介分配观。它会繁育出大量从财政地位、权力赋予、影响和文化（道德）承担等角度界定的交互关系。

另一套分析模型以社会整合为焦点。帕森斯看到的是分化、多元化和升级这三重动力机制。这就意味着他的“进化论—控制论”社会观。他把失范类型的社会意象勾勒为去分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倒退过程。但他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进步的迹象与症候，能够有助于将 60 年代的危机理解为通向更多人的更好生活的中间步骤。现代性的要旨就在于平等法权，法律系统（以及高教和医疗）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高峰。他还分析了分层以及族群性，作为美国社会结构看似偶然的变迁的核心领域。

但是，从30年代到60年代，他还始终亲身参与时事政治。在他的个人参政这块领域中，他会积极实践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中的适宜呼吁。他并不是躲在哈佛象牙塔里搬弄口舌的学究。自学生时代开始，他就通过发表作品，或积极参与任何切合自己兴趣的政治群体来表明自己的政见。而他作为一名活跃分子最公开的一幕，无疑是二战期间纳粹统治的那一段。但他也参与了反核军备事业，并协助黑人民权运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比如说，在30年代，帕森斯为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流亡者提供了书面担保，确保他们能够进入美国，而他们最终也在美国找到了大学教职。其中有一位比较知名，一位是政治学家沃格林，另一位是社会学家施派尔。 <278>

在40年代上半叶，帕森斯积极参与对英军援委员会，加入捍卫美国哈佛小组（并在其中担任国民士气委员会主席），成为民主议事会成员（个人隶属其下的通讯委员会），参与“科学、哲学、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之关系会议”，凡此种种，仅举数例。他还自愿承担哈佛海外管理学院繁重的教学任务，指导未来负责欧洲及远东军管政府的职员。他甚至还在某家政府机构担任顾问，负责军管政府下德国战后初期计划，要在那里推行“受控型制度变迁”。

在50年代，他的参政活动表现出反对苏联的一面。二战胜利之后，这个国家暴露出是个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极权主义大国。尽管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尚属落后，但帕森斯却认为它已经是一个工业社会。1945年后，他反对核军备，加入核科学家协会以及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致力于发出一个社会学家的声音。在麦卡锡主义袭扰哈佛大学之前，他早在1946—1948年间就把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哈佛分会搞得有声有色，这个富有预见性的堡垒要不是存在时间有限，本可以使其所在的大学躲过被调查的一劫。此后又有四年时间，他把绝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投放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对于遭受非美活动委员会不公对待的人的平反工作上。

到了60年代，他也融入肯尼迪时代的政治热忱之中，即便只是间接参与。在约翰逊政府任内，他参与了许多活动，比如试图影响越战相关政策的校际联合行动。在美国文理学院主席任上，他发起了与苏联科学院的接触，并且相当成功。事实上，1968年第18届帕格沃什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苏联物理学家安德



鲁·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呼吁世界和平的提议，令克里姆林宫颇为光火。他还促成美国文理科学院赞助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会议，讨论大学的目标与治理，这是导致 70 年代高等教育温和改革的一条富有活力的渠道，既对学生数量的增加，也为少数族群开启参与高等教育的合理平等机会。

至于其党派政治立场，帕森斯毕生都不是共和党人。从 30 年代开始，他就热诚支持罗斯福。他也是肯尼迪的坚定追随者，肯尼迪 1952 年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时，帕森斯就视之为大有前途的领导人。肯尼迪遇刺后，他看到美国支持西贡的非民主政权，对国家政治一度近乎绝望。最后，到了 1972 年，他曾为挑战尼克松但功亏一篑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竞选游说。帕森斯认为，水门事件对于美国民主所构成的危险堪比麦卡锡主义。在他眼里，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已经非常接近一名法西斯主义者。

他这种积极行动的姿态从未停歇，退休之后也依然故我。1975 年，他和一批同事给南斯拉夫的专制领袖约瑟普·铁托发电报，抗议该国非法监禁一名持不同政见者。

帕森斯对于民主的捍卫为何如此特别？我的判断是，在他看来，民主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组织的类型，而是一种社会行动的结构，意味着公民对于其所在共同体的自愿承担。他认为民主会映射在行动者的态度之中。在他眼里，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遭歧视和被剥夺选举权一样重要。“情境界定”的范围内包含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意义领域：一端是偏见，另一端则是代表民主取向的交互模式。

有鉴于此，他认为，社会不仅仅是系统中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更是融入了人们彼此所感所思——他们的行动模式映射了世界观，在经济领域如此，在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也是如此。互动媒介，也就是针对互动交互性的一般化符号媒介，最终进入他的社会学想象，这绝非偶然的发现。他毕生遵循了韦伯。现在他又在效仿韦伯，借鉴后者的社会行动定义，把它概括为意义建构 (Sinnkonstruktion)，是相互可理解的意义的建构。当帕森斯追随韦伯经典的社会行动概念，他的民主观所蕴含的行动者就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并且具备判断能力）。

那么，是什么使他如此锲而不舍？他坚信，社会学有一项使命不容推脱，

那就是理解社会的动力机制的实质。他在1939年与沃思的通信中，为了捍卫自己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的方法论现实主义，区分了三门各有其独立范围的社会科学学科，即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耐人寻味的是，沃思对是否可能为社会学划出一块专门领域表示怀疑。但帕森斯明确指出，这门新兴科学完全配得上自主性，就因为韦伯传统下的社会世界的结构。

二战行将结束时，他通过争取受雇于负责筹划战后德国处置的政府机构，来施展自己的社会学专业知识。作为顾问，他说服机构内的专家们相信，摩根索的“计划”尽管逻辑确凿，政治正确，却并不切实际。而他的社会学建议却在这个看似非己所长的领域最后获得成功。

终其一生，帕森斯从未安坐书斋，觉得确保社会学使命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不过，在1948年与巴伯合撰的一篇文章的结尾，帕森斯表达了自己一贯的乐观主义态度：“作为一个专业群体，我们承担着一项在许多方面史无前例的探险，事实上，悲观主义者大可预见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这是一项挑战，配得上美国进取精神的传统精髓。”

而在二十年后，1968年，他则这样来谈社会学，虽然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声名已近乎牢固确立，但对于这位自成一格的“不可救药的理论家”来说，社会学依然是一项探险，

我们必须追问究竟哪一点更重要：(1) 原教旨主义式地回归更为原初的层次；(2) 分裂主义的革命后果，这往往会使冲突最大化；还是(3) 价值系统中新的一般化水平的制度化？社会学负有重大责任，协助摸清现状，搞清楚要使这些可能性取得平衡，关键在哪里。[这段话作者没有附注，但在原书第225页引过，出处见第四章注[172]。唯一的差别是这里将第一句“最重要的问题”中的“most”改成了“more”。这里按照前文。——译者注]



参考文献

帕森斯本人重要著述

- Parsons, Talcott. "Society",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34), 重刊于 *Early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第 109—121 页。 <281>
- "The Place of Ultimate Value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45 (1935): 第 282—316 页。
-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New York: MacGraw Hill, 1937; 2d ed., 1949, 平装本重印于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 "Max Weber and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risi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4 (1942): 第 61—76 页, 以及第 155—172 页; 重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Uta Gerhardt 编辑并作序,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第 159—187 页。
- "The Problem of Controll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 Essay i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Psychiatry* 8 (1945): 第 79—101 页; 重刊于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第 291—324 页。
- Parsons, Talcott, and Bernard Barber. "Sociology, 1941—194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3 (1948): 第 245—257 页。
- Parsons, Talcott.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 Parsons, Talcott, and Edward A.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Parsons, Talcott, Robert F. Bales, and Edward A. Shils, eds.,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 Parsons, Talcott, and Neil J.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6.
- Parsons, Talcott. "Durkheim'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Social Systems", 收于 Kurt H. Wolff, ed., *Essay on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by Emile Durkheim et al. with Appraisals of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9, 第 118—153 页。
- Parsons, Talcott. "The Principal Structures of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View", 收于 Carl J. Friedrich, ed., *Community*.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59, 第 152—153 页。
-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0.
- "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收于 Quincy William Wright, E. Evan, Morton Deutsch, eds., *Preventing World War III: Some Proposal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2, 第 310—331 页。
- "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7 (1963): 第 37—62 页; 重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405—430 页 (Postscript, 第 431—438 页)。
-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07 (1963), 第 232—262 页; 重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352—404 页。 <282>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Force in Social Process”, 收于 Harry Eckstein, ed., *Internal War: Basic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第 33—70 页。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Parsons, Talcott, and Kenneth B. Clark, eds., *The Negro Americ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
- Parsons, Talcott.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1966.
- “The Nature of American Pluralism”, 收于 Theodore R.Sizer, ed.,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 “On the Concept of Value-Commitments”, *Sociological Inquiry* 38 (1968): 第 135—160 页; 重刊于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第 439—472 页。
-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 “On the Building of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Daedalus* 99 (1970): 第 828—830 页; 重刊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第 22—76 页。
-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1971.
- Lidz, Victor, and Talcott Parsons, eds., *Readings on Pre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 Parsons, Talcott.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Trends of Change of Ethnicity”, 收于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s.,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重刊于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第 381—404 页。
- Parsons, Talcott.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帕森斯研究二手文献

- Alexander, Jeffrey C.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arber, Bernard. “Theory and Fact in the Work of Talcott Parsons”, 收于 Samuel Klausner and Victor Lidz, eds.,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第 123—130 页。
- Black, Max.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London/Amsterdam: Feffer & Simons, 1976; 初版于 1961。
- Bourricaud, Francois. *The Sociology of Talcott Parsons*.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 Brick, Howard. *The Reformist Dimension of Talcott Parsons' Early Social Theory*.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1991, mimeo.
- Gerhardt, Uta. “Models of Illness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Talcott Parsons' Contribution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edical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5 (1990): 第 337—355 页。
-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 Society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Democrac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 (1996): 第 303—325 页。
- “Die soziologische Erklä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ntisemitismus in den USA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1 (1991): 第 253—273 页。
- “Normative Integration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als Problem d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Talcott Parsons'”, *Soziale Systeme* 4 (1998): 第 281—314 页。

- “Parsons' Analysis of Societal Community”, 收于 A. Javier Treviño, ed., *Talcott Parsons Toda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第 177—222 页。
- Hamilton, Peter. *Talcott Parsons* (London: Tavistock, 1983).
- Holton, Robert J., and Bryan S. Turner.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 Johnston, Barry V. “Contemporary Crisi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Department at Harvard: A Case Study in Hegemony and Disinte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st* 29 (1998): 第 26—42 页。
- Mitchell, William C.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Politics: Th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7.
- Sociologie et Sociétés*, vol. XXI, no. 1, Avril 1989 (entire issue): *Talcott Parsons: Relectures* (realist par Francois Beland et Guy Rocher).
-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31, no. 2, Summer 2000 (全期讨论帕森斯与日本的关系, Lawrence Nichols 与 William Buxton 编)。
- Weame, Bruce C. *The Theory and Scholarship of Talcott Parsons to 195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其他参考文献

- Alexander, Jeffrey C, ed., *Real Civil Societies: Dilemma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8.
- Allport, Gordon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54.
- Allport, Gordon W, and Helene R. Veitfort.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Civilian War Effor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S.P.S.S.I. Bulletin 18 (1943): 第 165—233 页。
- Barber, Bernard.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ructure and Proc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7.
- Bell, Daniel, and Irving Kristol, eds., *Confrontation: 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 ed., *The Radical Right: The New American Right Expanded and Update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3.
- Bellah, Robert.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ist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 Bendix, Reinhard,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2d ed., 1966.
- Berelson, Bernard B.,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 Brickner, Richard. *Report on a Conference on Germany After the War* (no date, no location), November 1944, New York, published: “Germany After the War - Round Table 1945”,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1 (1945): 第 381—441 页。
- Coser, Lewis.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56.
- Cox, Archibald, Mard De Wolfe Howe, and J. R. Wiggins, eds., *Civil Rights,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our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ox, Harvey. *The Secular City: Secular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SCM Press, 1967.

- <284> Craig, Gordon A. *The Germans*. New York: Meridian, 1991.
- Davis, Allison, Burleigh B. Gardner, and Mary R. Gardner. *Deep South: A Soci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aste and Class*. 10. imp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 Deutsch, Karl.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 Eckstein, Harry, ed., *Internal War: Basic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 Eisenstadt, S. 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Collier Macmillan, 1963.
- Ely, Richard T. *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889.
- Farago, Ladislav, L. F. Gittler, Gordon W. Allport, John G. Beebe-Center, Edwin G. Boring, Floyd L. Ruch, Stanley S. Stevens, Kimball Young. *German Psychological Warfare.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New York: Putnam and Sons, 1942.
- Friedrich, Carl J.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a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7; 修订版,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41.
- “Military Government as a Step Toward Self-Rul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 (1943): 第 527—541 页。
- Friedrich, Carl J. and Associates.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Military Governmen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Rinehart & Co., 1948.
- Fromm, Erich.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Rinehart, Winston and Holt, 1941.
- Gerhardt, Uta. “A Hidden Agenda for Recovery: The Psychiatric Conceptualization of Re-education for Germ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World War II”, *German History* 14 (1996): 第 297—324 页。
- “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 und Massenmord. Eine soziologische These zum Thema der freiwilligen Verbrechen an Jude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4 (1998): 第 503—538 页。
- *Ideas About Illness: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Medical Soci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 Gerth, Hans. “The Nazi Party: Its Leadership and Compos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1940): 第 517—541 页。
- Hartshorne, Edward Y, Jr.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7.
- Herberg, Will. *Protestant-Catholic-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 Heyl, Barbara. “The ‘Harvard Pareto Circ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4 (1968): 第 316—334 页。
- Hilberg, Rau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Quadrangle, 1961.
- Hofstadter, Richard, and Wolfgang Metzge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Vintage, 1956.
-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Braziller, 1959; 修订版(初版于 1944)。
- Hogan, Michael J.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Horkheimer, Max, Erich Fromm, and Herbert Marcuse et al.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 Félix Alcan, 1936.
- Inkeles, Alex, and David H.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s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Janowitz, Morris. "German Reactions to Nazi Atroc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946): 第 141—146 页。
- Kaiser, Charles. *1968 in America: Music, Politics, Chaos, Counter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a Genera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285>
-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London: L. & V. Woolf, 1926; New York: New Republic, 1926.
-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Marshall Plan Day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 Klausner, Samuel, and Victor Lidz, eds.,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 Kloppenborg, James T.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Kluckhohn, Clyde. "Group Tensions: Analysis of a Case History", 收于 Lyman Bryson, Louis Finckelstein, and Robert MacIver, eds., *Approaches to National Un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5, 第 222—231 页; 重刊于 Kluckhohn, Clyde, *Culture and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第 301—322 页。
- Kogon, Eugen. *Der SS-Staat. Das System der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 Fischer, 1946. Translat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The Germa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e System Behind Th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Co., 1950.
- Kuntz, Paul G., ed., *The Concept of Order*. Seattle and London: Grinnell Colleg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 Lasswell, Harold.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4 (1933): 第 373—384 页。
———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4.
-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 Lazarsfeld, Paul F, and Wagner Thielens, Jr., with David Riesman. *The Academic Mind: Social Scientists in a Time of Crisi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8.
- Leighton, Alexander. *The Governing of Men*.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45.
- Lewin, Kurt. "The Special Case of German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 (1943): 第 555—566 页。
- Lipset, Seymour M.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Neil Smelser. *Sociology: The Progress of a Decade. A Colle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Theodore Wolin, eds., *The Berkeley Student Revolt: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Garden City, N.Y.: Anchor (Doubleday), 1965.
- MacIver, Robert. *Academic Freedom in Our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 Maier, Norman. *Frustration: The Study of Behavior Without a Goa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9.

- Marshall, Thomas H.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4.
- Mayhew, Leon. "Ascription in Modern Societies", *Sociological Inquiry* 38 (1968): 第 105—120 页。
- Mead, George Herbert.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Mead, Margaret, and Rhoda Metraux,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Medical Car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Cost of Medical C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2.
- Meiklejohn, Alexander. *The Liberal College*. Boston: Marshall Jones, 1920.
- <286> Merton, Robert K.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1938): 第 672—682 页。
——*Mass Persuasion*, with assistance of Marjorie Fiske and Alberta Curti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6.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2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 Morgenthau, Henry. *Germany Is Our Proble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5.
- Mowrer, Edward Ansell. *Germany Puts the Clock Back*.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ed.,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 Myrdal; Gunnar, with Richard Sterner and Arnold Marshall Rose.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4.
- Neumann, Franz.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st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2d edition, 1944.
- Poliakov, Leon, and Joseph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Berlin: Arani, 1957.
- Rainwater, Lee. "The Problem of Lower-Class Culture and Poverty War Strategy", 收于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ed.,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 Rawls, John. "Constitutional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of Justice", 收于 Carl J. Friedrich, ed., *Justice (Nomos VI)*,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1963.
- Rheinstein, Max, ed.,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Riesman, David. *The Academic Mind: Social Scientists in a Time of Crisi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 Riesman, David, and Christopher Jencks. "Patterns of Residenti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Harvard", 收于 Sanford, Nevitt, ed., *The American College*. New York: Wiley, 1962, 第 731—773 页。
- Schlesinger, Arthu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8.
- Schneider, David. *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pproach*.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8.
- Smith, Richard N. *The Harvard Century: The Making of a University to a N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 Speier, Hans, and Erich Kahler, eds., *War In Our Time*. New York: Norton, 1939.
- Stouffer, Samuel, Edward A. Suchman, L. C. De Vinney, S. A. Star, Robin M. Williams, Jr., *The American Soldier*, 2 volu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 Stouffer, Samuel A.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A Cross-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 Min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Uta Gerhard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 Tawney, Richard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6.
- Veblen, Thorstein.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 Von Schelting, Alexander. *Max Weber's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34.
- Warner, W Lloyd. "American Caste and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2, 1936, 第 234—237 页。
- Warner, W Lloyd, Buford H. Junker, and Walter A. Adams. *Color and Human Nature: Negr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1, 代表美国教育委员会重印于 1969, Washington, D.C.。
- Watson, Goodwin, ed., *Civilian Moral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2. <287>
- Weber, Max. "Der Sinn der 'Wertfreiheit' der soziolog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en" (初版于 1917), 收于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3rd ed., Johannes Winckelmann, ed., Tübingen: Mohr, 1968, 第 489—540 页。缩译本, "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收于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ax Weber*,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翻译并编纂,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第 1—49 页。
-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alcott Parsons 编辑并作序,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原由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翻译,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22.
- Whitehead, Alfred North.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Lowell Lectures, 1925*.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中外人名索引

A

- 阿贝尔,西奥多 Abel, Theodore,
90-91, 111 n. 222, 134, 136
阿达米克,路易斯 Adamic, Louis, 92-93
阿多诺,西奥多 W.Adorno, Theodor W., 118
阿尔波特,戈登 W.Allport, Gordon W., 75, 79
n. 89/90, 81, 118, 134, 144-146, 283, 284
阿格尔,罗伯特 Agger, Robert, 188
阿莱,莫里斯 Halle, Morris, 205, 205 n. 90
阿隆,雷蒙 Aron, Raymond, 图片 8
阿伦斯伯格,康拉德 Arensberg,
Conrad, 90, 136
阿伦特,汉娜 Arendt, Hannah, 273
阿普索恩, R. J. Apthorne, R. J., 194 n. 43
埃尔斯伯格,丹 Ellsberg, Dan, 274
埃克斯坦,哈里 Eckstein, Harry,
196 n. 54, 204 n. 84, 282, 284
埃里克森,埃里克 H.Erikson,
Erik H., 111 n. 222
埃利,理查德·T. Ely, Richard T., 68, 284
埃利奥特,威廉·Y. Elliott, William
Y., 81 n. 101, 233 n. 201
埃齐奥尼,阿米塔伊 Etzioni, Amitai, 248
埃特曼,托马斯 Ertman, Thomas, xiv
埃文,威廉·E. Evan, William
E., 201 n. 71, 281
埃文斯,罗杰 Evans, Roger,
91 n. 144, 136 n. 34
艾尔斯,克拉伦斯 Ayres, Clarence, 69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 Eisenhower,
Dwight D., 3 n. 11, 133

- 艾森施塔德,萨缪尔 N. Eisenstadt,
Shmuel N., 231, 284
爱德华兹,富兰克林 Edwards, Franklin, 265
爱德华兹,乔纳森 Edwards, Jonathan, 图片 2
爱因斯坦,阿尔伯特 Einstein, Albert, 53
安吉尔,罗伯特·库利 Angell,
Robert Cooley, 245
奥本海默, J. 罗伯特 Oppenheimer,
J. Robert, 133
奥尔兹,詹姆斯 Olds, James, 212 n. 124
奥弗斯特里特,哈利·S. Overstreet,
Harry S., 111 n. 222, 118
奥康奈尔,查尔斯·托马斯 O'Connell,
Charles Thomas, 178 n. 200
奥斯汀 Austin, 60
奥西波夫 Osipov, 275

B

- 巴伯,伯纳德 Barber, Bernard, x, xiv,
45 n. 195, 153, 155 n. 112, 186 n. 8,
217 n. 142, 279, 281, 282, 283
巴克,保罗·H. Buck, Paul H.,
81 n. 101, 137 n. 41
巴克爾 Buckle, 12 n. 40
巴克斯顿,威廉 Buxton, William, 60, 283
巴拉克,阿尔文·L. Barach,
Alvan L., 111 n. 222
巴兰,保罗 Baran, Paul, 129
巴斯德,路易 Pasteur, Louis, 155
巴韦拉斯,阿历克斯 Bavelas,
Alex, 107 n. 206

- 邦迪,柯特 Bondy, Curt, 145
 邦迪,麦乔治 Bundy, McGeorge,
 121 n. 262, 182
 鲍尔,雷蒙德 Bauer, Raymond,
 179 n. 201, 254 n. 284
 鲍姆,雷纳 Baum, Rainer, 60
 贝尔,丹尼尔 Bell, Daniel, xiv, 187 n.
 9, 217 n. 142, 230 n. 192, 268, 283
 贝尔斯,罗伯特·R. Bales, Robert
 R., 168 n. 154, 192, 281
 贝克尔,霍华德 Becker, Howard, 267 n. 233
 贝拉,罗伯特 Bellah, Robert,
 187, 241-242, 283
 贝兰德,弗朗索瓦 Beland, Francois, 283
 贝雷尔森,伯纳德·R. Berelson,
 Bernard R., 191-194, 283, 285
 贝特尔海姆,布鲁诺 Bettelheim, Bruno, 145
 贝特森,格雷戈里 Bateson,
 Gregory, 75, 135, 147
 本德尔,劳蕾塔 Bender, Lauretta, 111 n. 222
 本迪克斯,莱因哈德 Bendix,
 Reinhard, 206 n. 97, 210, 283
 本尼迪克特,露丝 Benedict, Ruth,
 111 n. 222, 112 n. 226
 比尔施泰特,罗伯特 Bierstedt, Robert,
 1-2, 3 n. 10, 19 n. 73, 65
 比霍夫斯基,古斯塔夫 Bychowsky,
 Gustav, 106 n. 202, 111 n. 222
 毕比-森特,约翰·C. Beebe-
 Center, John C, 79 n. 90, 284
 毕卜林,爱德华 Bibring, Edward, 118
 边沁,杰里米 Bentham, Jeremy, 30, 53
 宾格,卡尔 Binger, Carl, 111 n. 222
 波茨曼,列奥 Postman, Leo, 145 n. 72
 波利亚科夫,列昂 Poliakov,
 Leon, 65 n. 26, 286
 波佩 Poppe, 179
 波普,阿瑟·厄珀姆 Pope, Arthur Upham, 133
 波特,查尔斯·O. Porter,
 Charles O., 110 n. 220
 波伊克特,德特勒夫 Peukert, Detlef, 21 n. 91
 伯迪克,尤金 Burdick, Eugene, 191
 伯恩斯坦,阿瑟·R. Burns, Arthur R., 121-122
 伯克,肯尼思 Burke, Kenneth, 273
 伯纳德,杰西 Bernard, Jessie, 83 n. 107
 博克,吉塞拉 Bock, Gisela, 22 n. 94
 博林,埃德文·G. Boring,
 Edwin G., 79 n. 90, 284
 博托,保罗·德 Voto, Paul de, 81n
 布莱克,马克斯 Black, Max, x,
 185-186 n. 5, 260 n. 302, 282
 布莱克,约翰·D. Black, John D., 109n. 216
 布赖森,莱曼 Bryson, Lyman,
 118 n. 251, 133, 148 n. 84
 布赖特,威廉 Breit, William, 69 n. 44
 布朗,尤尼乌斯·哈格 Brown,
 Junius Hagg, 83 n. 107
 布朗特,卡尔 Brandt, Karl, 78 n. 85
 布劳,彼得 Blau, Peter, 220
 布里科,弗朗索瓦 Bourricaud,
 François, 186, 205, 282
 布里克,霍华德 Brick, Howard,
 11 n. 39, 69 n. 43, 282
 布里克纳,理查德·A. Brickner, Richard
 A., 107-108, 111, 112 n. 227, 113, 114
 n. 232, 116, 121, 132 n. 16, 141, 283
 布里特,斯图尔特·亨德森 Britt,
 Stuart Henderson, 83 n. 107
 布林顿,克莱恩 Brinton, Crane, 7-8, 12
 n. 40, 15 n. 51, 21, 53, 56-57, 131
 布龙方布伦纳,乌列 Bronfenbrenner,
 Urie, 260 n. 302
 布鲁默,赫伯特 Blumer, Herbert, 211 n. 119
 布鲁纳,杰尔姆 Bruner,
 Jerome, 132 n. 14, 134
 布罗德贝克,阿瑟 Brodbeck, Arthur, 191
 布罗根,丹尼斯 Brogan, Denis, 273
 布什,万尼瓦尔 Bush, Vannevar, 149-151
- C
- 蔡尔德,欧文·L. Child, Irving L., 79 n. 89
 查皮,埃利奥特 Chappie, Eliot D., 75
 查普曼,约翰·W. Chapman,
 John W, 237 n. 221
 柴尔德,玛丽 Child, Mary, xiv

D

- 达尔, 罗伯特·A. Dahl, Robert A., 194 n. 42, 208
- 达尔文, 查尔斯 Darwin, Charles, xii, 13, 15 n. 53, 16-17, 19 n. 73, 29, 52, 222
- 达伦多夫, 拉尔夫 Dahrendorf, Ralf, 191
- 戴高乐, 夏尔 de Gaulle, Charles, 210
- 戴维, 莫里斯·R. Davie, Maurice R., 20 n. 81
- 戴维斯, 阿兰 Davies, Alan, 62 n. 11
- 戴维斯, 埃尔默 Davis, Elmer, 75
- 戴维斯, 埃利森 Davis, Allison, 262, 284
- 戴维斯, 金斯利 Davis, Kingsley, 65-66
- 德弗罗, 乔治 Devereux, George, 65-66
- 德雷克, 圣克莱尔 Drake, St. Clair, 265
- 德鲁克, 彼得 Drucker, Peter, 72, 97
- 邓肯, 奥蒂斯·达德利 Duncan, Otis Dudley, 189, 234 n. 203
- 蒂利亚基安, 爱德华德 Tyriakian, Edward A., xiv
- 蒂伦斯, 瓦格纳 Thielen, Wagner, 266 n. 351, 285
- 杜布, 伦纳德 Doob, Leonard W., 75, 130 n. 5
- 杜布切克, 亚历山大 Dubcek, Alexander, 210
- 杜鲁门, 哈利·S. Truman, Harry S., 151, 159 n. 128, 191
- 杜威, 约翰 Dewey, John, 255
- 多拉德, 约翰 Dollard, John, 78 n. 86, 118, 262
- 多伊奇, 卡尔·W. Deutsch, Karl W., 133, 271, 284
- 多伊奇, 莫顿 Deutsch, Morton, 201 n. 71, 203, 281

E

- 厄尔, 爱德华·米德 Earle, Edward Mead, 90 n. 137
- 厄文 Ervin, 252
- 恩德鲁魏特, 京特 Endruweit, Guenter, xiv

F

- 法拉戈, 拉迪斯拉斯 Farago, Ladislas, 79 n. 90, 133 n. 19, 284
- 法伊勒, 阿瑟 Feiler, Arthur, 78 n. 45

- 凡勃伦, 索尔斯坦 Veblen, Thorstein, 19, 286
- 菲斯克, 玛乔莉 Fiske, Marjorie, 135 n. 29, 156 n. 116
- 费尔班克, 保尔 Fairbank, Paul, 181 n. 205
- 费许尔, 奥特马尔·冯 Verschuer, Otmar von, 21, 23-26
- 费伊, 西德尼 Fay, Sidney, 98 n. 178, 134
- 芬克尔斯坦, 路易斯 Finckelstein, Louis, 118 n. 251, 133, 148 n. 84
- 芬索德, 默尔 Fainsod, Merle, 179
- 弗格林, 卡尔·F. Voegelin, Carl F., 273
- 弗赖, 诺贝尔特 Frei, Norbert, 3 n. 11
- 弗赖尔, 汉斯 Freyer, Hans, 27
- 弗兰克, 劳伦斯·K. Frank, Lawrence K., 110 n. 221, 111 n. 223, 118
- 弗兰奇, 托马斯 French, Thomas, 111-112
- 弗里德, 汉斯·恩斯特 Fried, Hans Ernst, 111 n. 222
- 弗里德利希, 卡尔·J. Friedrich, Carl J., 46 n. 199, 75, 77 n. 81, 78, 83 n. 107, 99, 104, 108, 118, 130 n. 17, 132, 133 n. 17, 137 n. 140, 139, 146-147, 180 n. 202, 194, 203, 207 n. 100, 211, 233, 234 n. 203, 237 n. 221, 281, 284
- 弗洛姆, 恩里希 Fromm, Erich, 82 n. 103, 106 n. 202, 111 n. 222, 169, 284
-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Freud, Sigmund, 53, 102, 156, 257, 259
- 弗农, P.E. Vernon, P. E., 78-79
- 福布斯 Faubus, 263
- 福克斯, 爱德华 Fox, Edward, 139
- 福克斯, 勒妮 Fox, Renée, 168 n. 154
- 福勒, 亨利 Fowler, Henry, 122-123, 126
- 福特, 富兰克林 Ford, Franklin, 272-273
- 富兰克林, 约翰·霍普 Franklin, John Hope, 265
- 富勒, 朗·L. Fuller, Lon L., 233 n. 201

G

- 盖洛普, 乔治 Gallup, George, 75, 207 n. 100
- 高德特, 黑兹尔 Gaudet, Hazel, 191, 285
- 戈德斯坦, A. Goldstein, A., 104-105
- 格哈特, 乌塔 Gerhardt, Uta, x, 11 n. 38, 27

n. 113, 108 n. 210, 121 n. 264, 122 n. 266,
132 n. 16, 186 n. 8, 211 n. 119, 282, 284
格莱泽, 纳坦 Glazer, Nathan, 267-268, 282
格兰特, 尤利西斯 Grant, Ulysses, 图片 1
格劳巴德, 斯蒂芬 Graubard, Stephen, 184
格雷伯, 伊萨克 Graeber, Isaque, 83-84
格雷蒂, 皮尔斯·J. Gerety, Pierce
J., 181 n. 205, 182 n. 212
格雷尔, 杰弗里 Gorer,
Geoffrey, 75, 112 n. 226
格林, 威廉 Green, William, 20 n. 81
格鲁, 约瑟夫·C. Grew, Joseph C, 131 n. 13
格吕克, 谢尔顿 Glueck, Sheldon, 81 n. 101
格罗斯曼, 理查德 Grossman,
Richard, 130 n. 6
格罗特雅恩, 阿尔弗雷德 Grotjahn,
Alfred, 25 n. 105
格特, 汉斯 Gerth, Hans, 134, 284
龚普洛维奇, 路德维希 Gumpłowicz,
Ludwig, 20
古尔德, 马克 Gould, Mark, xiv
古尔德纳, 阿尔文 Gouldner, Alvin, 184
古尔维奇, 乔治 Gurvitch, Georges,
90, 93, 95 n. 158, 136
古里安, 瓦尔德马 Gurian, Waldemar, 86, 133
古斯塔夫斯, 阿道弗斯 Gustavus
Adolphus, 113

H

哈贝马斯, 尤尔根 Habermas, Jürgen, x
哈利, 阿利克斯 Haley, Alex, 250
哈列维, 埃利 Halévy, Elie, 31, 256
哈钦斯 Hutchins, 64
哈特, 保罗·K. Hart, Paul K., 189
哈特曼, 海因茨 Hartmann, Heinz, 111 n. 222
哈特索恩, 爱德华·Y. Hartshorne,
Edward Y., 65-66, 81, 91, 93, 110,
130, 131, 132, 134, 136, 284
哈维 Halevy, 57
海尔, 芭芭拉 Heyl, Barbara,
xiv, 131 n. 12, 284
海曼, 爱德华 Heimann, Eduard, 78 n. 85
海森堡, 维尔纳 Heisenberg, Werner, 53

汉德林, 奥斯卡 Handlin, Oscar, 90 n. 135
汉弗莱斯, 爱德华 Humphreys,
Edward, 111 n. 223
汉密尔顿, 彼得 Hamilton, Peter, 58 n. 1
汉密尔顿, 查尔斯 Hamilton, Charles, 265
汉密尔顿, 沃尔顿 Hamilton,
Walton, 64 n. 21, 69
豪, 莫德·德沃尔夫 Howe, Mard
deWolfe, 238 n. 228, 283
豪斯, 弗洛伊德·N. House, Floyd N., 2-3
豪泽, 菲利普·M. Hauser, Philip
M., 153, 262-263 n. 312
赫贝格, 威尔 Herberg, Will,
229, 240-241, 284
赫林, 彭德尔顿 Herring, Pendleton, 160-164
赫鲁晓夫, 尼基塔 Krushchev, Nikita, 203
赫舍尔, 苏珊娜 Herschel, Susannah, xiv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利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256
亨德森, 阿瑟·M. Henderson, Arthur M., 287
亨德森, 劳伦斯 Henderson, Lawrence, 255
亨利希, 迪特尔 Henrich, Dieter, xiv
洪堡, 威廉·冯 Humboldt,
Wilhelm von, 63 n. 14
胡塞尔, 埃德蒙德 Husserl, Edmund, 54
华德, 莱斯特 Ward, Lester, 20
华莱士, 亨利·A. Wallace, Henry A., 105
怀特, 威廉·F. White, William F., 81 n. 101
怀特, 温斯顿 White, Winston, 258-259
怀特海, 阿尔弗雷德·N. Whitehead,
Alfred N., 52, 255, 287
怀亚特博士 Wyatt, Dr., 81 n. 103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35, 46-47, 60, 104, 255-256 n
霍尔本, 豪约 Holborn, Hajo, 129 n. 4
霍尔顿, 罗伯特·S. Holton,
Robert S., x, 186, 283
霍夫兰, 卡尔·I. Hovland, Carl I., 155 n. 110
霍夫施塔特, 理查德 Hofstadter, Richard,
17 n. 65, 19-20, 68 n. 38, 266 n. 284
霍根, 米切尔 Hogan, Michael, 159 n. 129, 284
霍克海默, 马克斯 Horkheimer, Max, 82

n. 103, 118, 122 n. 267, 169 n. 158, 284
 霍林格尔, 大卫·A. Hollinger, David A., 250
 霍曼斯, 乔治·C. Homans, George C.,
 187, 212 n. 124, 220, 254-255, 258

J

基尔格尔 Kilgore, 150
 基斯佳科夫斯基 Kistiakowsky, 274
 基辛格, 亨利 Kissinger, Henry, 274
 吉布, 詹姆斯 Gibb, James, 265
 吉尔, 布兰奇 Geer, Blanche, 267 n. 333
 吉尔伯特, 菲利克斯 Gilbert, Felix, 129 n. 4
 吉特勒, L.F. Gittler, L. F., 79 n. 90, 284
 加德纳, 伯利·B. Gardner,
 Burleigh B., 262, 284
 加德纳, 玛丽·A. Gardner, Mary A., 262, 284
 贾诺维茨, 莫里斯 Janowitz,
 Morris, 4 n. 12, 130, 245, 284
 金, 马丁·路德 King, Martin Luther
 Jr., 196 n. 56, 264 n. 322
 金德尔伯格, 查尔斯 Kindleberger, Charles,
 31 n. 131, 126, 129 n. 4, 159 n. 129, 285
 金兹伯格, 伊莱 Ginzberg, Eli, 72

K

卡伯森, 威廉·帕顿 Culbertson,
 William Patton, 69 n. 44
 卡茨, 巴里 Katz, Barry, 103 n.
 197, 118 n. 246, 129 n. 4
 卡哈纳, 埃娃 Kahana, Eva, xiv
 卡赫纳 Kahane, Rabbi, 251
 卡米克, 查尔斯 Camic, Charles, x, 2
 n. 3, 7 n. 18, 64 n. 20, 69, 70 n. 50
 卡特勒, 艾迪森·T. Cutler,
 Addison T., 64 n. 20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 Keynes, John
 Maynard, 30, 32, 164, 185, 215, 285
 凯尔森, 卡尔 Kaysen, Carl, 274
 凯克斯凯梅蒂, 保罗 Kekskemeti, Paul, 274
 凯泽, 查尔斯 Kaiser, Charles, 225, 285
 凯泽, 菲利普·M. Kaiser, Philip M., 31
 n. 131, 122-125, 142 n. 57, 143 n. 59
 坎德尔, I.L. Kandel, I. L.,

106 n. 201, 111 n. 222
 坎农, 沃尔特 Cannon, Walter, 75
 坎特里尔, 哈德利 Cantril, Hadley, 75
 康德, 伊曼纽尔 Kant, Immanuel, 34, 51, 256
 考克斯, 阿奇博尔德 Cox,
 Archibald, 238-239, 242, 283
 考克斯, 哈维 Cox, Harvey, 241, 283
 柯林斯, 阿比盖尔 Collins, Abigail, xiv
 科尔曼, 詹姆斯 Coleman, James, 254-255
 科尔姆, 格拉德 Colm, Gerhard, 78 n. 85
 科贡, 尤金 Kogon, Eugen, 4 n. 12, 285
 科南特, 詹姆斯 Conant, James
 B., 91, 150, 159
 科奇尼希, 沃尔特·M. Kotschnig, Walter
 M., 105, 106 n. 201, 111 n. 222
 科塞, 刘易斯 Coser, Lewis, 221, 225, 283
 科万, 托马斯·A. Cowan,
 Thomas A., 235-236
 克拉克, 肯尼斯·B. Clark, Kenneth B.,
 237 n. 220, 261 n. 303, 263, 265, 282
 克拉克洪, 克莱德 Kluckhohn, Clyde,
 109-110, 118, 133, 136, 147-149,
 152, 154, 157, 178-179, 211, 285
 克拉奇菲尔德, 理查德 Crutchfield,
 Richard, 111 n. 222
 克莱, 卢修斯 Clay, Lucius D., 147
 克莱顿, 奥比 Clayton, Obie, 262 n. 309
 克莱格, 戈登 Craig, Gordon, 31
 n. 131, 85 n. 118, 283
 克劳斯纳, 萨缪尔·Z. Klausner,
 Samuel Z., 85 n. 116, 154 n. 108,
 156 n. 114, 160 n. 131, 285
 克勒, 埃里希 Kähler, Erich, 78 n. 85, 286
 克里斯, 恩斯特 Kris, Ernst, 75, 111 n. 222
 克里斯托尔, 欧文 Kristol, Irving,
 230 n. 192, 268 n. 341, 283
 克龙, 克劳斯-迪特尔 Krohn,
 Claus-Dieter, 78 n. 85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04
 克洛尔德, 理查德 Cloward, Richard, 266
 克洛彭堡, 詹姆斯·T. Kloppenburg,
 James T., 68 n. 38, 285

克平,克劳斯-彼得 Koepping,
Klaus-Peter, xiv

肯尼迪,罗伯特·F. Kennedy,
Robert F., 197 n. 56

肯尼迪,约翰·F. Kennedy, John F.,
131 n. 13, 184, 194, 196 n. 56, 203,
223, 240, 241, 242, 258, 261, 278

肯尼迪,约瑟夫·P. Kennedy,
Joseph P., 74 n. 68

孔茨,保罗·G. Kuntz, Paul
G., 239 n. 233, 285

孔德,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7, 95

库比,劳伦斯·S. Kubie,
Lawrence S., 111-112

库蒂斯,艾伯特 Curtis, Alberta,
135 n. 29, 156 n. 116

库恩,卡尔顿·史蒂文斯 Coon,
Carleton Stevens, 83 n. 107

库欣,理查德·詹姆斯 Cushing,
Richard James, 240

L

拉波夫,威廉 Labov, William, 266

拉尔森,锡德里克 Larson, Cedric, 133 n. 18

拉斯威尔,哈罗德 Lasswell, Harold,
38 n. 163, 47 n. 203, 60, 73-74, 99
n. 180, 106 n. 202, 133, 138, 143,
171 n. 172, 190 n. 23, 211, 285

拉瓦锡 Lavoisier, 57

拉扎斯菲尔德,保罗·F. Lazarsfeld, Paul
F., 118, 191, 221, 248, 266-267, 283, 285

腊岑霍夫,古斯塔夫 Ratzenhofer, Gustav, 21

莱德雷尔,埃米尔 Lederer, Emil, 78 n. 85

莱顿,亚历山大 Leighton,
Alexander, 149, 152, 157, 285

莱恩巴格,保罗·M.A. Linebarger,
Paul M. A., 130 n. 5

莱赫纳,弗兰克 Lechner, Frank, 60

莱曼,爱德华 Lehman, Edward, xiv

莱姆克,克里斯蒂娜 Lemke, Christiane, xiv

莱文,唐纳德 Levine, Donald, xiv, 3 n. 10

莱茵施泰因,马克斯 Rheinstein,
Max, 237 n. 223, 286

赖克,西奥多 Reik, Theodor, 78 n. 86

赖利,约翰·W. Riley, John W., Jr., 160-164

赖斯,阿尔伯特·J. Reiss, Albert J., 189

赖特,昆西·威廉 Wright, Quincy
William, 133, 201 n. 71, 281

兰德海尔,巴塞洛缪 Landheer,
Bartholomew, 90, 135, 199

兰格,威廉 Langer, William, 129, 131, 182

朗,丹尼斯 Wrong, Dennis, 180

朗,休伊 Long, Huey, 73

劳施宁,赫尔曼 Rauschnig, Hermann, 86

勒纳,丹尼尔 Lerner, Daniel, 130

勒韦尔,罗杰 Revelle, Roger, 272

勒温,库尔特 Lewin, Kurt, 75,
107, 111 n. 222, 118, 285

雷恩沃特,李 Rainwater, Lee, 217, 286

雷斯曼,列奥纳德 Reissman, Leonard, 188

李,阿尔伯特·麦克拉 Lee,
Albert McClung, 118

李嘉图,大卫 Ricardo, David,
14, 15 n. 49, 30, 31, 255

李普塞特,西摩·马丁 Lipset,
Seymour Martin, 206 n. 97, 210,
228 n. 182, 234 n. 203, 259 n. 297,
262, 267-268 n. 340, 283, 285

里斯曼,大卫 Riesman, David, 259,
266 n. 331, 267 n. 335, 286

李克特,伦西斯 Lickert, Rensis, 118, 135

利皮特,罗纳德 Lippitt, Ronald, 107 n. 205

利维,大卫 Levy, David, 75, 157 n. 120

利兹,维克多 Lidz, Victor, xiv, 85 n.

116, 154 n. 108, 156 n. 114, 160 n. 131,
180 n. 202, 231 n. 196, 282, 285

列昂捷夫,瓦西里 Leontief,

Wassily, 164, 271, 273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Lenin,
Vladimir Ilyitch, 176

林德,罗伯特 Lynd, Robert, 56

林肯,亚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223

林赛, A.D. Lindsay, A. D., 31 n. 131

卢梭,让·雅克 Rousseau, Jean Jacques, 248

鲁赫,弗洛伊德·L. Ruch, Floyd

- L., 79 n. 90, 131, 284
 鲁缅采夫, 阿列克赛·M. Rumiantsev, Aleksei M., 275
 路德维希, 埃米尔 Ludwig, Emil, 141
 罗伯逊, 赫克特·门蒂思 Robertson, Hector Menteith, 70-71
 罗尔丝, 安妮 Rawls, Anne, xiv
 罗尔斯, 约翰 Rawls, John, 237 n. 221, 286
 罗斯, 阿诺德·马歇尔 Rose, Arnold Marshall, 286
 罗斯福, 爱莉诺 Roosevelt, Eleanor, 99
 罗斯福, 富兰克林 Roosevelt, Franklin D., 30, 34 n. 143, 105, 121 n. 263, 150, 151, 191, 207 n. 100, 278
 罗斯托, 沃尔特 Rostow, Walt, 31 n. 131, 131, 159 n. 129
 罗索夫斯基, 亨利 Rosovsky, Henry, 264-265
 罗西, 彼得 Rossi, Peter, 188
 罗西瑙, 詹姆斯 Rosenau, James A., 201 n. 71, 202 n. 78, 203 n. 81
 罗谢, 居伊 Rocher, Guy, 283
 罗辛斯基, 赫伯特 Rosinski, Herbert, 81-82 n. 103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35, 46-47, 248
 洛奇, 约翰·卡博特 Lodge, John Cabot Jr., 74
 洛维特, 卡尔 Löwith, Karl, 134
 洛温塔尔, 列奥 Lowenthal, Leo, 259 n. 297
 洛伊巴, 克拉伦斯 Leuba, Clarence, 106 n. 202
- M**
- 马丁, 阿尔伯特·P. Martin, Albert P., 97 n. 171
 马尔库塞, 赫伯特 Marcuse, Herbert, 129 n. 4, 284
 马尔萨斯, 托马斯 Malthus, Thomas, 28, 255
 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 Macchiavelli, Nicolo, 35
 马克思, 卡尔(含马克思主义) Marx, Karl (incl. Marxism), 15 n. 49, 30, 95, 96, 161, 181, 185, 190 n. 23, 222-223, 255
 马克斯韦尔, 罗伯特 Maxwell, Robert, 199 n. 66
 马夸特-比格曼, 彼得拉 Marquardt-Bigman, Petra, 131 n. 10
 马奎斯, 唐纳德 Marquis, Donald, 160
 马林诺夫斯基, 布朗尼斯劳 Malinowski, Bronislaw, 53
 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 Marshall, Alfred, 7, 35-36, 45-16, 222-223
 马歇尔, 乔治·C. Marshall, George C., 159 n. 127
 马歇尔, 托马斯·汉弗莱斯 Marshall, Thomas Humphreys, 187, 227, 236, 260, 263, 285
 迈尔, 卡尔 Mayer, Carl, 83 n. 107
 迈耶, 阿道夫 Meyer, Adolf, 111 n. 222
 迈因茨, 雷纳塔 Mayntz, Renate, xiv
 麦基佛, 罗伯特 MacIver, Robert, 118 n. 251, 133, 148 n. 84, 233-234, 266
 麦卡锡, 尤金 McCarthy, Eugene, 279
 麦卡锡, 约瑟夫·P. McCarthy, Joseph P., 187, 210, 254, 263
 麦克菲, 威廉·N. McPhee, William N., 191, 283
 麦克劳林, 詹姆斯·A. McLaughlin, James A., 81n
 麦克利什, 阿奇博尔德 MacLeish, Archibald, 99 n. 182
 麦克纳马拉, 罗伯特 McNamara, Robert, 272
 曼, 克劳斯 Mann, Klaus, 130 n. 6
 曼, 托马斯 Mann, Thomas, 130 n. 6
 曼海姆, 卡尔 Mannheim, Karl, 47 n. 205
 梅, 斯泰茜 May, Stacy, 69 n. 46
 梅奥, 艾尔顿 Mayo, Elton, 81 n. 101
 梅茨格, 沃尔夫冈 Metzger, Wolfgang, 266 n. 329, 284
 梅尔, 查尔斯 Maier, Charles, xiv
 梅尔, 诺曼 Maier, Norman, 38 n. 163, 285
 梅雷迪斯, 詹姆斯·H. Meredith, James H., 197
 梅林, 西德尼·L.W. Mellen, Sydney L. W., 108 n. 211
 梅森, 爱德华·S. Mason, Edward S., 68
 梅森, 乔治 Mason, George, 131
 梅特罗, 阿尔弗雷德 Metraux, Alfred, 112 n. 226
 梅特罗, 罗达 Metraux, Rhoda, 111 n.

222, 112 n. 226, 135 n. 31, 285
 梅休, 利昂 Mayhew, Leon, 217, 285
 门格勒, 约瑟夫 Mengele, Josef, 26 n. 111
 门格斯, 卡尔 Menges, Karl, 180
 米德, 玛格丽特 Mead, Margaret, 60,
 75, 111 n. 222, 112-113, 115, 117,
 123 n. 268, 133, 135, 141, 147-148,
 155 n. 111, 222 n. 160, 285
 米德, 乔治·赫伯特 Mead, George
 Herbert, 48, 53, 102 n. 194, 257, 285
 米尔, 约翰·斯图尔特 Mill, John
 Stuart, 12 n. 40, 16 n. 59
 米尔, 詹姆斯 Mill, James, 31
 米尔克, 弗雷德 Mielke, Fred, 4 n. 12
 米尔斯, C. 赖特 Mills, C. Wright, 187-191
 迈克尔约翰, 亚历山大 Meiklejohn,
 Alexander, 63-64, 69, 133, 285
 米勒, 克莱德·R. Miller, Clyde R., 79 n. 89
 米利斯 Millis, 240
 米利翁希科夫, M.D. Millionsheikov,
 M. D., 274
 米切尔, 威廉·C. Mitchell, William C, x, 283
 米切利希, 亚历山大 Mitscherlich,
 Alexander, 4 n. 12
 米歇尔斯, 罗伯特 Michels, Robert, 224 n. 169
 明希, 理查德 Münch, Richard, 186
 缪尔达尔, 贡纳尔 Myrdal,
 Gunnar, 120, 262, 286
 摩根索, 亨利 Morgenthau, Henry Jr.,
 120, 121 n. 261, 126, 280, 286
 莫尔顿, 哈罗德 Moulton, Harold, 20 n. 81
 莫勒, O. 霍巴特 Mowrer, O. Hobart, 106-107
 莫勒, 埃德加·安塞尔 Mowrer,
 Edgar Ansell, 98 n. 178, 286
 莫罗特-西尔, 爱德华 Morot-
 Sir, Edouard, 221
 莫伊尼汉, 帕特里克·丹尼
 尔 Moynihan, Patrick Daniel, 217
 n. 146, 263 n. 312, 282, 286
 墨菲, 加德纳 Murphy, Gardner,
 75, 111 n. 222, 145 n. 70
 墨索里尼, 贝尼托 Mussolini, Benito, 224

默顿, 罗伯特·K. Merton, Robert K., xiv, 65,
 91, 134-136, 156 n. 116, 168-169, 286
 默里, 亨利·A. Murray, Henry A.,
 75, 81 n. 101, 133, 144, 156
 穆尔, 威尔伯特 Moore, Wilbert, 118

N

纳尔逊, 本杰明 Nelson, Benjamin, 233 n. 201
 奈泽, 路易斯 Nizer, Louis, 118 n. 249
 尼科尔斯, 劳伦斯 Nichols, Lawrence, 283
 尼克松, 理查德 Nixon, Richard, 251-254
 尼斯比特, 罗伯特 Nisbet, Robert, 270
 纽曼, 弗朗兹·L. Neumann, Franz
 L., 103-104, 122 n. 267, 286
 诺斯, 塞西尔·N. North, Cecil N., 189

P

帕尔莫尔, 约瑟夫·R. Palmore,
 Joseph R., 178 n. 199
 帕累托, 威尔弗雷多 Pareto, Vilfredo,
 7, 10, 27, 28, 32-33, 35-36, 39 n.
 170, 40-44, 47, 49, 222-223
 帕普克, 斯文 Papcke, Sven, xiv
 帕森斯, 埃斯特 Parsons, Esther, 图片 2, 4
 帕森斯, 爱德华·史密斯 Parsons,
 Edward Smith, 68 n. 42, 69, 图片 1, 4
 帕森斯, 安妮 Parsons, Anne, 图片 3
 帕森斯, 查尔斯 Parsons,
 Charles, xiv, 图片 3, 181
 帕森斯, 查尔斯·爱德华兹 Parsons,
 Charles Edwards, 图片 2, 4
 帕森斯, 海伦·沃克 Parsons, Helen
 Walker, 图片 4, 10, 177
 帕森斯, 玛丽·奥古斯塔·英格索尔 Parsons,
 Mary Augusta Ingersoll, 图片 2, 4
 帕森斯, 小爱德华·史密斯 Parsons,
 Edward Smith Jr., 图片 2, 4
 帕森斯, 伊丽莎白·英格索尔 Parsons,
 Elisabeth Ingersoll, 图片 2, 4
 帕特森, 奥兰多 Patterson, Orlando, 266
 佩蒂格鲁, 托马斯 Pettigrew,
 Thomas, 263 n. 312
 佩里, 拉尔夫·巴顿 Perry,

Ralph Barton, 75, 133

- 佩里, 约翰 Perry, John, 99, 100 n. 184
 彭罗斯, E.H. Penrose, E. H., 120 n. 260
 平森, 克佩尔 Pinson, Koppel, 111 n. 222
 珀塞尔, 爱德华 Purcell, Edward, 272
 普拉特, 吉拉德 Platt, Gerald, 243 n. 245, 270
 普莱斯, 吕西安 Price, Lucien, 63 n. 18
 普勒茨, 阿尔弗雷德 Ploetz,
 Alfred, 21-23, 25, 32
 普洛克特, 罗伯特 Procter,
 Robert, 22 n. 94, 26 n. 111
 普特南, 特雷西 · J. Putnam,
 Tracy J., 111 n. 222

Q

- 齐美尔, 格奥尔格 Simmel, Georg, 33 n. 140
 齐姆科, 厄尔 · F. Ziemke, Earl
 F., 136 n. 39, 139 n. 46

S

- 萨顿, 弗朗西斯 Sutton, Francis X., 274
 萨哈罗夫, 安德烈 Sacharov, Andrej, 278
 萨林, 埃德加 Salin, Edgar, 70 n. 50
 萨洛蒙, 戈特弗列德 Salomon,
 Gottfried, 21 n. 90
 萨姆纳, 威廉 · 格雷厄姆 Sumner, William
 Graham, xii, 12, 17-20, 30, 32, 255
 萨奇曼, 爱德华 · A. Suchman,
 Edward A., 155 n. 110, 286
 萨伊, 让 · 巴蒂斯特 Say, Jean
 Baptiste, 14 n. 49
 塞尔兹尼克, 菲利普 Selznick,
 Philip, 267-268
 塞泽, 西奥多 · R. Sizer,
 Theodore R., 242 n. 242
 桑巴特, 沃纳 Sombart, Werner, 33, 233
 沙弗拉内克博士 Safranek, Dr., 90
 沙利文, 哈里 Sullivan, Harry, 78
 沙利文, 哈利 · 斯塔克 Sullivan,
 Harry Stack, 78
 沙普利, 哈洛 Shapley, Harlow, 181
 舍恩鲍姆, 大卫 Schoenbaum, David, 65 n. 26
 舍尔廷, 亚历山大 · 冯 Schelting,
 Alexander von, 27 n. 113, 286
 舍夫勒, 亚当 Schaeffle, Adam, 21
 舍勒, 马克斯 Scheler, Max, 47 n. 205
 施莱尔辛格, 阿瑟 · M. Schlesinger,
 Arthur M., 81 n. 101
 施莱尔辛格, 小阿瑟 · M.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81 n. 101, 131, 184,
 187 n. 10, 194 n. 44, 286
 施莱尔辛格, 伊丽莎白 Schlesinger,
 Elizabeth, 136
 施雷克, 埃伦 Schrecker, Ellen, 183 n. 214
 施莫勒, 古斯塔夫 (· 冯) Schmoller,
 Gustav (von), 68 n. 41
 施耐德, 大卫 Schneider, David, 250, 286
 施诺雷, 列奥 · F. Schnore, Leo F., 234 n. 203
 施派尔, 汉斯 Speier, Hans, 78
 n. 85, 203 n. 80, 279, 286
 施潘, 奥斯马尔 Spann, Othmar,
 23-25, 27, 55 n. 235
 施普拉格, 西奥多 · W. Sprague,
 Theodore W., 96 n. 163
 施塔格尔, 尤斯廷 Stagl, Justin, xiv
 施塔默, 奥托 Stammer, Otto, 图片 8
 施特恩, 弗里茨 Stern, Fritz, x
 施特尔特, 尼科 Stehr, Nico, 7 n. 18
 施特劳斯, 安瑟伦 Strauss, Anselm, 267 n. 333
 施瓦布, 格拉尔德 Schwab, Gerald, 61 n. 7
 史蒂文森, 乔治 Stevenson, George, 111 n. 223
 史密斯, 爱德华 · 帕米列 Smith,
 Edward Pamelee, 图片 1
 史密斯, 大卫 · H. Smith, David H., 284
 史密斯, 丹尼斯 Smith, Dennis, 130 n. 6
 史密斯, 理查德 · H. Smith, Richard
 H., 129, 131 n. 13, 149, 286
 舒尔茨, 西格丽德 Schultz, Sigrid, 111 n. 222
 舒曼, 弗雷德里克 · L. Schumann,
 Frederick L., 90 n. 136
 舒斯特, 乔治 · N. Shuster, George N., 133
 斯宾格勒, 奥斯瓦尔德 Spengler,
 Oswald, 53, 54 n. 226/227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xiii,
 7-8, 12-14, 15n. 51, 16-18, 30-31,

32, 52, 56, 95, 96, 166, 255, 276
 斯蒂尔, 理查德 · W. Steel,
 Richard W, 98 n. 179
 斯蒂文斯, 斯坦利 · S. Stevens,
 Stanley S., 79 n. 90, 284
 斯梅尔塞, 尼尔 Smelser, Neil, xiv,
 192, 193, 234 n. 203, 281, 285
 斯内尔, 约翰 · L. Snell, John L., 203 n. 80
 斯坦伯格, 米切尔 · 斯蒂文 Steinberg,
 Michael Steven, 65 n. 26
 斯特恩, 伯纳德 · J. Stern, Bernard J., 20 n. 88
 斯特纳, 理查德 Sterner, Richard, 286
 斯廷森, 亨利 · A. Stimson,
 Henry A., 121 n. 262
 斯通奎斯特, 埃弗里特 Stonequist,
 Everett, 83 n. 107
 斯托弗, 萨缪尔 · 安德鲁 Stouffer, Samuel
 Andrew, 133, 155, 158 n. 125, 180-182, 286
 斯威齐, 保罗 · E. Sweezy, Paul E., 129
 索恩, 道格拉斯 · A. Thorn,
 Douglas A., 111 n. 222/223
 索罗金, 皮季里姆 Sorokin, Pitirim,
 37 n. 153, 53-56, 89
 索普, 威利亚德 · 朗 Thorp,
 Williard Long, 图片 5

T

塔尔德, 加布里埃尔 Tarde, Gabriel, 192
 塔尔科特, 凯瑟琳 Talcott, Katherine, 图片 2
 泰勒, A.J.R. 弗雷泽 Taylor,
 A. J. R. Frazer, 72-74
 泰勒, 埃德蒙德 Taylor, Edmund, 75
 泰勒, 哈罗德 Taylor, Harold, 154 n. 109
 汤普森, 劳拉 Thompson, Laura, 111 n. 222
 特雷维尼奥, 哈维尔 Trevino, Xavier, xiv, 283
 特里林, 莱昂奈尔 Trilling, Lionel, 273
 特纳, 布赖恩 · S. Turner, Bryan
 S., x, xiv, 186, 283
 滕尼斯, 费迪南德 Toennies,
 Ferdinand, 96, 233
 铁托, 约瑟普 Tito, Jossip, 279
 涂尔干, 埃米尔 Durkheim, Émile, ix,
 xiii, 7, 27, 28, 32-34, 37-45, 49, 52,

80, 166, 222-223, 226, 232, 245 n.
 254, 246, 248-249, 255-257, 281
 托比, 杰克逊 Toby, Jackson, 231 n. 196
 托马斯, 凯瑟琳 Thomas, Catherine, 110 n. 218
 托马斯, 威廉 · I. Thomas, William
 I., 53, 165-166, 211 n. 119
 托尼, 理查德 Tawney, Richard, 70, 286
 托皮奇, 恩斯特 Topitsch, Ernst, 图片 8
 托伊伯, 康拉德 Taeuber, Conrad, 153

W

瓦格纳, 阿道夫 Wagner, Adolf, 68 n. 41
 威尔伯, 拉伊 · 莱曼 Wilbur, Ray Lyman, 64
 威尔基, 温德尔 Willkie, Wendell, 191
 威尔逊, E. 布莱特 Wilson, E. Bright, 272
 威尔逊, 哈罗德 Wilson, Harold, 130 n. 6
 威尔逊, 托马斯 · J. Wilson,
 Thomas J., 204 n. 89
 威尔逊, 伍德罗 Wilson, Woodrow, 223
 威金斯, J.R. Wiggins, J. R., 238 n. 228
 威利茨, 约瑟夫 Willetts, Joseph, 91n. 144
 威廉斯, 罗宾 · M. Williams, Robin
 M., 153, 155 n. 110, 286
 韦伯, 马克斯 Weber, Max, ix, x, xiii, 4,
 21, 27 n. 113, 30, 32-34, 37, 39-46,
 49, 51-52, 70-71, 87-89, 94, 127, 图
 片 8, 141, 166, 174, 185, 196, 203, 204
 n. 84, 206, 211, 214, 222-224, 232 n.
 197, 255-257, 267, 276, 279, 287
 韦尔特福特, 海伦妮 Veltfort, Helene R.,
 144 n. 66, 145 n. 67, 146 n. 73, 283
 韦斯, 埃德温 Weiss, Edwin, 111 n. 223
 韦特海默, 马克斯 Wertheimer, Max, 78 n. 85
 维尔德, 罗伯特 Waelder,
 Robert, 93n., 111 n. 222
 维纳, 罗恩 Wiener, Ron, 178 n. 199
 维特查, 埃莱娜 Vitcha, Elaine, 245 n. 251
 维泽, 利奥波德 · 冯 Wiese,
 Leopold von, 图片 8
 魏特夫 Wittfogel, Karl August, 80 n. 94
 温伯格, 卡斯帕尔 · W. Weinberger,
 Caspar W, 81 n. 101
 温克尔曼, 约翰内斯 Winkelmann,

- Johannes, 46 n. 198
 温克勒, 阿伦·M. Winkler, Allan M., 98 n. 179, 129 n. 2
 温克斯, 罗宾·W. Winks, Robin W, 129 n. 3
 温塞特, 西格丽德 Undset, Sigrid, 111 n. 222
 文德利希, 弗里达 Wunderlich, Frieda, 78 n. 85
 文森 Vinson, 151
 沃恩, 布鲁斯 Wearne, Bruce, x, xiv, 283
 沃尔什, 大卫·I. Walsh, David I., 74
 沃格林, 埃里克 Voegelin, Eric, 85-86, 图片 10
 沃林, 谢尔顿·S. Wolin, Sheldon S., 267 n. 336, 268 n. 340, 285
 沃伦, 厄尔 Warren, Earl, 187
 沃纳, 劳埃德 Warner, Lloyd, 118, 206 n. 97, 262, 286
 沃森, 古德温 Watson, Goodwin, 75, 107 n. 206, 145 n. 70, 287
 沃森, 克雷格 Watson, Craig, 265
 沃思, 路易 Wirth, Louis, 2, 4 n. 3, 50-51, 133, 279
 乌利希, 罗伯特 Ulich, Robert, 81 n. 101
 伍德沃德, C. 范恩 Woodward, C. Vann, 271
 伍尔夫, 约瑟夫 Wulf, Joseph, 65 n. 26, 286

X

- 西尔斯, 大卫 Sills, David, 245 n. 252
 西摩尔, 查尔斯 Seymour, Charles, 20 n. 81
 希尔伯格, 劳尔 Hilberg, Raul, 61 n. 7, 284
 希尔德林, 约翰 Hilldring, John, 136
 希尔斯, 爱德华·A. Shils, Edward A., 130, 163 n. 138, 168 n. 154, 245, 287
 希斯, 阿尔杰 Hiss, Alger, 181
 小斯基林, E. Skillin, E. Jr., 146 n. 78

- 谢林, 托马斯 Schelling, Thomas, 274
 熊彼得, 约瑟夫 Schumpeter, Joseph, 6-7, 51
 休斯, 埃弗里特·C. Hughes, Everett C., 267 n. 333

Y

- 雅各布逊, 罗曼 Jakobson, Roman, 204-205
 亚当斯, 沃尔特·A. Adams, Walter A., 262 n. 305, 286
 亚尔莫林斯基, 亚当 Yarnolinsky, Adam, 274
 亚历山大, 弗朗兹 Alexander, Franz, 111 n. 222/224, 133
 亚历山大, 杰弗里 Alexander, Jeffrey, x, xiv, 58 n. 1, 70 n. 50, 133, 186, 282, 283
 扬, 金博尔 Young, Kimball, 79, 284
 扬, 韦兰 Young, Wayland, 199 n. 66
 耶基斯, 罗伯特 Yerkes, Robert, 75, 154
 伊斯顿, 戴维 Easton, David, 209 n. 112, 210 n. 116, 211
 英格尔斯, 阿利克斯 Inkeles, Alex, xiv, 179 n. 201, 231 n. 196, 284
 英格索尔, 拉尔夫 Ingersoll, Ralph, 90 n. 138
 约翰斯顿, 巴里 Johnston, Barry V., 158 n. 125, 283
 约翰逊, 林登·B. Johnson, Lyndon B., 131 n. 13, 187, 242, 263, 271-272
 云克, 比福德·M. Junker, Buford M., 262 n. 305, 286

Z

- 泽尔蒂奇, 莫里斯 Zelditch, Morris, 221
 詹克斯, 克里斯多弗 Jenks, Christopher, 267 n. 335, 286
 张伯伦, 内维尔 Chamberlain, Neville, 74
 兹纳涅茨基, 弗洛里安 Znaniecki, Florian, 165-166, 211 n. 119

中外机构、团体、院校等专名索引

A

阿默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xii,
62-64, 69 n. 46, 图片 5, 146, 217 n. 142

B

波茨坦会议 Potsdam Conference, 123, 125
布雷顿森林会议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120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 n. 81
布鲁克林学院 Brooklyn College, 90

C

参谋局(调研处)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Research & Analysis Branch), 103 n.
197, 129, 131-132, 135, 153, 154 n. 109

D

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College, 190 n. 24
德奥事务处 Division of German and
Austrian Affairs, 159, n. 129
德国社会学学会 German Sociological
Society, 21, 图片 3
对英军援委员会(运动) Militant Aid to Britain
Committee (Campaign), 74, 133 n. 20, 278

F

反战同盟 the Pacifist League, 75 n.69
非籍与非裔美籍学生联合会 Association of
African and Afro-American Students, 264
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181, 183
非美活动委员会 Committee on Un-
American Activities, 180-182
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 160, 187, 274
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36

G

高等研究独立学校 / 社会学研究中
心 Centre D'Études Sociologiques/
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 90
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121 n.
265, 133, 134-135, 179, 191, 231, 268-269
公共事业振兴署 Works Program
Administration, WPA, 262
公共卫生署 Public Health Service, 154
国际防治癫痫病联盟美国分部 American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110
国际组织雇员忠诚委员会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mployees
Loyalty Board, 181 n. 205
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54 n. 109
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 110
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xiii, 149-151, 154
国家资源计划署 National Resource
Planning Board, 154
国民士气委员会 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 75, 91
国务院 State Department, 131
国务院德奥事务处 Division of German
and Austrian Affairs, 126, 159 n. 129

H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x, xiv, 6,
9, 33 n. 140, 53, 90, 109, 129-131, 134,
136 n. 36, 149, 177, 179, 180, 184, 213,
238, 243, 268, 271-273, 276-278
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149, 154, 178-180
 哈佛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项目 Afro-American Studies Program, 264-266
 哈佛大学海外管理学院 Harvard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 108-109, 127, 图片 7, 136-137 n. 40, 145, 147, 148, 154
 哈佛大学经济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64
 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图片 7, 149, 158 n. 125, 163 n. 138, 193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62
 哈佛大学文理教授会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264
 哈佛大学学生会 Harvard Student Union, 74, 178
 哈佛大学亚当斯楼 Adams House, 66
 海德堡 Heidelberg, x, 5, 65 n. 27, 70 n. 50, 124, 256
 捍卫美国哈佛小组 American Defense Harvard Group/ Harvard Defense Group, 80, 81-82, 91, 106, 127, 131, 133, 136 n. 37, 137, 138-139, 145, 154, 278
 核科学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 152
 荷兰情报局 Netherlands Information Bureau, 90

J

基督教青年会 YWCA, 75 n. 69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67-268
 价格管理署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154 n. 109
 剑桥社区议事会 Cambridge Community Council, 136
 军管政府和国际共管机构委员会 Committees on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137 n. 41

K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243

坎布里奇妇女社区联合会 Womens' Neighborhood League of Cambridge, 75 n. 69
 科学、哲学、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之关系会议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118, 133-134 n. 23, 137-138, 143-144, 147-148, 278
 科研署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 149-151

L

拉特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160
 劳工统计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54
 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ttee, 154 n. 109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 “联总” United Nations Rehabilitation and Relief Agency/UNRRA, 111
 联合国组织 (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incl. UNESCO), 106, 124, 154 n. 109, 180, 198-203
 陆军部 War Department
 陆军部马歇尔将军办公室 Marshall Provost General's Office, 113, 132
 陆军部民事处 Civil Affairs Division, 136-137, 141, 153
 陆军部情报与教育处研究科 Research Branch of War Department'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 158
 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70, 121 n. 265, 图片 4
 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91, 136 n. 34, 154 n. 109

M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5 n. 69, 159 n. 129
 马萨诸塞历史学会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238
 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促进会 Massachusetts Committee on Public Safety, 145
 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228, 249
 麦格劳-希尔 (出版社) McGraw

Hill (Publisher), 8, 71
 美东产业人员安全委员会 Eastern Industrial Personnel Security Board, 180, 181
 美东社会学学会 Easter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95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图片 6, 182-183, 243, 278
 美国公务人员委员会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181 n. 205
 美国教育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f Education, 262
 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8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10
 美国精神分析学会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10
 美国精神缺陷学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ental Deficiencies, 110
 美国军方特训项目(及民事培训项目) United States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 (and Civil Affairs Training Program), 136-137, 139-141, 177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52, 278
 美国劳联—产联 the CIO and the AFL, 75 n. 69
 美国青年委员会 American Youth Commission, 262
 美国社会学协会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图片 6, 246, 275
 美国神经病学学会 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 110
 美国文理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6, 184, 187, 273-275, 278
 美国心身问题研究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Psychosomatic Problems, 110
 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 American Ortho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10, 203, 243
 美国医学协会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1 n. 38, 64 n. 21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18
 美国舆论研究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4, 207 n. 100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135
 美国哲学协会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208
 美国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Polit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 233
 民事署 Civil Affairs Division, CAD, 136
 民主议事会 Council for Democracy, 75-76, 127, 132-133, 137, 138, 276, 278

N

纽约大学华盛顿广场学院 New York University Washington Square College, 130
 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 City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63
 农经署 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54 n. 109, 156
 农业人口与农村福利处 Division of Farm Population and Rural Welfare, 154n. 109

O

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Marshall Plan), 158-159

Q

情报处协调官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Office (COI), 91, 97, 129, 131, 135
 全国饮食习惯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ommittee on Food Habits, 123 n. 268
 全美争取西班牙自由委员会 American Committee for Spanish Freedom, 180

S

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学会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 S.P.S.S.I., 145
 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78
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
生院 Graduate Facult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78 n. 85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xiii, 130 n. 7,
153-160, 160-164, 177, 277
社区服务学会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159
士气与国民联合委员会 Committee
on Morale and National Unity, 81

T

塔夫茨大学 Tufts University, 75 n. 69
特供与发放局 Supply Priorities
and Application Board, 158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154 n. 109
图兰大学 Tulane University, 134

W

瓦萨尔学院 Vassar College, 267
外国经济管理署(敌国处)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FEA (Enemy Branch),
61, 121-126, 127, 132, 137, 142, 154
外国士气分析科 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 148
威廉皇帝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优
生学研究所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Genetics, and Eugenics, 21
韦尔斯利社区事务学院 Wellesley
School of Community Affairs, 136
韦尔斯利学院 Wellesley College, 75 n. 69

X

西蒙斯学院 Simmons College, 75 n. 69

(古) 希腊 Greece (classic), 89, 232, 258
项目调查处 Division of Program Surveys, 135
心理战处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110, 130 n. 6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83
学术援助理事会(科学知识保护学
会) 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65 n. 24
学术自由和固定教职特别委员
会 Special Committee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 183

Y

研究与统计署 Bureau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158
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9, 129, 136 n. 38
医疗保健开支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Cost of Medical Care, 64, 285
约翰·伯奇社 John Birch Society, 187
约翰·里德学会哈佛分部 Harvard
branch of the John Reed Society, 180

Z

战情局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98 n.
179, 99, 129-130, 131-132, 152, 153, 157
战争动员与复员局 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 and Reconversion, OWMR, 151
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48, 64, 102 n. 194, 130, 136 n. 38,
154 n. 109, 188, 211, 234, 262
资情局 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
OFF, 98, 99 n. 182, 135, 156
综情局心理处 Psychology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COI
总统研究局 President's Research Board, 154

中外主题索引

B

- “北欧日耳曼”人 “Nordic” man, 27
 变迁 change, 亦参: 革命, 社会变迁
 不安全感 insecurity, 38, 73-74
 孤立主义下的不安全感 in
 isolationism, 73, 75
 不安全感与偏见 and prejudice, 72, 94-95,
 96-97, 120, 140-141, 143-144
 不安全感对比安全感 vs.
 security, 46-47, 116, 123
 不安全感与系统病理 system
 pathology, 212-215, 216
 亦参: 侵犯性, 失范, 强制, 偏离, 原教旨主
 义, 工业化, 现代化, 社会解组, 极权主义

C

- 承担 commitment
 民主体制下的承担对比遵从 vs.
 conformity, in democracy, 48, 76,
 99-100, 168-169, 196-198, 202, 218
 承担与文化意义建构 and cultural meaning
 construction, 218, 223, 249-251
 承担作为互动媒介 as interaction
 medium, 210-214, 216
 “通胀/紧缩”中承担的丧失 loss, in
 “inflation/deflation”, 101, 215, 229
 承担与价值整合、模式维持、共同体 and
 value integration, pattern maintenance,
 community, 101, 210, 233-236
 亦参: “银行交易”, 四功能图式, 影响, 制度,
 互动媒介, 权力, 意愿论
 冲突 conflict
 冲突对比共识 vs. consensus,
 192-193, 201, 228-231
 反“冲突理论” anti-“conflict
 theory”, 186-187, 225

- 社会结构中的张力 strain in social
 structure(s), 119, 170-171, 185, 244
 冲突与系统类型变迁 and system
 type change, 212-215
 冲突与越战 Vietnam war, 271-275
 亦参: 侵犯性, 模式变项, 系统, 功利主义,
 “恶性循环”
 传统主义 traditionalism, 44, 47, 71-72,
 80, 86, 88-89, 93-95, 115-118,
 126, 176-177, 197, 216
 亦参: 权威, 不安全感, 社会变迁, 社会

D

- 达尔文主义 (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
 Darwinism (including social Darwinism),
 5, 7, 12, 13-32, 50-52, 221-222
 亦参: 遗传与环境, 实证主义, 功利主义
 大学 universities, 63-65, 67-68, 103,
 124, 136-137, 172-173, 210, 218,
 230, 243-245, 252-254, 266-271
 亦参: 反智主义, 共同体, 民主, 教育, 国家
 社会主义, 专业, 科学, 社会学
 道德 morality, xii, 69
 失范—民主体制之分中的道德 in
 anomie-democracy divide, 27,
 39, 40, 41, 45-46, 46-47, 48
 道德与互动媒介结构 and interaction
 media structures, 197-198, 209-210
 士气/道德—士气低落/道德沦落—不道
 德 morale-demoralization-amorality,
 70-72, 74, 78-79, 88, 94, 97-98
 国民的道德资源, 道德领袖地位
 moral resource of the nation, moral
 leadership, 139, 214-215, 229
 价值一般化, “后工业”社会 value
 generalizatio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239, 247

亦参：共同体，民主，伦理，整合，规范系统，
社会控制，社会秩序，系统，价值
德国 Germany, 5, 59, 60-61, 222
前纳粹时代，魏玛时代 pre-Nazi,
Weimar, 82-83, 93-95
纳粹时代 Nazi, 21-26, 34,
36, 86-89, 96, 176
战后 postwar, 61, 97-98, 105-106,
108-110, 110-118, 121-126,
141-142, 147, 179-180
亦参：获致—先赋，欧洲，国家社会主义，种
族主义，再教育，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E

俄国 Russia, xiii, 6, 73, 92, 110, 115, 149,
167, 172, 176-177, 189, 202, 221
亦参：克里斯玛，共产主义
“恶性循环” “vicious circle”, 120,
125, 175, 198, 214-215, 216
亦参：冲突，偏离，歧视，偏见，革命，社会变
迁，社会控制

F

法律性 Legality
法律性与权威 and authority, 46, 48, 76, 196
法律作为民权底线(平等) law as
baseline for civil rights (equality),
187, 218, 227, 229, 261
法律与偏离 law and deviance, 170
纳粹德国时期司法独立的丧失 loss
of independent judiciary, Nazi
Germany, 88, 94, 104, 115-116
程序规则的法律性与正当化 and
justification, procedural rules, 79, 204
科学立法 science legislation,
150-153, 154-160
亦参：公民权，共同体，民主，制度，整合，合
法性
法治国 Rechtsstaat, xiii, 4, 46, 88,
115-116, 194-195, 234
亦参：公民权，宪政，法律性
反犹太主义 anti-Semitism, 27-28,
61-62, 83-84, 85-86, 119,

134, 140-141, 169-170
亦参：歧视，犹太人，偏见
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28-32,
42, 67-68, 76, 100-101, 138, 218
亦参：歧视，原教旨主义，不安全感，偏见
犯罪 criminality, 168-171
犯罪与克里斯玛型权威 and charismatic
authority, 42-43
作为强制的宽容犯罪 tolerance
of, as coercive, 47, 197
纳粹德国时期的犯罪 in Nazi Germany,
88, 101, 105
犯罪与功利主义行动取向(失范)
and utilitarian action orientation
(anomie), 38-39, 40
亦参：偏离，强力，不安全感
分化 Differentiation
分化与作为倒退的去分化 and
dedifferentiation, regression, 88, 185,
199, 215-216, 224-225, 246-247
政府功能的分化，分权，非零和 of functions
in government, division of
power, non-zero sum, 77-78,
101, 121-126, 191-193
分化与多元主义，涵括 and pluralism,
inclusion, 185, 226-228
亦参：“银行交易”，民主，四功能图式，互动
媒介，现代化
分析实在论 analytical realism,
7, 34, 95, 254-257
符号/符号化 symbol, symbolization
社会中张力通过怨恨的呈现 representation
of tension in society, through resentment,
120, 123, 144
符号/符号化与科学 and science, 168-170
社会共同体中的符号/符号化 in societal
community, 232-233, 233-239
符号性互动/互换媒介 symbolic media of
interaction/interchange, 185, 198-203,
204-205
与系统动力机制的关系 and system
dynamics, 215-216

亦参：“银行交易，分化，互动媒介，偏见，宗教，科学，社会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 6, 11-12, 16-19, 30-31, 34, 47-48, 222
亦参：民主，经济，平等，整合，现代化，新政，社会

G

革命 revolution

克里斯玛类型的转换 charismatic type takeover, 42, 61-62, 71-72, 115, 121-126, 174-175, 185, 198, 214-215
革命与分化，现代化 and differentiation, modernization, 227
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与教育革命 industrial, political, educational, 230-231, 249
思想革命 intellectual, 29-30
革命与媒介动力机制，去分化 and media dynamics, dedifferentiation, 198, 216, 224
亦参：社会变迁

个体 individual

民主类型社会中的个体 in democratic-type society, 200, 201, 215-216, 218
失范类型社会中遭否定的个体 negated in anomic-type society, 38, 48, 87-89, 115-118, 123-124, 196-198
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 in societal community, 232-233, 236-239, 258-259
亦参：选择自由，共同体，平等，四功能图式，制度，整合，互动媒介，模式变项，社会行动，理论

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226, 256

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230-231, 249
迅速工业化 rapid, 74
法理型社会 rational-legal type society, 94, 113-118, 121-126, 132, 185-187
亦参：“银行交易，经济，不安全感，现代化

公民权 citizenship, 161, 214

社会系统在国族中的基础 basis of social system in the nation, 113
公民权的历史变迁，行动议程 historic

changes, agendas, 185, 261-275

公民权与涵括，多元主义 and inclusion, pluralism, 212-215, 218, 226-228, 236-239, 249-251

亦参：共同体，平等，整合，法律性，合法化，社会，社会学

“公民学” “Civics,” 6, 51, 71, 240

公民自由权利 civil liberties, 98-99, 101

美国社会中的公民自由权利 in American society, 76, 79, 138, 261-265

公民自由权利与公民权 and citizenship, 218, 226-228

公民自由权利与公民权利，公民宗教 and civil rights, civil religion, 185, 242-245

失范状态下拒绝给予公民自由权利 denial of, in anomie, 87, 212-215

亦参：共同体，民主，法律性，法治国

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5, 7, 13-20, 27-29, 35-36, 38, 40, 45, 47-48, 96, 131, 165-166, 185, 203, 208, 211, 220-221, 246-248, 254-255, 255-257

亦参：达尔文主义，强力，遗传与环境，实证主义

共产主义 Communism, 6, 73, 77, 170, 172, 180, 181-182, 199, 209-210, 210, 225

共同体 community, 35, 68, 185

共同体与“无所偏倚” and “disinterestedness,” 45

共同体与社会的进化(现代化)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 (modernization), 229, 231-233

纳粹民族共同体(失范类型，伪共同体) Nazi folk community (anomie type, pseudo-community), 43, 76, 170-172

社会共同体 societal community 作为整合类型社会的社会共同体 integrated type society,

46-48, 117, 209, 214

作为整合子系统的社会共同体 integrative subsystem, 236-245, 251-254

共同体与世界秩序 and world

- order, 200-202, 209-210
 亦参: 失范, 文化, 整合, 专业人员 [原文即为“professionals”, 参看专业、专业精神。——译者注], 社会
- 规范系统 normative system
 公民社会中的规范系统 in civic society (societal community systems), 218, 226-228, 233-236, 236-239, 239-242
 规范系统与系统类型的变迁 and system type changes, 121-126, 174
 规范系统与双翼媒介结构 and two-pronged media structure(s), 194-198, 204, 215-216
 意愿论对比遗传与环境 voluntarism vs.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45-48, 49, 102-103
 亦参: 共同体, 民主, 信托, 整合, 道德, 专业, 社会, 价值, 意愿论
- 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 9-11, 27-28, 36, 61
 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范与残暴之处 anomie, atrocities, 3, 6, 10, 51, 61-61, 73-74, 102
 战胜国家社会主义 overcome, 97-98, 105-118, 121-126
 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不完善的”社会秩序 as “partial” social order, 138, 202, 227, 229
 《社会系统》中论国家社会主义 in *The Social System*, 167, 169-170, 171-172, 175-176
 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典型社会 as type society, 61-71, 65-66, 67-68, 72, 75-80, 81, 86-89, 138
 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典型结构要素 type structural elements, 59, 80, 93-95
 亦参: 反犹主义, 德国, 强制, 不安全感, 模式变项, 偏见, 仪式主义, 社会, 极权主义, 功利主义
- 国族主义 nationalism, 10, 76, 88, 97-98, 105, 123, 131, 151, 171, 197, 202, 209, 229

H

- 合法性 / 合法化 legitimacy, legitimation
 合法性 / 合法化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基础 as basis for societal community, 213, 215-216, 228-230

- 民主政权对比威权政权下的合法性 / 合法化 in democratic vs. authoritarian regimes, 42-43, 44, 45, 46, 48, 71-72, 94-95, 115-117, 171-172
 结合互动媒介结构来考察合法性 / 合法化 in relation to interaction media structure(s), 191-194, 195, 204, 209
 亦参: 权威, 克里斯玛, 法律性, 理性
- 黑人 Blacks
 黑人的社会处境 in society, 77, 236-239, 262-266
 社会学中对于黑人的探讨 in sociology, 120, 187, 226-230
 亦参: 公民权, 共同体, 歧视, 平等, 族群性, 整合
- 互动媒介 interaction media
 超越“零和”论的互动媒介观 beyond “zero sum”, 194-198, 203-208, 212-215, 219
 整合对比失范的二元结构下的互动媒介 integrative vs. anomie bipolar structure, 212-215, 215-216
 互动媒介的语言类比 language analogy, 204-205
 社会共同体、“后工业”社会中的互动媒介 in societal community, “postindustrial” society, 226, 234-235, 236-239, 245-246
 亦参: 行动取向, “银行交易”, 承担, “控制论”, 分化, 影响, 权力, 社会, 符号化, 价值
- 获致—先赋 achievement-ascription, 138, 208, 217, 231-232
 获致机会遭排斥 exclusion from achievement chances, 229
 在纳粹和战后德国的表现 in Nazi and postwar Germany, 87, 114, 122-123
 获致—先赋取向与科学 and science, 172-173
 亦参: 经济, 德国, 现代化, 模式变项, 社会

J

- 基督教 Christianity, 11, 36, 62, 71, 86, 98, 117, 119, 140, 240-242
 亦参: 新教, 宗教, 价值

“集体良知” “conscience collective”, 40,
232, 248, 257

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对比民主体制 vs.

democracy, 75-77, 79, 80-83,
99-100, 196-198, 212-216

与研究自由、社会科学构成对立的极权主义,
opposed to freedom of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65, 161-162, 173

如何取代之 supersession,
114-118, 121-126

亦参: 失范, 强制, 强力, 军国主义, 权力,
仪式主义, 系统

价值 values

失范社会(缺乏价值整合)中的价值
in anomie society (lack of value
integration), 10, 11, 38-39, 45

公民社会中的价值, 以社会共同体为焦点
in civil society, focus societal
community, 223, 231-233, 247

作为互动媒介的承担 commitment,
an interaction medium, 210-215

法西斯社会中的价值 in fascist
society, 95-97, 120, 169-170

整合秩序中的价值 in integrated order, 48
通过再教育重建价值 reestablished,
through reeducation, 117, 126

社会学家的价值(价值无涉) of
sociologist (*Wertfreiheit*), 50, 51

“理论取向的研究”中的价值 in “theory
centered research”, 165-167, 172-173

价值与双翼结构 and two-
pronged structure(s), 196-198,
201-202, 215-216

亦参: 权威, 承担, 宪法(宪政), 四功能图式,
互动媒介, 制度, 整合, 道德, 规范系统,
模式变项, 社会, 理论

价值无涉 *Wertfreiheit*, xi, 4, 46,
51, 103, 161-162, 270

亦参: 科学, 社会学, 大学

交互性 Reciprocity

偏见中遭拒弃的交互性 denied,

in prejudice, 169-170

理性、民主类型关系和社会中的交互性
in rational, democratic type relations,
society, 47, 102-103, 191-194,
195-196, 226-227, 255-256

亦参: “无所偏倚”, 理性, 社会行动, 意愿论

交换 Exchange

失范类型社会中的强制 coercion, in anomie
type society, 66, 89, 204, 212-215

交换对比“交换理论” vs. “exchange
theory,” 185, 220-221, 254-255

整合类型社会中的交互性 reciprocity,
in integrated type society, 47-48,
66, 116, 204, 212-215, 227

亦参: 选择自由, 互动媒介, 理性, 交互性,
功利主义

交换 family, 109-110, 123, 136,
143, 197, 217, 240

教育 education

贬损教育 denigration of, 17, 19, 89

教育方面遭排斥 exclusion from, 229

高等教育、自由教育与西方文明 higher,
liberal learn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63-68, 105-106, 124,
136-137, 139-141, 141-142

现代社会与教育革命 modern
society, educational revolution,
187, 201, 230-231, 247, 249

大学的动荡 university unrest, 266-271

“恶性循环”不断升级 “vicious circle”,
upgrading, 120, 240, 243-245

亦参: 公民权, 文化, 现代化, 再教育, 革命, 大学

阶级 classes, 参看: 社会阶级(分
层); 亦参: 公民权, 平等, 社会

解组 disorganization, 参看: 社会解组

经济 economy

经济与克里斯玛型非民主政权 and
charismatic, non-democratic
regime(s), 42, 88, 106, 119

经济与民主变迁、民主政权 and democratic
change, regime(s), 116, 117, 121,
122-126, 141-142, 195, 199

经济学 economics
 经济学个体主义 economic individualism, 8-9
 制度经济学 institutional, 69-71
 现代凯恩斯经济学 Keynesian, modern, 30-31, 33, 46, 68-69
 经济学对比政治学、社会学 vis-a-vis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50, 166
 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231
 货币互动媒介系统类型 money interaction medium system type, 216
 “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 247
 结合四功能图式 relative to four-function scheme, 185, 193
 亦参:“银行交易”, 资本主义, 工业化, 政治, 社会
 精神病学 psychiatry, 108, 110-114, 157
 亦参: 德国, 再教育, 社会学
 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102, 111-113, 119, 167-168
 亦参: 德国, 医疗实践, 偏见
 军国主义 militarism, 76-77, 81-82, 94, 98, 115, 121-126, 214-215

K

科学 Science
 民主与现代化中特有的专业技能 expertise, characteristic in democracy, modernization, 65-66, 75, 77, 96, 97-98, 109-110, 126
 纳粹德国时期被败坏的科学 corrupted in Nazi Germany, 62, 66-67, 80
 科学对比疑似科学、伪科学 vs. quasi-science, pseudo-science, 11, 27-28, 52, 47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堪比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 equal to natural sciences, 129-130, 134, 149-153, 155-160, 160-167
 基于研究的社会科学 research based, 256
 科学专业精神 scientific professionalism, 172-173, 218, 222
 作为对当代社会的理解的科学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9, 191-194, 215-216, 230
 亦参: 再教育, 道德, 专业, 理性, 研究, 社会学, 理论
 克里斯玛 charisma, 62, 71
 克里斯玛与“银行交易” and “banking”, 247
 麦卡锡主义中的克里斯玛 in McCarthyism, 192
 纳粹政权中的克里斯玛 in Nazi regime, 42, 86-87, 88-89, 117-118
 作为权威类型的克里斯玛与仪式/失范 and ritual/anomie, as type of authority, 40-43, 43-44, 66, 174-177
 克里斯玛与社会变迁 and social change, 212-215, 216, 224-225
 亦参: 行动取向, 权威, 原教旨主义, “元首”制, 权力, 社会
 控制 control, 参看: 社会控制
 “控制论” “cybernetics”
 “控制论”与“进化控制”论 “evolutionary-cybernetic” theory, 246-248
 “控制论”下的控制层级 hierarchy of control, 210, 216, 223, 233
 关于双翼互动媒介 re interaction media, two-pronged, 209, 209-210, 207-208, 214-215
 “控制论”比照“理性选择”理论 v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254
 “控制论”与社会进步 societal progress, 222
 宽容 permissiveness, 116, 125, 141, 167-168, 253

L

理论 Theory
 理论与经验社会 and empirical society, 8-9, 164-167, 185-186, 191-194, 215-216, 260
 科学中的理论 in science, 172-173, 255-257
 非“基础性” non-“elementary”, 220-221
 非“伪实在论” non-“pseudo-realistic”, 203, 208, 211

亦参: 研究, 政治, 科学, 社会, 社会学, 价值
无涉

理念型 ideal type, 27, 50, 52, 212-213, 216

理性 rationality
在欧洲的纳粹体制下遭到否认 denied
in Nazism, Europe, 86-89, 96-99

非理性和与理性无涉(仪式主义)对比
手段—目的理性 ir- and non-
rationality (ritualism) vs. means-end
rationality, 33, 38, 40-41, 44, 47-48

“需高深学识之专精职业”对比功利
主义思想 “learned professions”
vs. utilitarian thought, 60, 66

与社会过程中的强力和病理现象相对立的
理性 opposed to force, pathology
in social process, 215-216

社会共同体和学术系统中的理性
in societal community, academic
system, 244, 252-254

美国社会和战后德国社会中的理性 in U.S.
society, postwar German society, 77, 79,
94-95, 121-126, 138, 173-177, 194-195

亦参: 权威, 民主, 法律性, 专业, 交互性, 科学

历史 history, 3, 39, 185-187,
221, 251-254, 261-275

亦参: 现代化, 社会变迁, 社会, 理论

利益 interests
失范对比民主下的利益 anomie
vs. democracy, 39, 45, 47, 77

利益与多元主义 and pluralism, 202, 223

“既得利益” “vested interests”, 105,
114, 125, 143-144, 174, 202

亦参: “无所偏倚”, 个体, 自由主义, 模式变
项, 情境, 功利主义

伦理 ethics
“意义伦理”对比“责任伦理”
“Gesinnungsethik” vs.
“Verantwortungsethik”, 71, 89, 211, 224

亦参: 克里斯玛, 民主, 道德, 价值无涉

M

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 ix,
178-180, 180-183, 185, 187,

190, 192, 208, 209, 254, 260

亦参: 原教旨主义, 现代化

民主 / 民主体制 Democracy
民主对比作为法西斯类型社会系统的失范
vs. anomie, fascism type social system,
32, 46, 51-52, 58, 75-80, 87, 102,
119-120, 170-172, 174-176, 215-216

关于互动媒介, 双翼功能系统变异
re interaction media, two-pronged
functional system variation,
186-187, 195, 196-198, 204, 223

前纳粹时代的德国结构对比战后的德国结
构 Germany, pre-Nazi vs. postwar
structures, 93-95, 97-98, 105-106,
108, 123-124, 141-142

作为社会科学认知旨趣的民主
knowledge interest of social sciences,
ix-x, 155-160, 161-162, 243-245

关于社会共同体 re societal community,
226-230, 236-239, 240-241, 243-245

美国的民主体制, 20世纪40年代的结构特
性, “实情策略” U.S. democracy,
structural features 1940s, “strategy
of truth”, 76-77, 99-100, 138

亦参: 共同体, 分化, 四功能图式, 互动媒
介, 整合, 现代化, 道德, 模式变项, 政
治, 社会, 福利国家

模式变项 pattern variables
在德国, 先赋取代获致, 获致取代先赋
achievement replaced by ascription,
ascription by achievement, in
Germany, 87, 122-123

作为集体取向的“不偏不倚”
“disinterestedness”, as
collectivity orientation, 45, 48

在纳粹“元首”制中体现的伦理特殊主义
ethical particularism, Nazi
“Führer” principle, 76, 80

在宗教和美国社会中体现的伦理普遍主义
ethical universalism, in religion,
American society, 62, 68, 79

模式变项与互动媒介结构, 社会共同体

- and interaction media structures, societal community, 214, 215-216, 217, 257
 非民主体制与民主体制这两极的模式变项 non-democratic vs. democratic poles, 114
 在德国, 普遍主义取代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 replaced by universalism, in Germany, 141
 社会系统中的张力与机制 tensions, mechanisms in social system, 170-172
 亦参: 获致—先赋, 承担, 情境, 社会行动, 社会, 系统,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价值
- N**
- 女性 women, 94, 105, 113, 123, 227
 亦参: 公民权, 德国
- O**
- 欧洲 Europe
 欧洲的科学 with 立场 European science, standpoint, xi, 12-13, 32-33, 40, 51, 255-256
 欧洲的种族主义与悲观主义 racism, pessimism, 21-26, 36-37
 欧洲的战争与战后重建 war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79-80, 90-92, 98-99, 108, 109, 120, 121, 123, 124-126, 160, 158-160
 亦参: 经济, 再教育, 价值
- P**
- 偏见 prejudice
 偏见与强制, 杀戮 and coercion, murder, 120, 169-170, 197
 偏见与分化, 社会变迁 and differentiation, social change, 124, 227-228
 偏见与专业科学 vs. professional science, 172-173
 偏见与“相对剥夺”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217-218
 “通俗小报式思维”, “寻找替罪羊” “tabloid thinking”, “scapegoating”, 114, 118, 119, 148
 亦参: 侵犯性, 反智主义, 反犹主义, 歧视, 原教旨主义, 不安全感, 种族主义
- 偏离 Deviance
 在民主社会中作为非承担倾向的行动 in democratic society, as non-community prone action, 217, 238-239, 246
 作为社会行动系统的类型 as type of social action system, 101-102, 120, 168-170, 196-198, 215-216, 227
 亦参: 犯罪, 社会控制, “恶性循环”
- 平等 equality
 平等与涵括 / 排斥 关于模式变项、互动媒介 and inclusion/exclusion re pattern variables, interaction media, 77, 88, 209, 216-219, 228-230
 机会平等 of opportunity, 76, 117, 138, 209, 217
 平等与政治观念, 权威结构 and political ideas, authority structures, 96, 123-124, 187, 195, 201
 “后工业”社会的平等与“次生”不平等 and “secondary” inequalit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217, 249-251
 亦参: 宪法 (宪政), 共同体, 经济, 族群性, 个体, 互动媒介, 模式变项, 社会阶级 (分层), 社会
-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
 资格能力、信托权威 competence, fiduciary authority, 219
 纳粹类型社会中的普遍主义性质减弱 decrease of universalism, in Nazi type society, 10, 68-72, 76, 87, 138, 169
 民主类型社会中的普遍主义性质增强 increase of universalism, in democratic type society, 79, 114, 121-126, 231-232
 “后工业”社会中的制度 institu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247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与社会控制类型 and types of social control, 114, 197-198
 亦参: 伦理, “元首”制, 信托, 德国, 现代化, 模式变项, 偏见, 种族主义, 社会控制, 价值

Q

歧视 Discrimination

民主体制内的危险地带 danger zone
in democracy, 77, 144, 168-170
社会共同体内的涵括 / 排斥 inclusion/
exclusion in societal community, 228-230
非民主政权内的歧视 in non-democratic
regimes, 88, 118-120, 140-141, 197
保护免遭歧视 protection from, 239
亦参: 反智主义, 反犹主义, 偏离, 情感, 偏见

强力 force

强力与失范型社会秩序 and anomic
social order, 10, 35-37, 37-38,
38-39, 42-44, 46, 47, 48, 88-89
强力与互动媒介的“金本位”原教旨主义一
极 and interaction media “gold-standard”
fundamentalist pole, 208-209, 234-235
强力与负责的社会科学分析动
力 and responsible social-science
analytical impetus, 151, 155-160
强力与双翼功能系统 and two-pronged
functional systems, 196-198
亦参: 失范, 强制, 达尔文主义, 不安全感,
国家社会主义, 极权主义, “一切人对
一切人的战争”

强制 coercion

互动媒介系统中的强制一极
anomie pole in interaction media
system(s), 196-198, 208-209
强制对比影响(说服) vs. influence
(persuasion), 47, 66, 215
强制与管辖权域 and jurisdiction, 235
作为社会控制类型的强制 as
type of social control, 101-102,
104-105, 158, 174-177
亦参: 失范, 权威, 专制, 强力, 原教旨主义,
权力, 极权主义

侵犯性 aggression, 46, 120, 169-170

散漫飘移的侵犯性 free-floating,
94, 100, 143-144
德国与日本的侵犯性 German and Japanese,
58, 85-86, 97-98, 100-103, 105, 124

关于越战的侵犯性 re Vietnam
War, 271-275

亦参: 受挫感, 不安全感, 偏见

情感 emotion

作为“通俗小报式思维”的负面情感
negative, as “tabloid thinking,”
94-95, 115, 119, 125, 192-193, 196
作为人际“感情”的正面情感 positive,
as interpersonal “affect”, 259

亦参: 歧视, 制度, 整合, 价值

情境(情境界定) situation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100-102, 114, 119, 125, 165-166,
172-173, 195, 202

亦参: 利益, 模式变项, 社会行动

权力 power, polity

权力与类型的变迁 change of
type, 97-98, 123, 174
民主的、整合的权力 democratic,
integrated, 48, 66, 99-100
强力的、欺诈的权力, 仪式主义、克里斯玛
型的权力 force and fraud,
ritualistic / charismatic, 11, 42,
65, 76, 86-89, 96-97, 104
“后工业”社会(社会共同体)中的权力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ocietal
community), 218, 226, 247

作为非“零和”概念与现象的权力
non-“zero sum” concept and
phenomenon, 190-191, 197-198,
199-203, 208-210, 213-215, 215-216
亦参: 失范, 权威, 承担, “控制论”, 民主, 经
济, 影响, 政治, 社会

权威 authority, 215-216

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 50,
61-62, 81-82, 107, 171-172
社会变迁中的权威类型变迁 change of
type, in social change, 121-126, 224-225

强制性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
coercive, charismatic, 37, 42,
71-72, 76, 80, 194-198

信托权威 fiduciary, 218, 238

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影响权威 moral,

legal, influence, 41, 65-66, 206
 行动系统中的权威类型 types, in action systems, 43-45, 87-89, 185, 195-196
 亦参: 失范, “银行交易”, 克里斯玛, 强制, 共同体, 四功能图式, 互动媒介, 现代化, 模式变项, 权力, 专业

R

日本 Japan, 135, 148-149, 152-153

S

社会 society

美国社会的要素与原则 American,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62, 75-77, 79
 社会的进化普遍项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231-233
 前纳粹、纳粹与战后德国社会的要素与原则 pre-Nazi, Nazi, and postwar German,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82-83, 86-89, 93-95, 124-126
 社会与社会共同体、“后工业”社会 and societal community, “postindustrial” society, 233-245, 247
 作为社会学分析主题的社会 as subject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8-9, 50, 79, 161-162, 163, 187, 191-194
 经验社会分析的双翼模型 two-pronged model(s) of analysis for empirical society, 8-9, 34-35, 35-48, 59, 114, 195-198, 212-215, 215-216, 219-223, 260-261
 结合社会秩序类型看经验社会中的变异 variation in empirical societies, relative to types of social order, 114-115, 170-171
 西方民主整合型社会 Western, democratic, integrated, 6, 103, 114, 124
 亦参: 经济, 四功能图式, 互动媒介, 模式变项, 政治, 社会行动, 科学, 社会学

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受控型制度变迁 controlled institutional change, 115-118, 121-126
 社会变迁与社会过程的差异 different from social process, 225-226
 通过分化、涵括实现社会变迁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inclusion, 224-225, 228-230, 242-245
 通过通胀—紧缩、媒介去分化实现社会变迁 through inflation-deflation, media dedifferentiation, 214-215, 215-216
 倒退型社会变迁 regressive, 87, 198
 现代化中的失范源泉 sources of anomie in modernization, 96, 258
 《社会系统》中韦伯视角下的三种社会变迁类型 three types, Weberian perspective, in *The Social System*, 173-177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社会变迁 in U.S. society, 1960s, 184-185
 亦参: 分化, 不安全感, 现代化, 革命, 社会控制, “恶性循环”
 “社会福音运动” “Social Gospel”, 68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103, 111-112, 185
 亦参: 四功能图式, 再教育
 社会阶级(分层) social class (stratification), 47, 77, 116, 171, 189, 195, 217, 226, 240, 247, 249-251
 亦参: 公民权, 分化, 歧视, 平等, 不安全感, 社会
 社会解组 social disorganization
 失范、专制下的社会解组 in anomie, dictatorship 10, 39, 45, 50
 权威、产权控制下的社会解组 controlled by authority, property, 195, 216
 欧洲、德国二战后受控型社会解组 controlled post-World War II in Germany, Europe, 110, 125
 经由去分化进行的社会解组 per dedifferentiation, 224-225
 社会解组并不一定等于去整合 not necessarily desintegration, 102
 亦参: 失范, 强力, 不安全感, 社会控制,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
 社会控制与分化、多元主义、公民社会 and differentiation, pluralism, civil society, 224-225, 239-242
 作为行动促动因素的四类社会控制 four types, as action incentive, 197-198

社会控制与再教育 and reeducation, 102-103, 141-142
 关于变迁的社会控制类型 types, re change, 115-117, 173-177
 强制型与自愿型社会控制 two types, coercive vs. voluntary, 101-103
 社会控制与社会类型, “控制论”媒介等级序列 and types of society, “cybernetic” hierarchy of media, 210, 215-216, 233
 亦参: 行动取向, “银行交易”, 强制, “控制论”, 互动媒介, 模式变项, 宽容, 社会行动, 社会变迁, 价值, 意愿论
 《社会系统》 *The Social System*, 163, 167-177, 192, 210, 215-216, 219
 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
 社会行动的类型变迁 change of type, 121-126, 173-177
 克里斯玛—仪式主义型社会行动 对比民主—整合型社会行动 charismatic-ritualistic vs. democratic-integrated, 40-43, 45-48
 社会行动的四功能图式 four-function scheme, 185, 191-194
 社会行动的互动媒介动力机制 interaction media dynamics, 215-216
 经由社会共同体进行的社会行动 per societal community, 236-243
 美国社会的社会行动对比纳粹社会的社会行动 U.S. society, vs. Nazi society, 79-80
 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 Weberian theory, 167, 168-169, 173-177
 亦参: 行动取向, 失范, 共同体, 民主, 四功能图式, 整合, 互动媒介, 模式变项, 理性, 交互性, 宗教, 社会
 《社会行动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3-5, 32-48, 51, 101-102, 128, 170-172, 177, 187, 219, 255-260
 社会学 sociology
 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行动议程, 通过互动媒介动力、公民社会构建社会学理论 analyzing new agenda 1960s, theory per interaction media dynamics, civil society, 187, 191-194, 203, 208, 210, 211, 231,

243-245, 246-248, 257, 260-261
 分析政治危机、社会、政策选择、二战 analyzing political crisis, societies, policy options, World War II, 84, 86-89, 97, 110-115, 117, 120-126
 在经验分析方面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的区别 distinct from economics, politics, re empirical analysis, 2, 34-35, 49-51
 专业、基础科学、国家资源 profession, basic science, national resource, 103, 151-152, 153, 160-162, 172-173
 亦参: 研究, 科学, 社会, 价值无涉
 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
 美国社会秩序对比欧洲社会秩序 American vs. European, 75-77, 123-126
 失范型(极权主义)社会秩序对比整合型(民主体制)社会秩序 anomic (totalitarian) vs. integrated (democracy), 35-48, 77, 202
 社会秩序与原子弹 and atom bomb, 152
 社会秩序与从互动媒介概念来理解社会 and interaction media 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ety, 191-194, 199-202
 再加上系统功能与类型变异 plus system function and type variation, 215-216
 聚焦于社会共同体 focus societal community, 232-233, 234, 236-239
 社会秩序与从模式变项概念来理解社会 and pattern variable 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ety, 170-173
 亦参: 失范, 强制, 民主, 四功能图式, 互动媒介, 整合, 合法化, 道德, 国族主义, 模式变项, 社会,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失范 anomic, 39, 95-97, 215
 失范类型的社会 anomic type society, 6, 9-10, 35-45, 216
 强制型社会控制/异化性行动取向 coercive social control/alienative action orientation, 101, 168-170, 197-198
 去分化, 社会共同体的衰微 dedifferentiation, deterioration of societal community, 224-225

- 失范对比整合 vs. integration, 45, 58-59, 186-187, 209-210, 212-215, 249, 251
 如何取代失范 supersession, 115-118
 亦参: 权威, 强制, 强力, 不安全感, 社会控制, 社会解组, 社会
- 实证主义 positivism, 255-257
 20世纪30—50年代的反实证主义 anti-positivism, 1930s-1950s, 5, 7, 27-32, 95, 165-166, 190-191
 霍曼斯与科尔曼那里的实证主义 in Homans, Coleman, 220-221, 254-255
 “伪实在论理论阐述” “pseudo-realistic theorizing”, 203, 208, 211
 实证主义对比社会系统中的科学 vs. science in social system, 170-172
 亦参: 达尔文主义, 功利主义, 价值无涉
- 士气 morale, 81-83, 104-105, 135
- 受挫感 frustration, 38, 143
 亦参: 侵犯性, 不安全感
- 说服 persuasion, 47, 48, 99, 100, 172-173, 204, 214-215
 亦参: 选择自由, 影响
- 四功能图式 four-function scheme
 AGIL图式 AGIL-scheme, 185
 说明行动、投票 explaining action, voting, 191-194
 用AGIL图式和LIGA图式说明社会控制/社会化 and LIGA-scheme, for social control/socialization, 257
 AGIL图式与社会共同体 and societal community, 232-233, 245-246
 AGIL图式与各子系统的双翼结构 and two-pronged structure(s) of subsystems, 195-198, 210, 214, 216
 功能制度 functional institutions, 219
 亦参: 制度, 社会行动, 社会

W

- 妄想狂 paranoia, 10, 101, 107, 108, 118, 124, 143-144, 169-170
 亦参: 反犹主义, 偏离, 偏见, 再教育
- 危机 crisis
 危机与系统类型的变迁, 互动媒介动力机制

- and change of types of systems, interaction media dynamics, 209-210, 212-215
 危机时刻社会科学(科学家)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science (scientist), in times of, 74-75, 86-89, 103, 165

文化 culture

- 文化悲观主义 cultural pessimism, xi-xii, 36-37, 53-57, 89, 230
 作为(第四)功能系统的文化 as (fourth) functional system, 220, 246
 文化与意义、社会秩序 and meaning, social order, 107, 222, 232, 257
 文化与怨恨 and resentment, 218
 文化与重构(德国) reconstruction (Germany), 107, 110-113
 文化与研究 research, 109-110, 112-113, 131-132, 166-167
 文化与价值承担 and value-commitments, 211-212
 亦参: 承担, 共同体, 四功能图式, 互动媒介, 研究, 社会, 大学, 价值
 “无所偏倚” “disinterestedness,” 45, 48, 102, 165-166, 173, 207
 亦参: 医疗实践, 模式变项

X

系统 system

- 系统的“控制论”等级序列、社会子系统 “cybernetic” hierarchy, societal subsystems, 223
 系统的动力机制, 四功能图式 dynamics, four-function scheme, 185
 系统的动力机制, 互动媒介 dynamics, interaction media, 219-223
 系统的动力机制, 政治子系统 dynamics, political subsystem, 191-194, 194-203, 215-216
 整合子系统、社会共同体 integrative subsystem societal community, 245-246
 亦参: 行动取向, 道德, 规范系统, 社会秩序, 社会, 社会学, 《社会行动的结构》, 《社会系统》, 价值
- 现代化 modernization

现代化与失范 and anomie,
39, 75-76, 86-89
现代社会的现代化 of modern society,
48, 115-118, 121-126, 174,
184-185, 225-226, 246-247
现代化的逆转、倒退 reversal, regression,
174-175, 215, 268-270
双翼媒介过程动力机制 two-pronged media
process dynamics, 193,
213-214, 246-247
亦参: 共同体, “控制论”, 分化, 不安全感,
社会变迁
宪法(宪政) constitution(alism), 46, 77-78,
美国民主体制中的宪法(宪政) in
American democracy, 79, 138, 223, 228
宪法(宪政)与权力、政治体中的影响
结构 and power, influence structure
in polity, 191-194, 207, 209
宪法(宪政)与社会共同体 and societal
community, 236-239
亦参: 法律性, 合法性, 理性
心理学 Psychology
“德国社会结构与国民心理” “German
Social Structure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82, 93, 97-98,
107, 111-112, 122-124
实践理论取向的研究 practicing
theoretically orientated research, 166-167
心理战、裁军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sarmament, 98-100, 126
亦参: 社会学
新教 Protestantism, 70-71, 85-86, 113, 214,
227-228, 240-242
亦参: 资本主义, 基督教, 宗教
新政 New Deal, ix, 11, 29-30, 34, 45-48, 51
信托 fiduciary, 200, 212-215, 218, 249
亦参: 权威, “银行交易”, 共同体, 分化,
医疗实践, 专业
信息 information
威权社会对比民主社会中的信息
in authoritarian vs. democratic
society, 99, 120, 226
社会共同体中的信息 in societal

community, 243-244
双翼媒介结构 two-pronged
structure(s) of media, 185, 195-198,
204-205, 210-212, 212-215
亦参: 公民权, 互动媒介, 制度, 大学
行动取向 action orientation
失范型、克里斯玛型、仪式型、符号型行动
取向 anomic, charismatic, ritual,
symbolic, 38, 40-41, 43, 169-170
行动取向与偏离 and deviance,
168-169, 170
行动取向与四功能图式 and four-
function scheme, 191-194
行动取向与互动媒介 and interaction
media, 204-206, 210-212, 215-216
理性、交互性行动取向 rational,
reciprocal, 45, 47, 77, 79, 138
行动取向与科学 and science, 172-173
社会共同体中的行动取向 in societal
community, 246, 255-260
“基元行动” “Unit Act”, 50
亦参: 失范, 权威, 克里斯玛, 整合, 理性,
社会行动, 社会, 价值
宣传 propaganda, 65-67, 94, 98-103, 117,
131, 172, 197
宣传类型(民主式、反民主式) types
of (democratic, anti-democratic),
78-79, 101-103, 117
宣传与舆论(多元主义) vis-a-vis public
opinion (pluralism), 214-215
亦参: 舆论
选择自由 choice, freedom of, 41, 47,
199, 204, 213, 227, 240-241
亦参: 个体, 整合, 意愿论

Y

研究 research
研究议程 agendas, 162, 163
作为基本国家资源的研究、作为国家资源
的研究 as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national
resource, 153, 155-160, 160-167
“理论取向”的研究 “theory-oriented”,
163, 165-166, 172-173, 191-194

- 亦参: 科学, 社会学, 理论, 价值无涉
- 医疗实践 *medical practice*, 11, 64, 67-68
- 医患社会系统 *physician-patient social system*, 103, 112, 161-162, 167-168
- 医疗实践与“专业综合体” and “*professional complex*”, 207, 219
- 亦参: “无所偏倚”, 专业, 社会学
-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War of All Against All*”, 30, 39, 40, 47, 51, 55, 209, 216, 257
- 亦参: 失范, 强力, 不安全感, 权力, 功利主义, 极权主义
- 仪式主义 *ritualism*
- 失范类型社会中的仪式主义 *in anomic type society*, 8, 39, 40-43, 71
- 作为偏离动力的仪式主义 *as deviant motivation*, 169
- 纳粹类型政权下的仪式主义 *in Nazi type regime*, 71, 80, 86-89
- 理性取代仪式主义 *replaced by rationality*, 115, 121-126
- 亦参: 伦理, 国家社会主义, 极权主义
- 遗传与环境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27, 48-49, 52, 220-221, 222
- 亦参: 达尔文主义
- 意愿论 *voluntarism*
- 纳粹德国下的犯罪化, 被强制否认 *criminalized in Nazi Germany, denied in coercion*, 88, 102, 174, 197
- 作为现代社会系统中的民主、整合要素 *as democratic, integrative element in system (s) of modern society*, 102-103, 115-118, 121-126, 138
- 现代化过程中意愿论色彩的增强 *increase in modernization*, 231-233
- 作为双翼行动结构中的一端 *as one side in two-pronged structure(s) of action*, 197, 212-215, 216
- 社会科学所促进的意愿论 *promoted by social sciences*, 161-162
- 《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意愿论 *in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1-2, 6, 8-9, 12, 32, 41, 45-48, 51
- 亦参: 选择自由, 影响, 制度, 整合, 说服, 交互性, 科学, 社会学, 价值
- “银行交易” “*banking*”, 152, 247
- “银行交易”与承担 *commitment*, 213-215
- “银行交易”与社会系统中的分化/去分化 *differentiation/dedifferentiation in social system(s)*, 214-215, 224-225, 226
- “银行交易”与影响 *influence*, 206-207, 209-210
- “银行交易”与货币 *money*, 198, 200, 203, 205
- “银行交易”与权力 *power*, 198-203
- “银行交易”与“恶性循环” and “*vicious circles*”, 216
- 亦参: 民主, 互动媒介, 现代化
- 影响 *influence*
- 影响与社会共同体 and *societal community*, 218, 236, 238
- 影响与双翼功能结构 *in two-pronged structure(s) of function(s)*, 145, 185, 197, 203-204, 205, 206, 207-208, 215-216
- 影响的类型 *types of*, 65-66, 66-67, 101, 207
- 亦参: “控制论”, 四功能图式, 互动媒介, 说服, 权力
- “应战努力” “*effort*”, 20, 41, 100, 129-149, 153-160
- 犹太人 *Jews*, 10, 65, 72, 77, 88, 101, 119, 140, 169-170, 228, 251
- 亦参: 反犹主义, 族群性, 原教旨主义, 偏见
- 舆论 *public opinion*
- 民主社会中的舆论与公民权 and *citizenship in democratic society*, 207, 214, 235-236, 238
- 舆论与“实情策略”、(社会) 科学 and “*strategy of truth*”, (social) *science*, 98-100, 173
- 亦参: 影响, 政治, 社会
- “元首”制 “*Führer*” *principle*, 10, 34, 42, 65, 76, 87, 195, 214-215
- 亦参: 权威, 克里斯玛, 国家社会主义,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 原教旨主义 *fundamentalism*, 76-77,

95-97, 114, 123-126, 140, 185,
196-197, 209, 214-215, 251

亦参:反智主义,反犹主义,不安全感,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麦卡锡主义,政治,偏见,宗教

原子弹 atom bomb, 144, 149-153,
164, 177, 203, 271-275

Z

再教育 reeducation, 97-98, 105-108,
121-126, 141-142, 272

亦参:德国,社会变迁

整合 integration

整合对比失范、强制 vs. anomie,
coercion, 38-39, 45, 51-52,
59, 196-198, 215-216

极化功能系统中的整合 in bipolar
function systems, 191-194, 195-196,
209-210, 212-215, 215-216

整合与民主社会秩序 democratic social
order, 45-48, 50, 102-103, 114-118,
123-126, 166, 170, 172

在失范与去分化中整合的丧失 loss of, in
anomie, dedifferentiation, 39, 224-225

通过多样性、分化实现整合 per diversity,
differentiation, 230, 247, 249

“不完善的”整合对比现代的整合 “partial”
vs. modern, 51-52, 120, 171-172, 202

以社会共同体为渠道实现整合 in/
through societal community,
186-187, 214, 225-233, 236-245,
245-246, 249, 254-260

亦参:权威,选择自由,共同体,分化,制度,
专业,社会,价值

政治 politics

失范性极权主义类型政

治 anomie totalitarian type, xi,
43, 73, 93-95, 196-197

民主类型的政治 democratic type, 3-12,
46-48, 75-78, 113-115, 121-126,
195-196, 203-204

有别于经济、社会的政治 distinct from
economy, society, 50, 170-172, 190, 192

国家政治、国际政治 national, international,
83, 86-89, 144, 158, 160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108, 231

“金本位”与“信贷”类型结构之间摇摆的
政治 varying between “gold standard”
-and “credit” -type structure, 212-215

亦参:失范,民主,经济,原教旨主义,影响,权力,社会

职司 office

纳粹政权下职司观念的瓦解 breakdown of
idea of office, in Nazi regime, 11, 80, 88,
126

职司作为民主类型社会的典型特征 as
typical for democratic-type society, 66,
96, 170, 192-193, 195, 204, 207, 232

亦参:民主,影响,模式变项,社会

制度 institution

受控型社会变迁 controlled social change,
117-118, 125-126, 141-142

社会共同体中的制度与制度化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societal
community, 204, 218, 226, 229

制度与价值内化 and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 212, 214-215, 257-260

民主型社会秩序中的制度与合法性 and
legitimacy, in democratic social order, 43,
48, 75-77, 102-103, 114, 116, 170, 195

亦参:承担,个体,整合,法律性,合法性,
价值,意愿论

种族 race, racism

关于黑人的整合(“统合与冲突”) re
integration of Blacks (“Unity
and Conflict”), 228, 229-230

前纳粹、纳粹、后纳粹德国的种族问题
pre-Nazi, Nazi, post-Nazi
Germany, 21-26, 61-62, 86-88,
97-98, 104, 118-120, 123-124

普遍主义—先赋取向机制 universalism-
ascription mechanism, 171-172, 197

亦参:反犹主义,黑人,公民权,族群性,平
等,原教旨主义,偏见,社会

专精职业/专业精神 professions, professionalism
作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

- 模式”,“教育革命”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third model,” “educational revolution,”* 60, 249
- 作为通过影响发挥作用的专家的“需高深学识之专精职业” *“learned professions” as experts through influence,* 66, 102-103, 126, 138, 207-208
- 信托权威 *fiduciary authority,* 218, 219, 243-245
- 纳粹政权下遭到否认 *negated in Nazi regime,* 87
- 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倡导 *promoted in industrial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96, 163
- 具体体现为社会学家 *sociologists,* 103, 161-162
- 大学中的表现 *in universities,* 172-173, 213
- 亦参: 共同体, 教育, 影响, 法律性, 医疗, 理性, 科学, 社会, 社会学, 大学
- 专制 Dictatorship**
- 基于强力和不安全感的克里斯玛型专制 *charismatic, based on force, insecurity,* 10f, 42, 73, 87, 100, 103, 196-198
- 专制与对大学的破坏 *and destruction of university,* 244
- 专制与伦理 *and ethics,* 224
- 从互动媒介动力机制的角度谈专制 *in terms of interaction media dynamics,* 215-216
- 亦参: 克里斯玛, 强制, 强力, 极权主义
-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32, 39, 68-70
- 资本主义与民主型社会秩序 *and democratic social order,* 46, 115-117, 122-123, 126, 215-216
- 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and fascism,* 87-88
- 资本主义“精神” *“spirit” of,* 70-72, 214
- 亦参: 共产主义, 经济, 权力, 专业
-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 欧美的自由民主社会 *liberal-democratic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 Europe,* 76, 79-80, 93, 116, 123-126, 170, 184-185
- 自由教育 *liberal learning,* 63-68, 243-245
-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 *“Manchester” liberalism,* 18, 35, 38-39, 170, 175, 209
- 亦参: 失范, 民主, 欧洲, 功利主义,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福利国家
- 宗教 religion**
- 多元性、整合性的公民宗教 *civil religion, pluralist and integrative,* 187, 223, 228-230, 237, 239-242
- 理性行动、民主型权威中的宗教 *in rational action, democratic authority,* 44, 47-48
- 战后德国重建的宗教 *reestablished, in postwar Germany,* 117
- 仪式性行动、克里斯玛型权威中的宗教 *in ritual action, charismatic authority,* 33, 40-41, 42, 47-48
- 作为不平等之源的宗教 *source of inequality,* 217
- 纳粹体制对于普遍主义宗教和自由经济的威胁 *threat to universalist religion, liberal economy, in Nazism,* 62, 68-72, 77, 83-86, 118-120, 127
- 亦参: 权威, 经济, 社会
- 族群性 ethnicity**
- 族群性与公民权 *and citizenship,* 217, 249-251, 262-266
- 族群性与极化, “后工业”社会的涵括/排斥 *and polarization, inclusion/exclusion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226-230, 247
- 亦参: 黑人, 公民权, 平等, 犹太人

译者说明

译者于2004年初次接触本书，2006年8月至2007年2月断续阅读，对大量档案资料进行了初译。2008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公司徐文宁先生拿来此书征求意见，“相见如故”，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完成全书翻译。2008年4至5月于北京、2009年5至8月于北京和杭州完成全书二译和初校。2009年9月于北京完成二校。

原书涉及大量人物、团体、机构等专名，注解涉及各类档案资料，细致乃至繁琐，译者虽几经校译，或仍有错漏之处。书后三份中外索引，系译者根据原书两份索引进行重新编排、增订而成。人名在书中首次出现时会给出全译。原书索引页码遗漏甚多，中译者虽多加补充，恐仍有疏忽。

由于原书注解繁多，中译本仅在个别必要之处加了中译注，并为了保持索引仍可查找，以另一种字体随注在正文中，不另行编号（个别正文夹注未注明“中译者注”者，属于原文夹注）。

此书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挖掘帕森斯丰富的非正式出版文稿，以平衡乃至反驳单纯基于帕森斯正式出版的论著和文章所产生的片面或是错误的判断。但是，鉴于汉语学界目前对于帕森斯正式出版的著述翻译十分稀少，研究也寥寥无几（以译者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赵立伟先生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规范与自由：重构帕森斯社会理论》，无论规模还是深度，均为汉语学界之仅见，足资参阅，期待早日出书。），阅读本书时或许不能充分体会到这种意义，甚至会产生“矫枉过正”的另一种片面印象。这是需要提醒中文读者注意的。不了解对于帕森斯的某些错误定论，或者不比照晚近社会理论中某些潮流人物（比如福柯），恐怕无法深刻体会作者为何要如此详细地讨论帕森斯的某些观念（比如权力观）。

此外，即使是综合讨论帕森斯的“道、学、政”，本书也只是选取了几个阶段，聚焦于一些重点事件，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帕森斯全传”。或许首先要做的基础性工作，是能够利用浩繁的档案资料，作出一部《帕森斯年谱长编》之类的东西来。稍加细致地盘点这位“江湖大佬”的身前身后、业内业外、增益毁损，也就算一部20世纪美国社会学史的最重头篇章了。

2004年的八九月间，我去到哈佛大学，开始为期一年的燕京访问学者项目。当时的申请理由之一就是去哈佛大学档案馆全面接触有关帕森斯的这些原始资料。五年后的今天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不仅算是小小回报一下当时拿的那些钱，也更能对照出当时自己是多么不自量力，更能理解自己在哈佛教员俱乐部的学社欢迎仪式上介绍自己的“研究计划”时，周遭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的礼节性微笑了。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在应邀为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译本（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的新印本撰写导言时，使用了本书的不少材料，由于出版社要求导言不署名、不注释，也由于当时本书中译尚在进行中，故此未加注明。有违学术规范，敬请读者明察。

2009年9月3日
李康于京北西二旗



2